

# 房山最早的师范学校

魏志华

我小时候就听说过房山师范学校的一些情况。最近路过这个学校的旧址，又想起这所具有特殊意义的学校。它办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影响很大。是房山县最早的一所师范学校，也是当时房山县的“最高学府”。因为当时全县只有几所完小，没有一所中学，因此在全县名气很大。但这个学校已停办了六十多年，知道情况的人已经不多了，因此，我决心把它调查、整理一下。

开始，我在县城附近找了十几位老教师、老干部，但知情者不多。当时师范学校的老师、学生大多已不在人世。有的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记忆不清。最后，跑了几趟洪寺、顾册、饶乐府等村，才找到几位当时师范的学生、已80多岁的退休教师（饶乐府村的老教师邢惠芳已87岁）。经过细致座谈，认真回忆，反复印证，又查了一些资料，才把房山县简易师范学校的情况基本搞清。

房山县简易师范学校建于1933年。当时的县政府为了培养师资力量，发展教育事业，建立了这所学校。开始称“房山县简易师范学校”，后来又改为“房山县乡村师范学校”。学校的地点在城西小洪寺村东头（解放前小洪寺与大洪寺是两个独立的行政村，1956年合作社时两个村合并为洪寺村）。大洪寺西头、留台山下边是长育完小。师范学校的房子是租用于浩然的一个院（原来是做买卖用的）。房屋20多间，有教室、教师办公室、学生宿舍、伙房。学制4年（学习3年、实习一年）。课程有语文、数学、地理、历史、自然、生理卫生、音乐、体育，此外还设了教学法、教材研究等课程。学校的设备比较简陋但也有一些必要的设施，如风琴、篮球、乒乓球等。

简易师范共办了两期。第一期是1933年暑假，共招了50来人。当时的校长是莘颜湘（韩村河人），教师有姜时喆（佛子庄村人）、毛长福（芦村人）、王石斋。姜时喆、毛长福都是通县师范毕业，庶务是赵国民。因教师少，校长也兼教一些课程。第一期师范的学生有范公廉、邱迪春、赵然、常健、蒲怀颜、葛华、姜志华、邱汝绩、常守礼、常守智、张荣、杜森、徐安、苏乃

京、杨天鹏、崔士纯、李连奎、安庆杰、宋绍先、郑石桥、王凤祥、赵继贤、郑桐、马希杰、闫桂荣、邢惠芳、车秀芬、车乃章、李志媛、邢福兴、段勋阁、郭维农等。

第一期师范学生 1936 年暑假毕业后，分配到本县各学校实习。1937 年暑假回校又参加一次考试，才正式毕业，发了毕业证书。

第二期师范招生是在 1936 年暑假，第一期学生毕业、实习后才招的，共 40 多人。有隗永禄、隗永湘、孙道新、杨春芳、葛英、韩宗信、张铎、李明箴、韩永志、丁士超、陈士雄、邱万春、贾万钟、张惠娴等。

这两期师范班的学生分布很广，来自五十多个村。不仅有房山城关附近洪寺、东街、西街、南街、南关、北庄、饶乐府、田各庄、瓜市、顾册、坨头、周口店、五侯村的，还有南边离县城六七十里的镇江营、石门村的，北边有坨里、李各庄、陈家台、佛子庄、南窖、北窖、水峪、长操等山区的学生。从学生年龄上看差别也很大。大的有 20 多岁、还有的已结了婚。小的只有 12 岁。如西街的车秀芬、车乃章，考入师范时只有 12 岁，段勋阁、苏乃京、李连奎等都已 20 多岁。考入师范的学生功课都比较好。大部分是长育完小毕业的。长育完小于 1920 年建校，师资力量强，治学严谨，远近闻名。几次全县完小观摩比赛，长育完小各门功课及体育，都名列前茅。师范的学生除几个女生外，绝大部分在校住宿。离家远的一般每月回家一次。每到星期天，不少学生到洪寺村西山顶庙树林中去学习。当时山上的树很多，1946 年被房山伪军砍掉，并在山上盖上了岗楼。学校的环境也比较好，院落比较大、宽敞的教室、院里有球场，还有十几棵大垂柳。当时的学校为了使毕业生及适应农村形势，除了课堂上讲些农业生产知识外，每个星期六下午半天，组织全体老师、学生到城关北市农业试验场去劳动，学习农业技术，体验生活。每年植树节，还到北市农业试验场去植树，使学生养成劳动习惯。此外，学校还办了板报和月刊。发表学生的作文、诗歌、绘画等，对提高学生的字体水平起了很好的作用。学校的教学方法也比较好。他们借签了长育学校的经验，严格管理，因此，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学校风气正，团结互助，严守纪律。学校还建立了学生自治会。赵然任班长、课代表，还是学生会主席。

1936 年第一期师范班毕业后，学校的人事有些变动。莘颜湘校长调走，新来的校长是王鲁清，石楼村人。姜时喆老师调县教育局任局长，调来两个姓张、姓李的老师。县政府对师范学校比较重视。学校经费由县财政按时拨给，学生全部免费。县教育局经常派人到学校视察，了解情况。第一班学生毕业时，

房山县县长，教育局长亲自到校参加毕业典礼，并和全体师生合影。



1936年6月房山县简易师范学校第一班毕业生合影（魏志华提供）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队占领了房山城，师范学校被迫关闭。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恢复，房山简易师范只办了四年。

房山简易师范虽然仅仅办了四年，学生绝大部分都当了教师、校长，成为房山县教育界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房山县的教育事业，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还有一些人毕业后就参加革命工作。奔赴抗日前线，并成为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

当时的教师姜时喆，1937年“七七”事变就参加了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6月随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任密（云）平（谷）蓟（县）联合县县长，平谷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后调平西军分区任敌工科长。解放战争开始后任张家口市政府秘书长、劳动局长、工业厅厅长。1966年调北京、任北京地质局党委书记兼局长。

赵然（河北李各庄人）13岁在长育完小读书，15岁完小毕业后考入房山简师。1936年毕业后在黄土坡村当教师。卢沟桥事变后，他到学校附近各村，并到房山县城内宣传抗日救国。1938年八路军来房山开展工作，赵然便投身革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共房良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1940年县参议会建立，赵然被选为参议长、晋察冀边区参议员。

后又任房涿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在抗日斗争中，英勇善战、功绩卓著。1944年积劳成疾，后因肺病加重而去世。房涿涿县政府赠的挽联是：“开辟房良、发展涿涿、英风不愧燕赵；创建民主、巩固政权、功绩可谓卓然。”

常健，镇江营村人。1936年简师毕业后当了教师，后到解放区参加革命。1948年底房山解放后，他是县政府的第一任教育科长。1950年调通州潞河中学任校长。蒲怀颜，北窖村人，1936年毕业后当了教师，1938年便参加了革命，任平北专署财政科长，1943年因病逝于延庆县。杨天鹏，房师一班毕业，南窖乡水峪村人。1938年经赵然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任房良县五区区长，1942年在长操被敌人包围、遇难牺牲。隗永泽，水峪村人，房师二班学生。1940年入党，任房良第二区区长，1944年被敌人杀害。隗永禄，房师二班，水峪村人。先在山区当教师，解放后先后任长沟中学校长、房山师范学校校长。隗永湘，房师二班，水峪村人，解放前当教师，解放后先后任房山县教工会主席，房山中学副校长，赵各庄中学校长。还有不少人解放后任中小学校长、学区校长，成为房山县教育界的骨干力量。

房山县简易师范的旧址，土改时房子分给了洪寺村没房的贫下中农，现已面目全非。几十年来，原来的房子有的已经倒塌，有的经过各户的翻修改造，有的盖了新房，成了若干个小院，昔日学校的风采已荡然无存。

# 原良乡初级师范学校简记

曹焕魁 白玉

位于琉璃河大石桥北头路西的琉璃河中学，即原来的良乡初级师范学校。校址前身是清嘉庆年间皇帝的行宫，后改为道观，称岫云观。是清朝遗孤太监的栖身之地，也称老公庙。

在历届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良乡初级师范学校的各项建设越来越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输送了大量的合格人才。

1950年土改后，广大农民当家作主，生活有了保证，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了翻身。这时他们迫切要求送子女入学，以求在文化上翻身。党和政府及时提出了放宽入学年龄，面向工农开门的指示精神。于是良乡县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出现了村办学校、送子女入学的热朝。没学校的村子办起了学校，一个班的增加到两个班。缺教师和教室，就开二元制或复式班，大村办起了完小。这样就出现了学生急剧增加、教师严重不足的局面。良乡师范学校，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为了办好师范学校，培养出合格的教育工作者，县教育科从良乡第一完小和有关学校，抽调了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如安贯之、张木斋、王开继、王文敏、许栋臣、李仲、肖宏儒、郑宝莲、苏汉臣、陈重权、李喆、杨澍泉、艾成杰等老师。又从老区调来李馨任学校主任，吕文甫任总务主任。他们是良乡师范学校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为良乡县的教育事业，培养了二百多名新生力量，推动了良乡县教育事业的发展。

1951年9月，良乡师范学校开始招收学生，此前已有五十名“短师班”的学生进校学习了。此次招考新生共一百人，学制三年。

1951年10月初，一百名新生来到了师范学校，分成甲、乙两个班。甲班班主任是张木斋，乙班班主任是安贯之。“短师班”班主任是王开继。

新生进校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教室是由道观大殿改造的，上课没有桌凳，每人搬几块砖头坐。讲议夹子放在膝盖上就是桌子，没有课本就发油印的讲议进行学习。

在课余时间，同学们都建校劳动，在老师的组织下，同学们清除了房前屋后的蒿草，捡走了碎砖乱瓦，拆除了残垣断壁。学生的宿舍是东院，被改造成平房，照明没有电，睡前点一会煤油灯。学校派一名工人，负责夜间查看学生宿舍炉子，防止煤气中毒。与此同时，学校还加强了思想教育，树立了同学们正确对待人民教师这一职业的观点，清除了见异思迁的思想。每个同学的思想，都比入学时有了提高。大家都认识到当人民教师是光荣、伟大而崇高的革命事业，摒弃了“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的错误思想。

1952年初，良乡师范学校又招了一百名“短师班”新生，短师甲班班主任是张木斋，短师乙班班主任是马国屏。此时在校生已达到二百人。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怀着满腔的激情，刻苦学习着。在暑假的时候，学校招了四个初中班，学生共二百人。在此期间，教室和学生宿舍都已经安装了电灯，并建了教师宿舍和几十间学生宿舍。学校面貌开始发生喜人变化，出现了新气象。

1952年暑假之后，师范班调整了班级。甲班全是男同学，班主任是王开继；乙班大部分是女同学，有一小部分男同学，班主任是安贯之。这时在校生达到了三百人，教职员工几十名，成为良乡县的第二所中等学校。为了加强学校的领导，从良乡中学抽调李少峰到学校任校长。马凯轩任教导主任，张家任任人事干部，并成立了党支部。党支部和团总支，紧密结合国内外的形势，加强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同学们在学习文化课程和业务课的同时，还要配合各种政治运动，开展学习和宣传活动。当时男女同学混编成组，到附近的刘李庄、董家林、泃城等村，去宣传抗美援朝、中苏友好、统购统销、三反五反等。

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做好发展学生党员工作，党支部书记李少峰每学期给积极分子和团员上次党课，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团总支也积极开展团课教育，吸收和发展积极的广大青年入团，同时号召和要求团员们要积极申请入党。当时在学生中涌现了一大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1953年7月1日，三名同学张振海、史淑兰、郑生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同学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学生会的工作也很活跃，成立了文艺部、卫生部、体育部等。学校组织了舞蹈队和腰鼓队，由李永芳任队长，任宝珍为副队长，由郑宝莲等教师负责指导。在期中或期末，学校经常开娱乐晚会，师生同台演唱，有舞蹈，有合唱，有快板和相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体育部和各班的体育干部，经常组织班级篮球赛，在篮球队中师生合建的校队——鹰队，水平较高，在琉璃河地区是很出名的。篮球队员包括教师许栋

臣、李仲、李喆、王文敏，学生有宋少奇、迈士泰、林秀坤、甘惠田、王达、刘春霖、郭福、王俊贤等。

1954 年上半年，第一届师范生进入实习阶段。实习的科目，包括语文、算术、历史和地理四门。实习学校是师范附小（琉璃河完全小学）。实习生给学生讲课时，大家坐在下边听课，课后评议。通过实习，提高了同学们的各项能力。

1954 年 7 月，三年的师范学习结束了。毕业生中有 20 人被保送到通州师范继续深造，其余的人回良乡县教育科，分到各类学校去工作，后来，这批毕业于良乡师范学校的学生都成为本地区教学工作的中间力量。



1954 年 7 月良乡初级师范学校师范班毕业生及教职员工合影  
(白玉 提供)

随着第一届一百名师范生的毕业，良乡初级师范学校也结束了她的历史使命，不再招收师范生，而转为一座普通中学，即琉璃河中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琉璃河中学已经发展成为共有三十几个班的完全中学。建起了初、高中教学楼，配备了现代化的教学设备，成为一座在本地区颇有影响的学校。

# 房山中学首届高中班记事

张广文

房山中学是房山区一所重点中学，1944年9月定名“房山县初级中学。”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历史。1958年春，房山县与良乡县合并，从原河北省通州专区划归北京市，曾更名为“北京市周口店区房山中学”。暑假开学后增设高中班，始成为一所完全中学。

首届高中班共招收学生172名（其中女生65名），共设四个班。第三学年为了适应高考需要，进行文理分班。三班定文科班，原三班理科生分到其他三个班。计：一班39名（女生15名），二班38名（女生17名），三班54名（女生19名），四班41名（女生14名）。

在党的教育方针和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指引下，首届高中班全体师生发愤图强，朝气蓬勃。在非常困难时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取得了教学和育人双丰收，为房山中学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 朝气蓬勃 教学相长

1957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4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贯彻落实这两个方针，1958年暑假开学后，全体师生就一面抓教学，一面积极投入到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的运动中去。

首先是教学要贯彻总路线、大跃进的精神，在教学质量、高考升学率上赶超早已设立高中班的老校良乡中学。教研组的老师，除了少数老教师外，大多数是当年北京几所师范院校毕业的大学生。老教师经验丰富，新教师意气风发，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精神推动下，新老结合，取长补短。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从期中考试成绩看，教学水平已经和良中不相上下。为了提



高教学质量，学校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全体学生不论住家远近一律住校，以保证学习和集体活动的时间。二是教师集体备课，并经常与良中老师进行课堂观摩，交流经验。三是选择优秀青年教师担任班主任，并充分发挥学生科代表的作用。当时，一班班主任王淑娟（化学老师），二班班主任黄佩珺（数学老师），三班班主任贺心滋（历史老师），四班班主任桂实谷（俄语老师），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还是班主任和教研组长“双肩挑”，有很强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值得一提的是老教师田树屏。为了教好代数课，一不怕困难，二放得下架子，向比他年轻十来岁的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生黄佩珺虚心求教，共同备课。还公开告诉学生自己教课是“现趸现卖”。由于结合了自己丰富的教学经验，把代数课讲得深入浅出，加上他虚怀若谷的风度，深得学生尊敬。

1958年下半年，在总路线指引下，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体师生一边完成教学任务，一边响应党的号召，实践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在为了超英赶美年800万吨钢的群众性大炼钢铁运动中，师生们上山拉坭土，砸矿石，打泥坯。紧张的时候就吃住在工地，终于在校园南侧的城墙根下建起了十几个小高炉。十几天下来，当其中一个小高炉流出几十斤铁水时，还真有些欢欣鼓舞。

为了达到亩产万斤小麦，同学们也在县委的高产试验田（地点在饶乐村东）参加了深翻土地劳动，象挖壕沟一样把几十亩耕地挖到一米多深，再施肥浇水种小麦（其结果是翻出来生土层，多年形成的耕作层破坏了，跑水跑肥）。每亩播几百斤麦种，秋天一片绿汪汪，第二年却只长秸杆不长穗，细细的麦杆大片倒伏，连种子也收不回来。现在想来，真是幼稚可笑。

为了支持人民公社，师生们经常放弃星期日和假期，打起背包到公社化的农村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城关公社、石楼公社的一些村种地、收割。

一部分身体好又不怕吃苦的同学在“勤工俭学”的号召下，利用课余时间到周口店小东沟煤窑背煤，我就是其中一个。那是在1958年冬天，每天下了晚自习，走十几里山路，到了井口，挽上一身单衣裤，拿着一盏电石灯，顺着坡度足有五六十度的木梯，下到几百米的掌子面装煤。背着一百多斤的煤筐，浑身汗水气喘吁吁地爬出井口，过磅，把煤倒在离井口几十米远的煤堆上，再迅速地跑回井口。每晚可以背2至4趟，挣一两元钱。收工后下半夜再走回来，第二天继续上课。虽然苦了点，但也锻炼了人的意志。

首届高中班肩负着学校和家长诸多期望，学习紧张，课外活动也丰富多彩。各科都在科任老师指导下成立了课外学习小组，一是加深知识，二是带动后进同学。还组织了歌咏比赛，广播体操比赛，俄语会话表演。李志宽老师带领的园艺小组成为校园田的技术骨干，除了种粮种菜还结合课本知识搞农业科学试验，食堂吃菜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在学校党支部支持下，高二班学生张广文还发起创建了房山中学广播站，并参照县广播站的工作程序设计栏目，编播文艺节目和各种稿件（张广文后来成为房山县人民广播电台的业余播音员）。党支部书记陈竹溪为了支持广播站的工作，曾几次到播音室表演月琴独奏。

### 艰苦奋斗 共渡难关

也许要实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古训，首届高中班的师生们在经历了短暂的“轰轰烈烈”的日子后，就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了因天灾（严重的自然灾害）人祸（内部的共产风浮夸风和外部的苏联逼债）造成的困难时期。

1959年下半年吃粮开始定量，男生每月36斤，女生32斤（后来还响应上级号召每月捐出一斤支援灾区）。现在看来粮食定量还不少，但当时每月只有100克食用油，鱼、肉、蛋、奶全没有，营养和热量都不够。学生们学业紧张，又在长身体时期，总觉得吃不饱。于是食堂想了很多办法。米饭、窝头用“双蒸”法加大体积，但吃饱了很快消化了，还是饿。后来就开始经历“瓜菜代”，以白薯、土豆、倭瓜、各种菜代替粮食。十几亩校园地里的大白菜不仅菜帮子，就连白菜根、干叶子都收集起来吃。白薯秧花生皮磨成面掺在粮食里吃。玉米皮、玉米瓢、以及秸秆里的软芯用石灰水泡软后磨成糊掺在粮食里吃。秋末冬初，师生们忍着饥饿，利用星期天走十几里到结着冰碴的大石河去捞茭草（一种鱼虾吃的水生藻类植物）回来做菜团子。

课程表上取消了体育课，人们把有限的体力用在了解决饥饿的生产劳动中，提倡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己动动手，丰衣足食的延安精神。校园内的大操场翻地后种白薯，城墙外的大操场种萝卜白菜。由于营养不良，一些体质差的师生得了“浮肿病”，一活动就心慌出虚汗。即使这样，老师还坚持教课，学生还坚持上早晚自习。

1960年冬末春初，最严重的考验到了，一场严重的流感袭来。许多同学头痛、发烧、浑身酸软，无法正常上课。终于被迫停课，但不放假。同学们稍

有一点精神就去教室看书，累了就坐在教室外边晒太阳，实在撑不住了才去宿舍里躺着，师生们仍然坚定着战胜困难的信心。

党和政府关心着正在成长的年青一代。学校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校长王喆领导下，想尽办法克服困难。浮肿的师生去医务室看病可以得到半斤黄豆，与其说是治病，让人感到更深的是种关怀。流感发作时，学校用大锅熬中草药汤，让大家每天两次按时服药。停课两周后，同学们拖着痊愈的或者还未痊愈的身体，又投入了紧张的学习。1961年春天，为了改善生活面貌，彭真市长在物资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还为全北京市大中学生每人特批五米人造棉布指标，令人终生难忘。我的第一条人造棉被面陪伴我40多年，至今还在使用。

### 师生共勉 不辱使命

1961年来到了，首届高中班进入了关键时期。虽然困难还没有过去，但人们似乎适应了艰苦生活，形势也稍有好转。全体师生开始向高考目标冲刺。复习，模拟考试，再复习，再考试，直到进入高考考场。高考期间学校想办法提高了伙食标准，补助了粮票。还准备冰棍、汽水（当时这算是奢侈品）、急救药品，不少老师还到考场外为学生服务。

8月底，录取通知书陆续到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全国重点名牌校都有房中的同学被录取。其他录取的院校还有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铁道学院等，高考升学率达到63%，房中开始显出其教学实力。

由于贯彻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首届高中生无论是升入大学还是留在本地直接参加工作，都没有辜负党和学校的培养教育，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对国家、对房山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留在本地直接参加工作的毕业生大多数都充实了教育战线，成为中小学教育的一支生力军，有不少人成为高级教师，有的担任教导主任和校长副校长。不少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的同学成为专家、教授或领导干部。一些陆续回到家乡工作的同学成为所有单位的骨干力量，有的担任行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刘荣、陈宝荣同学还回到母校执教。

在教书育人的同时，首届高中班的老师们也得到锻炼和提高，为以后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其中田树屏老

师当选为房山区政协副主席，贺心滋老师成为房山区令人敬佩的特级教师。黄佩昭老师还把艰苦奋斗的精神带到海外，战胜癌症坚持教学，被澳门培道中学誉为“辛勤的园丁、抗癌的斗士。”

四十二年过去了，首届高中班毕业生都已年过六旬，每当忆起这段生活都会感慨万千。

# 房山中学首批成为军事干部学校学员的回忆

王锦城

1951年7月，房山中学15名同学积极响应祖国号召，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我是成员之一。回忆在军旅度过的大半生真有说不完的话。

—

1951年前后，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年轻的新中国受到严重威胁；国内被打倒的反动势力，也开始蠢蠢欲动，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生人民政权，急需要巩固与加强。

当时的房山中学广大同学对国内外的紧张局势认识不足，特别是我们初中班和师范班即将毕业的同学，都是埋头学习，准备升学。当时北京刚解放，又急需要大量知识青年，充实到各单位，因此，上级组织决定，中学毕业班的学生，不准升学，一律服从组织分配，首先是报考军干校。开始有不少同学甚至团员思想不通，怕苦怕累，怕到前线打仗。

针对同学们这些模糊观念和落后思想，学校领导深入地进行了思想教育。一是校长作形势报告，学生读时事手册，组织全校师生大讲美帝国主义侵朝目的，认清侵朝战争与我国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大讲美帝国主义反动本质，消除崇美、恐美、媚美等糊涂观念，提高学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二是发动高年级学生，组成许多宣传小组，到城关街头和附近村庄，写标语、出板报、说快板、演话剧和演讲等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宣传教育活动；发动学生缝制慰问袋，写慰问信，慰问志愿军和军烈属，通过学生现身说法，自我教育，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三是传达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各种军事干部学校招收学生的决定”，大讲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陆海空军及现代化革命化军队对保卫祖国的深远意义，使学生认清保家卫国是知识青年责无旁贷的义务；大讲中国青年学生参加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使学生进一步澄清私心杂念，摆正国家与家庭、革命需要与个人前途的利益关系。

经过多种形式的思想教育，校园中政治气氛逐渐浓厚，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迅速高涨起来。将要毕业的同学，纷纷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有些同学耐心说服家人，消除了家长存在的“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旧思想，旧观念。

最后学校根据中央军委招生决定精神，以应届初中毕业生为主的要求和政治、身体条件，报请县政府军校招生委员会审核批准，确定 15 名同学应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其中初三毕业班 10 名，有杨化良、常柏、王锦城、杨建洲、赵继曾、陈绍武、邹洪宾、肖景华、韩宗淑(女)、王玉贞(女)；师范毕业班 1 名，是徐捷英(女)。其他中学班 4 名，有中学二年级的李亦清、骆宝伶、赵宗仁，中学一年级的王凤皆。

1951 年 7 月 5 日上午天气晴朗，群众热烈欢送我县解放后第一批知识青年志愿入伍。政府党政领导、团委、妇联及各个部门的干部，四街两关的父老乡亲，还有学生亲属，都出来欢送。县立中小学校同学，也列队南街和东街(当时中学的大门在学校的西南角)，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歌声响彻天空。我们参军的同学，胸戴红花，心情激动，唱起了共青团员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我们就是这样一边唱一边招手，向亲人、老师和同学们告别。在学校团总支书记张林泉陪同下，坐上汽车告别了故乡房山。

## 二

一路上我们坐在大卡车上，情绪开始由激动到逐渐沉闷不语，有的同学，还掉下了眼泪。主要是因为有的人从小没离开过父母，没有出过远门，现在一参军，想到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家！面对少数同学思想脆弱的表现，大家互相进行安慰，有的说：“我们已经在全校老师和同学面前表示了参军的决心”；有的讲：“我们又都戴上红花，挺胸高歌，走过轰轰烈烈的欢送人群，一一招手表示决不辜负父老乡亲们的期盼”；还有的同学接着说：“我们已经坐上参军汽车，踏上了征途，就别再多想了，拿出大丈夫气派，面对现实，大胆往前闯吧”！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精神振作起来，驱走了懦夫的眼泪，顺利到达了通县专区招生接待部。

在接待站，同学们接受了进一步政审和体检，有 13 名同学验收合格。其

中7名分配到石家庄第六高级步兵学校，4名分配到广州第一军医大学上学，2名分配到北京总参卫生干部学校。剩下2名不合格，一是陈绍武年龄小（14岁），二是王玉贞身体弱，决定退回。他俩着急找领导表示：我们坚决跟着大家参军。最后军校招生负责人终于答应了他俩的要求。陈绍武被分配到石家庄步兵校；王玉贞与韩宗淑、徐捷英一起被分配到北京总参卫生干部学校，可是该校根据招生条件不收，王玉贞最后被分配到东北齐齐哈尔陆军卫生干部学校。

### 三

走进不同专业的军事干部学校后，我们就开始了紧张艰苦的训练。

学习内容以队列、内务、纪律三大条例和射击、投弹、刺杀、越野、捕俘五大技术等基本训练为主。每天六点起床，晚上九点半休息，时间安排的紧张充实没有一点空隙。晚饭后自由活动，还要锄地种菜、要写板报、要排练文艺节目。

进入文教、政工、医疗等专业教学为主的训练阶段后，由老师进行“大课”讲授（近千人听课），教员再串门辅导，以达到领会精神实质，融会贯通的要求。课程考试采用五分制、单人答辩的方式。抽题目、答论句、作阐述、举例证，不记得过了多少次考试关。



1951年7月房山中学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学生合影（李亦清 提供）

经过严肃紧张的训练、学习和生活，多数同学都得到锻炼。大家都深有感触的说：“一年的军校生活，比上几年中学收获还要大。”

走出军校，少数同学分配到军事机关或医院岗位，多数同学分配到野战部队团以下单位。当时部队还住在农村、生活条件较差，除了正常的野营拉练、下连当兵、蹲点代职以外，每月三分之一时间实行劳动制，下连开荒种稻、上山打眼放炮（修国防工事），生活非常艰苦。我在坦克团工作时，有一次冬季

野营拉练到河北唐县，边行边练百余里才到宿营地，一路上我除参加演习外，坐在坦克上，还要把野营中的好人好事编写成稿。下车后，赶忙吃完野餐，就去刻钢板、印《铁马之声》快报。这时，战士们早已熄灯休息了。

就这样，同学们经过军旅多年的洗礼，各个经受了考验，先后入团入党，成了德才兼备、一专多能的革命军人。

#### 四

在部队，我们还接受了组织上的历次考查、审干和肃反、反右等重大政治运动的考验，渡过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关。有的同学因长期服役在外，父母双亲年迈体弱，生活困难，老人病入膏肓，未能探亲尽孝，因应服从革命需要而无怨无愧。还有的同学，不论职务高低，工作条件好坏，均能以饱满和革命热情，年复一年踏踏实实地面对各种工作。

正是经受了部队多年的摔打，同学的才养成了优良政治素质，坚强的革命意志，在处理应急事务问题时，表现成熟老练，成了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中的先进分子和骨干。例如王玉贞，军医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内蒙赤峰陆军医院，从事耳鼻喉科医疗业务，因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不到 50 岁就与世长辞。韩宗淑，在军委卫生干部学校学习三年，分配到总参卫生处，在负责爱卫会工作中，荣立三等功；1963 年又去公安部队医科学校医疗系深造五年，仍回到总参原处，在平凡的军医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年。有时陪同总参首长出差外地，或为各大军区首长来京开会，做些医疗保健工作。陈绍武，先后入军校深造三次，最后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政治理论，参加过甘南剿匪。他聪明能干，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宣传工作，在各级军队报刊上登载了不少文章，出版了个人诗集。在太原市也算是较有名气的作家和诗人，转业后曾任太原市南城区政协主席。杨化良，1968 年左右就担任团政治处主任、师宣传科长职务，后因身体健康原因，过早在天津休养。杨建洲，在部队速成中学任教时，荣立三等功。1958 年底保送到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深造五年，1963 年毕业分配到国防科委，高级工程师，曾参加某项科研工作，荣获一等奖。常柏，参军入校后，一直是个学习尖子。根据革命需要，不等毕业就提前留校任教，从事军训大队的文化教学到政治理论教育。他潜心钻研，抒发才智，著书立说，锻炼成为一名优秀的高级教官。1970 年左右，开始担任北京军区军以上干部学习班的教学工作。曾任张家口市军分区政治委员，



后调任国防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任副主任。肖景华，年龄稍大一些，于 1952 年就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李亦清在第一军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天津 259 医院，转业前任医院传染科主任、主任医师。

总的来说，我们 1951 年抗美援朝房山中学参加军干校的同学们，在军旅光荣度过的大半生，没有辜负房山故乡父老的期盼，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母校增了光。

# 房山二区小学教育的回顾

王硕儒

一天，我翻看《房山区普通教育志》时，在《1990年房山区小学教育情况表》中，无意中看到十渡镇六合村初级小学的建校时间是1958年，（见《房山区普通教育志》第69页）。这不能不引起我在房山县二区工作的一段回顾。

六合村，在革命战争时期，一直到五十年代房山县撤区建乡前，都属于房山县二区。我是1949年初到二区工作的，初当文教干事，不久任文教助理员，小学、民校、文化、卫生等具体工作都由我负责，1953年春调离二区。六合村小学是我在二区工作时建立的，它的建校时间最迟不能晚于1952年。

## 二区小学教育概况

二区是房山县非常偏僻的深山区（张坊村以里，1949年辖28个行政村），是革命老区，是平西抗日战争巩固的根据地。我初到二区工作时，各村基本都建立了小学校，只剩下六合村和卧龙村。不久，卧龙村也建立了小学，六合村是最后一个建小学校的村庄。

这个地区，早在抗日战争前，政治、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交通十分不便。政权掌握在少数封建统治者手中，广大人民群众苦不堪言。抗战开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平西抗日战争巩固的根据地，特别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既是房涿涿联合县和昌宛房联合县机关的所在地，又是冀中十分区后勤机关的大后方。我党对这一地区的工作非常重视，全面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改造旧政权，发展生产，不断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又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建立小学校，开展冬学、识字班运动。二区大部分小学校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建校的。干部和群众十分重视教育事业，他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教师，甚至达到崇拜的程度，认为教师无所不知，无论有什么难解的事情都去请教教师。记得有一次我在七渡村下乡，晚上和教师住在小学校里，教师姓宋，是个青年。天才蒙蒙亮，我们还未起炕，门

外就有人叫宋老师，说是他家孩子没（死）了，该往那边去扔（埋葬）。宋老师一边起炕一边说：“往村南山沟里扔”。门外边的人就走了。这好像是笑话，但是却是事实，说明村干部、群众非常信任教师的。

当时的小学校，除张坊、三合庄、十渡村小学校外，其余都是一村一校一个教师。无论几个年级都是一个复式班，办学条件很差，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学校还是民宅，一般是3间房，屋内靠一头有块黑板（不少是大石板），是教师教学的地方，另一头有个土炕和炉灶，是教师住宿和做饭的地方，学生的课桌和坐位是用木板（石板）或石头搭成的。教师的工作很辛苦，既要教几个年级的复式班，还要自己做饭，参加社会活动。村干部有事就去找教师，让教师给出主意，特别是搞宣传（屋顶广播、出黑板报）、文娱活动等都要教师管，甚至村干部召开行政性会议也让教师参加，有看不懂的文件让教师给传达。为克服学校的混乱现象，减轻教师社会活动的负担，提高办学质量，县区政府曾三令五申，要求村干部不得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制止教师的社会活动。但有些村有时还是难以避免。各校的学生一般二、三十人、三、四十人不等，冬春季学生最多，群众在冬闲期间千方百计送自己的子弟上学，由于居住分散，离学校远的地方甚至临时搬到靠近学校的地方住。春耕生产开始以后，由于生产的需要（特别十六、七岁的大龄学生）学生开始减少，到了夏季，学生约要减少到半数，秋收大忙季节，坚持学习的学生就很少了，教师要随时注意做好学生及其家长的工作，尽量多坚持学习。当时在教育界有个顺口溜，叫“冬满棚，夏一半，到了秋天不见面”。就是形容当时山区教育情况的。这不是因为学生和家长不愿学习，而是因为当时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

### 六合村小学的建校经过

六合村的干部和群众同其他村一样，不甘心自己的子弟总当睁眼睛，他们渴望识字，学习文化。为什么总建不起来学校呢？当时的情况主要是山区师资特别缺乏，当地有些文化的人都脱产当了干部，再找不出能教书的人，政府由平原往山区派教师又派不进去。

新中国成立前后（从1949年开始），县政府就开始从平原往山区派教师，但由于山区离家远，交通很不方便，办学条件极差，教师很难派进去，即使派进去了，也很难坚持住。我在二区工作期间，从平原派去的教师在干河口村往里只有3人，有的时间不长还不辞而别。如派往前石门村（现更名为西石门村）

的赵老师，这村是一个比较集中、办学条件较好的村庄，赵老师还是不辞而别，在路过区政府时去同我打招呼。因区委区政府非常珍惜教师，不肯轻易放走一个，我立即报告给区委书记刘天相，正好区干部文化学习还没有文化教员，经谈话把这位赵老师留下当了区干部的文化教员。其次，山区本来就很分散，可六合村在二区是一个更偏僻更分散的村庄。全村有荆子站、黑水峪、核桃园、龙王庙、下双窑、上双窑、中双窑、狮子谷、东天峪、大水湾、南台子、塔山子 12 个自然片。每个自然片的住户也不集中，不少都是独门独户，多者两三户或四五户，交通极不方便。

六合村的干部曾几次要求政府给他们分配教师、建学校，可政府就是无人可派。1951 年冬，六合村见全区各村都建立了小学，非常着急，于是就从邻村（马安村）请了一位教师，办起了一所村办小学。

约在 1952 年夏初，我去卧龙村片（包括东太平村、西太平村、卧龙村、六合村）发放救济物资和救济粮，六合村的干部听说是我去发放救济物资，村党支部书记、村长、文教委员等几位主要干部都去卧龙村找我，一方面领救济物资，一方面向我汇报他们村办小学的情况，并说已向区委作过汇报，让去看看，这次让我一定去看看。我答应他们发完救济物资，第二天一定去，他们很高兴。

第二天，我正要动身，六合村的干部（可能是文教委员）到卧龙村去接我。我俩走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六合村办的小学校，我一看，村里几个主要干部都在学校等我，他们准备让教师对学生搞一次测验，让我看看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效果。

学校座落在荆子站，处于沟谷的缓坡上，是全村距区政府较近又较集中的一个自然村。学校原来是三间民房，同其他村学校一样，屋内一端墙上有一块黑板，另一端盘一土炕和炉灶，学生的课桌是搭的木板，坐的是一些小石墩。学生有二、三十名，一般都十几岁了，大的有十六、七岁了。不少学生离家有几里路、十几路里，中午不能回家，都是带饭上学，一般带的多是菜粥。

区干部下乡是吃派饭的。革命老区多数人民群众都是想方设法让下乡干部吃的好一些，这次更不例外，给我吃的是粘玉米和大豆包粽子，菜是炖腌羊肉、摊鸡蛋。

下午，我和村干部一起看了教师对学生的测验，主要是让学生读书、背书、认字、写字、演算简易加减法。测试后，村干部让我表态作个评价。我认为在半年的时间里，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效果很明显。

这位老教师姓刘，原来曾教过学，工作很认真，不辞辛苦，就是能力差，因其就是私塾底子，教书识字还可以，但对阿拉伯数字上 10 位数就不懂了，如  $5+6=11$ ，他先写个 10，后边加 1，就等于 101。这教小孩算术就困难了，所以让他回家了。六合村干部要办学，找不到能力高的教师，所以又把这位老先生请出来，这我事先是知道的。村干部要求政府承认这所学校，给派教师，或是在短期不能派时，能否批准刘老先生为国家教师。因为这个村确实经济困难，村办小学在全区是头一家，为了减轻村内的负担，我当时表示：一、支持六合村的小学校坚持办下去；二、回区后向区长汇报，请示县政府承认六合村小学为公办小学，批准刘老先生为国家教师。

回区汇报后，区委书记蔡景超、区长陈希廷都同意请示县政府先承认刘老先生为国家教师，一切待遇由国家负责。我以区政府的名义向县政府写了请示，并在一次会议上向文教科陈浩山作了汇报，陈科长口头答复同意区政府意见（当时还没有严格人事手续），刘老先生为国家教师，享受老区教师供给制待遇。

关于六合村小学校的建校时间，如果从村办时间开始，应为 1951 年冬，最迟也不应晚于 1952 年。

1953 年春我调离了房山二区，以后情况就不清楚了。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云居寺见到这位刘老先生，他已调到那里看守石经，这是后话了。

# 日伪时期的奴化教育

张 珍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有目的、有计划对中国青少年一代进行奴化教育，手段是阴险的，用心是恶毒的。

我的家乡是房山区韩村河镇尤家坟村。从 1939 年到 1945 年，我先后断断续续地在本村小学、长沟小学读书。当时，我的家乡已沦入敌手，所以我的小学生活是在日寇的铁蹄下度过的。日本侵略者对中国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我是亲身经历过的。侵略者进行奴化教育，采用了潜移默化的方式，使青少年在不自觉中，树立日本帝国“神圣”、日本皇军“神圣”的思想。尽管侵略者大肆宣传什么日本侵占中国是为了“大东亚共同繁荣，”但是由于我亲眼见过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抢掠，见到过他们残酷迫害中国百姓的种种罪行，所以谁也不相信它那套谎言，中国人民的内心深处无不充满对敌人的极端仇恨。

日寇的奴化教育至今难忘，他们经常向学生灌输“大东亚共荣”的思想。村里的维持会长、日伪大编乡的乡长，经常到学校给学生训话，说什么“中国是有名的‘东亚病夫’，中国在工业上比不上日本。日本人来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新生活”等等。要求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拥护皇军”，见了“皇军”要敬礼鞠躬。那时我们都把日本兵打的旗子叫“膏药旗”，校长和维持会长就多次威吓我们说，那是日本国的国旗，应当说是“太阳旗”，不能说是“膏药旗”，那块红色图案，是太阳，“它要照亮全世界”云云。

校方还经常组织小学生列队欢迎日本人进村进校。我在本村和长沟小学上学时，是学校鼓号队的成员，曾多次被组织“欢迎”日本人来校训话。1944 年的春天，房山县的伪县长王德育和几个日本军官要来长沟小学，校方强迫全校 50 多名鼓号队员和二三百师生，早早就列队站在西长沟的村口等候。将近一个小时后他们才到，鼓号队吹所谓的迎宾号，师生呼欢迎口号。王德育及几个日本兵大摇大摆地从我们面前走过，还不时地向我们招手。当时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伪政权的奴颜婢膝，日本侵略者的不可一世。

在小学设置日语课，学唱日本歌曲。在长沟小学，三四年级以上都设了日

语课。当时学校规定，在校老师和学生必须学会唱日本国歌、“新民会会歌”等美化日本侵略者的歌曲。当时我是四年级，教我们日语的是一位青年教师，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这个日语教师一心倾向日本，教课方式，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谁背读或默写不出来，他就要动手打学生，有时用藤子棍打脑袋，有时用“戒尺”打手板，相当凶狠，所以我们就怕上日语课。

组织小学生“参观”日军武装演习，实际上是要我们认为日本侵略者的不可战胜。我的家乡在日伪时期属伪天开大编乡管辖，天开乡驻守许多日本武装部队，日本兵经常在大场院里进行练兵活动，学校就组织老师学生去“参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看日本兵练刺杀。两排日本兵，面对面地列队，每人手持长柄木枪，互相向着胸部戳刺，每个日本兵胸前都有护胸板，互相戳杀时发出刺耳的响声。有个别的不用力，教官就将他拉出队列，狠狠地打他嘴巴，被打的日本兵，越挨打，越要在教官跟前站立。

学校还以开朝会的形式进行维护日伪统治的教育。所谓朝会，就是学校早晨开全体师生大会。我在长沟小学上学时，家距离长沟小学十二华里，学校要求走读学生不准迟到耽误朝会，如果误了朝会，以旷课论处。因此，我们每天都要起大早赶到学校，以班列队上朝会。那时长沟小学校长段某，每天主持朝会。他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先训话，然后带领全体师生呼口号，训话的内容是强调遵守学校“纪律”，不得违反“纪律”，不得听信“谣言”和传播“谣言”。那时通过上朝会，给学生的基本印象是：日伪统治不得怀疑，维护日伪统治是每个学生必须遵守的纪律。

参加日伪举办的体育运动会，我参加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运动会。一次是1942年夏季。驻天开乡的日军出动两辆卡车，把尤家坟、五侯、岳各庄、周各庄等村的学生，运到涑水县的娄村，行程一百多华里，参观日军在娄村举办的运动会。这个运动会的参赛者，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由田径运动员做表演。运动场面很大，除成干的观众外，运动场的四周，全都用苇席围圈起来，苇席上面贴满了诸如：“中日提携！大东亚共荣！剿灭共匪！和平建国！”之类的反动标语。另一次运动会是1944年秋天，房山县举办的全县小学生运动会。运动会项目很多，远道而来的运动员，管吃管住，竞赛优胜者，都获得了奖品，第一名的都得了银盾。搞这样的运动会，无非是企图给人一个日伪政府“很关心青少年的体育锻炼”的印象。

虽然日本侵略者时常向中国人民灌输奴化教育，但终究改变不了侵略者必将失败的下场。现在回忆一下几十年前的这段亲身经历，就是要向世人证明这个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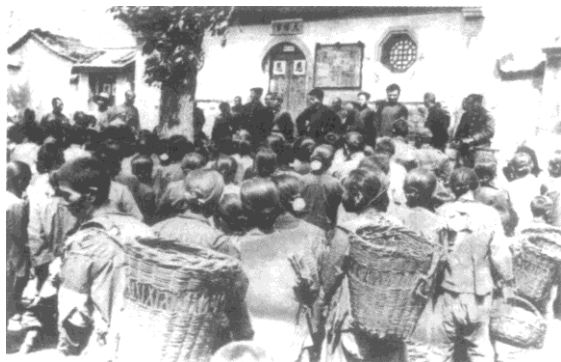
# 一组反映敌战区生活的老照片

张玉泉

在中国近代史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数以千万计的华夏儿女惨遭杀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可谓罄竹难书。

战争过去了几十年，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不散，日本的政要不仅参拜靖国神社，还在教科书上歪曲历史，浅川先生算是侵华日军中有良知的一员，对侵华战争犯下的罪行表示抱歉和忏悔。历史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浅川今朝男的照片只反映日军分化的一个片断，中国人应该铭记这血和泪凝结的历史教训。

1996年深秋的一天，河南村委会办公室接到了来自日本的一个厚厚的大信封，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叠泛黄的黑白照片，并附上简短说明：照片中的人都是河南村和部分河北村的，请帮助寻找，并将照片转送本人或家属。



日伪军在河北村天缘宫前召开群众大会

这些照片上的老人、妇女和孩子，都是六十多年前的人，他们中多数已不在世间，照片上的景物，多已变了模样。



驻河南村日军队部

村委会干部们从照片中认出村民卢瑞的父亲卢子山（已去世多年），于是便把当时已是61岁的卢瑞找来，请他取走照片和寄信人的名信片，并请卢与他进行联系。

寄信人叫浅川今朝男，当时在日本群馬县安中市的家中开照像馆。他于五十七年（1939年）前23岁时在侵华日军驻防在河南村多年，是个摄影爱好者，当时人称“小胡子”。

浅川今朝男在接到卢瑞的信之后，十分高兴。



随后又寄来第二批照片。卢瑞便把片上有关人（绝大部分是他们的后代）分送出去。

1997年10月末，浅川今朝男在其儿子、儿媳妇和侄子等人的陪同下，飘洋过海来到他阔别了五十七年的河南村。他怀着十分友好的感情，回顾了当年他在河南村生活的背景，并对侵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表示了真诚的歉意并作了和忏悔。



骆驼队

1999年3月，浅川今朝男给河南村民卢瑞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一叠厚厚的照片，并寄上劳务费三千日元，被卢如数退还。



午餐

2000年春，浅川今朝男再次访问了河南村。他说，他特别怀念年轻时在这里生活多年的村庄，总想看看老地方及当年的老人和孩子们。此次，他见了河南村的村民，并参观了当年住过的宅院。回国后，他又给卢瑞寄来一批照片这些历史照片成为反映河南村当年历史的珍贵记录。

# 长沟地区民谣四首

傅洪珍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长沟地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其间该地区军民曾口头创作了些通俗易懂、简单易记的歌谣，并流传至今。经笔者长时间搜集，走访刘德旺等老人，整理出部分作品，现抄出四首，以提醒后人，不要忘记那段难忘的历史。

## 抗敌歌

老头儿队，儿童团，站岗放哨把信儿传，把信儿传、把信儿传，不论白天和夜晚，不论白天和夜晚。

妇女们，民兵连，做鞋运粮去支前。去支前，去支前，哪管饥饿和风寒，哪管饥饿和风寒。

子弟兵，真喜欢，打起仗来冲向前。冲向前，冲向前，不顾生命和危险，不顾生命和危险。

手榴弹，炸开花，打的敌人滚又爬。滚又爬，滚又爬，吓的叫爹又喊妈，吓的叫爹又喊妈。

敌人们，心胆寒，跑的跑来窜的窜。窜的窜，窜的窜，一队人马完了蛋，一队人马完了蛋。

## 男女对唱小调

男：什么样的葫芦刺好样的瓢？  
什么样的谷种出好样的苗？  
什么样的政府老百姓享福哇？  
什么样的政府老百姓受苦哇？  
哎嘿呀伊呼儿嘿。

女：好样儿的葫芦刺好样儿的瓢，  
好样儿的谷种出好样儿的苗，  
人民的政府老百姓享福哇，  
法西斯的政府老百姓受苦哇，  
哎嘿呀伊呼儿嘿。

男：什么样的棉棵摘好样的花？  
什么样的瓜苗结好样的瓜？  
什么样的军队老百姓爱他呀？  
什么样的军队老百姓恨他呀？  
哎嘿呀伊呼儿嘿。

女：好样儿的棉棵摘好样儿的花，  
好样儿的瓜苗结好样儿的瓜，  
人民的军队老百姓爱他呀，  
国民党的军队老百姓恨他呀，  
哎嘿呀伊呼儿嘿。

### 打土城

民国三十六年哪，长沟修据点。孟庆刚监工他把夫子看哪，他把夫子看。  
哼哎哎嘿呦哇，哎嘿哎嘿呦哇，他把夫子看。

有个佟家沟哇，二姑娘十八九哇。孟庆刚去了她炒菜又打酒哇，钞票顺着手儿流。  
哼哎哎嘿呦哇，哎嘿哎嘿呦哇，钞票顺着手儿流。

据点刚修成啊，八路来进攻啊。柴部队交枪炮楼被打平啊，孟庆刚他失了踪。  
哼哎哎嘿呦哇，哎嘿哎嘿呦哇孟庆刚他失了踪。

### 兄妹逃荒小调

中华呀，民国呀，二十六年呀嘿，小日本进了良乡城啊，百姓不得安宁呀嘿，  
哎呀嘿，哎呀嘿，百姓不得安宁呀嘿。

兄妹呀，逃荒啊，一块儿走呀嘿，走到半路妹的脚疼啊，没法往前行呀嘿，  
哎呀嘿，哎呀嘿，没法往前行呀嘿。

女儿家呀，逃荒啊，走不了这山石道呀嘿，坐在坡头哭了一声天哪，姨兄

儿你把我搀呀嘿，哎呀嘿，哎呀嘿，姨兄儿你把我搀呀嘿。

叫声啊，姨兄儿呀，你别看急呀嘿，回头对我的大姨提，将奴许配你呀嘿，哎呀嘿，哎呀嘿，将奴许配您呀嘿。

兄妹呀，定计啊，在大北沟呀嘿，一个放羊的把我们冲啊，大骂不绝声呀嘿，哎呀嘿，哎呀嘿，大骂不绝声呀嘿。

# 车王府曲本中的良乡城

张广明

“车王府曲本”是清代北京车王府内收藏的一批典本，包括戏曲、杂曲、鼓词、子弟书等。其内容丰富、卷帙浩繁，从文化史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清朝向盛而衰阶段的民情、民俗、宗教信仰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是一个足可以向世人展示的艺术宝库。

“车王”，全称车登巴咱尔王，蒙古族，属成吉思汗直系子孙。其祖策棱是康熙女婿，因军功封王。今天的“车王府”即北京“那王府”。座落在安定门内宝钞胡同，共占地三十八亩。王府内隐藏的典本大约有四千余册。包括从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的戏曲、杂曲、鼓词、子弟书等。“车王府曲本”不仅是民众的文艺，也可以作为他们的历史、哲学、宗教的备忘录。实际就是民众心目中的历史。这些曲本作为国家教委古籍整理“七·五”计划重点项目，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原曲本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在《车王府曲本菁华》综合卷，有鼓词“满汉斗”。说的是三朝元老刘统勋奉旨钦差私访到当时的良乡县城为民伸冤的故事。其中有一段文字描述当时良乡县城的情景。抄录如下：

远看城头三滴水，近看垛口数不清。  
车走吊桥如擂鼓，马跑尘土太阳蒙。  
城门都用铁叶裹，上边钉着菊花钉。  
食店铺里碗擦碗，黄酒馆里盅擦盅。  
这边卖的大碗面，那边切糕热腾腾。  
香油果子犯何罪，干油炸来万油烹。  
木匠铺里镞凿响，铁匠炉上冒火星。  
黑油房里有个铃，打一槌来响一声。  
衙门外边两台戏，众人围的不透风。  
大班唱的是“打鬼”，小班唱的是“送灯”。

……

这些曲本，据专家考证分析，成书较晚。且得来不易。真手抄本是琉璃厂松筠阁刘盛誉先生在1925年从地摊上廉价购得。经专家鉴定为清末北京蒙古族车王府抄本。经顾颉刚分类整理，于1926年至1927年初在“孔德月刊”刊载。艺术源于生活。笔者认为所描述的良好乡城大约是清末民初时的情景。从中不难看出当时良好乡县城的繁华景象。曲本对良好乡县城的城墙、垛口、城门、门钉的描述是真实可信的，对店铺酒肆、行业卖买的记录也是非常生动的。《车王府曲本菁华》一书前言中认为“不仅可以提供史学、民俗学的参考，在文化史上同样是一批不可多得的资料。”

清代良好乡县城繁华热闹的原因，从曾任良好乡县知县陈崑《重修良好乡县志序》中，可以找到证据：“然近畿各县号繁剧者，独以良好乡称首县。以密迩国门，拱卫神皋，东南十三省有事京师者，无不取道于斯。冠盖之送迎，邸舍之供顿，文移邮递之分沓，进奏飞骑之交驰，方物入贡，尽袒之护持；饷车转运，远迩之巡警……”等等。也就是说良好乡离京城近，又是“行宫”所在之地，交通便利，迎来送往频繁所致。难怪就象三朝元老刘统勋这样的大人物外出私访也要在良好乡安顿下榻，来审理公案了。

据我所知，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良好乡县城已集中形成了一批有名的老字号如：“公泰永”（糕点）、“中和茶庄”（茶叶）、“春华茂”（杂货）、“有客泉”（烧锅）、“万顺兴”（杂货）、“同义轩”（饭馆）等。这足以说明，良好乡县城商业发达，市井繁荣是有其传承和悠久的历史。

# 北甘池村的太平鼓花会

傅洪珍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北甘池村曾有过太平鼓花会。当时我虽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但出于爱好文娱，曾经当过花会的演员。

当时虽说农民的生活贫苦，但由于传统观念浓厚，到过年时也得欢乐几天。每到腊月，农民就无事可做，村里的头脑人物就把此会组织起来。因为那时的大姑娘、小媳妇都是裹小脚，再加上农村浓厚的封建意识，所以妇女都不参加花会表演。村里的男演员们，把脸上擦上胭脂抹上粉，穿上各种颜色的花衣裳。有的脑后梳个假纂儿，戴朵大花，脸上点几个黑瘡子扮成老太太模样；有的头上戴顶破毡帽，挂上假胡须扮成老头儿模样；有的扮成男青年，还有的戴上假发，背后梳个长长的大辫子，辫梢上扎上红头绳儿，扮成大姑娘模样。

在村里的二十几名演员中，有一位单号叫“桃逗儿”的领队，表演很有特色。他把脸皮上抹上几条子白，头顶上梳个小生辫儿，手里拿条马鞭子，鞭子脚踩鼓点儿，又蹦又跳。他想跟谁逗就跟谁逗。特别是他跟那大姑娘逗时，那姑娘还装出一副羞羞答答的样子，群众观后，真是乐得前仰后合。

此会的队形有多样变化，时而一字形，时而圆形，时而“串花篱笆”，时而又拉“四方斗儿”等等。每人左手拿张鼓，右手拿个鼓锤儿边扭边打。打一阵唱一阵，再打一阵、再唱一阵，如此循环往复。唱的传统曲子有：“十二棵樹”、“十二月花名儿”、“十二月古人名”、“四季花”、“四花园”、“绣门帘儿”、“西厢曲”、“织蒲席五更”、“十三月大实话”、“乡里娃娃去上庙”、“二十四节”、“劝赌歌”等等。下面就选择几首：

## 二十四节

正月里来正月正，白马银枪小罗成，杨六郎独把三关口啊太平年，白袍征东箭射三雄呀年太平。

立春雨水紧相连，苏列保主下江南，盖苏文中了燕门计啊太平年，鞭打韩

昌真可怜呀年太平。

二月里来好长天，冯昌保主下高山，魏华他把花园闹啊太平年，豆玉虎把守紫阳关呀年太平。

惊蛰已过是春分，钻天入地他姓孙，鸡眼毛遂先担道啊太平年，大斩孙膑呀是毛奔呀年太平。

三月里来桃花开，刘金定立下招夫的牌，樊梨花刀劈杨丑鬼啊太平年，穆桂英寻夫呀找下山来呀年太平。

过了清明谷雨来，高君宝领下圣旨来，杨宗保挂了元帅印啊太平年，薛天保证西呀得胜回来呀年太平。

四月里来养蚕忙，磨房受罪李三娘，柳迎春打水井台会啊太平年器倒了长城女儿孟姜呀年太平。

过了立夏小满天，周氏一怒甩了凤冠，秦雪梅吊孝自己去啊太平年，赵玉娘吃糠呀真可怜呀年太平。

五月里呀麦秋来，朱买臣无食打过柴，孟正敢上木栏寺啊太平年，苏秦赶考呀落榜回来呀年太平。

芒种夏至好天长，干罗他十二当了宰相，若梁灏八十把状元中啊太平年，姜太公老来呀遇见文王呀年太平。

六月里来热难熬，关羽华容挡过曹操，任丘县里王金河啊太平年，前来招兵呀保汉朝呀年太平。

小暑过去大暑来，能征善战康昌才，黄巢杀人几百万啊太平年，王来冲征西呀得胜回来呀年太平。

七月里来七月七，天上的牛郎会织女，秦桧金牌十二道啊太平年，阁老严嵩呀奸出了奇呀年太平。

过了立秋处暑天，李良篡位数他奸，永芳下河东私通国外啊太平年，贾尚章上朝诡计多端呀年太平。

八月里来八月八，铁面包公坐南街，施不全公案无其数啊太平年，海瑞他为官呀不怕杀呀年太平。

白露过后是秋分，忠心保国是寇准，于夫言私访门头进啊太平年，鞭打受搞了闯王的坟呀年太平。

九月里来看山高，敬得实心保唐朝，李逵他把江州闹啊太平年，郑小明他救驾董家桥呀年太平。

过了寒露霜降交，杨七郎他搬兵令箭口，霸王自刎乌江口啊太平年，张飞



唱断了当阳桥呀年太平。

十月里来十月一、林朋斗保伍子胥，赵云救驾保阿斗啊太平年，狄青王虎呀平过西呀年太平。

过了立冬小雪交，诸葛亮施计把战船烧，关羽大刀把蔡阳斩啊太平年，王佐他断臂呀计真高呀年太平。

十一月呀转了河，三顾茅庐请诸葛，梁山军师名吴用啊太平年，刘伯温妙算计谋多呀年太平。

冬至来临大雪去，打板算卦苗广义，徐茂公保过唐二主啊太平年，进子冷学道归山去呀年太平。

十二月来整一冬，吃斋行善木连僧，韩湘子出家东南山上啊太平年，西天取经是唐僧呀年太平。

过了小寒是大寒，法王太子离朝班，张良私回到山上去啊太平年，法海他出家呀在金山呀年太平。

## 十二月劝赌歌

正月里来是新年，开天立地往下传，何人留下的赌博场呦太平年。贪财汉子往里钻呀年太平。

赢了钱呀真喜欢，好似在外当了官，人为钱财两个字呦太平年，靠着那赌博混吃穿呀年太平。

赌博路呀实在玄，就像推车入沙滩，赢了钱也存不下呦太平年，输了钱来无法还呀年太平。

输了钱哪受贫寒，亲戚朋友下眼看，到处借钱无人理呦太平年，事到临头后悔晚呀年太平。

二月里来是春分，还说要钱这样的人，也有老年和青壮呦太平年，个个怀着贪财的心呀年太平。

赌博场，有金银，人人都想把手伸，眼看着金银拿不到手呦太平年，好比那沙里去澄金呀年太平。

赢了钱，不能存，输了钱来好伤心，卖了房子去了地呦太平年，家业输光受了贫呀年太平。

听人劝，早回心，人做正事谁不尊？事要三思免后悔呦太平年，等到头来呀不如人呀年太平。

三月里来桃花红，耍钱之人无正行，输钱多了要赖帐呦太平年，拔起腿来呀扔了蹦呀年太平。

今日西，明日东，好像断线一风筝，夜间如同无坟的鬼呦太平年，他的那家里乱了营呀年太平。

他的母，泪莹莹，想儿想的双眼红，求神占卜又问卦呦太平年，几外漂流呀母担惊呀年太平。

他的妻，正年轻，独坐屋内守孤灯，恩爱夫妻两离散呦太平年，只因耍钱瞎胡弄呀年太平。

四月里，麦稍黄，耍钱之人瞎流浪，做事不懂情和理呦太平年，哪知勤劳与伦常呀年太平。

闲不住，手发痒，学会耍钱这行当，今日输了就卖地呦太平年，明日输了又卖房呀年太平。

日不久，折腾光，眼看就要断了粮，肚内无食饥难忍呦太平年，想找亲朋将他帮呀年太平。

岳父家，比他强，有心去借脸无光，思前想后无的怨呦太平年，今日烧了断头的香呀年太平。

五月里，到麦秋，赌钱之人无尽休，赢钱只觉赢的少呦太平年，输了还想往回求呀年太平。

输了钱，难回头，跟着贼人去学偷，犯了官司身受苦呦太平年，打的身疼不自由呀年太平。

听人劝，早回头，安分守己度春秋，从此你若戒了赌呦太平年，以后你会不用愁呀年太平。

吃不少，穿不少，全家老少乐陶陶，谁人见面都夸好呦太平年，日子越过越提高呀年太平。

六月里，热风飘，耍钱之人不可交，死皮赖脸偏要耍呦太平年，暗使巧计耍花招呀年太平。

赢了钱，兴一遭，输钱回家把钱找，拆房卖畜把钱换呦太平年，闹的少吃又没烧呀年太平。

让妻子，下眼瞧，思想起来好心焦，无人之处把泪掉呦太平年，不该去耍这一遭呀年太平。

七月里，数伏完，浪荡之人不由天，人人都把儿女养呦太平年，只望后来把己帮呀年太平。

耍钱人，贼葫芦，各种赌具他都熟，耍钱本是小引大叻太平年，赌来赌去心思粗呀年太平。

输了钱，当夜服，指着赢钱再去赎，长期欠赌无钱给叻太平年，不赎衣服光屁股呀年太平。

身无衣，难回头，不敢回家见父母，羞臊难当悬梁尽叻太平年，不知爹娘怎样哭呀年太平。

八月里，半年多，庄稼老儿忙如梭，男男女女都下地叻太平年，赌者仍是奔赌窝呀年太平。

求名利，只两个，何用昼夜去奔波，赌者冬日衣裳破叻太平年，裤衫褴褛战哆嗦呀年太平。

肚无食，日难熬，手拉木棍沿街讨，大爷大娘连声叫叻太平年，从早叫到日头落呀年太平。

狗要咬，用棍搓，讨遍了街巷讨不多，亲戚朋友都笑话叻太平年，给口粥喝念弥陀呀年太平。

九月里，霜降节，赌钱之人心似铁，昼夜想钱到不了手叻太平年，正好来位眼子爷呀年太平。

眼子爷，摆赌具，赢了银钱一大些，输的汉子无主意叻太平年，额头汗珠往下泻呀年太平。

回到家，把嘴撇，指着土地把钱借，成总的钱银还了债叻太平年，赢钱的汉子笑嘻嘻呀年太平。

买骡马，置轿车，头上缨帽足下靴，这种富贵不长久叻太平年，运去时衰受折磨呀年太平。

十月里，冷风刮，赌钱之人不可夸，茶酒馆里讲来路叻太平年，同场耍钱犯争花呀年太平。

赢钱人，胡乱花，输钱之人不敢回家，有的回家卖产业叻太平年，卖了产业呀把帐杀呀年太平。

十一月，雪花飘，赌钱之人真经熬，整天整夜不睡觉叻太平年，饥饱劳碌大尿泡呀年太平。

腿熬酸，眼熬红，乡亲们劝他他不听，熬的他来睁不开眼叻太平年，管那六猴当眼儿坑呀年太平。

输的他，没有招，一心还想往回捞，指着妻子也得耍叻太平年，只有卖妻呀这一招呀年太平。

妻子她，泪莹莹，叫声丈夫你是听，这世怎么嫁了你呦太平年，不如早死早脱生呀年太平。

十二月，整一年，大雪飘飘北风寒，输钱之人赤着体呦太平年，饥寒交迫呀无人管呀年太平。

劝明公，你是听，莫干赌钱这一宗，千万别把赌场进呦太平年过好日子算正经呀年太平。

### 十三月大实话

正月里来正月正，天要黑了就点灯，东屋点灯东屋亮，西屋不点黑咚咚。母鸡会下蛋，公鸡会打鸣，大年初一家家起五更。

二月里来天气长，谷子碾米要去糠，大麦豌豆能做酱，炕要不烧就冰凉。发河必有水，和泥就要垒墙，老爷庙里有周仓。

三月里来桃花开，黄花木耳都是菜，男子作揖女子拜，杏树开花一片白。当官就比当兵的大，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理拿钱来。

四月里来四月八，走进门来就到家，耗子见猫就害怕，母鸡下蛋就嘎答。男大要娶妻，女大要婆家，苦瓜熟了就是甜瓜。

五月里来端午节，打破了脑袋就流血，四十五天个半月，人人都穿两只鞋。水路就行船，旱路就走车，天黑就是太阳落。

六月里来数三伏，爹妈死了儿女哭，棉花纺线能织布，男女都得穿着裤。瞎子看不见，婴儿饿了就会哭，没有头发是秃子，秀才准都念过书。

七月里来七月七，不吃饭来肚内饥，吹火全凭一口气，东边的对面就是西。娶过的是媳妇，没娶的是闺女，姑舅姨儿都是亲戚。

八月里来月儿圆，脚踩地来头顶天，生米下锅就成饭，大蒜辣来醋就酸。刮风树就动，下雨就阴天，白糖入嘴它准甜。

九月里来秋风凉，身冷就得加衣裳，生育就用接生婆，家家锅台连着炕，数伏天就热，墙北有阴凉，哥哥的岳母是嫂子的娘。

十月里来冷飕飕，土坯房子不如楼，房有窟窿下雨漏，宰了猪羊就吃肉。麦子能磨面，芝麻能打油，碾子磨盘都是石头。

十一月来雪花飘，牛的头上有犄角，两个耳朵分左右，腿腕下边就有脚，一手有五指，两脚十指头，人人都有胳膊肘。

十二月来整一冬，数九暖气还春风，春风吹面暖融融，有钱的老头儿叫富

翁。讨饭的是乞丐，喝酒就用盂，烂肉准就招苍蝇。

十三月来打新春，十六两来是一斤，一尺布来是十寸，骡马吃草都得变成粪。树大刮不倒，树根扎的深，句句实话不用问。

# 解放初期的一次救火纪实

宋 湘

1951年6月23日（农历五月二十，当日正值连续五天的房山城内“五月庙会”的第二天。当时我正在房山中学附属师范二班读二年级。清晨5点，突然钟声乱响（所谓钟声，实际是树上挂着一节铁轨，起床、开饭、上课、下课、熄灯等作息报时由工友用铁锤敲击铁轨，也能声震全校）。在校住宿的同学们从睡梦中惊醒。开始，人们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么早敲起床钟（应该是早6点起床）？莫非是工友看错了钟表？旋即又感到非同寻常：正常的作息钟声是慢节奏，而今天却是不断地紧敲，一定发生了什么特殊情况。这时，有人在院里喊话：“同学们，紧急集合，带上洗脸盆去救火！”

火情就是命令。同学们顾不得洗漱，抄起各自的脸盆，迅速跑到中三班教室前的小广场集合待命。校长杨槐堂、教导主任王喆已经站在那里。部分教职工、伙房炊事员有的扛着铁镐，有的担着水桶也纷纷赶来。校长杨槐堂脸色凝重，操着浓重的宛平口音对大家说：“县供销社南街门市部失火！为了保护国家财产，我们赶紧去参加救火。到那里要听从现场指挥，注意自身安全。马上出发！”大家跑步前进，很快到达现场。

县供销社门市部位于房山城内南大街路东，南隔学房胡同与大生堂药店相邻，北邻县文化馆，即现在的华冠五分店处。这是一个前后两进的四合院。临街是四间门市铺面，一间大门过道，南北各三间厢房是办公室兼职工宿舍，东上房五间是库房。后院也是职工宿舍。失火的正是前院五间库房。

我们到达现场时，只见仍是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县供销社主任李明（1952年后任房山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正站在北屋房顶上，拿着一个纸制喇叭筒喊话：“老乡们，救火来吧……”供销社供应科科长隗有声正指挥供销社职工和已经赶到的县直机关干部救火。当时没有消防机构，也没有先进的救火设备。人们从附近水井挑水，学生们排成一字长蛇阵，一盆一盆地把水传到着火的房前，有人站在梯子上往上泼水。还有人爬到房顶上尚未着火的地方用镐拆除房顶，以隔开火势。由于人多势众，约一个多小时后火逐渐地扑灭了，但五

间房顶也已烧光、拆光、库房内的物资也全部烧毁。

救火结束后，同学们分别找到自己的已经破烂或已经变形的脸盆，大家为国家财产遭到损失而心情沉重，也为参加了一次救火战斗而感到自豪，一路高歌“年轻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返回学校已是早7点开早饭的时候了。

据后来得知，这场火烧毁房子五间，损失布匹、火柴、麻袋等日用品32种，价值111283102元（旧币）。这是1948年底房山城解放后直至九十年代南关商业城失火中间四十多年里房山城唯一的一次重大火灾。

当时正是“镇反”和抗美援朝运动高潮，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这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反革命破坏事件。一些历史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职工自然列为怀疑对象，而这些人自知必被怀疑，也忐忑不安，如惊弓之鸟，必然会有一些反常表现，这就更增加了被怀疑的因素。果然不久，1951年9月，夜宿单位曾经当过伪军的一名李姓会计被公安局关押审查。后经多次审讯，反复查证，终因缺乏有力证据不能认定是李纵火，于1953年3月将李释放，并安置其当了小学教师，此案也就不了了之。

# 高山顶上的学校

刘琛 口述 侯国智 整理

## 当上了“走教”老师

我叫刘琛，1959年7月，从北京市第七十中学（今周口店中学）初中毕业。因家境贫寒无力深造，与周珊等同志被分派到十渡去从事教育工作。十渡离我家东营村一百多里路，我们背着行李到岳各庄挤上公共汽车到张坊下车往十渡校部打电话，校部主任袁士聪说：“雨季拆桥了（拒马河在山谷里忽左忽右地流，河两边村子里的人互相来往，在早年间用大筐箩拉人渡河，所以有几渡几渡之说，后来搭了土桥，又怕洪水下来冲走建桥的木材，特别规定：农历五月单五拆桥，八月十五搭桥），没法儿接你们，你们把行李寄存在张坊旅店里，先住一宿，明天跟着邮递员过来。”第二天清早我们跟着邮递员从张坊爬片儿岭，到干河口，进干沟，爬百尺岭，到六渡，爬七渡对面的“狐狸险儿”；再爬上“窄鞍”，往下才到了十渡公社校部报到。在平原呆惯了，初进深山，沟里边都是让人磕磕绊绊的大大小小的石头；山上都是一人高的荆条和许多不知名的植物，丛丛莽莽。见了“百尺岭”那么高、那么陡都眼晕。上那“狐狸险儿”腿直打哆嗦。右边是山崖，脚下是“一叉宽”的羊肠小道。左边就是万丈深渊，下边是奔腾咆哮的拒马河，真是惊心动魄啊！

到了十渡，校部留我参加刚刚建立的十渡中学的基建工作，管帐、进料，到十渡附近的山后石门儿购买木料。由于雨季无桥，把木料捆成筏，从拒马河顺流而下，人随木筏沿着河滩走，曲曲弯弯二十多里想法儿运回十渡中学建房。一直干到11月，我要求去搞教学，领导又把我分派到王老铺去教书。当地民谣说：“王老铺、王老铺，不是爬、就是蹿，下山驴尾巴朝天，上山气喘像猪。”

王老铺是深山区里的一个大村子，方圆四十里，海拔千余米，下属七个生产队。王老铺本村是一队，在一个小盆地里，二十多户。上骡圈是二队，在村南一里多地，十多户。大岭西是三队，在村西南四里多地，十多户。庞家坨是



四队，在村南三里，十多户。天井儿是五队，在村东南十多里，十来户。杨树沟是六队，在村东三里，二十多户。王二岭是七队，在村东北十来里，十多户。全村不满千人。

当时，王老铺完全小学校的主任是王庄儿村的高玉荣（谷中秀、于泽芬也当过），教三、六年级的是杨驸马庄村的赵德仁，教四、五年级的是惠南庄的方桂森，教副科的是双磨村的刘学昌。有房九间，分三排，前后排是教室，两个班是三至六年级的两个复式班，中间的三间用来作教师的办公室兼宿舍。因为学校能占的地方窄小、房子少，所以王老铺小学在上骡圈、杨树沟、本村的三角地附近设一“分校”，教师有天开村的孙辉、周各庄村的荆宜庚、琉璃河水泥厂的马全兴、赵各庄村的周珊，有房十二间，有一至四年级，两个复式班；在大岭西设二“分校”，教师仅有东南章村的张绩，有房三间，有一至四年级一个复式班。为使适龄儿童有学习的机会，派我接替刘学昌当了“走教”老师，负责庞家坨、杨树沟、王二岭三个“走教点”的一至四年级小学生的教学工作。必须天天爬山，日日走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各“走教点”的学生两天上一次课，我就这样“走教”了一年。

这三个“走教点”都没有教室，课堂就设在老乡打场的场院中的“场房儿”前面，课桌是学生的膝盖，“黑板”是竖起来的一块石质的“大凌板”（大石板）。有的地方有十来个学生，有的地方七、八个学生，一至四年级都有。可学生学习的认真、努力、顽强、执著的劲头儿，我可是从来没见过。由于坚持“走教”，山顶上常常响起朗朗的读书声，那可是比什么音乐都好听！

## 衣食父母

山上教书最困难的是水。王老铺学校吃水要到山水泉儿去背，虽说只有二里地，却要爬五十道坡弯。担水可得有技术，山高路窄，又陡又弯，不会担，水桶要碰山坡，不但担不回水来，还有“泡坡”的危险。乡亲天天给我背一桶水，我就从没断过水吃。我深知水是宝贵的，洗脸洗手只用一盆底儿水，留到晚上洗了脚后还要和煤用。

那时正赶上国家的困难时间，我的工资每月是 27.5 元，粮食定量每月是 29.5 斤。天天跑那么多路，年纪轻轻儿的正长身体，肚子里的油水儿少，一天合不上一斤粮。我们星期六晚上把火封上，就去路远的学生家里家访，学生家长也知道我们来不只是为了“家访”，不是熬稠粥就是用“豆儿糊瓜”来款待

我们，我们也就不回学校了。

我们上课时学生没听懂，你得给他掰开揉碎地、耐心地讲；在课堂上讲、家访时讲、随问题讲；弄点教具讲、画张简图讲、做个实验讲；学生闹矛盾了，老师要弄清是非曲直，教学生要学会团结；学生有困难了，老师要首先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学生克服困难。

我 1959 年上山二十岁，1977 年出山，在山区整整干了十八年。

### 扎实工作

那时的教学质量虽然说不太高，但是老师认真教，家长抓紧催，考试成绩、学习效果都还不错，也出了不少人才。我的前后同事里就出了不少有口皆碑的好老师，像袁士聪、谷中秀、米文卿、赵德仁、刘学昌等等。袁士聪的资历很深，曾在六渡教书，当地老乡特别佩服他，口碑特好；谷中秀是 1955 年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米文卿是北京市里的人，1965 年进山的，1985 年被评为北京市级的劳动模范；刘学昌画儿画得好，进山后又回去帮助七渡设计了旅游点——孤山寨。

赵德仁老师，石楼镇北庄村（杨驸马庄村）人。1946 年通县潞河高中毕业，1948 年底参加教学工作，只是家庭出身不大好，1958 年调到了王老铺，并带家属在王老铺安下了家。赵老师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学生身上，教出了不少好学生。可是，他干得再好，他做的好事再多，在当时也不能把他评为模范教师，因为他出身不好，报上去也白搭，白占一个名额！所以，他的模范事迹往往安在别人头上。文教组跟他说明时，他说：“我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实实在在做工作，让乡亲们的孩子学知识、长本领，改变落后面貌就行了！”

但是，乡亲们、学生们可自有自己的做法儿。“小四清”时，老师们吃老乡的饭叫“多吃多占”，要退赔，赵老师退赔的钱和粮票又被家长、队长退还给了赵老师。就是文革时，村里社员分什么，还都有赵老师一份儿。他到哪村被“游斗”，哪村的学生都不难为他，他管的越严的学生越照顾他。当时，造反派把他揪出来关在一个小屋儿里，派两个民兵站岗，村里的副书记兼民兵队长隗永生，披着大衣来检查，先是对民兵拉着脸大声喊：“你们俩要是不注意，让这老家伙自杀了，或是逃跑了，我对你们可要军法从事！”然后，走进囚室对着窗户大声说：“你必须实事求是，好好交代问题，不准乱说乱动！”随后，把掩盖在大衣里的一棵大白菜、半斤叶子烟拿了出来，偷偷放在小课桌儿里，

并且对赵老师挤挤眼睛，故意对着窗户喊道：“你必须实事求是，好好交代！”  
文革后，隗永生说：“咱不保护他那样的好老师，心里过不去呀！”

房山地处山区，山地、丘陵约占三分之二，像王老铺那样的深山区很多，曾在山区工作的人民教师数以百计。他们任劳任怨、辛勤耕耘、兢兢业业，给房山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给国家和本地区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 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侯 隽

编者按：本刊上辑发表了《我的同学侯隽》一文，详细介绍了“北京的特别姑娘”侯隽的插队生活。现刊载由我区原畜牧水产局党委书记、区一至四届政协委员韩秀琴提供的这篇侯隽在1992年撰写的回忆文章，以使广大读者从侧面了解那段特殊的历史。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有十六年了。时光的流逝丝毫也减弱不了我对他老人家的怀念之情，时至今日，每当我回想起周总理对我关怀备至的桩桩往事，亲切接见的幕幕情景，总不由得会流下感动的泪水，激起无限的哀思。

周总理生前一贯爱护青年，他老人家不仅直接领导、全力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而且亲自听汇报、作指示、召集各种会议；挤出时间接见知青代表，促膝交谈，听取意见；并亲手培养典型，为青年树立榜样。在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身上，他老人家倾注了无数心血和深情厚谊，我是其中让总理操心最多的一个。

1962年，我高中毕业以后，自愿从北京来到天津市宝坻县窦家桥村插队。一个小姑娘，从城市到农村，举目无亲，又不是组织安排的，困难自然很多，加上许多人对我的行动不理解，更少不了风言风语。下乡一年多，正在我最苦闷地时候，周总理从黄宗英那儿了解到我的情况，便鼓励黄宗英快点写出文章来，并派农垦部和华北局的领导同志来看望我，还在几次会上提到我，总理指出：“这是个方向，青年一代就是要下乡。”



1962年，侯隽在天津市宝坻县窦家桥村插队时所住房屋前留影（韩秀琴提供）

据说当时曾有人因为我的家庭出身问题，对能不能报道提出疑问，总理明确表态说：“我们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她向着光明，向着

新社会，我们就是要把这样的青年带起来”，“不要让孩子背家庭包袱”。我被当作“城市知识青年立志建设新农村”的典型，实际上是周总理亲手树起来的。

自此以后，周总理就一直把我挂在心上，对我这棵弱苗百般爱护，精心培养。

在 1963、1964 年两年中，由于全国各大报刊都报道了有关我的消息，天津地委还发出了《关于在知识青年中开展学习侯隽事迹的通知》，我一下子成了名人，社会活动简直多得令人喘不过气来。我怕脱离劳动、脱离群众，总是白天黑夜不停地忙，身体也累垮了。面对这种处境，我曾多次呼吁减少外出活动。正当总理访问亚、非、欧十四国，中间回昆明休息



1972 年，侯隽时任天津市宝坻县窦家桥村党支部书记时留影（韩秀琴 提供）

之际，从一份内部材料上看到了我的要求，总理马上打电话给国务院，指示要立即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上级规定，派我外出必须经过地委批准，从此给我解了围。

还有在一次会议上，总理听到有人说，清华大学要调我去脱产学习，似乎生了气，说：“这可怪了，树立一个旗帜总是不肯帮助到底”。我们的周总理一向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看作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战略措施。对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关心到底，负责到底”。正是在总理的指导和关怀下，才使我在农村扎了根，踏踏实实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在实践中受到了锻炼，与农民群众建立了感情，也为我的健康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么好的总理，我当然是做梦都在想念他，盼望能亲眼见到他。1964 年 6 月，共青团“九大”开幕时，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那天，毛主席、周总理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并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而后，毛主席、周总理和刘少奇、朱老总又单独接见了我们二十二名代表。我第一次和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握手，心情非常激动，握着毛主席那温暖的大手，真是觉得一股暖流流遍全身，无比幸福甜美；和刘主席、朱老总握手总是觉得极其欢快；和周总理握手感觉更加特别。当我走到周总理面前，望着他老人家那慈爱的目光，就像小孩见到了母亲，当时我心情激动，热泪盈眶，喉咙哽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当总理握着我的手问我叫什么名字时，我强

忍住哭声回答，可能因为声音太小，总理根本没听清。过后，我遗憾地大哭了一场。同志们劝我说，以后还有机会，我却以为这种机会不易再有了。没想到后来我又先后五次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有两次还留下了珍贵的照片。

其中有一张是周总理和郭老接见日本外宾时的合影，这是总理第三次接见我时留下的永久纪念。

那是1971年5月6日，我正在北京治病，总理从《北京日报》得知我在北京住院的消息，就叫秘书找我。因为报上没写明是哪家医院，直到晚上十一点才找到我。护士叫醒我，让我去接电话，原来是总理办公室打来的，说是总理要接见我。我高兴得心都快蹦出来了。到了人民大会堂，总理的秘书告诉我：“总理正在开会，过一会儿接见日中农业农民第二次交流访华团叫你参加。”已是深夜十二点多了，总理才开完会，我和北京的两位农民代表一起去见他老人家。

在这次接见中，总理告诉我，他是从一位朋友那里知道我的。我说：“她是黄宗英。”总理问那次她在我那儿住多久，我就把黄宗英同志1963年在我们村劳动、写作的情况一一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听后说：“黄宗英那个时候就能到农村去，还是有革命愿望的”，“她在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面是有功的。”紧接着总理又关切地问了黄宗英同志的近况，并对我说：“你们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这第三次接见和总理呆的时候最长。外宾到来前总理和我们交谈近二十分钟，他问我：“在农村多少年了？”我回答：“快十年了。”“很习惯了吧？”我说：“比较习惯了。”总理又关心地问“你结婚了吗？”我说：“结婚了。”“你爱人是干什么的？”“种地的。”总理特别高兴，说：“好啊，你们都爱上农村了。”我对总理说：“我们还有很多知识青年也在农村结婚了。”总理笑着说：“很好，你们都在农村扎根了。”接着总理又关心地问我们村改造南洼盐碱地的情况以及粮食、棉花生产和养猪等情况，总理是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无拘无束地向总理一一做了汇报。

零点四十分，郭老来了，总理连忙上前迎接。日本朋友随后也到了。总理招呼大家一起合影后，就劝郭老回去休息，并向日本朋友说明，郭老年岁大了，就不让他陪大家一起座谈了。日本朋友也一起劝郭老回去，郭老就先告辞了。紧接着总理便与日本朋友亲切交谈起来。因为他老人家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地理、物产、习俗等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事前又向工作人员了解了这个团的情况，会谈气氛异常热烈、融洽。他们从日本农业谈到战争与和平，不知不觉两

个小时过去了，我这个年轻人都感到了有些疲倦，可总理依然精神饱满，谈兴酣浓。这些日本的平民百姓能与中国的总理午夜会见，并交谈了两个多小时，对他们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幸事。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周总理为促进中日农业的交流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付出的心血和精力。

送走了日本朋友，我们真想再跟总理多呆会儿，可时间已快四点了，怕他老人家太劳累，谁也不忍心提出这个要求。总理好像看透了我们的心思，对我们说：“来，来，再坐会儿。”总理问我：“今天收获不小吧？”我说：“是的，我学到不少知识。”总理说：“你不是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吗？”我记起这话是《北京日报》登的那篇“访问记”里谈到的。周总理那么忙，而那篇报道又是那么长，得占用总理多少时间呵！我很不好意思地回答：“我是这样想，但做得还很差。”总理笑笑说：“慢慢学习嘛。”一年后，根据总理的提议，我参加了中国农业农民代表团出访日本，我想这大概是总理给我的又一次“放眼世界”的学习机会吧。

那天，总理和我们三个农民代表的谈话快到五点才结束。我正寻思：总理什么时间才能休息呢？总理却走上前来，握着我的手说：“实在对不起，头一次见面，就耽误你这么长时间。”我心里一热，傻乎乎地冒了一句：“您什么时间休息呀？天都快亮了。”总理只笑了笑，没回答，却问秘书送我到哪儿休息。我忙说：“我回医院吧，不用麻烦了。”总理告别了我们，转身刚走几步，又回过头来，见我还在原地恋恋不舍地目送着他，便大声问：“谁管她呀？”秘书忙说“有人管”，我便被拉走了。总理看我出了门，才放心地转身向前走去。我带着周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含着幸福的热泪走了，而总理那博大的胸怀、非凡的智慧、敏捷的思维、超凡的风度、慈祥的面容，谦恭的态度、感人的谈吐……一切一切都永远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仍记忆犹新。自从那天亲眼看到他老人家任劳任怨、不知疲倦地拚命工作，我的一颗为总理健康悬着的心也就永远放不下了。

我们的好总理，和我们总是心连心，整天要考虑和处理那么多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却还要时刻惦记着我们的许多平凡小事，什么住房问题、口粮问题、吃菜问题、疾病医疗问题、婚姻问题……，从政治到生活，从学习到工作，大大小小的事全挂在心上。他老人家更关心我们的思想，随时随地给我们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唯恐我们在复杂的环境里经受不住考验，会出什么问题。

记得就在总理接见我们三个农民代表那天，曾经谈到计划生育。总理问我：“侯隽，你避孕了吗？”我说：“没有。”“怎么不避孕呵？你们那儿有一个月一

片的避孕药吗?”我说:“我都没听说过。”“怎么没听说过?就是天津出的嘛,你可以去要点。”当时我也没在意。没想到过不多久我忽然接到妇产科专家余蔼峰的信,信上说:“总理捎来口信,叫我向你宣传避孕。从你的身体健康和工作需要出发,你应该避孕……”。读完信,我真后悔,又让总理挂念了,我决心永远严格要求自己,再不能让总理为我操心了。

“文革”期间,邢燕子曾受当时河北省某领导人的压制,我打抱不平,引火烧了身,挨了一顿批,憋了一肚子气。总理听一些记者谈及此事,特意在接见日本外宾时把我从医院接出来。第二天报上又发消息,又登照片,为我解除了政治压力。

1973年,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总理又提出:“把邢燕子、侯隽找来,听听她们的意见。”会上,总理叫我们站起来,向全体与会同志作了介绍,对我们的情况,包括对我父母的情况,总理都记得那么清楚,使在场的每位同志都深受感动。

也就是在那一天,我第一次见到江青。她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在主席台上。江青总是坐不住,一会儿站起来走出去,一会儿又坐在那些儿照镜子,后来索性玩起来了。她把点着的纸团放在烟灰缸里,引起火苗窜起半尺高。可能正在兴头上,听总理表扬我们,忙抢过话来大声说:“还有一个好青年,他叫张铁生,考试交白卷……”总理立即打断她的话说:“这样的好青年到处都有。”从那些天起,江青也认识了我。以后她几次到小靳庄都招呼我去迎候她,还把她的旧草帽给燕子和我,说是“在延安开荒时戴的”。没想到在我们宝坻县这古往今来兵家必争之地,争夺青年、争夺典型的斗争竟然这么激烈。

1973年党的“十大”期间,周总理作为天津的代表来到天津组参加讨论,市委领导有意把我安排在总理身边。记者同志为我们拍了张好照片。看到这张合影,我就仿佛又坐在了总理身边。总理那番贴心的话仍响在耳边:“有人说,朱克家刚入党四个月就当中央委员,总比李雪峰搞个非党员强吧!”“这次我们安排了两个知青中央委员,一个男,一个女;一个新,一个老;一个南方,一个北方。不然好像咱们就这么两个人了似的。我想这点侯隽是能够理解的,不会有什么想法吧?”听得出总理是担心我会因此闹情绪,他老人家的心有多细呀!因为我向来以为无论让我们谁当代表、当典型,都体现了党和人民对我们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肯定和鼓励。我们作为先进知青的代表只有发挥带头作用的义务,没有向党和人民伸手的权利。而且我早就听说,这次我当“十大”代表,也是由于总理的过问才安排的,所以,那天我好像没过脑子似的,就接



过总理的话来说：“哎呀总理，我还能有什么想法，能参加这个会我都没想到，我们一个县竟出席两名代表。”总理放心地点点头说：“特殊情况嘛。”

一年后，我又出席了四届全国人大，当上了四届人大常委，我猜想这也是总理悉心安排的。

回想起那年月，像我这个出身不好的人，“文革”中不仅没受到大冲击，还能多次参加重大政治活动出席党政重要会议，如果没有总理的关怀和教育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当时为了保护我们的热情，总理与各种恶势力巧妙斗争，处境又有多难呵！

“文革”中，总理为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总是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我们眼见他头上的白发、脸上的黑斑日日增多。真担心他的身体承受不住这巨大的压力。

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听说总理因病住了院，总理是为我们操劳累的呀！我无时不在祝愿总理早日痊愈，恨不得变只飞虫偷偷飞到医院里看看他老人家。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开幕的那天，我们主席团准备上主席台时，总理来了，大家热烈鼓掌，纷纷拥上前去和总理握手，我又看到总理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但他老人家苍老消瘦得那么厉害，看了又真让人心疼。问他身体怎么样，他回答说：“马马虎虎。”看来病得确实不轻。我对邓妈妈说：“总理怎么瘦成这样了？我看了直想哭。”邓妈妈还劝我说：“人老了，总要有点病。你在农村那么坚强，哭什么！”但总理究竟是什么病，我们谁也说不清。选举那天，利用大会计票时间，总理接见了天津代表团。他老人家对照代表名单一一问了姓名和职务。看到我的职务时说：“你当团市委书记了，你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停顿一下总理又关心地说：“不过她的职务太多了，要减轻他的职务。”后来市委决定燕子和我上留一职，下留一职，把中间职务全免掉了，实际这是总理的意思。当总理鼓励一位有病的老代表战胜病魔时，坦诚地告诉他：“我得的是癌症。”我听了觉得头发胀，眼发黑，两耳嗡嗡响，天旋地转……只听总理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吧”，其它就什么也听不清了。当时我欲哭无泪，欲喊无声，直至回到京西宾馆才清醒过来，扑倒在床上，失声痛哭。我怎么也想不能，总理为什么偏偏得了这种病！他自己得了不治之症，还惦记着为我们减少职务，减轻负担，我又能为总理做什么呢？如果我能替总理得病该多好啊！当时我们也还都抱着很大幻想——因为听有位代表说，他也是和总理一样的病，手术十几年了，也没出问题，所以大家又都盼望总理也能奇迹般地好起来。但奇迹始终没有出现，却传来了晴天霹雳般的噩耗。

永世难忘那悲痛欲绝的时刻，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令人朝思暮想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党和国家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人民群众失去了一位可亲的知心人，九州同落泪，四海放悲声，全国沉浸在巨大悲痛中。当时我在北京的一家医院治病。九日早晨，一个病友推开我的房门，带着哭腔喊醒我说：“小侯呵，打开收音机听听吧，总理逝世了。”我的心乱跳，边开收音机边想：“也许我听错了，不能吧？”但广播员哀告了这令人无法接受的事实。我无比震惊和哀痛。面对周总理的遗像我心如刀绞。我戴上了黑纱，插上白花，给邓妈妈写信，给我的亲友们邮寄总理的纪念画册……，但无论如何也表达不尽我怀念总理的无限哀思和爱戴总理的深厚感情。一位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不忍看我那哀伤的样子，悄悄把总理治丧办的电话告诉了我。我哭着央求治丧办的同志让我再看一看周总理。总算有缘，十日下午，我被获准去北京医院瞻仰遗容了。

只能看这最后一眼了，什么鲜花呀、党旗啊，我全顾不上瞅，只注意那张熟悉的脸，尽管不听话的眼泪总是模糊我的视线，我始终目不转睛地凝望着总理那坚毅安详的面容。总理消瘦得实在太厉害了，简直快让人认不出了。他老人家为国为民呕心沥血，无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我们怎么能离开这样的好总理呢！我怀着无比悲痛和崇敬的心情向总理深深鞠躬，仿佛又听到他老人家那洪亮的声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围着总理的遗体慢慢地走，觉得还象是他老人家在亲切接见我们似的，我多希望总理再睁一睁眼，再教导我们几句啊！可是，总理真的和我们永别了……

在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建设的今天，回想起周总理在四届人大做《政府工作报告》时那掌声雷动的情景，就象周总理又向我们发出了向“四化”进军的号令。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更加坚定了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我们缅怀敬爱的周总理，就要牢记他老人家的教诲，为实现他老人家的遗愿，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到底。

# 黄华副委员长两次来房山视察纪实

李 耀

1983年7月23日至24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华偕夫人何理良同志来房山参观视察。房山县委副书记王俊起、副县长马文舫和县人大副主任孟长友负责接待和陪同视察。1985年春天，黄华副委员长第二次来房山参观视察，县长王俊起、县人大副主任马向凤负责接待和陪同视察。我时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也参加了两次接待工作。黄副委员长那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以及和蔼热情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虽然身居高位，但平易近人，是一位可尊可敬的长者，是一位平民式的中央领导人。

1983年7月23日上午9点多，黄副委员长和夫人何理良在市人大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景良陪同下从市里乘车直抵房山县全国著名的农业先进单位窦店村参观。到窦店后，没有休息，立即在村委会小会议室听取村党总支书记仇振亮的汇报。仇振亮比较详细的汇报了窦店村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科学种田，改革耕作制度，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认真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等方面的工作以及群众生活变化的情况。窦店乡党委书记郑德光就公社体制改革的情况也在会上作了汇报。黄副委员长听的十分认真，并不时作下记录。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还常常提出一些问题展开讨论，气氛十分热烈。

汇报结束后，黄副委员长在大家陪同下，参观了窦店村的养牛场、养猪场、饮料加工厂、农机队、服装厂等一批村办企业，对窦店村的各项工作十分满意。特别是对窦店村因地制宜，实施“两茬平播”获得丰收的耕作方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于大力发展饲养业，搞“过腹还田”，既可增产又可增收十分赞赏；对重视发展机械化，解放劳动力和积极创办村办企业，发展多种经营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对于窦店村，乃至县乡干部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鞭策。

在窦店村参观视察后，黄副委员长在市、县有关领导同志陪同下到琉璃河商周遗址参观视察，并在留言簿上写下了“温故知新，振兴中华”的题词。晚7时离开商周遗址到县政府就餐住宿。因当时政府招待所条件较差，又不便于安全保卫，所以就把政府小会议室临时搭个床，作为黄副委员长夫妇的住所。

24日上午,黄华一行到云居寺参观。那时云居寺尚未重建,原旧址只建了藏经室和展览室,其他还是一片废墟。黄副委员长等领导首先参观了石经,并详细听取了文物管理所就石经的发现、挖掘、保管以及云居寺惨遭日本破坏的情况汇报。在参观过程中,黄副委员长对雕刻石经这一艰巨浩大的工程和静琬大师以及历代僧人这种代代相传、锲而不舍的精神深深感动;对石经的书法和刻经工艺,对石经促进佛学的继承和发展等方面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展览室黄副委员长写下了“云居石经,国之瑰宝,珍藏永年,千古鉴赏”的题词。



1983年7月24日,黄华副委员长(前排右三)一行视察云居寺(李耀提供)

从展览室出来后,又参观了嘉庆皇帝碑文、静琬和尚纪念碑、云居寺北塔以及塔院内的碑刻和石雕佛像。对这些在日本大轰炸下幸存的古老建筑和雕刻文物珍品的幸存感到欣慰,对云居寺这一重要文物古迹遭到日本侵略者的严重破坏感到痛心。

参观云居寺遗址和石经后,黄副委员长又到高庄水磨石厂、石窝大理石厂参观视察,观看了石雕工艺品,并与工匠师傅亲切交谈,鼓励大家继续开拓创新,精益求精。大家听了很受鼓舞。参观视察直到下午一点半才结束,然后大家一起返回县招待所用餐。饭后,县长王俊起、马文舫等同志又汇报了我县社队企业发展情况和关于发展旅游事业的设想。黄副委员长听完汇报后联系两天的参观视察,就有关社队企业发展、文物保管和修复、以及发展旅游等工作,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要大力抓好植树造林,绿化美化工作。他指出,所到各处感到树还不多,特别是窦店村是全国的农业先进典型,但树较少,应该加强植树造林,功在当代,利在子孙。

二是要加强文物的保管、修复和遗址的建设工作。云居寺被破坏的石佛、北塔的佛像面部破损的部分要修整好,修复技术要请教文物管理部门的专业人士,广西桂林文物局有一名修复技术比较高的工匠,可以派人去学习。对展览室的石佛摆放高度和铜佛要加套玻璃罩等都提出了具体建议,鉴于当时云居寺尚未对外开放,建议我们可以考虑对外开放,以便向海内外募捐,用来对云居寺的修复和建设。

三是要重视发展旅游事业。房山的文物古迹很多，山川秀丽，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应该大力发展旅游业，可以请国家旅游局来人帮助咨询一下。

四是社队企业要向深度发展。石窝大理石厂的雕刻，要从现在的一般工艺向工艺美术方向发展，要加强与美术院校的联系，求得他们的指点，提高艺术水平。并要与外贸部门挂勾，提高产品的价值，增加农民收入。

五是要注意培养年青一代的技术人才。现在大理石厂的雕刻技术人员年岁偏大，要抓紧培养年青一代技术人员。这既可以把传统的雕刻技术继承下来，又可以发展现代的新技术，新工艺。

下午3点，黄副委员长和夫人何理良同志在政府门前合影后乘车返京。

1985年5月，黄副委员长第二次来房山参观视察。县长王俊起与县人大副主任马向凤同志陪同参观（我时任政府办公室主任，也陪同前往）。

黄副委员长一行首先到十渡，在万佛台山庄稍事休息后，即徒步瞻仰平西烈士纪念碑。在去纪念碑亭的山腰小路上，还仔细寻找那个“佛”字，当看到“佛”字后，老人家为这个自然造化的绝妙奇景感到惊奇和高兴。

来到平西抗日烈士纪念碑前，黄副委员长认真阅读碑文，并联系自己抗战时的经历，感慨颇多，高度颂扬了人民的民族精神和革命热情。对平西革命根据地人民对抗战战争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为在平西抗日而光荣牺牲的烈士表示了崇高的敬意。从烈士纪念碑亭下山后，饱览了拒马河两岸美丽的自然风光。随后趋车到南尚乐乡下营村的红鲢鱼养殖场参观，由于当时红鲢鱼还是一个新引进的名贵鱼种，在饲养管理上还处于摸索试验阶段。因此，黄副委员长在参观时一再嘱咐养殖场的同志要虚心学习，勇于探索，不断总结，为今后的发展创出一条科学饲养的路子来。在鱼场参观后返回县政府招待所，在招待所，黄副委员长不顾劳累，又与县里主要领导就房山的旅游事业，特别是开发十渡旅游事业交换了意见。建议我们要拟好规划，分步实施，尽快把旅游这项产业搞起来，既增加山区人民的收入，又为广大群众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优美环境，是一件得民心的好事。

黄副委员长一行在招待所用餐后即返回市里。

# 张南生中将、卓琳同志在娄子水村

刘振泉 魏志华

1965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原北京军区副政委、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张南生中将、卓琳同志曾到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娄子水大队蹲点。

当时周口店公社娄子水大队四清工作队共180人，大部分是北京军区的同志。四清工作队长赵江是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师级），指导员唐汉清（师级），副队长林配芬是国家气象局的一位领导。各生产队的四清工作组组长都是团级干部。

张南生同志没有担任四清工作队的领导，主要是到村蹲点，帮助工作队搞四清的。他刚到村的时候，村里的干部、群众并不知道他是什么干部，工作队只给村里介绍是“张老”，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别的工作队员都是二、三十岁，而张南生已59岁，出门有警卫，有秘书，他住的地方有人站岗，工作队长对他说话也很客气。大家都看出来这位老人来历不浅（开始工作队长赵江等同志在部队的职务也没有公开）。直到1965年10月，北京军区来电话找张副政委，村里才知道他是北京军区副政委，村里知道后都感到惊奇。

张南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经过25000里长征。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过连指导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组织部长、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等重要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6兵团政治委员、志愿军政治部代主任、北京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就是这样一位老领导，却没有一点官架子，平易近人，说话和气，对干部、群众都很热情。特别是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对待干部的问题，关心群众生活，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给这个村的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心干部，保护干部

当时由于中央对农村形势和农村干部的问题估计的过于严重，因此，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有些四清工作队宁“左”勿“右”，认为搞出的问题越多，成绩就越大。有的搞逼供信，制造冤假错案，周口店公社南街大队就搞出一个以支部书记为首的大的贪污集团，几名支委都被开除党籍，支部书记还戴上坏分子帽子，直到1978年才给予平反。

娄子水村的四清运动却没有像上面那样搞。四清工作队在张南生的指导、帮助下，能够正确地对待农村干部，从四清一开始，张南生和四清工作队就反复宣传中共中央《二十三条》：农村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没有农村干部的辛勤工作，就不会有农村的进步。他们一方面发动群众查摆农村的问题，帮助干部改正错误，强调不能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同时教育干部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要深刻认识自己的问题，改正自己的错误。反复强调，四清的目的不是整几个人，而是通过四清要把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把农村工作搞好，干部要放下包袱，大胆工作。经过会议动员和个别思想工作，干部很快就去掉挨整的思想，积极主动与工作队配合。一方面高标准、严要求检查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积极抓起了各项工作。干部经过几次“洗手洗澡”，检查自己的问题，便都在代表会或群众会上通过“下楼”。

查证的结果，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重大问题，主要是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多吃多占的问题，该退赔的进行了退赔。大队领导班子也只进行了个别调整，干部、群众都比较满意。

#### 四清、生产一起抓

如何对待生产问题，是当时四清工作队争论的焦点。有些人认为农村干部是“光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埋头生产，不问政治”，还有的认为是“以生产压革命”。因此，不仅农村干部对抓生产不理直气壮，不大胆，就是四清工作队，有些人也心有余悸。但张南生和娄子水的四清工作队，对生产一直抓得很紧，工作队进村就把四清和生产进行全面安排。除大队、生产队干部主要精力抓生产外，工作队也有人分管农业生产，及时研究、解决生产上的问题。

1965年8月下旬工作队进村时，正赶上三秋种麦。工作队除开一些会议进行思想发动外，主要精力都投入三秋种麦，按时完成了任务。三秋种麦后，张南生和四清工作队几次找大队干部研究，如何使农业生产上一个台阶。他不

只一次的讲，四清的目的不是整人，就是要使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把生产搞上去，增产增收，要使农民富起来，过上好日子，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些话在大抓阶级斗争的年代是冒很大风险的，但干部、群众听了特别高兴。

经过几次研究，大家认为娄子水村影响农业发展的关键是水利问题。当时村里水地不多，大都是丘陵旱地，靠天吃饭。经过研究决定平原地打两眼深井，丘陵坡地挖坑田。但当时村里很穷，打两眼深井需要几万元，根本拿不出来。张南生立即从部队找来打井队，无偿为娄子水村打了两眼深井，扩大水浇地 200 多亩。三秋种麦后便发动群众在丘陵坡地大挖坑田，每天有社员六、七百人。四清工作队的同志也都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就连年近花甲的张南生也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为此，县委和县四清工作团党委还在娄子水村召开了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平原公社党委书记、四清工作团书记及部分大队党支部书记、工作队长参加。由娄子水大队和四清工作队介绍了他们的经验。经过一冬的努力，全村共挖坑田 2000 多亩。使粮食产量明显增加。1965 年粮食总产 145 万斤，1966 年粮食总产 210 万斤，增产 50 多万斤。

1965 年入冬后，张南生与这个村的四清工作队长又找大队党支部研究，如何进一步让农民增产增收。张南生说：“光靠粮食生产群众富不起来，能不能搞点企业？”一是当时政策的限制，农村以粮为纲，搞企业有风险。经常批判“重副轻农”、“以副伤农”；二是村里条件差，没有资源。当时村中唯一的副业就是每个生产队有 1 辆马车，农忙务农，农闲时搞点运输。张南生提议每个生产队再增加一辆马车，对农业对副业都有利。当时全村七个生产队，要增加 7 辆大车，就需要购买二十多头骡马大牲畜，又需要几万元，村里还是买不起。最后，张老从北京军区弄来退役的二十二匹军马。当时二十多匹军马运到村后，干部、群众奔走相告，大家都说，张老真是处处为咱们群众着想，真是咱们的贴心人呀！由于增加了 7 辆马车，对村里农业生产和增加收入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 关心群众生活，解决实际困难

张南生除对村里集体经济、农业生产关心以外，对群众的生活也很关心，经常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疾苦，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当时，全村 600 多户，3800 多口人，只有两口井，一口井安上水泵，安上龙头，大部分群众都到这口井去接水，经常排大队，等很长时间，浪费很多劳力。张南生发现后，立即找大队长刘振泉问：“这么多群众排队打水，为什么不多设几个点，多安



几个水龙头呢？”刘振泉告诉他，这个问题村里研究过几次，如果一个生产队设一个点，需要 2000 多米铁管，同时，水塔要加高，一般砖厂的砖还不行，需要窰店砖瓦厂的砖，窰店砖瓦厂是市属企业，砖又紧张，需要市计委批，买铁管和砖的资金村里也解决不了。

过了一段时间，张南生把市委书记刘仁和副市长兼市计委主任王纯请到娄子水，房山县副县长吕镒陪同。他们到村后，由刘振泉把村里情况、问题作了汇报，刘仁书记问的很细致。最后决定，2000 米铁管和 3 万块砖，由市计委帮助解决。刘仁同志和王纯同志临走时嘱咐干部要好好干，发展生产，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要走群众路线，改进干部作风，不要怕群众提意见。1966 年春天，村里把新水塔建好，自来水增加了 6 个点，群众吃水再也不用排队了。

总之，娄子水村的四清工作由于有张南生的正确领导，没有伤害干部，也没有伤害群众。通过四清使干部、群众受到了教育，改进了干部作风，改善了干群关系。特别是四清工作队和各级领导，帮助村里解决了不少生产和生活上的问题，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对村里的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都有很大的推动，干部和群众非常满意。1966 年 6 月四清工作队离村时，不少的干部、群众为他们送行。

娄子水村四清工作队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那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同志。卓琳同志从四清一开始就随工作队到村，但没有公开身份，没有担任四清工作队的领导。向村干部介绍她是“老左同志”，大家都以为她姓左。她穿的很普通，住在群众家里，除开会外，经常背着背筐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什么活都干，不怕脏，不怕累，晚上不开会时就到群众家里串门、拉家常，真正与社员实行“三同”。

当时娄子水村比较穷，每年的人均收入只有几十元，吃的大部分是粗粮，很少有细粮，早饭、晚饭还经常喝粥。副食更差，不过年过节吃不上肉。但她从没说过苦。不过村干部也觉得她不像个一般干部。有一次四清工作队开会，她因吃派饭晚到一会儿，她一进门，张南生同志就把她叫到自己身边的凳子坐下，对她很客气。会后村干部问工作队长赵江：“老左到底是什么人？”赵江半开玩笑地说：“该告诉你们的都告诉你们啦！不该告诉你们的，你们也别问啦！”从此，村干部再没有问过。直到 1966 年 6 月四清工作队离村时，“老左”才告诉大队党支部书记崔贵生、大队长刘振泉。“我不姓左，我是邓小平的老伴，我叫卓琳，以后有什么事县里解决不了的，可以去找我。”他们听了感到非常惊奇，也非常敬佩。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夫人，又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一

点架子也没有，在村将近一年的时间，和其他工作队员一样，吃派饭，参加劳动，生活那么艰苦，一点怨言也没有。同时我们也感到对不起她，对这样一个老同志、老领导，在生活上没有一点照顾。卓琳同志说：“如果开始你们就知道我是谁，对我说话就不随便啦，对工作没好处。生活艰苦点没什么，这样才能真正体验生活，了解的东西更真实。”

四清结束后，文化大革命很快就开始了，张南生、卓琳等同志都受到冲击、受到迫害。北京军区的造反派到娄子水村调查他们的问题。找干部、群众座谈，叫大家揭发他们的问题。问大家：“张南生、卓琳在娄子水村放了什么毒？”但不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异口同声：“他们在单位有什么问题我们不知道，在娄子水组织干部、群众学毛选，抓生产，帮我们解决好多生产生活上的问题，他们是好干部。”造反派什么也没捞到，扫兴而归。

张南生离休后，娄子水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振泉代表大队曾两次去北京看望他。每次到张老家里都热情接待，了解村里的变化，一再嘱咐刘振泉，要加强班子团结，带领群众搞好生产，要千方百计叫群众富起来。

从四清结束到现在已经 40 年了，但娄子水村的干部、群众没有忘记张南生、卓琳等同志。大家还经常提起他们，提起他们为娄子水村的群众花的心血、办的好事，说他们真正是人民的好干部。

# 参加全国首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 积极分子大会的经过

李德生 口述 白玉 刘振祥 整理

军留庄村地处永定河右岸的大堤脚下，东有永定河西有小清河。解放前，堤里有点好地被有钱人家霸占着。堤外土地贫瘠，地势低洼，到处是盐碱沙荒芦苇草。秋后遍地草，春天白茫茫，有雨水汪汪，禾苗黄又黄，草比苗高，种什么也是十年九涝，没什么收成。解放前，全村 61 户人家，310 口人，除两户富农生活好一些外，其余大部分户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为了生活，有的人大麦两秋外出打工，个别的逃荒要饭，还有的刮地皮熬小盐到外地去卖，还是偷着卖，说卖盐犯法。我们生活在不毛之地上，那时就像是“大地当床，蓝天当被，头枕半头砖”，几百口人就这样苦苦的煎熬着。在清河边流传着“金高岭，银稻田，饿的军留庄直叫唤”。当地的顺口溜说：“金高岭，银独义，饿的军留庄没主意”，这些都是军留庄村的真实写照。

解放后，全村在县委领导下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贫苦农民当家做了主人。男女老少齐出动，耕种在自己的土地上，出现了热火朝天搞生产的高潮。这时，我发现有的户缺劳力，有的缺畜力及耕作工具等，有了地种不上，心里非常着急。就带领全村几个基干民兵为骨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及时地组织了互助组，开展了助耕活动，一时间出现人帮人、户帮户，互助合作搞生产的新气象。

在种好地的同时，我又以互助组为基础，民兵为骨干，带领大家在低洼的盐碱地里，开了近 20 亩的稻地，种上了水稻，秋后亩产 300 多斤。在解放前这样的地种水稗子，才亩产百八十斤，我们第一年开稻田，就亩产 300 多斤。秋后每户能分上几十斤大米，过去只有地富等有钱人家吃的大米，现在我们也吃上了。

在 1952 年初，我们的互助组经县委批准，成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全村人走上了合作化道路。全村的土地统一耕种，统一收获，劳动记分，统一分配，人尽其才，地尽其力，成立初级社的第一年，水稻亩产 600—700 斤。这时有

的农民说：“生产年年长，不忘共产党，天天吃大米，不忘毛主席”。我们村由最穷的村，一跃成了富裕村。我们村的巨变，对周围几个村有很大的影响。到1955年初级社进一步扩大，把张家场、保合庄、杨庄子、马场等几个村合并进来，人多地也多。人口有3300口，土地是1100亩。当时我们实行统一方法和措施，分村管理，劳动记分，按分分红。决算时，每10分1元5角，人均收入300多元，劳力多的户达500多元。集体财产增多，家大业大骡马成群了，真的由穷变富了。各地学校师生到我社参观，他们赞扬说：“弯弯柳树靠河滩，挖渠打坝灌田园，千年梦想亲眼见，荒地变成水稻田”。

根据我们村的巨大变化，我被推荐评选为出席首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整个的评选过程由当时在团县委工作的张庆权亲自主持。我的典型材料是张庆权三下军留庄、六次召开座谈会后亲手编写，最后经上下多次反复核实才定的稿。



1955年9月，李德生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证书和出席证（李德生提供）

张庆权后来回忆时，详述了我参加大会前的经过：“为了迎接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1955年团中央发出通知，决定1955年第三季度召开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河北省团委、通县团地委先后发出通知，就评选积极分子事宜提出了具体要求。根据通知要求，团县委分析了全县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青年农业社长的情况，就评选方法以及代表产生等提出初步意见，向县委常委做了汇报。会后，县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长罗玉源来到团县委，同我们一起研究评选工作。他要求我们：一要开好评选会；二要抓重点，对事迹突出的典型，要派人帮助准备材料；三要总结典型事迹要做到实事求是，群众公认。经过充分准备，召开了评选会，四个区的代表一致推选我为出席代表。

评选会后，张庆权来到军留庄农业社，先后六次召开各方面人员座谈会，走访了十余户社员，听取反映，核实材料，就地写出了初稿。回到团县委后，又请罗玉源同志参加讨论，并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他要求对不太确切的数据和含混不清的事例，再实地核实一下，做到真实可靠，群众公认。为此，张庆

权同志第二次到军留庄农业社，再次核实补充材料，写出了第二稿。回到机关，经过讨论通过后，第三次又到军留庄农业社，在党团员干部会上宣读典型材料，征求意见。最后，由罗玉源同志修改定稿，上报河北省团委。在“五四”青年节前夕，省团委批准了我代表良乡县去参加解放后首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55年，我还是一个25岁的青年社长（团县委委员），是做为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典型去参加大会的。我去的时候，由良乡出发，先到河北省保定市集中。当时全省各界各条战线的代表近百人都云聚保定，住在条件比较好的河北饭店。然后由省团委书记李兴带队，到北京西苑大旅社报到。根据会议安排，我们这些代表就吃住在旅社。当时我就想，党和国家领导这么重视这次会议，又把我们安排这么好的旅社吃住，真是感慨万千，贫苦农民出身的我，有幸参加这次大会，真是莫大的幸福。这次大会是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由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主持并作大会报告，他报告的声音宏亮，掷地有声。他还不时地提问，接着便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他说：“我们青年人，是党的得力助手，就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什么是顶天立地呢？我告诉你们，顶天就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只有用革命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才不会迷失前进的方向。什么是立地呢？立地就是密切联系群众，走好群众路线，这是做好工作的保证。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我们青年人敢想敢创的革命精神，才能团结和带领广大青年，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他的报告打动着每个代表的心，全体代表都受到很大的教育启发和鼓舞。

大会发言进行好几天，各界代表交流了经验和体会。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赖若愚同志代表全国总工会，各条战线的领导李富春、邓子恢、邓颖超等都对大会表示了祝贺，并对代表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他们说我们是国家的栋梁和未来的希望，要求我们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充分发挥党的助手作用等。

在会议进行当中，著名作家魏巍来采访我。我向他简单的介绍了情况，并把团县委的材料给他看了，他看得非常仔细认真，而且很有兴趣。他对我说，“弯弯柳树靠河滩”太俗，这样吧，题目就叫“永定河畔稻花香”吧。时间不长，《永定河畔稻花香》一文便在各报刊相继发表。后来这篇文章，还收集在大会汇编文集中，可惜我保存的那本文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丢了。

9月28日晚上，周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并宴请全体代表。在宴会厅里，

听说周总理来了，代表们纷纷涌向饭店门口，团中央领导动员大家各就各位，当时周总理也风趣地说：“你们要听青年领袖的话嘛，快回去！”大家才自觉的回到各自的饭桌。在宴会中周总理每桌都走到了，当周总理来到我们饭桌时，拍一下我的头，亲切的问：“小伙子，你是哪儿的？”我立即做了介绍说：“我是河北省良乡县的农民代表……”。周总理握着我的手意味深长地说：“好啊！合作化搞的好，今后还要搞农业电气化和农业机械化，实现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农村一定会越来越好。”周总理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全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9月29日，大会即将结束，毛泽东主席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怀仁堂接见了全体代表。大家静静的等候着，心情非常激动，天天想日日盼，都想亲眼看看毛主席。毛主席来了，大家自觉的起立，以雷鸣般的掌声迎接毛主席。毛主席冲我走来，我正好在他坐位后边，和我只隔一把椅子。毛主席把手伸过来，和我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我的心激动地快要跳出来了，虽有千言万语现在想说也说不出来了。此时此刻，我就觉得我真幸福、真自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激动的心总也平静不下来。

1955年10月1日，我们全体代表参加了国庆观礼。我在观礼台东侧，亲眼看到了天安门前庆祝国庆节日的热烈场面。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让我终生难忘。

散会后，代表们都回到了河北省保定市，领导给我们讲了话，布置了工作，要求我们回去向党委汇报，传达大会盛况和会议精神。

接着，通县地委书记徐瑞林、专员王宪以及团地委领导又接见了我们，并安排到通县、顺义、三河、香河、蓟县、大兴等县去做传达报告。

回到良乡以后，我首先向县委和团县委领导做了汇报。他们听了以后很高兴，并安排我给全县500余名教师及上千名的良中学生做了首场传达报告。

这次大会对我的启发教育是深刻的，特别是周总理说的农业要电气化和机械化，对我是很大的激励和鼓舞，使我明确了前进的方向。我下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倍的努力，创造出新成绩，更上一层楼。

1958年，我又参加了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次会后，由团中央组织我们部分代表组成青年代表团，赴朝鲜进行访问，受到朝鲜领导的接待，并发给每人一个奖章和证书。

# 房山解放区的妇女

王硕儒

房山解放区的妇女组织，始建于抗日战争时期，初称妇女抗日救国会，后更名为妇女救国会（简称“妇救会”）。1942年边区实行精兵简政，在抗日救国联合会下设妇女工作部。

解放战争时期，各级妇女组织均称妇女联合会（简称“妇联会”）。各级妇女组织的首要任务，是教育和领导解放区广大妇女提高阶级觉悟及自身解放的意识，推翻“三座大山”，冲破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和婚姻、家庭等束缚，同一切虐待、歧视妇女的行为作斗争，动员并组织妇女走向社会，投身土地改革、生产运动和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中去。

妇女参政，积极投入土地改革运动，是摧毁封建地主政权的关键环节。房山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从1946年冬至1948年上半年，经历了土改、复查、平分和纠偏几个阶段，各个阶段都有广大妇女的积极参加。据统计，1947年上半年土地复查，一区参加贫农团的妇女556人，占应参加的26.3%；二区12个村，参加贫农团的妇女392人，占应参加的55.5%。同年冬的土地平分，一区参加贫农团的妇女1042人，占应参加的67.7%。一、二两区贫农团的代表311人，其中女代表114人，占代表总数的36.7%。1948年上半年土改纠偏中，房山解放区（一区和二区21个村）参加农会的妇女会员2031人，占应参加农会的43.9%；农会委员259人，其中女委员65人，占25.1%。区代表207人，其中女代表94人，占45.4%。二区张坊村，在土改纠偏重新划分阶级成分时，广大妇女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这一时期妇女参政，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各级政权注重培养和选拔思想进步、工作认真的妇女担任领导工作，鼓励和支持妇女从政。许多村庄还专门由妇女组建政权班子，据1948年5月统计，房山二区有13个村建立了男、女两套政权组织，战时，男子外出支援前线，女子担负起村中全部的政权工作，而且工作很出色。如干河口村女村长穆秀芝，在领导生产、组织后方群众支前和处理过往军队、民兵、民工的吃、住等工作中，都认真负责，工作繁忙时，

不分昼夜，都按时完成任务。

战时支前是村政权的的一项重要任务，很多工作都是由妇女承担的，如做军鞋、磨面粉、慰问伤病员等。一区下石堡村妇女每天轮流值班，一切过往军队、民工的接待等各项工作都由妇女负责。有一次，接待了 66 名伤病人员，全村妇女组织起来，烧水、做饭，伺候两天两夜，对重伤员，不仅要喂饭、喂水、喂药，而且要端屎端尿，精心照料，胜似亲人，伤病人员都很受感动。

妇女参加生产，是广大妇女从经济上取得自立地位，实现男女平等的关键。房山解放区各级政权和妇女组织，一贯重视广大妇女参加生产运动，并组织妇女拨工组。1948 年，据一区 21 个、二区 18 个村统计，有 7 个村组织男女混合拨工组 70 个，参加 589 人，同时，组织妇女拨工组 548 个。一区下石堡村，组织 4 个妇女拨工组，参加 26 人，郑秀兰、赵秀兰、刘淑芝等青年妇女，拨工背粪、刨地、背水等。二区西河村，组织 7 个妇女纺织组，参加 46 人，每组人数不等。

争取文化翻身是解放区妇女自身解放的一项重要任务，县、区、村各级政权和妇女组织，一贯重视组织妇女识字、学文化，并组织妇女参加屋顶广播和剧团演出等宣传活动，以达到边学边用，在用中学习的目的。一区下石堡村每晚的屋顶广播，都由妇女承担。据下石堡、霞云岭、庄户台、堂上、东村、芦子水、蒲洼等 8 个村剧团统计，共有演职员 248 人，其中女演员 60 人。二区十渡村剧团郑玉仙与女儿同台演出《小姑贤》，受到观众的好评。



# 五十年代房山师范学校琐忆

宋湘

重视发展教育在房山有着优良传统。《房山文史资料》第 17 辑刊登了我的师兄魏志华经过艰苦调查走访后撰写的《房山最早的师范学校》一文，读后颇多感慨。现将上世纪 50 年代的房山师范情况也作一回顾，供后人了解那段历史。

## 房中附师开班

上世纪 30 年代房山县乡村师范学校创造了四年的辉煌，后因日寇侵华，战乱爆发而停办。

1948 年，房山中学校长绳纶如，（石楼镇杨驸马庄村人）深感房中附小（1944 年房山中学成立后，原“房山县立中心国民学校”即“城关小学”改为房中小学部，直至 1951 年中、小学分设）师资匮乏，遂萌生自己培养师资之决心。在取得当时县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同意与支持后，于当年夏季招考了房山中学附属师范第一班，学生 50 人。

1948 年底房山县城解放，人民政府接管房中。1949 年 3 月房中复课。

## 房中附师第二班招生

1949 年，笔者就读于房山县第 13 完小（前长育学校，上世纪 50 年代初改称洪寺小学，80 年代复名长育中心小学）六年级。历来，中、小学皆为秋季始业，解放后的第一年全县各小学改为春季始业，而中学仍为秋季始业。1949 年暑期，六年级尚未毕业，房山中学却要招生，各小学只允许少数同学提前毕业报考房中，多数同学仍留校就读。

1950 年 1 月，我们这一届六年级学生正式毕业，但中学（包括北京市里各中学和房山附近的良乡中学、涿县中学）皆不招生。这时，房山中学通告招收附属师范第二班 50 人。全县小学应届及往届毕业生以及同等学力者闻讯蜂

涌报名，报名人数达 328 人。在房中小学部的教室里，以一天时间笔试算术、语文。年深日久，试题早已忘记，唯作文题《为人民服务》至今记忆犹深。数日后发出第一榜，100 人榜上有名。

因是招收未来的师资，形象、口才、反应能力都很重要。遂于数日后举行面试、口试。在当时房山中学中三班教室（全校最大的教室），用课桌排成一个长弧形，十几位教师两人一组就坐，考生从东侧门按号入内接受面试和口试，从西侧门鱼贯而出。试题有数学题、语文题，自然常识题，还有智力测验题。

当时，我仅是一个 12 岁的农村孩子，对于能否录取心中无底。万一落孙山将无处升学，到社会上谋取职业又因年幼无知而不可能，心中忐忑可想而知。进入面试考场后，见到老师中有几位熟悉的面孔，国文教师白焕如、王香岩，生物课教师李志宽，他们都是 40 年代中期原长育学校的老师。在熟悉的老师面前回答问题，心情倒也放松下来，因而能够对答如流。至今我还清晰记得，白焕如老师在问了几个语文、语法常识后，突然问道：“木桩上有 5 尺长的一根绳子拴着一条大狗，距木桩 8 尺远放了一块骨头，狗能不能吃到骨头？”我心想：5 尺绳子，8 尺距离，如果拴住狗头它显然不能吃到骨头；但白老师提问中强调是一条“大狗”，我顿时反应过来，立即回答：“把绳子拴在狗腿上，加上大狗的身长，它一定能扑到那块骨头！”只见白老师满意地笑了笑，说了一声“过”。下一关到了李志宽老师面前。李老师以他那特有的轻声细语问我：“肥料的三要素是什么？”这是小学自然课上学过的知识，我立即回答：“氮、磷、钾。”李老师又问：“食物的三要素是什么？”我未假思索地回答：“也是氮磷钾！”李老师的声音显然提高了八度：“人能吃大粪吗？”我顿时醒悟：“回答错了！应该是脂肪、淀粉、蛋白质！”李老师笑了，轻声说：“过！”走出考场，我的心仍在怦怦地跳！

又过数日，学校发出第二榜：正取 50 名，备取 10 名。喜出望外的是，我中了正取第一名。

正取生中，由于不同的原因，个别人没有来入学，有的来了不久又退了学，备取生陆续递补。此外，还有政府保送的宛平县（今门头沟区）和房山县长操、南窖等老解放区的几位小学教师插班深造。全班同学最多时达 60 人，后来的 3 年中有来有走，到毕业时实有 52 人。

### 附师班在孔庙

1950 年 3 月 4 日（旧历正月十六），房山中学开学。我由此进入房中附师

第二班。

房山中学及其附小是在早年云峰书院（房山县城南门内路东学宫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又把毗邻的孔庙、药王庙扩进来。进入校门，越泮池汉白玉石桥，过棂星门，进入孔庙，北面5间正殿，南面3间过厅（即大成门），与东西各5间配殿（称“东庑”、“西庑”），形成一个大四合院。院内古柏参天，历代石碑林立，一派庄严肃穆的景象。1950年我们入学时教室就设在孔庙的正殿里。圣像尚未拆除，只是把大殿原有木屏风向里移，将圣像遮挡起来，剩余的空间即为教室。到1951年我班迁到孔庙以东药王庙正殿。1952年初又迁到药王庙以东、东城墙根一片园田中的5间北房里，直至1952年暑假。

我们班入校时，房中校长杨槐堂（宛平县桑峪村人），教导主任王吉吉（宛平县马栏村人）。全校除附小外，中学部4个班（中一甲、乙两个班，中二、中三各一个班），附师两个班，学生共计约300人。除教导处、总务处干部、职工10余人外，各科教师不过20人，有语文教师白焕如、王香岩、王履荫，数学教师田树屏、彭振蒙、罗东光，历史教师祖兆增，地理教师李慰萱，教育学教师马汝良，生物教师李志宽，理化教师李秉忱，音乐、体育教师李杰臣。还有几位来了不久却又离校的老师，记忆已不很深刻。

### 丰富多采的文体活动

房中附师一、二班学生学业基础普遍较好，加之老师的教学内容侧重于教育学、社会活动学，所以很快成为房中文体活动和社会活动的重要力量。

解放初期，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为配合政治运动的社会宣传，各班学生在老师指导和直接参与下，排演各种文艺节目到社会上去宣传。1949年，附师一班排演了以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为背景，以反封建、反压迫为主题的大型历史话剧《九件衣》。1950年，房中师生排演了以反抗阶级压迫为主题的古装京剧《打渔杀家》，数学教师田树屏饰演肖恩，师一班女生于莲芳饰演桂英，历史教师祖兆增饰演教师爷，师一班同学刘凤鸣、张勤饰演李俊、倪荣。师二班同学在音乐教师李杰臣的指导下，排演了反映新社会工人阶级发挥主人翁作用的歌剧《新态度》。1951年，师生还排演了以破除封建迷信为主题的大型古装京剧《河伯娶妇》，田树屏老师饰演邳县县令西门豹，师一班同学卞恂饰演巫婆。同年，师一班同学排演了现代歌剧《一贯害人道》。师二班同学排演了反映农民加紧生产支援

抗美援朝的歌剧《生产忙》。这些文艺节目在校内、城隍庙戏楼多次演出，曾轰动房山城乡。

此外，为了锻炼师范班同学社会活动能力，学校组建的鼓号队、腰鼓队、秧歌队也以师一、师二班学生为主力。大家经常利用星期天或中午休息时间，有时也占用一些上课时间，由鼓乐队、腰鼓队开路，到大街上或附近村庄演出活报剧、相声、快板书、“拉洋片（演唱、宣讲学生自己画的时事漫画或连环画）”。

附师班同学的体育活动也非常活跃。学校举办的春、秋季运动会上，师一、师二班多次取得男子篮球冠、亚军；师二班女子排球队多次夺冠；田径项目师范班也取得很好成绩。

### 房山师范学校正式建立

解放初期，经过几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以“一化三改（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总路线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即将到来，大力发展教育更趋迫切。在这种形势下，房中领导和县教育主管部门早已开始酝酿附师与房中分离，正式建立房山师范学校。

1951年暑期，附师一班毕业，又招收了附师三班50人。

1952年暑期，县人民政府决定利用城南5里顾村村北、玄应观大庙的古旧建筑建立房山师范学校，并将玄应观西邻的顾册小学命名为房师附小。暑假期间，房中派员前往主持拆除大殿中的泥塑神像，改建教室；在院内东侧空地新建两座教室（青砖平房）。

1952年9月1日开学。附师正式与房中分离。这时，我们房师二班已是三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三班已升入二年级，又招收了房师第四班50人。

房中教导主任王吉吉调任房师首任校长。两个多月后，房中校长杨槐堂奉调通县专署教育科，王吉吉又调回房中任校长。房中总务主任刘天德调房师为第二任校长。1952年12月，刘天德校长因煤气中毒突然辞世，教导主任隗永录主持工作。1953年初，谭九皋调入，为房师第三任校长。当时我们已经毕业，谭校长尚未到任；后来发给我们的毕业证书已是谭校长署名。

建校初期，教师中由房中分来的有马汝良、王香岩（我们班的班主任）、罗东光；新调入的有隗永录、马凯旋、高杏村、张振远、张永兰、冯侃、胡宝田；教导处、总务处教职工有张勤、刘凤鸣（都是附师一班毕业生）、张树民、石洪太（从房中分来）、吕伏熊、潘金耀、邹树铭等；还有一位玄应观道人恒

谦留任做学校工友。

## 劳动建校

8月31日我们来校报到。校内到处还是一片杂乱景象。大殿神像已经拆除，新盖教室刚刚落成，勉强可以上课，但拆除之渣土还像小山一样堆在院里。女同学宿舍安排在大殿东西两廊低矮窄小的“七十二司”内。男同学宿舍尚未建成，临时借宿在学校对过戏楼附近的一些民房里。

9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庆祝房山师范学校诞生。县政府教育科长杜生聪（1950年我们考入房中附师班时杜是学校教导干事、团委书记，不久即调团县委，后升任教育科长）到会。校长王吉吉在讲了建校的意义和学校面临的困难情况后，要求全校师生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向全校师生发出“劳动建校”的倡议，党、团员代表纷纷发言响应，一个以党、团员为骨干，全校师生踊跃参加的劳动建校的热火朝天的局面立即形成。每天中午、晚上课后时间，以班为单位出动，有的清理渣土、平整院落；有的到顾册村西一里多地公路南侧一个砖窑背砖（盖男生宿舍及院墙）。“年轻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歌唱二郎山”的歌声响彻在劳动工地。大家以新中国的主人翁精神，解放军进藏部队不惧艰险修筑康藏公路的精神，互相激励和鼓舞，深秋时节汗流浃背，没人叫苦叫累，都把艰苦当乐趣，为母校作贡献为光荣，终于在入冬前建成了男生宿舍，校园也整理得平整而洁净。

1953年2月8日，房师二班举行毕业典礼，全校教师与毕业班同学合影留念。下午，教育科长杜生聪与全班同学逐个谈话，宣布分配工作决定。全班52人，除王庆宽、张珍等10人分配到县委、县政府，鞠德裕留校任音乐、体育教师外，其余全部分配到全县各村小学校任教。



1955年2月，房山县初级师范第二班毕业师生合影（宋湘提供）

1956年，房山师范停办。1958年3月，在顾册师范原址又重建房山师范（此后已是中等师范）。1960年房师迁址城关公社饶乐府村东，1962年房师并入昌平师范，此是后话。

# 五十年前的双柳树村

魏志华

1954年2月8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该报著名记者高粮拍摄的反映翻身农民欢度春节的一组照片。通栏标题是《春节在双柳树村》,共12张。这组照片反映的内容很丰富。有春节这一天村里接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李振东在朝鲜立功的喜报,村干部率领本村农民给军属李凤祥大伯送匾贺喜的;有在该村“工农联盟座谈会”上,参加抗美援朝归来的北京铁路局丰台工务段工人王宝坤介绍祖国建设情况的;有村里召开“爱国检查日”的;有村里农业社检查农具、种子,准备春耕生产的;有大年初一村里举行团拜会的;有春节联欢会上演出文艺节目的;还有房山县县长张拓夫把爱国售粮模范村的红旗授予该村的。据笔者所知,这组照片还同时发表在当时的《人民画刊》(后改为《人民画报》)第266期上。

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抗美援朝专刊”上,同时发表了《人民日报》驻朝鲜战地记者金凤采写的通讯,题目是《佳节报前方》。记述的是双柳树村除夕,志愿军战士王宝芬的家里召开家庭会的内容。王宝芬的大哥王宝坤是北京铁路局丰台工务段的工人,二哥王宝森是本乡党总支书记,王宝芬是老三,四弟王宝芳在本村上学。他们是个先进家庭。这天晚上,他们召开家庭会议,制定1954年每个人的工作学习计划。同时,全家给在朝鲜前线的王宝芬写信,介绍家里的情况和变化,鼓励他在朝鲜前线杀敌立功。这篇通讯的前边,还有记者高粮拍摄的志愿军战士王宝芬家里开家庭会的照片。



为什么《人民日报》要发表双柳树村的照片和消息呢?1954年春节前,《人民日报》记者高粮和金凤到房山采访王宝坤介绍了祖国铁路建设的情况(魏志华提供)

夏曆甲午年正月廿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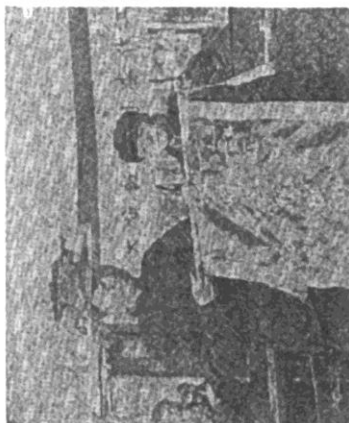
一九五四年二月八日

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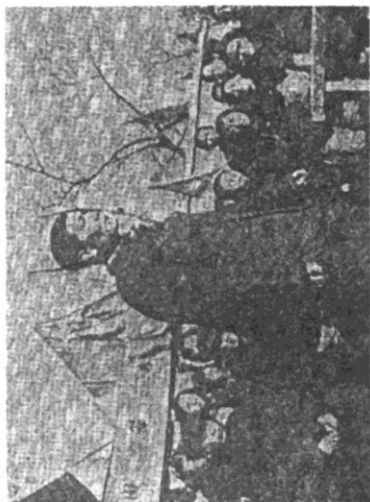
第七期

大光明电影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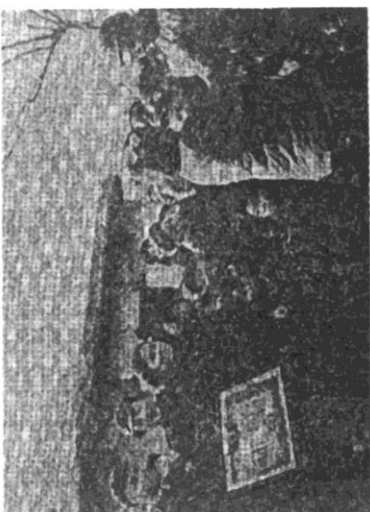
# 春節在雙柳樹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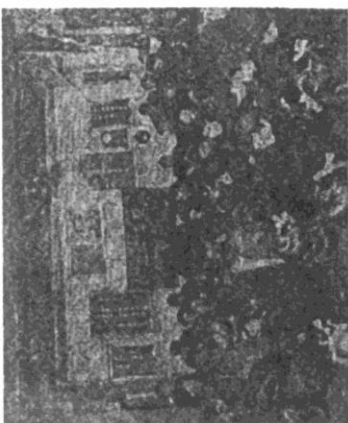
▲ 春節期間，雙柳樹村農民在村中舉行各種慶祝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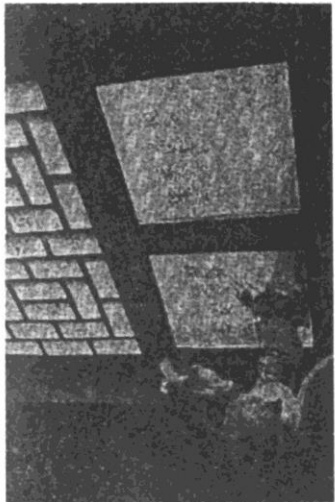
▲ 春節期間，雙柳樹村農民在村中舉行各種慶祝活動。



▲ 春節期間，雙柳樹村農民在村中舉行各種慶祝活動。



▲ 春節期間，雙柳樹村農民在村中舉行各種慶祝活動。



▲ 春節期間，雙柳樹村農民在村中舉行各種慶祝活動。



▲ 春節期間，雙柳樹村農民在村中舉行各種慶祝活動。

1954年2月8日，《人民日報》刊載的《春節在雙柳樹村》照片資料（局部）（魏志華提供）

访,准备拍摄一组反映翻身农民欢度春节和抗美援朝活动的照片。经县委研究,他们二人被推荐到当时一区的双柳树村。因为当时的双柳树村是区、县、专区和省的模范村(当时房山县属河北省通县专区),生产、扫除文盲、办民校、组织宣传网和爱国卫生运动中,曾得过11面红旗。较早的办起了互助组和李春常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村的政治思想工作比较好。每年大年初一,全村干部群众集中一起搞团拜。除村里制定一年的工作计划外,每个家庭也要制定家庭和个人的工作学习计划。同时,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十五为“爱国检查日”,党员和干部一起开会,总结和布置工作。这种制度促进了全村的各项工作和团结互助,保持了模范村的荣誉。1953年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高涨。原来村里只有李春常1个初级社、8个互助组,贯彻总路线以后又增加了王福农业生产合作社和6个互助组,全村除地主、富农外,都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按当时的政策,地主、富农不准入组入社)。1953年冬,第一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双柳树这个100多户的小村,就卖爱国粮37万斤,每户平均3000多斤。被县里授予“爱国售粮模范村”的称号。

确定高、金二人到双柳树村采访后,县委给他们找了两辆自行车,由县委宣传部的同志陪同去双柳树村。到村后,他们深入田间地头,到干部和农民家里座谈访问,召开座谈会,和群众一起过春节。他们在村住了五六天,拍下了大量照片,挑选了十几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采访结束后,高、金二人回到县委机关,向县委领导介绍了采访情况。他们对双柳树村评价很高。认为这个村领导班子强,干部、群众思想觉悟高,风气正。给这个村概括了四个字:“爱、憎、俭、耻”。爱,就是双柳树村人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热爱自己的家乡;憎,就是憎恨国民党反动派,憎恨剥削阶级,憎恨旧制度;俭,就是双柳树农民勤俭持家,劳动致富;耻,就是民风古朴,讲道德,知羞耻,村中没有违法犯罪的。认为这个村不愧为农村工作的先进典型。



1954春节这一天,双柳树村接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李振东在朝鲜立功的喜报,村干部率领本村农民给军属李凤祥送匾贺喜(魏志华提供)

《人民日报》发表双柳树村照片消息后,在全县引起了很大震动。因为这



是解放以来，国家级报纸第一次发表反映房山人民生活的一组摄影作品。双柳树很快成了当时农村的样板、农村的“明星”。有些乡村干部到双柳树参观学习；有的按照双柳树的经验，制定了自己的计划和制度。对全县的农村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双柳树村的干部、群众更是受到很大鼓舞。当时村里的报纸不多，大家都抢着看，传着看。村党支部还组织党员、团员、干部集体学习讨论、找差距，表示一定要戒骄戒躁，继续努力，争取各项工作有更大的进步。

# 五十年代的房山县委宣传部

马向凤 魏志华

解放初期，我们国家的经济还很落后。中共房山县委宣传部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从 1948 年 12 月房山县城解放到 1958 年 4 月房山、良乡两县合并，在近 10 年的时间里，中共房山县委宣传部的部长先后是：宋广宽、佟建和、郑玉森。副部长是：张进儒、晋显文、赵广仁、李棲良、马向凤、耿宏悦、范德山。宣传部的干事，多时有六、七人，少时三、四人。

当时县委宣传部的的主要工作是：

1、群众性的宣传教育。对群众的宣传教育除通过会议外，主要是依靠报告员和宣传员。

1950 年县委即设立了报告员制度。当时报告员共二十几名，主要是县委委员和县直各部门的主要领导。报告员都分片包干，明确分工。每两个月报告一次。县委宣传部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结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编印宣传材料。县直机关每两至三个月由县委主要领导向机关干部作一次国际国内形势报告。

在农村建立宣传网，发展宣传员。到 1951 年底，全县宣传员发展到了 1500 多人。宣传员主要是党团员及有文化、有宣传能力的群众。他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和宣传材料，及时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方法相当落后。主要是靠黑板报、屋顶广播。一般村黑板报有四、五块，每周换一次。屋顶广播，因当时房山还没有电，只能靠人喊话。在村里每隔 100 米左右设 1 个人，站在屋顶或高处，最前边的人一句一句的念稿，后边的人一个一个往下传。宣传员的喇叭，有的是用铁片或硬纸自己做的。有的就用拔火筒。屋顶广播一般也是每周一次。民校也是一个宣传阵地。当时全县有 200 来个民校，600 多名教师，2000 多名学员。民校除学习文化外，也经常进行时事政策的宣传。此外，全县有 56 个剧团 58 个花会。剧团有京剧、评剧、河北梆子、歌剧等。花会有秧歌、旱船、太平鼓、高跷等。一般每个剧团

演出五六次。除春节和庙会外，一些大的活动也要演出。剧团演出，参加的人很多，影响也大。除一些传统的历史节目外，也配合中心工作，上演了一些现代戏。如歌剧《白毛女》、《刘胡兰》、《王秀鸾》、《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王宝山参军》、《赤叶河》等。评剧有《刘巧儿》、《罗汉钱》、《柳树井》等。当时演出影响较大的有长沟的《白毛女》、《王秀鸾》、饶乐府的《刘巧儿》、房山中学的《打渔杀家》、北街的《小女婿》。

县委对宣传员的工作很重视，除定期培训外，还召开宣传员代表会议。

此外，在宣传方式上，还有当时被称作“科学的现代化的方式”，就是利用幻灯和收音机。1954年以前，全县共有干电池收音机7台。县直机关4台（县委宣传部、县政府、县社、房山中学），三、五、六区各1台。每台收音机都配有专职或兼职的收音员。县委宣传部的收音员是索培珍，政府的收音员是冯越。他们每天要收听和记录中央电台的“记录新闻”。还要经常带着收音机到农村组织群众收听。这在当时是最新鲜、最受欢迎的。1953年初，魏志华和县政府的徐庆云、冯越等人去六区贯彻婚姻法。带上政府的收音机，背着行李，从六区区政府霞云岭，一个村一个村的一直走到蒲洼、东村、芦子水、鱼斗泉等村，这是房山西南最远的村，离房山县城200多里地，与涞水县的野三坡相连。每到一个村，除开会宣传外，便组织群众收听收音机。山里的人从来没有看见过收音机，又听新闻，又听戏曲，感到特别新鲜。男女老少参观这“新式武器”，比通知开会到的人还齐，效果特别好。

看电影当时是一种高级的文娱活动和宣传形式。但当时农村看电影相当难。县里没有电影队，只是通县专区有一个电影队，到各县巡回演出，几个月来一次。到各地演电影要带上发电机，自己发电。1956年房山县建立了电影放映队，共四个人，1台16毫米放映机，1台汽油发电机，1辆运机器的马车。

2、支部教育。对基层党支部的党员教育，也是县委宣传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县委宣传部及时编印下发支部教材。一般每月组织1至2次党员学习。除县、区领导讲党课外，还从有文化的农村党员干部中聘请了六十名不脱产的小区支部教员。那时小区支部教员没有补贴，到外村上党课自己要带干粮。同时，每年冬季还要轮训一次党支部委员和部分党员。当时县里条件很差，没有招待所，更没有宾馆，一开会就要住民房。有时在县城办学习班，住四街两关及洪寺、饶乐府、顾册。1954年以前，原房山宾馆西院的大北屋，是当时县里唯一的大礼堂。县里开大的会议都在这里进行。有时到长沟的太和庄或石楼的二

站村去办班，开会、住宿都在当时废弃的天主教堂里。一个大屋住几十人。地上铺上花秸、稻草。不仅如此，在解放初期办学习班，还要自己带被褥、带小米，国家没有开支。十渡、霞云岭里边的山村的干部到房山开会，一天到不了，需要走两天，非常艰苦，但参加会议的干部很少缺席。

3、组织县直机关干部学习。那时机关干部的学习分两种情况。一是文化班，参加的机关干部学历都是初中以下的。二是理论班，即初中以上的。文化班的学习，由县委宣传部领导，县政府文教科和干部学校具体负责。理论班由宣传部直接管理。解放初期，机关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大部分没上过高小，甚至是文盲。初中毕业就算是知识分子。当时凡是没有上过中学的，一律到西街干部学校去学习。那时的学习，一律不占工作时间。每天早晨6—7点为学习时间。那时机关连个钟表也没有，只有政府传达室有一个马蹄表，传达室的屋顶上有一个手摇汽笛。机关上下班，早晨学习，都以汽笛为准。经过几年的努力，机关干部绝大部分都达到高中或初中的水平。

1954年以前，机关的理论学习主要以小组为单位自学，内容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党史，如胡乔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56年以后，通县地委成立了讲师团，巡回到各县讲课，系统地学习了哲学、《联共（布）党史》。到房山讲课的主要是刘孝先。每半个月讲一次。平时利用早晚时间自学或小组讨论。每个阶段还要进行考试。那时的学习条件很差，但大家的学习情绪都很高。

4、通讯报导。宣传部有一个同志主管宣传报导。一是自己写稿，二是各单位提供稿件。及时反映农村及各单位的好人好事。如解放初期，宣传部组织总结了周口村党支部书记卢翠英的模范事迹，稿件在《河北日报》登载。1950年卢翠英被评为全国劳模，参加了国庆观礼和国庆招待会。1956年又总结了河北省劳动模范、西关上村党支部书记李堂的先进事迹，稿件在《河北日报》上发表，在全县起了很大作用。50年代机关干部的生活非常艰苦，但大家的革命热情都很高，领导经常带头下乡。1952年4月，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宋广宽，带领宣传部的马向凤、张文兴、白璧几个同志到山区下乡，调查研究，检查工作。从张坊、十渡进山，经蒲洼、宝水、霞云岭，最后，从河北回来，走了十多天，到了二十多个村，步行三百多里地。那时，同志间的关系都很密切。当时，魏志华与牛树文、曹长贵三个人工作上也有分工。牛树文负责农村宣传，曹长贵负责通讯报导，魏志华负责理论学习和部里的综合材料。但谁下乡做中心工作，别人就主动把他分管的工作抓起来，互相

配合，不分你我。

50年代的房山县委宣传部工作虽然非常艰苦，但部里全体同志工作起来都是毫无怨言，风雨无阻。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战胜困难，千方百计按时完成领导交给的工作任务。

# 一段不为常人所知的历史

章世铭

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良乡机场，原来是北京中国人民航空俱乐部，曾先后在国防体育上为中国创造了多项世界记录，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可能不多。

那是在 1957 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及其所属国防体育系统出于为中国空军培养后备力量的需要，在河北省良乡县黄辛庄西部兴建了中国人民航空俱乐部。1958 年良乡划归北京后，改称为北京中国人民航空俱乐部。航空俱乐部建有 2200 米标准长度的草坪飞机跑道，重点进行跳伞运动、航模运动、滑翔机运动等国防体育内容的训练和比赛活动。1963 年在航空俱乐部又成立了北京市 100 中学，专门从社会招收符合空军飞行员条件的青年，开设有初中班和高中班，把学习文化课和进行飞行员培训结合起来，先后有三届学生毕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培养了后备力量。1969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海军司令部和北京空军司令部三单位派出人员进行军管。1973 年，撤销北京中国人民航空俱乐部，正式移交给海军运输大队，修建了钢筋混凝土跑道，改为现在的良乡机场。

北京中国人民航空俱乐部在开展活动期间，为中国的国防体育运动曾创造了多项世界记录。

1959 年 9 月 13 日至 10 月 1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在北京新落成的工人体育场举行。在这届全国首次举行的运动会上，打破了男子 100 米蛙泳、女子小口径步枪、飞机跳伞和无线电遥控航空模型四项世界记录。其中无线电遥控航空模型世界新记录就是由北京中国人民航空俱乐部创造的。为了准备参加首届全运会，1959 年 5 月先在北京中国人民航空俱乐部举行了第一届全军运动会航空模型比赛。第一届全军运动会闭幕后，空军航空模型运动队与海军航空模型运动队联合组成解放军航空模型运动队，并在北京进行集训。9 月 13 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航空模型比赛在北京中国人民航空俱乐部拉开帷幕。9 月 27 日上午就在北京中国人民航空俱乐部的跑道上，解放军航空模型运动队代表王永熙、赵嘉祯在飞机发动机容量 5 毫升、总重 2.5 公斤以下

级别的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飞行爬升高度比赛中，以升高 1260 米的成绩打破了当时比利时运动员保持的世界记录。

新的世界记录创造后，王永熙、赵嘉祯与第一届全运会其他创造世界记录的健儿，作为体育界代表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十周年庆祝大会，并参加了国庆十周年庆祝国宴。国庆节后，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接见并且作为解放军文艺、体育界的代表受到贺龙元帅的接见；出席了文化部举办的庆祝建国十周年文艺演出会；出席了在台基厂举办的由共青团中央胡耀邦总书记主持的茶话会和文艺演出会。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闭幕式上接受了由周恩来总理授予的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此后，被国家体委授予国家运动健将称号。

1961 年 3 月 16 日至 28 日，在北京中国人民航空俱乐部举行的女子综合跳伞表演中，国家队女子跳伞运动员赵月英创造了 1500 米高度距靶心 0.365 米的世界记录。在 3000 米高度个人定点跳伞表演中，运动员李淑花、耿桂芬分别创造了距靶心 1.15 米和 2.207 米的世界新记录。

1963 年 7 月 21 日，在北京中国人民航空俱乐部举行的跳伞比赛中，国家队女子跳伞运动员崔秀英、耿桂芬、赵月英以平均距靶心 2.987 米的成绩，打破女子日间 1500 米高度集体定点跳伞的世界记录。

# 黄山店煤矿事故的抢救工作

罗玉源

1974年11月2日，房山县黄山店公社煤矿井下发生了一场崩水塌方事故。10名采煤工人刚下井不久，就被井下突如其来的透水塌方事故困在井下。

事故发生后，黄山店公社及时向县作了汇报。县革委会主任孙海同紧急通知我、张成基协同办公室有关同志一起赶到事故现场，组织人力、物力紧急抢救。同时为使抢救工作进行顺利，一面组织井下抢救，一面抢修好道路。由于抢救人员少，又缺少经验，为尽快抢出被埋人员，当即向京西矿务局求援。京西矿务局马上抽调得力人员和一名有经验的工程师，同时从房山矿、长沟峪矿抽出50余名有经验的抢救队伍赶到现场，立即深入井下，投入了抢救工作。

由于井下积水多，塌方面积大，抢救难度大，很难顺利进行。为此，就在现场召开了有县、公社、村、煤矿、抢救队各级领导参与的现场会。经研究，当场决定几项抢救措施：

一、由县革委会副主任罗玉源、张成基，黄山店公社副书记吕福英，黄山店煤矿一名副矿长等组成领导小组，负责全面的抢救工作。

二、为使抢救工作迅速有序的进行，由矿务局的抢救队员和本矿部分工人组成抢救突击队，分三班日夜不停轮流作业抢救。

三、组织好抢救工作中的后勤工作。由县供销社副主任郭凤鸣负责，组织县、公社两个供销社做好后勤物资的供应工作，保证物资供应和全体抢救人员生活的需要。同时就地搭起大棚，建起临时伙房，使抢救人员既能参加抢救战斗，又能吃好，休息好。

四、由县医院副院长王庆堂负责，组建由友谊医院大夫参加的医疗抢救队，负责医疗抢救工作。

五、为使抢救工作不受干扰，县和公社组织好工作组，深入到被困井下的矿工家里，做好家属工作，既作好安慰工作，又照顾好家属的生活，并劝阻家属不要到现场去吵闹，不要影响抢救工作。

从11月2日事故的发生到11月11日晚七点钟，抢救工作已经连续奋战



210 多个小时，但抢救工作仍不喊停，坚持继续抢救。正当我值班带人下井察看情况时，隐隐听得里面有敲打铁器的微小声音。矿务局的工程师也听到了声音，分析一定还有活着的人。抢救人员振奋起来立即从侧面挖洞靠近出事地点。果然，奇迹发生了，很快从井下抬出似黑泥棍似的三个人来。根据经验，把三个人的眼蒙上，立即送往县医院抢救。这就是被困井下 9 天的矿长王志和矿工许大振、贾金海三人，现场人员无不欢欣鼓舞。经过医护人员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三位同志不久就出院了。

事故抢救工作结束后，进行了现场总结，主要的体会是：

第一，市、县、公社三级领导重视。市领导韩伯平在抢救中曾到现场了解指导抢救工作，县革委会主任孙海同亲临现场指挥，革委会副主任罗玉源、张成基现场坐阵，始终坚持指挥抢救工作。县、公社、办公室坚守岗位，随时用电话或到现场上报下达报告情况，形成一个指挥有序的领导系统，从而有效的指挥现场的抢救工作。

第二，被困在井下的王志当时是黄山店公社的副主任，担任该矿的矿长，他对井下作业有经验，有很强的事业心，有顽强的战斗意志。事故发生后，王志从 2 米深的水中挣扎着爬起来时，就赶紧找其他人，经顽强拼搏，找到了矿工许大振、贾金海两名矿工。他们三人在井下，为了生存下去展开了艰苦斗争、喝井下水、吃随身所带的捲烟纸、皮带、棉花团、坑木皮……。总之，尽一切努力活下去，王志还给其他二人作思想工作，鼓励他们“坚持下去，争取胜利，要相信领导一定会千方百计的来抢救我们”。果然，在井下经过九天九夜的奋战，三名同志终于得救，在生死面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第三，安置工作细致。被困家属都非常理解党和政府的关怀。

这次事故虽已过去近 30 年，成为了历史，但当时抢救人员上下一致、团结战斗的革命精神，王志等三人与生死拼搏的顽强毅力以及这一事件的惨痛教训，至今使我难以忘怀。

# 镌刻房山石经的社会背景初探

吴梦麟 薛宝华

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山和寺南地穴中共藏石经一万四千余石，其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已为人们所知。有些国内外学者还进行过踏查、研究与考证，但因锢藏已逾千年，无法窥其全貌。1956年为纪念释迦牟尼诞辰二千五百年时，由中国佛教协会与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等有关部门合作，对这项大型文化遗产进行了全面的发掘、传拓和整理后才得到文物部门的重视和学术界的关注，已有不少研究论著问世。国务院还在1961年就将“房山石经”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正在努力争取早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就目前研究的状况看，在广度和深度上还显不足，一方面是新材料较少，另外拓片不易看到，影响了研究的发展。如在诸多研究中，对探讨刻经的社会背景、社会根源和静琬法师始刻的原因时往往引用一些过去熟知的文献和有关隋末唐初的几则题记材料入手，还多与一些离幽州地区较远的高僧相联系，如题记中提到的“末法”或“进入末法期”时就与信行法师（河南安阳邺地高僧）和“三阶教”相连，说到静琬法师刻经的动机时就认为他是受南岳慧思的影响，秉承其意而始刻石经的。但如何从北京地区，甚至房山云居寺周边地区具体情况出发，进行考察和分析研究则很少。为此，笔者平日多留意搜集有关材料，近年来令我们欣喜的是在云居寺附近出土的文物和在上世纪70年代文物调查中的一些新材料使我们从较模糊的苦思中理出一些头绪，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为此，促使我们从社会背景的角度进行探讨，或许对研究房山石经的镌刻有参考价值。

## 两方墓志中传递出来的信息

本世纪初，在北京房山区曹章村出土了隋代墓志两合，一曰《韩智墓志》，一曰《韩辅墓志》。

韩智，字子哲，燕国良乡县秤邑乡临治里人。约生于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537），卒于隋开皇九年（589），享年53岁。韩智曾祖父韩合，魏帝授中坚将军、洛阳太守。祖韩据，辟为主簿。父韩琬，抑版清河太守，出身于世宦之家。韩智本人也在大约十五岁时即学经典，二十岁遍览百籍，为官升至郡主簿。但到半百之年时，则身心大变，投入释教怀中，志文曰：“至年如命，归心释道，顿舍三毒，进十善，形六礼，意念一乘。聊披涅槃玄解文趣，暨听华严，义相遥览，和容淹慈，先他后己，慕阐无为于群生，愿扬太空于我我，志质未敷百六已尽，始年五十有三，薨于燕署之内”。

韩辅，字仲卿，燕国良乡人，约生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四年（546），卒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享年56岁。其高祖韩合为韩智曾祖，曾祖韩据，韩智祖，祖韩琬为韩智父。韩智与韩辅应为一家族人，并未出三辈，韩辅为韩智侄，晚一辈，亦出身于世宦之家。韩辅本人也“相传三政，并任司功”。他卒后，人谓曰：“来从无为来，早修无为路，言讫悟觉，忽然意解，更心易志，幕求大道，拾己珍物，劝导乡亲，敬造一切经并作经藏。常持五戒，日修六礼，奉香忏，除三毒，授口愿，归十善。真礼未周，刁风缠已。以仁寿元季岁次辛酉四月十八日卒于昌乐乡临治里之第宅”。志文后部虽有残，但“季及知命，意心一乘”等词句仍清晰可见。

以上两志中道出了几点共性：

- 1、两志出于一地，志主均为韩姓，并为叔侄，为同一家族。
- 2、二人均系世宦子弟，但晚年都归心佛教，意念（或意心）一乘。
- 3、二人年龄相差九岁，均丧于晚年。而二人同时生活在北朝至隋初这一时期。
- 4、二人均为官，经历相近。

从以上几点加以思考，使我们对北朝之东魏、北齐、北周和隋代期间的房山云居寺周边地区佛教信仰的客观情况有了较细了解，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 1、同一地区发现两合家族墓志，墓主皆为世宦和富贵之家的长者，且都具有知识和文化，属社会上层人士。但又归心佛道，力劝众乡亲信奉，反映在北朝与隋初时，佛教在此地区的传播已具规模，并有相当势力。正像《隋书——经籍志》载“开皇元年，高祖（隋文帝杨坚）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倍。”的情景一样，幽州地区信仰佛教的风气也很炽热。

2、两位墓主人所信奉的佛教思想都是一乘(又称一乘教,是大乘佛教的宗旨,它能导引众生臻于绝对觉悟的境地,归于唯一究极的传说,臻于究极的觉悟)。所信的经典是涅槃、是华严(涅槃为大乘佛教经典,有天竺沙门昙无、晋法显等译出。释道朗称其为:“发身之玄堂,正觉之实际,众经之渊镜,万流之宗极”。华严属大乘佛教主要经典,东晋佛陀跋陀罗等译)。可见,此地区在南北朝与隋时以大乘佛教为核心,主要经典也很流行。

3、韩辅志曰:“拾已珍物,劝导乡亲,敬造一切经并作经藏”,说明在隋文帝时此地区可能已有出资刻经的活动,并且还作为收藏,如若是,则可推测在静琬于石经山有计划刻经之前,已有先声了。

### 万佛堂孔水洞的刻经和摩崖造像

20世纪70年代,笔者曾参加了房山磁家务万佛堂孔水洞的田野调查,在洞内发现了北朝或隋代造像和刻经,这是北京地区的重要文物发现。

孔水洞是一处喀斯特自然溶洞,洞内有泉,其声隆隆,清澈见底,古人在洞口用砖石砌墩台,中劈券洞,券石上雕水兽与菩萨,为北朝或隋造像(说法不一)。龕下凹进壁上刻隋大业十年(614)题记的“涅槃经”和“添品法华经普门品第二十四”。一般水量较大时经文全部被浸入水中,因历经久远,洞内又潮湿,文字多有漫漶。经文后还有金大定年(1180)题记,说明孔水洞内有时无水,可以镌刻佛像和经文。孔水洞与“房山石经”同在房山一个小范围内,而所刻石经又与静琬法师始刻的石经相同,二者是否有内在联系?结合上述二志石反映的史实,我们初步认为万佛堂孔水洞与石经山上两处刻经,有可能均为静琬法师等人所为,只因万佛堂孔水洞内面积有限,又有泉水,不宜大规模刻经,而离石经山不远的石窝一带又盛产质优的房山“艾叶青”、“房山白”与洁白无暇的汉白玉,是刻经的最佳良材,导致最终选择了白带山(石经山)为刻经的主要地点,也从传统的摩崖刻经转为碑版式,成为世界上数量最丰富,镌刻最美,内容最丰富的佛教经典。

总之,集佛教刻经事业大成的“房山石经”是多种因素、多种条件促成的结晶。

### 几点认识

从上述两组材料中可以看出，在南北朝至隋代初期，房山石经山上始刻石经之前或同时，已有大乘佛教及其主要经典《涅槃经》、《法华经》的传播，并为一些民众所接受，并已具有一定规模，且有影响，在这种客观条件下，周武帝的灭佛行动，对此地区的信徒也会有影响，因此在仁寿元年的韩辅墓志中就有“敬造一切并作经藏”的记述，证明一些信徒也意识到灭佛的来临和预感，自发的开始镌刻经石。所以，当静琬发起刻经之时，就能得到当地信徒的响应与拥护，并积极采取行动，这种社会背景是极其重要的。

近年来学者们在研究中比较注意应用出土文物和田野调查的成果，“房山石经”内涵丰富，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究，今后的研究要扩展思路，在充分利用文献的基础上，还应设立课题，进行专题考察，注意有关文物遗存的保护，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较大变化和提

# 京剧《三不愿意》与良乡

赵思敬

1953年，辽宁戏曲研究院实验学校首次演出京剧《三不愿意》，受到各界好评。同年，这出戏又参加东北区第一届戏剧音乐舞蹈观摩演出大会，获剧本奖、集体表演奖。剧本于1954年由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全国有许多京剧团学习演出。

《三不愿意》剧情叙述明代良乡县城的崔华有两个妹妹，秀英和丽英。秀英早年与本县邓文焕订婚，崔华嫌邓家贫穷，逼令退婚。长工八儿同情文焕，暗助文焕告到县衙。知县传讯崔华、秀英。秀英由于怨恨其兄所为，已暗中私逃邓家。崔华无奈。只好带二妹丽英冒名上堂，并嘱咐丽英到堂只能说“不愿意”。邓家亦让文焕之弟文跃冒名出堂。堂上，机智的长工八儿，凭着能言善辩，利用知县沽名钓誉的思想，使他将秀英断嫁给文焕，将丽英断嫁给文跃，姐妹双嫁邓家。《三不愿意》原名为《绒花计》，是一出梆子戏。但《戏考》中只有两场，就是崔华教妹妹三个不愿意的一场及公堂一场。当时，东北戏曲学校的教师们并不知道《绒花计》是梆子



取材于良乡地区的京剧剧本《三不愿意》封面（赵思敬提供）

戏，便由两位教师拼凑成一个全剧的本子。经过研究，大家认为拼凑的部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没有《戏考》上的两场精彩。据专工青衣、花旦的著名京剧演员赵桐珊（1901-1966）先生说，他年轻时唱梆子戏也就唱两场，从没看到过全剧的本子。

为了改编好京剧《三不愿意》，编者决定最后两场戏尽可能地保留梆子戏

原本的优点，只根据需要添加一些情节。在人物方面，首先是重塑八儿的形象，尽可能使他像一个劳动人民，把他身上的低俗去掉。让人认识他的智慧和正义感。崔华在原剧中是个可笑的傻瓜，改编时加强了他的自私、傲慢与专横的一面，使人看了不仅觉得可笑，而且可恶。他见到官的态度是卑鄙奉迎，以钱媚势。杨知县在原剧中是个正面人物，用老生扮；梆子本中不是邓文焕的舅舅，而是一般的清官。这样便损害了喜剧的完整，而且八儿的作用也很难突出了。改编后的杨知县给人的印象是：知识分子出身，在宦海中历练不久，所以官不大，却爱钱，也受贿。但不老练，胆子也还小，并且有些愚蠢，喜欢图名。因为白白放弃了崔华送给他的二百两银子，利图不到，当然得图名了，所以非要让邓文焕给他送块匾不可。

改编后的京剧《三不愿意》有七场戏，全剧人物 13 人：崔华，良乡县财主；八儿，崔宅的长工；邓文焕，崔华的大妹夫；崔秀英，崔华的大妹妹；崔丽英，崔华的二妹妹；丫头，崔华的丫头；班头，良乡县班头；邓文跃，邓文焕的弟弟；杨知县，良乡县县令；青袍，四人。

京剧《三不愿意》的执笔人赵慧深（1914-1967），女，四川宜宾人，曾任旅大市文协艺委会副主任，东北戏曲学校校长，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部副主任等职。作品除《三不愿意》外，还有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蜘蛛与麻雀》、《如此北平》等。

京剧《三不愿意》从改编至今，已有 51 年，这个剧目仍活跃在舞台上，可见群众对全剧是认可赞扬的。

# 解放前房良地区的“驼户”

张广明

北京地区风行养骆驼，以清末民初最盛。京西石景山、门头沟、房山一带，有很多养骆驼的“驼户”。他们几代人都是以此为生。

房山地区养骆驼的多集中在陈家台、佛子庄、河北、坨里、良乡等地。据当地人讲，陈家台村有一半以上的农户都养骆驼。多的一户五、六只，少的也养两三只，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北京地区的骆驼最早是蒙古人带进来的。蒙古人向清政府进贡或来北京做买卖，都是把贡品或货物用骆驼驮到北京，卸完货后就把骆驼卖掉。房山盛产煤、灰、山木、干鲜果品。但交通不便，山路崎岖，驴车、马车上不去。而骆驼秉性温顺，吃苦耐劳，不易生病，路上可以几天不吃不喝。而且骆驼认路，再大的风沙也不会迷失方向，好养活，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

房山的“驼户”有两类：一类是专门搞运输的，给业主往城里送山货，当时称“高货”；另一类是自己作生意，买来当作交通工具的。前一种拉骆驼的只能挣些运费；后一种既挣运费又挣货钱，属跑买卖的，被称作骆驼主或掌柜的。由于骆驼走的慢，一般从山里到北京要走三天时间。第一天住良乡或长辛店的“骆驼店”，第二天到北京广安门外的煤市，或者广安门里的灰市。卖了货收了钱，第三天到家。陈家台、佛子庄一带养骆驼多的驼主忙不过来时，还要雇人拉骆驼。拉骆驼的有规矩，拉着货的骆驼人不能骑，空放回来人可以骑。但进村必须下来拉着走。

外边大的“驼户”也有到房山一带驮脚贩货的。据说京西衙门口村有位陈二先生，他会瞧病，曾给京城礼王府家人瞧好一病，王爷给他买了好多骆驼，他们家就用骆驼专门从周口店、长沟峪一带给礼王府家驮煤。一只骆驼能驮三、四百斤，一“把”骆驼（五只或六只）能驮一吨煤。打头的骆驼背上插一面三角形的小黄旗，上面有龙形的图样，表示是给皇家做工的。当时城里的马路不宽，交通紊乱，但陈二先生的驼队，可以畅通无阻，那时从京西到城里，一路上时常可以见到高大的骆驼昂首阔步，悠然自得，叮叮当地漫步在大街上，



也称北方民间一景。

拉骆驼做生意主要在春、秋、冬三季，其中以冬天最忙。从夏至开始，天气一天天热起来，骆驼开始掉毛，这个季节骆驼不服夏，容易生病，必须到口外去歇夏，养膘。到白露节再拉回来干活。所以夏天是看不到成群骆驼的。

自从有了马车、骡车，修了公路、铁路以后，骆驼就逐渐被淘汰了。解放以后，骆驼不能进城了，以骆驼为主的运输也停止了。

1958年以后大牲口都入了社，就更没有养骆驼的了。房山陈家台佛子庄一带的个别的单只骆驼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全部消失了。

# 追忆四十多年前采写《背篓商店》的经过

郭仲义

北京市管辖地区三面环山，约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地区是山地，所以有“北倚山险”之说。在深山中，分散着许许多多自然村，居住着千家万户一代传一代的农民。他们按着“靠山吃山”的生活传统，过着既封闭又困苦的日子。在四十多年前，山区还没有修筑通畅的公路，农民依旧走着祖祖辈辈用双脚踩出来的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要去一趟乡镇或县城，要爬山越岭，早出晚归需要一天的时间才能回家。所以农民进出封闭的深山是个大难题。

北京解放后，各区县相继组建了组织商品流通的供销合作社。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按商业政策规定：山区的商品收购和物资供应，统一由各县供销社负责经营。农民要卖出辛勤劳动收获的各种山货，想购买农药化肥和生活必需品，都要翻山越岭去趟供销社，那时没有第二条商品购销渠道。各区县供销社为支援生产建设和方便农民生活，虽然设立了许多商业购销网点，但是又不可能村村都设商业点。为了让农民少爬山走路，为了让农民节省出时间从事生产劳动，当时各县派出了许多送货下乡上山的货郎担，这种流动服务方式很受农民欢迎。但许多供销社往往是偶尔为之，不能长年累月地坚持下来。而房山县黄山店供销社的几位营业员，却能常年坚持背篓上山送货和收购各种山货。不论盛夏酷暑，不论严寒的冬天，他们都能坚持着这种背篓上山送方便的购销营业方式。

我那时是《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的新闻记者。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激励我走访黄山店供销社的主要原因。

从我首次报道黄山店供销社送货上山的新闻，到走访黄山店写成《背篓商店》的通讯报道，大约经历了三年的时间。1962年初，在北京市商业先进工作代表会上，我首次结识了黄山店供销社负责人王砚香。利用两个晚上的走访长谈，王砚香向我介绍了山区商业工作的特点。他拿出一个小笔记本，历数了过去的一年中背篓上山送货的许多故事。

王砚香说：“去年春天短雨，山坡地里的土干得没有一点湿气，社员一年

吃的菜都没有种上。一天晚间，忽然下起雨来，淅淅沥沥直到半夜。久旱逢甘雨，我立刻想起明天社员们定要展开一场春播大战，可是店里还没有春种的菜籽，天一亮，准有人来买菜籽”。王砚香停顿了一会接着说：“种地不能误农时啊！我们不能让社员买不到急需的菜籽。想到这里，我立刻起床穿衣，披上雨衣，找了一条麻袋，冒雨向县种子站跑去，这时正是夜里两点钟。雨中的深夜，山路难辨，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急奔，用了两个钟头到了种子站。站里的保管员急忙给我装上九十斤菜籽，我背上就匆匆忙忙往回奔。这时天亮了，雨也停了，土地散发出清新的气味。这一天，我背回来的菜籽都被社员买去种到地里去了，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王砚香说，黄山店供应区中有五百多户社员，分居在二十多里内的四十多个山坡上和山沟里。在这一年中，他有二百四十八天走出店门上山服务。一件件在平凡劳动中形成的感人故事，激励着我写出一篇题为《二百四十八天》的通讯报道，刊登于1962年1月21日出版的《北京晚报》上。这篇报道刊出后，我先后收到几十封读者来信，纷纷赞扬王砚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读者的来信促使我应该走访黄山店，跟随上山送货，听取农民意见，深入实际采写亲眼目睹的实况。

办报纸离不开记者，我的采访任务接连不断，抽不出空余时间到深山里去。转眼到了1964年初夏，这正是山区农民的大忙季节。我乘车先到了房山县周口店，然后再沿着山路步行，碰到了乡民就问路，最后走进了在一个山坡下的黄山店供销社。王砚香见到我突然来访，惊讶地问：“您怎么来了？”我告诉他，我要在这里住几天，跟他上山送货，也想听听社员们的意见，还想拍些山里的新闻照片。他说：“好啊！现在山坡都绿了，各种树上都挂上了青果，社员们正忙着呢！山里风景很美，跟城里可是大不一样”。当天晚上，我和商店里的五六个营业员开了个座谈会，听他们介绍黄山店地区的情况，社员们分散居住的原因和生活特点。

第二天，我背上照相机便跟着王砚香和他的背篓上山了。背篓里装着一些常见的日用百货和火柴、食盐之类的商品，大约有几十斤重，可我看不出他有沉重之感。他脚踏碎石山路，爬过一坡又一坡，转了几个自然村。有的社员把晒干的药材卖给他，有的买香皂和毛巾。有的告诉王砚香：“下回你背些花布来，要给小孩做衣裳”。在走向长流水村的山路上，一群正在地里干活的姑娘呼喊“背篓商店来了”，纷纷跑过来把王砚香拦在地头上。你挑他选，买针买线买香粉，翠绿的山野地里一时笑语喧哗。我乘机拍摄了多张现场照片，并

顺便问姑娘们：“背篓送货，你们觉得方便吗？”姑娘们齐声赞扬：方便，方便，真方便！我又问：“你们想买的东西都能送到吗？”有人回答说：“商店里的东西不可能全搬到山上，可是我们想买什么，只有先向王砚香说一声，他下回就能送什么！”

我没有听到不满意的意见，又跟着王砚香爬了几道山坡，来到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自然村。只见家家闭户，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几只鸡在院里悠闲地觅食。王砚香说：“现在社员们谁也闲不住，都上山干活去了，他们想卖什么和想买什么我都知道。”说着，王砚香便伸手推开一户社员的家门。屋里见不到主人，只见小饭桌上放着十多个鸡蛋。王砚香收起鸡蛋称了称重量，又从背篓里称出相等价值的食盐，把盐放到小桌上的一个盆里，然后回身关上房门，一笔鸡蛋换食盐的商品交易就这样完成了。王砚香说：“这种买卖双方不见面的送货换货方式，必须让社员信得过你，他要卖什么和买什么都会事先告诉我，我按约送到就成了。”我看到这一情景，心中感到十分惊奇，几千年前古代的初级商品交换方式，在新社会中人与人的相互信任的关系中再现了。在几天的采访中，我看到和听到很多“背篓商店”的故事，这是最能使我心灵激动的故事之一。

回到报社后，我写出了长篇通讯《背篓商店》，以整版篇幅刊登在1964年6月18日的《北京晚报》上，并刊出王砚香送货上山的现场照片。《中国青年报》在1964年7月4日刊出了我写的散文《背篓》，南方《羊城晚报》也转载了相关报道。这些报道影响较广，报社决定以宣传报道形式推广商业部门要支援生产方便群众的经验，让我再写了《背篓上山送方便》的长篇通讯，刊登在1964年9月5日的《北京日报》的头版上，并配发社论《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些宣传报道为黄山店供销社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打下了新闻舆论基础。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谢添到报社向我了解黄山店的地形山貌和背篓上山的故事细节，拍成了以黄山店供销社为原型的电影故事片《红色背篓》。电影在全国放映后，为宣传黄山店供销社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到1965年，北京市供销社领导人杜逢明带队到基层社蹲点，总结黄山店供销社的经营管理方式，推广交流他们的经验。1965年6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向全市各区县党委及财贸系统各党支部发出了《关于号召学习“背篓商店”的通知》，号召有关部门都要时刻关心群众生活，千方百计满足群众的需要。

# 房山旅游文化节标志的设计

李瑞祥

1995年5月18日，我区在房山体育场举行首届房山区旅游文化节开幕式。会场主席台中央悬挂着由我设计的旅游文化节标志，即节徽。有关文化节的宣传画册、车证、入场券、邮政纪念封等，都醒目地印着节徽。会场上停放着五辆彩车，其中宣传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彩车，也是由我设计，并带着美术教师、美工、学生和木工等十多人，在部队的配合下制作的。这辆彩车4月23日曾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庆祝北京建城3040年活动。

当时北京兄弟区县早就以盛产的西瓜、啤酒等物产办节，或以冰灯等旅游项目办节。房山区确定以旅游文化办节，定位好，确实后来居上。开始区里为节徽和宣传口号向社会公开征稿，宣传口号的应征信纷至沓来，但节徽的应征稿却较少，且没有专业水平的稿件出现。于是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段汝连出面，召开了一个动员会，通知区内一些知名的美术界人士参加，我也去了。

回来后，除去白天的繁忙工作外，每天晚上直至深夜，我都在思考和翻阅设计资料。几乎有二十多天，我睡觉总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一旦脑子里有个什么想法划过，立即开灯下床拿笔记下来。

标志设计不仅需要绘画基础，尤其需要图案基础和美术字基础，还需要从事任何艺术活动都必须的文化修养。一个好的标志设计应该具备四个方面的特征：一要“美观”，就是好看、漂亮，赏心悦目。二要“准确”，是指定位准，表达诉求到位，不产生歧义。三要“简洁”，这是近几十年来世界标志设计的发展趋势，是标志自身功能的需要。四要“巧妙”，即要求标志中至少有一处亮点，或一形多义，或一笔多用。

标志设计的过程就是不断寻找最佳方案的过程，正如清末民初的王国维形容做学问的三境界：第一阶段，“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阶段，“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阶段，“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设计的房山区旅游文化节标志，借鉴了专业人士的设计元素，整体用龙

形来表现我区是龙的故乡；龙背上的翅采用城墙上的城堞形，暗喻了房山西周燕都遗址把北京建城史前推到 3040 年前。旅游文化关键在历史文化支撑，所以我把龙形设计成行草书体的“文”字，同时折弯成山形，表示房山，巧妙地一形多用，既是龙，又是文化，还是房山。整个标志采用我国古代青铜器和玉佩的纹饰风格。房山古属幽燕，历史上幽燕英雄豪侠多慷慨高歌之风，因此线条采用硬直线，辅以外弯角曲线，使图案既有力度感又不失优美。定稿后，用西德产朱红色和金色不干胶贴，平粘到白卡纸上，再用可擦彩笔把纹样准确画到不干胶贴上，然后用刻刀一丝不苟地剔刻出节徽。



房山旅游文化节节徽

有一件事需要说明，1987 年 9 月房山电视台首播我设计的第一代台标，1994 年底石花洞采用我设计的洞标，以及 1995 年旅游文化节采用的这个节徽，我都是只投一个稿，为什么呢？因为设计者心里清楚自己哪个方案最好，随时就删除了不理想的方案。如果把多个方案一起交上去，实际是设计者还没找到最佳方案，自己也没有信心的表现。

有一天区委宣传部王晓芝部长和三位副部长一起召见我，因为不但旅游文化节标志选中了我的方案，西周燕都遗址彩车设计方案也中选准备制作。按照领导要求，节徽要加进汉字和英文，我又从晚上 6 点开始手绘标准墨稿，一直画到第二天早晨 5 点多才完成。为什么我要夜里画并且画这么长时间呢？因为当时电脑制图尚未普及，标准墨稿是作为各种印刷品照相制版依据的原图，画面上不允许有一丝毛茬，线条必须平整光滑规矩。所以我利用夜深人静，便于精力高度集中。台灯换上 60 瓦灯泡，手要洗净，桌要擦净，纸要掸去浮尘，

并在桌上压实，才能开始画。标志上要加进共 11 个汉字，4 个英文单词共 31 个字母，统一安排进外围 360 度圆环里。7 个汉字按略小于半圆，量角等分作格加字距；英文占下半个圆周，单词之间留空要略大，字母之间距离要小，由于 31 个字母中有两个单笔划字母“ I ”，字体所占空间要小于正常字母，因此计算安排颇费时间。这样各种印刷品包括国家各大报上的旅游文化节广告，就不需再修饰，直接用我手绘墨稿制版即可。后来王晓芝部长又带我去宾馆录相，在房山电视新闻中解释了节徽的含义。

# 房山运煤高线始末（上）

潘惠楼

高线，又称缆车、空中铁路，是一种高空运输工具。房山运煤高线，是我国第一条以机械为动力的高空运输铁路路线，在房山的经济建设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做为机械运输工具，房山高线在北京采煤史上亦有其重要地位。

## 一、修建缘起

房山高线是因采煤而兴、因运煤而建的。房山采煤“发轫于辽金之前”，至晚清时已有大小煤窑数百座。但房山之煤，多蕴藏在山区，储量虽丰而运出不易。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朝廷借比利时款项修筑卢保铁路（卢沟桥至保定）、从琉璃河站辟出支线通往周口店运取灰、煤，后又从良乡站辟出支线通往坨里运煤，使房山产煤得以通过火车运出，促进了房山煤业的开发。可这两条铁路支线也只修到了房山地区平原与山区的交界处。限于当时的资金、技术和条件，再往山里修筑铁路实为困难。所以，房山产煤仍需大量人力、畜力运至周口店和坨里两地的火车站，才能大量外销。人力、畜力运煤，负载量小，从山区把煤送到火车站，有时还不够沿途的人吃畜喂，入不敷出。更何况房山的矿场煤窑多在山区，近者距火车站一二十里，远者可达百里之遥。冬天大雪封山，夏季山洪暴发，交通经常中断。而有些矿场煤窑也根本没有道路。尤其是房山产煤量最大的河套沟，大石河从百花山奔流而下，九曲十八弯，河上的几十座桥梁到更季均需拆除，以防洪水将桥上木材冲走。商旅往来，或涉水而行，或盘桓山路。徒手尚且困难，负重运输更为艰难。由于运输工具和道路限制，阻碍了房山煤炭的大量输出和销售，直接影响了房山煤炭的开发利用。周口店和坨里两条铁路站台的火车也需经常等煤外运。而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民族工业的兴起，煤炭越来越供不应求。房山距京、津两座大城市较近，有卢汉铁路纵贯县境南北，有琉璃河至周口店、良乡至坨里两条铁路支线伸入县境腹地大房山南北麓，煤炭有着广阔的市场。



只要将煤运出山区，即可装火车东至天津港口，北入繁华京师，南下江淮河汉，皆可获利。加之房山煤炭火力强、质量优，是民用和工业需用的极好燃料，吸引了许多富豪商贾在房山投资煤炭运输业，于是出现了在房山山区修建运煤高线铁路的主张。

光绪三十二年，良乡煤炭运输业主刘玘瞻会同房山的部分窑户与天津商会联系，由天津商会总办王竹林出面，联合天津集胜运盐公司经理陈梓臣与盐商陈秉章、李子赫等，开始在天津商人中进行修建房山运煤高线的游说鼓动。王竹林以天津商会名义，向当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禀递了在房山修建运煤高线、建立运煤高线公司的报告。此时清政府实行“盐引”政策，改官办盐业为逐步自由经营，加大了课税数额，增多了课税项目，从而减少了天津盐商的生财之道，致使许多盐商纷纷响应王竹林等修建高线的主张，以辟新的财源，从经营盐业转而投资高线运煤业。

恰逢其时，清政府面对晚清日益兴起的人民革命运动，也采取了拉拢资产阶级的策略，鼓励民族资本兴办实业。光绪三十三年上的上谕中就说：“凡有能力办农工商矿，或独立经营，或集合公司，其确有成效者，即从优奖励。果有一厂二局，所用资本逾千万，所用工人数千名者，尤当破格优奖，即爵赏亦所不惜”。农工商部还具体规定了按照“个人资本之大小，所用工人之多寡”，给予不同级别爵赏。“资本在二千万元以上者，特赏一等子爵”，资本在七百万元以上者，“特赏三品卿”。资本在十万元以上不足三十万元者，“奏请五品衔”。这种奖励实业的作法提高了民族资本家的政治地位，使其有权与相当级别的官员平起平坐，因而大大刺激了更多的人把资本投入到兴办实业之中。即赚钱又做官、名利双收，促使了天津商会鼓动资本家积极投入了在房山修建运煤高线的行动。

然而，高线乃以机械为动力的运煤工具。究竟如何运输，投资多少，不要说没有见过，很多投资者还是刚刚听说。王竹林将报告请示直隶总督府后，袁世凯也对修建技术、资金来源等提出了疑问，并再三提出了有无外国人插手和如何解决高线运输与当地民众的利益矛盾等问题。经王竹林等再三禀请，说明情况，并通过袁世凯幕僚阮忠极等多方斡旋，袁世凯终至批准了房山运煤高线的修建。于是王竹林以天津商会名义，以直隶、河南两省六十三县盐业专卖许可权做抵押，联合天津盐商，向驻在天津的德华、道胜、汇理等外国银行借款三百万两白银，成立了“高线铁路公司”，于光绪三十三年开始了在房山修建运煤高线的工程。

## 二、高线线路

房山运煤高线的线路，原设计构想为两条。第一条，起于良乡到坨里铁路的终点站坨里火车站台，沿大石河河谷而上，直达大安山，总长 78 华里，装运沿线矿窑及大安山产煤。第二条起于第一条线路的中间红煤厂站附近，沿南窖沟入猫耳山北麓，再向西绕过猫耳山呈弧形，连接琉璃河至周口店铁路的终点周口店火车站台，以装运猫耳山四周及南窖、长沟峪一带产煤。两线路呈 Y 型。第一条线路，空车由坨里火车站入山，重车出山。第二条线路，空车由坨里火车站入山，中途装煤后即可前行运往周口店火车站，又可中途折回将煤运往坨里火车站；反之从周口店发空车，中途装煤后即可直达坨里火车站，也可装煤后中途折返回周口店。这两条线路的设计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经济合理的。尤其是第二条线路，两站起点连接两条铁路的终点站台，把高线同两条铁路线连接在一起相通，即使高线一段出现故障，另一段仍可正常行驶运输，考虑十分周到。

然而，良好的主观愿望并非都能够成为事实。房山运煤高线从光绪三十三年修筑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 60 年代运营结束，只是修筑了预想线路中的部分线路，却形成了三条运营线。

第一条线谓之坨红线。该线起自坨里火车站台，沿大石河南部产煤山区逶迤而行，经口头村、万佛堂村、半壁店村、黄土坡村、南车营村、杏园村、口儿村、英水村、佛子庄村、至红煤厂村止。原计划在红煤厂跨大石河继续往山里修至大安山地区，因缺少蒸汽机未果，只好到红煤厂告终，实际长度 34 华里。全线于宣统二年初（1910）竣工并开始运营。

第二条线谓之坨清线。该线是在坨红线基础上，修订原设计线路改建形成的。坨红线运营后，终点站红煤厂并不产煤，所运之煤要靠畜力、人力从大安山、南窖、霞云岭等地运来。高线公司只是在红煤厂坐地收购。收购煤量有限，成本也高，而高线为机械动力运输，开车后运量很大，所收的煤根本不够高线运量，得不偿失，致使高线公司不得不另想办法。于是高线公司又从坨红线路上的前山站台，辟出一条支线，往南经英水村、西安村、北窖村、南窖村、安子村，至清港沟止。因这条线路的煤炭运至前山站后并入坨红线到坨里火车站台，因此被称为坨清线。此线路所经过之处煤窑众多，而且线路、站台距煤窑较近，有些煤窑把煤采出后直接送入高线装车外运。这样高线公司就废弃坨红线转而专门经营坨清线。坨清线总长 52 华里，其中前山站台至清港沟 32 华

里，前山站台至坨里火车站台 20 华里。坨清线于宣统三年五月竣工并投入运营，初时为每日一班运煤，后改为两班运煤，日夜开车。在正常情况下，每班可运煤 500 车，每车装煤 0.5 吨，每天可运出煤炭 500 吨，使高线公司利益大增。由于坨清线利润较大，曾引起许多官僚政客及地方豪绅争夺路权，千方百计插手高线，所以此路线路权也几易其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坨清线多次在战斗中被毁停运。由于坨清线在房山历史上运营时间最长，影响最大，人们习惯上把坨清线称之为房山高线。

第三条线谓之周长线。此线路位于大房山南麓，起于周口店火车站台，终于长沟峪的横门，全长 14 华里。周长线所经线路虽是天津商会预想高线线路中的部分线段，但并非天津商会所修。而是北京和房山等地的乡绅，受坨清线运煤获利的启发，于 1919 年集资修筑的。周长线修筑时，正值安福系军阀支持的大丰煤矿修筑周口店至车厂村轻便铁路运煤。周长线明知大丰煤矿轻便路于已有碍，会与自己争利，但又知大丰煤矿有安福军阀为后盾，奈何不得。于是采取了与坨清高线联合的手段，妄图借坨清高线的势力与技术修建成周长线。而坨清线正欲夺取周长线路权，见时机到来，遂通过北洋保公司承揽修筑权，以敏锐手腕将周长线路权攫取。后地方豪绅屡争路权终未夺回。周长线修筑时受大丰煤矿修轻便路影响，施工急迫，所用工料全然不如坨清线，所聘请的日本株式会社缆车公司技师技术不精，所以修造不甚得法，致使路线竣工后屡出事故。而且周长线运距较短，运费不可能收取太多，所以未能获利、连续赔累，运行后时间不长就被废弃。

房山运煤高线自上世纪 20 年代中期之后，能够保持运营的只有坨清线一条线路。

### 三、机器设备

高线做为机械运输工具，首创于荷兰，后欧洲许多国家仿效。至 19 世纪末，德国高线发展很快，设备尤佳。房山运煤高线初筑时，在我国及至东亚，还是首次。

高线的运输方式和铁路很相似，不同的是铁路建在地面，高线是架在空中的铁路。高线的线路由铁架支撑，凌空高悬，上挂斗车，依靠蒸汽动力牵引斗车在高线上运行。火车的蒸汽锅炉安设在车头上，高线的蒸汽锅炉则安设在站台上。高线的机器设备主要是铁架、线轨、斗车和锅炉。

### 1.铁架

铁架是高线的支撑物，根据线路下垂的程度按距离架设。一般两架之间不会超过 500 米，最近处两架距离只有 10 余米。铁架的高度随所处地形的高低起伏而定，尽量保持线路处于同一水平。最高的铁架为 145 米，低的铁架高度只有一米多。为了保持线路的平直，山高处铁架则矮，山凹处铁架则高。遇到山太高不易保持线路的基本平行时，还要开山劈岭，以使线路通过。开凿的山口，底宽必须保持 5 米才能通过斗车，有的山口深十余米，长可达几十米或上百米。房山高线在修建过程中曾开凿山口十余个，其中口头山、花岭山、荞麦山、新道沟等地，开凿山口的土石方量都很大。铁架的基部为正方形，下大上小，如同现在输电线路上的铁塔架杆。铁架由角铁铆焊连接而成，架顶部两端向两侧突出，托住高线做为线轨的大线。架顶部下端约 2 米处，有两个平台向两侧伸出，如同铁架上长了两个翅膀。这两个平台上安有滑轮，滑轮托住牵引斗车运动的小线，防止小线下垂并加油润滑。在较低的铁架上一般不设这两个平台。铁架上安有铁梯供人上下。

房山运煤高线支撑的铁架，计有 300 多座。另外线路在跨越沟涧时还架设铁桥 8 座。为了便于管理，还从起点站坨里开始，逐铁架按顺序编有号码，称为 1 号架、2 号架……，编到前山站台后的查儿村时已为 122 号架。铁架最高者为口头山 15 号架，算上架顶的铁框，高达 145 米。在石板坡、荞麦山等地的铁架，也有多座超过 140 米。有的铁架座落于陡坡之上，下临深涧，在架顶上望谷底，垂直高度可达数百米，令人目眩头眩。

### 2.线路

高线的线路共 4 根。上面平行两条粗线做为斗车轨道，称为大线。下面平行两条细线做为牵引线，称为小线。斗车轮子悬挂在一条大线上，由一条小线连接斗车牵引斗车前进。一条大线和一条小线走重车，另一条大线和一条小线走空车。两条牵引线运动方向相反，轻车与重车有来有往。

大线径粗 35 毫米，由钢丝拧缠而成，分为内外两部分。内为线芯，由 17 根圆钢丝拧成圆形，外圈由扁钢丝拧成圆形包住线芯。圆钢丝极富弹性，扁钢丝极耐摩擦。

小线的径粗 23 毫米，由上百条细钢丝绕在油棕绳上分股拧成，富有拉力。小线缠绕在站台内的铁轴上，铁轴直径 1.5 米，由蒸汽动力推动旋转。小线从铁轴两端伸出站台，一端连接重车，一端连接空车。当铁轴转动带动小线从轴两侧沿相反方向运行时，小线牵引空、重车分别出、入站台。

### 3.斗车

斗车是盛煤的工具，高约 1.5 米，有两个轮轴挂在大线上。轮轴随小线牵引斗车在大线上滚动前行。轮轴上悬有两条铁梁下垂、中部有连接小线装置，下部有两个铁套环，套住车斗。车斗里放入煤炭，每斗可盛煤 500 公斤。整个斗车如同一个倒置的问号。斗车自重 200 公斤。斗车与斗车之间的悬挂距离为 100 米，斗车的运行速度每分钟为 150 米。

### 4.锅炉

高线的动力仰靠锅炉蒸汽。锅炉结构形式分为立式和卧式两种，工作方式分为火管式和水管式。高线线路原计划从坨里修至大安山，因缺锅炉而修到中途作罢。坨清高线线路初建时安设 4 台锅炉。第一台为德国 1910 年出厂的卧式单筒锅炉，圆径 1.5 米，长 4.3 米，公能 24 平方米。第二台为德国 1910 年出厂的卧式单筒烟管锅炉，圆径 1 米，长 3.2 米，有烟管 33 根，锅驼机自动上水，公能 15 平方米。第三台为德国 1910 年造的卧式双筒锅炉，圆径 1.8 米，长 6 米，公能 55 平方米。此炉为高线功率最大之锅炉。第四台为德国 1911 年制造，蒸发量为每平方米 90 公斤，公能 5 平方米。这四台锅炉分别安装在万佛堂站台、坨里站台、南车营站台和北窖站台，其中北窖站台的锅炉最大。以后，又在南窖站台设立了锅炉。

高线的机器设备除铁架、线路、斗车和锅炉外，还有许多辅助设备。如电动机、电话、机床等等。

## 四、修建过程

房山高线的修建工程，在我国尚属首次。早在酝酿修建高线的动议时，股东们就深知工程之艰、技术之难。时天津商会总办王竹林为发展长芦盐务，兴办实业，在天津组织了北洋保商公司，并聘请了德国顾问。德国顾问鉴于房山山区岭壑纵横、运输不便的情况，建议王竹林成立高线运煤公司，并从德国请来了建筑工程师保尔进行线路设计和组织施工，订购了机器，从而解决了技术和设备的难题。王竹林肥水不外流，将高线修建工程整体承包给北洋保商公司，由北洋保商公司德籍顾问白里西领导，于光绪三十二年开始了修建。

### 1.线路选择

高线公司自房山的坨里镇开始，沿大石河河套沟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对沿途的村庄、房舍、坟墓、水道和地质等情况做了记录，绘制了图册，与线路所

经地区的民众多次进行洽谈磋商，也曾多次更改线路设计。如原计划需在杏园村附近选择一块平地做为站台，但这块平地恰是村中蔡姓人家坟茔，高线公司礼聘重金，蔡姓人家就是不卖。高线打算强买，蔡姓人家有一秀才请出头面人物与高线公司斡旋，致使高线不得不更改线路，重新购买蔡姓人家坟茔附近的另一处空地建起了前山站台。

为了线路安全和防止高线空中运输坠物伤人。高线对线路所经过的房舍宅院，悉数进行了搬迁，而户主不愿搬迁时，高线只好更改线路，尽量绕开村舍民宅。对与高线线路相交汇的主要道路，高线公司在交汇点的路面上架木棚进行防护。

## 2.运输机器设备

高线的机器设备大都采自德国，乃是天津商会以唐山煤矿名义，通过外国银行购买。机器设备材料均是先运到天津港口，再转乘火车运到房山的坨里火车站。以后就完全依靠人力、畜力进行搬运了。由于高线建在山区，如何把这些庞大沉重的机器设备运到施工地点并进行安装，曾让高线公司大伤脑筋。然而参加施工的高线工人们在困难面前没有却步，他们和高线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大胆设想，进行试验，土洋结合，创造了许多方法，保证了机器的运输和安装。当时在山区运输高线机器，其难度超过了在平原地区修建铁路。尤其是抬大线和运锅炉，曾引得万人观瞻，至今当地曾参加或目睹此事的人们，仍对此津津乐道，被誉为房山盛事。

大线从火车卸下，每盘长约千米，缠在 1.5 米高的木轴上，总重 10 余吨。要把大线运到勘测好的线路上，需把大线从木轴上放开，每人按 1 米的距离排开，扛起大线前进，犹如一条巨大的蜈蚣在山间蠕动，当地人谓之“抬懒龙”。为了步伐一致，还有人指挥呼喊劳动号子。喊号人手持旗子一面，站在山梁高处，抬线人呼应着号子，看着喊号人手中的旗帜摆动，齐心用力，尤其是往山上抬线或跨越河谷绝壁时，喊号人格外用力，号子也格外响亮。声震山谷，此呼彼应，回荡不绝。这号子也由喊号人随口编来，有时粗野，有时淫秽，有时饶有情趣，令人忍俊不禁；如“拉大线，扯大线，几百人；扯不断，谁要不使劲呀！谁就是大坏蛋”等等。

高线用的锅炉每台重约数吨，最小的圆径 1 米，长 1.8 米。大者圆径 1.8 米，长约 6 米。钢板厚度一般 10 毫米，外围壁管极怕磕碰。绑大杠人抬，抬不动，而且从火车站至安设锅炉地点要多次经过大石河。即使几十人将锅炉抬起来，爬山涉水，道路窄仄，也难于行走。最后高线工人们采取了“走旱船”

的方法，在锅炉下放上滚木，把锅炉绑上绳索，由人在前边拉，一步一挪地前进。上山时，以人力绞车在前边绞拽，周围人保护，防止锅炉翻倒一路上，窄处开道，遇水搭桥，披荆斩棘，腾挪向前。费时数月，才将锅炉运到目的地。每日运锅炉时，不但本地人围观相助，亦有不远百里前来观瞻“走旱船”者。看的人，一是想看锅炉是何样子，二是看“旱船”如何走法。

### 3.安装高线

安装高线的工作主要是立铁架、架线和拉线。

铁架从德国运来，都是散件，每根角铁上都编有号码；从火车卸下后，以人力或畜力按铁架的编号和角铁的号码运往各个架设地点，不能运错，否则不易组装。立架前要先打下地基。小铁架的地基一般以水泥整体浇铸。大铁架的地基有如一两间房的面积大小，整体浇铸用水泥太多，则在地基的根部四角砌铸水泥石墩。每个水泥墩一米见方，中间置入铁柱，在铁柱露出部分套入铁架四个角根部的角铁，使铁架与地面基础固定在一起，然后按铁架的号码顺序一根接一根往高处延伸。因当时铁螺丝很少，角铁的连接多使用拇指粗的铁铆钉。

立铁架时，工人们先燃起烘炉，把铆钉烧得通红，然后取出铆钉放入角铁的孔眼连接，用铁锤趁热砸扁。待铆钉冷却后，两根角铁就连在一起。这活茬很有传奇色彩，需要掌握技术和火候，火候不到，铆钉温度不够，则连接松动，需重新操作。严寒冬季，高山上，铁架旁，工人们燃起烘炉，拉动风箱，热汗直流。铆钉烧红后，掌钳师傅用火钳将铆钉夹出，往几十米高的铁架上一甩，但见铁架上的工人身子一探，手中的帽斗向空中一兜，正在空中的铆钉已落入帽斗之内，攥有湿布的另一只手抓起通红的铆钉，眨眼间准确地插入了角铁的孔眼，只听得空中一阵叮当锤声，两块角铁已然牢牢地铆焊在一起。确有“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诗词意境，令人叹为观止。当然，在几十米高铁架之上操此营生，也就难免出事故了。

高线的大线、小线运到目的地后，按架设要求放好，宛若一条长龙蜷卧在崇山峻岭。往铁架上固定时，工人们在铁架顶部安设滑轮，将高线垂吊起来，放入铁架顶端的线槽内。架上线后，两铁架之间的线路会因自重和斗车的重量而下垂。为了保持线路的平直，工人们在高线站台上挖有深井，井中吊有罐笼。罐笼上端连接大线，里面放入铁碇、石块等重物。当装进罐笼的重物超过空中高线的重量时，罐笼下沉，线路就被拉直。而当线路经过一段时间运行摩擦需要检修时，则将罐笼中的重物一点点搬出，罐笼就会逐渐上升，线路就会逐渐下垂，直至垂落地面。

高线的每盘大线，如长度不足两站之间距离时，需要接线。接线是高线工程中难度极大的技术活，非一般人能做、敢做。线接不实，高线断裂开，后果不堪设想。整个高线公司，能够接大线的人寥寥可数，能够接大线的人可以被高线公司提升为工匠。因旧时同行是冤家，技术垄断，非至亲朋友秘不示人，接大线时，只由工匠去做，由徒弟打伞伺候，其他人躲开。打伞，一是遮阳挡雨，二是防止他人偷看学走技术。接线的方法为，先把大线的断面锯平，伸入预先准备好的“扣不楞”内。“扣不楞”是外语译名，是个如同机梭形状的中间粗两头细的空芯铁管套筒，长约一尺五寸，两个细头比大线稍粗，可以一分为二，里面有丝扣可以拧紧咬合。接线时把两个大线的断面从一分为二的两个空管套筒的细端插入，把里面断面的钢丝撬松，再把分为两部分的“扣不楞”按丝扣拧严合二为一。然后顺“扣不楞”细端往里钉钢签，加粗“扣不楞”里面大线的断面，直到把“扣不楞”内部的空隙撑满为止。这样“扣不楞”里面的线胀粗，就不易从“扣不楞”脱出，两条线就通过，“扣不楞”连在一起。

## 五、组织机构

高线公司股东初期多为天津盐商，公司在房山的坨里设有办事处。股东通过代理人管理高线运营。股东通过董事会决定高线重大事项，一般不直接插手高线事务。

高线公司坨里办事处为高线运输业务机关，下管高线各站台及坨里机厂，其组织形式分工为：

### 1.高线机关

有 73 人。其中领导 1 人，主管全面工作。庶务 2 人，协助领导管理高线。文牍 2 人，处理高线文事、信函。机关下设五个处室。内材料处 3 人，有处长、科长、股长各 1 人。会计处 3 人，有处长、科长、股长各 1 人。车务处 5 人，有处长 1 人，电话员 2 人，司帐 2 人。工程处 4 人，有工程师 1 人，处长 1 人，马夫工人，翻译 1 人。警务处 46 人，有警卫 40 人，巡官 1 人，巡长 4 人，火夫 1 人。另外，在高线坨里机关，还设有茶役、花匠、杂役计 7 人。

### 2.高线立站台

高线坨清线设 9 个站台，分别为坨里、万佛堂、南车营、前山、后山、西安岭、北窖、南窖、清港。高线坨红线中，坨里至前山段线路与坨清线坨里至前山段是同一线路，自前山站往北至红煤厂站段与坨清线分开。其中前



山站至红煤厂站之间只设一站，为佛子庄站。这样两条线路共计设高线站台 11 个。在每个站台，至少需用 15 人，才能保证高线开车运转。站台工作人员分工是：站长 1 人，负责站台全面工作。工匠 1 人，负责站台技术工作。挤油 1 人，负责往机器、斗车、线路定期注油。车夫 6 至 8 人，负责斗车的进站、出站和装卸物品。电话 2 人，负责站台之间的线路联系通讯及维修。火夫 2 人，负责做饭、烧水烧锅炉等后勤工作。洗车 1 人，负责擦拭机器，清理斗车的污物和存煤。

由于各站台的机器设备不一样，有的站台还要增加人员。一是万佛堂站台锅炉较大，增加了烧火工 2 人、司炉 2 人。二是前山站台是中心站，洗车任务大，要在此修理电话，因此又增加洗车工 4 人，修电话工 1 人。三是高线日夜两班开运时，每站需增加车夫 6 至 8 人。四是在高线线路距地面较近地点，设有看道工，建有看道房，以防有人破坏线路或偷取煤炭。看道工可以全家人都居住在道房，生活用品由高线斗车运送。全家人住道房，可以日夜看护线路，节约人力，又可避免在荒山野岭中的孤单。五是高线的部分站台，设有巡线工，每天往返线路之间，清除影响线路畅通的杂物，如滚下来的石块，长高的树枝。巡线工还要检查线路有无破损，铁架是否完好。巡线工配有德国产的一尺长的单筒望远镜，在地面可对高空中的线路进行细致察看。六是高线警务处还经常增加警卫，驻守站台，以防不测。如前山站为中心站台，经常派驻护路队员。并多次在前山站台设立护路支队，有队员 12 人，多时曾达 50 至 60 人。这护路队和高线警务处一样，身着统一制服装束，配有长短枪支。既护高线，也是地方上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护路队员经常仗势欺压百姓，但在维护地方治安、防范土匪中也曾发挥作用。

如此算来，高线的 11 个站台，人员计可达 300 人上下。

### 3. 坨里机厂

高线在坨里设有机厂，负责修理机器、配置零件。机厂的工作人员为：旋工 1 人，打铁 3 人，木匠 4 人，修车 4 人，修理 5 人，杂工 8 人，司帐 2 人，烧火 1 人，司库 1 人，担水 1 人。再加上厂长、技师、临时雇工，机厂一般情况也有 40 人。

高线如果两班正常运转，将坨里机关及各站台、坨里机厂的工作人员都计算在内，通常可达 350~400 多人。高线公司坨里办事处，还曾在许多地方自办煤窑，雇用许多临时工在站台收煤、购煤，实际工作人员早已超过 400 多人。日本侵华期间，日军用高线深入山区，抢夺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物资，抗日军

民经常对高线予以破坏，高线不得不增加许多人员排除运输故障，机器维修量不断加大。仅坨里机厂的工作人员就从 40 人增加到 80 人，仍然不能完成修理任务。而每当修理大线时，高线公司都要雇佣很多临时工参加拉大线，这拉大线少则几十人，多则可上百人。

## 六、运营状况

房山运煤高线 1911 年 5 月正式开始运营，每日一班，开车 12 小时，由沿线路站台收购各煤窑产煤，运给设在坨里的煤栈和火车站台，然后发往京、津等地。当时以运购南窖一带产煤为大宗，北窖、前山一带产煤次之，其他站台收煤较少。高线计有斗车 520 辆，油车 3 辆，水车 4 辆。高线每 1.5 分钟挂二斗车，每斗车盛煤 500 公斤，运至坨里每斗车可得运费 5 角。如按当时米价计算，当合小米 19 斤左右。高线每日运量多者 600 斗车，少者 400 斗车，平均 500 斗车，可得银元 250 枚，可折小米 9500 斤。至 1912 年，高线工人技术日臻熟练，机器设备也经磨合润滑，高线遂改为两班日夜开运，而且在沿途投资开办煤窑，在坨里设立自办了销煤处，利益大增。

高线正式投入运营时，清廷将收归国有的高线划归盐务署负责经营。盐务署采取的是总包销制，聘请的是“北京煤炭大王”李寿臣为总包销。李寿臣是京西衙门口人，世代煤商，对京西矿厂煤窑的生产经营情况比较熟悉，在北京城开设大德生、厚德生等煤栈。清末民初，北京内外九城均有李寿臣的煤栈分号。李寿臣承包高线运煤后，组织同义公司，直接派人到房山高线线路所经过的附近煤窑收购煤炭，将煤炭用高线运到坨里后装火车，再运往自己在京、津经营的煤栈发售或从坨里火车站直接发往用户。同义公司负责高线的运营收入，高线只负责煤炭运输，实际上等于同义公司垄断收煤卖煤权。进入民国后，大中银行总经理孙鸿钧从国民政府盐务署中租赁、经营高线，也是通过李寿臣的同义公司购煤销煤，实行总包销制。

袁世凯担任民国大总统后，王竹林见高线私人租赁可获利，于是鼓动房山四十八村掀起阻路风潮，将高线路权争回。领得高线运营执照；在北京顺治门旧帘子胡同建立事务所，高线的运营方式基本无大变化。

1919 年，原袁世凯总统府宣传长王药生下野，欲走办实业的路子，被聘为高线公司总经理。王药生参加高线后，力图一展身手，一是取消了同义公司李寿臣把持的高线总包销制，改为“车轮制”。将高线的斗车按煤商运煤数预

订，每订一辆车交押金，另单收运费。二是按高线始建时的原计划，兴修周口店至长沟峪一段的高线线路，运销大房山南麓产煤。结果造成高线公司全面亏损。再加上高线人员中饱私囊，管理者胡乱支用款项，维修线路工作也不及时，终致高线工人开支发生困难，生产效率大为降低。线路上下，站台内外，差错迭出，斗车经常脱线下坠。两班运营只有 500 车，只及民初时一班运量。

1924 年，直奉军阀混战，交通阻塞，运输停顿。房山产煤运不出去，房山高线被迫停车，高线工人和矿厂煤窑工人纷纷失业。直隶军饷督办张英华委派周培恩将高线军事接管，张英华曾任吴佩孚的财政总长兼盐务署长，深知高线底蕴，准备以军事控制高线运营筹办军饷。直军失败后，周培恩溃退潜逃。直军和鲁系军阀组成联军，直鲁联军军阀张宗昌又遣耿文玲管理高线。1926 年 10 月，奉军入关，张作霖又派刘鸿基接收高线，办理运营。1928 年，北伐成功，蒋介石又派朝阳大学教授孔昭级管理高线。值此军阀混战的多事之秋，高线路权数易其手，造成多次停运。1925 年就曾全线停工月余。由于战乱频仍，高线开工不足，造成成本加大，煤炭也不能及时到位装运，致使高线入不敷出，经济上捉襟见肘，只好向银行借款度日。许多依靠高线外运煤炭的矿厂煤窑关闭，许多依靠高线煤炭销售为生计和用高线煤炭的工厂商号歇业许多向高线放债借款的钱庄银号纷纷前往坐索。至 1929 年，房山运煤高线终于亏损太多，支持不住，濒于倒闭。

1929 年，经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批准，由政府出面组织银行团清理房山高线债务，将高线从军管中收回。由钱晴峰充任银行团经理，聘请华北大会计谢霖参加，终使高线公司的股权债务得到清理。银行团插手高线，财大气粗，门路畅达，加之政局稍稳，房山运煤高线逐渐中兴，又开始了两班运输。虽然没有恢复到每天运煤千车的水平，但每日也可达五六百车。1931 年，北洋保商行经理王泽民，以其雄厚资金，将高线从银行团经营改为归属自己经营。王泽民担任高线公司经理，尹君茂、郭竹轩任事务员。王泽民大力投资房山煤业，在房山长沟峪开设机采兴宝煤矿。但由于高线从天津商会始建就缺少稳定的根基，运营后即多次争夺路权，缺少必要的后期资金投入，时开时停，没有长期的经营计划，所以北洋保商行经营高线后，也只是勉强维持。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房山运煤高线，日本人派野上辰之助对高线运煤实行军事管制。高线工人不堪压迫，纷纷逃亡。抗日军民多次攻打高线日军，破坏高线运输设备，致使高线经常停运。高线北段曾一度被抗日军民攻克，成为根据地一部分。日军控制的高线南段的前山站台至坨

里之间线路，也经常受到抗日军民的袭击，至 1945 年初，高线运输基本上中断。

1945 年，日本投降后，高线停运，无人负责。1946 年，由民国初年的前股东谢紫佩发起，又召集新股东，经营房山运煤高线，新股东会以高云鹏为董事长，原房山县县长张历萱为副董事长，任命孟继恒为经理，继续在坨里设机构承办高线运营。时高线北段已成为解放区，高线南段坨里站台一带为国民统治区，高线线路连系解放区与国统区之间，成为游击区。新股东会与国民党军队配合，准备假高线为运输线，向解放区进攻，掠夺解放区物资。由于高线的存在对解放区军民财产威胁较大，游击队遂进攻高线守敌，深入到距国统区坨里站台最近的万佛堂站台，将高线机器设备部分拆卸，藏到山区内坚壁，高线终于全部停顿，但站台、大线、铁架基本完好。

1949 年 5 月 21 日，人民企业平西煤矿公司成立，为了解决解放不久的北京和天津等地的烧煤问题，平西煤矿公司决定，利用房山运煤高线的基础和设施，修复房山坨里至前山，段的高线，在坨里成立了坨前高线办事处，具体负责修复高线事宜。工程自 1949 年 9 月开始，至 1950 年 6 月结束。线路从坨里火车站台至今房山煤矿西区井口，总长度 9998 米。中途设铁架 98 座，大线有接头 107 处，小线有接头 113 处。沿线设立了坨里站台、万佛堂站台、南车营站台、前山站台和房山矿井口站台计 5 个。新建高线交由房山煤矿所有管辖，由房山矿运销科负责运营，主要为房山矿的产煤运输销售服务，名称仍为房山高线。

1951 年，从石景山至房山矿的高压输电线路竣工，房山高线运煤动力由蒸汽锅炉改为电力驱动。从而高线工作人员锐减，高线工人的体力劳动强度也大为减轻。由平西煤矿公司发展起来的京西矿务局又修复了在解放战争时期被拆毁的良乡至坨里标准轨铁路 16.2 公里，从而使房山矿产煤出井口即可装入高线斗车运往坨里火车站，然后装火车外销。1952 年，房山矿开凿了位于磁家务的万佛堂平硐，将此平硐称为东矿区，将房山矿原井口称为西采区。1956 年，房山矿东西区井口在井下贯通。1956 年，北京矿务局又投资将良乡至坨里的标准轨铁路延长 6.29 公里至磁家务，并在磁家务建起火车站，建起房山矿装火车煤仓。使房山矿西区产煤可通过地下二十里长的巷道，直接运往东区，装火车外运。这样，由坨里至房山矿西区井口的运煤高线失去了运煤作用。1960 年 9 月 15 日，房山矿运煤高线停止运输。1962 年，房山矿将这条高线铁路拆卸。1965 年，煤炭工业部把房山煤矿运煤高线的大部分机器设备调拨

给山西晋城矿务局。至此，始修筑于清末 1907 年的房山运煤高线线路结束其历史使命。

## 七、国际纠纷

光绪三十三年（1907），天津商会总办王竹林多次稟请直隶总督袁世凯批办房山运煤高线，引起直隶省及所属房山、良乡、昌平、涿县、宛平等县的官员反对。王竹林投资三百万元修建高线，且聘外国人为技师，购买大批机器设备，如此浩大工程，必然会引起世人瞩目。树大招风，清廷派出巡察，但碍于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对其统管的天津商会未予深究。清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浙江绍兴人张弧出任天津长芦盐运使。在巡查盐务中发现，王竹林及天津盐商投资所办房山运煤高线款项，是以向外国驻天津银行抵押直隶、河南两省六十三县盐业专卖许可权借来。遂向朝廷启奏，指控王竹林等所办房山高线违背“盐引”政策，危害盐务权益。而此时，清政府正在颁布新政，开展铁路运输收归国有运动，见有人指控高线，也就以此为由将高线收归国有，致使王竹林等苦心经营的房山运煤高线成为竹篮打水一场空。

然高线修建款项是以天津商会为名、由天津盐商向外国银行所借，至 1911 年时，连本带利已滚到九百万元。外国银行向盐商催债日紧，除一户因借款不多，另行借债顶替还清外，其余盐商皆束手无策。高线刚投入运输即被收归国有，盐商们丝毫利润未得。修建高线款项以官准“盐引”许可权做押，朝廷将高线没收有据可查。盐商们有苦道不出，难辞其咎。外国银行明知盐商们以“盐引”做抵押违法，依然借款，实为为虎作伥，所形成债务问题，理应双方各自负担。但此时外国银行却仗倚强权，通过各自的驻华领事，竟以盐商无力偿还借款、高线收归国有为名，向清朝廷提出了代盐商赔还借款的要求，把天津盐商修建运煤高线款项的经济纠纷搞成了外交事件，华俄、道胜、德华，汇理等外国银行代表在俄、德、法三国领事带领下直接找长芦盐运使署要帐，清政府见事情闹大，唯恐得罪洋人，更怕洋人借机攫取高线。便由政府向大清银行借砵银七百万两，替各盐商悉数还清了借款，并将拖欠外国银行款项的王竹林等十家盐商的盐引专卖权撤消，改为官运。清政府向大清银行借款的条件也仍是“盐引”中的税收和官运售盐的余利作为抵押。至此，房山运煤高线修建款项的国际纠纷结束。清政府得到了房山高线，丧失了大笔“盐引”收入。天津商会及盐商负债累累，空忙一场。外国银行借债放债，坐收其利。



# 房山运煤高线始末（下）

潘惠楼

## 八、阻路风潮

早在高线测路之初及修建高线之动议提出阶段，提出修建高线的天津商会就与线路所经过的附近村庄和地方政权发了严重的利益纠纷。地方政府和民众认为，高线修成，将直接影响着以运煤为生计的民众利益，导致大批以运煤为业者和为运煤服务业者的失业。房山县河套沟附近 60 个村庄，联名上书房山县政府，提出拒修高线意见。周口店等山煤商、煤栈上书县政府提出，高线运煤不但会夺去房山数万运煤驮户生计，而且会夺去涿、良、房、宛等县大批驮户生计，影响房山商业发展及税收。房山知县鲍同祖也稟请直隶总督袁世凯，妥议条规，安置驮户，制定办法。一时间，掀起房山阻路风潮，在京、津两地沸沸扬扬，房山以运煤为生计的驮户，惴惴不安。袁世凯也批札王竹林等谨慎筹办。致使天津商会在房山修建运煤高线的好梦难圆，高线公司举步维艰，动辄得咎。在天津商会与房山民众多次交涉不成之后，王竹林采取了宣传鼓动、分化瓦解、行贿受贿、软硬兼施的手段，终使修筑高线成功。

一是在京津两地登报纸、发传单。广为宣传高线是现代文明建设，建后省人省力、提高效率，促进地方建设和开发，繁荣经济，不但不会夺人生计、而且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王竹林还让人编成修建高线十大好处，予以传唱，发放到高线线路附近村庄。

二是邀请高线线路附近村庄代表和地方政权代表谈判。将代表们请至天津和北京，给予丰厚待遇，日事歌饮，饱食鸦片，吃喝玩乐。致使代表们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再谈判时口气自然缓和。况且这些代表多是殷实人家和地方上的土豪劣绅，也并不以运煤为生计，自然也就容易答应要求。

三是假意采取让步措施。提出高线并非垄断商业，只是转运公司，线路所经过地区与矿场煤窑仍有一定距离，以煤为生计者得以继续从事煤窑与高线站台之间的运输，仍有生计道路。

四是支持地方公益事业。高线公司每年拨出银元两千两，为当地开办学校，为本地培养人才。首先建东庄子小学、接收河套沟附近村庄的子弟入学。

王竹林采取的措施首先在谈判代表中奏效，打消了谈判代表在接受王竹林贿赂后回去无法交待的想法，缓和了民愤。这些代表回去后也讲修建高线的好处，从而使地方民众终于答应了修建高线的主张。高线遂开始大规模修筑。但王竹林行贿代表的作法并非使所有代表上当，其中河套内东庄子村教书先生殷祖盘敢于仗义执言，挺身而出，又代表河套沟民众上告高线公司。但终因人孤力单，被高线公司买通官府，将殷祖盘打入死囚牢房，折磨而死。房山县民国十八年编撰县志，将殷祖盘做为乡贤载入书中。

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王竹林等终将高线修成，但规模已比原设想设计的线路短得多，所需资金告急，再续修无力，况缺少蒸汽机及设备，只得停修投入运营。由于此线路已非原设想的线路，建成的高线所经过的村庄也仅限于河套沟一带，对房山其他地区的驮运煤业无大影响。房山民众阻建高线的风潮随之缓和。

房山高线建成后，刚投入运营，即被朝廷收回。紧接着发生辛亥革命，高线归国民政府。1911年末，大中银行总经理孙鸿钧见高线有利可图，遂从国民政府盐务署中租赁经营，获巨额利润。1913年，王竹林发现高线由官办改为私人民办租赁后，千方百计想夺回，无奈大中银行资本雄厚，势力庞大。王竹林机关算尽，终不能得逞。于是想起昔日与自己一起集资修建高线的股东关系和曾代表地方阻建线又得过自己好处的旧交熟人，重新联系房山县河套沟的土豪乡绅，发动起河套沟村民，阻挡高线运输。恰逢此时，当地村民见高线运煤，肥水外流，十分眼馋。而当地以骡马驴驮运煤为业者，小本经营，辛苦异常。矿厂煤窑出井后，多爱与高线运输，双方一拍即合，蜂拥而起，遂与王竹林合为一股，再次掀起了以房山河套沟四十八村为首的阻路风潮，致使高线被迫停运。政府派人调查后，发现阻挡高线运输是因王竹林背后鼓动，大中银行遂提起诉讼，并将高线全路及机厂工人领至北京，住在前门外打磨厂大同旅馆内，照发工资，供给全部膳食，让高线和王竹林打官司。高线工人进驻北京后，王竹林见有机可乘，又利用老关系从天津盐务署雇来新工人到高线工作。因技术不熟，斗车经常出事，机器屡发生故障，王竹林被迫停止运营。由于高线修建过程中涉及人员较多，背景复杂，大中银行与王竹林这场官司旷日持久。经多次调解，双方都神疲力乏。直到1914年，才达成协议。由王竹林出银元三百万元，将高线赎回，自己经营。王竹林仍以天津盐商为股东，又吸收一部分在修建高线和争夺高线过程中卖力气、有



贡献者，组成了新的股东董事会。新续的股东有原在袁世凯批办高线中起重大作用的库伦(乌兰巴托)厅长阮忠极，有王竹林在天津商会时的旧部，时天津商会坐办刘悦臣，有高线所在地的房山县县长张历萱，等等。1917年，又有袁世凯总统府的宣传长王药生、总统府庶务长谢紫等加入股东，使得高线公司势力大增，后台更硬。王竹林从大中银行手中夺回高线后，房山河套沟48村的阻挡高线运输风潮，稍作平息。但由于房山运煤高线与河套沟一带民众运煤的利益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以后河套沟48村民众又多次发生阻路活动，当地民众与高线之间造成的纠纷始终没有停止过。

### 九、27村吃高线

房山运煤高线所经过的大石河河套沟一带，村民素以种地、采煤、运煤为生。高线以机械动力机器运煤，垄断了运煤业，致使许多运煤为业者失业，数万头驮运牲畜骡马与驴驼被变卖，为运煤牲畜提供服务的粮食户、饲草户、鞍鞯户关闭，以牲畜粪便为肥料的种地户土地也日趋瘠薄。1930年，河套沟一带遭受旱灾虫灾，粮食歉收，村民无以为计，于是河套沟高线附近27村，推出代表，与高线公司展开了说理斗争，要求高线公司从运煤利润中取出部分以救济灾民。然高线公司置灾民于水火不顾，唯利是图，一毛不拔，遂激起民众抗争。沿高线线路抢煤者有之，毁坏高线机器设备者有之。尽管高线加强巡逻人员，增设护路警卫，但高线在群山中迤逦数十里，灾民人熟地灵，昼伏夜出，使高线公司防不胜防。线路屡断，收入锐减，煤炭用户时有责难埋怨。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高线公司被迫答应了河套河27村提出的部分要求，忍痛在坨里站台和前山站台两处设立粥厂赈济灾民。高线公司为表示宽宏、仁义、慈善之怀，对赈济之事广为渲染，收买人心，致使除27村外，房山河套沟自坨里至大安山等地数十个村庄都有前来吃粥者。因粥厂用的是从外地运来的大米和小米合熬的“二溜子粥”，本地不产，故许多较殷实之家也有冒充饥民前来吃粥者。一时间，坨里站台粥厂和前山站台粥厂人头攒动，前呼后拥，摩肩接踵。由于人多粥少，这场赈灾闹剧约进行一个月的时间，粮食即告罄。其间舍粥日期也是断断续续，时开时停。很多远道而来的灾民闻讯后还未到粥厂，粥厂即已关闭了。

高线设粥厂赈灾本是灾民斗争结果，设粥厂赈灾的目的是高线为缓和与当地民众矛盾，收买人心，唯恐再次掀起阻挡高线运输风潮。同时，高线公司也可借机中饱私囊，向上多领款项，向下苛扣粮食。

27 村吃高线要求赈济，主要是河套河的东庄子、李各庄、河北、河南、北窖、陈家台、佛子庄等大石河沿岸村庄。而参加说理斗争，参加粥厂吃粥的灾民村庄范围则早已扩大到河套沟的五六十个村庄。

## 十、抗日军民攻打高线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房山。同年 8 月 20 日，日军占领了房山运煤高线坨里办事处大楼，并沿着高线继续向房山山区进攻。1938 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整个高线线路，并派日本人野上辰之助对高线实行了军事管理。利用高线运输设备，大肆掠夺房山丰富的煤炭资源，源源不断地把宝贵的煤炭运往山外。为了保住这条能源补给地，日军在线路的各个站台都派有重兵把守，建有碉堡炮楼。八路军挺进平西后，决定以高线为主要目标，教训敌人。高线正处于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前沿，也是敌人进攻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桥头堡，因此敌我双方，都把高线作为争夺的焦点。

1939 年 12 月，由平西抗日游击队改编成的八路军九团，打响了改编后的第一仗，攻打房山运煤高线南、北窑站台的战斗。南窑和北窑两个站台，是房山高线最北部的两个主要站台，也是房山高线运煤最多的两个站台。当时九团下设三个营，团部设在房山的长操村。布置一营打南窑站台，二营打增援敌人，三营打北窑站台。天还未亮，一营和三营就分别开赴到南、北窑。三营以两个连的兵力控制山头，以一个连担任主攻，在营长的带领下，首先得手，冲入站台内，炸毁了锅炉房，控制了日军援助的军车一辆，消灭了这车日军。由于日军大队增援，地形不利，敌我悬殊，二营撤出了战斗。日军援军到达北窑后，已控制北窑村的三营也撤出。攻打南窑的一营未能够攻下高线站台守敌，见敌援军到来，也撤出战斗。

这一仗，虽然没有将占领南、北窑两站台敌人全部消灭，但却炸毁了北窑站台的锅炉房，造成了房山运煤高线北段线路的瘫痪，给平西人民极大鼓舞。在这次战斗中，三营副营长在冲进北窑站台收缴敌人的电话机时，被敌人挂在电话机上的手榴弹炸伤，撤回后医治无效牺牲。

高线线路北段瘫痪后，日军集中兵力严加把守高线南段的坨里至前山站线路。抗日游击队也经常对高线线路进行夜袭，破坏交通。高线的工人们也配合八路军和游击队，以各种方式和日本侵略者及其在高线的伪军、汉奸展开斗争。工人们经常怠工、破坏机器或故意制造事故，使高线运转不灵或根本不能运转。

1943年冬天，日本侵略军实行扫荡封锁，房山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很多人外出逃荒，高线的工人们更加深了对侵略者的仇恨。一天，高线断了，几十个斗车从线路上掉了下来，造成整个高线线路停顿。日军管理人野上辰之助、日本经理三好、工程师华田商量一天也没办法，只好把高线工匠王德兴找来，让他带领工人们赶快将高线抢修。王德兴说，修高线必须把工人请回来，工人没粮食吃、干活没劲，高线没法修。野上只好答应工人要求发粮食，但野上很狡猾，口上答应，实际却不发。王德兴就带领工人们“磨洋工”，高线也始终修不好，野上被迫把粮食发给了工人。

在日本统治期间，“磨洋工”是高线工人们经常使用的罢工方法。这种方法使得敌人干瞪眼，干着急。高线的工人多是有技术的固定岗位，被日本侵略军逼急了，就破坏机器和设备，使敌人防不胜防。抗日战争期间，高线线路沿线，随处都可以看到摔坏的斗车。高线北段的前山站至南窑站之间虽经日军多次修复，却多次被抗日军民破坏，基本不能通车。高线南段的南山站至坨里之间，虽经日军严加管理，却也是差错百出，线路经常停运。

1945年7月，八路军与日本侵略军展开决战，七团在军分区司令员肖文玖、副政委李水清带领下，在房山地区对日军发动了强大攻势。从7月11至16日，相继攻克南窑、长操、安子、红煤厂等敌人据点。房山高线除坨里站台外，全部收复。据同年7月25日晋察冀《解放日报》头版报导：该矿区全部机器、钢铁为我缴获。毙伤敌伪50余人，生俘伪房山县保安联队第四中队长张泽新以下官兵73人，缴获平射炮1门，榴弹筒3个，长短枪88支，子弹2800余发及其它军用品。该报编者按说：“南窑、北窑、东安子、西安子等地是北平产煤盛地，规模之大，产量之大，仅次于门头沟矿区。”

## 十一、房山高线与房山煤业

房山采煤历史悠久。在民国之前，均为土法开采，手镐刨挖，人力背施，生产工具简陋、劳动效率低下。清末民初，高线建成投入运输后，房山煤炭通过高线运输，得以大量迅速地走向市场。加之房山之煤质好、火力旺，一时竟供不应求。市场的需要，便利的交通，房山迅速掀起煤炭开采高潮。得运输之便，房山河套一带的矿厂煤窑，很快富裕起来。尤其是大房山南北麓所产末煤，通过高线运输，其煤质遐迩京津，被誉为“房山高末”，煤价甚高。房山运煤高线以蒸汽机器为动力运煤，也使窑主们开阔了眼界，极欲想把机器动力应用于矿山采煤。

外地资本家见房山煤炭的巨额利润，也纷纷请求到房山高线附近开矿。一时在房山开矿者趋之若鹜，随之房山也出现了以机器为动力的近代矿井。

据民国十七年房山县志所载：“当时在高线线路附近，有大小矿窑 80 余家。”据农商部调查，仅三安子附近一带由高线枝头福字号运煤至坨里约 5 万吨。除长沟峪 12 万吨不计外，房山年产煤尚不下 57 万吨。煤炭销售占北京约 60%，其次销往天津和保定。民国初年，经高线运出的房山产煤在北京市场数量大增。尽管门头沟产煤距京城较近，然当时通兴煤窑公司停工，各小窑积水又排不出，致使门头沟许多小窑不能生产，北京市场主要依靠房山产煤。此情况直至门头沟中英煤矿于 1923 年投产之后，北京市场煤炭中房山之煤与门头沟之煤比例才逐渐改变。后由于房山高线经常发生阻路风潮，路权争端，造成停运，北京市场上的两地煤炭销售平分秋色，并逐步发展为以门头沟煤炭为主。

房山高线附近矿窑产煤多通过高线外运。高线收煤，由同义公司所属煤栈把持，收煤时，价格极力压低。据《劝业丛报》1920 年 10 月所发第 1 卷第 2 期所载：“上等之煤，山价每吨不过一元半，劣者仅七八角。业窑者勤动终岁，所获极微。而高线之煤，自坨里运至京津，售价几十倍于山价。故前数年间，同义煤栈年得纯益，时达三四十万。”但窑价再低，窑主也仍可获利，否则煤窑必会关闭，受剥削者只是窑工而已。

民国初期，受高线运煤影响，在线路附近开设的规模较大煤矿有：山西太谷人吴叔明于民国二年在北窑村开办的北窑窑业公司，占地 536 亩；四川华阳人孔伟虎于民国七年在晒石台村开办的伟业煤矿公司，矿区面积 1739 亩；房山县人余杰臣在民国八年于三安子村开办的三安矿，矿区面积 3544 亩；漏子矿，矿区面积 1365 亩 8 分 7 厘；湖南湘乡人董卓夫于民国九年在大安山寺上村开办煤矿，矿区面积 4869 亩；浙江人周延龄在大安山开办的鸡冠岩矿，矿区面积 5276 亩；浙江杭县人董■北在大安山开办的鸡冠岩老后槽矿，矿区面积 5192 亩。北京人任济安于民国十一年在安子村开办的东大矿，矿区面积 3492 亩。北京资本家金少伟与海军次长龙济光于民国十一年在杏园村开办的济伟煤矿；北京官僚王克敏与其侄王泽民在长沟峪开办的兴宝煤矿等等。在房山运煤高线沿途，众多未领矿照的土采煤窑密如蜂巢，比比皆是。众多的矿场煤窑的产量高低直接影响着高线的正常运转和经济收入，高线是否正常运营也直接影响着沿线矿场煤窑的煤炭产量，结成了利益上相互依靠的共同体。所以高线与矿场煤窑关系密切。各矿窑之间与高线的关系也明争暗斗，都愿意同高线进行路矿合

作，想利用高线挤跨同业。许多矿场煤窑为了运煤方便，与高线站长或收煤人员称兄道弟，拜把子认干亲，或通婚联姻。每年高线站长都会得到窑主的礼贿、尤其是坨里高线站台，掌管着分配斗车权力，被认为是高线公司的肥缺。

在房山运煤高线的运营史上，与高线关系最为密切的可以说是协中煤矿。从高线建立投入运营至 30 年代，房山高线的运煤以南北窖、三安子一带矿窑产煤为大宗。到 30 年代，房山运煤高线前山到清港段受战争影响一度被毁，虽几经修理，也时开时停，不能正常运转。时日本侵略军占领高线，只能开运前山至坨里线路，而此段线路中矿窑规模较大者就是协中煤矿。

协中煤矿前身为距高线南车营站台较近的位于杏园村的济伟煤矿，因煤质不好，又多在采空区，产煤并不多，至 1926 年被迫停产整顿。后招募以曹汝霖为首的股东 118 名，集资 15 万元，于 1929 年将井口改在距高线前山站台较近的杏园村黄院沟开凿。1931 年出煤，以人力、畜力将煤运至高线前山站台，销路颇佳。日本侵略军进攻华北时，协中煤矿经理刘宗涛南下四川，由曹汝霖的女婿刘家骥担任协中矿经理。日本人占领北京后，因曹妻子是日本人，曹在“五四”时就卖国亲日，故日本人对曹汝霖开办的产业未予接收。日军占领高线后，为解决自己的战略需要和协中矿的运煤问题，于 1940 年从房山运煤高线的前山站台，专门辟出一条长约 2 华里的支线，通往协中煤矿。协中矿采出之煤，出井口即可直接装入高线斗车通过高线运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房山从协中煤矿掠走的煤炭资源最多。1945 年，日本投降前夕，房山高线前站台至协中矿支线被日军拆毁。因协中矿股东曹汝霖等与日人关系密切，协中煤矿的大把头与高线前山站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协中矿的大把头还与前山站站长、前山站护路队长等人结成拜把兄弟，共同剥削矿工和高线工人，并且相互勾结，挤垮了高线前山站台附近的土采煤窑。在日本侵略房山期间，高线线路附近的矿厂煤窑因不满日本人侵略和压迫，纷纷被迫倒闭，大批矿工以及部分窑主逃亡，能够维持生产的矿窑十之不足二三。高线在日本的残酷统治下，工人们辛勤劳作苦不堪言，高线经常中断甚至瘫痪，能维持煤炭生产的矿窑也常常发生危机。在抗战胜利时，房山运煤高线线路附近，也只有协中煤矿在日本人支持下惨淡经营。

1945 年日本投降，房山矿区获得解放。当年底，人民政府将协中煤矿接收，由平西军区十一专署领导，并改名为新华煤矿。1946 年 5 月，该矿又由平西军区四分区民运部领导、改名为裕民煤矿。1946 年，更名为振兴煤矿。1949 年 5 月平西煤矿公司成立后，该矿划归平西煤矿公司所属。至 50 年代

初期，该矿所在地划为房山县管辖时，矿名又改为房山矿。平西煤矿公司成立后，着手房山高线的修复工作，到1950年6月，高线修复通车后，交由房山煤矿运销科运营，直至1962年，火车道修到房山矿之后，高线终结运煤使命并被拆除。但房山矿仍以拆除运煤高线的机器设备另修一条规格相同的长约2华里运矸石高线，至今仍在房山矿使用运转。

## 十二、支援建设

房山运煤高线是我国第一条以机械为动力的空中运输索道，它的修建和运行为我国培育出了第一代高线工人队伍，这批高线工人在我国以后的高线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房山运煤高线归划房山煤矿管辖，房山煤矿的高线工人曾对高线的运输做过许多重要的技术改革，其中有的改革项目填写了高线运输的科技空白。房山煤矿还多次派出人员和机械设备支援地方上的工农业生产建设，并到外省市帮助、指导修建高线。房山煤矿还利用运煤高线为有关单位和外省市培训了许多从事高线工作的工人。

### 1. 支援房山地区高线建设

1958年，房山矿派出高线工匠王德兴，帮助所在地河北乡政府在大石河上架铁索桥一座。此桥位于河北村东，是利用矿山的旧高线铁架和大线建成，桥长200米，桥两端和中间河道中各有铁架一座。河道中铁桥高约15米，有10根大线连接桥两端，其中6根横排，上铺木板为桥面。两侧各有两条大线缠上铁丝编成的网络做护栏。人行桥上，颤颤巍巍，但却解决了夏季大石河水泛滥时两岸交通问题，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称赞，被誉为“工农联盟桥”。1966年，通往河北乡政府的水泥桥落成。此铁索桥遂拆除。

1958年，房山矿为支援河北公社李各庄村的副业生产，为该村架设一条长400米的土高线，运输石板山的石板，提高工效720倍，使石板山上开采出的石板可从山顶顺高线直达村对面公路边销售。

1960年，房山矿高线工人采用木搭支架架设大线，为南窖公社车子矿架设一条长700米运煤。

1970年，房山矿高线工人朱永亭等到河北公社支农，为三福村架设一条长600米高线，运送黄土垫大石河滩，造地20余亩。

1970年，房山矿高线工人为河北公社三十亩地村架设一条长200米高线，往山上运肥料，往山下运粮食。

上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期，北京矿务局开发长沟峪煤矿时，房山矿高线工人利用新中国成立前周长高线的旧铁架基座，重新为长沟峪煤矿架设一条长 4000 米的高线运煤。以后又更改线路，建成一条运送石板的土高线，这条土高线至今仍在使用。

60 年代初，房山矿高线工人帮助房山县上方山林场，架设一条从山下山上运送物资的高线，至今仍在使用。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房山矿高线工人帮助南窖公社架设一座引水铁渡槽，长约 100 米，宽 0.8 米，凌空飞架，由一座 40 米高的铁架支撑。

70 年代，070 部队在房山县坨里乡的冷月沟开采石英石矿，房山矿高线工人用 4 个月时间，为石英石矿修建一条长 660 米的高线。

## 2. 支援北京市建设情况

1959 年，北京市为解决修建密云水库搬迁问题，请房山矿派出高线工人，为新城子乡架设一条长 2250 米的高空运输线。当地民众非常感激，赠送房山矿锦旗三面以示感谢。

1962 年，房山矿派出人员和设备，为北京矿务局木城涧煤矿架设一条运煤高线，从干军台坑口至北台子下站，计长 2273 米，至 1965 年 8 月停运，中途有铁架 18 座，山上至今仍留有铁架数座。

1974 年，房山矿派出朱永亭、胡振才等 10 余名高线工作人员，用一个月时间，为密云县太子峪乡架设一条长 500 米高线，当时《北京日报》曾予报导。

房山煤矿高线工人还为延庆县金矿架设一条运水高线。

房山高线工人在北京市内支援建设的高线，所用铁架、线路等机器设备基本都是以房山运煤高线的旧物料改制而成。1980 年，北京香山公园建起北京市第一条电动旅游缆车，房山矿的高线工作人员朱永亭、宋振铎等也曾前往进行技术咨询指导，并随车试验。

## 3. 支援外省市建设情况

1953 年，房山高线工人支援河北省井陘矿务局架设高线。河道上原设计七座铁架支撑，经房山高线工人建议，修改原设计方案，缩短了工期，节约了原材料，受到煤炭部表彰。

1965 年 5 月，煤炭部将房山煤矿高线运输设备调拨山西晋城矿务局，房山矿负责技术指导和拆卸、安装，并到晋城矿务局帮助培训高线技术工人。

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期间，房山矿曾为三门峡水库工地培训高线工人 50 名，学习时间 8 个月。

房山高线曾派出工作人员张海、张桂福去陕西铜川矿务局两年时间，做为技术指导培训当地高线工人。

在山西省杨家杖钨矿，房山高线工人曾帮助建设高线一条。

60年代初期，房山高线工人曾去云南、贵州支援“三线”建设高线。

新中国成立后，房山高线的技术曾多次在全国推广介绍。50年代，全国许多省市和单位派人来房山学习参观高线的运输技术，房山高线工人也多次被有关单位请去指导修建高线。

煤炭部四川煤矿设计院还根据房山运煤高线的情况，编写出版了论述高线运输和高线操作技术的书籍。至目前为止，始修于清末的房山运煤高线长度及动力在全国的高线线路中，仍然是规模较大的。

### 十三、遗址遗物

房山运煤高线从清末1907年始建，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所修高线大部分被毁坏。1949年平西煤矿公司成立后，以高线遗留的基础和旧物料，在一年的时间内将坨里火车站台至房山矿两座井口约10公里线路修复，用于房山煤矿产煤的运输销售，房山煤矿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国家现代化大中型矿井，高线发挥了巨大作用。50年代，也是房山运煤高线历史上最为畅通的时期。尽管50年代的房山高线比清末民初时的房山高线运距短、站台少、规模小，但50年代房山运煤高线的日运煤量却是历史上最高的，也是高线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候。至60年代初期高线停运拆卸。房山运煤高线经历了50多年的沧桑历史，原来高线所经的线路多已是荆莽丛生、荒草萋萋了。然高线毕竟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现代工程建设，留下了许多遗址遗物。

#### 1.高线机厂

位于坨里站台，大石河畔，占地面积66.9亩。解放战争期间，高线全线停运后，机厂由技师张文言看管。1950年11月27日，高线股份有限公司向京西矿务局移交了所有财产，对器材、房屋、设备等做了估价和清理，由京西矿务局坨前高线管理处负责善后和重新恢复修建工作，机厂划归房山矿所有，由矿运销科负责。移交时，高线公司代表人有机厂负责人张文言、高线工匠张春，坨里村代表有村长朱玉和王彬，京西矿务局代表有房山矿矿长王达和矿材料科科长赵润田。移交后，张文言、张春等人均转为房山矿工人，参加高线的重建。机厂成为房山矿的材料和运销科。1962年，坨里至磁家务



的铁路修通后，新建的高线随之拆卸。坨里机厂遂成为职工宿舍区，京西矿务局在此盖起办公室。另有一部分机厂房屋成了 6122 部队仓库。1971 年，北京矿务局在高线机厂所在地建丰收炼铁厂，房山矿遂把高线机厂产权移交炼铁厂。1972 年 9 月炼铁厂投产，1980 年 7 月下马，共炼铁 99417 吨。北京矿务局又利用下马的炼铁厂基础设施，改建为水泥厂。到 1990 年，北京矿务局水泥厂生产水泥 333424 吨。原高线机厂所在地现为水泥厂所占，原高线机厂的房屋经多次改建已基本拆除，只遗有原高线站台的围墙和几间破旧平房，但原机厂内的高线坨里办事处办公楼基本完好。楼为二层水泥结构，虎皮石墙。一层为储物室，水泥厂曾一度将其改建为职工会议室。二层原为高线办公室，多是里外套间，有的大外间里套有几个小房间，如同单元楼住房。水泥厂也曾把二层楼做为办公室。这栋楼房约是清末民初德国人指导修建高线时所筑，式样也是欧洲风格，至今水泥厂仍在用。这座楼房可能是房山地区和北京矿务局最早的水泥结构楼房。

## 2. 前台站台

高线全路总计有 11 个站台，现保留最好的是前台站台。该站台位于杏园村潘家楼，曾是高线的中心站，也是坨红高线与坨清高线的交汇点和分岔点，另外还有日本侵华时修的通往协中煤矿井口的支线。新中国成立后，房山矿为修复高线，又把此站台做为枢纽，大力营造。50 年代中期，此站台又成为房山煤矿的井下矸石排放点，在站台附近购地存放矸石。夏季山洪暴发时，房山矿与外部交通受阻，车辆进不了矿。房山矿就用高线与外部交换物资，从坨里往矿运粮运坑木等物资，把前山站做为物资散地。1958 年，房山矿又利用前山站台运输方便的特点，在其附近建设一座集体经济所有青煤窖，并在前山站台建造了滑坡煤仓。1962 年房山矿拆除运煤高线时，前山站台改建成了职工宿舍，以后又成为家属招待所，从而使原高线站台的部分房屋及站台石墙、水泥构筑站台基座等得以保存。

## 3. 锅炉设备

房山运煤高线始建时只有 4 台锅炉，以后又因线路需要购置，至新中国成立后房山矿接收高线时，有锅炉 8 台，其中立式 1 台，卧式 7 台，均有不同程度毁坏。1954 年房山矿仍采取“走旱船”方法，将高线南窖站台、北窖站台的破旧锅炉运到矿西区，修理后做为工人浴室烧水洗澡之用。1967 年，房山矿西区新浴室建成，高线旧锅炉随之废弃，存放在西区锅炉场院区。另外坨里机厂、万佛堂站台等地的锅炉也都被房山矿修理使用过。

新中国成立后房山矿接收高线财产时，还有德国西门子公司于 1919 年制造的电动机，德国造 16 英寸卧式车床，德国造旋转式通风机，以及斗车、铁架、线路等许多设备及工具。有的至今仍在房山矿使用，如德国产单筒长柄望远镜，原是巡线工具，现被房山矿运销科排矸队用于口头高线木目瞭望使用。再如日本昭和初年(上世纪 20 年代末)生产的电机，30 年代用于高线运输，现仍在房山矿口头山排矸点运转。

#### 十四、高线现状

1962 年，房山矿拆除高线时，为了矿排矸方便，利用拆除的高线设备，又在矿东区井口至口头山顶架设了一条长约 2 华里的标准高线线路，中途设铁架 7 座支撑，在口头和矿井口分别设立了上、下两站台，将矿井口排出的矸石通过高线运往口头山顶，往荒山沟中排放。1965 年，煤炭部把房山运煤高线拆除下的设备调拨山西时，房山矿排矸用高线被完整保留下来，至今仍做为房山矿的排矸运输线。从而使人们可在北京地区亲眼目睹高线这种“车轱辘朝天的车”，而且房山矿仍有一支 40 余人的工人队伍为高线运输服务，也经常帮助有关单位进行高线建设或从事土高线运输的技术指导。房山煤矿机电科技技术人员张立民等人看到房山矿排矸用高线卸斗车工作劳动强度大，遂进行技术革新，于 1971 年发明了高线自动翻斗扣车，使在线路运行中的斗车在空中自动翻转，将斗车所运物料卸车。此发明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填补了我国高线架空索道自动翻斗卸车的空白，从而使房山运矸石高线减少工作人员 10 余名，还减少了卸矸石站台的工程建设和工人劳动强度。

自 1981 年香山公园建成北京第一条旅游用缆车索道运输后，至 1995 年北京已建起多条旅游用缆车。这种缆车与房山运煤高线索道原理一致，但采用的缆线却不同，这些旅游用缆车是将缆车固定在缆线上，靠机器拉动缆线带动缆车运行。而像房山运煤高线采用 4 条缆线，靠小线牵动斗车，以车轮在大线上滚动运行的运输方式，在北京还是绝无仅有的。因此，现存的房山煤矿卸矸石高线运输这种“车轱辘朝天的车”曾引起无数人好奇，并且有很多人到房山煤矿参观。

#### 十五、与高线有关的人物

房山运煤高线从修筑至停止运营，历时 50 余年。高线工作人员为我国第

一代高线工人，来自四面八方。高线在修建和经营过程中曾酿成国际纠纷、盐务风潮、48村争高线、27村吃高线等多起重大事件，并有许多人涉足其中。其中影响较大者有清末修筑高线的代表人物王竹林，新中国成立对修复高线做出杰出贡献的王德兴等。

王竹林，名贤宾，字以行。生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卒于1939年。天津人。曾捐纳为河南候补知县、道员，经营盐业致富。1903年经袁世凯批准，担任天津商务总会总董。其对天津商会进行改组，大力兴办实业，深得袁世凯赏识。光绪末年，王竹林为发展长芦盐务，与天津盐商李幼香等，组织了北洋保商公司。通过北洋保商公司，王竹林联合天津十大盐商，聘请德国顾问，购买德国机器设备，在房山修筑运煤高线，以蒸汽为动力运营山区煤炭，与房山煤炭运输、销售业的驮户、商号、煤场发生利益纠纷，引发起数万人参加的“高线阻路风潮”。王多方斡旋，后经袁世凯批准，高线得以建成，时为东亚第一条以机械为动力的高空运输索道。高线运煤伊始，朝廷发现王竹林等修建高线使用河南、直隶的63县盐业专卖权做抵押，向外国银行借款，遂将高线收归国有，又引发起“盐务风潮”，河南、直隶许多县纷纷要求改“盐引”为官运经营。外国银行也通过领事馆要求归还银行贷款，酿成国际纠纷。民国初年，房山运煤高线改为国有私人承包运输。王竹林鼓动天津富户、高线股东及房山高线线路附近村庄民众士绅，争夺高线路权，掀起“48村争高线”风潮，并诉诸公堂，终被王竹林组织股东出银300万两，将高线争回。运营过程中，高线受军阀战争影响，于直奉战争中被军事接管，经营不善，使众多借款给高线的煤栈、商号、银行倒闭，房山煤矿煤栈业纷纷停开关闭。1936年，王竹林再次当选天津商会会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天津沦陷，王竹林参加伪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并任委员，担任天津物资对策委员会委员长。1938年，天津伪市公署成立，任王竹林为长芦盐运史。1939年，王竹林被刺毙命，结束了其晚年甘当汉奸的罪恶生涯。

王德兴，生于1888年4月13日，河北省新城县南横沟村人，出身农民家庭，以种田为生。1908年到京张铁路南口机厂学徒，后因挣钱少难于养家糊口。1911年2月到房山运煤高线工作由于他认真学习技术，成为高线的主要工匠。1937年高线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王德兴曾带领高线工人多次开展“磨洋工”斗争。1945年高线在战争中破坏停运，王德兴被迫返回原籍务农。1946年又到门头沟六顺窖看水泵，做机工。1949年平西煤矿公司准备恢复高线运输，王德兴被请回，参加建设高线工作并担任工匠。一年后高线通车，

王德兴担任高线总工匠，与高线工匠张春等人一起对高线进行技术改造。1951年，王德兴提出取消高线中途设立的南车营站台，将高线经过的花岭山与小城峪山之间长达800米的V形线路拉直，获得成功，减少站台工作人员21人，每年节省轮轴和油耗价值两万元。王德兴又对高线坨里站台和前山站台进行改造，将易发生装载事故的坨里站台悬钢梁轨道升高250厘米，使钢梁死弯改活弯，小弯改大弯，斗车不易掉轨，重车可自动滑入挂接地点，减少了人力推车。王德兴将前山站台的托轮改为100厘米，架轮轨道升高100厘米，减少了掉车事故，而且还能使斗车装运大口径的较长规格的进下坑木。将高线站台用于牵引线的坠砣设计成四槽坠砣轮，解决了因牵引线坠砣发生脱落索道落空问题。为了提高运输能力，王德兴提出运输斗车容量从0.58吨增加到0.72吨，将高线连接用的套筒直径由29厘米改为81厘米，斗车运行速度从每分钟159米提高到197米，均取得了成功。1953年王德兴被煤炭部派往河北省井陘矿务局帮助架设高线，他对原设计线路中的河道桥墩进行改进，缩短了工期，节约了材料，得到煤炭部表彰。王德兴积极参加支农工作，带领高线工人以废旧高线设备为京西矿区河北乡李各庄村建一条运石板用土高线，在河北乡村前大石河架设一条人行铁索吊桥。1958年，王德兴不顾年老体弱，又带领高线工人参加恢复建设长沟峪煤矿高线工作。从1953年至1958年，王德兴四次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59年，王德兴已71岁，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群英会时，被周恩来总理誉为“71岁的老英雄”。1961年，王德兴被邀请参加天安门国庆观礼。1962年房山运煤高线开始拆除，同年1月1日，王德兴退休回原籍。1972年2月19日，王德兴因病去世，终年84岁。

在王德兴的参与和影响下，房山运煤高线在50年代进行较大技术革新200多项，高线的运输能力超过德国人设计运输能力的两倍；运输成本从1950年每运一吨煤1.20元降低到1959年每吨煤0.40元；运输效率从日本侵略军占领高线时正常通车时的每天400车，提高到1959年的每天两千车；使用人工从40年代的425人减少到1959年的240人；在新中国成立前每进行一次检修索道2至3天，到1959年时只用8个小时。

房山运煤高线培养出了我国第一批高线工人，其中很多工人刻苦钻研技术，不迷信洋人，成为优秀的设计人员和能工巧匠。

高线初建时的工人大多来自两个地区，一是修筑卢汉铁路和京张铁路的工人，这些人家乡多在卢沟桥至保定一带沿线村庄。二是房山附近的煤矿工

人和破产农民，这些人以房山河套沟高线线路附近村庄为多。这一部分人原是我国早期修筑铁路的民工，卢汉铁路修成后，又参加京张铁路建设。京张铁路竣工后，一部分人南下随詹天佑去四川继续修铁路，不愿意离家远去的人员，又参加了房山运煤高线的建设。这部分人来到高线后，大多从事技术工作和担任领班，许多人还成为高线的某些工种的技术权威。譬如被誉为高线“四大王”的电话王、机器王、接线王、鞭炮王等人都是能工巧匠。再有接大线的杨老四、大狗熊(姓熊、此为绰号)，打线楔的胡树南父子都在高线工人中享有很高名望。这批人为房山运煤高线的修筑做了很大贡献，是房山运煤高线建设和开始运营的主力。他们的后代中，许多人也继承父业，从事高线工作，后来成为房山煤矿的高线运输工人。在第二部分高线工作人员中，多是原高线修筑时雇用的当地矿工和农民做临时工。高线开通后，继续在高线工作，从事一些简单、卖力气的工作，多为高线的推车工和杂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工作的熟悉，逐渐走上技术岗位，担任电话工、司炉工、巡线工等。由于高线工作比当地矿工和农民收入有保障，许多矿工和当地人也托人送礼给高线公司或站台的站长，让自己的亲属及子弟到高线当工人，后来这批人成为高线工人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房山煤矿接收了高线。煤矿组织了多种高线技术培训班，现场观摩修线、接线技术，许多年轻人也成长为高线的技术骨干。

## 十六、结束语

房山运煤高线自清末建筑至1962年拆除，经历了清末、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三个时期。高线的经营者有商人、官僚、政客等，资金来源牵扯到中外很多著名银行以及国内的银号、钱庄、煤商及私人股份、放债者。修建运营过程中又酿成国际纠纷、盐务风潮、阻路风潮、48村争高线、27村吃高线等多起重大事件。其复杂、曲折的过程和经历，在房山工业发展中绝无仅有，在我国民族资本企业中也是极其少见的，可说是沧桑历尽，饱经忧患。反映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族工业发展道路的艰难。所幸的是，房山运煤高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时间内，就恢复了运营，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当铁路修入房山山区后，房山运煤高线结束了历史使命，但却在我国运输史上和矿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 参加 1950 年首都国庆活动的回忆

魏志华

1950 年 10 月 1 日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首都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除北京的广大群众外，各省、市也派代表参加。当时房山县还属河北省管辖。房山中学属河北省通县专署领导，专署分配房山中学 5 名参加国庆活动的代表名额。我当时是初中三班的团支部书记，被学校推荐为参加首都国庆活动的代表之一，感到特别荣幸，五十多年过去了，有些事情印象还很深刻。

1950 年 9 月 30 日，由杨槐堂校长带队，我们先到通县专区集中。当时房山的交通很不方便。房山到北京每天只有一辆客车，是烧劈柴的旧卡车，经常坏，雨雪大一点就不能走。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坐学校的马车去良乡（学校的这匹马是杨校长 1948 年底从解放区来房山时领导给他配备的）。从良乡坐火车，中午到北京后又乘汽车去通县。下午 4 点多钟到通县专区。当时专署没有招待所，我们就在通县北街，找一个离地委较近的旅馆住下。吃晚饭的时候，谭惠民专员来看我们（谭惠民是杨校长的老战友、又曾是房山县的老县长）。问长问短，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家建设服务。

10 月 1 日早晨 4 点多钟，天还很黑。我们就起床，吃点早饭便整队出发。走了五六里地，到通县南边的火车站，坐火车去北京。因为人多，火车是为参加国庆活动的代表发的“专列”，我们坐的那个车厢全是青年学生。火车刚一启动，有人就带头唱起了歌，大家都自动跟着唱了起来，一个接着一个。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解放区的天》、《咱们工人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共青团员之歌》等等。大家的情绪特别高涨，一直唱到北京。

从北京前门火车站下车以后，大家步行到东单、王府井、台基厂一带整队等候。上午 11 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在国歌的军乐声中，礼炮齐鸣了 28 响。大会首先举行阅兵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检阅陆、海、空三军和公安部队。朱德总司令乘检阅车检阅部队之后，宣

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给全国武装部队和民兵的命令。接着进行武装部队分列式检阅。各兵种部队经主席台前由东向西行进。受阅部队有空军部队的学生和海军部队的学生及步兵、炮兵、战车摩托化步兵、骑兵。同时，空军各种飞机排列整齐的队行由东向西腾空而过。当时大家都说、我们刚解放怎么这么多飞机呢？后来才知道，当时我们的飞机确实不多，于是采取循环飞行的办法。即前边的飞机飞过天安门、长安街以后，绕一个圈，又飞到后边，循环几次。他们计算的时间、速度非常准确。别说一般群众，就是专业人员也很难看出。

阅兵式结束后，各界群众的游行开始了。走在最前边的是首都少年儿童。15000多名少年儿童穿着白上衣，结着红领巾，挥动着彩旗、鲜花。接着是产业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我们和首都的7万多大中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游行，都盼着早点见到毛主席。大约下午1点多钟，我们到了天安门，看见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心情特别激动。我们手拿着小彩旗，向着天安门城楼使劲的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真想叫毛主席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在天安门下边虽然看不清毛主席他们的脸庞，但大体轮廓看得比较清楚。毛主席不停的向游行群众挥手，还不时喊着“人民万岁！”我们走过天安门，还回过头来看，真想在天安门前多呆一会儿、多看几眼，但我们事先已讲了严格的纪律。必须保持队形，不能在天安门前停留。我们只好跟着队伍向前走。走在游行队伍最后的是各种文艺工作者组成的艺术队伍。他们当中有边疆的少数民族的文工团，有专业的文艺工作者，也有工厂、学校的业余艺术活动者。他们一面游行，一面表演各种民间舞蹈，或者腰鼓、秧歌，更增加了节日气氛。整个庆祝活动进行了5个多小时，直到下午4点多钟才结束。

当天晚上，首都举行了盛大的焰火晚会，各大公园进行了游园活动。吃完晚饭，我们便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看焰火的人很多，有十几万人。8点钟开始放焰火，一簇簇的焰火和礼花在夜空里放射出五彩缤纷的花朵，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照亮了天安门城楼和北京上空。看完焰火我们又到了中山公园参加游园。中山公园游园的人很多，非常热闹。文娱活动有十几处。当时中山公园里没有剧场，有的搭了临时舞台，大部分都是打地摊。有戏曲、歌舞、相声、杂技等。当时我们对戏曲，特别是京剧还不太懂。所以我们重点看了杂技和魔术。解放前，我们在房山也看过一两次杂技，但离得很远，看不太清，而这次特别近，就在眼前，水平又高。有的表演车技、有的抖空竹、有的蹬大缸、蹬伞、有的耍碟子。尤其是对表演魔术更感觉有兴趣。一直到夜里11点，我

们才离开中山公园。

当天晚上，我们住在前门外边粮食店街的大北客店。大北客店在当时是普通客店，条件较艰苦，几个人一个屋大连铺、屋里什么设备也没有。尽管我们忙了一整天，走了几十里路，但夜里睡觉的时候却不觉得累、不觉得困，特别兴奋。白天游行的情况，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总是在眼前出现，“人民万岁”的声音总是在耳边响着。

这次到北京使我们大开眼界。我们这几个农村的学生，大部分没进过北京城，在家里连三轮车都没看过。这次到北京坐了汽车、火车、电车（当时是有轨电车），看到首都的变化，特别是能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10月2日下午，我们乘汽车回到房山。到学校后，我们都把这次参加国庆活动的情况写了作文或日记，在班里向同学或团支部作了介绍。同学们也为我们感到高兴。后来又召开全校教职员和学生大会，由杨校长把我们参加国庆活动的情况向大家作了详细报告。大家都表示一定要好好读书，学好本领，听从党的召唤，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 北京龙腾杂技艺术团记事

赵润东

在北京民俗文化的摇篮中，曲艺、杂技称得上是一枝奇妙的艺术奇葩，一直为广大观众所喜爱。近年来，活跃在祖国大江南北、献技于世界各地的北京龙腾杂技艺术团，以中幡、舞狮、文场和传统杂技、气功、魔术等节目为主，既能在广场上表演又能在舞台上亮相，既能走街串乡又能登大雅之堂，有着浓厚的北方乡土风韵，更是受到全国各地及外国朋友的喜欢和热烈欢迎，这支民间艺术表演团体就来自北京房山区阎村镇。

—

说起北京龙腾杂技艺术团以及它的成立与发展历程，首先要了解一下我国杂技艺术的历史。

据史书记载，我国杂技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代，已有精彩的力技表演。汉代形成了一种比较完整的表演形式，当时称为“百戏”。南北朝以后，又称为“散乐”，其规模更大，节目花样更多。自宋朝以后，民间杂技的繁荣代替了宫廷杂技。元代初期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了汉代以来百戏节目及其发展经过。

杂技是我国民间传统技艺性表演艺术的总称。主要有蹬板、手技、顶技、踩技、口技、车技、武术、爬竿、走索、中幡以及民间各种杂耍等，一般把戏法、魔术、马戏、驯兽等也包括在内。我国杂技有优美健康、轻松活泼、动作灵巧迅速等特点。建国后，我国传统杂技经过不断改进和创新，早已形成了具有民族风格的表演艺术，并多次在国际性比赛中获奖。

中幡是杂技中一项深受观众喜欢的表演节目。据史料记载，中幡历史悠久，古代称百戏中的“寻撞”，起于唐宋时期，繁盛于明清，唐宋时称“戴竿”，清代称“太平中幡”。

明朝末年，中幡传入北京。后来，有一个叫田宝的吴桥杂技艺人又把中幡

带回家乡，并结合自己学过的棍术，创作出了“幡旗火背花”、“背花后滚翻”、“前滚翻蹬”、“顶翻对传”和“脚踢幡对传”等动作。随着艺人的足迹，中幡很快遍及全国，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杂技节目流传至今。

## 二

北京龙腾杂技艺术团是一支民间艺术团体。虽然土生土长在北京郊区，但是由名人真传绝技，其基础扎实，功夫过硬，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小有名气。这个艺术团体发起于上世纪70年代，地点是房山区阎村镇二合庄村。

1966年，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被称做“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这场运动极其深入，所有的干部群众都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波之中。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田间，风起云涌，形势突变。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上课，干部靠边站。一时间，全国上下呈现出一场翻天覆地、是非颠倒、史无前例、灵魂扭曲的局面。在这场浩劫当中，那些自幼练功，掌握高超技艺的表演艺术家也不能幸免于难。1970年，北京著名气功表演艺术家朱国全先生下放来到阎村镇（当时为大紫草坞乡）二合庄村，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劳动改造”。

朱国全先生为人厚道，非常随和，当时已年近花甲，上身穿一件大棉袄，下身穿一件马裤，腰间却系着一根绳子，身着朴素，但朴素中又不同一般，看上去很有个性。由于老先生人缘很好，待人和善，不久，便和村民们混熟了。然而，在哪个特殊的年代里，对于这样一位素不相识并且是从京城里下放来的人物，谁敢轻易接近？后来，人们发现，朱先生不会做饭，右手还有残疾，一天三顿总是啃干馒头，这些馒头是老伴送来的。老伴在丰台工作，隔几日送一次，每次带来十斤，吃到最后馒头都拉黏。看到这种情景，一向老实巴交的宋振海实在不忍心，便不顾那些激进分子的流言蜚语，把老先生请到家中吃饭。那时候，宋家的生活也十分困难，但这份热情及粗茶淡饭足以使朱先生无比激动。后来经聊天得知，朱先生是北京天桥著名的杂技表演艺术家，主要表演武术、拉硬弓和气功等。宋振海虽说是农民，但自幼习武弄棒，精通武术，二人情投意合，越谈越投机，之后，朱先生成了宋家的常客，而且与宋振海推心置腹，无话不讲。

艺术家的不幸遭遇的确是一场灾难。然而，他的到来却给这个祖祖辈辈都在种地的村民带来了希望和生机，也为宋氏一家及后来的北京龙腾杂技艺术团

的组建发展奠定了基础和铺平了道路。朱先生感激宋家，总觉得没的报答，因此萌生了教孩子玩意儿的想法。

宋振海一家6口人，三子一女。儿子宋勇、宋良、宋林，女儿宋秀兰。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孩子每天放学回来都要打草打柴。一天，朱先生对宋振海说：“你们家的柴草堆成山也有个烧完的时候，还是让孩子练点功夫吧，练好功夫可是长久的。”宋振海听了连连点头。于是，让孩子拜朱先生为师学起气功。宋家儿女学习气功，村里的孩子见了都感兴趣，也都纷纷参加进来，全村练功的很快达到三四十人。

这年，宋秀兰6岁，两个哥哥才十几岁，兄妹三人非常喜欢杂技艺术，自从拜朱先生学艺以后，刻苦勤学，十分用功。他们一招一式，绝不马虎。冬练三九，下练三伏，寒暑秋冬，毫不懈怠。练三张桌子翻提需要擦起三张桌做道具，家中没有，他们就挖沟垫土，借助土坎当道具，练功条件非常艰苦。朱国全先生对孩子们不怕吃苦的精神和毅力十分满意。后来，他把自己发小的好朋友、著名的满族杂技表演艺术家成连宝和经常来此看望他的侯宝林先生等带到二合庄村，请他们进行多方面的指导。朱先生擅长拉功、刀功和硬气功；成先生则精通轻功、武术，他在一分钟内能够连贯完成160个武术动作。二位大师在中国杂技界很有名望，他们身怀绝技，亲自指导，对宋氏兄妹的成长及后来的艺术发挥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说起宋氏兄妹苦练杂技基本功的过程，妹妹宋秀兰更为突出。她生于1962年10月4日，“文化大革命”兴起时她才6岁。在众多同龄儿童还在母亲怀抱中撒臆怔撒贱的时候，幼小的秀兰便开始拜师学艺了。她天资聪颖，很有悟性。师父讲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要领，她都牢牢记在心中。小小年纪，就有了理想，长大后要当一名优秀的杂技演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支含苞欲放的花朵，在园丁的精心培育下正茁壮成长。小姑娘不怕吃苦，毅力很强，一天要练三遍功。她早晨4点钟起床，练完功去上学，有时一路翻着斤斗去上学。中午和晚上放学后继续练。白天在自掘的土坑上练翻滚，晚上在院内练气功，连做梦都在想着练功。父亲看了又高兴，又心疼，有时练不好还要打。师父看了心里喜欢，嘴上夸奖。成连宝先生认为自己遇见了一棵好苗子，收她为徒，真传绝技，使她很快又熟练地掌握了长顶功和腰腿功。幼小的宋秀兰迷上了杂技功夫，以至后来在学校受到校长不点名的批评：“有的人，从小就想吃香的喝辣的，目的不纯，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宋秀兰虽然在思想上受到压抑，但她就是不服输，从此更加努力、争强叫劲，直至取得成功。经过二十多年的

苦练，终于成为杂技艺坛中的佼佼者。

### 三

1979年，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下放劳动改造十年的著名杂技表演艺术家朱国全先生终于得到落实政策，他回到北京，不久就在崇文区组建了燕京杂技团并任团长。这年，朱先生把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高徒招了进杂技团。宋秀兰和两个叔伯妹妹宋秀清、宋秀玲先进杂技团，一个月后，哥哥宋良和宋福也来到该杂技团，剩下的学员在村中边务农边演出。五人跟随恩师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国庆节后到哈尔滨、大庆等地。1980年去广州、汕头，转而又赴新疆、宁夏等地，一走就半年，观众场场爆满。如在沈阳、在银川等地演出，观众从凌晨4点就去排队买票，不到半小时就销售一空。

自1979年开始，宋氏兄妹随燕京杂技团演出。两年后该团精简解散，宋氏兄妹只得回乡。1982年，经多方努力并求得各个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市、区、镇、村方审核批准，宋秀兰领取执照，正式成立了京郊第一家民间杂技团——燕山艺术团，隶属于房山区文化局。该团由宋秀兰任团长，演员为宋永、宋良、王维、田凤银和望楚村5名初中毕业生，主要在乡下和京城演出。1988年下半年，宋秀兰率领燕山艺术团参加文化部勇进评剧团的演出。这时，著名满族杂技表演艺术家成连宝建议成立北方满族杂技团，不久该团正式成立。于是，燕山艺术团同北方满族杂技团一起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当时非常红火。

1990年春节期间，宋秀兰带领燕山艺术团应邀参加北京市农民艺术节表演，其中表演的狮子舞节目获得一等奖，中幡节目获得二等奖。1990年4月，北京市房山龙乡杂技艺术团成立，挂靠在北京杂技团下。1991年开始独立组团演出并获奖。1992年应邀赴沈阳参加国际妇女节演出，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和好评。1995年，北京市房山龙乡杂技艺术团变更为北京龙腾杂技团。中幡和狮子舞是宋氏兄妹表演的主要节目，这些节目具有高难动作，每次均获奖。

幡分为大、中、小三中。大者，称为“大制式幡”（简称为大幡），高可达20米，由一人撑幡杆，四角各有一人拉住晃绳，以保持幡杆的稳定。这种大幡无法耍练，只是为了壮场面气氛而已。小幡，高4米有余，耍起来灵巧，多用于“走会”时沿途的表演，因其便于通过城门或街头牌楼时表演不中断。唯有中幡是正式在场子中表现的。

表演中幡的道具只是一根碗口粗、高达10米的大竹竿，上顶有伞盖、旗、

大小竿等，最主要的是由上而下悬挂着的一幅长约 5 米、宽约 0.6 米，质地为纱或布制的长幅——幡。大多是在其上面绘画或刺绣着神像或文字的“彩幡”，也有不带任何内容的“净幡”，但很少。不管幡顶有或多或少的装饰物，都一定会挂一些小铃铛。整个中幡重量约在 40 斤上下。耍起来时，幡幅飘动，铃铛作响，再加上一些惊心动魄的表演动作，紧张、刺激、乐目、悦耳，很吸引人。

中幡是民间十三档花会之头档，历来都是由男子表演。而女子耍中幡，宋秀兰为京城第一人，开全国之先河。她功底扎实，技艺精益求精，能将几十斤重，数丈高的长幡，舞的娴熟。尤其是将优秀的民间花会融进时代精神，传承民族传统，大胆改革创新，创作出了一批深受观众喜爱的节目。

宋秀兰的表演身轻如燕，动作灵巧。能以天真活泼的少女形象表演英姿飒爽的引狮女郎；能以气贯山河的武生姿态表演高难动作的中幡绝技；上百种神奇的小魔术，变幻莫测；灵活熟练的轻功、气功，造型优美，别具一格；武术、钻圈、翻滚、提拉，以及魔术等均有新意。

耍中幡可以一个人单独表演，也可以几个人同时耍一根幡。单人耍幡，要看个人的技巧、功底；多人耍幡，主要协调配合，看送幡与接幡的功夫。耍中幡的，有两类，一种是属于民间花会，为一些纪念性的活动或应人之邀，边走边耍，或走到某处停下集中表演，属于助兴表演；另一种是牟利性质的，是职业演出，多在天桥或旧京的几大庙会。

三人中幡为宋氏兄妹之首创，堪称一绝。二男一女同台表演，由宋秀兰担纲主演，哥哥宋永、宋良配合。传统的中幡表演大多是单个动作，而创新后的三人中幡，则将小武术动作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他们有继承有发展，推陈出新，创作出了“封侯挂印”、“喜鹊登枝”、“抱翻坐脚”、“左右踹马”、“卧看巧云”、“站肩与乌龙绞柱”等丰富多彩的表演节目。三人表演起来，穿插跑动，变换动作，协调配合，快而不慌，慢而不拖，惊而不险，让人赏心悦目，给人以新、活、惊、美的感受。

近几年来，以宋秀兰为团长的北京龙腾杂技艺术团经常应邀出国演出，他们精湛的技艺，扎实的功夫，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好评，所到地区有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德国、匈牙利、科威特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受到欢迎和称赞。

# 一册记录黑龙关村风情的珍贵志料

栗景鸿

中国文人自古乐山乐水，遍访名川大河，以陶养性情。入清以来，尤其民国以后，此风依然盛行。略有不同的是，此间的许多名士显儒已经开始把注意力逐渐集中到了京西一带，而且均有其游记类作品成辑行世。仅就笔者所知，即有192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蒋维乔编纂的《大房山》；1928年铅印、顾颉刚等编的《妙峰山》；1937年出版、王毓霖编纂的《房山游记汇编》等等，其它散见于书刊报章中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这为我们现在研究上个世纪初的京西民俗民情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

民国十八年（1929）九月，在北平享誉一时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所属会刊《艺林月刊》，曾出版过一册汇记当时房山风情的“游山专号”。因其极不易见，而且多有涉及黑龙关村之处，这里简单作一下介绍，也许能让大家对黑龙关村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游山专号》封面（栗景鸿提供）

“中国画学研究会”，1910年成立。发起者为当时北平著名画家陈衡恪、周肇祥、贺金朴、金绍城，并出版会刊《艺林月刊》。《艺林旬刊》即为《月刊》之前身，为8开4页，16开本，道林纸印。后因保存不便，故改为月刊。其宗旨为：“纯在倡导美术，所集材料，以具有美术价值为限，选择精审，考订详明，绝不滥竽充数，亦不随俗徇知。”刊物以刊载古今书画作品兼及金石碑刻、古迹名胜摄影等内容为主，具有极高的资料参考价值。该刊创办后，广受

欢迎，风行海内，可惜于1942年6月停刊，共出118期。

笔者手中保存的这册《艺林旬刊》“游山专号”凡40页，竖版繁体印刷，每页22行，4万余字。每页除文字外，均配有一图。内容多为记叙房山境内之百花山、莲花山、大寒岭、秒（庙）庵岭、圣米石堂、黑龙关村等地。计游记6篇，诗作、题名、感赋56首，照片、碑刻拓片36幅。仔细体味文中各篇，可谓笔墨扎实老到，文采飞扬，再加上摄于七、八十年前的数十幅珍贵照片，应当算是一册“可遇而不可求”的反映房山“河套沟”地区的文献性史料。

“专号”文字非一人所为，作者共计六位，均是名冠当时的大家。从书前的出版“识语”中可见六人当时的影响：

游山专号，乃江安傅沅叔（增湘）、绍兴周养庵（肇祥）、吴兴徐森玉（鸿宝）、长汀江翼云、建始周立之、泰县凌直支（文渊）。六先生，先后游百花莲花诸山，所作游记题名诗篇，交由本社汇辑刊行者也。六先生性好游览，足迹遍天下，出其所历之胜及学问文章，足以引导激扬后生，而求高尚娱乐，养成坚强之体格，俊伟之人才，其事甚盛。第一集凡四万余言，所插图画碑刻，共三十六幅，皆江翼云周养庵两先生所手摄。披图玩读，不啻置身山水间矣。何其快哉，何其快哉！

据笔者所知，“六先生”中，傅增湘(1872-1950)，四川江安人，字淑和，号沅叔。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曾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总办、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等职。后致力于版本目录学研究，为我国著名的藏书大家；周肇祥(1880-1954)，浙江绍兴人，字嵩灵，号养庵，别号退翁，宋儒周敦颐后裔。民国后，一度任湖南省长、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等职。曾数渡日本，博通文史，精于鉴别，为我国近代著名书画家、鉴赏收藏家；徐森玉(1881-1971)，祖籍浙江吴兴，名鸿宝，以字行。历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故宫古物馆馆长等职。1960年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后，常策杖四处走访，为国家征集、鉴定了晋代王羲之、宋代司马光、苏东坡的真迹等大量国宝级的文物，为我国著名文物鉴定家，金石学、版本目录学家。至于其他三位“先生”，也是在民国文坛画界风云一时的人物，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绍了。

## 二

黑龙关村因其水名，由其庙显，自然会引起傅增湘等六先生的雅兴。

1925年旧历八月及1929年旧历三月，六先生两次携仆十数人先后过百

花山、贾家口、长操、红煤厂、佛子庄一带，当游至黑龙关村时，不约而同地被这里独特的山水风情吸引，遂驻足二日，宿于黑龙潭庙中，并与当时庙中一位姓李的道士作彻夜之谈。并因感而发，各自留下了别具风采的诗篇文字。

首先引起此行游人注目的是黑龙关村别致出奇的地理形貌。傅增湘在《游百花山记》中谈到黑龙关村时说：

……黑龙关，冈峦回互，峡气阴沉，宛行夔巫道中。关外龙王庙，雄踞石壁上，碧石献压其冠，清流啮其趾，尤为胜观。

再看周肇祥《游百花山记》一文：

……班各庄……其北溪路渐狭，两山亏蔽，气象阴森，山石如截木，层累叠积，数里不断。遥见一山覆釜，神祠当其隈，曰龙神庙。下为黑龙潭，深黝不可测，网罟不敢入，风过闻水腥。元明以来，禱雨辄应。

最能对黑龙关村景致给予形象描绘的还有凌直之的《说游百花山》：

又四里过黑龙关，二里到龙神庙。庙后靠着面（疑为“南”字之误——笔者注）港山，前对后岭，左有大坨山，右有烟筒（疑为“囱”字之误——笔者注）山，这些山名皆是土人说的，是否的确，尚待考证。看这四山包围里有个地方广数里的黑龙潭在其中，水光碧绿。远看龙神庙的殿阁高出浓阴浅黛的树林，返照在潭水之中，好象到了西湖的里湖边上，在湖光倒影中看见留余草堂弥勒院坚瓢别墅的崇楼杰阁一样。这种美观，更不料在北方游山时得之。

### 三

在房山地区，尤其“河套沟”一带，一直流传着有关黑龙关村的种种神奇传说，这在六先生的游记中也记载了几件颇能引起旁人遐想的故事：

昔范阳卢文进，与李存勖战败，夜走马坠涧中，才及水一跃而出，即此处也。二里黑龙关，古称险隘，驻兵设防，但余废垒。北曰白城湾，相传刘盆子称帝时筑城山上，其下惊波洄湊，穿岩啮岸。土人云，昔白龙与黑龙斗，不胜，抉石去。有过骑坠鞭，于孔水洞得之……（周肇祥《游百花山记》）

文中所提“范阳卢文进”事，在《日下旧闻考》中也有类似记载，是否确有其事，只是现已无从考证了。至于“二龙相争”事，虽是人们的一种想象，不必深究，但也多少能从中看出黑龙关村的那种神奇氛围。再看下面一段：

辛亥二月二十二日，凤集岩畔，百鸟随从，天日为蔽，鸣声铿铿，逾时乃去。凤兮凤兮，何得之衰也（周肇祥《六日山行记》）。



按文意，文中“辛亥”年“凤集岩畔”事，应为公元1911年发生的。同样引人入胜的事情在清初雍正年间也出现过，只是地点在今燕山地区的凤凰亭一带。下面是清人汪启淑（1728—1799，清代歙县人，浙江盐业富商，官至工部都水司郎中）所著《水曹清暇录》中的记载，或许对读者研究黑龙关村能起到参证作用：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日卯时，有凤凰集于房山石梯儿沟山峰上。高约五六尺，尾长丈许，五色具备，文彩绚烂。伫立逾时，向东北翱翔而去。见《畿辅通志》（《清暇录》第26条）。

#### 四

“游山专号”中除上述内容外，还有关于对黑龙关村村制沿革的介绍：

我们渡潭宿入庙中，殿前有元碑一座，碑文是欧阳玄撰的，字是杨德庸写的，碑额是周伯琦篆的，立于元朝至正十四年十月。养庵已将碑文全字抄下，我仅把碑额上所篆的“大都房山县大安山创建黑龙潭庙记”十五个字记下而已。现在这个庙是圣米石堂的下院，又为佛子庄黑龙关班各庄陈家台四村所共管。就中如龙潭村（黑龙关村）乃属宛平县管辖，大有“特别区域”的样子。我国行政区域，如省的分配，出于“犬牙相错”，系从消极的牵制以防省有变化。此因政治上时代的关系，不得不然。不料小至一村，亦有此等怪象，何以热心谈自治者。仅此区区，还不能把他厘定一下子呢？……（凌直之《说游百花山》）

黑龙关庙中之元碑至今犹存，“专号”中除对其有文字记载之外，尚附有一幅十分珍贵的碑刻拓片。即便单单从文物价值考虑，“专号”就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实证。有见识、感兴趣的方家应当能从中获取更有价值的信息。

至于文中所提黑龙关村当时为房山县属地，却为宛平县所辖，这是我国一种十分特殊的“插花飞地”现象，并非仅黑龙关村一地所独有。当时仅在房山地区就有黑龙关村、车厂村、西庄、坟上村、沙峪村等五村属于这种情形。有关这方面的情况，笔者已有专文论述，不再赘述。

#### 五

黑龙关庙自元至正年间建成后，一直成为方圆百里百姓祈雨之胜地，周肇祥先生的《六日山行记》对此有一段详细记载：

二里黑龙关，一里龙神祠，踞潭上。元至正十年，中书平章政事搠思监奉诏留镇。五月至六月不雨，遣留守司都事萨理弥实奉香币，与玉虚宫张真人门徒明道洞微大师毕辅贵往祷。明日龙见，大雷电以雨，畿甸沾足。因募众财，叠石筑坛，庙而塑像。十四年夏，又旱，复遣萨理弥实往祈，并嘱翰林学士承旨欧阳玄为庙记。玄病暑痢，强起默祷。丙午大雨，己酉又雨，岁有秋。玄疾亦苏，乃记以文。又为迎享送神之诗，刻于石。书之者，房山县儒学教授杨德庸；篆额者，崇文太监周伯琦，可称三绝。碑阴刊官吏道教耆老助缘人名，不知何年倒地，重立乃反树也，归当遣人拓之。殿有清雍正御笔“甘泽普应”额、乾隆四十四年修补碑记，高阳县生员常尔玉撰。谓明万历三十一年，邑侯李公忧旱，祈祷获雨，邑人颂龙君之德，书诸石，遍访不得。寺左右皆道士坟，形类方塔者，意是元代造。无碑，砖上划有“谢道师”三字。与诸君坐潭畔磐石，看群鸭游泛，绿波白羽，天然幽睹。既而山气渐合，暮色苍然，返祠治饭。祠为班各庄、陈家台、李各庄、南涧村所共管。以其颓废，将事修饰。为莲花下院，纠首集议于庭。蔡道士捐银二百，遣其徒李理明经纪之。理明为道沿河口大悲岩之胜……访以房苑之胜，夜深始睡。三十日，早起，李道士复与言龙君轶事，以重修勒石之文见属。余念人民苦兵忧旱，待泽孔殷，愿乞霖雨，为我濡笔，当撰记以继圭斋后……

## 六

黑龙关村虽为房山境内一处极具地方特色之地，但各种史料关于此村记载非常稀少，而诗记作品更是难得。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看，除了明代著名学者李濂游历黑龙潭庙时留下一首诗作外，似乎就是“专号”中保存的6首作品了。先把李濂的诗作抄录如下：

阴云袅袅黑龙湾，瑶草丹崖不可攀。  
越客漫夸天姥胜，渔阳还有大房山。

“专号”中所录的6首作品，用笔沉着，沉郁苍凉，是对黑龙关村沧桑的历史真实的写照。限于篇幅，最后把这6首诗作全录下来，以为读者提供一些研究黑龙关村的素材：

宿黑龙关（傅增湘）

群嶂侵天落日昏，涧流之子啮岩根。

阴森云气龙沉壑，浩渺春波鸭到门。  
蜀客疑通巫峡路，遗民犹痛石壕村。  
重来系马荒祠下，细读残碑剔藓痕。

黑龙关（江翼云）

野渡无舟乱石横，麦苗短短醮波明。  
破残壁垒高峰上，曾住沙陀父子兵。

宿黑龙神庙（江翼云）

暮抵黑龙关，当门水一湾。  
盘桓松下石，梦寐峡中山。  
店少依僧宿，诗多醒酒慳。  
元碑犹可读，细与剔苔斑。

与李道士理明夜话（周养庵）

山中良夜喜盘谈，头白道人今李聃。  
浪说朝天曾落凤，宵深有梦定先探。

黑龙潭神祠读欧阳圭斋撰碑

李道士以重修记文相属因赋（周养庵）

苦兵忧旱甚于焚，千里残黎望泽殷。  
愿乞龙君三日雨，好为濡笔继斯文。

抵黑龙潭久旱望雨（凌直之）

一临潭水快无涯，谁使长河涌白沙？  
宁独游人皆苦渴，龙君惜未到人家。

总观这册民国年间的“游山专号”，虽区区几万言，却数处涉及黑龙关村，其对研究该村历史提供的参考价值自不待言。况且此本颇不易得，遂专撰此文，做些介绍。希望能引起更多关注者的兴趣，从而让世人意识到，在首都北京，还有一个尚不为人知的独特村落。

# 一册未能出版的《房山人民公社史》

张广明

上世纪 50 年代末，曾听说过市里派人来房山总结大办人民公社的经验。计划编写一部“公社史”，当时只是听说，后来没有消息。接着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四清”、“文革”，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更不知道结果如何。四十多年过去了，是否确有其事，又是怎样一个历史背景，成书与否，作者是谁？至今似乎还是个“谜”。

最近我在 2004 第 46 期《文摘周报》“解密”专栏上，读到一篇署名黎虎写的《钱钟书女婿自杀真相》的文章，从中得到了一些重要线索。

文章中披露了这样一段史实：1959 年秋冬，黎虎和他的同事王得一曾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派去北京郊区的房山县编写公社史。并说王得一就是钱钟书、杨绛的女儿钱瑗的丈夫。这引起我极大的关注和兴趣。下面我把黎虎文章中的一段文字抄录如下：

钱瑗的前夫王得一与我是北师大历史系的同年级同学。大学读书期间，他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四年中他先后担任过班长和班主席。1959 年 7 月毕业时，我们两人一起留校，在历史系当助教。他参加工作不久就承担了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任务，课讲的不错，颇受学生欢迎，这与他的勤奋有关。大概第二年他就承担了一个学期的课程，这在青年教师中是很突出的。他也善于为文，大约 1959 年秋冬，我们一起被历史系领导派去北京郊区的房山人民公社编写公社史，共同“战斗”了半年之久，主要是由我们二人执笔写成了一本十余万字的“房山人民公社史”，油印成册，不过后来并没有正式出版。

这段文字证明了编写《房山人民公社史》确有其事。作者就是王得一和黎虎二人。时间大约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的半年时间。

涉及到钱瑗夫婿的记述，黎虎认为主要是在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中。我也查阅了杨绛的《干校六记》，了解到杨绛称女儿为阿圆，女婿为得一，他俩同在一校而不同系。文革中，钱钟书下放劳动，出发时全家送行，看到王得一主动帮助行李多的人时写到：

默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和善忠厚，阿圆有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

关于王得一自杀，杨绛在《干校六记》中是这样写的：

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的时候，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得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得一已回校，阿圆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日回家。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人宣传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

黎虎先生因为和钱瑗伉俪都很熟悉，了解个中真相，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是为了表示对故友的纪念，才写了这篇文章。没想到其中带出了编写《房山人民公社史》这段历史。我想如果能找到原稿或油印件的话，那将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资料。

# 房山的集市贸易与行会行语

王绍清

## 集市贸易发展简况

集市，为定期的贸易市场，是人类生产能力、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在商品交换较多的地方，就逐渐形成了集市。历史证明，集市是连接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纽带，是商业贸易活动的初级形式。自古民间就有赶集、赶场、赶墟之习俗。

集市产生于何时，无从考证。贸易交换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据《房山区志》载：“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曾出土货币一枚。经鉴定，产于黄淮流域以南之蚌壳，表明山顶洞人和远方原始人群已有原始贸易交换。”

商朝重视商业及集市贸易的发展。商民善于经商，后世将经商的人称为“商人”即起源于此。商都（亳）今郑州，商业繁荣，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之称。

西周在“工农食官”的制度下，商业由奴隶主国家垄断，在都邑中设有集市贸易的市场，并设有管理市场的“质人”。交流的商品，有珍贵的宝货、兵器、牛马、丝帛等物资，还有奴隶。奴隶的价格，据铭文所记，五名奴隶才值“匹马束丝”。集市大部以物易物，《诗经》中“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就是这方面的记载。《易·辞下》并有易货之市的记载：“日中而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当时集市贸易状况的描绘。战国时期，燕地商品经济比较发达，集市交换的品种比较丰富，主要品种有粮食、油料、丝麻、枣、栗、布帛、铁器、铜器、陶器、食盐、皮货、牛、羊、猪、马匹等十数类，流通范围广。良乡板栗，驰名燕地，为市上名品。为集市贸易之需，燕曾铸人铜币在市场流通。

汉代，商业通道四通八达，城市没有集市，匈奴远驱牛马与汉会市。史书记载，“富商人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蓟城贸易区的“市”都有固定摊位，兴建店铺。店铺悬挂牌匾，赶集赴市的行商及商贩挂着唤头，

为利少数民族进行交易，设有“胡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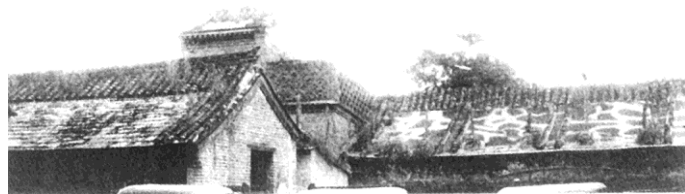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兴盛，商业繁荣，市场发达。交通要隘有私家店肆，备有“驿驴”供客商骑用，官府在市场内设官员管理集市物价、税收、“草市”（集市），还可按主要物品命名，如柴市、骡马市、米市、菜市等等。“草市迎江货，草市多樵客。”唐代商人足迹遍全国，“客行田野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蓟城为幽州，据房山云居寺石经记载有31个行业，店铺达千余家。

宋朝，打破商市与坊的界限，打破日中而市的古风，出现晓市和夜市，市内有娱乐的“瓦子”，集市有打把式、卖艺等。王安石变法，设有市场法，官府设立市易务，达到平稳物价。集市出现滞销货物，官府出钱收购，集市短缺时适时出售。限制商人对市场的控制，促进了商品的交流。行会组织进一步发展，农村集市发达的地区逐渐形成集镇，对集市行商收取商税。

元朝，减免商税，市场活跃，大运河开通，直达积水潭，商业中心有米市、面市、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鸡鸭市、皮帽市、绸缎市、珠子市、铁器市等。有三十余个集市分布在京师，最集中的有三处，羊角市（今西四附近）、枢密院角市（今东四西南）、最繁华的斜街市（鼓楼西积水潭北）。

明朝，实行轻税休民政策，在京师城内修建“廊坊”，招商居货，和代客存放商品的货栈，正阳门（今前门大街）成为繁华的“街市”。外地来京商旅结成行帮，兴建会馆，和接待外宾的会同馆。每年正月十五日灯节，有专门灯市（今北京灯市口大街）。

清朝，“重本轻末”，压抑工商，延缓了商业的发展。乾隆时期形成了文化市场，清中期帝国主义入侵，逐渐洋化，出现第一家东安市场，晚清时提出“恤商”政策，后出现天桥平民化市场。农村集市贸易活跃。



房山晋商隆福当(当铺)建于清代，光绪二十六年改为隆福局粮栈，图为后院粮仓一角（王绍清 提供）

辛亥革命后颁布“工商保息法”，推动了集市的发展，但军阀割据却阻滞了商品交流。后国民政府南迁，燕京集市贸易衰落。

日本侵华后，日军统治区对主要物资实行经济封锁，对边区采取围笼政策，对统治区的群众实行配给制度，集市由新民会管辖，新粮上市，由日伪合作社

低价收购囤积。东北伪满实行“粮谷出荷”政策，农民要将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出荷，完不成“出荷任务”的户以“反满抗日”罪名，由粮谷出督班翻箱倒柜，抢夺粮食。是时，集市是有集无粮。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投机盛行，交通受阻，坐商面临倒闭，集市贸易奄奄一息。

中国共产党对集市贸易非常重视。1947年12月，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制定了对工商业的政策。陕甘宁边区宣布“免征商业税”。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发展工商业指示中，明确边区贸易总公司主要任务是活跃市场，平稳物价，不承担财政任务。对边区集市贸易加强了领导，活跃了边区经济。

抗日战争时期，为冲破日寇的经济封锁，晋察冀边区政府在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合作事业，通过业务活跃了边区经济。房涞涿抗日政府合作社干部，主要通过涞水蓬头、赵各庄、房山、张坊、长沟、坨里等集市，输出大量山货，换取军用民需主要物资，经地下商品流通线，乔装巧运，解决了边区人民燃眉之急。解放战争时期，在十渡、庄户台建立了集市。北窖生产的卷烟为集市畅销商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力发展集市贸易，1955年全国有大小集市36000多个。据中央税务局统计，1953年全国牲畜交易共达2469万头，百分之九十通过集市农民之手。1958年公社化后，农村经济发生了变化，粮棉油由国营商业及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集市贸易一度萧条。195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明确规定集市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缓解了集市萧条现象。文化大革命时期，1967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下令坚决取缔自由市场，集市基本关闭。1979年改革开放，集市贸易复苏，80年代末、90年代初，房山集市贸易旺蔚如潮。1982年粮食成交量105.6万公斤，1994年粮食成交量300.3公斤，蔬菜5049.1万公斤，干鲜果品1568.3万公斤。集市成交总额3.73亿元。

## 房良集市

房良地区人口密集，地域广泛，集市颇多。

琉璃河古称燕古店，与燕都董家林隔河相望，是燕都水路码头，系四方官员客旅朝会落脚之地。水陆方便，汇集了南北商品，集市贸易蔚然勃发，商家



栉列，帆樯鳞集。据志书载，当时，初二、初四、初七、初九、十二、十四、十七、十九、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七、二十九为集日，是燕国集期最多的繁盛集镇。春秋之际，停船装卸货物的船只长达十里之外，集日车马盈市，摊贩比肩，陆海百货，萃于其中，七里八乡赶集上店的人可达数千。集市以粮食为大宗，其次为仔猪。清末民初，房山煤炭业踵跟而起，在琉璃河设灰煤过货栈达二十余家，水运京津保地区销售，自“引盐公廩”，益照临在此设立盐业总店，马骤车驰，络绎不绝。轮蹄之声昼夜不停，白天由警务局指挥船只，黑晚由商团巡逻。由于业务量大，为携款之便，创办了“河票”，每到集日，仅锦福隆、大成公两家商号，收支河票达百张。

良乡燕国向北扩展疆域，董家林都城逐渐失去了中心位置，遂迁于蓟。蓟城（今北京广安门地区）内控中原，外扼塞北，为南北交通要冲，是北方贸易中心。各地土特产品，通过集市互相交换，市场上有南方象牙、塞北的马、东海的鱼盐、西凉的皮货。由于商业贸易及集市的发达，官府在市场内设有管理人员。良乡一片沃野，与蓟相邻，交通与自然条件良好，为京南第一驿站，商旅云集，集市繁荣。良乡有悠久的历史，早期出版的“六言杂字”课本上曾有“汾露烧酒良乡”字样。集市贸易的手工业及工业品，大部来自京津，故行商较多，集日以粮为大宗，次之杂货，经行商收购后，运往京师。据清康熙四十年良乡县志载：县城初一、三、六、八、十一、十三、十六、十八、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六、二十八为集期。

房山康熙三年（1664年）志书载：房山城四街轮市，每月四集，逢二北街，逢四东街，逢七西街，逢九南街，南北大街两侧商号林立，经营者多为晋商，隆福局粮行设在北街，资金雄厚，传说可屯粮千石。清末民初，灰煤业发展，集市以粮食为大宗，次之杂货、牲畜，另有盐业专卖。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修筑护城壕，仅南关设有车马人行通道，集市迁至南关壕外（今华冠处），集市衰落。建国初期，集市迁至城内，上市货品琳琅万千，车涌人流，前熙后攘。

**长沟：**长沟位于房涿之交，与贡米产地毗邻。集市以粮菜为大宗。贡米闻名于华夏。附近群众婚丧嫁娶来此购菜。每逢春节，鞭炮齐全，二、四、六、七、九日为集期。

**张坊：**张坊为拒马河出山之口，南通来涿，北达三坡，有张坊城之称。集市以干鲜果品、木炭、香料、荆条、檀木、石磨、药材为大宗，民国时期逢一、四、六、九为集日。

**石窝：**大石窝坐落在房山西南六十里处黄龙山下，盛产大理石。其石质地优良，储存丰富，品种繁多，开采历史久远，可追溯到汉代。历代朝廷兴建皇宫、寺庙、灵寝、牌坊、御路桥梁，所用精美石料大多来自此处。据史料载，随着石料开采量的增加和石匠、差役的增加，石窝逐渐形成了一个管理机构叫镇。镇中心的街道叫官厅街，官厅街东西各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东道称东店，西道称西店，东店当时店铺林立，曾一度成为各种商品的集散地，日久成为集市。集市以日用百货为大宗。

**坨里：**坨里位于大石河出山之处，自高线运煤，良坨铁路开通，坨里成为煤的集散中心，有煤栈 24 家，西部山区有煤窑数座。加之土地瘠薄，粮食产量低，集日以粮食为大宗，蔬菜次之。抗日战争时期，平西抗日根据地敌工人员借集日之际，与敌占区地下工作者接头，了解重要情报。每旬三、八为集期。

窦店、交道均为交通要道，集市以粮食为大宗。周口店、大韩继、南窖、河北、石梯等地集市曾兴繁一时。

## 行会组织

房良行会组织从京津保、山西、江南流入。宋朝工商业的同业组织由各业的祖师神会发展而成。房良两县集镇手工业与商业的行会组织，无截然界限。如粮油杂货业为财神会，屠宰业为张爷会，药铺业为药王会，酒酿业为杜康会，黑白铁业为老君会，木匠为鲁班会。民间盖房，石、瓦、木匠同桌用餐，石匠为上。煤窑供奉窑神爷，为窑神会。这些组织均是商务行业的前身，商业行会的目的在于维护同行业利益，会首由当地富商大贾担任。

据史料载，房良两县民初建立了商会组织，取代了行会。会长均由地方知名人士担任，由政府领导。建国后建立了工商业联合会，会长由工商界自己选举产生，政府委派秘书长。

## 行当行语

房良两县集市行当主要是斗行、牙行、脚行，旧社会一些商贾通过行栈牙记以行语（行话暗语）进行贸易而获暴利。

斗行，农民装粮时，粮商将手伸进口袋取粮，捏粮成团（粮行基本功），以显示粮食湿干。二次在从装粮的口袋底部取粮一把，双手合拢一搓，摆于掌

心，使其出现碎粮糠屑等杂质，目的是杀价，又使菜粮者心甘情愿。侃价成交，开“非子”（条子）送粮行。过斗时，粮行又要做手脚，首先粮行伙计敞开口袋，把口袋抬高将粮冲进斗内，使粮扎实无隙，划尺时成馒头形。除此之外，还备有私置斗，并有一套暗语等，以使粮行能牟取暴利，粮行收受粮食时，由掌柜用暗语告诉伙计，用什么斗等。暗语是，九折斗叫“由号”，九五斗叫“由吉”，九八斗叫“由发”，十足斗叫“十月”等。民国初年县衙在集市设立官斗。

南北杂货业有价格暗语，吉为一，如为二，甘为三，利为四，果为五，竹为六，新为七，法为八，有为九，王为十。牙行，本身不备资金，不作买卖生意，专为客户收理。在集市的牙子有两种，一是跑街的为买卖双方搓和价格，二是有专业技术为人牲畜交易的牙子。其身着与众不同，身穿大褂，为捏价方便，袖口特别肥大。卖方先找牙子看牲畜毛眼，看口齿，如六岁口为壮畜，七岁口为中畜，八岁口为老畜。初定卖价，有卖者由牙子做中介，与买卖双方用手在袖口“捏价”。脚行，主要为粮行商家装卸搬运，由当地有名声的人担任脚行头，每日晚结帐按三七开，头三劳七。

旧社会除行当暗语外，对行业从业人员分为三六九等，有上九流、下九流之说，上九流是：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问卜四堪舆，五流丹青六流匠，七僧八道九琴棋。下九流是：一削（修脚的）二拍（搓澡的）三吹（吹鼓手），四打（打铁活）五采（弹弦卖唱的）六唱戏，七差人八剃头九娼妓。建国后，为改造旧集市，繁荣市场，由政府委派干部组成集市管理委员会，取缔行会暗语、牙记，实行明码购销，和公斗公秤，计量由政府管理，物价由供销社物价科掌握集市行情，对赴市商贩公平交易。

# 房山的民间花会

王梦麟

房山历史悠久，民俗质朴，民间花会流行时间长，上可追溯到金代。据人回忆，房山的花会就有上百道之多，相同一道花会就有二三十道。一年中各种庙会不断：新春正月有春社，六月十三日有青苗会，七月十五有中元城隍出巡，十月十五下元节有迎瑞雪、求雨、谢雨等各种庆祝活动。

房山城因是县城，旧时每有大的活动，各灯花会从四面八方涌来，集于城关，成为全县少有的热闹景儿。

房山名气较大的花会有南关杠箱会、北市炮会、顾册吵子会、银音会、周口村少林会；支楼银音会、牛头虎；黄山店大鼓会；大次洛叉会；芦村杈子会、少林会；苏村小车会、孤山口旱船会；瓦井、辛街、坨头、河北、长沟峪高跷会；北街铜锣会；天开、西甘池太平鼓会、龙灯会、狮子会、跑驴会、礼佛会、好佛礼、大头娃娃会、大肚和尚斗玉翠、猪八戒背媳妇。民国后添秧歌、腰鼓。

杠箱会为群会之首，以祈福敬神为内容。表演进贡钱粮时，表演者抬八个箱子和两个杠子，表现出各种高难动作。

炮会以民间自制铁杆、铁筒、炮药上街边走边点放。

吵子会以民间打击乐器为主的乐队。

银音会（音乐会）民间音乐会社，主要乐器有银锣、笙、管、笛、钹、镲等，谱曲上百种。

铜锣会以 8 面大铜锣为主的乐队。

大鼓会主要器具有大鼓、沉子。大鼓都是双数，有 8 面、12 面、16 面等。

少林会民间武术会社，以武术表演为主。器具有刀、枪、剑、戟、斧、钺、钩、钗、镗、链、槊、棒、鞭、铜、锤、抓、拐子、流星等十八种兵器。

大次洛村的叉会以目连僧救母（化游山）、五鬼捉刘氏（刘清提）为题材；卢村的叉会为化妆表演，取魑魅魍魉人神共诛之之意。

好佛会、礼佛会以磕头顶礼膜拜、焚香、念佛号、念佛经为内容，并有雅乐伴奏，此会多来自僧尼和佛教居士。

小车会小姐坐车，老翁推车，老妇拉车。小姐在上面稳重端庄，脚在下面照常行走，车身来回晃动。车两旁有12个随行人员，配合小车动作伴舞，有乐队伴奏。

旱船会旱船为陆地行走的“船”，船两头有掌舵的，中间女子坐船。虽说是坐船，下边脚照常行走，船在行走，任凭风浪晃动，坐船人安然无恙，船两边各有6人，像在岸和水里女子戏耍，也有乐队伴奏。

无论是坐车、坐船的少女小姐，表演者在上面稳坐，下面独立行走，有“坐一天车船磨两脚泡”的说法。

狮子会狮子两个人扮，小狮子一个人扮，狮子头用牛皮做成，狮子头的眼珠、嘴都能活动。狮发长飘，脖颈上有缨络和铜铃铛，大狮子分红头、青头、黄头、绿头，表演滚绣球、上桌子，互相打斗。一般2只或4只大狮子表演，多则6只、8只。又有比大狮子多一倍的小狮子围狮戏耍。

牛头虎一般一头牛由两个人扮，一只虎由一人扮。少则一牛二虎，多则四牛、八虎。牛虎之间互相厮杀，互不相让，做出高难动作。

太平鼓用桑皮纸糊成带小铃铛的小手鼓，领头扮成杨香武、黄天霸，其余人浓抹重彩化妆，有节奏进行舞蹈表演。

猪八戒背媳妇以《西游记》题材为背景，唐僧一本正经，孙悟空机智，灵敏，猪八戒贪吃懒惰，沙和尚威武忠贞。同时有两三个老翁，四五个乡村少女，猪八戒不时对少女进行调戏，甚至抢过来背走，老翁追赶，孙悟空前来制止猪八戒，揪着猪八戒的耳朵跑。

大肚和尚斗玉翠是大头娃娃舞，带大头盔和尚与民妇戏耍、打闹，幽默、滑稽、可笑。

龙灯会夜间耍，以2条、4条、6条、8条巨龙的形式为主，龙头眼、嘴、都能活动，龙身全是灯笼，分外通明，上下翻滚戏珠（火球）。

跑驴会由东北二人转演变。骑驴的少妇前带驴头，后带驴尾，和赶驴人互相配合，有一对一的，也有骑驴人多，赶驴人少的，动作配合默契，整个场面欢乐活泼。

高跷会最为普遍的花会，房山就有十几个村都有。前面陀头手拿两根木棍，互相敲打。卖豆儿的手拿马鞭，渔翁拿手帕。蹦跳、打斗、上桌子翻板凳，以武功为主。以瓦井、辛街、坨头为最佳。

腰鼓会来自陕北，房山地区在民国年间出现。

秧歌多种，来自陕北、东北，形成多种表演形式的秧歌，成为参加人数最多的群众性娱乐健身项目。

民间花会来自广大人民群众之中，蕴藏着丰富的民间智慧和艺术，有超高表演形式和水平，体现了当时当地的民风民俗。

# 杏园村名的由来及其它

潘惠楼

杏园村，是房山区河北镇的一个行政村，位于大石河河套沟的横流水支沟内。横流水沟内分布有杏园、口儿、他窖、南道四个行政村。民国年间，沟内四个村庄各居各地，彼此之间距离近者一华里，远者则有四五华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位于横流水沟内的京西矿务局房山煤矿采煤需要，对部分采空区所在地的村庄及房屋进行了搬迁。至上世纪的 60 年代末，四个村庄的房舍几乎连在一起，有的地方还交叉错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致使外来人很难区分清楚。横流水之名是因此沟之水与大石河成直角相交，故大石河河套地区谓之横流水，沟内村庄则被统称之为横流水村。

杏园村村域范围，主要在横流水沟的东部。北邻南道村，西邻口儿村，东邻南车营村，南邻羊耳峪村。村域南北长而东西短。南北最长可达十华里；东西最宽处五华里，东西最窄处不足一华里。杏园村的房舍聚落呈散列型，点缀在村域面积之内。民国年间的聚落点，由东往西分布有天槽、红煤槽、赵嘴、上杏园、老虎园、东台、王横街、老蔡家、潘家楼、西大地等处，非常分散。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搬迁调整，至 60 年代中期，聚落点基本定型为王横街、老蔡家、潘家楼、东台、下杏园、东大地六片，聚落房舍基本连成一体并向集中方向发展。杏园村的村委会，位于横流水沟四村的中心地带潘家楼，距河北镇政府 2.7 公里。

在杏园村的聚落点中，年代最为久远者为老虎园。据村中相传和久居老虎园的唐姓后代介绍，唐姓是到横流水落户的最早居民，至今已传至第十九代。当时唐姓先祖从山西到此安身时，横流水尚无常住居民。唐家的领地界限为“南至南山尖，北至大河边，西至胡椒岭，东至风口鞍”。南山尖即今日的南大山，为横流水的第一高山，也是横流水的主发源地，海拔约 1000 米；大河边即今日之大石河畔；胡椒岭即今日横流水与西部英水沟的分水岭；风口鞍即从城关镇羊耳峪村去横流水的第一道山梁。唐家先祖的领地大体上也就是今日横流水所含的地域。

继唐姓落户老虎园沟之后，与老虎园沟仅隔一道小山梁的杏园沟也迁来居民，并在杏园沟的沟头山岗上逐渐形成村落，老虎园沟也成为杏园村的聚落点。据《房山区地名志》载，杏园“明已成村”，可说是横流水沟内最早的村庄。当时的杏园村地点为今日的上杏园所在地。据上杏园娘娘庙中清代铁钟铭文记载，建娘娘庙捐款的村人姓氏中，朱姓、李姓占了大部，蔡姓、潘姓、宋姓、唐姓、王姓、崔姓、张姓都有。在上杏园的地名中，还有一个小小的山沟称为米家洼，据说是米家人曾在此种地。在杏园村的蔡姓中，据说是三家蔡，并非同祖同宗。在杏园村的李姓中，共有两家李，也非同祖同宗，其中的一个李姓家谱记载，传至今日的“树”字辈，已是到杏园的第十一代。杏园村潘姓家谱记载，传至今日的“宝”、“希”、“惠”、“树”字辈，都是到杏园村的第十代。杏园村民的姓氏之多，家族传承，也可印证杏园明代成村有据。

杏园村名来自上杏园，上杏园坐落在杏园沟的沟头山岗上，地窄山狭，何以在横流水内较早形成村庄，是由上杏园的地理位置和物产所决定的。过去从平原入大石河谷进山区，受河水影响，交通十分不便。而上杏园向东下山即是羊儿峪村可直入平原。站在上杏园的山头上，可望见房山县城和良乡县城。上杏园村虽然在横流水沟的支沟杏园沟内，但采购商品则以去房山县城为主，其经济交往也与东面的城关镇联系较多。在上杏园，往东有驮道经羊儿峪村可达城关镇，往东北有驮道经南车营村可达大石河的出山口坨里镇，往北有驮道出杏园沟沿横流水可去河北镇，往西有驮道经老虎园沟、晒台沟、口儿沟进入英水沟再进深山区。旧时，上杏园虽地窄山狭，但煤炭资源丰富，交通比较方便，每日运煤、运山货的驮队络绎往来，致使上杏园一度发展成为横流水内人口较多、文化比较发达、经济比较繁荣的村庄。

杏园村的村名由来，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得于杏树。但如何得法、是否得于杏园，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种说法是杏园村之名得于居民以种杏为业。此种说法见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房山区地名志》，其记“杏园村”词条中有：“《日下旧闻考》引《北游纪方》云，‘车营岭小冈叠阜，起伏连绵，居民以种杏为业，环十数里，峰头涧底，皆是杏林，’所云当即南车营一带。”笔者自小生长在杏园村，自认为对杏园村地理比较熟悉，杏园村的坡坡岭岭，确是杏树繁多，杏树的种类也很多。但杏园村之杏受土地限制，很少人工栽培，多是山杏，多是苦核杏树，多是自生自灭。虽有杏林却不成规模，能够成片生长者，每片也不过几十株而已。至于成为杏园，则名难符实。当时的杏园村所在地为上杏园，绝少平地，即是



近三百年后的今日，最大的梯田，也不到一亩。而南车营村与上杏园交界处，山势峻峭，多为荒山石田。杏园村的村民，主要以采煤为生，兼以耕种薄田度日。无论传闻还是记载，迄今尚未发现有杏园村村民以种杏为业者。《北游纪方》中关于车营岭居民种杏为业之记载，笔者认为所云当即北车营一带，似乎更为合适。北车营在房山区的坨里镇北部，距南车营约十五华里，山头隔大石河与南车营相望。北车营村的林果产品，种类繁多，果品优良，是村中主要经济支柱。村中种杏者颇多，其中“五月鲜”杏，在五月即可成熟上市，在京城久负盛名。

那么，杏园村名由何而来，笔者认为应与杏园村的采煤有关。在上杏园的地下，蕴藏有丰富煤炭。杏园村的采煤史，笔者所见有明确记载的可追溯到清代乾隆年间。

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总管内务府奏销档》中，有一则顺天府处理的杏元村煤窑官司。记载在乾隆三十三年间，居住在北京城内的张进良雇人在杏元村村民蔡兴地内开挖三合槽煤窑，因利益问题，投资人与开窑人发生纠纷，经房山县与顺天府的多次调查，最后上奏朝廷，使涉足其间谋利的数十人受到处理。此案件中记载的杏园村为杏元村。

在黑龙关村的龙王庙内，现存有一方碑刻，为乾隆四十四年《修补龙神庙碑记》，记载重修黑龙庙时，附近村庄、煤窑、商号、民众捐助款项，其中有“核桃树窑钱壹仟，大南坡窑钱五百，通盛窑钱壹仟伍佰，杏树窑钱伍佰，西安村、蚂蚁槽村、上英水、查儿四村共钱拾叁仟，下胳膊窑钱叁仟，核桃树窑钱叁仟，塌窖村，杏园村，嘴霸窑钱贰仟，榆树窑钱贰仟，上白利窑钱壹仟，椿树窑钱壹仟，大成窑钱壹仟，风口槽窑钱叁仟……”。可见，杏园之村名在清乾隆年早已有之。

杏园村名由来，当地人多认为是开煤窑演变而成。因当地是煤炭产区，村里及周围的许多地名由来都与采煤有关。有的从煤层名称得来，有的从煤窑名称得来，有的从地形情况得来。在上杏园的附近，与杏园沟并列的几条山沟都产煤炭。最东边的风口鞍山梁下，名为红煤槽沟，因此地产红煤而得名，至今仍有城关镇民人在此地开窑采煤。风口鞍山梁之西，名为大槽沟，是南车营沟的上部，因此地产大槽煤而得名。旧时煤窑众多，1926年，济伟煤矿公司曾在此开矿，现有房山煤矿的大槽沟风井；过大槽沟的西山梁，即是杏园沟，此地也是煤窑众多，旧有杏树窑，规模较大。旧时许多煤窑之名，往往以窑口所在地之标志命名。窑口有杏树者名杏树窑，有桃树者名桃树窑，有椿树者名椿

树窑，有榆树者名榆树窑，有梨树者名梨树窑。因以树命名者众多，久之则舍去树字，直接称谓，将杏树窑说成杏窑，将桃树窑说成桃窑。杏窑之窑与杏园之园，读音相似而字不同，久之杏窑转化成了杏园。或是杏树窑转成了杏树园，又简称之杏园。今日的杏园沟内，仍有河北镇镇办煤矿在此采煤；过杏园沟西山梁即是老虎园沟，此地旧时曾有较大煤窑名为老虎窑。老虎园沟是由老虎窑沟演化而来；过老虎园沟再往西过山梁，还有蚂蚁槽沟，是英水沟的上游。蚂蚁槽沟产的煤如麻叶形状，即称为麻叶煤，后写成蚂蚁煤，此沟内的村庄，名称曾为蚂蚁槽村。

杏园村名来源于杏树窑，还有一说是，当今的杏园村民，仍保留有杏窑的口音，称杏园为杏沿儿或杏窑儿。当地人也将老虎园沟称为老虎沿儿沟或老虎窑儿沟。当地人认为，古时，此地有杏树园还勉强，此地有虎园养虎则不可能。既然没有杏树园，杏园村名就无从谈起；既然没有虎园，老虎园沟也就缺少根据。而此地有杏树窑、有老虎窑却是实实在在的，地名由煤窑得来是有据可循的。

而随着大石河谷交通的改善，横流水的经济中心也逐渐下移，许多居住在杏园沟沟头山岗上的居民也逐步向杏园沟口发展，其中，潘姓从上杏园的沟头来到杏园沟口居住，形成了潘家楼、东台、西大地等聚落点；蔡姓从上杏园的沟头来到杏园沟口居住，形成了老蔡家聚落点；宋家的一部分迁入了横流水内的口儿村地界，一部分迁入南车营村；李家的一部分迁入了大石河畔的新庄村；唐家的一部分从老虎园沟迁入了横流水的口儿村地界；还有一部分村民向东迁入了城关镇的羊儿峪村、朱各庄村等地。坐落在杏园沟沟头山岗上的上杏园逐渐失去横流水内大村的地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政府将位于杏园村黄院沟内的煤矿接收。1949年，这所煤矿移交平西煤矿公司，后改名为房山煤矿。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房山煤矿将横流水内杏园村、晒台村划为采空区，为保证村民安全，对杏园村的上杏园、老虎园等聚落点和晒台村进行了整体搬迁。其中，居住在晒台村的村民大部分搬迁进入大石河畔的河南村，少部分并入了口儿村，晒台村的大部分土地也划入了口儿村上。杏园村以农业户口为主的大部分村民和老虎园的村民搬迁至杏园沟口东侧，其聚落点称为下杏园，而将原住地杏园村称为上杏园，自此开始有了上杏园和下杏园之分：原籍在上杏园的房山矿工作人员及家属搬迁入住煤矿的阳房职工家属区，由于家属区的房屋与原拥有房屋面积相差较大，去矿工作的人员及家属有意见。1962年煤矿又将这批人重新安置在煤矿的东大地家属区，并按在村中的原有住房间数安置。但东大地的房屋质量

不好，经常漏雨，去矿工作的人员和家属仍然有意见。1967年，煤矿又在东大地的家属区空地为这批人按原有住房间数从新盖了房屋，这批人员在东大地又形成了聚落点。

到50年代末期，原属杏园村居住在上杏园及其老虎园、大槽沟、赵嘴、红煤槽等地聚落点的村民全部搬出，这些聚落点逐步成为废墟。杏园村的村民基本分布在横流水中部杏园沟口的潘家楼附近。

60年代中期，房山煤矿又对横流水西部高山上居住的他窖村进行了采空区搬迁，搬入口儿村与杏园村、南道村之间的珠玉沟口，使这四个村的建筑完全联成一体。

杏园村所在地横流水的其他三村，村名之来历也很意思。其一为口儿村名。在1992年出版的《房山地名志》中“口儿村”词条中记为：“清末称口儿村，又有黄流水之名，当地俗称恒流水”。此记载中，口儿村名来由未涉及；黄流水之名为横流水口音之误；将横流水写成恒流水则不通，因此水为季节河流，有时冬天干涸无河水；再是口儿村只是横流水之一部，并非是横流水全部，口儿村并非是横流水村。在横流水中上游的口儿供销社的市场附近，有横流水的三条支沟即老虎窑沟、晒台沟和黑牛沟之水在此交汇，坐落在此三沟沟口交汇处的村民聚落点被当地人称为沟口，久之形成村庄名曰口儿村，即口儿村名由来。其二为南道村名。《房山地名志》中“南道村”词条记为“清代成村，村址位于镇南原一条土道旁，故名。”南道村虽在横流水沟内，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以前，却是大石河畔河南村的聚落点。横流水下游进入大石河两岸旁的土地，旧时多为河南村所有，横流水进入河北镇的土道，旧时多走河南村的地界之内，因南道聚落点在河南村之南的路旁，故河南村人称为南道，这也是南道村位于横流水之北却名南道之原因。50年代的“大跃进”时期，成立人民公社走集体化道路，南道聚落点虽属河南村，但距离河南村远而与杏园村近，于是就近加入杏园村大队。“大跃进”后，划小核算编制，改为生产队核算，南道聚落点与杏园村的西大地聚落点合并在一起核算，后独立为大队编制，形成村的建置。所以，南道成村为50年代末而非清代。其三为他窖村名。《房山地名志》中“他窖村”词条记为：“清代成村，原为五个小村。名他了、窖儿、小岭、大西沟、高山，为便于管理，划为一村。”他窖村，应为塌窖村演化而成。塌窖村之名，在黑龙关村《修补龙神庙碑记》碑刻中就有记载，可见清代确已成村。当地人认为，此村庄产煤，在坍塌煤窑附近形成的聚落点，名称演化成“塌了”。塌窖村名是在划村时取塌了和窖儿各一字组成，此说不无道理。

但后人写成“他了”，以后又成了“他窖”，实在让人费解。

因《房山地名志》“杏园村”词条中涉及南车营村，这里也附及谈一下南车营村名来历的看法。《房山地名志》“南车营村”词条中记有：“明已成村，与坨里乡北车营相对而称南车营。”在“北车营”词条中记有：“元以前成村，因历史上曾于谷积山贮存粮食，运粮车队至此无法再行进，停下卸粮，村因而得名车营，又因有南车营相对而称北车营。”北车营的谷积山之名，在辽代就已有之。在北车营村灵鹫禅寺第二进院后檐墙下，现存有《大辽析津府良乡县张君于谷积山院读藏经之记》碑刻，还有元至正七年（1347）《大元敕赐上万古积山灵严禅寺碑》，均记有谷积山院和上万古积山，并无北车营村名记载，说明谷积山当时属上万村。在灵鹫禅寺及附近还有明正统五年（1440）的《敕赐灵鹫禅寺兴建记》碑和明成化年间的《敕赐圆通寺创建记》碑，也无北车营村名的记载。由此可见，北车营村成于元代以前，尚根据不足。

北京乃至房山地区，都有许多以“营”字命名的村庄。其中许多带“营”字的村庄都与驻军有关。仅在房山区和丰台区，就有东营村、西营村、晓幼营村、后甫营村，等等。在《房山县志》中记有：后甫营为烧灰之地驻有官兵，因名后甫营。元、明、清建设北京城，都曾在丰台区大灰厂和房山区北部一带烧制大灰，派有大批驻军和犯人从事劳动。由此，笔者认为在大灰厂及其附近以“营”字命名的村庄，多与在此地的烧灰军队有关。后甫营，应为军队的候补营之演化。晓幼营，应为车队中的小幼营之演化。车营，应是参与建筑材料或煤炭运输的军队。久之，军队驻地形成村庄，即称之为后甫营村、晓幼营村、车营村。而北车营村，南车营村，当是车营军队中各自以方位区分的驻地形成的村庄。由此，我认为北车营村应成村于明代。南车营成村还要晚于北车营村，也许是北车营村的部分人员到南车营落户形成。

关于杏园村、口儿村、南道村、他窖村和横流水村的村名来由，涉及到的南车营村、北车营村的村名来由，旁及的后甫营村、晓幼营村村名来由，乃是一家之言。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意在対地名由来进行深入调查，对地名文化深入研究与探讨。

# 房山特色小吃两种

王绍清

清末明初，随着房山地区灰、煤、石业的兴起，饮食行业踵跟而起，除“居”、“栈”、“馆”、“铺”字号的佳肴美食外，土色土香的民间小吃鼎盛一时，风味迥异。

## 油酥烧饼

油酥烧饼产于房山城关西北关秦记烧饼铺，距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据第四代传人秦国庆讲，其曾祖父秦德泰于民国初年从山东来到城关西北关张家店，由此油酥烧饼开始在房山落脚。其制作工艺和原材料是：用灶灰制作夹层抱炉，选用东街磨房头箩白面，南关油坊头槽花生油，按祖传秘方和面，用青砖砸芝麻去皮，放在抖盘上，再将烧饼坯子放在上面，双手巧劲轻颠。听到抱炉有喳喳声时，往炉膛上贴，看烧饼颜色焦黄取出，有土香味，口感酥、脆、爽口而不腻。一经上市，倍受喜爱。“广泰公”是当时名声比较大的一家以经营南味糕点为主的杂货铺。当得知油酥烧饼倍受人们喜爱时，就请秦家专门为之加工，销路极好。人们购买油酥烧饼，并不仅是自己吃，也用来馈赠亲友。当地习俗，小孩种牛痘十二天结痂为吉利，邻居亲友要送烧饼，原来都送里外两层皮的马蹄烧饼及麻酱芝麻烧饼，自有了油酥烧饼后，大部分便转为送油酥烧饼。不仅如此，红白喜事也可以见到油酥烧饼的身影，姑娘出嫁压箱的点心放上几块油酥烧饼，丧事灵前供桌上也要摆上一碟油酥烧饼。这种制作工艺，延续到第三代，后改为电烤炉。但和面仍按祖传秘方。秦家有个规定此方传男不传女，故多年来房山仍仅有此一家，多年保持秦记油酥烧饼味道。

近几年，每逢佳节，市内电话预定烧饼，有的馈赠亲友，还有的带到美国、香港等地，使油酥烧饼驰名中外。

## 驴打滚

驴打滚，俗称糖糕，产于城关南关村“罗记”，其制作精细，将黄米或黍米用石碾碾成细面，温水拌匀，放入特制瓷器内，名为“糕镜”。糕镜，大者径宽一尺五寸，深八九寸，底部有密布网眼。稳在铁锅上，注足水，糕镜上盖浆蓬。用旺火烧糕镜下面的铁锅，水蒸气喷在浆蓬上产生草香味。面熟扣在柳木案板上罩布蘸凉水双手拍打，再将炒熟的黄豆面撒在案板上将面擀成圆饼形，放上红小豆馅，卷成卷，双手拉两头，来回在黄豆面上滚动，故为驴打滚。其色泽金黄，味道清香，兼有一点草香，口感豆沙，粘而不沾，闻名七里八乡。

制作驴打滚所用浆蓬草颇具有房山特色。山顶庙南侧三里处有座小山，底盘大，顶部尖，人称“浆蓬山”。山上的草被人们称为浆蓬草，长四尺左右，梅雨季节散发出浓浓的清香。秋季双孝村黄家将草收割，用青黍秸皮做经，编织成的浆蓬别具一格，现浆蓬已绝迹，罗记糖糕已不再是原来的罗记糖糕。

# 日本对京西煤田的调查

潘惠楼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占领我国东北，并不断向我华北进犯。在军事手段挑衅的同时，还派出大批军事、经济特务，到华北猎取情报，为侵略掠夺华北的宝贵财富做准备。北京丰富的煤炭资源，邻近东北和天津港口的优越地理位置，早就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垂涎，并妄图将北京作为日本的能源补给基地。日本军事特务和经济特务，极为关注北京的煤业发展，频繁流窜出入于北京，或公开或秘密地对北京煤炭资源进行调查。其中，1934年至1935年间，日本帝国主义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名义，对北京地区的煤炭资源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

此次调查，日本军方进行了精心准备，从满铁产业部、抚顺炭矿、北满经济调查所、天津事务所等部门和单位，抽调了一批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专门成立了调查队。组成人员有，满铁产业部矿业课职员河田学夫、森田日子次、堀内一雄；产业部矿业课雇员中村秋男、森井茂吉；抚顺炭矿职员铃木治助、舟越卯、和田繁松，抚顺炭矿雇员里村林吾，抚顺炭矿参事桑村松二；北满经济调查所雇员川崎笃则；天津事务所职员新田荣等。其中，河田学夫为调查队长，新田荣为翻译。调查队成立后，立即来到北京西部矿区，开展了煤炭资源调查。由于情况变化，日本军方和伪满洲国又先后派出多人参加了调查活动。

调查活动历时一年有余，足迹遍及京西的众多村镇和煤矿、煤窑以及北京、天津的煤炭市场，查阅了许多煤矿、煤窑的历史档案，对北京的煤炭质量进行了多次取样化验分析。至1935年末，调查队将在北京的调查成果汇编成册，铅印了《北京西山炭田调查资料》一书，收存有调查报告14篇。分别为，满铁产业部计划课冈本荣、渡来巽二人执笔的《宛平县斋堂炭田调查报告》，河田学夫执笔的《宛平县斋堂炭田调查报告》、《宛平县板桥炭田调查报告》、《房山县大安山炭田调查报告》，满铁产业部矿业课调查人员集体执笔的《斋堂煤矿公司经营计划大纲及意见书》，满铁产业部资料室村田久一执笔的《西山斋堂镇炭矿权益调查》、《房山县大安山炭田调查报告》、《房山坨里

公司(房山县高架运炭公司)权益调查》、《门头沟炭矿权益调查》、《宛平炭矿权益调查》《西山炭田杨家坨炭矿权益调查》，冈本荣执笔的《斋堂煤矿探矿报告书》、《宛平县板桥炭田调查报告(改订)》，满铁产业部矿业课竹山俊雄执笔的《房山县房山炭田调查报告》。这14篇调查报告，都对如何开发京西煤田提出了意见，有的报告还进行了开采论证。书中的绪言还专门介绍了斋堂炭田、板桥炭田、大安山炭田、房山炭田、门头沟炭田的煤炭储量、煤炭质量、交通运输等简况。

《北京西山炭田调查资料》的印刷为中文和日文混印，计有122页，约15万字。书前印有“极密”字样。为了控制使用，加盖有书册的序号印戳。书中还收录多种京西煤炭的取样化验分析表格，有房山运煤高线公司运煤销售契约、中日合办杨家坨煤矿契约、中日合办香山煤矿的契约等许多资料。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上了京西，对京西煤炭进行了疯狂的掠夺。正是依据《北京西山炭田调查报告》等经济情报，日本侵略军对门头沟煤矿和房山运煤高架线及京西运煤铁路实行了军管理，在板桥地区武力开采大台煤矿，在房山地区武力开采万盛煤矿，在门头沟地区武力强占宏福煤矿、利丰煤矿、杨家坨煤矿，将北京地区的优质煤炭源源运往日本和沦陷区，使北京矿区人民陷入沉重的灾难。

《北京西山炭田调查资料》一书，是日本侵华的铁证。尽管在日本有一部分人否认侵略历史，但历史是抹煞不了的。



# 霞云岭地区的“霸王鞭”

许冬梅 郑修华 王 晔

“霸王鞭”是近代民间广大城乡常见的歌舞表演形式，表演时可演唱各地民歌，形式生动活泼。据传秦末楚汉相争，项羽与刘邦相约：“先入咸阳者王之”。后项羽一路所向披靡，每攻下一城池，便站在马上，挥舞马鞭，高歌竞舞，舞至酣时，命士卒折木为鞭再舞，共同欢庆胜利。其恢宏之状，激昂之情，吸引和感染了当地百姓，百姓纷纷效仿。于是这种欢庆胜利的即兴舞蹈形式，就由军营传播到民间，逐渐演变为一种传统舞蹈形式。因项羽被称为西楚霸王，“霸王鞭”由此得名。

“霸王鞭”广泛流行于我国北方和中南一带，其中房山区霞云岭地区就一直流传“霸王鞭”这种歌舞表演形式。这里的霸王鞭是用一根长 1.1 米的木棍制作的，分别在木棍两端打两个孔，在孔内拴上铜钱，绑上一缕红绸或是花布条，舞起来时，发出的响亮的声音。舞蹈时以鞭击打或碰击臂、腿、肩、腰、背、脚心、膝、胯、肘、手掌等部位或地面，也可棍与棍碰击。步法有立、跪、蹲、坐、卧、行进、停留、跳跃等各种动作。击打动作有简单的四下、八下，难点的有十二下、十六下，复杂的有二十四下。有规律、有节奏地挥舞击打，形成一套跳跃、下蹲、转体、舞打的连续动作。随着跳动的步伐，发出整齐有节奏悦耳的响声，舞蹈队伍人数越多就越显壮观。

霞云岭地区“霸王鞭”与一首红色圣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着不解的情缘。

1943 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第六个年头。这一年 9 月，晋察冀边区抗联委派群众剧社 40 多人，组成若干小分队到平西根据地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当时 19 岁的曹火星和其他三位同志来到了堂上村进行抗日宣传，组织村剧团创作演出文艺节目。小分队利用当地流行的“霸王鞭”的民歌曲调填词，一连创作了几首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批驳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歌曲，最后需要一首明快有力的主题歌，就由曹火星来写。曹火星回顾抗战以来自己的亲身经历，激情满怀，受《解放日报》社论的影响，他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1950

年经毛泽东主席修改，歌名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词中“抗日六年”改为“八年”)作歌曲的名字，满怀抗日救国激情，经过五个日夜辛勤构思，反复推敲，一首鼓舞全民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歌曲就这样诞生了。这首歌写成后，曹火星等人以“霸王鞭”的表演形式教村里的儿童团员学唱。当时学打霸王鞭的儿童团共有8人，年龄从10岁到15岁，其中有6个男孩，2个女孩。他们是：李万代、李福会、李万深、任成宝、李万伶、李增生、安书香、安甫绵。儿童团团员学会后，再教村里男女老幼唱，随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广泛流传，“霸王鞭”的表演形式在霞云岭地区也广泛流行起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霸王鞭”被迫停演。

1994年，曹火星回到堂上村，为了欢迎他，堂上村又组织人员表演了“霸王鞭”。2001年6月27日，在堂上村举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创作地纪念雕塑揭幕仪式。仪式上有近千人表演了“霸王鞭”。场面壮观，给来宾留下了深刻印象。2006年6月26日，在建党85周年之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落成暨大型主题展览开幕式在堂上村举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一心救中国……”和着“霸王鞭”的铿锵节奏，这首为亿万中国人所耳熟能详的动人歌曲再次回响在她的诞生地。

现在堂上村“霸王鞭”表演队有50人，都是妇女，年龄在20岁至60岁之间。同时，霞云岭乡下石堡村、上石堡村、霞云岭村、大地港村也分别成立了“霸王鞭”表演队。此外，霞云岭中学有学生表演队500人。在堂上民俗村旅游活动中，旅游者都可以欣赏到“霸王鞭”的表演。

# 房山最早的彩色照片

魏志华

现在由于数码技术的普及，拍彩色照片已是很普通的事。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照像在房山还比较困难。农村基本没有照像馆，就是在房山和良乡两个县城，也只要一、二家照像馆，而且照像只能是黑白的，就是在北京大的照像馆，也很少有彩色的。当时所谓彩色，就是黑白照片上涂上一些颜色而已。因为当时我们国家还不能生产彩色胶卷，少量进口的彩卷，只发给国家特级摄影师使用。一直到1980年前后，彩色照片才逐步发展起来。但是在1966年初，原房山县张坊公社广录庄村却出现了几张彩色照片，而且是当时的新华社副社长石少华拍摄的，这可能就是房山最早的彩色照片了。



石少华拍摄于1965年的房山最早的彩色照片(因时间过久等原因，照片已褪色) (宿廷增 提供)

1965年，全国农村普遍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大四清”)。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央和市属机关、部队、学校、事业单位的领导，都要带队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来我县参加四清运动的有4000多人，部级(军级)的就有20多人，新华社的同志全部在原张坊公社，带队的是副社长朱穆之(化名何青)，石少华(化名石林)党委副书记王天章，他们是张坊四清分团的正副团长。朱穆之、王天章住公社抓全面，石少华在广录庄村蹲点。各村的四清工作队长大部分是新华社的中层干部，后来调国务院的袁木同志就在东关上村参加四清。

广录庄村四清工作队有30多人，队长是县里的宿廷增(当时是十渡公社党委书记)，副队长是阮信之(新华社保卫科长)、方黄(新华社)、安洪元(县干部)，石少华同志在工作队没有担任领导职务。四清工作队全部住在群众家里，到各户吃派饭。石少华住在许洪琪家，和许洪琪的父亲许德一住在一个屋里。石少

华 1938 年奔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摄影和政治宣传工作，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敌后根据地摄影事业开拓者之一。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记录了我们党领导人的革命活动，反映了解放区军民英勇战斗的光辉事迹。主要代表作品有《毛主席和小八路》、《埋地雷》、《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地道战》、《子弟兵母亲戎冠秀》、《解放张家口》等，解放后在报纸和画刊上也发表过不少他的作品。历任冀中军区政治宣传部干事、冀中军区政治宣传部摄影科科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晋察冀报社副主任、华北画报社主任。新中国成立后，石少华调任中央新闻摄影局副局长、新闻摄影处处长。1952 年 4 月新华社摄影部成立后，他调任主任。1959 年后任新华社副社长，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就是这样一个老领导，却没有一点架子，非常平易近人，经常到群众家里拉家常，访贫问苦，了解情况。对干部、群众，包括对四清工作队从没有发过脾气，发现干部及工作队的一些问题，总是讲道理、说服教育、用讲故事的形式启发引导，从不指手划脚。他在生活上严格要求，在广录庄村近一年的时间，除到市、县开会外，从不离村。当时村里群众生活水平不高，早饭、晚饭大多是喝粥，副食更差，但他从没有过怨言，从不搞特殊。抽烟是自己卷，跟农村干部没什么区别。石少华同志很虚心，对农业生产不太熟悉，遇到问题便向宿廷增和县、公社干部请教，虚心学习。

石少华同志和广录庄村四清工作队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一方面认真宣传贯彻《二十三条》，深入发动群众揭摆问题，教育干部正确认识，检查自己的问题，“洗手洗澡”，另一方面认真抓农业生产，帮助解决生产上的问题。这个村生产条件很差，大部分是丘陵坡地，他们帮助村里修水渠，把村里的扬水站由一扬改为二扬，扩大水浇地。在坡地，不能灌溉的地就大挖坑田，一个冬春就挖坑田 300 多亩。这个村的地大部是黄粘土，他们便发动群众大搞土壤改良。每天早晨，工作队带领群众到拒马河去拉沙土、垫地、垫猪圈，来回有六里多地，全村 300 多户，户户参加，一个冬春改造了 400 多亩。村边有一个大坑，夏季雨水很多，不仅不卫生，还淹死过人。工作队发动群众平坑造田，每天晚上有五六百人参加义务劳动，一冬垫土一万多立方米，平出 5 亩多地，通过这些方法，使村里的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发展。

广录庄四清工作队对群众的生活也很关心。帮助村里解决不少实际问题。一是改造街道，过去村里的路高低不平，很不好走。经过详细勘测、规划、一冬春修了几条路，把路垫平。二是改造厕所。过去村里没有公共厕所，很不卫生，夏季蚊蝇很多，经过与干部群众研究，在村里建立起 10 多个公厕。三是

水井加盖。过去水井都是敞口，有的地势较低，一到雨季，街上的泥土、粪、脏水都往井里流，很不卫生。工作队与干部群众研究、把村里所有的井都整修加盖，群众非常拥护。通过上述措施，村里的环境卫生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个村过去是纯农业，什么副业也没有，生活水平很低，工作队帮助他们建立起一个砂石厂，增加了副业收入。另外，这个村附近有一支驻军部队，过去与村里关系不够密切，石少华主动找部队联系，与村干部一起座谈，军民关系有了很大改善。

新华社的同志由于部门工作的特点，四清中他们发现一些好的典型、好的素材。随时进行拍照，照了不少照片。石少华同志还破例拍了一些彩色照片，有妇女推小车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有建扬水站引拒马河水上山灌溉的，有几个青年入党宣誓的，有移风易俗、节俭办婚事的，还有广录庄村全体四清工作队人员的合影。这个村青年卢佩周，四清后期入党并任党支部副书记，1966年初结婚，响应党的号召新事新办，工作队亲自帮助他们操办婚事，写对联，主持婚礼，并给他们照了结婚照以及全家合影，都是彩色的。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鲜的，不少群众都争着去看，非常羡慕。1966年4月，在张坊公社搞了一个摄影展览(都是新华社在各村四清工作队的同志拍摄的)。后来，有一些作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些在北京摄影展览上展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朱穆之、石少华都受到了批判、冲击。1972年到1973年，石少华被下放到房山县南召公社新华社的农场劳动一年多，当时宿廷增在琉璃河公社任党委书记，石少华曾先后几次到琉璃河公社去看他。宿廷增也几次到南召新华社的农场去看望石少华，帮助农场解决水泥、树苗及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疏通农场与附近厂矿、大队的关系。新华社的同志也帮助附近公社、大队办了不少事情。

1982年，石少华离休后担任中国老年摄影家协会主席。1986年，他与中国摄影家协会秘书长杨绍明，曾带领各省、市和港、澳、台的摄影记者、摄影工作者200多人到房山县南尚乐乡进行一次大型参观、摄影活动。参观、了解农村改革的大好形势，到附近村和云居寺拍了不少照片，在各种报刊上发表。

最近我到广录庄村四清时的当事人家里走访了一下。原广录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卢佩周入党宣誓和结婚时石少华拍摄的照片仍然保存，但因农村条件的限制，彩色照片已褪了色，成为房山历史上一段难忘的记忆。

# 李学鳌与南韩继

张广明

20世纪60年代，著名诗人李学鳌曾同著名作家杨沫响应市委“希望作家深入生活生产第一线，写出反映时代和人民的好作品”的号召，来到房山南韩继大队深入生活采访。

来房山那天，他们之前约好由南韩继大队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徐庆文乘车先接杨沫，然后途经李学鳌家接学鳌一起到房山。到南韩继后，他们听了徐庆文简单介绍南韩继解放前后的变化，不顾路途的疲劳要求先到地里看看。当他们走过大片大片的绿油油的麦田时，不由得惊叹南韩继人在党支部领导下，把一个“偏坡溜岗十八沟”的穷村子，变成米粮仓的壮举。提出一定要在这里多住些天，向南韩继人学习，学习他们坚持真理，敢于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打井挖地科学种田，艰苦奋斗，改变家乡面貌的精神。在南韩继的日日夜夜里，他们深入田间地头 and 农民交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快，李学鳌同志就写出了他到南韩继后的第一首诗：《电井之歌——南韩继组诗之一》。这首充满激情的作品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井台的石板啊/已磨得又平又光/井台的绿柳啊/已长得又粗又壮/井台上的泵房啊/却还是那么明亮/看水泵的年轻人啊/永远不会把挖井的日子遗忘！”该诗在1965年第10期《北京文学》上发表。

南韩继大队，当时只有183户，904口人，是有名的“气死龙王、烫死蝎虎子”的“十年九旱八不收”的干旱村。老辈人常埋怨，南韩继风水不好，村里沟沟坎坎几十道，水存不住，土挡不住，肥留不住。全村只有三眼井，人吃水都困难，不用说浇地，只有靠老天爷吃饭。盼水都盼得急红了眼，“一代盼水一代空啊/还是十年九旱八年荒。”缺水，阻碍着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从1957年开始，在党支部书记徐庆文的带领下，南韩继人不信邪，不怕苦，决心要打深井，把旱田变水田，改变家乡面貌。但这时又引起人们的议论：“日本人在西地折腾那么长时间，也没打出水来，咱这沙石层没水源，甭瞎闹了”。但党支部和徐庆文却不这样认识，一切都要经过实践，他们找有经验的

打井师父选址，组成由徐庆文、王忠和几个贫农党员为骨干的打井班，决定先打一眼深井试试。“打深井这个谜要揭不开，南韩继的面貌就永远也改变不了。”

抱着不打出水来誓不罢休的决心，开始向自然开战。徐庆文第一个下井，打井班吃住在打井工地，日夜连班作业。只用了二十多天，南韩继历史上第一眼深井终于打出水了。人们知道这个消息一个个欢呼跳跃，奔走相告。

李学鳌在他的《电井之歌》中，是这样形容当时战斗场面的：“莫管它/层层干土硬似铁/咱是削铁的优质钢/莫管它/重重尖石如狼牙/咱是擒狼的好猎枪/这班英雄刚出井/那班英雄又接上/直挖得地球喊疼打哆嗦/直挖得井下泉水哗哗响……”。第一眼深井成功后，紧接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南韩继人一鼓作气，又打成了 25 眼井。架上高压线后又按上电动抽水机，从此南韩继电井遍地开花，旱地变水田，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也得到改善。南韩继成为北京市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李学鳌和他的《电井之歌》很快也唱响了当时的京郊大地。四十多年过去了，人们还在怀念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 管桦夫妇在良乡

张玉泉

1969年初春的一天，原良乡公社分来一批北京市文化部门的下放劳动干部。其中有一对中年夫妇，他们就是著名作家管桦和他的妻子李婉。管桦当时是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专业作家，李婉是中国评剧院办公室干部。

他们到良乡公社当天，管桦被分配到良乡公社西北部的詹庄村，分到该村共三名干部，他任组长。李婉分配到距詹庄村二里地的渔儿沟村劳动。

按照当时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要求，他们在下放劳动中，协助当地党组织认真宣传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搞好群众大联合，建立健全基层支部班子，坚持



上世纪90年代，著名作家管桦夫妇（右三、四）在良乡（张玉泉提供）

同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改造世界观。在近三年的下放劳动中，管桦夫妇按照组织的要求，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把自己当做真正的良乡人，处处事事为群众着想，一心一意帮助公社、大队干实事。在劳动中他们真心实意地与农民交朋友，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

建立健全基层支部班子，消除派性，搞好群众大联合，是摆在公社和下放干部面前的首要任务。

1969年，良乡公社某些村“文革”中群众组织形成的派性尚未消除，有的村党支部完全瘫痪或处于半瘫痪状态，生产、工作基本无人管理。针对这种情况，公社党委及军宣队给下放干部的任务是：搞好群众的大联合（消除派性）做好整队整党，建立健全党支部的工作。当时的詹庄虽然在文革前是县里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党支部尚能开展工作，但部分人工作不够得力。干部群众还存



在有派性，有的还很严重。管桦和其他两位同志就走家串户做两派群众的思想工作，同时摸底调查，物色较合适的人选，充实和调整大队、生产队的领导班子。

通过吃派饭或开座谈会、办学习班等形式，消除群众之间，干群之间的隔阂，听取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以及在生产工作中好的意见和建议等。

李婉所在的大队班子，曾一度比较涣散，不够得力，她进村后配合军宣队进行调查摸底。当她了解到有一位群众过去曾当过生产队干部，组织能力强，懂农业生产又会管理后，经过反复谈话发现他有进步的要求，又有工作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李婉多次做干部和党员们的工作，才在全体党员会上讨论一致通过他的入党申请。后经公社党委批准发展为党员，进入村支部领导班子。这样使该村的各项工作才慢慢步入正轨。

当时围绕“消除派性，搞大联合，大团结，提高思想觉悟”这个宗旨，公社曾连续举办几期由党员干部、造反派负责人参加的学习班，每次办班公社都请管桦参加，让他在班上做思想工作，写简报，带头动员。因为管桦是大家公认最正派、最公道的干部，他绝不随波逐流，所以他在干部群众中威信较高，做思想工作说服力很强，效果比较好，群众没有一点反感。

1971年夏，公社的主要领导干部被打成良乡地区最大的“五一六”分子，被送进了“学习班”审查。管桦认为这是极左的表现，是派性的干扰。一个普通基层领导干部又没有上层关系被发展成“五一六”分子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既不怕碰钉子，又不怕别人指责，无私无畏、敢于冒着为“反革命分子”翻案的风险四处奔走申辩，找房山支左办公室、找市革委会的有关同志，送材料谈情况。经过有关方面的深入调查，弄清了事情的真相，最后终于给公社的这个主要领导干部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启用。

## 二

管桦夫妇真心实意地帮良乡开展工作，力所能及地帮助发展生产。1970年早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为了推动京郊的农业生产大发展，准备召开农口经验交流会。县里让良乡公社总结詹庄开展农业畜牧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的经验，参加市农口经验交流会，公社请管桦同志做这个文章。管桦同志一次次深入到第一线，深入到干部中、民兵中和妇女中，到田间地头，猪厂饲养棚，反复了解情况，座谈走访，掌握第一手材料后，一次又一次坐在

冰冷的炕上，挑灯夜战。经过两、三个月的奋战，终于写出一份 5 万字的汇报材料。公社领导和干部看了材料之后，认为写得具体生动真实感人。他的那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令干部群众钦佩和感动。让一个作家写汇报材料，这难度可想而知，它不同于写小说散文等文艺作品，之后管桦几易其稿，多方面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最后才定稿。当村党支部的代表向市里汇报后，受到兄弟单位和市革委会领导的好评。

管桦特别注意虚心向老农们请教，一年四季的农业生产每月每季都需要干什么，特别是重大的农事活动，他都熟记在心，总怕耽误了农时。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为了给来年增施有机肥，1970 年和 1971 年两个冬季，他都帮助全村各生产队掀起一个个积肥高潮，管桦和其他两个下放干部带头去拾粪。他们每天半夜起床自行车后带上粪筐，去丰台沿路捡粪，每天一趟，每次每人都要捡七十到上百斤牲口粪。一开始累得受不了，捡回来连炕都上不去，半路上饿了买个冻柿子吃，累了就在马路边上坐一会儿，就这样每天往返 70 里地，一直坚持整整两个冬天。

在开始发动积肥时，社员都没有动静，后经仔细了解才发现主要是没有落实报酬措施和奖励办法。按交粪的重量、质量给记分，超千斤优质肥奖一定数额的现金，这时群众的积极性一下就充分地调动了起来，掀起了一个积肥高潮。肥积多了为来年的丰收打下基础。管桦看到许多群众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全家出动，他的心情十分高兴。管桦每次出村无论是到良乡开会，还是到其他地方办事情，肩上总是背着粪筐，一路上捡粪，捡不着就搂些烂草根、黑泥什么的背回来沤粪，这已经形成了习惯。

妻子李婉在鱼儿沟下放劳动期间，把心思全部扑在集体生产上。为了发展养殖和林业生产，增加集体积累，她一手抓养猪，一手抓植树。鱼儿沟村只有百十户人家，集体经济很薄弱。大队猪场因管不好只有十几只猪，骨瘦如柴，年年赔钱。李婉通过关系几次到良乡地区一部队农场低价买回仔猪，除少量育肥外，大部分留作种猪，用作后备母猪，繁殖猪仔。她还请兽医站的人员来村帮助防疫、打预防针，甚至亲自赶着母猪去良乡配种站配种。她不辞劳苦、不怕脏累，常常是整天蹲在猪厂里帮助饲养人员管理，摸索养猪的规律。在她的亲自帮助下，大队猪厂迅速发展，从原来的十几头瘦猪，发展到一百多头，经济效益增长很快。

李婉还亲自带动群众植树，她下放的两年中每到春秋季节都搞绿化，改善生态环境。光是她自己亲手种植的树就有一百多棵，而且树苗都是她自掏腰包买

来的，存活的树木至今都已经成材。

### 三

管桦在下放劳动中深入生活，真心实意地与农民交朋友，因为群众生活是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管桦原名鲍化普，1912年1月生于河北丰润县三女河乡女过庄。1938年随父亲出来打游击，1940年参加八路军。他自幼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参加革命后，也和县大队、妇救会和儿童团一起进行抗日活动。他于1942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和长篇小说《将军河》、《辛俊地》等。他同作曲家合作的歌曲《我们的田野》、《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曾获国家一等奖并传唱至今。

管桦在詹庄下放劳动中坚持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农民群众交知心朋友。为了深入了解农民的生活，他特意搬进了饲养室里去住，这里是农民扎堆的地方，在这里可以接触和了解更多的人，了解和掌握许多普普通通农民的生活状态和大量激动人心的故事，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基础。

因为管桦把农民当成知心朋友和农民打成一片，再加上他作风纯朴、和蔼可亲，又非常平易近人，浑身充满了乡土味儿，所以农民们都亲切地叫他老管。村民有什么事儿都愿跟他讲，毫无顾虑。谁家有了困难他也是真心实意地帮助解决。有位生产队长干活时不小心扎了脚，脚肿得不能着地，管桦带着他到北京一家大医院去看。下了公共汽车，管桦就背着他进医院，又楼上楼下地背着他化验、打针、换药，管桦累得满头大汗，却毫无怨言，所以他深受广大村民的爱戴。在饲养室里，他跟饲养员睡在一起。时常熬夜到很晚，饿了老饲养员就给他炉白薯吃，渴了就给他烧开水喝，天冷了管桦还常常给老饲养员烧热了炕。他和农民水乳交融，打成一片。干部群众说：“管桦夫妇跟我们没什么两样，他们就是良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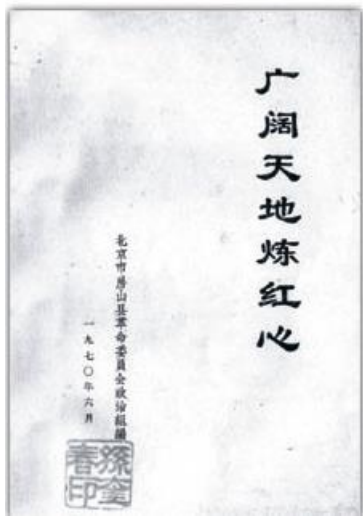
1971年，北京市文化领导小组，把管桦调回去，请他去大兴县大白楼写王国福的事迹。完成任务之后，管桦同志又回到良乡，被安排在蚕农场，一面体验生活，一面构思长篇小说《将军河》的写作。同年夏，李婉从鱼儿沟调入公社政治组帮助工作。

1972年底，管桦夫妇才结束了在良乡的下放生活，回到北京。

# 《广阔天地炼红心》的编写过程

孙奎春

2004年1月，罗玉源同志在《我的人生历程》一书关于“房山县革命委员会工作回顾”一文中提到：1969年春至1971年间，在管理市、县下放干部时，曾编印过《广阔天地炼红心》一书，很受下放干部欢迎。近期我回市内住宅果然在藏书找到了这本小册子，或许是因为自己主持编辑此书的缘故，所以倍感亲切。



《广阔天地炼红心》一书封面

自1969年5月开始，先后三批市、县下放干部共1700多人，根据身体状况分配到平原、山区三百多个村庄，一般4至5人一组，单独居住，自行起伙做饭。对于管理下放干部这项重要任务，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时任县革委会主任、党的领导小组组长孙

海同、县革委会副主任、党的领导小组副组长、主管政治工作的罗玉源曾一再强调：“下放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教育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政治上信任他们，生活上关心他们，工作上支持他们，切实作到三落实——组织领导落实、思想教育落实、管理制度落实，并且要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一技之长，及时总结表彰他们的先进事迹。”

下放干部的日常管理工作，由县革委会干部组负责，有马振君(组长)、郑旭光、陈广水、孟德礼、米林和武装部姜文忠、铁四师小黄等人。根据领导的要求，针对下放干部人数多、分布广的特点，经研究决定组成若干工作组，采取“先山区后平原，抓两头带中间”的方法，会同各公社政治组有关人员进行一次走访，检查“三落实”情况，听取下放干部的意见和要求，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记得在1970年夏天，我与孟德礼去南窖公社，听完公社的汇报之后，当天下午由政工组长陈瑛陪我们翻山越岭徒步十几里，去中窖村看望下放干

部，途中遇上瓢泼大雨，当我们到下放干部的住处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下放干部张俊歧、冯锦庭、郑殿泉、张俊卿等人都非常感动，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你们辛苦了，感谢党组织的关怀！”

同时，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了一些先进典型，由《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文联系统下放干部中选拔出的七八名年富力强，写作水平高的同志，协助总结先进典型材料，其中工作表现突出如季英正、刘文泽、侯琪、谢大军等。由于他们的辛勤努力，克服了交通不便等种种困难，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挖掘素材，反复修改，写出了数十篇优秀的长篇通讯和新闻报道，并且先后在《北京日报》和中央、北京电台上报道，有的被中央台对外广播节目采用。

为了发挥典型的推动作用，用下放干部的先进事迹教育他们自己，自觉改造世界观，坚持参加生产劳动，积极当好大队“参谋”；同时帮助社、队干部加强对下放干部的管理。基于这种考虑，县革委会政治组决定编写《广阔天地炼红心》一书。《广阔天地炼红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部分是围绕毛泽东主席 1968 年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精神，选择了有关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深入群众不要脱离群众，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等方面的毛主席语录百余条。第二部分是下放干部个人和集体的先进事迹，如王康久的《插队劳动使我焕发了革命青春》、李光荣的《下放劳动是改造世界观的必由之路》、杨廷如的《在劳动中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黄鹤华下放干部小组的《学习唯物辩证法，正确处理劳动与工作的关系》。第三部分是公社、大队管理下放干部的经验，如十渡公社的《光荣的政治任务，细致的思想工作》，芦子水大队党支部的《当好下放干部的革命引路人》。

《广阔天地炼红心》一书，于 1970 年 7 月共印刷千余册，发至下放干部小组和公社、大队，要求大家认真组织学习，反映很好，得到市革委会农林组的好评。

# 房山百货商场早期的商业美术工作

李瑞祥

1974 年以前，北京的远郊区县只有中小规模的商店，没有较大规模的商场。1974 年这一年，大兴、昌平、房山等县城都各有一家商场相继建成开业。房山县第一座商场，即位于京周公路房山段（现兴房大街）西侧 42 公里处的房山百货商场，于 1974 年 9 月 30 日开业。它的开业促成了房山商业专职美术的诞生，带动了全县商业美术的迅速发展。本文记述的是该商场 1974 年 9 月至 1978 年 6 月，美工在商业美术设计方面的情况。

—

房山百货商场中间主体建筑两层，下层营业，上层是仓储和职工住宿，营业面积 850 多平米，两边对称连体建筑各一层，营业面积各 320 多平米，共计营业面积 1500 多平米。商场主楼墙面上有城关煤建商店的王振中写的老宋体“房山百货商场”六个凸起水泥红漆大字。两个门厅把主楼前的橱窗分成三部分，每部分由外墙垛分成两个橱窗。橱窗内净高 2.7 米，进深 1.2 米，每个橱窗长 6 米，六个橱窗总长 36 米，橱窗背板总面积 97.2 平米。这种橱窗设置在郊区是少见的，和市里大商场的规格接近。

房山城关零售商店的张庆文和周口店长沟峪商店的李瑞祥，于 9 月初被县商业局调来，成为房山县第一代商业美工，张庆文任美工组长。

橱窗任务重自不待说，更重的任务是营业厅内的布置。虽然当时只先开业主楼，但商场不比平房商店，室内地面到天花板的高度达 4.5 米，而货架只能做两米高，根据各种商品大小形状形态和软硬质的不同，货架顶上不可能都堆码商品占据空间，需要设计制做大量的商品广告牌和装饰展架道具等，所有这些任务都要赶在开业前短短的二十多天内完成。

张庆文不但懂绘画，对木工、油漆工和商店装饰等多方面都有经验。李瑞祥绘画基础好，干活极其严谨细致认真。两人文化基础扎实，都喜欢古文诗词，

加上李瑞祥熟悉英语和汉语拼音，所以他们合作四年，没在文字上出过一点差错。

商场主管业务的副经理（文革时叫革委会副主任）王兆兰兼管美工，旧社会他曾在保定和天津商业学徒，因此对商场的美化和商品陈列特别重视。商业局副局长姜云原在北京西单商场工作过，他专门嘱咐商场领导，给美工每人配备一双拖鞋进橱窗。商场雇了四个木工，除了应付日常维修外，主要就是制作美工设计的展架道具。从筹备开业会战时起，一直到1978年，这四年里王兆兰不但要求随着应季商品和元旦、春节、五一、国庆四大节日经常变换橱窗，而且要求营业厅内的设计也得不断变换，要让顾客常来常新。所以美工组成为商场唯一的常年加班组，几乎每个月至少有二十多天都在加夜班，但从没发过一分钱的加班费和夜餐费，美工组申请买一个一百多元的120型照相机，也未获批准。商场200多名职工里，新参加工作的插队学生有130多人。王兆兰有意安排新职工轮换到美工组帮忙，从中发现干活细致的人。当时张庆文每天统筹设计安排，李瑞祥具体实施设计写画，两人配合默契，工作既紧张又有条不紊地进行。

百货组钟表柜台有一块广告牌，上面的手表图案比洗脸盆还大，为了达到效果好，李瑞祥设计用银箔纸、红箔纸、黑绒纸三层镂空后叠粘。在美工组帮忙的六个新职工里，布匹组的王春莲细心地完成了这个高难度的任务。

因商场国庆前开业，所以决定用一个橱窗画天安门。由于这个橱窗不摆放商品，不需设计立体空间，于是决定让矿机组的谢国平和针织组的翟季春两个爱好美术的新职工帮忙画。李瑞祥在16平米的橱窗背板上画好轮廓线，调好颜色，谢翟二人端着颜料盆站在凳子上用板刷填色。

营业厅两端墙面较大，张庆文设计了两块大型牌匾，一块是毛主席手书诗词，另一块是毛主席“咏梅”词的篆体字。他熟悉药材药性，发明了一种用石膏流画成字画的方法。洁白凸起的石膏字，在深红色版面的衬托下，极为漂亮醒目。为了保证篆字准确，李瑞祥去城关刻字店，查阅《说文解字》里有关诗词的每一个字。

商场开业后，新一轮的美化工作在继续。橱窗里做过一个放大的香烟模型，烟盒里伸出的烟卷采用冬天取暖用的铁皮烟筒来做，从整体造型到图案文字，李瑞祥完全按比例认真测算绘画，精致严谨，效果极好。橱窗里还做过一个缩小的现代楼房模型，高1.6米，也严格按挂历图片比例测算制作。玻璃窗粘贴的是绿色玻璃纸，平整光滑。最令人称绝的是门厅前的台阶，用硬泡沫板做好后，张庆文觉得花岗石的效果没出来，他反复思索，最后采用针扎、刷色再水

冲的方法，反复试验加工了两天，效果出奇的好。

由于橱窗里展示的商品经历高温日晒后都得减价处理或报损作废，所以有一次领导要求搞一个只画画不摆商品的橱窗，要让画看着深远。李瑞祥就画了一列火车从远处山洞里开过来，配上国歌的“前进前进前进进”口号。由于立体透视画得准确，观者无论从哪个方向看，火车都像朝自己开过来。当时照相机还是稀罕物，竟好几次有顾客专门来橱窗前照相留念。

1975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一部关于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的纪录片，其中有两个从商业角度反映石化产品的镜头，选中了房山百货商场。张、李二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忙碌，设计制作了两个组的装饰道具，协助制片厂完成了拍摄。

无论是橱窗还是营业厅，张庆文和李瑞祥从未简单照搬市里商场的美术设计，而是学习吸收后再自己独立创作。李瑞祥连续多年用个人休息时间走遍了北京和天津各大商场，认真观摩学习。

美工组在轮换帮忙的新职工中，发现了几个特别细致有耐心的，后来抽人帮忙就找这几个人。他们是鞋帽组纪炳国、针织组肖红兵、蒲全喜，布匹组王春莲、杜永红等。这其中最突出的是纪炳国和肖红兵。1976年纪炳国已被安排和李瑞祥一起住在美工室，美工没有紧急任务时，纪就去鞋帽组上班。他心灵手巧，干活细致，经他手完成的必是精品。肖红兵特别有耐心，她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能干到最好，有很高的审美水平，能理解和欣赏抽象美。

## 二

在文革那样的特殊年代，商场的美化不可能不受影响，打上时代的烙印。

美工按照主管领导的意思，参考市里大商场的样式，设计制作了一个仿古风格的“月亮门”道具，被另一个领导批为“封资修”，只得拆改了一部分。

1976年4月，邓小平同志再次被打倒，商场领导反复要求美工在鞋组系列广告牌上画批邓漫画，最后美工只做了“深入批邓，北京皮鞋”、“北京皮鞋，深入批邓”的口号。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商场不仅像各单位一样设置灵堂追悼，还连夜让美工和布匹组人员加班，用黑布黄布把全部橱窗布置成追悼会场的样式。



## 三

美工除完成本商场的工作外，还经常外派支援别的单位。如李瑞祥两次去琉璃河水泥厂商店设计装饰新门市部；为张坊供销社和周口店供销社培养美工并亲自装饰；县武装部人防办测绘房山城关地区各单位的防空洞，李瑞祥带组完成了近一半的工作量；此外还帮助设计制作县委主办的展览会等。

1976年11月，商业局在房山百货商场举办了美工学习班，本系统11个单位共14人参加，张庆文、李瑞祥各讲了半天课，李瑞祥又和大家在周口店长沟峪商店实习了一个星期。在这14人中，张兆顺在房山城关零售商店早就搞过多次商店美术设计，后来从房山人民商场副总经理位置上退休。刘昆元在房山蔬菜经理部曾参与过美工工作。谢国平1978年调房山人民商场当美工。翟季春1975年调琉璃河水泥厂商店，曾参与过美工工作。李建国在良乡零售商店曾参与美工工作，1982年调回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他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近年来又在山水画上取得突出成绩，作品多次入选市级美展，《美术向导》杂志也曾专版介绍。寰店砖瓦厂商店戚琳杰1978年调房山人民商场当美工，1979年调燕山，当过商业美工和中学美术教师，在国画和卡通连环画上取得成绩。

1978年7月1日，房山人民商场开业，李瑞祥于6月初被调去任美工组长。房山百货商场张庆文让纪炳国、肖红兵和有些美术基础的赵秉安在美工组帮过忙，1982年2月纪炳国被正式调入美工组。1986年11月，张庆文调到房山商业大楼任楼层经理，从此告别了美工工作。

回忆过去，房山百货商场开业四年的美术设计工作是具有创造性的，工作量是超负荷的，在京郊商业中是走在前列的。

# 为毛主席纪念堂敬献汉白玉

孙奎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经中共中央决定，请越南专家协助为毛主席遗容防腐，效果非常理想。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组织各级干部、模范先进人物代表瞻仰毛主席遗容——毛泽东同志的遗体安卧在明彻的水晶棺中。我与房山县数十名来自各方面的代表，怀着悲痛而崇敬的心情，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悼念活动。



兴建毛主席纪念堂纪念章

为了永久纪念毛泽东同志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中共中央破例在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南面，旧北京城中轴线原“中华门”的位置上，兴建毛主席纪念堂，与天安门、正阳门、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古今建筑物交相辉映，构成一幅气势磅礴、宏伟壮观的画卷。

毛主席纪念堂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单位主持设计，占地5.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纪念堂呈正方形建筑，具有强烈的中心感和庄重肃穆的艺术效果。于1976年11月24日奠基动工，要求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建成并正式开放，建设工程时间紧、要求高。为此，北京市成立了工程总指挥部，下设若干个专业组，组织全国能工巧匠和各方面的专家，征集全国最优秀的建筑材料。房山隶属石材组，由全国各地呈献石材样品参加竞选，最后选中福建的黄色花岗岩用于纪念堂周围44根主体廊柱，通体用山东青岛的花岗石贴面，台邦用四川的枣红色花岗岩砌成。

采用房山汉白玉雕刻毛主席坐像和纪念堂外面360套栏板，720根柱子，以及纪念堂四周环以汉白玉万年青花饰栏杆，南、北门台阶中站两条汉白玉垂带，上面雕刻着葵花、万年青、腊梅、青松图案，象征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的社会主义江山坚如磐石，万年长青。

对于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房山县委、县革委会十分重视，组成以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张成基同志为首的领导小组，成员有工交组、社会企业局、南尚乐公社和大石窝大队的领导同志，当时我负责组织协调工作。并组成了强有力的现场开采领导班子，调集挖掘机、推土机、卷扬机、水泵等设备。由10个村抽调两千多人奔赴4平方公里的山场，进行大面积、深层次的土石方拨离；同时，以大石窝村石匠为技术骨干组成了350人的采石队，进行阶梯式挖掘。在百米以下才能挖出厚度1至3米的汉白玉。众所周知，房山汉白玉洁白无瑕，全国独一无二。万里同志在北京主持工作时曾明确指示：大石窝的汉白玉要控制开采，以备今后有特殊用途。结果这次果然派上了重要用场。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深冬季节，广大参战人员日以继夜，三班作业，发扬了吃大苦，耐大劳，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将一批又一批汉白玉运至地面，本着“优中选优，好中选好”的原则，从中选出最佳汉白玉石材1200立方米，源源不断地送往加工点，平时需要一年多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只用了5个月就按质、按量、提前完成了供应汉白玉石材的任务，受到市领导的好评。会战结束后，参战人员都荣获一枚珍贵的“兴建纪念章”。

毛主席纪念堂于1977年5月24日落成，于同年9月9日正式开放，每天接待数万名国内外来宾和人民群众前来瞻仰毛主席遗容。

# 房山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规划编制侧记

张广文

1987年1月，房山县与燕山区合并，成立房山区。1988年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为了使房山区经济社会持续稳步协调发展，推动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进程，克服盲目性和短期行为，减少失误，振兴房山，在1988年首都军民共建领导小组牵线召开的首都驻军帮助房山区共建两个文明座谈会上，中共房山区委、区政府与国防科工委签订了军民共建协议，决定由国防科技大学派专家，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帮助房山编制《1989—2000年区域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规划》。

由于1989年春天的一场动乱，致使工作一直推迟到7月底才开始进行。首先，房山区政府与国防科技大学正式签订了共同编制房山区区域规划的合同书。区里成立了以区长李庆余为组长的领导小组，下设区域规划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办公室主任为规划局长翟鸿儒，常务副主任为区计委副主任刘顺林。编制规划技术工作由专门成立的课题组负责。课题组在总体组下设协调综合组、农业组、工业组、财贸组、社会组、城建组及燕山分组。总体组由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数学系副教授从善本、元国乔，讲师谷德敏、王维平、马达、高麟，以及房山区刘顺林、刘焕忠、钱增福、丁宽致、李树民、张广文(同时负责制定房山区种植业规划)等人组成，从善本任课题组组长。主要担任总体发展战略开发和总体规划的制定，并指导各专业组的同志制定本部门专业发展规划。北京市规划总体所、信息所王欣、徐晓佳、胡育新、崔鲁清四名同志参与技术协作。房山区各委办局共抽调了38名业务骨干集中到区体委大楼联合办公，并轮流派出车辆保证办公需要，房山区历史上第一次十年综合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就此拉开帷幕。

—

此次区域规划工作，既是一项军民共建的科技研究项目，又是一项北京市

下达的工作任务，因此受到国防科委政治部和北京市县(区)域规划领导小组的重视。国防科委政治部许瑞忱副主任 1989 年 8 月 30 日来房山视察，袁树范秘书长、郑在新副秘书长及群工处同志经常来房山解决军民共建有关问题。北京市县(区)域规划领导小组领导和专家，市规划院副院长张其昆和副总建筑师王东每月一两次参加规划工作研究讨论。区委书记邵乾坤、区长李庆余每周都要过问一次规划的进展情况，并且对每个规划阶段的重大问题都要参与讨论或听取汇报，及时解决规划的难点和关键问题。白天没时间就安排在夜间。由于此次规划意义重大，动员充分，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主要领导成员在规划制定过程中都参加过研讨会或听取汇报。四大部门领导和各委办局领导都认真地参观了 1990 年 2 月 24 日在区委 413 会议室举办的规划成果汇报展览会，提出了多种建议性意见。为了摸清底数和广泛听取全区各方面意见，总体组的同志行程 2000 余公里，走遍房山区各乡镇、各委办局，召开各种类型座谈会和研讨会 117 次，指导制定出 24 个部门及 31 个乡镇规划。



1990 年 3 月 18 日，在房山宾馆召开的北京市房山区区域规划鉴定会（张广文 提供）

参加规划编制工作的全体同志，从进驻工作地点就取消了休息日。总体组的每位同志除了要完成分工负责的北京市房山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北京市房山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北京市房山区区情、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诊断、规划指标集、规划项目集、模型技术报告、规划工作的组织与实施、北京市房山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综合报告等 9 个总体报告，以及区址迁移报告、良乡镇总体规划、北京市房山区 1988 年投入产出分析、北京市房山区主要行业及产品结构调整等 4 个专题报告。还要分析指导几个部门的诊断报告和发展规划的制定，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各部门抽调的同志，说是专门抽调，因为都是部门骨干，本单位有脱不开的任务。在规划进行期间，一要学习系统工程理论和操作技能，二要负责制定本部门的规划，三要向总体组提供各种所需资料，基本都是靠加班加点完成任务。实战锻炼干部，知识提高水平，规划工作结束后，参加规划工作的同志大部分都担任了重要职务，为房山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防科大的老师们以军人的姿态给全体工作人员做出榜样。白天忙里忙外，完成各自分工任务，晚饭以后都是安排集中研究和讨论工作，夜里十一二

点钟才能休息。饿了就煮点方便面，生病了就拿点药，带病坚持工作。谷德敏爱人生病住院，从善本孩子受伤住院，他们不能回去，只能打电话问候，让系里的同志帮助照顾。

规划编制期间，国防科大的老师们为培养房山区的干部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把先进的系统工程理论在实践中教给了全体规划工作人员。一方面根据工作进展陆续授课，共授课达 280 学时，相当于把规划工作人员送进国防科大办班两个月(其中从善本 65 学时、元国乔 45 学时、马达 45 学时、王维平 45 学时、高麟 30 学时、谷德敏 30 学时)。给房山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 二

这次编制房山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规划，是北京市第一次用系统工程方法编制县城规划。国防科技大学的系统工程与数学系统具有这个学科在国内领先的实力。系统工程是系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用科学的方法规划和组织人力、物力、财力，通过最优途径的选择，使我们的工作在一定期限内收到最合理、最经济的效果。用系统工程方法做规划，就是运用系统思想和各种数学方法，科学管理方法、经济学方法、控制论方法以及电子计算机等技术工具，对房山区这个复杂的大系统进行系统分析和系统设计。通过建立开发系统、过程系统、对策系统，以概念开发为前导完成房山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规划的最优设计和得以顺利实施。

为此，工作的全过程实现了系统化。其中，建立规划工作过程系统指挥和协调全部工作；建立文本系统指导规划文本的编制撰写；建立诊断系统摸清房山区区情；建立战略系统进行发展战略开发；建立规划系统编制发展规划。特别是模型系统使县域规划从过去的定性为主，经验为主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使用各种预测模型群和优化模型群进行系统综合、系统仿真、系统评价，对房山区的结构和功能作出了科学的、量化的分析判断，找出了房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潜力、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通过多方案比较、优化，使规划方案得到全面论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

1990 年 3 月 18 日，在房山宾馆对规划进行了科技成果鉴定。鉴定会由北京市科委主任邹祖焯和国防科工委技术基础局局长金朱德共同主持，主任委员为中国科学院系统工程所原所长许国志，副主任委员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秘书长王寿云和北京市规划院副院长张其昆，鉴定委员会委员 16 人均是各方

面的著名专家和学者。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该规划推动了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进程，采用了一套比较严谨的工作程序和科学方法，提出了今后十年经济社会发展许多新见解和积极的建议，如“科教先导、改革开放、中间起飞、带动两厢、城乡结合、服务兴房”的战略思想，以及燕房一体，区址迁向良乡等各项具有开拓性的设想。并特别提出，“该规划是军民共建、军工技术转民用在区域规划领域的一项开创性工作”。

鉴定委员会认为：“《北京市房山区 1989 年—2000 年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规划》是一项重大的软科学研究项目，把系统工程创造性地应用于大城市郊区区域规划，达到了国内同类软科学研究的领先水平”。建议“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国防科工委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推广这项科研成果，并给予奖励。”（经过报审，《北京市房山区 1989—2000 年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规划》1992 年 7 月获得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0 年 3 月 19 日至 20 日，北京市县(区)域规划领导小组在房山宾馆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由市政府军民共建领导小组办公室宁巨川和市农办主任白有光主持，经过听取汇报和认真讨论，领导小组验收了房山区区域规划工作，对作出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市各委办局负责同志也从各专业角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意见。

### 三

对历经 8 个月完成的房山区经济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四大部门及区直有关部门领导多次讨论、汇审，并认真听取了各民主党派的意见，一致认为这一规划符合房山区实际情况，具有很强的先进性、科学性、开拓性和实用性。区政府于 1990 年 3 月 18 日签发了关于《房山区 1989—2000 年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规划》的采纳意见。

为了使规划具有权威性，房山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经过认真审议，于 1990 年 3 月 31 日作出了关于房山区 1989—2000 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决议。会议强调，“规划的制定是全区人民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认真贯彻落实这个规划，直接关系到房山今后的社会繁荣和社会进步。”会议指出“规划中提出全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步东移良乡，用城镇建设的格局转变带动生产力布局的调整的战略对策具有开拓性，它对实现中间起飞带头两厢的战略思想，推动全区经济和各项事业更快发展，有着重要的深远意义”。

在实施规划的十年间,三任区领导班子坚定不移地遵循这次规划的战略思想,为实现规划确定的战略目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对规划的部分内容作了充实和完善,使房山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建设持续发展,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特别是1998年11月18日区政府东移良乡,成功实施“龙调头”战略,完成了房山区经济社会布局的一次大调整。

由于此次区域规划是军民共建,军工技术转民用的一次高水平的科研实践,受到了国内、军内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在规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中将和科技委主任聂力少将,国防科工委政治部和一些基地的领导都曾经到房山视察和指导工作。来房山区参观学习和了解情况的还有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家民政部、国家建设部等有关部门领导,北京市有关部门和区县单位。还有外省市的,如上海市农委、建委组织各郊区县参观团,上海市宝山区人大、区政府,天津市大港区委,银川市政府等。为了把房山区用系统工程方法制定规划向全国推广,时任房山区规划办公室副总工程师的张广文在《上海城市规划》杂志1992年第二期上发表了《应用系统工程方法制定北京市房山区综合发展规划》的科技论文。

在实施1989年—2000年规划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房山区各级领导充分认识到制定科学的、符合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对引导一个地区经济社会沿着健康轨道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为此,1999年1月又完成1999—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指导着房山区迈入21世纪。2005年,结合北京市总体规划的修编赋予房山区的发展功能定位,房山区又制定出2006—2020年远期发展规划和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实施这些规划,必将给房山区的社会发展带来一个新的划时代的飞跃。



# 清公案小说与房山

张广明

清代储仁逊抄本公案小说多涉及房山旧事，曾引起我极大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应当算是涉及房山地区历史故事，民间传说，风土人情最为丰富的一种。内容包括“刘公案”（刘庸）、“毛公案”（毛登科）和“于公案”（于成龙）等流传甚广家喻户晓的公案故事。此书经过民间艺人的反复加工演义传承和润色，以及编者储仁逊的整理修定其内容更加全面和成熟，该书收入《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清代历史上有两个于成龙，先后都任过直隶巡抚，且都清正廉洁。在《于公案》中在第六回、第十四回中，对两个于成龙的事迹均有涉及。与房山有关的是《于公案》第十四回所讲的于成龙，于成龙（1638—1700年），汉军镶黄旗人，字振甲，康熙七年（1668）由荫生授直隶乐亭县知县，历任滦州、通州知州，直隶巡抚。这个于成龙长期任过河道总督，主管过运河、黄河的河道加固治理工程。康熙三十七年（1698）主持疏浚浑河，对上游自卢沟桥南良乡君堂村至下游经固安到永清县一百四十余里的河道进行疏浚与治理。从此浑河改河名为永定河。

为人不多知的是，于成龙私访过房山县红门寺。《于公案》第十四回所讲的就是他调兵遣将，与恶僧决斗，除凶救人的故事。书中说他“心直性命令人惊，爱民重如性命”。书中讲所谓红门寺系顺天府房山县西北一座山内的一座禅林古寺。房山百姓为了纪念这位为民除害的清官，还在西门外立下《于公颂德碑》。

巧的是，与他同名同姓的另一位于成龙（1617—1684）曾举荐时任通州知州的于成龙。两位成龙都因居官清正廉洁，得入贤良祠。

《刘公案》共二十回。讲的是在良乡一带家喻户晓的“左连成告状”，“黄爱玉上坟”，“刘罗锅私访良乡”等故事。

《毛公案》共六回。叙述明代嘉靖年间直隶巡抚毛登科微服私访良乡姚家庄、惩治恶人姚庚夫妇逆伦杀母，知州受贿贪赃，毛登科不避权奸，秉公执法，明冤昭雪的故事。

此外，书中还有《满汉斗》共八回。说的是三朝元老刘统勋，奉旨钦差到良乡私访为民申冤的故事。与《车王府》曲本中的“满汉斗”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诸作，语言简洁通俗、自然流畅，结构紧凑，脉络清晰，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史有其人，描写的事件既有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也有虚构或采用的民间传说，在良房地区均有广泛流传。

是什么原因，在这些小说中涉及房山、良乡的往事这么多？理由应该有两个：

其一，房山良乡地区是京城西南的门户，离京城较近，交通方便，又是“行宫”所在之地，不论皇帝群臣巡察探访，商贾百姓各色人等送往迎来，还是全国各地地方进京应试赶考，拱卫纳贡，舟车转运多取道于此。

其二，房良地区山水秀丽，寺庙塔林众多，城镇市井繁华热闹，既出名人雅士，又藏恶人贼寇，少不了因追名逐利相互碰撞，明争暗斗。有矛盾才有戏剧性，这也是写书人采风取材之妙处。但无论是公案、人性、民间习俗，这些小说在内容上都表现社会领域正直与邪恶的斗争，在风格上浸透着地域特色和艺术趣味。所以才得以流传，也给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系统读本和参考资料。

# 房山旧志概说

杨亦武

房山区历史上为房山县和良乡县两县地，房山县始建于金代的大定二十九年（1189），初名万宁县，明昌二年（1191）改为奉先县，元代始称房山县。房山县志创修于明，而最后一部旧志成书于民国十七年（1928）。其间房山县曾修志十一次，完志九部。这九部志书亡佚三部，存世有六部。作为北京旧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山县志》创修时间早、修志的延续性强，志书数量多、水平高，志书中所储存的历史文化信息丰富，颇受方志学界的称道。据史料记载，房山县在明代曾三次修志，完志三部。明朝初年，“诏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于是，洪武年间，房山县创修了第一部志书《房山县图志》，此书已佚，卷数修纂人无考，仅见于《文渊阁书目》署字号第一厨旧志二册。兹后的永乐年间，又成《房山县志》一部，此书亦佚，《文渊阁书目》往字号第一橱书目新志存其志名。现存的唯一一部明代《房山县志》成书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马永亨修、黄榜纂，原书八卷，残存明崇祯十五年（1642）刻本七、八两卷。

清代修志五次，完志五部。清代第一部《房山县志》修纂于清康熙三年（1663），佟有年修，齐推纂。共十卷，列沿革、形胜、绘图、分野、风俗、疆域、山上、城池、坊市、里甲、乡村、户口、赋税、盐法、荒政、土产、公署、学校、坛壝、庙祠、古迹、寺观、陵墓、关梁、建官、例贡、人物、诏记、碑记、记略、诗集等 31 门。此志在房山旧志中为承前启后之作，这部县志在明万历《房山县志》的基础上续修而成，在明万历《房山县志》残佚的情况下，保存了明代的珍贵志料，它奠定了房山旧志的基本规模，是房山早期旧志中最为重要的一部。

康熙三十七年（1698），房山知县罗在公续修《续房山县志》一卷，列公署、禁革、官宦、烈女、碑记、诗五门。此志除单行刊印外，并以康熙三年（1663）《房山县志》十卷的原板加以重印，与《续志》合订成书。《续志》订于七卷之后，其中的诗作，则附于十卷后。客观的说，《续志》内容不多，价值不大，

属于房山县修志史上的非主流县志，但是罗在公把《续志》与康熙三年（1663）《房山县志》合订重刊，对康熙三年（1663）《房山县志》的存世有积极贡献。

清代还有两部非主流县志。一部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房山知县张世法的《房山县志》，另一部是咸丰七年（1857）房山知县高骧云的《房山志料》。张世法的《房山县志》其实是他的个人诗文集，内存其文章碑记十三篇，诗作二十一首，其史料价值不大，志中的内容，也未被后续的《房山县志》所采录。高骧云的《房山志料》是一部房山西部山区的专辑志料，尽管不是一部系统的志书，但是，其补前代县志之不足，专门对房山西部山区的山川脉络，里居远近，分条缕析，兼作考订，并绘岭西、山后等图。堪称一部弥补旧志空白的山区志料专辑。光绪《顺天府志》称其为“最为有用之书”。

清代最后一次系统修志在晚清的同治十一年（1872），房山知县王尔琨延李恩德纂修《房山志略》一部，在前志的基础上“述旧增新，删讹补漏”，此志未及刊行，只有少量抄本流行，至年久缺失。民国时期，房山县先后四次修志。第一次在民国四年（1915）知事张象琨任上，延陈学愚主纂，甫月而废。第二次在民国十一年（1922）知事沈严任上，第三次在民国十四年（1925）知事尹铭绩任上，均未果而终。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三次修志虽未成书，但做了大量工作，积累大量的志料，为后续的修志奠定了一定基础。

民国十七年（1928），廖鹏飞继任房山县知事，集全县文化名流，开始了自民国以来的第四次修志。历时两个月，形成民国十七年本《房山县志》，廖鹏飞修，高书官纂。

民国十七年《房山县志》，是历代《房山县志》中最为珍贵的一部，此志集房山旧志之大成，是房山县旧志中的问鼎之作。这部县志，汇集、承袭了康熙三年（1664）《房山县志》、同治十一年（1872）《房山志略》的基本材料，充分利用了民国四年至民国十四年的三次修志成果，续编了同治十一年以后至民国十七年的房山县志料。志述了房山县自元初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间的房山县政治、经济、宗教、教育、地理、物产、名胜、人口、里居、民俗等方面的历史状况，堪称一部权威的《房山县志》。

此志八卷四十七门，内容详尽，虽多载于前志，但兴革之外甚多，兼有考订。山川一门，前志仅记三十一山，本志地理一类占全志三卷，将山脉、河流、分别志之，尤详名胜古迹、寺观、祠庙、陵墓等项。志内实业、交通、金石、自治等类，为前志所省略，选举类除移录增补前志科举、议员、保荐外，并载录“全县大中学毕业生一览表”，为民国以来的新资料。很有史料价值。

最为可贵的是，本志保存下了晚清到民国，中国社会变革转型时期在房山的史料，生动详实地记录了房山县在社会变革转型期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现实，尤其是百日维新后房山县的变革。从一个京畿郊县的侧面，真实地再现了这个历史进程。如庚子事变，在人物传中多有涉及，志中记载房山人民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自发组织起来，与入侵房山的八国联军英勇抗争的事迹：饶乐府人刘青绶，“创办本村团练，联军进京后，地方大乱，逃兵犯长沟峪，赖团兵保护得保全。”县城南关陈智，“纠绅士倡团练，京城陷，溃兵到房，汹汹将不测，公冒险见其首领宋公，城厢赖以获安。法兵据县城，民教有相仇者思报复，公竭力排解，民教得以相安。”周口店村常履贤亦办团练，京津失守后，联军到周口店村中勒索牛只，常履贤率团丁与洋兵理论，要求减少牛只数量，被洋兵杀害。志中还记载了国破家亡的惨状：京师陷落，张振绪的三个女儿四姑、十姑、老姑正巧住在京城，义然自杀死难。英德军由易县侵入房山，内城赵家胡同任秉璋妻投井殉节，吉羊村李维纲之女李姑则服药自尽。

志中还反映了新旧体制的演变过程。志载，“光绪三十四年秋，奉直录筹办地方自治总局札，速成自治学社，造就自治人才。”十月十六日，房山县自治学社成立，全县分五区，各区公推公正绅士六人入社学习。宣统元年（1909）二月，房山县又根据顺天府的指示，成立自治研究所。同年六月成立自治预备会。宣统三年（1911）五月，房山县议会成立。又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县巡警总局，全县五区各设巡警分局；光绪三十三年（1907）儒学废，劝学所成立，管理全县教行政。民国十四年（1925）改劝学所为教育局。

客观的说，民国十七年（1928）《房山县志》也有明显的不足。其一是详于录，简于述。一般的说旧志的修纂方法主要有二，一是录，即载录赋税、人口、官员、沿革等档案材料，以及历代碑记、诗文等，本志在此方面尽其详实；二是述，即记述本县当述事物，比如古迹名胜，陵墓寺观等等。本志在此方面则失了简略，无论在记述寺观还是陵墓，只记述其大致方位，概无其他介绍，例如：“清敬谨亲王陵，在东甘池村西。清克王陵，在北上万西。”“清凉寺，在芦村。万佛寺，在吉阳村。”

本志在载录的碑文和诗文中，也未脱历代修志之弊。即偏取于修志者自己撰写的碑文及作品，至使历代一些有价值的碑文和诗文作品漏载。仅以碑文为例，房山地区唐辽金元碑刻众多，可是本志中所载无几。

本志的在篇章结构上也存在着疏漏和混乱。比如，目录中，“卷四政治”的“学校”和“财政”二门之间有“警察”一门，可是实际上在志书的卷四“学

校”一门之后并没有“警察”一门。“警察”一门的实际内容则在卷六中出现，而卷六的目录中并未有此门。再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后的至宣统初的县议会从筹备到成立的史料，在“卷四政治”以“自治”一门出现，本属妥当，但述而未尽，又在卷六中出现，即显逻辑混乱。且属于政治上的变革活动，却在卷六中和旧的“科举”并志，更显失度。

本志在志述的史料本身上，也存在着讹误。如清罗在公续志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可是，在廖飞鹏《房山县志序》中却云：“续修于康熙三十年罗公营山。”罗公营山，即罗在公，罗为四川营山县人，所以有此称谓。

尽管民国十七《房山县志》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是瑕不掩瑜，这部县志实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志书。在北京旧志中，民国十七《房山县志》亦为精品之作。

# 云居寺历史上的禅律之争（上）

齐 心 王德恒

云居寺续刻石经，开始于辽圣宗（耶律隆绪）太平七年（1027年）。由韩绍芳、留公主持，按照唐五代以来未曾刊刻完毕的《大般若经》的次序，将《大般若经》卷三十六、六十八、七十三、一百四十七、二百二十三、二百三十八、二百五十四、二百六十四、二百六十七、四百八十六镌刻出来，所以，现在云居寺石经中都题有“大辽太平岁次丁卯重修此经”的题记。

这十卷经刻完后，虽然雕刻《大般若经》没有停止，但是，刻经的内容，组织形式乃至对原来所刻制的石经，发生了一个十分重大的本质的变化，变化表现为两种形式：

第一，有些唐朝刻的石经被磨掉了，但是，唐朝的纪年还保留着，而重新刻上了新的内容，同时，将辽代的年号也刻了上去。这样，就形成了一块石经两个朝代、两个年号的奇怪现象。当然，人们也不了解磨掉的石经是什么内容。

第二，刻经的底本发生了变化，不再使用《开元释教录》的经本，而由辽朝皇帝亲自指定的大德高僧重新编定新的佛教经典目录，这一套目录不但用于刻造《大藏经》，更重要的是也用来刻造房山石经。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是谁做的呢？

## 云居寺以禅宗为主的修习受到挑战

《云居寺》（杨亦武著）一书中，注意到了自晚唐以来，云居寺处于禅律并处的状态。但是，到了辽代云居寺改以律宗为主了。

当然，云居寺从禅律并处的情况，决不是自然的平安的过度到以律宗为主的，这期间，有佛教中的宗派相争，更重要的也反映了宋辽之间在文化上的竞争。正是这场竞争，才导致了云居寺历史上的一大谜案，导致一次重大的“毁禅、灭禅”事件。

笔者之一的齐心和王玲（北京历史学会会长）曾提出问题：律宗在佛教史

上影响并不甚大，它在燕京为什么得到特殊地发展，尚待进一步研讨。（《辽燕京佛教及其相关文化考论》载于《北京文物与考古》1991年，北京燕山出版社）

经过几年对佛教史料的检索，初步找到原因，得出一个浅见，写在这里，有待方家指教。

### 唐代纪年 辽代刻经

在《云居寺》一书谈到，“……辽代刻经中，中型石版是把唐代刻经磨掉后重刻的。在房山石经中，唐太和元年至咸通四年（827—863）三十余年间所刻石经多在碑额下端刻有佛、菩萨、天王、胁侍、飞天、花草等线雕图案，碑额多刻大字的题铭。这些图案在辽刻经版中因未全部磨平还能看得很清楚。例如，辽清宁九年（1063）刻《大方等大集经》三十卷，‘让、国、有’帙为这部经卷十八至卷三十，共计二十七石，所用经版与前十七卷不同，大小参差，长短不一，尤以第七洞一百九十四、一百九十六、一百九十七、一百九十八、二百零四、二百一十一、二百一十三、二百四十三、二百六十一、二百六十九诸石上端未被磨掉的唐刻花纹图案最为明显。此外在辽刻《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五百三十三（八洞八百一十七石）刻有‘开成八日记……赵洛清大和九年至开成四年送经条山院王全政记’，以及卷五百五十一（八洞五百八十石）刻有‘亲事兵马使黄法敏于大中十年四月八日巡视至华严堂故记’等唐代年号的题记。这些题记都是刻在碑侧。这是因为当时辽代只把唐碑的背面磨平，而碑侧未动。辽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今天还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2005年，在石经山上的古井中，又发现了十数块唐代的残损石刻，能够鉴定出来是人为毁坏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 背 景

云居寺静琬凿石刻经，以备法难为出发点。他的出身本是禅宗南岳天台宗，为二祖慧思的弟子。天台宗开宗是以《法华经》为基础的，尊龙树为本宗学祖。取“三教圆融”之意旨，悟“一心三观”的方法。日谈义理，夜禅思维，基本统一了南北不同的学风。慧思的“诸法实相论”是天台宗的中心思想。认为一切诸法既是实相，万有差别的事项皆是显示法性真如的本相，所以，提出“圆



融三谛”“一念三千”的认知禅法。整个宇宙都不过是“介尔一念心”，没有这个“一念心”也就没有了一切。尽管强调的就是心外无物，但是，毕竟心物一体，用心识物，在认识论方面比较好理解。

静琬跟从慧思修得了这套方法，为他的北上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所以，静琬刊刻石经，开始应该是《法华经》。后来续刻了《华严经》、《涅槃经》、《维摩经》、《金刚经》、《佛遗教经》等。看来，刻经初期，在三藏中，是以“刻经”这一藏为主。也就是说自隋迄唐，基本上是在禅宗的影响下，进行刻经事业的。

禅宗是南印度僧人菩提达摩泛海到中国后创立的。他先到广州，后至金陵，与梁武帝问答，机缘不合，于是渡江到洛阳，入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参禅，时人称为“观壁婆罗门”。后来有僧人神光前来晨夕参问，终于得到达摩的指点，学会了参禅方法，彻见心性，达摩将他的名字改为“慧可”，付以正法眼藏，并传授袈裟作为传法的信物。以后，逐渐普及，南北俱传。到了五祖弘忍时代，基本普及。弘忍有两个及门弟子，更是将此宗发扬光大。这两个弟子就是神秀和慧能。

神秀（606—706年）本姓李，开封人，少年出家访道，几经波折，到了蕲州得见弘忍，成为弟子，不久，因为其领悟深刻，论辩精辟，成为七百余坐弟子中的上座。唐武则天当政时，听到他的名声，将他召到长安，在内道场供养，中宗对他更加礼重，得到了“两京法主”、“三帝国师”的称誉。此僧百岁圆寂，其圆寂之前尚能说法，所以，他得到后世宠信，这也是重要的原因。

慧能（638—713年）和神秀走的是不同的路子。他祖籍和房山相临的涿州，后流落到南方，成为一个樵夫，一字不识，偶听人诵《金刚经》便悟道了。于是前往冯墓山谒弘忍，开始他入樵坊做杂务。八个月后，弘忍招弟子根据各自对佛法的见解，作偈说明。这就是那首“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来源。弘忍见他真正得到真谛，秘密将衣钵传给了他。他离开了冯墓山，隐居十五年，待神秀入宫才出来说法，成为禅宗一代宗师，禅法广播天下。他经常对弟子们讲的就是：“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他的弟子有行思、怀让、神会、玄觉、慧中、法海等人，都名重一时。法海将慧能的言行集为《六祖坛经》。

禅宗自开创以来到宋辽对峙的时代，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终于成为佛教中站主导地位的力量。按照禅宗的教义，通过宗教仪式或者宗教典礼去获得佛的保佑是徒劳无益的。甚至连祈祷、念经、叩拜也毫无价值。他们认为佛就是思想，就是“悟”，它超越语言和文字之上。至深之理既讲不出来，也写不

出来。信佛的人必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探求佛理，才能得到佛的庇佑。最终，佛也是用他的“智慧”指点你“悟”而解脱烦恼。内视，关心，静坐，寻求顿悟，终归于“无”，或者虚无，“空”，而达到人生至高境界。

这种思维方式暗合了老子、庄子的思想，特别投意于宗法制度下的士大夫，于是，由谈玄转为坐禅也是情理中的事情。禅学和道家的结合，本质上达到了西来的文化和本土文化结合到非常致密的程度。

佛教的起源和中国道家的思维发生有着共同的精神上的基础。那就是，人被安放在一个避免不了的灾难和烦恼的世界之中。于是，这个世界因为物质的欲望和恐惧而产生不同的面貌。佛的精神并不是要和这个世界对抗，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他找到了用自己内心的精神和外界平衡的支点，本质上表现为一种妥协，寻求充盈于天地之间的有生命的浩然元气，将世界浓缩在自我意识之中，“我思故我在”，无思则一切皆空。谐和美妙在静坐思虑中得到了。这就是佛界。思索达到的知晓，整个世界回复到自上来，原来，物质世界中各种美妙都是虚幻的，只有心灵上的东西得到感悟才是一种靠得住的真实存在。佛祖的时代已经不好考订了，但是，由他数世传道的弟子们的行为，那些瑜珈大师们的身上，能够看到这种精神本能。他们确实能在静坐中，进入心醉神迷的状态，那种无可言喻的自我陶醉，使佛的精神和形象宛如“无风处的火焰”，这种状态，能使现实的物质的世界消磨为思想的天地，独尊的天地。一切在静坐和思维中得到，就是禅学的本意。禅宗发展得终于到了“禅教合一”的地步。禅即佛，佛即禅。禅教合一的局面在唐代已经形成。

这种以思索为主要修炼方式的佛教和马背上不断跃动着的民族很难找到契合点。所以，禅宗在契丹族中并没有得到重视，到了宋辽交兵的时候，辽朝统治者虽然还是笃信佛教，但是，他们排斥禅宗。他们从萨满教中得到的启示是只有通过信仰和一定的崇拜形式，付以真诚，以身事佛，才能获得佛的保佑和赐福。

自从契丹在中国北方占领了燕云十六州，稳定了统治之后，承天皇太后摄政期间，佛教便开始得到很大发展。承天皇太后归政辽圣宗之后，这种发展依然在持续。开始，都是以广建寺院，多加施舍，作公德，积善果为对佛教信仰的途径。加之他们虽然勤于对汉文的研究，但终究难以熟读阐释禅宗的佛经而理解其艰深的奥意。而此时，主张身体力行的律宗已经传了进来，和律宗有同样思维方式的慈恩宗（又称法象宗）的唯识论因为比较容易理解，使得北方的一些大德高僧转而修习唯识论，唯识论中含有的哲学义理和创建者玄奘的崇高

威望，也能够和禅宗抗衡了。从这时开始，辽朝统治者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皇权对禅宗进行排斥。

### 何人磨碑 有何因果

云居寺石刻大藏经，虽肇自隋唐，实成于辽金。将此近六千卷，字以亿计之大藏佛典，妙笔正书，刻诸贞珉，藏之深山，联绵九代，历经千载而成。其功德早已超越于历代大德以备法灭之初衷，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灿烂文化的一个优秀代表。

“辽代那些在一百余年中，辛勤耕耘于浩瀚释典的编校大德及雕印匠师，是值得纪念的。正是这些宗师巨匠继承与发展了前代所创造与积累的经验，雕印了校刊精审的汉文大藏经。尤其是辽藏的主持者与指导者，圣宗统和时期燕京悯忠寺钞主无碍大师诠晓的生平与事迹，对于研究辽朝佛教史来说，是必须弄清楚的。而前此恰恰是被忽略了。”（见《历史博物馆馆刊》1986、9）

研究诠晓，就要从现存于云居寺塔院碑廊的《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及《重镌云居寺碑记》提供的线索开始。两碑记俱镌刻在碑阳，右面刻《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左面刻《重镌云居寺碑记》。额为篆书“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会之碑”。碑阴为重修云居寺千人邑会邑首、邑众及僧侣名录。用本地所产的大理石雕成。通高287，宽105，厚28厘米。自240厘米处收分，上出额首。碑文凡49行，行64字，字3X3厘米。碑文大多都可辨认。与早年碑拓校核再三，除个别缺泐严重之字外，全文贯通，来龙去脉清清楚楚，为统和二十三年王教出资重镌之物。此碑史料价值之珍贵向无疑义。碑中明确记载：

燕京左街悯忠寺钞主无碍大师笔受

弟子沙门智光撰记 石匠李延照刻字

对这两个二碑记，研究引证者很多，但是，仅就笔者所见，有几个具体问题还是有必要加以解释。

《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会之碑》（简称邑会碑）是辽穆宗应历十五年王正立的，这一年，辽穆宗亲临云居寺，参加盛大的浴佛节法会。所以，王正始有立碑之举。之后的四十年里，燕京地区发生了由宋朝要收回燕云十六州的两场战争，战火烧到了云居寺，将王正所立的碑刻焚坏。但是，诠晓大师由于长时间住在云居寺，将碑文熟记在心，所以，晚年时还可以“笔受”。王正的儿子

王教在南北议和的情况下，见父亲立的碑遭到战火焚坏，所以请诠晓、智光师徒将原碑正面磨光，重新刻制。而诠晓正是这方面的行家，因为，正是他已经将许多禅宗、尤其是东土禅宗自己著述后来被刻到石碑上的经典磨掉了。他身负皇家使命，到云居寺来，将不合于辽圣宗朝主张的佛经，如若上石就要磨掉，是纸经或者木经要焚毁。

笔者如此说，自然是有根据的。

在高丽大觉国师义天的著述中，有一条记载：

《跋飞山别传议》中称：“近者大辽皇帝诏有司，令义学沙门诠晓等再定经录。世所谓《六祖坛经》、《宝林传》等皆焚，除其伪妄。条例则《重修开元续录》三卷中载之矣。”（转引自宋嘉义元年沙门宗楷《释门正统》卷八）。

我们首先看看题跋的高丽大觉国师义天的经历。

据中国佛教协会所编印的《中国佛教》记载，高丽义天和尚是高丽国文宗的第四个儿子，11岁奉旨出家在灵通寺，修习华严宗。后来被封为“佑世僧统”。宋朝元封八年（1085年），率领弟子寿介等人到宋朝学习佛法，向宋朝敬献了佛经、佛像。宋哲宗接见了，安排他在启圣寺居住研习。当时，中国的贤首宗的各种经论已经遗失，也许这个情况义天早就知道，所以，他把朝鲜留存的贤首宗经论带来宋朝，使得这一重要的佛教宗派得以继续在大陆中国流传。在启圣寺居住了一个阶段后，义天到天竺寺授传天台宗。同时，又听灵芝元照讲说戒法，得到《四分律钞资持记》等经文。义天周游了宋朝境内的诸多寺庙灵塔，在元佑三年（1088年）带着一千多卷佛经回到高丽，在高丽大事宏扬贤首、天台二宗。这时，他又得到了辽朝所赠送的《契丹藏》。由于缺少史料，目前尚不知到义天走的哪条路回的朝鲜，如果走水路，从山东登州乘船可以不经过辽国，但是，如果走旱路，必经辽国。当时，辽宋之间正处于和平蜜月期间，他完全是可以走旱路的。如果不是经过辽国，可能辽国也不会主动对这个属国主动赠送《丹藏》了。

当然，义天能够得到契丹所赠《丹藏》，并不因为他是大德高僧，因为他是皇子，统领全国佛教。但是，义天确实信仰佛教，研究佛教。他倾其毕生心血著出《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以简称《义天录》被各朝僧俗所看重。访宋期间，义天作《跋飞山别传议》。在这个跋中提到了诠晓集《续开元释教录》（跋作“重修贞元续录”）三卷之事，应是可信的。

按《义天录》收诠晓著作多种，其卷一所收《弥勒上生经科》一卷，即1974年在河北应县木塔发现的《上生经疏科文》。因此《义天录》与《上生经

疏科文》题记都是诠晓所著。

辽圣宗至辽兴宗年间高僧希麟备极称赞的“钞主无碍大师和诠晓是何关系？”曾经有朋友如此问我。我答，两个名称，一个人也。

《顺天府志》卷七（北京大学影印本）记悯忠寺称：“释迦太子之殿乃无碍大师诠晓创始所建，辽圣宗统和八年也”。此记与《上生经疏科文》题记之时间、地点、释德称呼竟榘卯合枢。可以肯定，《义天录》中“旧名诠明”的诠晓，就是圣宗统和时期燕京悯忠寺的钞主无碍大师。

为经书作解称“注”，为注解再解称“疏”，总汇疏再解为“钞”。钞主应该是为疏作解的总领。诠晓被封为“无碍大师”，为总领群经的讲解和注钞的。是大学问僧。

诠晓重修的《续开元释教录》在统和五年以前已经完成，“传灯在念”，这在云居寺雕印大藏经准备了底本。

统和二十三年（1005），诠晓年逾古稀，但仍可笔授王正之碑，作重镌之记。据此推断，诠晓大师大致生于五代后唐天成年间，卒于圣宗统和末年。

焚毁铲除的主要是什么经典

诠晓奉圣宗之命删除焚毁禅宗的经论，主要者是《六祖坛经》和《宝林传》，大的背景前面已经说明，具体到这两部经典，需要详细探究，才能明白为什么在云居寺出现唐代碑刻被磨掉而在原碑上刻制新佛经的原因。

《六祖坛经》如前所述，是一部记录慧能言行的书，当时的禅宗一直将这部书视为经典。实事求是地说，《六祖坛经》对于中国环境下的知识份子是有着思想上的启迪作用的。但是，他和佛家是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的。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些佛家的语言和部分思想，更多的成分来自老庄哲学。对于这样的一部书当作佛教经典，当然不会得到辽朝这样以契丹族为主的朝廷的欢迎。实在是，他们在文化上还处于启蒙阶段，接受不了这样的思想。同时，律宗简单明了的仪式，也能起到安定人心教化人众的作用，怎能让主张静坐思考，整天琢磨“空”、“无”、“虚”的莫名其妙的“佛”来引领百姓呢。再说，可以将印度的释迦牟尼看成庇佑众生的神，怎能将一个樵夫的话当成神来崇拜！所以，视《六祖坛经》为伪妄，烧之、砸之、毁之，是有着理由的。

《宝林传》是禅宗云门宗的经典之一。是由缘密圆明三传的灵隐契嵩（1011—1072）祖述《宝林传》，反对天台宗信奉的《付法藏传》的说法，厘定了禅宗的世系为二十八祖，著《禅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及《传法正宗论》。他还针对辟佛的议论作了《辅教篇》等，由于他擅长文章，得到宋仁宗

和在朝的官僚们的称赏，使他的著作被准许入藏流通，成为经典。这就加强了云门宗的地位和气势。

当时，宋辽交恶，宋朝信仰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自然不能为辽朝所接受，何况还是一部述说禅宗世系的“书本”，当然不应该传播。即使后来有了“澶渊之盟”，在关于佛教的态度方面，辽朝一直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认真对待经典，几代皇帝亲自读经，和高僧交往，探讨真谛。后来，他们发现，许多在宋朝传播的所谓佛教经典，都是东土人自己撰述的，有的是学习心得；有的是另起炉灶。甚至许多经典距离原来的佛教本意越来越远了。只有律宗和慈恩宗还保持着佛教的本意。这样，当圣宗同意在云居寺刊刻大藏经的同时，他也委派了诠晓等僧人认真清理佛经，“再定经录。世所谓《六祖坛经》、《宝林传》等皆焚，除其伪妄。”而且要彻底地使人们知道，禅宗为外教别传，更正当时禅教一致的常说。

这就是云居寺唐代许多经版被磨光的原因，推测，那些被磨掉的经文，就是《六祖坛经》和《宝林传》之类的“伪妄”之经。

为此事，诠晓多次来云居寺，和寺主谦讽成为朋友，熟悉王正的碑刻是十分自然的了。幸亏由于诠晓的熟记碑文，古稀之年还能笔受，使得云居寺保留了重要的史料，否则，今天我们研究起云居寺来，将遇到更大的困难。

### 对诠晓其人的再探讨

对于云居寺乃至中国佛教来说，诠晓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自从他出现，云居寺“由禅改律”。但是以前对他研究介绍得太少，所以，这里有必要将搜集到的材料尽可能完整地介绍此僧。

前面进行了推算，诠晓大约生于晚唐时代，在辽穆宗十五年（965）时，他和云居寺主持谦讽、盐铁判官朝仪郎右补阙王正成为好友。此时应该进入不惑之年。到了圣宗统和二十三年（1005），他六十五岁以前，年近七十，但是，还能记住35—40年以前一千多字的碑文。此时，王正已经逝世，他立的《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并序》因为战火，内容全部脱落。澶渊之盟后，宋辽和平相处，王正的儿子王教担任了“诸行宫都署判官”，见父亲所立的碑伤缺，便出自己的俸禄钱重修。他只所以能够重修，是因为年近古稀的诠晓还记得全部的碑文，而且笔受给了徒弟智光。由此可见诠晓对云居寺了解之深关系之密。所以笔者推定，诠晓势必在云居寺驻守了很长时间，而且是奉旨行事。这就是

前面所引用的，《跋飞山别传议》中说的：“近者大辽皇帝诏有司，令义学沙门诠晓等再定经录。世所谓《六祖坛经》、《宝林传》等皆焚，除其伪妄。条例则《重修开元续录》三卷中载之矣。”

在此次驻守云居寺期间，诠晓将《六祖坛经》和《宝林传》等禅宗的代表经论焚毁或者磨掉了。诠晓的另一重要的事迹是领衔“再定经录”，这就是希麟《续一切经音义》书序中所说的：“自开元录后，相继翻传经论及拾遗律传等，从大乘理趣六波罗密多经，尽续开元释教录，总二百六十六卷，二十五帙。前音未载，今续之也。伏以钞主无碍大师，天生睿智，神授英聪，总讲经纶，遍糅章抄，传灯在念，利物为心。见音义以未全，滤检文而有阙。因贻华翰，见命菲才，遣对曦光，轧扬萤烛。然或有解字广略，释义浅深，唐梵对翻，古今同异。”由此可知无碍大师诠晓是在编定了四百八十帙之后，请希麟续音义（对所编选的佛教进行音义方面的注解）。诠晓在“再定经录”的过程中审定的《开元释教录》和撰述的《续开元释教录》，以及希麟受诠晓委托撰述的《续一切经音义》一起，成为辽圣宗时代雕版及石刻的底本，一直延续到了金代还在使用。罗昭先生已经考证出来金代在云居寺许多刻经的底本就是诠晓编定的。

可考的诠晓的事迹还有，即当时的佛教弘场（统领主持佛教的地方）悯忠寺的“释迦太子之殿，乃无碍大师诠晓创始所建，辽圣宗统和八年也。”

《顺天府志》卷七关于悯忠寺的历史记载表明，从唐初卜地建寺、赐额；而后兴建双塔，会昌灭法独存，大中年间增大。到了唐昭宗年间（景福）建七楹三级之阁，皆系皇帝或地方军政首要所为。统和八年（990），能够在如此重要的、实为僧统官署的悯忠寺内，主持创建释迦之殿，可见诠晓大师在燕京佛界和朝廷都实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于诠晓的逝世，《三宝感应要略录》三卷，日本《大正藏》卷五十一作宋沙门非浊集。按此集之卷下“第十四释诠晓法师发愿造慈氏菩萨三寸檀像感应”记称：

“释诠晓法师发愿造三寸刻檀慈氏像，祈誓生兜率天，著《上生经疏》四卷，以明幽玄。梦其像渐长大，金色光明赫灼，对明微笑。明白像言，我等愿求生兜率天，将得生不？像言，我既得释迦文大师要势付属，不念尚不舍之，况有念愿？作是已，还复本像。明秘不语他人。没后见遗书中，知其感应。临终之时，傍人梦见百千青衣人来迎，明指天而去矣”。

看来诠晓在晚年曾经造菩萨像，著《上经经疏》四卷，辨明生死两界。临歿前，留言是被神像接引上天了。

关于诠晓对佛教经文教义的研究，在《中国佛教》中，认为他是慈恩宗的代表人物，是唯识论的大师，说有著作六种，可惜全部逸佚。实则不然。笔者近年进行了检索，参照张畅耕、毕素娟等先生的考证，目今可见的诠晓的著作还有：

高丽僧《义天录》中，所收诠晓著作有六种七十五卷：

- 一、《法华经会古通今钞》十卷科四卷，大科一卷。
- 二、《金刚般若经宣演科》二卷，宣演会古通今钞六卷，消经钞二卷，科一卷。
- 三、《弥勒上生经科》一卷，大科一卷，会古通今钞四卷。
- 四、《成唯识论详镜幽微新钞》十七卷应新钞科文四卷，大科一卷。
- 五、《百法论金台义府》十五卷，科二卷，大科一卷。
- 六、《续开元释教录》三卷。

在我国境内，可见的诠晓著作，已见三种九卷：

一、《法华经会古通今抄》之卷二、卷六。于应县木塔四层秘藏，1974年发现。

《妙法莲花经玄赞科文》，即《法华经疏科》四卷之卷二卷残，见于敦煌伯希和（法国）P，2159纸背。

二、《上生经疏会古通今钞》之卷二、卷四残卷、《上生经疏应新钞科文》残卷。1933年见于赵城广胜寺金藏，后编入《宋藏遗珍》。前者将诠晓误写为唐释，后者记佚。经过和《义天录》及应县木塔发现的经文对照，都是诠晓之作。

《上生经疏科文》，在应县木塔中所见，正是统和八年时，诠晓主持修建悯忠寺时候，在燕京刊刻的。

三、《成唯识论述记应新抄科文》之卷三，发现于木塔四层，这是一部重要的关于佛学认识论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哲学价值。

《成唯识论述记科文》之卷一、卷二残卷。1933年出赵城广胜寺，后编入《宋藏遗珍》，误记为“大唐慈恩寺翻经沙门窥基撰”。按此二残卷之首纸均阙。从各纸接缝处小字题记，证为金代在晋南募化所刻。每纸二十八行，行二十字左右，版式与木塔所出《成唯识论述记应新抄科文》相同，内容相继。应该为诠晓所作。因为世所见窥基的作品，虽然同为唯识论内容，但行文差距明显，何况行文中每每提到玄奘和窥基。这样，赵城金藏的两卷和应县木塔出土的卷三，基本完璧。这是中国佛学和哲学史上的一大幸事。



诠晓的著作，不仅在辽朝，而且对宋朝、日本、高丽均有一定影响。1072年入宋的日本学僧成寻，在其《参天台五台山记》卷六之熙宁六年（1073、辽道宗咸雍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有如下记载：

大宋国熙宁六年（癸丑），二月廿八日（壬寅）“二入夜，三藏有请，即参问。储种种珍果，有酒菜。地（考地或此字）比（北）多学慈恩宗。予学玄赞由被告示。小僧问《摄释镜水抄》有无。答无有。给以契丹僧作诠晓抄，释玄赞书也者。三藏问八解脱大小乘观差别，以天台义答了”（《大日本佛教全书·游方传全书第三》15卷）。

按成寻索要的《摄释镜水抄》，即唐释栖复作《法华经玄赞要集》三十五卷，但开封没有这书。所给予的是“契丹僧作诠晓抄释玄赞书”。看来，当时诠晓不但在辽国有势力和影响，而且在宋朝、日本都有很大影响。诠晓的这本书流传到日本后，有多家注释，但是，注释繁多，使得本文难以辨认了。所以，使得许多人认为，诠晓已经没有著作流传了。

实际上，他的这本书是有底本的，那就是应县木塔所出的《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熙宁六年上距圣宗统和时期已过半个多世纪，宋京开封传法院三藏师尚以诠晓著作赠日本游方僧，足见诠晓著作在宋朝亦受重视，日僧成寻辗转以得。

唐玄奘法师的弟子，慈恩寺沙门窥基，曾作《百法明门论解》、《成唯识论述记》、《观弥勒兜率天经赞》、《金刚经赞述》、《法华经玄赞》等百部章疏，集慈恩宗之大成，被称为慈恩大师。诠晓更为上述五经作会古通今钞应新抄及诸科判，由此可知诠晓为燕京慈恩宗的代表学者。诠晓的著作对于研究辽代佛教史特别是慈恩宗的活动情况，是一批珍贵史料。由诠晓主持编校的辽藏选校之佳，可从高丽高宗朝的开泰寺僧统守其撰述的《高丽新雕大藏经校正别录》得到证实。守其据宋本（宋藏）、国本（高丽初雕本）、丹本（辽藏）互校，以雕新藏（即今存之高丽大藏经）。其修删、两存而涉及辽藏者凡六十八部。除极少数丹本有误外，其余皆以丹本为佳。例如：

“止函《佛说频毗婆罗诣佛供养经》西晋沙门法矩译右一经经名译主诸藏皆同。而其文相国本、宋本全同，丹本大别，似未知去取。今按开元录云，此经与《增一阿含经》第二十六卷等见品同本异译。检之国宋二本，与彼全同。即是彼经中抄出耳，何为异译耶？意者，宋藏失法矩译本，遂抄彼本部为此别行。然彼增一即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既抄彼经而云法矩译者何耶？况凡是抄经非异译者，《开元录》中曾被删去，此何独存耶？故今以丹藏为真本云。又

为看旧国宋藏奢，具录正经如左……”

对照高丽藏〔止〕函，辽藏〔若〕帙，皆收此《佛说频毗婆罗诣佛供养经》，内容与守其所录相同，应是据诠晓编定的辽藏所改正的。

又如，即使是一经数译而辽藏选本为佳者，守其亦十分谨慎地对待：

“若函《舍卫国王十梦经》按此经与《增一阿含经》第五十一卷《大爱道般涅盘品》同本异译。今国宋二本文义相同，此丹本与宋本义同文异，似非一译。而未知是非，不敢去取。然此丹本详悉。今且双存，以待贤哲。”

再如，契丹藏之删而未取者，守其亦删之。守其删削之因，实即诠晓不取之由。如国、宋本皆有《佛说木穗经》，丹本独无。守其校后认为，此经与已收之《木穗子经》实为同经异名，遂删之。辽藏不收南唐释恒安《续贞元录》中之《一切经源品次录》三十卷，《大佛名经》十八卷。守其亦绝然删之。对《一切经源品次录》，守其认为：“今检但是标举经中首尾之言，于看览藏经者所益无几，今且除之。”对《大佛名经》十八卷的看法前曾述及，兹从略。

《校正别录》，证实了诠晓主编的辽藏选校删削之精密，成为高丽编定大藏经主要参照物。许多研究者，如著名的日本池内宏氏就认为，宋、丽、辽三种大藏经，以辽藏为最优秀，（见《高丽朝的大藏经》）。这与其所据的底本有关系，也说明诠晓大师治学功力、佛典造诣之博大精深。

# 云居寺历史上的禅律之争（下）

齐 心 王德恒

## 云居寺的律宗和慈恩宗

《云居寺》书中论述“自唐以来，禅律共处，至辽代，则改为律宗。”与史相符。

前文论及当辽圣宗朝时，由辽圣宗颁旨、诠晓执行对禅宗经典在燕京进行焚毁；到云居寺砸磨之事。开始此事为佛教中的教派之争，和宋辽两国战争和政争的背景。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和好，双方均谨守条约，和平友谊成为主旋律。但是，在文化方面，暗中却是呈现出竞争状态。宋太祖时代，宋朝抢先刊刻了《大藏经》，因为是刊刻于开宝年间，故称为《开宝藏》。此经刻完后，曾经应高丽、日本国僧俗之请，赠送给两国。《开宝藏》中有许多新译经，后来有在真宗、仁宗时代经过两任皇帝亲自校订。按照当时的状况，宋朝也应该赠送给辽朝。因为赠送佛教为祈福表示友善之道。而且当时宋辽的关系也确实友好。

《契丹国志》卷七记：“宋真宗上仙，薛贻廓报哀入境，幽州急递先闻。帝不侍贻廓至阙，集番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因谓宰臣吕德懋曰：吾与兄皇未结好前，征伐各有胜负。泊约为兄弟二十余年，兄皇升遐。况与吾同月生，年大两岁，吾又得几多时也。因又泣。复曰：侄弟（宋仁宗）圣年尚幼，必不知兄皇分义，恐为臣下所间，与吾违约矣。后贻郭至阙，达宋帝圣意，喜谓后曰：吾观侄弟来意，必不失兄皇之誓……又谓后曰：汝可先贻书与南朝太后，备述妯娌之好，人使往来，名传南朝。又诏燕京悯忠寺真宗御灵，建资福道场百日而罢。复诏沿边州军不得作乐……下令国中应内外文武百僚僧道军人百姓等犯真宗讳者悉令改之。”

《辽史·圣宗纪》：“（太平二年）三月丁丑，宋使薛贻郭来告宋主恒殂，子桢嗣位……戊子，为宋主饭三京僧。”

在如此友好的气氛中，宋真宗生前或者新即位的送宋仁宗将新雕印的《大藏经》送于辽国是有可能的。此举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大藏经之上，它真实地反

映了“澶渊之盟”(真宗景德元年、圣宗统和二十二年)两朝之间确实存在着和平相处的友好关系。可惜这一历史史籍失载,我们只能从刻经情况来进行考证判断。

房山《云居寺石经简目》金刻宋译三十帙是按照宋藏原有序列下来的。此三十帙之后,又续刻法天翻译的《分别缘生经》一卷、《未曾有正法经》六卷,合编为[说]帙。后二经都是宋藏《大中祥符法宝录》所收录的。这可以证明辽藏收宋新译经三十一帙,是根据宋藏天禧本覆刻。刻制的时间应该是在圣宗晚期,太平三年至太平十年。到这时,辽藏至少雕印颁宣了三十一帙,含以前的部分,即是[天——说]共计557帙。

辽藏(根据宋藏天禧本)收入者只是新译佛典及西方圣贤集著。对宋帝御制诸品及《景德传灯录》等禅宗之籍皆不收。这又说明辽藏的编校者严守本朝立场,对禅宗经典则一如既往地排斥,门户很深。这一点,尽管“澶渊之盟”后,双方结好,称兄道弟,宋帝崩逝,辽圣宗举哀真挚殷切,但是,并没有因此全盘接受宋朝的文化,包括佛教文化。

应当指出,前此有据辽太平二年蔡忠顺所撰《大慈恩玄化寺碑阴记》,认宋藏之入辽应在圣宗太平元年者。按蔡忠顺系高丽显宗时的“参知政事”,《辽史·圣宗纪》载“开泰元年夏四月庚子,高丽遣蔡忠顺来……诏王询亲朝”即此蔡忠顺。时高丽使用辽的年号,故碑文所载,指的是宋藏入高丽之事,而辽获得宋藏也应该在此前后。

这一段历史说明,云居寺从诠晓开始的由禅改律,虽然在澶渊之盟后,并且得到了宋藏,但是,云居寺律宗为主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变。

辽代改禅为律,在历史上是一件有很大影响的事情,甚至是一件孤例。《云居寺》一书说:“辽代通理大师主持刻经,于前代不同,以前所刻多为大乘的经。通理则刻律和大乘论,于是,经、律、论三藏齐备。”是符合辽代的刻经历史,也同时揭示了佛教律宗在辽代的极度兴盛。

中国翻译佛教戒律和实行受戒仪式开始于曹魏嘉平年间(249——253)。那以前的中国僧人只落发,不受戒。中天竺僧人昙柯迦罗发现了这个问题,专门翻译了《僧祇戒心》,请当时的传法僧人带到洛阳,中国佛教僧人开始有了受戒的仪式。此后,经过二百多年,印度流传的“四部广律”,“五论”全部传到中国南北。

在北魏孝文帝时代,法聪律师开始在北魏首都平城(今大同)开讲《四分律》,慧光律师作《四分律疏》,删定《羯磨戒本》,“四律”、“五论”开始弘通

盛行，律宗的基础开始奠定。之后，慧光的弟子道云、道晖、洪理、昙隐，一直到智守集前人大成，创《广疏》（又称《大疏》），律宗从理论到形式都建构了完整的系统。在唐代，律宗达到了和禅宗并驾齐驱的地位。而在民众中的影响甚至更大。民间佛教的戒法五花八门，还直接影响到其它各种教派，连影响最大的道教亦在其列。而佛教律宗主要为“四戒”，即戒法、戒体、戒行、戒相。由此生发开去，加以论列，因所持义理和性相的见解不同，律宗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甚至举行的受戒仪式也有了区别。各派的戒律，周详而又琐碎。陈述起来那是很烦冗的。但是，律宗由于一改禅宗坐禅颂经的形式，律戒当时即能目见，外守其戒，则内心彰明，所以，产生的影响便明显了起来。

对于契丹这样的有本族语言，而在官方公文等方面又大量使用汉文的情形下，禅宗以内视为主的修习方式便不太实用，而律宗则很容易为他们所接受。辽太祖始崇佛教，圣宗、兴宗、道宗臻于及至。圣宗除了增建佛寺、施给寺院土地民户以外，还注意了加强了对佛教教务的管理，由于民众间对律宗理解的偏差，当时便通行过“燃指供佛”的习俗。对这一陋习，圣宗便颁旨禁止了。他拨款支持云居寺刻经，也要派人管理。所以，圣宗时的佛教发展是井然有序的。兴宗则过之。他本人带头皈依受戒，铸造银佛，编刻《大藏经》并且常常召名僧到内宫说法，并且给予高官显爵。当时僧人中正拜“三公”、“三司”兼理政事的有二十人。甚至在兴宗微服胡闹的时候，还有僧人参与。道宗文化修养高，他通梵文，对华严学造诣颇深，对《释摩柯衍论》尤其精通，关于“性”“相”之学，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往往自己在宫内设坛开讲。而这三帝，都排禅重律。道宗的时候，在内廷设坛受戒，开讲律学风气，一时之间，辽国境内受戒行律朝佛的风气大行其道。除了完成《契丹藏》和房山云居寺四大部经外，还建造了许多寺院佛塔。北京的大昊天寺虽然是大长公主捐私宅所建，但道宗专门赐钱五万贯，御题“大昊天寺”，懿德皇后萧观音是大长公主的女儿，也仿效母亲赐予了大昊天寺许多银两。而且，萧观音每天按律宗规矩为佛菩萨上香礼拜，成为长久的功课。正因为如此，大昊天寺成为当时京城中最大寺院的一个主要原因。后来，大昊天寺的一个僧人，前来主持位于良乡的法象寺，呼其寺的舍利塔为昊天塔，从此，法象寺本名倒不为人所注意，久而久之，讹传成真，使昊天塔也成为著名的佛家胜地，自京而南，一片梵音。

当时，除了主持刻经的通理大师之外，海山、志智都是名噪一时的律宗高僧。海山和兴宗互相唱和，多为以律宗为宗旨，从现存所遗的诗歌来看，海山和兴宗都是平等唱和的。海山又名非浊，他继承德云大师的遗志，利用新得的

宋新译经，将一切佛菩萨名号集全，之后，便刻进了房山云居寺石经之中。

在《云居寺石经简目》中《一切佛菩萨名集》二十二卷，编入〔勿多〕二帙。应县木塔所见《辽藏》“卷第六 勿”恰与其帙号相合。依《千字文》，此二帙为 564 与 565 号，已近 579 号之末。

《一切佛菩萨名集》二十二卷前有辽代高僧思孝所作的《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序》，详述此集之编纂入藏始末，是辽藏始雕于圣宗朝的另一重要旁证。

据真延所记，非浊得前二十卷手稿于重熙十八年，集全后奉呈给兴宗，兴宗颁旨，将这部经典收藏在《大藏经》的同时，也在云居寺进行雕刻。到了通理大师时，律宗的律论雕刻完成，云居寺经律论三藏齐备。

这是辽朝对云居寺刻经事业也是对佛教事业的重大贡献。

而素来不显扬自己的慈恩宗经律论由于和律宗有着义理方面的关系，在此时，成为云居寺刻经的主要底本。在石经未回藏之前，在藏经馆陈列的时候，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大唐三藏法师玄奘”所译经的刻本。而慈恩宗的创始人就是玄奘，玄奘的徒弟窥基又加以发扬光大，迨晓在辽代接踵其后，使慈恩宗大行其道，唯识论哲学得到发扬光大。

### 慈恩宗（法象宗）、唯识论解析

慈恩宗也称法象宗、唯识宗，属于大乘宗派。因为玄奘从天竺取经归来，和弟子窥基等一起长期住在长安的大慈恩寺创出的宗派而得名。遵从的经典是《瑜伽师地论》为本，辅以《百法明门论》、《五蕴论》、《显扬圣教论》、《二十唯识论》、《三十唯识论》、《分别瑜伽论》等“一本十支”，阐扬法相、唯识的义理。

玄奘，隋文帝仁寿二年（公元 602 年）出生在洛州绛氏镇（今河南偃师）一个官宦家庭，曾祖是后魏的上党太守，祖父是北齐的国子博士。父亲为江陵县令。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进寺院识字习经，十一岁能够背诵《维摩诘经》、《法华经》等大部头经典。十三岁的时候有人问他为什么为僧，他朗声回答：“意欲远绍如来，近光佛法。”听者无不惊奇。他对佛理钻研到入迷的程度，曾经到长安、巴蜀一带讲经求法，一时名声大振。

但是，他在讲经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惑着他，就是佛经中有的晦涩难懂，有的词不达意，有的残缺不全，有的取舍不当，有的歧异严重，令人无所适从。一部经典，不同的人翻译的竟然意思完全两样。所以，他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探本溯源，求得真经，进行准确的翻译。所以，他冒着危

险远赴天竺，经过十七年的艰苦努力，将印度的大小各种阐释佛学的学说都研习遍了，造诣之高，乌有敌者，在天竺便被誉为“大乘天”。贞观十九年，他携带着梵本佛经 657 部回到长安，受到唐太宗和唐高宗父子的支持，将供达官显贵游玩奉佛的慈恩寺另辟别院供他和弟子们翻译佛经。他在这里进行了连续十九年的翻译，将“一本十支”、“一身六足”和《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等全部翻译的出来，共 75 部，1335 卷。他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翻译之中，无暇撰述，只能在休息的空暇，将心得讲述给弟子们听，其中窥基最为勤奋，每天要把师傅的话记录下来，加以整理，有时还要写出心得，深受玄奘赏识。

窥基是元魏尉迟的后人，十七岁随玄奘出家，二十八岁参与《成唯识论》的翻译和注解，后来还多有撰述，是发扬光大慈恩宗尤其是唯识论的高僧。他所著的《三十论》单是印度的注家就有十派。而《大乘法苑义林章》才是他的关于唯识论的代表作。他此著作中提出从宽到狭、从浅至深、从粗到细的五重唯识论观识：一、遣虚存实论，二、舍滥留纯论，三、摄末归本论，四、隐劣显胜论，五、遣相证性论。这五重认识方式逐层判定，每一层各有关键，因此成为慈恩宗独特的看法。

慈恩宗对因明学说比之前期也有很大的发展。因明学说来自印度的瑜伽学派，玄奘在印度游学的时候，对于因明学说到处参问，造诣越来越高，在临近回国的时候，戒日王亲自主持无遮大法会，玄奘写了“真唯识量”阐述因明学说，书写在金牌上面，经过十八天的论辩没人能够驳倒，创造了阐述因明光辉的典范。“因明”两字，梵本原来没有，玄奘为了译述《因明入正理论》才创造出来。虽然有了译本，但是，他对弟子们又勤加口授，创建新说，他的口授被弟子们奉为秘宝，争相作注，后又有疏的出现。其中窥基的《因明大疏》和《成唯识论述记》为表述的最为准确。后世的云居寺诠晓、谦讽、可玄、智光、通理都修学上面两部著作。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律宗道宣继承北朝慧光（468——537 年）的律统，到了智首（567——635 年）都是专事《四分律》的阐扬，一直到了玄奘译出有关唯识论的理论著作，律宗才依据唯识论为基础，形成律宗完整的体系，从仪式到内容得到完善。当时出现了《戒体论》，表述了佛家弟子从师傅受戒时，在精神上需要构成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是为戒体。这成为以后律宗修身的决大法门。唯识论和因明论，影响深远，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专门写了多部著作论述唯识论和因明思维，启蒙思想家龚自珍运用因明学说写成《中不立境论》、《法性即佛性论》。谭嗣同所煮《仁学》一书其中也大量引用唯识论的思想，

作为改良创新的理论武器。最有代表性的是章太炎，专纠唯识论，他在和保皇派的论战中，运用因明学说和西方的逻辑学进行比较，又和墨家对照，得出许多新见解，写出许多影响很大的著作。晚年他主讲国学研究会时，在诸子说略中，经常拿因明学说来证实诸子。据最近整理出版的毛泽东读书笔记，毛氏对唯识论和因明学说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所以，慈恩宗在云居寺占主导地位，本质上是哲学的进步。

佛教自从禅宗为主流以来，内心关照，多发义理，原始佛学越来越走样了，《六祖坛经》成了经典，几乎代替了原译经典，诤晓出来匡正，毁掉了《六祖坛经》、《宝林传》，除伪妄，尊玄奘法师的原译为佛经正统，以唯识论为认识世界的方式，“读原著”为要理，使慈恩宗及其因明学说第一次站了上风，达到了以律代禅的目的。虽然这是尊经派唯一的一次胜利，但是，对于佛教史来说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不但在云居寺留下了一整套《大藏经》，《契丹藏》也得以流传。后来的佛教，基本上在这个基础上流行的。尽管在寺院方丈中几乎很少有专修律宗的人，但是，所有律宗倡导的律戒被所有寺院所接受，受戒成为必修的功课和仪式。特别是在这股风气的影响下，北京建立了北方最大的律宗寺院——戒台寺，禅律并宗的局面基本上形成了。

所以，辽代的刻经事业改禅为律，是当时的社会状况所使然。

(辽代)燕京僧院以律院为多，《松漠纪闻》：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南僧至，始立四禅院，曰大觉、招提、竹林、瑞象。考禅宗系南宋末天竺僧菩提达摩来华传入，以专修“禅定”为主，故名。相传五世，又分为南北两派。南方代表名神秀，北方代表曰慧能，故有“南秀北能”之说。南派教义通俗易懂，流传日广，南北朝时亦深受北方欢迎，后来影响宋明理学。律宗为唐代道宣所创，道宣居终南山，专攻“四分律”，即强调佛教戒律，故律宗又称南山宗。“律宗在佛教史上影响并不甚大，它在燕京为什么得到特殊地发展，尚待进一步研讨。燕京寺院多建自唐代，律宗大约是在唐代就大量传入幽州的。燕京寺院，不论禅院、律院，规模都相当大，悯忠、三学、延寿、竹林等寺皆巨刹。至于宗教活动，更为可观，往往一次饭僧数万。”(齐心、王玲《论辽代燕京的佛教》)

### 金代又改律为禅

但是，禅宗毕竟是中国有特色的佛教，云居寺的历史反映出来，仅仅就是



辽国六帝时期的状况。金以代辽，局面就发生了变化。

《云居寺》叙述，“到了金代大定二十年（1180）义谦法师入主云居寺，又改律为禅。”

据北京图书馆所藏《谦公法师灵塔铭》记载，谦公就是义谦，俗姓严，家居涿州范阳。生于金太宗天会二年（1128年），卒于金章宗承安五年（1200年）历五帝。他“自童雉间，不留髻发，天赐渊靖，性了空门。”他母亲发现了他的这个特点，允许他出家到云居寺，百禅师坦上人为师，得法名义谦。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金代辽以后，云居寺出现了禅宗坦上人，但是，寺院规则和内容还是律宗。义谦十五岁的时候，得到金朝皇帝熙宗的恩典，但是什么恩典铭中没有说。他深习华严经，中年后参禅入道，遇到柏山宝老禅教双通。“大众请为提举寺事，靡不推重，大定二十年，有兹院大众，本里坛信以施，状请匡摄荒蓝，师至日，改律为禅。”也就是说，在金大定二十年（1180年）的时候，施主大众和僧众，将在柏山的义谦请回云居寺任主持，他回来的当天便将云居寺改律为禅了。好在，这没有影响云居寺的修缮和建设，“施者重修廊宇，别建僧庵，西序东厨，焕然顶新。皆参道力，特诱华严。经邑门徒，众仅数千，供给斋粮，未曾有阙。香厨饮膳丰余，安居二九载矣。”终年七十三岁。

应该说还是在海陵王时期，产生了排佛的倾向。海陵王虽然没有公开宣布排佛，但是，他对佛教是不以为然的，曾对张浩等人公开指斥佛为虚妄之事。金世宗也没有对佛教的热情，这样，佛教又逐渐地成为信仰者的宗教，降入民间，缺少了来自政府的支持。禅宗能够由繁而简，内省悟道，所以便很容易地取得统治地位。就云居寺来说，成长在律宗环境的义谦入主之后，第一件事情竟然是改律为禅，可见“中国特色”的佛教还是深入人心的。

《大金国志》卷三十六《浮图》：“浮图之教，虽贵戚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惟禅多律少。在京曰国师，师府曰僧录、僧正，列郡曰都纲，县曰维那。披剃威仪与南宋等。所赐号曰大师，曰大德，并赐紫。”看来，从金朝开始，又恢复了禅多律少的局面了，直至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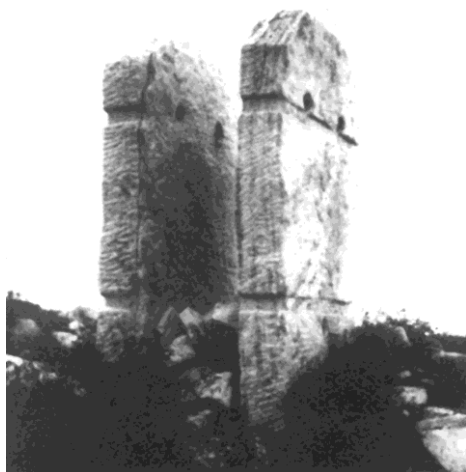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溟波主持寺事，云居寺开始作为临济宗的场所。”临济宗发源于河北的正定，是禅宗六祖慧能的六传弟子始创。发展到清代占了佛教的主导地位。顺康之际的名僧憨璞性聪、玉林通秀、行森、道素等都是临济宗的。所以，云居寺在有清一代都是临济宗的场所是不奇怪的。

# 大石窝石匠的传统习俗

张玉泉

2006年12月31日,《北京日报》公布了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房山大石窝石作文化村落榜上有名。成为全区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大石窝地处房山区大石窝乡,乡内有高庄村、南尚乐村等7个祖辈以石作为业的自然村落。大石窝石材品种繁多,尤其以皇家御用石材汉白玉最为珍贵。大石窝石材的开采雕刻的历史,可追溯到汉朝,自隋末云居寺刻经始,历经金、元、明、清数朝代皇家修建宫廷等工程,各地石匠云集于此,渐成村落。由此可见,房山大石窝石作文化历史悠久,民间素有“先有大石窝,后有北京城”之说。千百年来这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石窝石作文化村落。



用于插旗的夹杆石



位于石窝村北的鲁班庙山门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特产之一的大石窝“汉白玉”石料,作了全国许多重点工程的材料。在修建北京十大建筑时,周恩来总理把房山汉白玉称为国宝,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等一批重大建筑上都有应用。近几年远销日、美、法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大石窝的石匠艺人们长期以来以石为业,以石为生,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围绕着手工石作,创造出一套开采、运输、加工、雕刻、安装等许多独具特色的工艺流程,世代地延续着,形成了许多传统的习俗。这些习俗成为石作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对该地区传统的民俗文化做了调查，主要内容如下：

### 石匠节祭拜鲁班

每年农历三月十七日是祭拜鲁班的日子，这一天当地和在外乡的石匠们都放假一天，个别村还要演节目、走花会等庆祝一番。

解放前，石匠节要到鲁班庙祭拜，求祖师爷保佑。在大石窝村北曾有一座鲁班庙，相传建于明永乐年间，该庙坐北面南，正殿端坐鲁班塑像，高一米有余，黑红脸膛，白胡须，身穿灰兰对襟大褂，头带蓝白相间帽盔，脚登黑布园口鞋，表情肃穆。身旁放着墨斗、方尺、板尺的模型。殿前有大香炉、香炉前放供桌。为何规定农历三月十七日为石匠节？因这天是鲁班的生日。鲁班是我国古代建筑工匠，公输氏，名班，春秋战国时期的鲁国人。曾创造攻城的云梯和磨粉器，发明了木匠所用的工具等，被尊为“师祖”。相传他有四个徒弟，头一个就是石匠，依次为木匠、瓦匠和画匠。所以，后人把他的生日定为石匠节，以示对鲁班的纪念。

### 开山节祭拜山神

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日，相传是山神爷的生日，所以，石匠把这天定为开山节，在这一天祭拜山神，是石匠必过的节。祭拜的形式不同，山神庙有的建在缓坡上，有的建在山口处，盖一间石头房，大小、高矮不一，坐向一般按山的走向，有坐北面南的，大部分是坐西朝东。正面有个山神像，山神的相貌、表情不一。

每年祭拜山神时。确定一个开采点，开山的“把头”把墨斗、方尺、板尺三样工具供奉在石头旁，意在这三样是石匠用于开石的主要工具，不可随便把玩。同时还要写下：“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的对联，一般写在石块上，或写在红纸上贴到石块上。也有的烧柱香，叩叩头。祭拜完了才可破土。此礼时至今日还延续着。

### 石匠的规矩

石匠有几不准，这是不成文的规矩。凡从事石作的艺人，无论师傅和徒弟

都要自觉遵守。比如：

开白石山的不许吃血豆腐，怕把山吃出红点红线，干活的怕见红（工伤）；开红石山的不许吃虾米，怕把山吃瞎了，乱了层；在石头山上不许杀生，尤其是蛇之类的动物。解放前在黄龙山一石头坑里有人打死了一条小蛇，第二天正在干活时，山石滚落，砸死了那个人。从此，石匠们更加严禁杀生，即使一只蝎虎子也要放生；不许妇女到正采石的坑塘里，怕带来不吉利。除此之外还规定：在坑塘中不许乱说话，不许抽烟，不许打闹等，意在干活时精力要集中，以免出事故。

石匠们在采石运石过程中，号子的应用十分广泛，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从开采到滑撬时都要以号子为令，它起到指挥全体人员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的作用。石匠号子曲调朴实、简洁、优美，曲词以号令语言为主，号子分预备号、起动号和停止令。预备号反复唱起，各工匠做准备工作。起动号为一叫一答的方式，号手（即领唱人）嗓音洪亮，唱起来铿锵有力、节奏感强。号手与匠工相互配合，统一行动，号手转变不同的音高，传达行动号令，匠工根据节奏，起、撬、调头等各不相同。停止号令为“我撂”。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大石窝传统的落后的手工开采加工石料的生产方式，早已被现代化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设备所代替。



# 南窖乡水峪村中幡会始末

卓成栋

南窖乡水峪村中幡会表演，可追溯到建村初始。据有关文献资料和地方志书记载，水峪村始建于元末明初，尤其是明洪武年间政府性的由中原向北方的移民活动，奠基了现今的水峪村，水峪村的民间中幡会技艺正是在移民的基础上得以传承。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最早的水峪村中幡会仅限于家族式表演、传承，到清代初期中幡会开始由一个家族向几个家族扩展，到清代中叶，水峪村中幡会达到鼎盛阶段。它集中体现了地域的民俗文化特点，配合民间的大型祈雨活动，成为民间十三档花会之首。进入民国后水峪村中幡会衰落，新中国成立后水峪村中幡会再度回升，后来出现女子中幡形式。1989年该村中幡会活动全面恢复。

幡艺起源于晋唐，《晋书》记载“如动幡往来无定……”等句，《朝野僇载》也记载了“……跨鼓中幡次第行”等；幡艺早年用于军队的大督旗，后演化成皇宫的宫廷表演，元末流传到民间，清代流行于京都，中幡是幡艺其中的一种，幡幢分大中小类型，大幡为旌幡，小幡为值执，而中型的幡一般用于演练，故称中幡。明清时的中幡表演大多是走香会时的杂技项目，在民国年间的中幡项目，只是幡艺中的一种，当时称作幢幡、担幡。

有关地域志书记载，明洪武年间的移民活动使中幡技艺也因移民带到现今的京西南地区。其兴盛的又一原因，是当时在京畿地方盛行的民间祈雨活动，中幡作为一种民间娱乐形式在南窖地区得到了迅速发展，由原始的村民自娱型表演，演化成集体型、社会性的盛会表演。并积极参与当地极为兴盛的祈雨、窑节、庆祝活动，以及地方祭祀等宗教活动等，大大推动了中幡会技艺的发展。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元末的一次大型祈雨活动惊动了整个京师，规模之大，场面之热烈，足以见当时祈雨活动的盛况。又据元代建成的黑龙关村龙神庙中的碑文记载，祈雨的盛况震动了皇宫大内。到明代的民间宗教性的祈雨活动更盛，加之明代南窖地区采煤业的不断兴旺，使当时的南窖成为进山、出山的交

通山口要冲。当时南窖地区繁华的商业、煤炭工业也为水峪中幡会及其他花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清代这种表现形式更为昌盛，清顺天府志就记载了当时京畿西南发展繁华的煤业。基于这样的社会基础，在当地有中幡始于明盛于清的说法。而在清代，尤以清咸丰年间臻于鼎盛，自创始迄今已有近七百余年的历史，至鼎盛期的咸丰年间也前后相传二百多年。水峪村中幡会自明至清代代相传，清末幡会传到周边几个地区。如涿州地区的大邵村，后发展成了京畿西南中幡第一的盛誉，大邵村中幡至今在地区也较有影响。

民国期间水峪村中幡曾一度断档，后又由河北省涿州地区大邵村回流到南窖，才使水峪村中幡技艺沿袭下来。

水峪村中幡整套动作约有六十多种，如“站肩乌龙绞柱”、“左右大盘肘”、“左右担山”、“封侯挂印”、“卧看巧云”、“左右提篮”、“抱幡坐脚”、“喜鹊登枝”等。

水峪村中幡会在京西南地区极负盛誉。最早传人为山西大槐树移民冯姓、邢姓村民，传说冯、邢二姓村民原为宫中大内供职，后将此艺流传族人。初为家庭娱乐，后来耍出了自己的套路，并在年、节、盛会时间表演，后来这种娱乐形式又不断地向民间扩散，最后演化成每逢庙会、重大节日、纪念日、祈雨等大型活动是成为娱乐的主打形式，为表演的首选项目。

自元末明初以来，南窖地区就已有煤炭的开采业，煤炭业的兴盛也为中幡艺术在地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明代时期村中的业余花会多由一些煤炭开采的窑主资助，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幡会的代代沿袭。到了清代，南窖地区的煤炭开采更加兴盛，有很多的窑主纷纷在水峪村选择居住地，他们在村中大兴土木，建豪华住宅，引进先进的文化，促进村子整体素质的提高。因而清代的水峪村就有京西大房山下的文化村之称谓。全村光秀才就出了好几个，现仍存有多处古村深宅大院的遗迹。

水峪村的民俗文化底蕴对中幡会的发展也起到了助推作用，清咸丰年间出了个著名的民间艺人邢德春，他以独到的幡艺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每逢地区民间聚会，邢德春的幡舞得上下翻飞，成为聚会的一景，当地百姓无不为之倾倒。此后传至邢和、邢旺，清末传至杨姓，以后经杨天聪、杨福、杨林，再传王姓、崔姓，这时村中耍幡的开始有了女子耍中幡的出现。据今 91 岁高龄的崔万海老人讲，王姓、杨姓始终是幡艺的主要传人。杨守齐接崔万海班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又传扬万选，文革后又传王姓，至今已由王庆成、王金祥、王金禄、王云福、王启祥等成为现一代的幡艺传人。

水峪村中幡会传至民国，出现了女子耍幡。原因是当时传人杨姓无男性后人的特殊情况下，为了使中幡艺术不失传，便传给了女性。

水峪村中幡会由历代民间艺人传演至今。中幡又分大幡(男)、小幡(女)，大幡重50斤，小幡重30斤，其形制主要是一根碗口粗、高达10米的大竹竿或性质相同的杆类，上顶有伞盖、旗、大小竿等，最主要的是由上而下悬挂着的一幅长约5米、宽0.6米质地为纱或布制的长幅，幡顶或多或少都挂一些小铃铛之类的装饰物以示靓丽壮观。

在传统的中幡表演中均为男子表演，可水峪村的中幡却出现了女子中幡。在中幡表演时，演出场合通常为男女混合编制，共有男女队员21名，配10面幡、12面1.2米直径的大鼓，统一服装，整齐化一。鼓声是表演的前奏和指挥，鼓声响起，队员上场，男队员首先游走开场，随后女队员登台亮相，表演中，中幡上下翻飞，幡面彩绸迎风招展，幡顶铜铃叮当作响。表演者或顶幡上额，或伸臂托塔，惊险动作连连不断，但始终幡不离身，杆不落地。十余米高、几十斤重的中幡在表演者的手中、肩上、脑门、下巴、后背等处上下飞舞、交替腾挪。十面大幡迎风招展，场面格外壮观，随着鼓声的时急时缓，表演也逐步进入高潮。

水峪村女子中幡表演套路在传统动作的基础上，经过专家的精心编导，把传统武术和杂技的一些动作与中幡表演巧妙地结合，又创作出了如“站肩乌龙绞柱”、“左右大盘肘”、“左右担山”、“封侯挂印”、“卧看巧云”、“左右提篮”、“抱幡坐脚”、“喜鹊登枝”等高难动作，使幡艺动作增加到八十多种。表演的整套动作更加趋于和谐完美，表演中幡杆在表演者身体各部位游走，各种惊险动作不断，极具艺术性和观赏性。

水峪村女子中幡表演最早源于清末的村中的男子中幡表演，民国期间开始有女子小规模地学习幡艺，后逐渐演绎成为女子单独表演、女子集体表演等。据民国期间的县志记载：当时南窖地区盛行十余种民俗艺术，幡艺为其中一种。每逢地域范围的大型活动，如庙会、如地域村民大聚会，民间盛行的祈雨活动等。中幡会就要耍一耍，而且每次耍时，水峪村中幡会都占据各道花会之首，尤其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五月十三、八月初一等季节或庙会，水峪村的中幡一耍就要到涿州、百花山等地。特别是在地区大旱年景时，村民祈雨，中幡更是重要。当时的行进路线是由南窖村起步，经安子到北窖，再到佛子庄、黑龙关，男女两套大幡为祈雨活动助兴，成为当时一景。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南窖庆功大会上，水峪村的中幡会博得了当时边区的好评。



水峪村男子中幡表演和女子中幡表演略有不同，女子中幡不但耍小杆、有时也耍大杆，它打破了通常中幡表演男性演员的单一性，表演时男女搭配，表演形式在地区前所未有的，还如她们独创的幡前后传动，托举、旋转、令人眼花缭乱的变换的身姿，充分体现了女子演员集体表演的特色，演出中心的四杆主幡在他（她）们的手上上下下翻飞，惊险之际令人叫绝。因而，女子中幡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地域社会的进步。

例如，现在的水峪村女子中幡表演把传统武术和杂技的一些动作与中幡表演巧妙地结合，使表演的整套动作流畅利索，没有一点拖沓和繁琐，加之鼓声时急时缓的配合，表演的拟人化处理，收到了极好的场面效果。水峪村女子中幡表演的另一个成功所在，是她以奇取胜，大胆抢占北京地区的女子中幡表演舞台，开创了区域性的中幡表演先河。水峪村女子中幡演出队的恢复对繁荣地区的民间中幡表演艺术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还先后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和国庆等大型活动演出。

水峪村中幡表演如今已成为村里弘扬民俗文化底蕴的最好表现形式。大大推动了地区精神文明建设和业余文化事业的发展。深厚的文化基础，造就了水峪村的中幡事业，使民间艺术的瑰宝，得以代代相传，成为地域民俗文化的一份珍贵遗产。

# 张锡山与练字石板

张万波

张锡山，房山丁家洼村人。生于 1843 年，逝于 1901 年。1868 年，申请到学生练字用的石板专利。

张锡山，中过秀才，在羊耳峪西庙教过书。二十四五岁时在良乡的一个石板铺子做账房先生。铺子天天要进出石板，石板要过秤，当时记数用算盘，记完多少秤再汇总，有的卖主不识字不会算术，总是说他记得不对，张锡山就找一块一面平的大块石板立在窗台上，称一秤他就用石板磕在上面记一秤的数。再用算盘汇总，大家心明眼亮，纠纷自然没有了。

写字时因石板面粗糙不算平整，石板磕写字时也掉碴，写字也费劲，张锡山想如果把石板面磨平后肯定好写多了。他就用两块石板加水对磨后，并不理想。

过几天看到木匠用大刨子能把大木板推平，他就找了把刨子加上水推了几下，推完以后再用手纸一磨，比以前平光多了，再往上写字，省劲多了。把另一块石板放在水里浸泡两天，拿出来更好刨，也省力。

随后他又在笔上下功夫，先是用中药里的龙骨，一头磨尖在石板上写字，字迹清晰，又好写，后因龙骨大贵，改用油石（石膏石）做笔，经过加工，写字很理想。他从木匠锯木板联想到锯用水浸泡过的石板，终于制式的石板雏形出来了。又进一步把石板做成小块，便于携带，四边再镶上木框，避免了不经意时碰坏和掉角。

既然石板上能写字，张锡山就和掌柜商量向附近学校和私塾推广，老师和学生大受欢迎。有人开玩笑地说，你是石板的发明者，还不向北京申请专利？掌柜听到后，灵机一动，觉得发大财的机会来了，就和张锡山商量找良乡知县，试着商量申请专利的事。1870 年，良乡知县王堃接报此事，大力帮扶，就亲自去北京联系事宜，没几天北京方面让带着产品去鉴定，掌柜的找马车装着学生用的石板、石笔，各式大小不同规格的制式石板和张锡山去北京鉴定，北京承认了锡山的专利。官员指着张锡山说：“别的都放一边，你发明的学生用的

石板、石笔对咱大清国是一最大贡献，应该成为一个状元都不为过。”最后许可他们的石板厂独家生产销售两年自己的专利产品，两年内别家不许制作和销售，两年以后国家就不管了。

此后，掌柜的与张锡山二人，合股大量生产销售石板。开始财源滚滚，后来就差些了，因为别的石板厂，石板山见学生用石板利多，相继生产学生用石板和制式石板。一年中就为侵权的事打官司了，费了很大的精力，官商合股的石板厂都有靠山，不敢动，只能找那些微小利薄没有靠山的铺子打，赢得那点钱，还不够为打官司给当官送礼请客的多，最后也没气力为侵权打官司了。更何况当时的良乡县是北京的门户，南方九省的通衢，是北京的进出必经之地，没几年学生用的石板就在各地应用开了。村村学堂的学生都在用石笔在小石板上练习字和做作业。跟着又出现了各村学堂教书先生教学用的大石板（后来发展成现在的黑板）。

当时天津一刘姓大商号与天津海关杨道台关系深厚，得知消息后，自己跑来找锡山合伙把制式石板，学生用石板，石笔，小板擦等，海运往高丽国和日本国，良乡石板厂和天津刘商号派锡山国外批发销售，长住高丽釜山港，当货刚到釜山港，高丽人知道了学生用石板的好处，也争着购买。

张锡山所用石板来源于房山城北的山里黄土坡一带的村庄，最红火时，驮石板的牲口队前看不到头，后见不到尾，黄土坡村老少都在石板山上干活，山主发了大财，当打听到是一个叫张锡山的发明学生用石板和制式板，且供不应求，知道原由后，把锡山画成像一天三柱香地供奉，以求平安发财。

锡山在五十七八岁时，和掌柜的发生股份纠纷，回到家时没有什么钱，没几个月精神就不正常得了疯癫病。张锡山在去逝前的几天，自己到祖坟为自己打坑，挖好后，坑底四角一角放一块红砖，回家就躺在炕上，三天以后去世，时年五十八岁。

# 陪同前苏联《真理报》记者的一次采访

罗玉源

1957年秋，原良乡县委接到原河北省通县地委的通知，说苏联《真理报》记者安德里昂诺夫要来良乡县采访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当时任良乡县委农村工作部长，经县委研究决定由我陪同采访李德生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这个农业社是良乡县办得比较好的。该村党支部书记李德生兼农业合作社社长，业绩突出，曾于1955年和57年两次参加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并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同时还获得河北省和良乡县的奖励，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

解放前，军留庄村生产生活条件较差，地处永定河右岸的大堤脚下，东有永定河，西有小清河。大堤内即使有点好地，也被有钱人家霸占；堤外土地贫瘠，地势低洼，十年九涝，“春天白茫茫，有雨水汪汪”，收成无几。解放前全村61户，310口人，大部分农户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糠菜半年粮的苦难生活。为了活命，有的人大、麦两秋外出打工；有的人刮地皮熬小盐，私下里到外地去卖，因为在当时卖盐是犯法的，遇灾荒年就得外出逃荒要饭。就这样，苦苦地煎熬着。与该村临近的高岭村、独义村和稻田村土质比较好，粮食打得多，因此，周围村流传着：“金高岭银稻田，饿得军留庄直叫唤”，这便是昔日军留庄村的真实写照。

解放后，经过农村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翻身得解放，广大贫下中农当家作主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活也改善了，掀起了大搞农业生产的高潮。但是各户的劳力、牲畜、耕作农具很不平衡，有不少农户分到土地种不上，大、麦二秋不能及时收割，常常因此受损失。为了使大家都能按时耕种收割，以李德生为首组织起以民兵为骨干的互助合作组织，在完成各户耕作任务的同时，在低洼盐碱地开造稻田20多亩种上了水稻，从此以后，各户都吃上了大米。

1952年初，李德生的互助组因办得好，经过县批准办起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村人都走向了合作化的道路。全村的土地统一耕种，秋收后统一收

获，按劳取酬，实现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力。成立初级社第一年，秋后取得了好收成，互助组时亩产水稻 300 斤，初级社亩产达到 600 斤，翻了一番。农民高兴地说：“生产年年涨，不忘共产党；家家吃大米，不忘毛主席”，“弯弯柳树靠河边，挖渠打坝灌粮田，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生产一年比一年高”。军留庄村由穷变富，对周围几个村影响很大。

1955 年，李德生初级社扩大，将张家场、保合庄、马场三个村也合并起来，这样一来规模大了，人多地也多了。为了便于指挥，实施分村管理，划组生产，按劳分配，秋后分红的办法。这一年粮食丰收，人均收入达到 300 多元，集体财产也增加了。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初级社又开展了比学赶帮的大生产竞赛运动，挖渠打坝，开荒造良田。李德生经良乡团县委推荐，并经河北省委批准出席了 1955 年首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当年 25 岁的李德生就成为良乡县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典型。大会期间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同时，著名作家魏巍还写了《永定河畔稻花香》一文。从此以后，李德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名声大震，家喻户晓。

1957 年，我陪同前苏联《真理报》记者安德里昂诺夫前往长阳镇军留庄村，采访李德生农业生产合作社。他原计划看看就走，可是当我们乘车刚到村时，就受到了村干部、贫下中农的热情欢迎。到村办公室之后，安德里昂诺夫就急于要听取介绍情况，对翻译说：“要介绍农业合作社生产发展情况，还要求介绍我党对待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政策，以及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当时就由我和村干部介绍了情况，安德里昂诺夫越听越有兴趣，就决定住下来采访，一待就是七天，我又和村干部一起将其安排住在办公室，由通县专署专员王宪的儿子王庆英陪住（王庆英是来农村接受锻炼的青年）。

安德里昂诺夫在军留庄采访的日子里，我先后去过三次陪同采访，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我还陪他到附近几个村参观，走街串户访问贫下中农群众。安德里昂诺夫还特地找来了地主、富农和反革命份子的子女座谈。安问：“共产党没收了你们的土地你们恨共产党吗？”子女们回答说：“不恨共产党，因为剥削贫下中家就应该被没收”，安又问：“你家没有地了靠什么生活？”子弟们回答说：“土改时按政策给我们每人留了一份土地，我们要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现在我们也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后要做一个劳动者”。

经过几天的采访，安德里昂诺夫和翻译都非常满意，临行前由他“做东”，请我和几个村干部一起吃饭、喝酒，共叙中苏友好情谊。安德里诺夫深有体会

地说：“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的各项政策是正确的，中国农村搞互助组、合作社，走合作化的道路是正确的。不搞农田基本建设靠天吃饭是不行的，必须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力的精神，大搞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生活，把农民组织起来共同致富，这是最好的政策。毛主席真伟大。”安德里昂诺夫还对我们说：“我回国以后一定要写篇报道，在《真理报》上发表。”临别时，我和村干部组织了欢送仪式，共同祝愿中苏友谊代代相传。

# 房山区的第一项植物保护科研成果

张广文

1988年1月8日,房山区召开科技表彰大会,《房山区农林鼠害调查报告》获得房山区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这是房山区在农业植物保护专业领域第一项科研成果,这一成果的获得经过了近八年艰苦曲折的历程。

—

1985年10月,北京市植保站开展农田鼠害调查。房山区农科所为技术协作单位,确定我负责此项工作。虽然对所里来说这是一项全新的专业工作,但我却有一种机缘巧合的特殊感觉。早在1981年8月份,我还在房山县气象站工作,在参加县政府农业技术顾问团活动中,偶尔发现了周口店公社瓦井大队早熟向日葵出现鼠害,籽粒已被吃掉近10%;辛庄大队的10亩制种玉米整穗被啃光的也达到10%(1981年8月11日调查记录)。这引起了我的注意,随即扩大了调查范围。岳各庄、赵各庄、窦店等公社的农田鼠害也很严重。综合这些情况,我撰写了《鼠害迅速蔓延必须高度重视》发给北京日报社,不久以短讯形式发表。四年之后,我调到农科所工作。在以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我走访市植保站,县农业局、林业局、兽医站、防疫站等有关单位,收集并阅读了生物学、动物学、生态学、流行病学等方面的鼠害资料、鼠类研究和防治资料,了解到国内尤其是北京地区鼠类研究和鼠害防治的水平动态。当时,北京地区鼠类调查研究只有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北京大学生物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北京师范学院生物系做过一些实验性的工作,但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这次市植保站也只是要求各郊区县协作单位,配合其进行调查和测报工作。科技工作者的敏锐性使我认识到,一个难得的科研机遇来到了,我应当把这个一般性的工作提升到科研课题来做,这可能成为北京地区的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工作。

1986年1月18日,我将《房山县野生鼠类生态分布及区系综合考察研

究方案》，报送县农科所、县科委和市植保站，审批并获得科研立项。报告着重阐述了鼠害为患是当今世界上十分严重的生态学、经济学和流行病学问题。房山县仅 1981 年，农田鼠害发生面积就达 17.1 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 28.2%；而且 1981 年以来，以鼠蚤为媒介的斑疹伤寒从个别发生，迅速扩展到 20 多个公社的 70 多个大队，1985 年周口店、城关、良乡、官道公社还出现暴发点；流行性出血热也有病例发生。“为使我县粮食作物及各类经济作物稳定增产，其他各业减少损失，控制和减少鼠传疾病，特选定本课题进行考察研究。”

## 二

按照课题设计，以 4 月、7 月、10 月为春、夏、秋三个季节的代表月进行野外考察研究。全县各种生态环境下的鼠种、鼠密度分布以鼠夹捕鼠方法进行；对捕获的标本均进行体重，体长的测量，解剖确定怀孕、生育、性成熟情况，制作头骨标本进行鼠种鉴别。鼠害情况则以实地观测和调查访问为主。

在 1986 年 4 至 11 月的八个多月时间内，野外考察日数 120 多天（其中夜间布夹 94 夜），布夹总数 7712 夹次，捕获各种鼠 438 只，测量和解剖标本 418 号。普查了 27 个乡镇，其中调查布点 20 个乡镇的 33 个村。调查农田林地面积 23000 多亩，实地考察遍及房山区各种地形和各类生态环境，从小清河畔的葫芦堡、窑上，到拒马河流域的张坊、十渡、蒲洼，大石河流域的河北、长操；从海拔 26 米的兴礼洼到 920 米的大安山，1991 米的史家营百花山，2035 米的霞云岭白草畔，都留下了调查的足迹。总行程 1000 多公里，其中，徒步行程近 500 公里。共有各乡镇村、百花山微波站、白草畔驻军等单位 200 多人参与了考察工作。区农科所拿出农科所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科研经费支持此项工作。终于取得了空前丰富的调查研究成果。主要成果有：

1986 年 11 月 29 日，房山县科委、农委、农业局在房山县农科所召开科技成果鉴定会，对《北京市房山县农林鼠害调查报告》进行鉴定。成果鉴定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罗泽珣和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许焕林主持，鉴定组成员有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植保协会鼠害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马勇，副研究员、《动物学杂志》主编张洁，工程师金善科，北京市植保站农业科长农艺师吴仁杰，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副教授洪淑惠、生物系主任副教授张春生，房山县科委、农委、农业局主管领导许世君、郑惠芳、张文东、彭清泉、潘恒鲁。



鉴定结果认为：

1、农林鼠害的防治是植保工作的重要工作之一。北京市房山县地处华北大平原和太行山的过渡地带，西部和西北部约占全县三分之二的面积为山区，种植经济林木；三分之一面积为平原农业区。因此，进行农林鼠害的防治工作选题是合适的。

2、在短期内采集了全县 418 号鼠类标本，搞清了当地农田鼠害的种类，收集了大量生态学资料，并对各种鼠类的最适生态环境做了综合评价，对每种害鼠的危害情况做了调查，工作已达到了区域性同类工作的先进水平，为防治当地农林鼠害提供了依据。

3、本项工作能博采众长，克服经费、设备、图书、资料、交通工具对比标本之不足，从难、从严地完成了工作任务。此项工作符合“立”字当头的改革精神，应该发扬，同意报科技进步奖。

1988 年 12 月 23 日，我参加的北京市农田鼠害调查研究项目获得北京市农业局一等奖。

### 三

科技成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社会经济上的应用。1986 年 11 月至 1987 年 1 月，在全县灭鼠工作中我被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聘为技术顾问，应用以上研究成果进行技术培训 6 次，广播讲座 1 次，并亲自参加了 13 个乡镇的技术指导和检查验收工作，对房山县灭鼠一疫达标做出了贡献。

由于在房山县农林鼠害调查中，很好地利用了自然生态学原理，充分地利用了我掌握农业区划知识和资料的优势，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成果，使我有信心进行全市的鼠类区系工作，并取得了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拨出一笔专项经费进行全市范围典型生态环境的鼠类考察。1987 年 8 至 9 月，我利用存休和假期对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五县的鼠情鼠害进行了重点对比考察，历时 26 天，行程 1700 多公里，定点调查 28 处，这次考察，搞清了北京市郊区各种生态环境中的鼠种和鼠害；发现了延庆也有鼠传的热行性出血热发病，证实了这次采取的以生态环境相似为理论基础的调查方法的科学性和先进性。通过资料对比分析，了解到房山区山区的鼠害程度是全市最严重的。因此建议北京市有关部门统一协调按照监测与研究相结合，定点监测与普查相结合的原则，掌握全市鼠情，适时经济地进行防治。

通过 1987 年的调查,并在中科院动物所罗珣、马勇、北京农科院袁士畴几位专家的进一步指导帮助下,我在北京地区首次发表了《北京农区和林区鼠类区系及生态分布的初步研究》论文。这篇论文是北京地区鼠类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至今仍是科技资料库检索查询的论文。主要学术价值是:根据 1982 至 1987 年的调查,并参阅有关记载,在北京市农区和林区共发现 24 种鼠类,隶属于 4 科,首次参照北京市地形地貌、土壤、气候、植被及鼠类优势种和标志种,把北京市农区和林区的鼠类划分为 3 个小区和 12 个二级小区,并绘制了北京市农林鼠类综合区划图,为全市性的防治鼠害提供了科学依据。

#### 四

从事鼠类和鼠害考察和研究是一项相当复杂和艰苦的工作。所需知识涉及生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作物栽培学等学科,对于我这个学气象的人来说几乎是从头学起。鼠密度调查更是艰辛。每一个调查点都要设在距离居民区 500 米以外的农田、林地里。第一次踏察设捕鼠夹的地点;第二次于夜间 9 点钟以后田间无人活动时背着十几斤重的鼠夹和诱饵去布夹,每夹相距 5 米,山区每次布夹 20—30 个,平原每次布夹 50 个;第三次是在天亮以前的四、五点钟取回鼠夹,并在天亮后立即测量解剖记录。所以每次每个调查点至少要步行四、五公里,其中三分之二路程是夜行,蚊虫叮咬、雨露湿衣不在话下,只是有三次掉落山崖,虽是有惊无险,也实在后怕,直到调查完几年后才敢告诉家里人,怕的是拖了后腿半途而废。

这项科研工作需要大量野外作业,到了观测日还要风雨无阻,可谓非常艰苦,但是苦中有甜苦中有乐。为了北京地区首次发现的棕色田鼠我曾经八次上百花山。大雾中迷过路,遭受过雷电袭击,夏天借过棉大衣,跑掉过鞋底,但至今我仍为成为首次发现者而自豪,对百花山绚丽多彩的云海和山景记忆犹新,摄影作品还参加了房山区摄影展。在三合庄村我曾经一夜未眠,将一窝四代 22 只褐家鼠一网打尽。我观察过一棵青杏树上的十几只岩松鼠,它们能够在树上一次把十几个人们认为酸掉牙的杏皮啃光,然后把杏核叼走。它们的牙齿冷热酸甜都不怕,真令我羡慕不已。我知道房山地区鼠类天敌之一的鼬科动物会分昼夜值班,黄鼬值夜班,艾鼬值白班,而且艾鼬吃老鼠别具一格,它虽然是连骨头带肉一起吃,却是要在自己的洞外。把老鼠剥了皮再吃。我还给三种可爱的小动物鸣冤平反:被山区人们称为灰耗子的鼯鼠、麝鼠,在平原地下

生活俗称地排子的麝鼯其实是人类的好朋友，它们都是食虫目的小动物，实际上和刺猬是一家人，只是外形与啮齿目的鼠类相似，因此受到了外行人的冤枉。

在鼠类考察之余，我还充分利用了气象专业的知识，在房山的山区发现了我国北方地区罕见的“峨眉宝光”现象。（《百花山的峨眉宝光》一文发表于1987年第2期《气象知识》杂志上。在艰辛之中享受了人间美景和成功发现的乐趣。

# 昔日房山篮球赛事

孙奎春

在上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初，房山县篮球赛事非常活跃。有县直机关球队之间的友谊赛，有县境内——包括中央市属厂矿、部队驻军之间的联赛，还有区县之间的对抗赛。由于当时文化生活比较单调，因此，机关干部普遍喜欢看篮球比赛。

我于 1960 年调到县委工业部工作，每逢周末可以免费到工会俱乐部看露天电影，也可以去夜光篮球场看篮球赛。每周有两三场，只要不下雨周末准有活动。当时每个单位都有篮球队，水平比较高的是文教局队（含学校教工）、粮食局队、政府机关队和县供销社队。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在一般情况下，往往是县直机关球队之间进行友谊赛，有时也邀请中央市属厂矿球队表演赛。设有灯光照明的简易球场，在四周看球的人有坐在地上的，有蹲着的，有站着的，还有蹬在椅子上的，里三层外三层，场面十分热闹。

1978 年，我回到窦店砖瓦厂任党委书记之后，亲自过问厂篮球队的建设事宜。原厂篮球队在房山地区小有名气，并且有两名口碑不错的国家二级运动员——中锋尚天沐、后卫曹树森。为了充实和加强球队的实力，我们在招收合同工时优先录取部队退伍军人中会打篮球的人员。经过组织调整的球队面貌焕然一新，前锋如同两把尖刀——有“神投手”李清福，小张擅长突破上篮，还有几名 1.9 米左右的大个子，首发阵容比较理想，而且替补队员也有一定的实力。任命了足智多谋的孙庆祥为教练，修建了比较标准的灯光球场，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以赛代练”，提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弘扬良好球风，在联赛中保三外一。”

1983 年秋季，一年一度的篮球联赛开始了，参赛的甲级球队共 15 支：有县直机关联队、矿机队、良乡修造厂队、电力五处队、长沟峪煤矿队、401 所队、琉璃河水泥厂队、902 部队队、宏恩寺炮校队、化工四厂队、窦店砖瓦厂队。比赛实行大循环。

在联赛中，砖瓦厂队士气高涨，一路过关斩将，先后击败了从来未曾赢过

的修造厂队、矿机队，客场与战绩不俗的水泥厂队争夺决赛权——而且必须净赢球 15 分以上。为了拿下这场关键球，我们请县大赛组织者、县联队主力后卫兼教练高西宇现场指导，他分析了两支球队的特点，提出“少带多传，加强突破上篮，尽量不要远投三分，充分发挥高中锋篮下的作用。”开赛之后进展顺利，基本上掌控了场上主动权，上半场比分一直领先。然而，下半场开始之后发生了逆转，比分逐渐接近，双方运动员身体接触频频出现，以致擦出“火花”。双方毕竟同属市建材系统，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兄弟，暂停之后比赛又正常进行。结果砖瓦厂球队净胜 18 分，终于赢得了决赛权，水泥厂队与电力五处队争夺第三名。



篮球赛场面

决赛是县直机关联队与窦店砖瓦厂队之间进行。为了打好这场球，厂球队召开专题会议，分析双方的情况，研究制定大赛方案。对方的有力条件是主场作战，有经验丰富的高西宇、白玉庭任教练，队员多数毕业于体育院校，训练有素，技高一筹，并且有 1.92 米老中锋曹仕香、大杨，前锋徐仲山、宋银、张振雄也相当厉害；而砖瓦厂球队的情况则是：队员身体素质好、后劲足，斗志旺盛，以弱拼强没有包袱。可以说胜率各半，关键在于临场发挥和裁判的“执法尺度”。最后，球队请我给讲几句话，以作为参赛的指导思想。我提出了 30 个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打出水平，打出风格，给观众奉献一场精彩的篮球大赛”。

决赛的时间定于晚八时在城关东门外新落成的露天球场。水泥看台上坐了足有两千多人，新上任的房山县长邢春华也光临观球。球场周围的平房顶上、墙头上，甚至树杈上、汽车、拖拉机上都站满了人。

比赛开始后很快进入胶着状态，紧张激烈，观众兴奋不已，不时为双方的精彩表演鼓掌加油。最终，砖瓦厂球队以微弱的比分败北，县直机关联队获冠军，窦店砖瓦厂队为亚军，电力五处队为第三名。

在联赛的基础上，经过层层筛选，选拔 12 名最优秀的队员组成县代表队（含砖瓦厂 2 名），参加 9 个郊区县篮球对抗赛。每次从集训到比赛大体一个月左右，十几年间，几乎每次大赛都是房山县代表队稳获冠军，并多次获市体

委奖励。为了推动房山县篮球运动蓬勃发展，市体委破例一次批给房山县二级运动员指标 5 个，从而使房山县境内国家二级篮球运动员达 10 名，这在全国来讲也是极为罕见的，足以说明昔日房山县篮球运动的成就。

# 房山区红十字会的建立与发展

刘春艳

房山区红十字会自 1988 年成立以来，以扶危济困、改善最易受损害人群的境况为己任，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为房山区的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得到了社会的赞誉。

## 区红十字会的建立

1988 年，根据市会指示精神，房山区建立了红十字会组织。1987 年前市会要求区县建会，但当时正在申请并实施撤消燕山区、房山县建立房山区工作，因此红十字会组织 1988 年之前在房山区未建立。1988 年 5 月份，按北京市红十字会的指示精神和实际工作需要，区卫生局向区政府上报关于成立区红十字会的请示，同年 8 月向区编委上报关于成立区红十字会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领导职数及待遇的请示。8 月 24 日，经区政府 7 月 18 日第十三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成立房山区红十字会，下设秘书处，核定事业编制 2 人，设专职副秘书长 1 人。秘书处归卫生局管理，为其所属事业单位，所需费用由卫生局事业费中解决。区红十字会成立后，工作机构设在卫生局医政药政科，由苏仁明任副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7 月 20 日召开第一届理事会，选举产生 31 名理事，13 名常务理事。选举副区长李永忠为第一届理事会会长，曹湘洪、李会、郭先英、尹万珍、袁涛、宋家骊、苏宝光、孔祥禄、刘济禄、陈大琴等 10 名同志为副会长。卫生局副局长袁涛为兼职秘书长，苏仁明、张青军为副秘书长。聘请区人大副主任安法鲁、区政协副主席杨万钟、区政协常委房山第一中学教师田树屏、原卫生局长刘庆凯、第一医院院长高殿新为名誉理事。会议通过了区红十字会章程。李永忠致开幕词，袁涛做工作报告，北京市红十字会副会长谭壮、丁克智等领导到会讲话。同年 12 月 5 日召开一届理事会二次会议，增选区商委主任李耀、卫生局长李树勤、广播电视局局长宋春华、教育局副局长艾军、红十字会专职干部雷长志、燕山输血站干部任文福为理事，同

时增选为常务理事，增选李树勤、宋春华、艾军为副会长，选举雷长志为秘书长，苏仁明、任文福为副秘书长。

1992年5月25日召开第二届理事会，副区长郭先英当选区红十字会会长。选举安鲁法、田树屏、刘庆凯、高殿新、苗忠为名誉主席；雷长志为秘书长，苏仁明、李万芳为副秘书长。

2000年4月24日，区红十字会召开第三届三次理事会，副区长李惠英当选为会长，选举李永忠、李友发为名誉会长，安法鲁、李树勤、韩臣子为名誉理事，翟道富、王德敏为常务副会长，苏仁明为秘书长，李恕、罗亚玲为副秘书长。

新成立的区红十字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1、发展组织。在市属厂矿医院、区卫生局直属单位和卫生院建立团体会员单位42个，发展集体会员3190人。9月份组建了区红十字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发展青少年会员4000人；2、协助区血站做好无偿献血宣传工作；3、为世界儿童募捐款3100元；为云南地震灾区捐款217900元，被北京市红十字会评为单项评比奖；4、完成市会交给的查人转信工作。为5人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台湾亲属。5、发展红十字会福利事业，在区教育局保健所院内建立了红十字会门诊部，为房山北关广大居民就近医疗服务。

### 区红十字会独立设置前的工作

区红十字会独立前各项工作已逐步开展起来，主要开展社会救助、群众性卫生救护培训、全民无偿献血、培养红十字青少年、募集资金等工作。有团体会员单位96个，会员53778人。其中无偿献血100次的苗忠、向区红十字会常年献爱心的个体医生彭文润被北京市红十字会授予“荣誉会员”的称号。

组织发展工作。当时，由于房山区和其他区县相比规模较小，其原因主要是组织发展是以学校和卫生系统为主，各委办局基本没有加入，少部分乡镇也还没有加入红会组织。因为接受社会救助的受益单位大部分在各乡镇，区红十字会积极争取区农委的大力支持。1995年12月，区农委主任任全胜在区农村工作会议上要求各乡镇都要加入红十字会组织，因此1995年以来各乡镇按要求全部加入了红十字会组织，一部分委办局也加入了进来，使全区的红十字会组织有一个较快的发展。

服务“亚运会”。1990年为了保证亚运会顺利召开，区红十字会担负了旅



游景点工作人员救护知识培训任务，对区内石花洞、云居寺、上方山、北京猿人遗址等地景点的工作人员和导游进行了四大救护技术和卫生知识方面的培训有 256 人次，并分别建立了红十字卫生站，做到有专人负责。

备灾救灾、救助工作。1994 年 6 月份，周口店地区黄山店村及有些山区乡镇遭受暴雨袭击，直接损失达 800 万元。区红十字会向市会、国家总会积极争取救助物资价值 400533 元。在乡镇协助下，及时把 37500 公斤大米、3500 公斤面粉、1460 件棉上衣、1323 床棉被以及 10 多万元的药品分发到灾民手中。

1995 年北京市红十字会推出“95 博爱在京城”活动，这是一项以弘扬红十字人道主义为宗旨，向广大会员及社会各界募集善款，筹建北京市红十字会老年服务中心的社会救助活动。房山区为做好募捐活动，及时召开全区动员会，副区长、区红十字会会长郭先英在大会上做动员报告。全区有 300 多个单位积极参加参加募捐活动，共收到“95 博爱在京城”捐款 282955.44 元。按照市会要求，上交 5 万元，其余列为房山区红十字会救助基金，为区红十字会救助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此，“博爱在京城”募捐活动每年进行一次，成为备灾筹款品牌活动。

为了加强残疾儿童康复事业，促进残疾儿童事业发展，1997 年意大利“天下一家”组织投资 47 万美元，由中国红十字总会、房山区人民政府合作在河北镇兴建了中国红十字会房山儿童康复中心，为全国各省市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治疗。1997 年 6 月，葫芦垡乡突发流行性出血热，磁粉厂厂长得病死亡，为控制疫情的蔓延，乡政府决定在部分人群接种疫苗，为解决乡政府经费紧张问题，区红会从救助基金中支付 5 万元，从而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抗击“非典”工作。2003 年春，“非典”突如其来，区红十字会按照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积极协助卫生局做好抗击非典工作。秘书长苏仁明兼任区精神卫生保健院院长和周口店卫生院院长，战斗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其他 3 名专职人员陆续被抽调到抗非典各指挥部。为了保证红会工作正常运行，区卫生局将区物资保障指挥部设在红会办公室，一方面可以承担起红会日常工作，另一方面还可以做好募捐、物资接收、发放和管理的工作。截止到非典结束，区红十字会共接收社会各界捐款物共计人民币 729702.88 元，为夺取抗击非典的胜利作出了贡献。8 月份，经市会联系，香港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为房山区发放“关怀非典受难基金”76000 元人民币。区红十字会代表区政府及时做好安抚工作，为 5 名因感染非典而死亡的亲属每人发放 10000 元，为 13 名康复

者每人发放 2000 元。

逐步健全机构。1995 年 7 月区编委同意区红十字会为独立建制的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相当副处级，挂靠卫生局，核定事业编制 6 人。副区长郭先英兼任区红十字会会长，苏仁明任秘书长、李恕任常务副秘书长、罗亚玲任副秘书长，办公用房 2 间。当时由于经费不足制约了工作的正常开展，红十字会经费来源主要有会费和政府拨款，而会费收取非常有限。经费来源单一，政府拨款依然是 1988 年建会初期每年 5000 元的标准。为了扩大经费来源陆续创建了两个红十字会门诊部和—个红十字会华盛医院，使红会工作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经费来源保障，逐步建立红十字会可持续发展机制。

经过红会专兼职干部及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区红十字会—些工作取得可喜成绩，开创了京郊区县红十字会工作的先例：2001 年区红十字会举行无偿献血活动，有 20 名志愿者无偿献血；2002 年举办京郊首次造血干细胞捐献活动，有 57 名志愿者加入到造血干细胞资料库。

### 独立设置情况

2004 年 2 月，区红十字会机关人员参照公务员管理。11 月 17 日，区编委将区红十字会机关列为区政府直接联系的独立设置的群众团体机构，不再挂靠区卫生局，机构规格调整为正处级，核定事业单位编制 7 名。设常务副会长 1 名（正处级）主持日常工作，设秘书长 1 名（副处级）。到 2005 年 7 月 2 日区委才对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任命李惠英副区长兼任区红十字会会长，樊毅平任常务副会长，苏仁明任秘书长，办公地点搬至北潞园昊远隆基大厦。2005 年 12 月，区中小学、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金管理办公室成立，为红十字会所属相当正科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核定事业编制 5 名，主要负责全区中小学、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金的收费管理和报销费用的审核发放工作。此项工作自 2004 年 9 月启动，到 2007 年 9 月业务撤消，纳入“—老—小”保障机构，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负责具体工作。2008 年 3 月“少儿互助”办公室 5 名工作人员中 4 名转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1 名留在区红十字会转为工勤人员。

2007 年 3 月 5 日，任全胜任会长。5 月，区红十字会成立两个内设机构，即办公室和业务部。6 月 28 日，区红十字会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聘请区委书记聂玉藻、区长祁红为区红十字会名誉会长；选举区政府副巡视员任全

胜为区红十字会会长，樊毅平为常务副会长、苏仁明为秘书长，并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理事会执行委员会，执委会由樊毅平、苏仁明、刘春艳组成，樊毅平任执委会主任，苏仁明、刘春艳为执委会成员。

独立设置后，区红十字事业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备灾救灾、救护培训、造血干细胞、红十字青少年、社区服务、宣传及组织建设等工作都取得了新进展。目前，区红十字会充分发挥在关注民生、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作用，努力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 广播情缘六十年

张广文

今年是房山广播创建的 50 年和房山电视台建台 20 年。回忆起与房山广播的初次结缘，回忆起所看到的房山广播事业艰苦的创业历程，作为一位亲历者，笔者有着非同一般的感受。

## 源远流长自少年

1948 年 12 月，房山城解放。1949 年春节过后，我上了学。课程不多，课外活动可不少。做得最多的是村公所或下乡工作队让我们学生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其中有一种做法叫“屋顶广播”：把学生每三四个人分为一组，从村子中央依次向村子的四个方向排开，每个小组距离 200 米左右，以能够听清对方喊话为准。每个小组要选择一个周围比较开阔，又容易安全上下的屋顶作为站点。村子中央的一组由老师或高年级学生带领，手里拿着上级发的文件或工作队员写的宣传稿，点着蜡烛或煤油灯，每念一句由旁边的四个组向四个方向重复喊一句，下一个小组听到后再向下一组方向喊去。如此接力，由最村边的一个组把文件精神一句一句传到老百姓耳中。那时村子里很安静，没有现在这些噪声，吃过晚饭后又都呆在家里没事干，又是刚刚解放，老百姓很想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要干什么。村子里又没有收音机报纸等信息渠道，因此对广播内容都很认真听，听不明白的，第二天还要问一问。每到晚饭后，一个声音开始传遍全村：“老乡们，注意了，屋顶广播现在开始了……。”这种最原始的直接用人的声带作为传播信息的工具，也可以说是房山广播电视的先驱了。

大约 1952 年前后，农村开始普及一种叫做矿石收音机的广播设施，一个单线圈和一个用自然铜（一种天然的半导体晶体块）一个纸盆喇叭组成的简单电路，加上室外天线就可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套节目，虽然声音和现在手机的音量差不多，但围坐在收音机前也听得很清楚，屋顶广播也就不用了。

由于参加了几年的屋顶广播，我对广播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家里有了矿石

收音机，就经常听中央台的广播。那时最喜欢的就是新闻和评述类的节目，好几个播音员都成为我崇拜和模仿的对象。记得我最熟悉的声音有：浑厚庄重的夏青，铿锵有力的齐越，清脆悦耳的潘捷、葛兰和嗓音沙哑别具特色的费季平。当后来听说夏青和费季平是延安电台的播音员以后，我从心里越发敬慕他们，甚至幻想着有朝一日我也要当个播音员，让我的声音由电波传播出去。这大概就是广播情缘之初吧。

### 结缘广播初创业

1958年底，房山城内十字街的大喇叭里传出了周口店人民广播站播音员的声音，当地有了有线广播了！那时我正在房山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学校有一台50瓦扩大器，安装了两个高音喇叭，用于放广播体操的唱片，偶尔播送一次通知。我于是产生了一个念头：何不利用这套设备办一个校园广播站呢！经过一番考虑，找到当时的校长王喆和党支部书记陈竹溪，提出了自己主办校园广播站的要求，并提交了自己的工作设想和计划。大约在1959年3月，学校同意了我的想法，让我筹建广播站。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于是第一次来到周口店区人民广播站学习。

周口店区人民广播站(1960年改为房山县人民广播站)建站之初，位于房山城十字街东南角的一个破旧院子里。院子很小，有7间房，5间东房，2间南房，院子的空场不到20平方米。东房的北侧2间是编辑部兼办公室，中间1间是女宿舍，南侧的2间一分为二，最南边是播音间，做了简易的隔音设施，一进门的一小间是导播室；2间南房是男宿舍兼小库房。院子的西北角开了一个只有两扇木板门的小门。这样的房屋和院落冬天阴冷夏天闷热。这个院子东墙后还有个后院，后院比前院高出近一米，从后院看，五间东房像半地下建筑。后院安排了厕所、煤棚和两间简易库房。可能是为了与县委宣传部走动方便和运煤运器材方便，在后院的东北角也开了一道门，装上一个铁栅栏门。为了进前院和办公室，在办公室的沿街的一间就开了一个后门。不过，进这个后门得先下几层台阶，然后低头弯腰才能进去。

当时，广播站成立不到半年，接待我的是站里的负责人（站长不详）兼编辑张延庆，他穿着一套旧军服，瘦高个，说话带一口浓重的东北腔。站里有一个技术员是湖南人，叫罗熙湘。播音员是龚仲文。

在广播站，先学机务知识，从扩大机和话筒的原理、高低音喇叭的构造与

连接，电唱机的使用与简单的机器维修技术都要学习。还要学节目制作和稿件的采访编辑。还要学习播音的技巧，以便掌握语气，语速及情感。记得当时广播站的同志叫我用一张白纸放在面前练发音用气，念稿子时用喉咙发音，不能吹得白纸前后晃动，不能唾沫满天飞，喷湿了白纸。至于培训教材，我至今还记得是我当时非常敬慕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葛兰为培训班写的讲稿。

在学习期间，我又在学校的扩大机、收音机、电唱机上练习，同时收集了散放在学校各处的几十张唱片，制作出一些必要的管理制度，学校又选调了廉燕生、李增贤两位同学当助手。

1959年的5月，房山中学广播站正式开播。当时学校广播站一天播音三次。第一次是上午的课间广播体操，使用电唱机放唱片；第二次是中午放学和午饭时间，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第三次是下午课后的自由活动的时间，播送自采自编的节目，每天一个栏目，重要的稿件要重播二三次。

为了开办“校园生活”栏目，我们组建了各年级的通讯报道员向广播站投稿。“党团支部生活”栏目则由学校党团支部安排稿件。这两个栏目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学生和教职员的工作、生活、学习和思想动态，大家都非常支持和关心，踊跃投稿。因时间有限制，有时还要压缩文字，甚至到下周再播。在文艺栏目中，我把不同的唱片按内容和特点分类编一个条目，定好时间顺序播放，就组成了“进行曲欣赏”、“民歌欣赏”、“轻音乐欣赏”、“民乐欣赏”、“戏曲欣赏”等小栏目。听起来也颇有韵味。有时候也组织一些现场表演的节目，现在叫直播。在一间没有隔音设备又只有一个膜片式话筒前，表演出好效果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不经常组织。记得曾组织过小合唱、诗朗诵、乐器独奏等。党支部书记陈竹溪弹得一手好月琴，有好几次安排他的月琴独奏，很受师生的欢迎。

由于业务上的经常联系，我与县广播站几位同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即使学校放了假也要去看一看，以便学到更多东西。时间长了，我也对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当时站里的设备很简陋，办公条件艰苦得让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先说设备，一间导播室内装着两台前级增音机；还有两台重达十多斤像一个小手提箱那样大的录音机，一台是国产“钟声”牌的，一台稍小一点能够外出携带而故障较少的录音机是匈牙利的产品，用于录制会议报告和领导讲话的。播音室是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小屋，冬天没有暖气，能够冷到零度以下，都是穿着棉大衣念稿。夏天又闷又热，也不能开电扇，汗流浹背，稿纸上常常留下汗渍。

相处时间长了，我的各方面水平也有所提高。有时稿子多了，老张就给我一篇帮着编辑修改，并抄写在方格稿纸上便于计算数字。因为只有于泽英一名播音员，有时因休假，就让我播一篇。在星期天或假期，我还和他们一起骑自行车下乡采访。记得最远的两次，一次是到良乡南边的肖庄采访养猪的情况。另一次是张延庆、姜少英（后来是北京电视台郊区部主任，当时是县委宣传部的通讯员）和我骑车 50 多里地采访南尚乐公社秋收情况。那时去南尚乐完全是土路，早晨出发临近中午才到公社，下午到辛庄和北尚乐村采访，回到房山城已经天黑了。那一次采访秋收场院管理很有推广的价值，回来后由我整理成稿，除了在站里播出，还投送到北京电台和《北京日报》。

1959 年秋天，牛口峪水库开工建设。在热火朝天的水库工地，我又听了工程指挥部关于工程的介绍，在很短的时间内创作了一个广播短剧《牛口峪水库畅想曲》。在张延庆导演下，我和同班同学在小小的播音间录了这个在房山广播史上首次播放的广播剧。剧情梗概是，通过几个农民的叙述，水库建成后，库区花红柳绿一番美景，水库浇灌的田地五谷丰登。节目不仅在广播站播出，还拿到水库工地播放，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1987 年 8 月 1 日房山区广播电视局成立，1987 年底广播电视大楼建成，1988 年底房山人民广播电台、房山电视台建成开播，使房山的广播电视迈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1988 年庆祝房山广播事业 30 周年的时候，广电局的同志没有忘记我这位编外的广播人，把我列入“曾协助广播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员”，邀请我参加庆祝活动。以至于在我退休前后，还设想着能再为广播事业做点工作。1999 年，我自费参加普通话测试，拿下了普通话一级证书，后来还被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聘为北京市社会用字义务监督员。

### 良师益友音容在

在我与房山广播事业结缘的几十年中，给了我启蒙和最多关怀又令我敬佩的就是张延庆。据我所知，他是从部队转业来到房山的，参加过抗美援朝，曾在志愿军总部工作过的通讯排长，到房山后，他把自己的一生心血都献给了房山的广电事业。房山广电事业发展过程中，他是创始人之一，资格老、技术水平高，从艰苦创业直至退休，从不居功自傲。1958 年，他参加筹建广播站，从设备采购到各公社的机器调试安装，跑遍全县。1969 年由他负责搞载波广播，从冬到夏一干就是半年多；在 1970 年底开始的“小喇叭入户工程”，他

一年之内完成了全县十万只压电陶瓷小喇叭入户任务，跑遍全县各村；1973年开始建广播专线由他负责，一直干到1983年底。这期间，站里陆续添置了东风三轮摩托车和北京130小货车，他兼任司机、采购，还是装卸工。由于多年相处，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知识和很多优秀品质。

另外一位就是从1969到1985年担任站领导的李平。我从部队复员回到房山工作后才知道李平在广播站任站长。我上中学时他在学校党支部和团支部工作。创办房山中学广播站也曾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那时广播站已经迁到西街路北原工业局的一个小院里，我当时在气象站工作，后来知道，他虽担任站长，但也是编播全能，而且很热爱广播事业。因为他了解我，有时在关键的农时季节需要介绍天气情况和农业气象情况时，就让我自己撰稿和播音。比如“天气预报是怎样制作的”、“天气预报知识”、“小麦和玉米播种收获期气象条件”、“冰雹砸坏庄稼怎么办”等等，在工作上给了我不少的支持，思想和生活上也给了不少的关心，使我终生难忘。



# 房山县供销社系统商业美术回顾

李瑞祥

1974年国庆节前夕，房山县商业局系统的第一座商场——房山百货商场开业后，县供销社系统也加快了建设商场的步伐。

房山百货商场设立了专职美工，橱窗和营业厅里的美化装饰经常不断地变化更新，不但让细心的顾客感受到了，更引起了商业同行们的注意。当时每到重大节日前夕，各级商业领导开会，总强调美化店容店貌。过去一般小型商店只是从大搞卫生，做到窗明几净来体现店容店貌。现在许多商店的领导转变了观念，或通过关系，请外单位的美工来义务支援；或聘请一些有绘画手艺，却没有工资收入的农村能人来帮忙。由于县供销社系统的商业网点不像商业局系统那样集中在城镇和国有大厂矿附近，而是遍布于全县三十多个公社农村，分散而不集中；并且当时系统内也没有专职美工。所以县供销社系统的商业美术工作，开始时采取了充分发挥各基层供销社自己积极性的办法。

1975年冬，周口店供销社在京周公路47公里处东侧周口店中学旁，建成一座平房商场。供销社主任石玉柏提前一个月派了宋辉、冯汉庆、李建惠、肖淑荣等四个年轻职工，来房山百货商场学习美工。我在临开业前四天被派去昼夜苦干。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供销社还请了周口店大韩继村能画画的木工项珩来帮忙，为水果组绘制了女青年摘苹果的大画。

1976年元旦，周口店供销社商场开业。该供销社娄子水村分销店主任姜元鑫听说有一个能画画的青年刘森（现名刘申），正在县文化馆参加农民画学习班，就把他找回来，为分销店画了一幅五米多长的广告色海南万泉河风光和一幅农民在麦田里喷洒农药的风光画。姜元鑫画了一幅表现山区曲折盘旋公路的风光。三幅画把商店里三面墙货架以上部分正好贴满。姜元鑫后来调离供销社，到长沟峪煤矿工作。刘森后来成为燕化聚丙烯事业部的美工，多次在国际国内比赛中获奖。

1976年，十渡供销社先后迎来北京师范学院和中央工艺美院开门办学的师生。他们每天出去画写生，吃住在供销社。他们为供销社画了大幅十渡风光

的水粉画。由于出自专业人士之手，形神俱佳，赏心悦目，当年曾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供销社职工徐国华勤奋好学，爱好美术，他抓住机会认真向美院教师学习。后来几年间，他兼管写画宣传，多次被抽出来，为十渡、六渡、蒲洼等分销店设计制作毛主席诗词牌匾，书写标语口号牌等。1984年徐国华被调到位于大石河的县供销社职工干校当教师，该校后来改为北京市供销技校，即现在的北京市经贸高级技校。徐于1995年在该校创建了商业美工专业，除徐国华、杨旭君等学校自己的教师外，还聘请了笔者和张树梓等多人执教了连续八届学生，至今每年都在招生，为全市培养了不少实用型人才。

琉璃河供销社于1976年开始筹建商场，他们把先后建成的两座相邻的二层楼商店打通了过门，这样连起来达到80米长，共设有6个橱窗。曾在供销社药店任过会计，菜站当过组长的王佑民，当时已47岁，他能写会画，尤其喜爱书法。小他十岁的许文增当时在供销社照相馆工作，许自幼爱好美术，参加工作后，曾接受过到房山支农的美院教师指导。他俩被抽调出来组成了美工组，王佑民任组长，配合他俩工作打下手的是刘恩涛和木工耿少平。这是县供销社系统的第一个专职美工组。由于琉璃河供销社商场位于南北向的107国道旁，王佑民、许文增根据供销社系统经营生产资料类商品的特点，和当时国家的宣传口号，把橱窗分成“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两大部分来设计，突出了供销社的经营特色。经过几个月的忙碌，琉璃河供销社商场于1977年春开业。

张坊供销社也建成了一座两层共1050平米的商场，并于1977年“五一”节开业。开业前两个月，供销社主任白秀顺派了姜德臣、傅君华等四名职工，到房山百货商场美工组学习美工。临开业前六天，百货商场派我去张坊支援。张坊远离县城，经常停电。为了按时开业，供销社领导带领职工连续多天加夜班，营业厅里点燃近百支蜡烛，男职工忙着往返推车搬运商品，女职工分门别类地写价签，往货架上和柜台里码放商品。我和姜德臣等人写画剪刻粘贴忙个不停。整个营业厅里烛光闪闪，人来人往，一片繁忙景象。开业几个月后，白秀顺又请县文化馆美工刘仲全为商场画了大幅国画。天津美院毕业的刘仲全后来加入北京美术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并任房山区书画协会主席。

琉璃河供销社商场开业后，王佑民、许文增等抓紧时间，继续完善营业厅里的装饰。县供销总社又把王佑民、许文增抽借到县社机关驻地，为本系统各基层供销社服务。王佑民、许文增帮助美化装饰过的单位有窦店供销社商场（刘秀文配合工作）；坨里供销社商场（陈惠配合工作）；还有良乡供销社、长阳供

销社、石楼供销社、长沟供销社、周口店供销社（仍然有项珩来帮忙）、南窖供销社等。在长沟供销社干活时发现了陈宗武。

1980年，陈宗武被抽借到县供销总社，与王佑民、许文增一起干美工。陈自幼爱画，曾参加县文化馆举办的农民画学习班；1974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县文化馆在房山河北公社东庄子村，搞了一次条屏年画三结合创作活动，陈宗武在专业画家的指导下，创作的四条十六幅年画“迎风飞燕”曾印刷出版在全国发行。到1980年4月，经过近三年的辛苦忙碌，美工的任务基本完成。

1981年，县供销总社再次抽借王佑民和许文增，忙了近一年。任务完成后，王佑民仍回良乡供销社旅店上班，许文增则调回家乡窑上乡供销社当仓库保管员。王佑民1985年参加了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的学习，师从吴未淳、肖劳等名家，书艺大进，被北京书法家协会吸收为会员。1987年至1993年，他连任房山区第一、二届政协委员，2001年2月去世，享年72岁。

县供销社系统靠自己美工的力量，完成本系统内多家基层商店商场的美化装饰，甚至支援县里其它商业系统，这段美工最繁忙兴盛的时期从1976年秋开始，至1981年底结束，共有五年多时间。

随着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的大潮，1985年底城关供销社不再保留美工的设置。

1987年12月，县供销社系统在房山南关大街西侧，建成开业了营业面积达2400平米的聚源商场。建筑为前面凸出半圆形营业厅，与后面主楼营业厅有两门洞相通。半圆形外立面中间是商场大门，两旁是呈弧形的橱窗，所以不仅两层营业厅需要装饰，橱窗也得设计。王佑民为聚源商场刻制了由市供销总社副主任郭献瑞题写的金字木匾。交道乡刘平庄从事个体美术装潢的田仲唐为聚源商场设计了以平面水粉图案广告为主的橱窗。

聚源商场的商场美化工作，除上述开业前的以外聘为主，主要依靠了供销社的一位老职工侯之扬。他喜写画，尤擅写美术字。早在1958年，房山良乡二县合并划归北京市后，市里搞过一次商业橱窗展览评比，要求每个区县设计布置一个橱窗，各区县派人集中到海淀区一个商场施工。当时31岁的侯之扬带着两个女职工王亚荣、王伯华奋战了十多天，搞成一个表现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内容的橱窗，背景是红日照耀下的山区公路，往返车辆正在运输商品，标题美术字是“社会主义好”。这个橱窗获得了满分五分，为房山商业系统赢得了荣誉。

区供销社系统后来已经没有专职美工。如遇必需装饰和广告宣传的任务，就从外面雇请。如 1995 年，琉璃河供销社商场和城关供销社批发中心，都请田仲唐去帮过忙。尤其是田为城关供销社批发中心楼顶画的农机五金交电内容的六块油漆广告牌，可以说是我区手绘户外广告中真正达到专业水平的精品。

# 赵朴初出席云居寺 天王殿毗卢殿竣工典礼纪实

李 耀

自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于 1983 年 7 月 10 日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居寺视察后，市委、市政府对这一在抗日战争时期遭到日军严重破坏的佛教圣地遗址的修复工作十分重视。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云居寺修复委员会，由副市长陈昊苏任主任。原房山县政府也专门成立了修复工程总指挥部，由副县长高海量任总指挥。修复委员会认真研究和制定了修复规划，决定分期修复逐步完成。

首先恢复天王殿和毗卢殿。经过紧张的筹备和施工，于 1985 年 11 月 4 日举行了大殿修复的立架仪式。由于这是云居寺修复的头一项大工程，因此，县长王俊起，副县长云居寺修复工程总指挥高海量以及县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出席了立架仪式，现场气氛十分热烈。立架仪式后，修复工程紧张有序的进行。

经过近半年时间的施工，于 1986 年 4 月底，两座大殿修复工程相继完成，修复委员会决定于 1986 年 4 月 30 日举行天王殿、毗卢殿竣工典礼大会。竣工典礼仪式由副市长、云居寺修复委员会主任陈昊苏主持。出席典礼仪式的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云居寺修复委员会名誉主任赵朴初。市



1986 年 4 月 30 日，赵朴初（右三）  
出席天王殿、毗卢殿竣工典礼

政府、市文物局、规划局、园林局、交通局、水利局、林业局、农场局、绿化办、侨办等市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大会。县委县政府及县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典礼仪式。会前，与会人员积极响应胡耀邦总书记在视察时提出的“景区要治理，要植树，要绿化”的号召，积极参与了群众性的植树活动。

植树活动结束后，竣工典礼正式开始，会场鞭炮齐鸣，隆重热烈。首先由修复工程总指挥高海量汇报大殿修复工作和环境绿化工作进行情况及下步的修复计划。汇报发言后，赵朴初副主席讲了话。他对大殿修复工程的进度和质量表示满意，对修复工程的指挥者、建设者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讲话中他十分强调修复云居寺的重大意义。一是“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他说：房山石经从隋朝开始刻经，代代相传，直到明朝末年，相距一千多年，这虽然是历代僧人历尽千辛万苦组织的浩浩荡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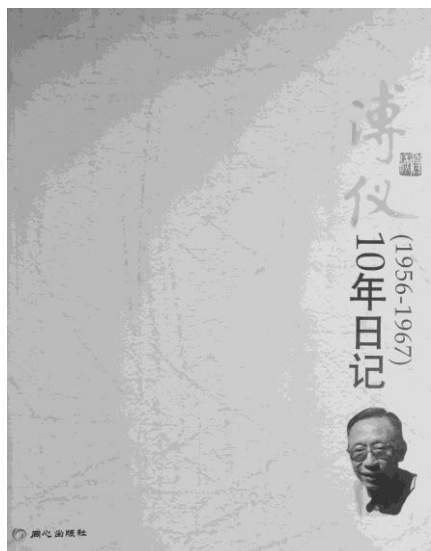
1985年11月4日，房山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在大殿立架仪式上

大工程，但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这是十分宝贵的，也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二是改善了石经的保护环境。他说：云居寺修复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之瑰宝”的石经的保护环境和条件，这是功德无量的大事。三是开辟了新的佛学研究的场所。他说：房山石经内容极为丰富，需要认真整理，现在在整理中还不断发现惊人的内容，云居寺则是研究佛学的重要场所。四是云居寺修复就是极好地宣传了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政策。他说：云居寺的修复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和宣传了我们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一事实就有力地回击了外国反动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对我国民族宗教政策的污蔑和攻击。最后他勉励大家要再接再厉，把下一步修复工作做的更好。

市政府领导也讲了话，就云居寺修复的资金来源、文物保护以及绿化美化环境等工作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要求。房山县委书记王俊起对各级领导给予云居寺修复工作的支持和关心表示感谢，对云居寺下一步的修复工程要继续抓紧抓好，高质量的完成任务表示了决心。

# 溥仪参观南韩继

赵思敬



《溥仪 10年日记》一书封面

自从 1964 年 2 月 3 日,《北京日报》发表长篇文章,介绍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南韩继大队艰苦奋斗,夺取粮食高产的先进事迹,北京市农委在《关于当前郊区农业生产情况和问题》的报告中,强调郊区农业要推广南韩继等村庄的先进经验。一时间,南韩继成了远近闻名的先进村。市委书记彭真曾说:“学大寨,看不见,南韩继,最方便。”此后,来南韩继参观的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绝。1965 年 11 月 13 日,末代皇帝溥仪作为政协委员跟随全国政协来到南韩继参观。

在来房山的前一天,即 11 月 12 日,59 岁的溥仪听取了南韩继村的先进事迹。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在政协礼堂听南韩继人民公社党支书徐庆文关于公社情况报告。市人委秘书长郭斐然等参加,李金德主持座谈会(以下楷体字皆为日记原文)。”在这里,溥仪显然弄错了,他把南韩继大队党支部书记徐庆文,误记成了“人民公社党支书徐庆文”,在以后的记述中,也是如此。当然,这无关紧要。那么,徐庆文介绍了南韩继的什么情况呢?查《京郊农业合作化大事简介》,应该是南韩继村四个方面的工作情况。一是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抓好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的情况;二是改造自然条件,狠抓水利建设的情况;三是在积肥、改良土壤上下工夫,做“笨”事情的情况;四是认真开展学习先进,开展科学实验,不断改进耕作技术的情况。因为,南韩继的这些先进经验当时已经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宣传。从现存的许多资料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溥仪来南韩继是一个星期六,这天“上午九时由政协出发,往南韩继公社参观,市人委平部长、郭秘书长、李副局长等等同行。”“领导照顾我初愈,命

坐紫轿车(七八人)。其他分三大车。九时半过到公社。到小学校休息,受社员等接待,极为殷切”。从西城区全国政协的办公地点到南韩继,三辆大轿车只用了半个小时,可见当时京周公路汽车很少。此前,溥仪因为患感冒,又加上尿血,正在人民医院请著名中医蒲辅周先生看病,所以领导让他坐小轿车。溥仪所说“初愈”,指的是10月18日患的感冒已经好了。南韩继人“极为殷切”的接待,溥仪印象很深。



晚年的溥仪

在南韩继小学校休息约一个小时,至“十时二十分出发,参观公社麦地和打的井”。溥仪所说的“公社”,即村里的麦地和农用水井。当时,南韩继村是周口店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这个村的地势高,水位低,十年九旱。解放前人们都管它叫“旱高台”。村里有183户人家,904口人,集体耕地1222亩,平均每人一亩三分多地。解放以后,南韩继人于1954年成立了初级社,到1964年把这个“旱高台”变成了稳产高产的米粮仓。1963年以后,每年向国家交售余粮40多万斤,平均每人交450斤。在几年的时间里,南韩继组成了一个打井队,先后打了51眼井,使百分之九十五的耕地变成了水浇地。溥仪一行人参观后,在村中小学校用午餐。虽然招待的是“窝头、咸菜、熬白菜、红薯、小米粥”,溥仪感觉“很香”。

下午,溥仪和在县里一名人员的陪同下,和其弟溥杰、于益之、郑庭笈、董益三、李继中分成一组,在社员葛玉玲的带领下,访问了三户农民家庭。第一户是杨秀玲家,“杨宅中悬毛主席像,屋中布置很好。杨大妈说:这都是毛主席给带来的幸福,在旧社会是盖不起房子的。现在的房子是(1964年)去年盖的,把老房翻盖的。又说,现在这个村一百多户,集体养猪,每户也养猪。我们三人三个月收入六百斤麦子,成了超产户,余粮都贮存起来。杨家还买了一百一十元的无线电”。杨大妈说的“集体养猪,每户也养猪”,目的是为了积肥。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1957年,村党支部中了一块试验田,播种、管理跟一般农田相同,就是施肥多,每亩8000斤肥,比一般农田多3000千斤,结果粮食亩产540斤,比一般地多产240斤。所以,养牲口、养猪,便成了一种多打粮食的先决条件。杨家的“无线电”指半导体收音机,不但家有余粮,还有零花钱,从此可窥南韩继村民生活之富裕。第二户是一个葛姓农



家，“葛家四口人，有一男在（读）高中，父七十三岁。中悬毛主席像，对联是‘毛主席万寿无疆，共产党千秋歌颂’。写‘抬头见党’（过去‘抬头见喜’）。他住的房子是解放后用几百元盖的，材料为百余元。葛玉玲说，过去我们这里产粮几十斤，现在一千多斤了。谦虚地说：“我们这里赶不上大寨，差得还远啦”。葛姓农家为葛万川家。葛玉玲说的是实话，过去，南韩继的一千多亩土地被大大小小十八条沟切成偏坡溜岗。下雨不存水，上粪顺水流。人们形容这里是“雨过天晴地皮干，烫的蝎虎打转转，三面坡岗一面沙，土薄地瘦不长庄稼。”那时，这里每亩地只打一百多斤粮食。第三户是葛玉玲自己家，“她家有一弟弟、一妹妹，妹在北京上学，第二医学院。母病，靠葛劳动，葛在中学毕业后到公社服务。她说，我们这里1957年每亩地产粮二三百斤，1964年每亩产九百三十八斤（65年约七百一十四斤）。葛说，每家养一头到二头猪。葛家的对联：‘翻身不忘共产党，永远跟着毛主席’。这是葛玉玲一家的心里话，也是代表南韩继公社全体农民的心理话，也是代表五亿农民的心理话”。访问了三户农民家后，溥仪感慨到：“农民遇见共产党和毛主席，才能由奴隶翻身成主人。我自己遇见共产党和毛主席，才把魔鬼变成新人”。

参观南韩继后，溥仪一行人又来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在这里参加一个报告会。“大家到周口店古脊椎研究所，在大厅里集会。由房山县县长报告；张芝凤（女）报告——种田为革命；社员孙和报告——学毛主席著作；社员谢利祥报告——学习毛主席著作，根据学习心得解决了什么问题；许振宇报告——勤俭工作；房山县委书记张林德作总结报告”。需要指出的是，“张林德”应为“张令德”，是房山县委副书记。作报告的人都是南韩继村民，“许振宇”应为“徐振宇”，这里也是笔误。报告会后，李金德秘书长请溥仪发言，溥仪发言大意说：“这次参观南韩继公社，先在政协听了徐庆文书记的介绍，今天又听各位的报告，对自己很大教育和鼓舞，这是学习革命。回忆打倒旧中国三座大山压迫，只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才翻了身。自己过去的前半生是封建统治阶级，是反人民的。只有在党的改造、教育下成为新人，过去的我正是今天的我的敌人。今天，能和大家——劳动模范、英雄同聚一堂，共同讨论，这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给的。祖国面貌真是天翻地覆变化，不仅建设方面天翻地覆，就是改造人类、改造社会，也是天翻地覆变化。我在访问葛家，看对联上有“翻身不忘共产党，永远跟着毛主席”，非常感动，感动得掉下泪。今天自己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能和大家共聚一堂，非常高兴。彼此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座谈会结束后，溥仪和随同委

员“参观古脊椎展览馆，看看猿人洞（洞外）”。溥仪参观猿人洞的事，不见于周口店大事记载。下午五时许，溥仪一行人离开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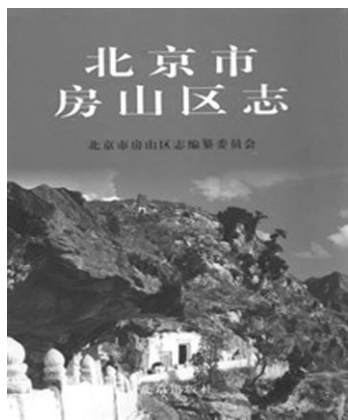
参观南韩继后的第三天，即11月15日下午，政协又组织委员们座谈、学习。溥仪在这一天日记中又写道：“关于南韩继大队的感想，我发言，申老发言”。这一次，溥仪终于弄明白了，南韩继是一个大队，不是一个公社。时隔两天，即11月17日下午，政协组织大家“继续漫谈参观南韩继大队感想”。由此算来，溥仪对于南韩继的印象应该还是比较深刻了。

参考资料：

- |                           |       |
|---------------------------|-------|
| 《溥仪10年日记（1956 - 1967）》    | 同心出版社 |
| 《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南韩继》          | 农业出版社 |
| 《京郊农业合作化大事简介（1949——1966）》 | 兵器出版社 |

# 房山的第一部新志书——《房山区志》

许冬梅



《北京市房山区志》一书封面

《房山区志》由房山区志编纂委员会编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房山区第一部志书。1990年启动编纂工作，至1999年完稿，同年9月由北京出版社公开出版。全书6编36章138节，字数约125万字，彩插16页，彩图50幅，地图1幅，首版印数7000册，16开精装本。志书上限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到1995年，是一部由古至今内容最全面、系统，同时也是最具权威性的地情资料书。志书的出版，是房山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不仅为领导决策提供了翔实资料，也为社会各界利用资料开展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起到了重要作用。

房山编修地方志的传统已久，现今能查到的较早一部《良乡县志》，修于明隆庆年间。较早的一部《房山县志》，修于明万历八年，距今均四百余年。1988年10月22日，市政府印发《北京市地方志工作规划纲要（1989年—1999年）》指出：“编纂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时期第一代新方志，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涉及范围广，请各部门、各区县按照规划纲要的要求，认真组织实施。”1990年1月10日，房山区政府召开第50次常务会议，决定正式编修《房山区志》。2月13日，经区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区志编委会组成人员名单。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在史志办，由史志办负责组织编纂工作。2月14日，区志编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审定通过了《房山区志编纂实施方案》。2月16日，区志编委会召开区属各委办局、各乡镇主管史志工作的领导及驻区中央和市属单位主管领导200多人参加的区志征编工作动员大会。编委会主任、常务副区长张中兴在会上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发展与我们的任务》讲话，就《房山区志》编修工作进行了动员，并就本届修志的目的、意义和任务作了具体阐述。会上，印发了《房山区志资料征集纲目》，要求各单位确定

专职资料员。2月28日至3月1日，区史志办举办房山区志资料员学习班，150多名资料员进行了关于新方志的资料工作和统计基本知识的业务学习，随后，建委、商委等各委口都召开了落实区志编写工作会精神，布置本系统区志工作具体任务。

编纂《房山区志》经历了四个阶段。

准备阶段。1990年1月至3月，区史志办成立了以史志办副主任张东升任主编的编辑部。之后，召开了动员会，对资料员进行了培训，制定了《房山区志篇目》、《房山区志编纂实施方案》和《房山区志资料征集纲目》。《房山区志篇目》，是在研读80年代有关新方志篇目设计的理论和已出版的志书框架的基础上，结合房山实际而确定的比较严谨的篇目。《房山区志编纂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从征集资料到志书完成各阶段的任务、要求和具体实施步骤。《房山区志资料征集纲目》已解析的方法，按编按章将所要征集的资料列出题目，分500个题目，确定了每个单位应分担的任务。

征集阶段。从1990年4月至1992年6月。资料是志书的基础，资料的征集包括选购图书，如《二十四史》、《顺天府志》等古籍。到区图书馆、区档案馆收集房山县、良乡县明清及民国年间志书和其他地情资料；其二为征集馆藏散件，主要是区档案馆、北京图书馆、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等图书和档案资料；其三，征集区属各单位出版或未出版的内部资料。到1992年，征集到房山县内部刊印资料数十份，约计400万字，加上图书和馆藏散件资料，征集资料总量在200万字至1500万字之间。其四，1990年3月，房山区人民政府向全区发出《关于征集编纂新方志资料的通告》，主要内容是：征集范围和征集办法。

撰稿阶段。从1992年7月至1995年底。《房山区志》采用大编结构。编纂工作实行总纂（主编）负责制。总纂负责志书的设计、制订规划并主持志书的编修工作。分纂按志书设计要求，在征集资料阶段负责自己分担的编或章的资料工作，并强调相互协调配合。总纂在分纂的基础上，进行总纂，主要是调整结构，册繁补要，统一文风及做重要史实的校核考证，处理交叉重复内容。至1995年底，志稿已基本完成。

出版阶段。根据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的意见，各区县及市各专志要三审定稿。1996年6月25日，在房山宾馆召开志稿评审会。会后，根据评审意见，整理出修改方案，边修改，边继续征集一些必要的资料。至1997年春，基本完成《房山区志》(复审稿)，交由市编委会复审。1999年1月13日通过北

京市编委会终审定稿后，交北京出版社出版。

1999年10月8日，《房山区志》以北京市出版三部志书之一，参加了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行的全国新编地方志成果展，得到了房山区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好评。2000年，房山区史志办被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市人事局评为北京市修志先进集体，张东升、贾昉荣获先进个人称号。同年，张东升撰写的《一部贯古通今的志书》发表在《中国地方志》杂志上，获得了专家的一致认可。

《房山区志》呈现的主要特点：按系统论原理设计，采用大编结构；内涵丰富，囊括古今；创新体制，纵横交织，构成文字叙述的基本形式；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多种体制综合运用，相得益彰；“地理”编渗透环境变迁意识；取材和选材严格，不落窠臼。语言凝练，朴实生动。

志书出版后，为了发挥“资治、存史、教化、交流”实现编修志书的目的，为了让干部群众认识志书的价值和功能，自觉投入到“读志、用志”的活动中来，大力开展了全区性区志宣传推介活动。

1999年11月8日，在昊天假日酒店举办了《房山区志》首发式。参加会议的有区主要领导，各届编委会主任、副主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段柄仁，房山游子、老作家苗培时等应邀出席会议并讲话。领导们就志书的编修和功能，充分利用志书的价值，以及积累资料为续修志书作好准备等问题做了深入阐述，提出了具体要求。首发式上，为房山区的全国劳动模范、市级劳动模范代表赠送了《房山区志》。

首发式后，先后三次召开了有区直各部委办局、各乡镇主管史志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宣传部长参加的座谈会。围绕志书的价值和功能，志书的发行、销售和如何组织干部群众读志、用志深入座谈。使大家进一步明确自身在读志、用志群众活动中的责任，增强了责任感，为组织引导群众读志、用志活动培训了骨干。

在宣传方面。一是借助广播、电视辐射面宽的优点，对《房山区志》首发式做了较为详细的报道。二是原区委副书记、《房山区志》第三届编委会主任郭先英在房山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讲解区志的价值和功能，号召全区人民要购买区志、阅读区志、利用区志，为房山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同时利用报刊、杂志搞好持续宣传。首先在《北京日报》、《京郊日报》、《中国地方志》等报刊杂志刊发信息，介绍区志出版发行的情况及志书的主要内容简介和有关评价，为区内外广大读者了解区志的情况，开通了区志与区内外读者之间沟通的渠道。1999年12月，在全区开展了以《房山区志》资料为基本

内容的“阅读房山区志，了解房山区情，发挥房山优势，促进房山发展”为主题的知识竞赛活动。一是以《房山报》为载体，进行笔答知识竞赛。二是组织全区乡镇、委办局组队进行口答知识竞赛。这次全区范围内的区志知识竞赛活动历时半年，参加竞赛活动的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等 2000 多人，范围广、人数多、辐射面广。通过活动，增强了干部和群众认识区志的价值和功能意识。其三在 2000 年 5 月 29 日与《房山报》社合作，在房山报开辟“知我房山”专栏，把房山区域内贯通古今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物等各方面最有价值的资料提供给广大读者，为广大读者提供直观的服务。

邮发《房山区志》内容简介和征订信函。起草撰写了区志内容简介和《欢迎选购〈房山区志〉的信函》材料，详细介绍了区志的结构和主要内容及特点。向全国各地共邮发 6000 多份，为让更多的人认识房山、了解房山，促进《房山区志》的成果转化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 编著全国“普法”系列教材的回忆

宋 湘

十年“文革”动乱，本来还不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同时制定了“依法治国”方略。为了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法律意识，增强各级干部和执法人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观念，1985年中央制定了第一个五年全国“普法”规划，提出向全民开展普及法律常识教育的活动，并首先在一些省、市、区（县）开展“普法”试点。

当时的房山县是“普法”试点之一。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及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局等有关部门领导组成县“普法”领导小组，下设“普法”办公室（即县司法局）。1985年4月26日，县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法制教育，普及法律知识的决议》。7月，县司法局起草并经县委、县政府审定了《房山县普及法律常识五年规划》，“普法”试点。“普法”工作在全县展开，并以东营乡韩村河村为试点。9月，县司法局总结了韩村河村落实

农村“普法”岗位责任制的经验。12月，韩村河村调解委员会被司法部评为“人民调解先进集体”。1986年2月16日，司法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普法”部分试点单位汇报会，邹瑜部长认为“房山县‘普法’经验很好，应予推广”。不久，司法部向全国转发了房山县“普法”经验材料，房山县成为全国“普法”先进单位。1986年4月25日，市司法局召开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表彰大会，房山县司法局局长范永权荣立个人二等功。

为了满足全国广大群众对“普法”通俗教材的需要，1986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司法部组织全国8个单位编纂全国普法通俗系列教材，分别对宪法、刑法、民法通则、刑事诉讼法、民事诉



《宪法常识》一书封面

讼法(试行)、经济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进行通俗讲解。房山县被选为编写单位之一,负责编写《宪法常识》。

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此项任务交由县普法领导小组、县委政法委员会组织落实。由县司法局长范永权牵头,与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志、县委政法委办公室主任宋湘、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公室任全祥、县委政法委办公室李科怡(女)组成编定组。经过精心准备,“五人小组”用一个月时间到南方开展调查研究。1986年6月13日,从首都机场乘波音737客机直飞成都,16日乘火车到重庆,20日乘江轮顺长江而下抵湖北枝城(宜都县),23日乘火车南下广西柳州、南宁、桂林,7月1日从桂林乘飞机到广州、深圳,7月7日乘火车北上到上海、杭州、南京,7月15日乘火车回到北京。

这次外出调查研究,一些特殊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我们一行5人虽然都是县级普通干部,但是带有“司法部普法教材编写组”的介绍信,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热情接待。每一站出发前即电话、电报通知下一站司法厅局。到机场、车站、码头早已有人举着“司法部普法教材编写组在此候车”的牌子来接站,然后安排食宿,并按照要求组织各种调研会、座谈会,当地党政领导参加或主持会议。我们从湖北宜都乘火车南下柳州时,宜都县司法局同志嘱托于列车长,一路上我们的卧铺车厢门前经常有乘务员巡视;去餐车用餐时,一位女乘务员一直在我们卧铺车厢门前守卫。

第二,这次南行调研,司法部拨给经费2千元,市司法局拨给1千元。仅此3千元要保证5个人一个月的飞机、车、船费和住宿费,必须精打细算。分工时由任全祥负责财务管理。他将一本旧的硬皮内页挖空,放入3千元现金,小心翼翼地保管。每天晚上都要核算开支,非常辛苦。每到一地,我们都要求住在当地政府或政法机关的招待所,每人每天住宿费一般5至10元。6月26日到桂林时,接站人直接把我们领到了桂林大酒店,每人每天住宿费20元。我们感到难以承受,第二天就搬到了市府招待所。每到一地,无论逗留时间长短,一般当地只有一顿招待餐,其余时间我们或在招待所、或到街头小店就餐,统一付款,最后结账,平均分摊,公私分明。

第三,由于我们要编写宪法常识教材,所以调研围绕“当前宪法实施情况、干部群众对宪法知识的水平、违宪现象以及如何向群众宣讲宪法”这一主题,主要以召开座谈会形式听取干部、群众对编写教材的意见。各地座谈会有省、市、自治区党、政、人大、政协、工、青、妇、政法机关的领导,法学界的专



家、学者、社会名流，也有基层乡村干部、群众。一个月期间，在各地召开座谈会 20 多次，广泛听取意见，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为编写教材奠定了基础。

7 月 16 日回到房山后，我们又以一周时间分头执笔，以 4 章 50 个问答题形式起草了教材初稿。经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审定后送交司法部。1986 年 7 月，作为“全国普及法律常识通俗系列教材”全套 8 本之一的《宪法常识问答》正式定稿，我们 5 人作为编著者署名，全书 80 页 17000 字。1987 年 2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第 1 版印刷 25000 册，由新华书店经销全国。

《宪法常识问答》虽只是不足 2 万字的薄薄的一本小书，但这是房山政法界人士首次编写出版法学专著，也是房山县对全国“普法”工作的点滴贡献。

# 公议庄五虎少林会的传承与发展

白玉

公议庄村的“五虎少林会”，是以少林武术为内核，以“董家桥斗五虎”的故事为内容的武剧形式的民间花会，相传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了。是保持原有风貌、而且内容较为完备的同类花会的杰出代表。

公议庄村，地处北京西南 25 公里处，村东是永定河西堤，隔河与大兴区相望，北离西南六环路葫芦堡出口 3 公里，向西隔小清河与良乡镇官道相毗邻。村域面积八千二百亩，二千余口人。历史上，这一带常有乡匪出没，加之社会动荡，村民为求自保，尚武之风遂盛。为此，少林功夫很早就传入该村。平日自己练功，节庆日撂地表演，不化妆，无剧情，没有管理模式。逐渐形成群众自发参与，自我管理，集体传承的社团组织。明朝初年，该村将少林武术与民俗融合，以宋太祖赵匡胤《董家桥斗五虎》的故事为蓝本，编演成现在的“五虎少林会”的武剧形式，成为有广泛影响的民间花会典范会档。

《董家桥斗五虎》的故事，从正面歌颂了起事前的赵匡胤、柴荣、郑子明三结拜兄弟的经历。再现了三兄弟结识及共同斗败横行乡里、勒索钱财的董家五虎——董泰及其四个儿子董仁、董义、董礼、董智的故事。体现了中华民族所推崇的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深受百姓欢迎。

几百年来，公议庄的“五虎少林会”在村内集体传承，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村民以少林武术为技艺核心，至今传承下来的有徒手套路对练 15 路、个人单器械 4 路、器械对练 13 路、五人阵法 4 路、群打 8 路、近年来引进自选拳术器械 6 路。武术器械有棍、枪、剑、拐、单双刀、大刀、双枪、双鞭、钩镰、两节棍、乾坤圈等。表演中的武场打斗火爆激烈，文场激扬震撼，人物形象独特生动。管理人员有总管（香头）、管事物的、跑蓝旗的；演员分文场武场，由掌令旗的会头统一指挥，表



公议庄五虎少会在表演中

演时以锣为号。文场以鼓、镲、钹、唢呐等 2 至 3 副构成“小吵子”，乐声抑扬顿挫，富于变化。武场角色以油色画成不同花脸，标明人物身份：如红脸（赵匡胤）、黑脸（郑子明），净脸（柴荣）。另有董家五虎，画花脸、排虬，呈凶恶状。董家小姐董金莲带四个丫环，组成“五个丫头”，彩衣丽装呈英雄状。花会专家隋少甫曾对本会表演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会档”。

公议庄“五虎少林会”，能这样系统完整的传承下来，靠的是“祖上传”，所以没有明确的师承分代关系的记载。问起师承关系，包括近百岁的老师傅，也只能向上追溯二、三代。少林会是谁传下来的，武剧形式是哪代哪些师傅排演成的，都说不清了。往往是全村各姓人家、祖孙几代人都在会里练习，选年轻的、技艺精良的扮角色，完成出会表演。尤其是这种特殊的传承方式，会里也没有记述的档案。在村子里，习武强身是村民练习的主要宗旨。少林会成为最有影响力、最能凝聚民心的社团组织，几百年来一直是村民的骄傲。周边几十里可谓有口皆碑。方圆百里，也是声名远播。

公议庄“五虎少林会”发展起来以后，早年曾传授给了河北省固安县东徐村、大兴县天宫苑等村。后来又传授给了现在丰台区的南营村，至今该村仍有较好的传承。南营村保存有光绪十八年（1893）制作的会旗一面，距今已有上百年。据该村主要传承人王士兴师傅讲，曾经在公议庄老师传艺的大门口有一幅对联：“南营武术当街摆，公议庄大会祖上传”。

公议庄“五虎少林会”参加过不少活动，也曾获得不少荣誉。如民国二十四年（1935），曾为驻扎在良乡的国民党宋哲元部炮兵八旅作慰问演出，士兵深受鼓舞。该旅旅长赠给黑绒面黄金龙镶边锦旗一面，上书红字“尚武精神”，另赠门旗一面。1958年，北京昆曲剧团侯少奎老师来公议庄体验生活时，观看了少林会的表演，给予很高的评价：“你们‘少林会’，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并在演员化妆上给予了具体指导。1991年至1995年连续五届参加龙潭湖“全国民间花会大赛”，前四届连续荣获二等奖，第五届获三等奖。1999年和2000年，又连续二年参加了莲花池庙会，深受与会者欢迎。

2006年，公议庄村投资一百余万元建起了少林武馆。武馆内设健身房、练功房、器械室、荣誉室等。院内有宽阔的场地，并有专人管理。

公议庄“五虎少林会”，是少林功夫与民间花会的结合，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已成为一处宝贵的文化遗产。

# 房山最早的灯箱

李瑞祥

房山最早的灯箱出现于 1969 年 9 月的周口店，虽然它只有两平米大，但它出手不凡，远非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能见到的普通固定灯光灯箱可比，又不同于现在的活动灯光霓虹灯。它持续活动放光的效果独特，与霓虹灯的活动灯光原理不同，效果也不同。

1968 年底，我从城里分配到京郊房山县周口店长沟峪商店工作。不久商店领导让我在职工食堂兼会议室里的墙上，画了大海上升起红太阳的壁画；又让我把商店所属的周口店菜站门市部女墙上，写上红色油漆口号；每月为商店出一期黑板报；还搞过商店的反浪费展览等。

1969 年 9 月，商店革委会副主任白祥问我：“北京前门大街上有一种毛主席像不断地放光，你看见过吗？”因为我家就在前门附近，当然知道。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对领袖的热爱，在到处书写毛主席语录和革命口号的“红海洋”高潮之后，前门大街上有的店家利用橱窗展出一种毛主席像活动放光灯箱，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片头五角星军徽放射光芒效果一样，很吸引人。白祥问我：“你能做吗？”我说不知道原理，如果能让我看看里面的结构就好了。白祥立即开了介绍信，盖上公章，带我上了开往天桥的长途汽车，直奔前门大街。

店方很热情，打开灯箱背板，我一看就明白了：活动放射光芒的效果是应用几何原理，通过转动透光圆盘使线条相切造成的。

回到单位，我用教学用木制大圆规和半圆仪，配合精密的绘图圆规、有机玻璃小半圆仪和直尺，在 1.2 米宽的两块大纤维板上，分别画直径 1 米和 0.3 米的同心圆；然后把 360 度圆周按每 5 度等分，分成 72 份；其中一个与小圆连成 72 条两毫米宽的双勾放射线；另一个作小圆的 72 条两毫米宽的双勾切线相连。画好后，在商店干活的两个石楼公社双柳树村的木工，开始细心地在纤维板上画的所有线条上打小洞，然后将镏弓子上的钢丝锯条穿过小洞，把 144 条两毫米宽的线条一点点镂空。高 1.8 米，宽 1.2 米，厚 0.4 米的箱体终于做好了，外面还用油漆做了文字图案装饰。

白祥带着老职工李逢吉、李伟平和我同时分来的同学逢旭东一起，给灯箱里安装了多支日光灯管。又找来一堆旧齿轮，挑选合适的组装在一起，连上电机，几经增减齿轮试验，终于把已镂空线条的直径 1.1 米的纤维板大圆盘调整到合适的转速。晚上，随着电机的运转，从中心向圆周不断放射的光芒在夜色里格外耀眼和引人注目。试验成功后，在灯箱中心毛主席头像处安装了一个直径 0.3 米圆形起鼓的大玻璃罩。

此时离建国二十周年大庆只差几天了，我们把灯箱放在商店院里正对大门处，天黑后就开亮灯箱。商店领导和商店职工都来看灯箱。消息不胫而走，周口店当地大量群众和部队战士纷纷前来观看。

1969 年周口店这个活动放光灯箱，到今天已经过去近四十年了。随着科技的进步，如今再要制做这种灯箱，可以选用慢转电机，不必再组装齿轮减速；可以选用不干胶贴，不必再用纤维板镂空光槽。但至今房山区没再出现过这种原理和效果的灯箱，周口店这个灯箱成为我区绝无仅有的一个。城里后来出现也极少，我见到过的是 1990 年王府井百货大楼重新装修后，一层营业大厅化妆品柜组的货架上曾经展示过两个小型的。在一些国家大型文艺团体演出的舞台背景中，曾出现过这种活动灯光。

# 关于《贾岛研究》

张寿江

唐代是我国诗歌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众多成就卓著、极有影响力的诗人，他们为我们留下了一首首千古绝唱。贾岛作为房山籍的著名诗人，在中国诗坛上不可忽视，贾岛研究成为后人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近日，笔者曾见到一本《贾岛研究》。此书由四川庐江人章泰笙编著，民国三十六年十月初版，正中书局印行，全书共 80 页。书前是金陵卢前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写的“卢序”。第二页是七十九叟陈诗、虞山缪镇藩和桐城徐莹的三首“题诗”。第三页是“自序”，谈到作者自 1938 年春开始，“投荒巴渝，客居无俚，偶于坊间见有售阅仙诗者，市归而诵之，遂欲进而究其生平”。为了收集资料，章泰笙先后到复旦、北陪、江津、巴县诸多图书馆，荏苒年余，于 1940 年夏，“挥汗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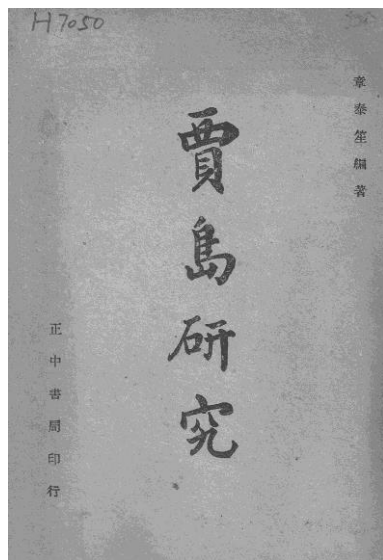
《贾岛研究》全书共十章，书中作者把贾岛姓氏省去，称“岛”。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章** “唐代诗坛鸟瞰”。

**第二章** “岛在诗坛上的地位”。分三个部分论述：岛晚唐五言律之先锋、造五言律诗作法之极则、与孟郊之比较。

**第三章** “岛的家世”。作者在书中说：“唐书宰相世袭表载：贾氏出自姬姓，唐叔虞少子公明，（周）康王封之于贾，为贾伯，河东临汾有贾乡，即其地也。”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有贾谊，谊为岛之祖。岛诗亦尝言及之，其送李余往湖南有云：若寻吾祖宅，寂寞在潇湘。”对此，作者解释说：“吾祖即指谊也。惜无从考知谊究为岛之何世祖耳！”并列一表，刊出贾岛的家世顺序。

**第四章** “岛的个性”。在这一章里，章泰笙



《贾岛研究》一书封面

说：“个性合先天之禀赋，与乎后天之习惯而言，然先天后天固皆受地理之环境影响而形成个人特有之性格也。诚以地域之影响个性即大且钜，就一般而言，生于南方长江流域一带之人民个性多温柔，生于黄河流域者刚直……岛为范阳人，范阳在今河北北平附近，而河北为古燕地，韩愈送董邵南序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是岛固亦豪士之流亚也。”他把贾岛归纳出七个特点，并举例论述：笃学不倦、深思苦吟、爱静、嗜酒、廉洁简朴、傲慢、伤感多情。

**第五章 “岛的交游”。**书中列举了贾岛与韩愈、孟郊、张籍、卢同、姚合、王建、朱庆余、雍陶、马戴和令狐楚十人的交往。在这一章节里，令笔者眼前一亮的是，作者说卢同“与岛均范阳人，是同与岛为同乡。”卢同于公元835年，因宿宰相王涯之第，遂罹“甘露之祸”，贾岛有《哭卢同》诗：“贤人无官死，不亲者亦悲。空令古鬼哭，更得新邻比。平生四十年，惟著白布衣。天子未辟召，地府谁来追。长安有交友，拖孤遽弃移。冢侧志石短，文字行参差。无钱买松栽，自烧蒿草枝。在日赠我文，泪流把读时。从兹加敬重，深藏恐失遗。”可惜当年卢同赠贾岛的诗文，未能流传下来。

**第六章 “岛的出处”。**涉及到“初为浮屠，名无本，字阆仙，少为僧，后举进士等”考证。

**第七章 “岛的著作”。**贾长江集十卷，小集三卷，今编诗四卷。作者认为：小集亦诗也。其所编四卷，内容除刊长江集所有之诗篇外，其余所编入者与畿辅丛书本长江集后之阆仙诗附集同，是小集又可名阆仙诗附集。但究竟小集是否即阆仙诗附集，不敢肯定，因小集今仅存其名，而无其书。

**第八章 “岛诗的风格与艺术”。**对此，作者归纳为“清新、幽奇、苦瘦、僻涩、典雅”五个方面，并加以论述。

**第九章 “岛的影响”。**作者称“岛诗对当时及后世之影响颇大”。当时跟贾岛学诗的有李洞、周贺、喻凫、曹松、马戴、裴说、许棠、唐求、张祜、郑谷、方干、于邺、林宽等。五代孙晟亦学贾岛诗，宋代初年有“九僧”，“沿袭贾岛寒俭幽僻”，“与岛同风”。南宋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四人均有诗集，“四人诗格相类，工为唐律，以贾岛为宗”。《四库提要》说：后山陈无己“其五言诗出入郊岛之间”。明代竟陵派亦学贾岛诗，清代乾隆时期的李怀民、光绪时期的寄禅亦学贾岛。

**第十章 “岛的年谱”。**在这一章节里，作者列出所见到关于贾岛生卒年的四种说法：

一、五十六岁说（785—841）。出处见于苏梅《唐诗概论》、日人近藤本

《支那学艺大辞汇》、郑振铎《中国文学年表(788—842)》、段臣彦《介绍一个苦吟诗人》(《磐石杂志》二卷十期)、清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新唐诗》等。

二、六十岁说(784—843)。出处见于日人泽田总清《中国韵文史》、《支那文艺辞典》。

三、六十五岁说(777—841)。出处见于郑振铎《中国文学史》、陆侃如《中国诗史》。

四、七十二岁说(793—865)。出处见于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章泰笙认为,以上四种说法中,“五十六岁说”是新唐诗之误;“六十岁说”是“自揣之词,无足取信”;“六十五岁说”“亦嫌不对”;“七十二岁说”“更不可靠”。贾岛的生卒年应以苏绛撰写的贾岛墓志铭为准,墓志铭云:“会昌癸亥,七月廿八日,终于郡官舍,春秋六十有四,呜呼,没未浃旬,又转授普州司户参军,荣命虽来,于公何有?痛而无子。”因苏与贾是“知己”,真实可信。即唐德宗建中元庚申年(780)贾岛出生,武宗会昌三年(843)贾岛卒,终年六十四岁。

《贾岛研究》一书的出版,弥补了民国期间关于贾岛研究的一段空白,为后人了解和研究贾岛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



# 奥运火炬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传递纪实

武灵玉

2008年8月8日，曾经燃起“北京人”火种的人类圣地——周口店遗址迎来了令世人瞩目的第29届奥运会圣火，人类文明的火种和奥运之火在这一刻交汇。

8日是北京奥运火炬境内外传递的最后一天，当天的火炬起跑仪式显得格外庄严隆重。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前搭起了一个以红色为基调的典礼台，两支盘绕着巨龙的巨型“祥云”火炬分列两旁，红地毯沿着山道从博物馆前一直铺到山下。早上5点左右，数千名群众手中挥舞着奥运旗帜守候在道路两旁，迎接奥运圣火的到来。“中国加油，奥运加油！”的呼喊声震天动地。装扮成远古人类的舞蹈演员身穿兽皮，手持木棒、石块，表现出人类的始祖采摘、狩猎、取火的情景。

早7时整，火炬传递正式开始。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体育局局长、北京地区奥运火炬传递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孙康林，北京奥运会组委会火炬接力中心副主任林晓华，房山区委书记聂玉藻，区委副书记、区长祁红，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先英，区政协主席范文彦出席火炬传递活动起跑仪式。房山区委副书记苗立峰宣布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炬接力北京地区8月8日传递活动起跑仪式正式开始。当圣火护卫入场时，现场响起了火炬传递主题歌，圣火护卫点燃第一支火炬，并交给房山区委书记聂玉藻。经过展示后，第一棒火炬手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总监、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冯巩从区委书记聂玉藻手中接过火炬，传递活动正式开始。冯巩、田雄、阿奇姆·施泰纳、王丽军、孙洪立、仇锁忠、许小龙、肖英、张宏欣、祁红共十名火炬手参加房山段的传递活动。

传递结束后，市、区领导对火炬传递给予充分肯定。区委书记聂玉藻对此次传递进行总结，认为达到了五个满意：一是奥组委满意；二是市委、市政府满意；三是火炬手满意；四是群众满意；五是媒体满意。第一棒火炬手冯巩激动地说：“在周口店遗址跑第一棒，这是我一生的荣耀。虽然只跑了七八十米，但是我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在很久以前，这里就曾燃起人类文明的火种，这

对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原始的石器工具到今天美丽的‘鸟巢’、‘水立方’，从钻木取火到今天高科技的奥运火炬，人类的文明就是这样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衷心祝愿北京奥运圆满成功！”

奥运火炬在周口店遗址传递的圆满成功无不凝聚着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为做好奥运宾客接待和奥运火炬传递工作，周口店遗址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服务奥运和观众为核心，采取遗址环境整治、完善服务设施、提高人员素质、丰富参观内容等多项措施，成立了以遗址管理处领导班子为组长、副组长，各部室主任为成员的工作小组，明确分工，责任到人。为确保奥运服务顺利进行，遗址管理处先后制定了奥运宾客项目、奥运火炬传递等相关方案、预案7项，并针对可行性进行8次演练。同时，市、区领导也高度重视，多次到遗址进行检查指导，确保各项工作万无一失。

做为窗口行业、世界文化遗产，人员素质尤为重要。遗址管理处积极利用职工上下班时间，每周二、四在班车上播放礼仪知识光盘；聘请部队教官、形体老师进行军训及形体培训；选派优秀讲解员外出进行多语种学习；聘请古人类学、古动物学、地质学等多学科专家到遗址授课，提升人员整体素质，确保奥运服务接待水平。

在强化业务水平的同时，周口店遗址还对参观环境和服务设施进行整治完善。整修了残疾人坡道、步道，粉刷了墙体，设置了无障碍设施，参观甬路沿途设置了体现“北京人”及其同时期的动物雕塑9组，在遗址入口处制作了一组长40米、高5.5米反映“北京人”狩猎、采集、打制石器、用火的文化墙。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以服务奥运为核心，加强领导，周密组织，以高标准、高质量，圆满完成了奥运火炬传递和奥运宾客接待工作，实现了奥运工作目标。

# 区红十字会在汶川大地震救援行动中

李晓军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里氏8.0级强烈地震。灾情紧紧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立即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作为政府人道主义救助工作领域助手的红十字会，积极动员民众，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救援行动。

## 快速反应 紧急行动

根据市红十字会和区委、区政府的要求，区红十字会于5月13日即刻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赈灾工作。联合区总工会、区妇女联合会、共青团房山区委员会，通过房山电视台、房山人民广播电台、房山报等媒体，向全区发出募捐倡议，希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发扬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奉献一份爱心，帮助灾区同胞渡过难关；同时，开通捐赠电话热线，公布捐赠账号，设置募捐接收站，开出流动募捐车等多种形式接受社会捐赠；并安排全体职工进行二十四小时值班，领导亲自带班，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周密部署，为在第一时间有条不紊地全面开展紧急募捐提供了组织保证。

我们众志成城，我们鼎力相助。当区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发出“汶川救援行动”以来，即刻掀起了一阵募捐“风暴”，一场空前的抗震募捐热潮席卷房山，一次前所未有的救灾救援行动全面展开。

## 万众一心 大爱如潮

红十字会的倡议即刻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红十字募捐热线电话响个不停，募捐接收站排起了“长龙”。从耄耋老人到天真儿童，从领导干部到普

通居民，从企业老总到打工仔，从富裕家庭到贫困群众，从社会企业到党政团体，都在尽其所能，笔笔爱心款都凝聚着亲人般的祝福和感人的故事。

为了给灾区同胞募集更多救命钱，也为了一些团体表达爱心的需要，红十字会又与一些部门联合组织了一系列较大的募捐活动。

5月14日上午8点，区红十字会与房山华冠商贸有限公司共同开展了首场为地震灾区捐款活动。来自华冠公司总部、华冠良乡购物中心的全体职工以及各分店代表共1000余人参加此次活动。他们纷纷走到募捐箱前将自己的捐款连同爱心投入其中。在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共筹集善款10万余元，此次捐款活动，在没有任何强行命令的情况下，创造了组织一个活动参与人数和捐款数额的历史之最。

区红十字会与房山区工商联联合倡议工商联会员企业积极关注灾情，采取认捐的形式向灾民伸出热情援助之手。5月16日，在工商联机关大厅，共有30家企业和个人捐款64.1万元，又创造了一次活动捐款数额历史之最；与房山商贸有限公司联合，将公司五月鲜花文艺演出，改为“抗震救灾”文艺汇演。在文艺演出前，进行了现场募捐，共接收捐款10万元。该公司已累计捐款20余万元。

5月18日上午，北京韩建集团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组织员工、业主和建筑工人，在伟业家园小区举行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活动。仅半个小时时间，前来捐款人数就达500余人，捐款总额达3.87万元，并将这笔捐款当场转交给区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地震灾害发生以来，一个个的生命奇迹在诞生，一件件的感人事迹在传播。人们在悲痛、垂泪之余，也深深地被感染着、激励着，都在想为灾区做些什么。为给更多的人创造奉献爱心的机会，营造爱心奉献氛围，5月23日，区红十字会与房山区艺术团联合在府前广场举办了大型赈灾义演活动。数百人聚集在活动现场观看演出，参加义演的演职人员真挚感人的表演，使不少观众潸然泪下，纷纷走到红十字募捐箱前捐款。真可谓：地震无情人有情，大灾之后见大爱。

5月29日上午，房山区委宣传部、区广电中心、区文联、区工商联、区私个协、区红十字会、区书画家协会联合举办“情系汶川，心手相连”书画义卖活动。来自市、区书法家协会的80余名书画家，日夜挥毫，饱含热情创作作品，将义卖的108950元善款通过区红十字会捐献四川地震灾区，帮助受灾群众重建家园。

## 领导关怀 备受鼓舞

区红十字会的募捐工作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好评。5月21日，区政府祁红区长带领全体副区长、区政府办主要领导专程前来看望、慰问区红十字会机关工作人员。祁区长高度肯定了房山区红十字事业的发展 and 区红十字会的工作。他说，区红十字会在理顺管理体制以来，顺势而为，与时俱进，工作越来越明确，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工作成效越来越突出。他称赞红十字会积极投入抗震救灾工作中，虽然任务紧急繁重，人员很少，但是你们不怕劳苦，克服了重重困难，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你们的工作是“急政府国家之所急、帮困难群众之所需”，是一项“积德行善，利他人、利国家、利社会”的工作。并鼓励大家要继续努力，认真做好募捐工作。

在这次“汶川救援行动中”，区红十字会共接收救灾款物共计4745546.62元。其中：救灾款4559178.62元，救灾物资折合人民币186368.00元，达到了房山区红十字会历史之最，超过了区红十字会建会20年的总和。

6月6日和18日，区红十字会分别接受了市区审计局、市纪检会、区纪委、区监察局的审计和检查。他们认为：红十字会接收的款物手续完备、专人负责、账目清楚，能够完全按照捐赠者意愿做到专款专用，无截留、挪用和虚列支出等问题，保证了社会捐赠资金使用的真实、合法，提高了社会捐赠款物使用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为了进一步激发红十字组织、个人和志愿者的积极性，2008年7月，北京市红十字会对全市红十字系统在抗震救灾工作中表现出色、贡献突出的单位、个人和志愿者进行了评选表彰。区红十字会获“抗震救灾优秀组织奖”；区卫生局、区直机关工委、区书画家协会、史家营乡、青龙湖镇、琉璃河镇、阎村镇等7个单位获得“抗震救灾先进集体”称号；区广播电视中心、区妇联、区工商联、北京市房山华冠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市金点点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等5个单位获“抗震救灾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奖”；此外，周德运、杨文利、张秋玲、隗林燕、李惠英、赵连杰、贺淑平、吕守军、韩朝明等9人被评为“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张振明、彭文润、翁庆苍、李志来、孟友龙、曹华、陈静、周丽秋等8人被评为“抗震救灾优秀志愿者”。

红十字，一个响亮而神圣的名字，在这场救灾的战斗中更加光彩夺目；房

山区红十字会肩负“汶川救援”的重担，为爱心人士搭建起传递爱心的平台，有力地推动了赈灾工作的全面开展，树立了区红十字会的良好形象，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房山区社会各界的义举和人民群众的爱心奉献，抒写着可歌可泣、令世人瞩目的爱心礼赞。一颗颗爱心的汇集，有如奔腾的潮水，使人感动，令人振奋，催人奋进，谱写了一曲构建和谐房山的新篇章。

# 北京燕山收藏欣赏联谊会成立经过

张寿江

现在全国各大省市几乎都成立了收藏家协会，有一些从事收藏家协会的驻会人员，还属于当地政府的正规编制。北京先后成立了三家收藏协会，说起这个话题，就不能不提起北京最早成立的民间收藏协会，即北京燕山收藏欣赏联谊会。那么，当初是怎么成立的呢？

1987年2月8日，我在《经济日报》“生活情趣”栏目上，发表一篇有关收藏扇子的文章《藏扇之乐》。由于发表时在署名前登出了我的工作单位，不久，我便收到了内蒙古、江苏、安徽、上海、湖南和山东等地一些人的来信，有几个人想托我帮助购买化工原料，更多的人和收藏组织寄来了他们主办的民间收藏刊物，如湖南的《收藏世界》、上海的《收藏家》等等，我国著名算盘收藏家陈宝定也给我写来了一封信。因当时我国还没有一份正式公开出版的收藏刊物，所以，我对民间办的这些收藏报刊很感兴趣，又想知道和获得更多的收藏信息。同时我又了解到北京还没有一个这样的组织，便萌生了一个“立足燕山，面向北京”，成立一个燕山收藏协会的想法。于是，我便拿着寄来的几份报刊，找到有同此爱好的赵思敬、叶永定、王德恒、郝士早和赵敬国等人，一起探讨商议这件事情。大家觉得只有成立一个收藏协会和出版一份会刊，这样才能与更多的收藏爱好者进行交流，广结收藏界的朋友，尽快提高自己的收藏水平。关于协会名称，就效法上海收藏欣赏联谊会，我们就叫北京燕山收藏



《收藏春秋》报

欣赏联谊会。（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成立收藏协会，还应该到民政局去登记审批）。会刊名称叫“收藏春秋”，赵思敬认为：这个刊头内容，如果要请书法家题写，本身就是一件可以收藏的书法条幅。后来经浙江湖州周熙华介绍，我求得上海一百零八岁的著名书法家苏局仙的行书条幅“收藏春秋”，果真应验了这个说法。为了让会刊能

够顺利出版，王德恒提议，将它列为是燕山文化馆、文馆所主办的文史文艺小报《燕山》的副刊。

1987年10月，协会成立工作进入紧张的筹备阶段。我们几个人经过初步酝酿研究，先拟出一份在燕山及市内收藏爱好者和收藏家的名单，共有18人，吸收他们做为第一批会员，并聘请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部主任胡德平、原北京市负责文化教育的副市长陈昊苏、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舒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藏书家周雷等人为顾问，扩大影响。

在这期间，我们几个负责人四处奔波，在燕山地区、所在的工厂和市内，当与一些人谈到要准备成立收藏协会时，由于当时我国文物界受到“左”的路线影响，文物政策尚未放开，民间收藏的文物禁止买卖。所以，一些人对参加这个组织还犹豫和持观望态度，还有一些个别人不理解，劝阻说：别把规模办大了，以免树大招风。但当我们与市内的一些领导、专家学者取得了联系，与他们谈到外省市收藏协会的情况，和我们创办收藏协会的宗旨之后，却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和大力支持，周雷为我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并帮助审定稿件和其他事宜。这样更加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克服困难，明确分工，把协会成立的日程及以后要开展的工作，安排的井井有条。会员周立友还设计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协会会徽。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终于水到渠成。

1987年12月6日上午，北京第一个由普通干部和工人组成的有关收藏的群众文化组织——北京燕山收藏欣赏联谊会，在燕化公司化工一厂培训中心会议室召开了成立大会。同时，会刊《收藏春秋》创刊号出版发行。

燕山地区和房山、北京市内的收藏爱好者以及各界人士一百余人参加了会议。来宾中有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老舍之子舒乙和夫人于滨，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编剧周雷和夫人富丽，北京作家协会副秘书长陈予一，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姚成和夫人郭文芳，房山妇联副秘书长，北京书协理事、燕山书协会长廉泾，著名古典家具收藏家张德祥，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瓷器收藏家马未都，字画收藏家唐克强和著名画家龚文桢、裴楫木、傅有叶、张宏钊等人也前来当场挥毫助兴。会议由副会长叶永定主持，副会长张寿江向大家介绍来宾和全体会员，秘书长赵敬国介绍协会筹备过程，会长赵思敬宣读了协会章程，副秘书长郝士早宣读了上海收藏欣赏联谊会和中国画研究院展览馆馆长沈希诚发来的贺信。

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协会顾问陈昊苏因故未能到会，托周雷带来书写的题词：“为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也为建设新的现代文化而大力提倡收藏的爱



好和实践。”周雷、舒乙、陈予一、王德恒、张广明等人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前会后，一些与会者和学生纷纷请来宾合影、签名留念。

会议结束后，大家又饶有兴趣地参观了会员们提供的部分收藏品展览。其中有名人字画、古墨古砚、戏剧脸谱、古钱币、根雕、邮票、火花、烟标、摄影等许多展品，琳琅满目，丰富多彩，其中有的藏品具有相当高的文物价值。最后，来宾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房山旅游胜地石花洞。

燕化公司电视台、《燕山油化报》、《北京青年报》、《百花商品信息报》先后报道了燕山收藏欣赏联谊会成立的消息。

协会成立后的第3天晚上，协会又召开了第一次会员工作会议。总结经验，广开思路，号召要积极参与燕化公司将举办的首届艺术节，布置下一步要开展的各项活动。

1988年3月5日，应沈希诚馆长的邀请，协会组织部分会员到中国画研究院参加“中国当代画展”开幕式，见到了方毅、李可染、叶浅予、何海霞、刘勃舒等大师级的画家，会员们与画家及书画收藏爱好者进行交流，畅谈感想，大开眼界，受益非浅。并向该展览赠送了一幅贺诗。

1988年5月7日，我代表燕山收藏协会参加了由叶浅予发起、中国画研究院举办的首届“在京部分画家收藏家珍藏历代绘画展”，我将收藏的20余件清代扇面绘画作品送展，受到有关专家和参观者的好评。

1988年7月30日出版的《文艺报》，用半版的篇幅并配发照片，介绍燕山收藏协会和化工一厂联合邀请在中国画研究院进修的毕业生，到燕化公司厂区、河北易县化工一厂疗养院参观、写生创作，并与厂书画收藏爱好者进行交流联谊活动的报道。

除此之外，在燕山收藏欣赏联谊会成立一周年之际，协会还印制了一枚由我设计、史树青题字的纪念封，并于当天晚上举办了周年纪念会和纪念封发放仪式。在成立两周年时，印制了一枚由中国文联副主席尹瘦石题字、我和赵思敬撰文的纪念封。

1990年10月6日，河北省电视台《中国民间收藏大观》系列片摄制组编导焦树志、著名节目主持人黄玲一行4人，来到燕化公司，对燕山地区的民间收藏活动进行了解和采访，燕化公司副经理赵俊山、收藏协会负责人赵思敬和我热情接待了他们。双方就我国民间收藏协会及代表人物、藏品层次、发展动态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我们还向摄制组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希望。

我们与外地的收藏爱好者主要是用报刊进行交流联系，沟通信息。由于当时一些民间收藏刊物大部分是油印的，水平和质量不是很高。我们协会先后出版了4期铅印会刊《收藏春秋》，图文并茂，这在民间收藏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上海收藏欣赏联谊会会长吴少华评价说“报纸象正规的出版物”。第1期《收藏春秋》，刊头由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会员赵思敬题写，王德恒撰写了《君知藏趣否，但来此中间》的发刊词，发表了张寿江撰写的《五年集扇六十幅》，舒乙撰写的《老舍与折扇》，张广明撰写的《集报杂谈》，叶永定撰写的《墨香》，赵思敬撰写的《我有一枚直百五铢》，马振彪撰写的《一枚外国的银币——墨银》，郝士早撰写的《书签——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唐克强撰写的《清吴山尊的对联》等。第2期《收藏春秋》，刊头由周雷题写。主要刊登收藏协会召开成立大会的情况，周雷所作《开展民间收藏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作贡献》的发言、舒乙作的《在北京燕山收藏欣赏联谊会上的发言》和王德恒作的《谈谈收藏的几件事》及其他人的发言摘要，同时还刊登全国部分收藏组织和个人发来的贺信题词，书画作品，北京著名书法家吴未淳书赠的一副贺联：“搜罗金石卑欧赵，管领风骚辟杜韩”。第3期《收藏春秋》，刊头由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李桦题写，内容刊登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著名集邮家吴凤岗、老舍夫人画家胡絮青、著名书画收藏家陈英的题词，叶永定撰写的《集画赏画，美的享受》，赵思敬撰写的《藏帖读帖习帖》，唐克强撰写的《戴夫人墓志铭拓本》，马未都撰写的《康熙青花盘口长颈瓶》，张寿江撰写的《朱文钧的一副对联》，李润波撰写的《我珍藏一枚丰货钱》，上海施根生提供的《我国民间私人藏馆一览》等。第4期《收藏春秋》，刊头由中国书协副主席王学仲题写。主要刊登了北京东方收藏家协会即将成立的消息，《沈希诚珍藏艺术请柬展览》在燕山文化活动中心举行的消息和介绍藏者的事迹，湖南常光跃撰写的《张伯驹，一位令人敬佩的收藏家》，罗荡平撰写的《我收藏手杖》，史长义撰写的《藏书小记》，张寿江撰写的《八十年代私人收藏大事记》等。

从1987年12月至1991年3月，燕山收藏协会共出版了4期铅印的《收藏春秋》，由于会刊出版周期长，为了弥补这一情况，及时与会员和外界收藏者保持联系，这期间我们在《燕山油化报》上出版了两个“收藏专版”。我还在一、两个月之内，就编辑一期打印的协会《情况简报》，内容是协会动态、会员行踪、对外交流和收藏展览信息等，这种简报一共出了10期。这些刊物在全国民间收藏界引起广泛的影响，一些收藏者纷纷来信索要。1992年，经

华夏收藏家联谊会主办的全国民间收藏刊物评选揭晓,《收藏春秋》被评为“全国十佳民间藏刊”之一。

协会成立以后,北京著名烟标、藏书票收藏家周继烈,火花收藏家吕春穆、李世清,集报者李铁光,著名书画收藏家、残疾旅行家钟文芳等人,纷纷来信要求加入协会。

转眼之间 22 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成立民间协会不容易,坚持下来更难。因为一无固定场地,二没活动经费,干什么事情都是“业余”,“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总之,水无源泉就会干枯。那个在北京西南曾经热闹一时的民间收藏组织——北京燕山收藏欣赏联谊会,现在早已无声无息了。当初的大部分会员,先后已经离开了燕山,有的会员已经去世了。尽管这个收藏协会生存的时间也就短短三年,但它在北京乃至全国收藏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在艰难的民间收藏道路上,它留下了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脚印。当时成立燕山收藏协会的往事,现在有人偶尔还会提起。翻一翻那已经发黄的 4 期《收藏春秋》和 10 期《情况简报》,看一看当时的录象带和照片,使人仿佛从中可以窥见和回忆起当年成立北京第一家民间收藏协会的前前后后。



1987年12月6日,燕山收藏欣赏联谊会成立大会

附：北京燕山收藏欣赏联谊会合影照片说明

前排左起：韩幸、廉涇、张寿江、于滨、舒乙、周雷、叶永定、赵敬国、裴楫木、傅有叶、龚文楨、陈予一、张广明、傅有叶夫人。

第二排左起：杨同华、王德恒、李炎、富丽、刘惠萍、张宏生、许士杰、成晓南、赵思敬、叶舒、张宏钊、杨连顺、服务员、郝士早。

第三排左起：赵凤英、叶东、赵雅洁、王延龄、马德荣、王秀峰、赵金生、周立友、赵宝生、叶垒、马未都、唐克强、张德祥、□□□。

# 房山“宝光”发现记

张广文

到过寺庙的人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些情景：一尊佛像或坐或站立于大殿之上，其身后则装饰成彩色光环。还有的寺庙墙壁上，经常出现佛像坐立于彩色光环之内的画面。由于这种彩色光环常与佛相伴，常被称为“佛光”，并且被渲染上神秘的色彩。

其实，“佛光”现象却是在自然界真实存在的。因为我国四川省的峨眉山上经常出现，又记录较早，被命名为“峨眉宝光”，也叫“佛光”。

—

人们觉得非常奇异的佛光，其实是一种大气的光学现象，笔者曾经从事过气象科学工作，知道只不过是一种基本知识而已。1986年，我曾经八次登上百花山、百草畔进行气象科学和生物学考察，终于有幸在这一地区亲自经历和目睹了一次佛光现象。

那是在6月22日，雨后放晴，下午5时左右，我到达2000多米的峰顶。在山下时仰望山顶云雾缭绕，到达顶峰时犹如置身迷雾之中，不辨南北西东。不久，天空裂开一道云缝，夕阳光芒斜射，顺阳光望去，不禁令我激动不已。在悬崖对面的云雾之中，出现了一个颇为壮观的景象：只见人影站立于七彩光环之内，我举手，我挥臂，光环中人影随之而动。我不禁惊呼，这是我只在云图谱中见过的峨眉宝光，确实难得一见！我赶紧举起照相机抓拍这一奇景。可惜云缝太窄，阳光一瞬即逝，仅维持一分钟左右，抢拍了两个镜头，宝光就消失了。宝光光环的大小与当时的云雾水滴大小有关，据我测量，这次的光环约在4至5度，是在水滴直径较大条件下出现的宝光。

二

发现房山宝光以后，我想了很多，我觉得这和以往的科学发现一样，既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又在事理之中。试想，如果我不是学气象的，怎么知道自然界有宝光？如果不是八次上百花山地区考察，又怎么能巧遇这难得一见的宝光？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为了向气象学界报道北京地区这一发现，我首先查阅了北京地区气象资料，经查阅多种气象资料，发现北京地区尚没有关于出现宝光的史料记载，因而确定可能为北京地区首次发现。其次，要确定这次发现是否就是气象学中的“峨眉宝光”现象，在北京地区有没有这种现象出现的条件？为此，我特别请教了时任国家气象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的殷显曦老师。看了我寄去的材料后，殷显曦在1986年10月27日复信中告诉我：“知你在野外考察工作中发现在房山境内有峨眉宝光现象，只要光学条件具备，这是可能的。峨眉宝光不仅限于出现在峨眉山，只不过是峨眉山上经常具备这种光学条件而已。但是，在北京，由于比较干燥，出现峨眉宝光的情况稀少。”至此，我终于确定了此次发现的科学性。并写成科技文章，于翌年在中国气象学会编辑的《气象知识》杂志1987年第2期上公开发表。

除了描述发现经过和分析成因，在文章末尾，我写道：“宝光在我国北方地区很少出现，在北京地区尚未见资料纪录，可能为首次发现”。又进一步提出：“在以后的野外考察工作中，我观察了百花山地区以及房山境内其他地区（如十渡、上方山），形成宝光的地形条件还有多处，而气象条件也有可能满足。”至于这次发现的实际意义，当时我认为：“随着这次宝光现象的发现，今后将可以不到峨眉山，就在北京地区欣赏这一色彩绚丽的奇异大气光学现象。”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旅游事业兴起，百花山沿线也开发旅游。我觉得房山宝光这一稀有资源可以纳入旅游开发范畴，遂向有关乡政府、有关人员推荐这一发现，并希望以“房山宝光”注册品牌，成为房山区旅游一个特色品种。

# 房山商场排演的话剧《约会》

李瑞祥

1979年4月19日晚，在房山影院举行了房山县业余职工文艺会演。来自全县工厂、商店等多家企业的职工，纷纷表演了各自排练的节目，仅房山百货商场一个单位就演出了大头娃娃拔萝卜、洗衣舞和独幕话剧《约会》三个节目。作为整场会演最后登台的压轴节目，《约会》演出时，现场观众反响热烈，演出受到一致好评。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稳步启动，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也在逐步深入。当时家在城里又喜欢文艺的商场职工崔淑凤，得知艺术院校学生创作了一个小话剧《约会》，正在内部观摩演出，剧本已在相关杂志发表。她把消息告诉了商场美工兼医务室“赤脚医生”张庆文，正巧县工会通知各单位准备节目，要举办职工文艺会演，商场领导采纳了张庆文的建议，决定排演这个小话剧。

张庆文自任导演，美工组纪炳国负责召集排练。由于当时商品供应全靠国营商业，因此职工工作非常繁忙。一个售货组如果抽走几个人，那么中午的换班吃饭和全组人每月的轮休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办公室资料员兼团支部书记李怡春就承担起协调离岗排练职工的抽调工作。

《约会》的基本剧情是：

老工人（针织组于胜利饰）为本单位的青年知识分子（食堂刘士勇饰）介绍女朋友（针织组张春玲饰），约好到公园里藤萝架旁的长椅处见面。

另一位文静的姑娘（烟酒组刘庆娥饰），由嫂子（库房崔淑凤饰）介绍一个男朋友（纪炳国饰），也约到这里来见面。两对男女青年在同一时间地点约会，闹出了误会与笑话。

刘士勇饰演的青年知识分子先到，他戴着眼镜，着装正统，坐在长椅上专心致志地看书。其间吐痰时，还舍不得放下手里的书，以致吐痰后忘记放下痰盂盖，回到长椅处左手捧书接着看，右手提着痰盂盖竟无知觉。

纪炳国饰演的男青年打扮入时，上身黑毛衣，下身穿喇叭口裤，脚上一双

尖头皮鞋，斜背一个“马桶包”，找到长椅处也等待约会。

与刘士勇同坐在一条长椅上的纪炳国，从包里掏出一个砖头式收录机，高声放起音乐来。刘嫌纪放的声音太吵，委婉地说超过多少分贝，会对人体健康有害。纪不懂什么分贝，也不管公园里安静的环境和旁边看书的人，依然高音播放音乐。

这时与纪约会的刘庆娥由嫂子陪着来了。见到文静漂亮的刘庆娥，纪十分高兴，关掉音乐，把收录机放入马桶包，又从包里掏出一大块巧克力递给刘。在两人的交谈中，刘问纪：“你喜欢看书吗？”

纪忙答喜欢。

刘又问：“你最喜欢看谁的书呢？”

纪答：“鲁迅的。”

刘问：“你知道鲁迅是哪里人吗？”

纪答：“知道！鲁迅好像是‘周树’那个地方的人。”

旁边的刘士勇悄悄提醒纪，周树人是鲁迅的原名。

刘庆娥沉吟不语。

这时张春玲饰演的女青年上场，她一身白色套装，挎着白皮包，头发上系着一条白色花手帕，领口处露出里面的红色毛衣。她还没来得及与老工人介绍的知识分子说上几句话，就被纪炳国认出并纠缠起来。原来，纪和张以前处过一段男女朋友，张用过纪不少钱，然后张就消失不见了。今天纪见到张，气不打一处来，吵嚷着非要张偿还他的钱，两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刘士勇和刘庆娥，以及双方的介绍人被晾在了一边。



话剧《约会》剧照

最后的结局是原来介绍的没成，文静的姑娘却喜欢上了看书的知识分子。

这个小话剧在当时有两个突破，一是倡导重视知识和人才，二是提倡正常的男女交往恋爱。因为文革中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报刊上总在批判“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几乎与坏人为伍；而青年男女恋爱在当时常遭单位领导大会小会的批评讽刺，国家提倡晚婚晚育，虽然婚姻法规定十八岁可以结婚，但各单位实际控制结婚申请年龄多在二十四、五岁以后，文革期间的文艺作品包括样板戏中，恋爱题材成为禁区，不能表现。



剧中虽然刘士勇与刘庆娥饰演的角色互相爱慕，但由于害羞和当时的社会风气，两人同坐在长椅上却十分拘谨，不敢过于靠近。这一点表演得很真实。

对于知识分子的塑造，剧中明显受到当时宣传数学家陈景润的影响，偏重于书呆子气、木讷、呆板。这一点表演得略有些过。

至于对人物服饰方面的观念和表现，显然有时代的局限性，还停留在批评排斥“奇装异服”，把追求美和不学无术、不求上进等同起来。

这个小话剧里最出彩的是纪炳国演的“小混混”型的男青年，和张春玲演的只追求形象美，不注重心灵美，泼辣和有点玩世不恭的女青年。

为了演出成功，张庆文带领演出人员晚上去城里某剧场观摩了一次内部演出。为了使刘士勇的行为举止更具知识分子的书生气，又让纪炳国陪同刘士勇去房山人民商场，找一个有些学究气的职工聊天，暗中观察。根据房山影院的设备和商场能提供的条件，张庆文对剧本作了小的删改，尤其是布景道具方面，作了一些简化和修改，充分利用商业美术的展示道具，巧妙地把公园的特征表现出来，为演出烘托了气氛，起到以少胜多的作用。纪炳国掏给刘庆娥的大块巧克力，原来采用真的商品，排练时感到剧场空间大，舞台效果不太显眼，张庆文和纪炳国就用聚苯板绘制了一块超大型的巧克力道具代替，实际演出时观众为此发出了会心的笑声。演出中需要用“雪绒花”的配乐，当时音像制品店里买不到。张春玲自告奋勇，带上老式大录音机的大圆盘空白磁带，只身赶到中央电视台大门口，指名求见某导演，请求支援基层单位的群众文艺活动。没想到，那位导演真见了张春玲，虽然流露出一点不屑的表情，但还是给录好了音乐。

在房山影院演出了这个小话剧后，商场领导又安排在食堂大饭厅里为全体职工表演了一次。

目前，张庆文已去世。纪炳国、于胜利一直在房山商业系统工作直至退休。张春玲演出后不久调燕化工作，在燕化历年举办的职工文艺活动中一直是主力并多次获奖。崔淑凤、刘庆娥后来调北京城里工作。刘士勇本是从部队退伍后在商场干临时工，后回家乡养鸡成为北京市和房山县两级劳模，他一直没有放弃对书法和文艺的爱好，现在琉璃河镇书画协会任秘书长，并领导着一个业余文艺演出团体。

# 城关零售商店的美化宣传工作

李瑞祥

1965年，房山县商业局和副食品管理处合并，改为县贸易公司。房山城关零售商店随之组建。商店办公地点在南大街路东，新华书店北侧院内，下属门店包括房山城内的工业品、百货、五金、副食、肉食、蔬菜、水果、国药、劳保、信托等门市部，以及城东后建的机关副食供应站、城外东南的煤矿机械厂门市部，和远在大石河的桥梁厂门市部。

由于商店地处县城中心，不但对服务态度抓得很紧，商店的店容店貌卫生工作也受到重视。计划经济时代格外突出政治宣传，尤其1965年冬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商店写画人才的发现与此紧密相连。

已经三十岁出头的张庆文（1935—2009），早在1958年房山、良乡两县合并，召开周口店区人民代表大会时，就被从药店里借出，与文化馆的美工李荣光、城关小学的美术教师王维俊一起，为大会写画“丰产榜”和标语口号等。

张兆顺（1944—2007），1964年在磁家务东矿商店参加工作，城关零售商店成立时被调到大角（县城中心十字街俗称“大角”）副食门市部当售货员。

蔡泽玲（1946—1975），1965年在城关零售商店参加工作，后任大角工业品门市部采购员。

1966年“文革”初期，从京城向全国兴起“红海洋”，即把大街两侧所有外露墙面抹上白灰或水泥，涂上红漆，然后写上黄色或白色的领袖语录、革命口号等。张庆文、张兆顺、蔡泽玲都被抽出来写字，张兆顺回忆当时除了搭脚手架爬上去写外，有时还得从商店的墙上垂下绳索，拴住身子，人吊在半空中涂漆写字。文革中县里召开大会布置会场，需要写刻会标和标语口号，这几人也常被抽出来，和文化馆的段汝连、马福、李荣光等一起干活。这种实践的锻炼，促进了他们写画能力水平的提高。还有一人也经常参加商店和县里的写画布置会场工作，即当时已25岁的刘昆元。他打格计算等很有耐心，常从百货门市部里抽出来为写画打下手协助工作，后来他也掌握了写美术字的基本功。

随着文革的发展，又兴起各单位争画领袖像的高潮。大角的商店地处县城中心，紧邻县委县政府，突出政治责无旁贷。但画领袖像是件严肃的事，只有热情不行，画得不像不但对领袖不恭，还会惹来麻烦。所以当时商店就请了房山中学教美术的翟老师，画了两幅各两米多高的毛主席像，分别悬挂在西南角百货门市部和西北角副食门市部大门正上方的墙垛上。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城关零售商店的领导对美化宣传工作有了一定的经验和认识，作了更细致的安排：大角东南角工业品门市部（经营针棉织品、服装、布匹等）的美化布置，由该店采购员蔡泽玲负责；西南角百货门市部（经营大小百货、鞋帽、钟表等），由药店张庆文负责；西北角副食门市部由该店张兆顺负责（东北角当时是供销社系统的生产资料门市部，另文再记）。当然上述的安排不仅有分工，需要的时候也会合作，而且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美化布置只是兼职。

当时商店的橱窗很不规范，每个窗户仅有不到三平米大，临街的外面玻璃中间还横置一条近十厘米宽的窗棂；里面没有设置橱窗的后背板，只是竖立三扇双开一固定的九小块透明玻璃后窗；橱窗的进深更小，仅是墙体的厚度 30 多厘米。

就是在这样不利于美化布置出效果的情况下，张兆顺埋头苦干，设计制作了一个宣传“农业学大寨”的梯田沙盘模型，梯田的水渠里竟然还能流动活水！旁边画了一个穿红衣的挑担姑娘。大角副食门市部的另一个橱窗，是张庆文设计制作的“养猪积肥好”。张庆文用紫色的干海带，捆扎成一头活灵活现的猪，用广告颜料的瓶盖做猪的眼睛，既宣传了养猪积肥，又展示了副食店经营的商品。最为搞笑和幽默的是，张庆文还用海带做了一坨猪屎，放在猪屁股下面。

张庆文帮助大角副食门市部搞橱窗，百货门市部却请了“外援”：原来百货部女职工库殿茹的爱人是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毕业的刘仲全，最近刚从河北固安调入房山文化馆。刘画了一幅毛主席《为女民兵题照》诗意画《不爱红装爱武装》，挂在橱窗里。虽然是临摹名家之作，但形神俱佳，水墨酣畅，确实不失专业水准，在当时的房山画写意国画能达此水平的，真的是绝无仅有。

工业品门市部的橱窗没搞几次装饰，但蔡泽玲却为北大街路东服务商店下属的理发馆，画了一幅约三平米大的梅花，是毛主席诗意画《咏梅》，题为“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1972 年张兆顺被调到城关南斜街路口旁的南副食门市部。不久店内所有的货架子上竖起了广告牌，画的北京糕点、北京花茶、四川榨菜、云南大头菜

等，不一而足。抛开当年强调突出政治的时代背景不谈，张兆顺为南副食门市部画的这十多块广告牌，可以说回归了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美术。

1974年国庆前夕，房山百货商场开业，张庆文调去当美工组长。1975年春节，蔡泽玲在家乡河北公社房山煤矿西区因意外事故身亡。同年张兆顺调任大石河桥梁厂门市部负责人。而刘昆元所在蔬菜门市部也在这一年脱离零售商店，划归蔬菜经理部。短短的一年，这几个人竟四散分离，使城关零售商店的美化工作受到影响。1975年冬至1976年春，商店领导只好外请周口店公社大韩继村能画画的木工项珩帮忙美化橱窗。项珩画的多是色彩极为鲜艳的花花草草，加上美术字，也得到商店领导的欣赏。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县贸易公司更名为商业局。1974年百货商场开业后，商业局即着手逐步拆迁城关零售商店，筹建房山人民商场。1978年3月，副食、肉食、水果等门市部，包括商品和人员，从城关零售商店剥离，另行组建城关副食商店等。1978年7月1日，房山人民商场开业，原城关零售商店撤销，所属门市部人员并入人民商场。

# 忆《光辉的十年》

宋 湘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在举国欢庆的时刻，我不禁忆起 1959 年“十年大庆”的一段往事。

1957 年 5 月，我从县人民委员会调到县人民法院任书记员，与审判员搭档，多数时间下乡巡回办理刑民事案件。

1958 年 3 月，原河北省房山县与良乡县合并改为北京市周口店区，区址设在房山城内。4 月 1 日，两县正式合并、挂牌、启印。

法院内部人事调整时，我被调到办公室做文秘、收发、档案等行政工作。不久，我发现法院的档案管理毫无章法。诉讼档案然按年存放，但无检索工具，需要查阅时只能逐一翻找。文书档案尤其混乱，一年一捆，胡乱堆放在库房里。

我怀着好奇心初步翻阅，发现有些 1945 年至 1948 年房山县城解放前的一部分文书档案和诉讼档案，心中不由一震。当年解放区的县政府设在张坊一带，还处于炮火连天、硝烟弥漫之中。司法工作人员背着这些文件到处游击，终于伴随着胜利的枪声把这些珍贵史料带入房山县城，实属难能可贵。革命前辈的忘我精神激励了我，我决心将所有档案进行彻底整理。

请示院长同意后，我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将 1945 年至 1958 年全部诉讼案卷数千册按年编号码放，再按被告人姓氏拼音顺序建立档案簿。这一来，只要提出被告人姓名，立即可以按拼音顺序查到所在某年某号，查找起来快捷方便。

文书档案的整理难度较大。我把数千份上万页文件全部摊放在长条桌上，先按年度分开。每年度再按上级来文、县委来文、县政府来文、其他部门来文分类；本院自己形成的文件按简报、计划、总结、报告等项进行分类。然后用区档案馆统一制发的卷宗封面分别装订，编好页码，填好目录，再按年度编成索引。

这项工作大约耗时一年，至 1959 年中基本完成。

1959 年初，中央发出指示，把“写十年光辉成就”作为迎接国庆十周年

的一个重要内容。法院系统也从上到下发出这一号召。当时，法院立即都行动起来，编写案例故事和办案经验。在整理档案的过程中，我对法院工作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由此产生了写一个法院简史的设计。经请示院长同意后，从当年5月初开始动笔，用了三个多月时间，一份十几万字的初稿写成，打印腊纸一百多张，终于在国庆节前装订成册，上报市高级法院和区委、区政府。



1959年9月30日,周口店区人民法院  
全体干警合影

因为是配合“十年大庆”，所以此稿定名为《光辉的十年——北京市周口店区人民法院简史（初稿）》，其内容以建院以后的十年为主，其中也包括建国十年以来的法院工作，还涉及到从1945年到房山城解放前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房山城解放后至1949年建立法院以前县政府下设司法科的工作。将各个时期、各个政治运动中法院的刑民事审判活动做了平实的记述。数十页刑民事案件逐年收结案统计表和刑事被告人处理情况的逐年统计表，作为全文的附录。

由于史实浩繁，头绪庞杂，作为法院的一个新兵，我自知难以驾驭，所以只求将收集的资料暂作堆砌，故特别注明只是“初稿”，寄望于日后再加雕琢，或后来人谈写历史时有所参酌。

“文革”开始后，军管介入法院，有人认为这些属于封资修的东西，全部文书档案被装进麻袋送到燕京造纸厂化为纸浆。良好的愿望化为泡影，房山法院这一大段历史成了空白！

1959年，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周口店区法院在贯彻“办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取得突出成绩，被评为北京市法院系统先进单位，我也被评为北京市法院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区档案先进工作者。

回忆“十年大庆”，捡出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那是“十年大庆”前夕的1959年9月30日，周口店区法院全体干警22人在法院门前的珍贵留影。每当看到这张照片，都会引起我忆起当年的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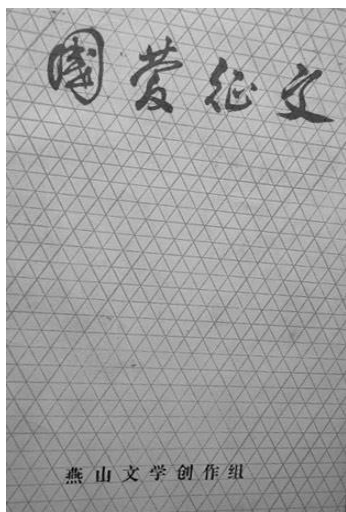
# 一本国庆征文

张广明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25 年前的 1984 年 10 月 1 日，“燕山文学创作协会”为了庆祝共和国 35 周岁生日，曾经举办过一次广泛的国庆征文活动。目的是号召全区人民和文学作者，用自己的亲身体会，以诗歌、散文、小说、特写等文艺形式，歌颂建国 35 年来的辉煌业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果。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团结奋斗，振兴中华。

这次征文活动，也正逢燕山石化公司正式投产 15 年，因此，得到燕化公司领导和燕山区领导的高度重视以及广大作者的支持。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同志，那时在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总公司担任党委书记。当征文活动小组的工作人员来到她的办公室，请她为这次活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她表示对这次活动非常支持，并谦虚地说：我写不好，但我一定参加，以一名普通燕化职工的身份参加。没过几天，她就将两首诗词交给了编辑部。一首是《浪淘沙·燕山》，另一首是《七绝·夜登燕岭》。以饱满的热情，磅礴的气势道出了石化儿女的满腔激情和豪迈心声：“喜庆盛年，跃马扬鞭，披荆斩棘不知眠，历尽肝胆赢凯旋”。我们都知道，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吴仪同志被称作叱咤风云的“铁娘子”，然而，我们从她发表诗词的字里行间，感到她又是一位刚柔并济、多才多艺的“小女子”（吴仪同志自称为“小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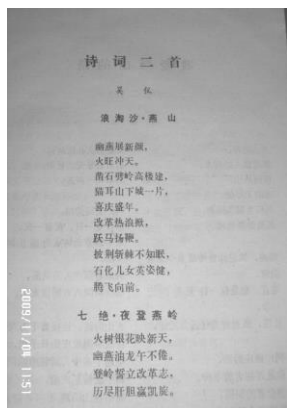


《国庆征文》一书封面

在这次征文活动中，原燕山区区长梁国柱也写了三首诗，寄情路、树、花，赞美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白水寺位于燕山橡树坡山腰上。据说一百多年前，这里风光秀丽，景色宜人，香火颇盛，大约在清末民初时便僧走寺荒了。1984 年被列入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燕山区政府做出决定重修白水兴隆寺，经过绿化、美化，白水寺一带已成风景游览区。

曾担任房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李永忠和现为房山区文联办公室的赵思敬共同写了一篇散文《白水兴隆寺遐想》。现任区政协副主席的王晓芝以一首《祖国颂》表达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原《燕山石化报》总编何绍改的《擂鼓歌》、副主编张士功的《车铃叮叮》、副刊编辑安宗翰的《创造平坦的人》,作家王德恒的《半个世纪的追求》和已故作家王延龄的《共和国三十五岁的青年》等作品,分别以诗歌、小说、报告文学的形式从不同的侧面、多视角地反映共和国35年来,各条战线人们的精神面貌。在这次征文活动中,笔者根据北京市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陈启鸿的先进事迹,写了一首叙事长诗《鸿鹄志》。这次国庆征文活动共征集作品百余篇,有55篇汇集成书。

从那次国庆征文到今年,整整过去25年了。25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弹指一挥间,共和国迎来她60周年华诞。但对那次征文的作者来说,25年,人生却经历了诸多变化。有的调动了,有的退休了,有的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努力着,有的在文学道路上不懈追求着。这本《国庆征文》,已经成为无愧于那个时代的见证。1987年,燕山区和房山县撤销,建房山区。这本《国庆征文》,又成为不可多得的一本文史资料。



吴仪同志诗作



# 陪同林汉雄部长考察房山

孙奎春

旅游业归口国家建设部管辖，原部长林汉雄同志完全可以通过房山有关部门陪同参观考察。然而，由于他在任国家建材局长期间，经常深入窦店砖瓦厂检查指导工作，并且与笔者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因此，特约本人陪同去云居寺、十渡等景点参观考察。

1989年9月17日（星期日）上午8点多钟，林部长与谭庆琏副部长及其家人来到窦店砖瓦厂，稍许休息，即由孙奎春、杨福成、田义民等陪同前往云居寺。当我们抵达“北京敦煌”——云居寺之后，受到原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田福月主任的热情接待。首先请大家在“窦店砖瓦厂专用签名册”上签名留念，之后，请资深讲解员王艳华小姐简要介绍了云居寺的概况。云居寺始建于1300多年前的隋末唐初，至今完好的保存着数量众多的唐辽古塔、佛祖舍利及石经、纸经、木板经，号称“三绝”。特别是古塔以历史悠久，数量众多，造型独特，雕刻精美而名冠京师。当时的收藏、展出条件都十分简陋，大部分经版均存放并简单陈列在几栋平房内。当讲解员小王饱含深情地说：“云居寺珍藏的石经，始刻于隋大业年间僧人静琬等为维护正法刻经于石。先后经隋、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镌刻佛经1122部3527卷14278块，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壮举，可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相媲美。”王小姐非常风趣地说：“前印度总理尼赫鲁对周恩来总理说：你们国家不信佛，我可以用等量的黄金换你们的石经。周总理说：‘黄金有价，石经无价’。后来遵照总理的指示，拓印了几份佛经馈赠尼赫鲁。”这时大家不约而同的报以掌声，林汉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北京敦煌，当之无愧！要采取有效措施妥善珍藏这些绝无仅有的无价之宝。”

看过石经、古塔、佛祖舍利之后，汉雄同志兴致勃勃，顾不上休息，提出要去寺东面2公里，海拔450米的石经山看看。当时没有索道，只能徒步而行。林部长虽年近“花甲”，却一直走在前头。当大家爬到山顶“雷音洞”之后，看到“千佛柱”上的佛像和四壁镶嵌的经版因“文革扫四旧”被损伤的情

景时，汉雄同志非常痛心地说：“损伤已不可补救，今后要倍加珍惜，不能再发生任何闪失。”

午餐安排在云居寺内部食堂，田主任特意准备了具有佛教风味的农家饭，有蒸白薯、老倭瓜、炸香椿鱼、烧红鲢鱼和自制豆腐等，清淡可口，大家吃得都很满意。林汉雄同志饶有兴趣地说：“今天来云居寺收获不小，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结交了新朋友，锻炼身体，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临行前，大家在辽塔前合影留念。

之后，大家乘车前往十渡风景区。当时的公路条件很差，路面较窄，高低起伏，全程都是“漫水桥”。然而，进入六渡以后，呈现给人们的却是一个凉爽的世界——旖旎的山水风光，清新的空气，宜人的自然环境，使人心旷神怡，旅途颠簸的疲倦一扫而光。沿着常流不息的拒马河蜿蜒前行，不一会便到了十渡中心区。这里真是名副其实的“北方小桂林”。在拒马河两岸是高耸陡峭的岩溶山，如同斧劈刀切一般，奇峰林立，怪石嶙峋，气势雄伟。满山遍野苍翠欲滴，姹紫嫣红，令人迷醉。这一带河宽水清，游人乘竹筏、小船垂钓、小憩。山光水色，交相辉映，柿子、核桃、花椒挂满枝头，点缀其间，构成一幅绝妙的山水画。

林部长看了之后非常兴奋，他说：“房山的旅游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这在北方来说屈指可数。要全面规划，重点开发，使之成龙配套，真正办成房山的‘名片’产业。”事后，我将汉雄同志的意见转告了县有关负责同志。

# 蜀派古琴名家俞伯孙

毓 琰

2006年春，蜀派古琴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俞伯孙先生一家受友人约请来到房山良乡客居，注定了古琴与房山的缘分。

俞伯孙，1922年出生于成都。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祖父俞丹溪浙江绍兴人。曾于晚清时在北京做官，后外调四川成都任太守。后复调北京为官，妻儿尽留蜀中。父亲俞子丹则是精通琴棋书画、文史哲经的全才，曾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执教于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华西坝）。这是一所由美、英、加拿大等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办的大学，俞子丹为大学中的外籍教授讲授汉语及东方文化知识，其高超的教学水平令外籍教授推崇备至。俞子丹先生的黑白市井民俗绘画作品极具古朴、真实之美，现已成为成都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历史资料被永久珍藏。

俞伯孙受父母熏陶教诲，承袭家学。自幼学习书法、绘画、喜戏剧、古琴，他多才多艺，在这样独特优越的家庭环境中逐渐成长、成熟。他14岁始学琴，师从人称“琴妖”的蜀派古琴家陈蕴儒和龙琴舫，得其真传，擅弹《佩兰》、《流水》、《墨子悲丝》等曲。到中年时，俞伯孙先生又遍访海内外古琴家查阜西、吴景略、溥雪斋、桂百铸等，以众家之长来滋养和丰富自己艺术生命。1949年，俞伯孙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部队文工团进驻西藏，又于1953年奉调西南军区文工团，艰苦火热的军旅生活对他的人生无疑是一种深刻的磨砺。后来俞先生转业至四川省川剧院，从事演奏和川剧唱腔设计。后又转调至成都戏剧学校，从此开始了培养戏剧艺术、古琴艺术新人的教育生涯辛勤耕耘，桃李满天下。在俞伯孙七十余年的抚琴生涯中，艰苦创办了“古风国乐社”、“蜀新琴社”、“成都东坡诗琴社”等音乐社团。他为数十首著名的古诗词谱曲，是现代琴歌创作和创新的领军人物，所谱的琴歌不仅继承了古典音乐的神髓，并对之加以创新，极富抒情性。俞伯孙不仅精通古琴艺术，还对四川扬琴兴趣颇浓，并大胆将传统扬琴座唱曲目《楚道还姬》、《梁红玉》、《鸳鸯弦》等改编发展为“琴剧”，将古琴演奏、琴歌弹唱的形式融入剧情，表现剧中人物的离合

悲欢。俞伯孙多才多艺，熟稔二胡，三弦、笛子，洞箫、扬琴等民族乐器，音乐基础深厚，造诣高深。

俞伯孙常说：“弹琴计万变，妙手难成春”，七十余年来，始终操缦不绝，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演奏风格——峻急奔放，铿锵跌宕，清微淡远中见深沉，刚柔相济中出雄奇。他的演奏古朴有力，气魄雄大，每首琴曲的意境、情致、韵味他都把握的虚实有度，恰如其分，把潇洒自如的川派琴风表现的淋漓尽致，令琴曲产生出“大音希声”的旷达，释放出天地的和谐之音。他高超的演奏技巧将文字符号“减字谱”变成了透韵的“音意”，再现了中国古琴艺术的传统精神。

漫长的七十余年抚琴岁月，俞伯孙始终不断为古琴打谱、整理和研究古代古琴琴谱。那是一种用文字形式记录琴曲指法、音高、音位的专用谱，又称“减字谱”，因年代久远，很难为现代人所理解和接受。俞伯孙经过反复地钻研、视谱、弹奏、对古曲《秋鸿》、《长清》、《离骚》等进行记录、整理和完善，让遥远时空的乐句、音韵重新成为意韵传神的琴曲，让古时琴曲的本真，通过打谱和演奏再次滋润中华民族渴求真、善、美的心灵。俞伯孙的打谱，记录并表现着中国古琴蜀派艺术的发展。

古琴要发展，首先是传承。几十年来，俞伯孙十分重视培养古琴人才，传承的学生当有数十人。为专业音乐学院输送合格人才，他们分别考入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就读，成长为当代青年古琴演奏家，理论家。俞伯孙与夫人黄明康坚持蜀派古琴挖掘、整理、传播、交流、传承、研究的宗旨。在各级政府的关怀下成立了“成都蜀派古琴研究所”，吸纳了十位古琴家成为研究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们出色地领导了成都东坡诗琴社、蜀派古琴研究所，成功组织了许多重大古琴演出和雅集。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特大地震，两位琴家又带领儿子俞明辰积极参与在北京举办的《有爱就有希望》、《用爱搭建温暖的家》大型赈灾义演，与数十位明星、歌唱家等一起为家乡抗震救灾尽一点绵薄之力。

鉴于俞伯孙在古琴方面的成就，香港雨果公司、中国唱片总公司录制出版了CD、DVD光盘，抢救、记录了俞伯孙的“蜀中琴韵”。2006年，俞伯孙荣获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颁发的“中国民乐终身贡献奖”他常说：“我是古琴界唯一得到这一殊荣的人，我还要努力作曲，把李白的游仙诗《梦游天姥吟留别》创作好，把蜀派古琴在房山传承、播种、开花、结果。我一定做到贡献终身。”

从古至今，古琴都是掌握在极少数音乐家的手中。现阶段古琴艺术仍然显

得有些落寞，尽管中国古琴文化代表着高雅艺术，可仍然无法大量普及，但也绝不可能消亡。因为古琴文化精髓的挖掘、整理、研究及传承，还需要古琴各个流派的传承人来传帮带。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确定了古琴成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定了数十位中国当今著名古琴家为各自流派的传承人，俞伯孙作为蜀派艺术传承人被确定。

2003 年 11 月 7 日，中国古琴艺术与世界其它国家的 27 个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这再次表明中国古琴艺术深具民族精神、审美情趣和传统艺术特征的实用价值。

# 云居寺与杨乃武案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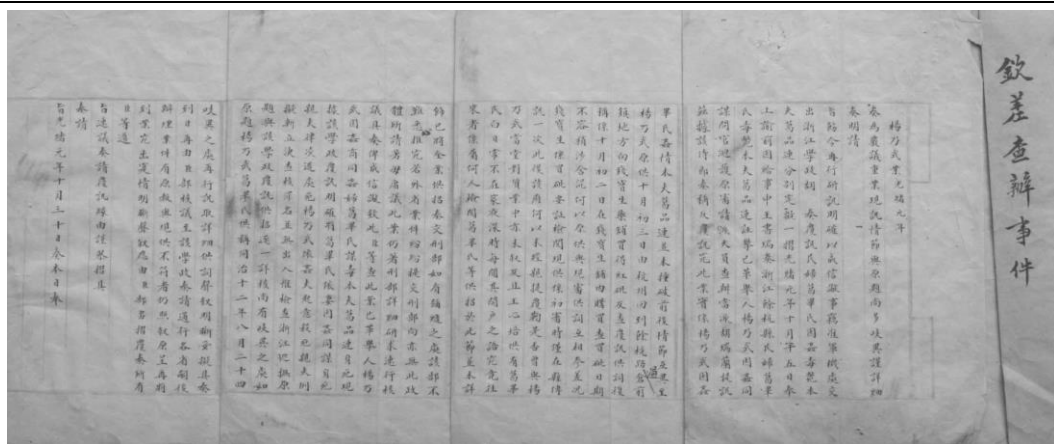
苏宝敦

千年古刹云居寺，为中国北方佛教圣地，创建于隋唐时期。寺东北方向隔着杖引泉流水为小西天石经山，山上有藏经洞 9 座。9 洞之中分别保存着隋唐经版 4000 余石，连同寺院南塔基座前藏经穴中出土的辽、金、元、明经版共计 14278 石，其工程之浩大艰巨为世界所罕有，被公认为石刻佛经世界之最。抗日战争时期寺院遭到一定毁坏，文革中，极“左”思潮泛滥，横扫一切。周恩来总理惟恐这座千年古刹遗址再有什么闪失，曾亲临云居寺视察，并责成当地驻军派专人保护。所以，这里的珍贵古建筑和石雕艺术品安然无恙，后来北京城里破“四旧”时的一些查抄物品，也被文物部门运到了云居寺保存。于是云居寺与清“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就有了瓜葛。

1993 年末，云居寺工作人员在藏经阁整理经卷书籍发现了《钦差查办事件》文稿，副题为“杨乃武案光绪元年”。仔细研读，此文稿竟是关于中国大清朝“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奏折。此案多少年来，在海内外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广为传播，几乎家喻户晓，老少皆知。但那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文艺作品，也可以说是“二手货”，真正原始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案情经过，钦差查办此案时向光绪皇帝书写的这本奏折才是第一手资料。

## 案卷真相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情扑朔迷离，惊动朝野。我们从发现的《钦差查办事件》奏折，就可窥见其中端倪。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初十日，毕秀姑（即小白菜）的丈夫葛品连病死。浙江省余杭县令刘锡彤据传言认为与新科举人杨乃武有关，逮捕了毕，严刑拷打，定成谋害亲夫，并诬为受杨乃武指使。杨先被革除举人，后被刑讯逼供，但他不承认。刘锡彤认为案情已明，上报杭州府。杭州府提审时，复施严刑，杨受刑不过，屈打成招。依大清法律，判处杨乃武斩立决，毕秀姑凌迟处死。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奏折

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决心为弟鸣冤，告到省里。浙江巡抚杨昌浚派人会审，而此人又被刘锡彤贿赂收买。于是巡抚杨昌浚依照杭州府的判决上报，只等刑部回文一到，杨乃武就要被处斩。杨的姐姐杨菊贞不甘心，两次进京告御状，在一些浙江籍官员的帮助下，这件事终于告到了两宫太后跟前。西太后谕：让刑部下令，杨昌浚会同有关部门亲自审问，务得实情。杨昌浚接到太后谕旨，委派湖州知府许瑶光复审，杨和毕在复审时都翻了供。审了两个多月，未能定案，给事中王书瑞上书建议朝廷另派大员赴浙审理此案，于是礼部侍郎、浙江学政（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胡瑞兰便接受了此案。据杨乃武的女儿杨浚在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回忆文章说：这位胡学政在同一些官员提审时，日夜熬审，用遍了各种刑具，二人受刑不过，乃又诬服。胡瑞兰复奏朝廷曰：“反复讯究，此案实系杨乃武因奸起意，令葛毕氏（按：即毕秀姑）将伊夫葛品连毒死，供词俞同，案无遁饰……原拟罪名并无出入。”事情至此，杨乃武绝望了，他在狱中自挽一联：“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刑台，乃武归天。”

就在刑部奉旨审议胡瑞兰上报的案卷时，杭州一些举人、生员及杨的好友30余人联名向刑部和都察院控告，揭露官府严刑逼供，草菅人命，欺罔朝廷。京中御使边宝泉也奏请朝廷将此案提交刑部详细研讯。

据这篇发现的奏折披露，边宝泉的建议被驳回了。奏折中说：“若外省案件纷纷交刑部，向亦无此政体。”但朝廷对此案显然给予了一定重视：先是严饬胡瑞兰“秉公研讯，不得回护同官，含混结案”，继而反复指示刑部“悉心推究”、“详细研求”、“俾成信谳”（即定案准确无误）。这份奏折就是当时刑部（按：当时的刑部上书是桑春荣）向朝廷汇报审阅胡瑞兰上报案卷的结果。

奏折指出：将浙江巡抚杨昌浚原先上报的案情与胡瑞兰复审的案卷“逐一

详核，尚多歧异之处”。如，关于所谓葛品连发现杨与毕奸情的细节前后矛盾，先说杨与毕奸情被葛品连撞破，后来的供词中又无此事了；所谓杨在钱宝生药铺买毒药的时间前后不一致；而且钱宝生系重要人证，只在县里传讯了一次，为何杭州府没有亲自审问？是否曾与杨当面对质，也未提及（按：钱是开药铺的，在刘锡彤的诱骗之下做过伪证，谎称曾售给杨毒药。杨曾多次请求与钱对质，均遭拒绝。此人在胡瑞兰复审之前已死于狱中。据同监犯人称，系被害而死。）再如，邻居王心培证言中说，葛毕氏经常白天不在家，夜间常听其开门，“究竟往来者系属何人”，葛毕氏没有交待，复审时也未详讯；还有一点，杨乃武告县令刘锡彤之子刘子瀚（按：此人曾强奸过毕秀姑，因怕事泄，积极参与制造杨、毕冤案），可是此人却未出庭，只派人传过一次，回来说刘海升（按：系刘锡彤另一个儿子）已经回原籍了。刘海升与刘子瀚是否是一个人？也未交待。奏折说：“以上各节均系案内紧要关键”，而胡学政又没有在复审中“逐层剖析”，未详细说明“供词因何不符”，所以“臣部（刑部）未便率复”，请求朝廷降旨，命“该学政提及犯证，将复审与原审情节因何歧异之处，再行讯取详细供词”，弄清楚之后，具奏朝廷，再由刑部核议。

据有关资料证实，朝廷果然饬令胡学政再行认真审问，并不得再用严刑逼供。胡又审了两次，杨、毕二人再次翻供，胡瑞兰复奏时说：“案情重大，人言纷纷，实非愚臣所敢专断，请特简大臣，另行复审。”在众人的呼吁之下，西太后谕：“将此案交刑部彻底根究，提京审问。”刑部奏谕：即令杭县令刘锡彤将全部犯人，证人押解来京，这才有了后来的真相大白。从另一角度说，才有了多少年以至当今戏剧曲舞台上、电影电视屏幕上那一幕一幕曲折动人的故事——《杨乃武与小白菜》。

### 案卷归宿

《钦差查办案事件》奏折共7页，1175个字，全部用毛笔小楷书写，字迹工整。这是光绪元年（1875）十月三十日由法务大臣沈家本写给光绪皇帝（实际是两宫太后）的关于复议杨乃武案件的奏折，题为《钦差查办案事件》。沈家本在奏折中详细陈述了胡瑞兰、边宝泉等4份奏折的不同之处，认为此案尚需复议。1994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沈厚铎先生投书《北京晚报》，首先说明他是沈家本的四代曾孙，并说明沈家本在光绪年间不是法务大臣，而是刑部左侍郎大理院正卿。据沈厚铎讲：“文革”时扫“四旧”，他怕家藏的先祖沈家



本遗著稿本、抄本、日记等珍贵史料遭劫，遂装了4箱书卷送到北京图书馆，后又被转送到北京市文物局。“文革”结束后他曾找到市文物局，文物局的同志帮他找到了不足四分之一的书卷，其中有沈家本的大部分日记和部分抄本及少量手稿，其他大部分都无从寻觅了。沈厚铎说，《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奏折，为沈家本先生手抄副本，正是先祖遗著文献中的一篇，是很有收藏价值的重要资料。为此，沈厚铎亲自到京郊房山区交谈“奏折”事宜。当时的房山区有关领导约笔者（时为房山区文化文物局主管文物工作的副局长，云居寺当时为文化文物局的下属单位）一起与沈先生商讨此事。最后，一致同意《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奏折归由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云居寺收藏展示。

至今，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奏折手抄本原件，依然很好地收藏在“云居寺纸经展览馆”内。云居寺以石经、木板经、纸经、“三经”之全名扬世界，是国内外文物工作者及广大游人欣赏、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及佛教文化的人间宝库，而杨乃武案卷又为此地增添了一个颇为引人的典故。

# 房山南关杠箱会

王梦麟

杠箱会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杠”是皇杠的简称，“箱”是钱粮箱的简称，“会”是民间花会的简称。原意为地方向三霄娘娘进贡钱粮，敬神祈福的意思。随着岁月的流逝，到清代又为地方向朝廷交纳钱粮，但仍有敬神祈福的本意。

金代时，金陵由东北迁到北京，开始设置万宁县，后改奉先，元代改为房山县。杠箱会在金、元时期已经开始形成，但规模不大，直到明代达到鼎盛时期，规模宏大，场面壮观，达到上百人。

杠箱会最前面是大型铜锣开道。花会旗帜均为三角形，中间大旗一面，为黄旗蓝字，篆书“天地”二字。两边是钱粮科两面旗，均为黄旗红字，隶书“钱粮科”三个字。跟着是八面大旗，是八卦旗，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黄旗黑边，黑色八卦符号。

接着是两个人抬着一根红色大杠，直径 30 厘米。大杠两头上铁箍，中间系黄色绸带，长 5 米。大杠共二根，抬杠人穿明代士兵服装，胸前胸后为黄地红字，上书隶体“钱粮”二字，在大杠上骑着一个 10 岁以下 6 岁以上的男性儿童。

八个杠箱，每个箱子长 1.2 米，宽 0.4 米，高 0.8 米，箱子上有彩色图画，分别是：《三国演义》图画 2 个，《水浒传》图画 2 个，《西游记》图画 2 个，《红楼梦》图画 2 个。每个箱子前面两面旗，后面两面旗，中间十字交叉，中间各竖有一把鸡毛掸子，前后各拴有一个铜铃铛。箱子中间竖有一个席筒，箱子左右钉有云头型的铜环，每个箱子上四面旗帜，八个箱子分别代表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每个箱子两把掸子，两个铜铃铛，两个铜环子，一个席筒。每个箱子上四张封条，黄纸朱笔。封条字是当时皇帝的年号和演出的日期。封条十字交叉贴在箱子两端，加盖户部御封大印。

杠箱用红色麻绳拴连，在十字交叉旗下穿过，杠长 3 米，直径 5 厘米，用新砍的柳木去掉皮后使用。抬杠箱一般由专业脚班(杠夫、轿夫)担任，表演

非常熟练，行走动作敏捷，配合默契，赢得观众大加赞赏。

杠箱会人员安排是：大锣 1 人，天地旗 1 人，钱粮旗 2 人，八卦旗 8 人，抬黄杠 4 人，抬杠箱 16 人，骑皇杠儿童 2 人，共计 34 人。

以上是杠箱会的前半部分。

后部分是“宵利（小偷）”2 人，扮成乞丐形，沿街摊铺随便吃拿，还可以将食品送给观众小孩，显得滑稽可笑，后边跟着花会人员给予付款，后有“傻丫头”2 人，憨厚朴实，与机灵的“宵利”形成鲜明的对比，一边走一边相互戏耍，后边跟着地方（村级小官）2 人，监视“宵利”，维护治安，制止“丫头”过分出丑，还受衙役指派，抓捕坏人和打官司的人。

随后是铜锣开道，4 面旗，4 盏红布灯，4 块虎头牌，上书“回避”、“肃静”、“钦差”、“威武”等字样。4 个衙役手拿黑红大棍。2 个师爷文人服装，手拿羽扇，显示足智多谋。中间是杠箱官，奉王命押解钱粮并代理民辞，着乌纱、蟒袍、玉带、朝靴。轿夫 2 人，杠箱官有时坐在独杆轿上，独杆轿有时可以横竖坐，旁边是杠箱婆，是杠箱官的夫人，杠箱官后面是一把蓝伞，一对执事扇。

旗、灯、伞、扇分别是民间“杠罩坊”的执事。行走中衙役、师爷、杠箱官相互戏耍，杠箱官不失威严，根据举报，可以随便将观众中的任何人抓来打官司，审讯内容无中生有，幽默滑稽可笑。

杠箱会后部分的人员安排是：宵利 2 人，傻丫头 2 人，地方 2 人，师爷 2 人，杠箱官 1 人，杠箱婆 1 人，铜锣 1 人，举旗 4 人，举灯 4 人，举牌 4 人，拿棍 4 人，轿夫 2 人（前后胸为“轿”字），举伞 1 人，举扇 2 人，共 32 人。

有乐队 12 人，堂鼓 1 人，大锣 1 人，小锣 1 人，手擦 1 人，水擦 1 人，锁呐 1 人，云罗 1 人，笙 1 人，管 1 人，笛 1 人，箫 1 人，琵琶 1 人。

杠箱会前后共 66 人，乐队 12 人，候补抬杠箱 32 人，因运动量大，技术性强，20 分钟就得换人，共 3 拨人，再加上服务人员，4 辆大车拉道具、行头 20 人，总计 130 多人，是规模最大的花会。在民间 108 道花会中，炮会开道，杠箱会是走在最前面的花会。

清后，杠箱会有所变动，但仍是三角旗，天地旗改为黄龙旗，钱粮科旗由红字改为黑字。八卦旗和杠箱上的八卦旗改为满八旗的旗帜，分别是正黄、正白、正蓝、正红、镶黄、镶白、镶蓝、镶红。所有人员服装都是清代服装，乌纱、蟒袍、玉带、朝靴改为顶戴、花翎、朝珠、补褂，师爷戴眼镜，虎头牌“钦差”有时是府衙，“威武”有时是正堂，“回避”、“肃静”二牌不变。

清代的房山南关杠箱会曾到涿州北关娘娘庙进香，行至大石桥时，礼炮连

天，旌旗招展，执事具全。有人赶紧通报，涿州地方官慌忙迎接，口称“下官来迟，望大人恕罪”。杠箱官道：“本饶乐府知府奉王命押解钱粮进京，并巡视涿、良、房。”知州百般殷勤，陪同进香后，杠箱官稳坐涿州东街州衙正堂。知州忙献茗茶并备宴席，杠箱官“巡按知府”口出“大清律”，振振有词，对知州严加训斥，知州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吓出一身冷汗，连连叩头谢罪。杠箱官坐州衙片刻后言道：“本府王命在身，不能久留，不必开宴，望你好自为之。”知州毕恭毕敬送“巡按知府”，出城后回衙方才醒悟。回头再找，杠箱官早已卸妆逃跑，在方圆百里传为笑话。

杠箱会人员众多，演出时专请县城脚班抬杠箱，有时请北关人合作演出。

民国年间，杠箱会仍用清代服装，已经没有辫子，但杠箱封条仍写大清乾隆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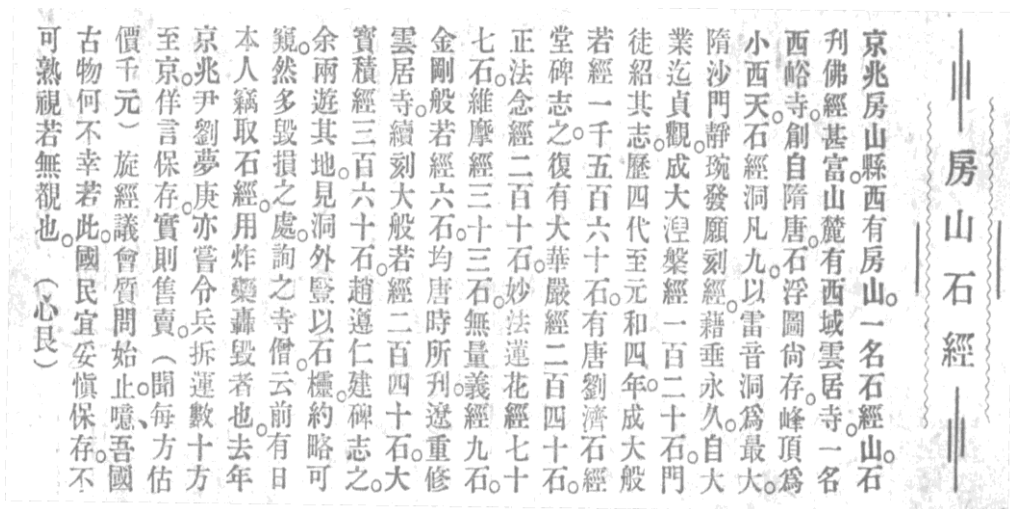
由于历史的变迁，杠箱会的规模越来越小，乐队是吹鼓手担任，是从外村请的。到民国时，只有两面铜锣，没有乐队了，人数也只有三、四十人，八箱两杠没变，旗子只剩前边 11 面，灯、扇均已减掉，牌只有“回避”、“肃静”两块，执事减少很多。师爷、地方、傻丫头也减为 1 人。

南关杠箱会最后一次演出在 1940 年的正月。如今回忆起来，仍令人回味无穷。

# 民国时期的石经破坏及保护

张爱民

近期，云居寺文物管理处文物科，在搜集整理有关云居寺的历史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发生在民国时期的，石经破坏及反破坏事件。线索刊登在民国十三年（1924）4月26日和5月8日出版的《申报》上，一篇文章题为《刘彦等质问拆运房山石经》，另一篇题为“房山石经仍运回原处”。由此，发生在民国时期京兆大地上一件鲜为人知地破坏石经与保护石经事件，再次浮出历史的水面。云居寺文物科依据《申报》上的新闻线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认真地调研和解读。



1925年第5期《图书周刊》所载房山石经拆运事件

事件的发生地是石经山，发生时间是民国十三年（1924）3月，发生背景是北洋政府的腐朽统治，诱因是国内外一些居心叵测之人对房山石经垂涎欲滴的窃取之心。石经山是房山石经刊刻的起源之处，石经山上九个藏经洞中藏有隋唐时期的经板4196块。这些石经的价值，早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同时，也引起了国内外一些心术不正之人贪婪的占有欲望。

时任京兆尹的刘梦庚说，奉北洋政府大总统曹锟谕“该石经关系文化，应

行查阅保存，迅将石经各块，安送来京，以恐转呈等语”。于是，刘梦庚命令房山县知事沈严，将石经山藏经洞中的隋唐经版迅速运送京城保存。

4月1日，沈严召集京兆守备队两路司令张韬协商办理此事。沈严和张韬会同云居寺一个叫论知的僧人，带领一些士兵来到了石经山上。上山后才发现石刻经版封存在八个洞中，且洞口用铸铁和石门封闭，无法打开。后来发现只有雷音洞是敞开的，洞壁上镶嵌着石经板大小146块，这些经版主要是静琬大师早期刊刻的佛经，其中有《华严经》、《妙法莲华经》、《维摩经》、《金刚经》、《弥勒上生经》等十余种，皆为隋唐所刻，年代久远、价值极高，字迹有欧褚笔法、端严秀丽。看到如此精工细凿的石刻佛经，沈严和张韬很是兴奋，于是命令士兵将雷音洞墙壁之上镶嵌的这些石经凿下二十余块，由骆驼将其中完整的十八块驮至西域寺火车站，装上火车运送到了京城。这十八块石经包括：金刚经六块、洗浴终身经二块、千佛贤劫经五块、陀天经三块、八戒斋法经一块。当时毁损的两块石经是无量义经和教戒经。这些经版的材质为青石，厚三公寸有零，边际稍薄的约一公寸半或二公寸不等，每石长十八公寸九分，宽十八公寸一分，版面有横刻也有竖刻，所刻之字笔迹较深，笔法又各不相同。士兵们在凿石经时，将雷音洞内的其它文物破坏的十分严重，洞内的物品被打得七零八落，并被抛弃在洞外。至此，石经山藏经洞的文物古迹遭到了严重地摧残。

4月中旬，众议院的议员刘彦得知此事后，深感此事蹊跷，于是立即联合何弼虞、魏肇文等人，对此事件的细节进行了严密的调查，发现了诸多疑点。一是房山县知事沈严和京兆守备队两路司令张韬，口口声声说是奉大总统曹锟之命运石经进城的，可又没有大总统的明文命令，很可能是“假传圣旨”；二是搬运石经为的是查阅保存，还说要效仿三希堂的保存方法，在北海建一座建筑来珍藏石经。如果真要查阅的话，就应该选派专门人员，到云居寺查阅或拓印就可以了，如果真要保存的话，也应该先建建筑后搬石经，而不是如此的乱拆乱毁；三是因为日本人一直扬言，愿出两千块大洋购买一块石经。



在1921年5月出版的《大房山》(第二辑)中所录的“石经堂下藏经洞”照片中，可略见石经堂窗棂被毁之状

石经山藏经洞中的四千余块石经，可是一笔相当大的财富啊！所以，不排除有人要侵吞国宝换取财富的嫌疑。

于是，议员们心里明白了，北洋政府统治腐朽，官僚腐败，根本不关心文物及古迹的传承与保护。他们对刘梦庚等人毁坏文物，转移石经的真实用意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和抗议。于是，刘彦、何弼虞、魏肇文等议员们联合诺门达赖、徐象先、石凤岐等 20 余人提交议案进行质问，召集爱国人士开展保护国宝行动，同时利用媒体广造舆论，要求政府在一个星期内查明实情，将房山石经送回原处。在民众的强烈要求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曹锟政府不得不下令将石经运回石经山雷音洞中保存。民国十三年（1924）5 月 7 日，房山知事沈严亲自到京兆尹公署将十八块石经领运回县，按原样重新镶嵌在雷音洞的洞壁上。

刘彦等仁人志士的壮举，才使石经山雷音洞中隋唐石经国宝免遭一难。

# 房山农民画的兴起与发展

赵思敬

房山农民画历史悠久，风格多样，千百年来，深得劳动人民喜爱。经过深入乡村民间，调查了解并走访当事人，对房山区农民画的发生、发展、现状进行了广泛地了解。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

## 形成探源

房山的农民画是通俗画的一种，是抒发思想情感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最初是农民根据传统图案自己绘画和刻印的作品，题材包括门神、纸马和各种神像以及在房屋的山墙、檐角和床头制作的吉祥图案，这些作品寓意祈福纳祥的愿望。解放后自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房山农民画，有一个从业余到专业、从自发到有组织创作的过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达到高潮，房山农民创作的年画，多次被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印成年画发行全国各地。房山一度被称为“北京的户县”。

房山地处北京西南，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底蕴丰富。是“北京人”的故乡。沿着农民画这条线往前探索，农民画最早不是画在纸上，而是画在陶器上，刻在石碑上或石壁间。大石窝镇镇江营遗址出土的“人面陶模”，是三千多年前商周时期先民创作的北京地区最早的“农民画”；辽金至元明以来云居寺经版上的许多佛像刻画，反映了房山农民的审美时尚和虔诚的心愿。清康熙年间霞云岭乡北直河村崖壁刻画的“武财神赵公明”等神像表达了村民对发家致富的期盼；1937年周口店遗址放炮炸山，把附近的一座山神庙震坏了，考古队为此用科考剩余的钱重修了山神庙，并请当地的农民重新画了像，但壁画已经不是神像，而是科考队员开挖龙骨山的场景了……房山作为京畿文化重镇，在历史上孕育了许多农民画家，山间村边的古庙至今仍有许多神怪壁画，可惜没有留下创作者的名字。但是，这些先民的作品为房山和北京地区农民画地研究，提供了宝贵丰富的历史资料。



近半个世纪以来，房山的农民画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在北京市和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涌现出了一批农民画家，他们结合中心任务，在生活中挖掘素材，捕捉创作的灵感，创作了大量现实主义的作品，展示了房山农民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现实生活的记录。有些描绘生活现实的作品已经成为记录房山历史发展的见证。

### 崭露头角

房山农民画在1959年崭露头角。当时，房山被称为“周口店区”。随着各地公社的成立，许多村子都成立了美术组。他们的任务是开展“诗画满墙”的创作活动，最初是临摹报刊资料上的图画，进而开始摹写生活。现在，房



房山农民画《人民公社颂》

山城关镇南关生产队废弃房屋的墙壁上，仍然有妇女扛镐、提铁锹下地劳动的壁画，这反映了解放后“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同工同酬”的平等思想。南窖乡水峪村的山墙上残存“工人跨越千里马”的形象，反映了生产大跃进的时代精神。这些农民画以线描和勾线平涂的技法创作完成。形象生动直观，起到烘托气氛，鼓舞干劲的作用。在这一时期，长沟镇东良各庄美术组受江苏邳县诗画工作的启发，首先开始大胆进行创作。李增华创作的《运粪赛过飞机》，反映了农民积极种田的干劲；田春创作的《双五虎深翻土地》展现了鼓足干劲种好田地的热情。此后，房山农民画的创作便在各村镇兴盛起来。1959年10月，房山城关修建丁家洼水库时，房山城关祁振清创作了《丁家洼水库》连环组画5幅，分别为：“丁家洼村”、“安装电灯”、“溢洪道工程”、“大坝工地”、“建成水库”。画面记录了历年多遭水患被淹没的丁家洼村，在修建水库过程中劳动大军战斗在工地的场面。丁家洼村建成水库的同时，还在村里建了两栋二层小楼，这是北京区县农民第一次建楼。村民刘淑珍把这一场景画了下来，

脚手架上方的电灯说明这是夜间的工地，忙碌砌墙的人们你争我赶。画面下边配有一首诗：“丁家洼，真正棒，建筑兵团不分昼夜忙。干劲冲天建楼房，为的是早日实现人间的愿望。”这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生活的最初写照。诗配画的形式显然带有那个时代“人人做诗人，个个当画家”的烙印。琉璃河人民公社成立时，村民赵海用毛笔彩墨画了一幅《庆祝人民公社成立》。记录了大会召开的情景，落款时间为1958年9月24日，为追寻那段历史提供了准确的时间坐标。琉璃河公社70岁的郭仲明老人也拿起画笔进行创作，先后画了《荷塘捕鱼》、《庆祝人民公社成立》等画。此外，窦店公社的西安庄、房山的石楼和房山俱乐部分别以集体名义创作了《歌唱丰收》、《保卫和平》等剪纸作品。房山农民画的创作引起了北京市文联的关注，经与房山文化馆协商，在全区开展了广泛的美术创作活动。在专业画家的帮助下，农民们纷纷拿起笔来，创作了大量的作品，经集中审评选出各种风格的作品41幅，作者有祁振清、郭仲明、赵海、刘淑珍、李增华、彩鸥、田春等28人，这些作品于1959年1月在北京北海公园画舫斋展出。1960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将这些作品集结成册，编成《北京市周口店区农民画选集》。画集的“前言”说：“周口店区的群众创作，由于作者年龄和精力不同，因此他们的画作各有特点，大体分来，有两种情况，青年人如彩鸥等人的作品人物形象比较写实生动、健壮，受现代作品影响多些；年老的如郭仲明等人的作品，人物形象较纤细工丽。当然不是完全这样，互相间又都在学习者影响着。”这次展览说明，“劳动人民的思想一旦解放了，完全能够很快的掌握文化技术，并能使用它来表现他们自己创造的生活”。

### 名声大振

房山农民画在1972年后名声大振。当时已经处于文革后期。据有关资料记载，此前的1972年，国务院文化组建立“全国美展办公室”，截止到1975年举办了4次“全国美展”及农民画、工人画等专项展览。1972年北京市相应成立了“北京市美术摄影展览办公室”，负责组织北京地区的美术活动。赵枫川兼任办公室主任，先期到办公室工作的有吴耘、阿尔、姜师白、何镜涵、吴为等，李中贵于1973年底调入。1974年，北京市美展办公室改组，吴休任负责人，成员有吴为、李中贵、肖金钟、李海涛等。北京这一时期群众性美术活动，是以各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县的文化馆等为中心组织开展的。主要活

动内容：一是为北京市所举办的美术展览或为全国美展“下达”的任务组织创作；二是参加每年的国庆节、劳动节游园布置；三是培训业余美术力量；四是组织观摩交流。

在北京市美术摄影展览办公室的领导下，从 1972 年到 1977 年，房山文化馆充实了美术队伍，采用水粉技法开始进行年画创作，短短的几年中取得可喜的成绩。文化馆建立起强干的美术人才队伍，先后汇聚了刘仲全、李鸿飞（李宏非）、诸中英、刘辉煌、许谋青等美术人才。由马福任组长负责年画创作。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好，首先是发现和培养人才，文化馆的美术工作者经常下乡，了解各村美术创作情况。一旦发现美术爱好者，马上加以辅导、鼓励、扶持，在有条件的地方集中办辅导班以提高技艺。在普遍培养提高的基础上，抽调技法比较娴熟的作者到文化馆进行年画创作。为了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经请示组织部门，抽调上的农民每人每天补助 1 斤粮票和 1 元钱，其中 5 角为饭费，5 角交所在村记工分。这一时期，北京市美术摄影展览办公室的赵枫川、李中贵、李海涛和吴为等人多次来到房山，辅导素描技法，具体指导创作。

为了搞好年画创作，一般都是由文化馆提供笔墨纸张和色彩。创作的方法是先确定作品主题，然后根据主题进行构图。一幅画稿完成之后，创作组和大家相互提意见，经过斟酌再拿出改进稿，最后才定稿着色。创作进入紧张时，许多人都吃住在文化馆以加紧创作。一般说，一张画要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房山农民画《穿山引水》

为了搞好创作，文化馆还带领大家到陕西的户县去参观，学习他们的年画创作经验。同时也把房山集中集体智慧，培养美术人才的经验进行介绍。几年下来，文化馆办班几十次，先后有 160 多人参加美术创作。其中裴开新、陈宗武、傅长顺、刘士英、王绍华、梁志伟、徐振铭、付启荣、石润兴、孔祥芬、傅长顺等人，在与张广、王文芳等专业美术工作者的合作指导下，不但提高了美术技法，而且出色地完成了年画创作任务。几年中，北京人民出版社共印制了 19 张房山获奖的年画作品发售全国。这些作品的署名都有“房山县年画学习班”的统称。年画的内容除了富有政治

氛围，还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打猪草》(刘士英、诸中英)反映少先队放学后为生产队猪场送猪草的热烈场面；同一题材的作品《咱队饲养员》(王志、吴为)入选国务院文化组主办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美术作品选；《迎风飞燕》(张广、陈宗武、裴开新)是四条屏，画面16张，以房山河北地区知青风雨天救人的故事为基础，画成连环画。其中有两幅入选全国美展。事后多年，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的张广说：《迎风飞燕》在创作过程中，尽管辅导两个农民作者用了很多时间，可他们的技法有很大提高。现在看这幅画有很强的时代感，让我感到亲切。《穿山引水》(孟明、孔祥芬、王文芳)和《水往高处流》(吕学福)两幅画内容都是兴修水利的主题，画面的主要人物都是“半边天”。《水往高处流》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全国美展。《写首儿歌颂北京》(徐振明、马士泉、彭培泉)画面热烈，人物集中，构图紧密。这幅画的底稿现在仍然保存在房山文化馆。《农村文艺宣传队》(付启荣、石润兴)创作的是送文艺下乡演出的场面，画面热烈欢快。《宝岛归来》反映1974年中越西沙之战后战士回乡讲述战况的情景，主题鲜明，具有时代感。在那一时期，反映大批判内容的作品也不在少数，《田头怒火》(傅长顺、刘辉煌)、《女子突击队》(傅长顺、李宏非)、《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马德方、李宏非)这三幅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主题。这些年画已都入选全国和北京市的美展。此外，房山中学教师何君华创作的反映山村教师扫雪的油画《冬天的早晨》，入选全国美展，并受到江青的表扬。此后，作品入选中小学课本首页。因此，有人称何君华为“何冬晨”。据统计，在六、七年中，房山有一百多幅作品入选各种美展。由于房山年画创作量大，获奖作品多，大批印刷出版后，在北京引起很大轰动，房山新华书店由此开展年画展订。全店售点最多时达150多个，这项独具特色的业务影响很大。为此，房山的农民画闻名中外。

### 日渐丰富

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农民的文化生活发生了很大改观，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逐渐丰富起来。房山年画的作者也从年画这一单一领域发展成丰富多彩的艺术之花。其中，韩村河五侯村的裴开新自从与刘仲全、李鸿飞(李宏非)两人合作绘画连环画《柳暗花明》后，又独立为人民美术出版社、农村读物出版社完成《半月塘传奇》、《古洞之谜》、《天云山传奇》

等连环画的绘制并出版。长阳镇军留庄的王绍华后来师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张世简先生，专攻国画牡丹，目前已出版《写意牡丹画技法》、《跟名家学技法——名家写意牡丹》等专著，还多次获省市以上各种奖项并在韩国、法国举办画展、进行文化交流活动。何君华专工漫画，成为著名画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所画《打虎协会副主席》风传一时，《杂文报》以此为题展开专题征文。近年，先后出版《何君花漫画选》、《幽默摄影拼贴画》、《肖像漫画初探》、《画话》等专著。长沟镇甘池村的刘世英（刘士英）在文化馆创作的《莱花香》和《水稻卫士》曾经出国展出。改革开放后由于承包土地而停止了画画。2003年重操旧业，开始国画工笔花鸟画的学习和创作。他以传统技法为根基、自然造化为范本，追求工整细致，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其他作者有的放下画笔，转入其它艺术领域。如马福专攻艺术摄影，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如李鸿飞转入青年出版社专任美编；如许谋清改行写小说，创造了“海土系列”作品。只有天津美院毕业的刘仲全一直工作在文化馆，他当时的作品《公社鱼塘》、《大队鸡场》、《播雨》参加全国美展。《公社鱼塘》还参加了澳大利亚世界博览会的展出。现在对国画山水、花鸟都有涉猎。作品和辞条被收入《中国美术书法名人名作博览》、《中国当代名家书画宝鉴》等辞书。进入新世纪以来，为提高农民素质，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房山区文联邀集区书画协会有关人员深入乡村，开展各种专题的文化墙绘制工作，农民画以文化墙的形式焕发了光彩。

综上所述，房山农民画在历史上的两次创作高潮，都和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上世纪60年代初的农民画创作，只留下一本画集可供我们查阅。上世纪70年代创作的年画，房山文化馆还保留着200多张原作，这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的文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在文化产品的需求和审美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房山要想继续发展年画这一品牌，政府要花大力气，投入资金，列入计划。在区委宣传部、区文联的指导下，由区书画协会负责建立创作队伍，定期举办学习班，着眼于人才培养，抓好队伍建设，与当前以先进文化打造“软实力”的目标相链接，才能打造好“房山年画”这一农民画的牌子。

# 蒋叔南的《房山游记》

栗景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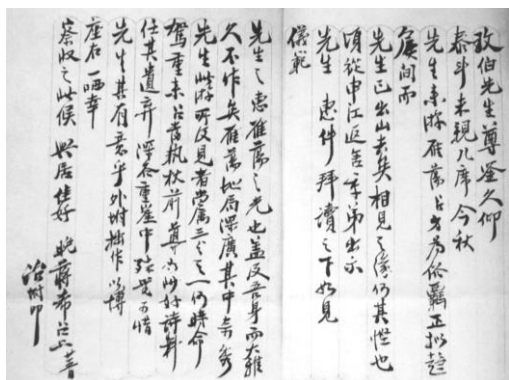
民国间，多有文士名家被房山山水所吸引，于是携朋聚友，探奇寻幽，争睹“幽燕奥室”之胜景。如收藏家傅增湘、书画家周肇祥、“京师四大家”之一的凌文渊、历史学家邓之诚、佛学家蒋维乔、教育家李书华、名居士高鹤年等，都曾在房山地区驻足徜徉，且都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文字记述，为后人了解近百年前房山的自然景观、人文风物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记述文字辞句优美、生动翔实，极具可读性，至今仍被当作游记范文而津津乐道。



蒋叔南像

期间，被《旅行杂志》誉为“中国近代第一旅行家”，被梁启超誉为“徐霞客第二”的浙江人蒋叔南也曾在好友蒋维乔的介绍下，慕名游历了上方山和云居寺两处“房山之胜”，并写下了《房山游记》一文。

蒋叔南（1884—1934），名希召，以字行，别号雁荡亦澹荡人、雁荡山人，浙江省乐清县（今乐清市）大荆镇东里人。早年从父读书，后入浙江武备学堂就读，毕业后被保送至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与蒋介石、张群等同窗。曾任浙江第五区禁烟监督、北京大总统府军事处谘议官等职。因与蔡锷过从甚密，遭袁世凯党羽排挤。民国四年（1915）南归，任上海《时事新报》经理。在沪期间，与梁启超一起主持了一系列纪念蔡锷的活动。民国六年（1917）夏，蒋叔南离沪返乡隐居，从此开始长达近二十年的雁荡山开发事业。蒋叔南经营名山事业，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开发新景点，其足迹遍布雁荡群峰，只要有新发现，即设法增设；二是将自己半生积蓄都用于雁荡山地区的文物古迹保护，同时动员进山的政要名流捐资；三是凭借自己的才识和阅历，编写了一系列出版物，以扩大雁荡山的影响。四是力邀傅增湘、张元济、林琴南、钱名山、康有为、黄宾虹、陈叔通、黄炎培等来雁荡山旅游，借名流之诗文之书画之口碑为雁荡山扩大知名度和美誉度。



蒋叔南墨迹

因而，蒋叔南被梁启超誉之为“徐霞客第二”、黄炎培赞之为“雁荡山中兴主”，当年的《旅行杂志》《申报》称之为“中国近代第一旅行家”、“雁荡山主人”。

蒋叔南一生酷嗜旅游，著作颇富。主要有：《雁荡名胜》摄影集（191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名胜雁荡山》（1917年，商务印书馆）、《蒋叔南游记

第一集》（1921年，纸本线装二册）、《雁荡新便览》（1927年，上海中华书局）、《雁荡山一览》（1936年出版）与《东瓯雁荡名胜便览》（1937年出版）、另有54卷《雁荡山志》刊稿本。

民国九年（1920）春，蒋叔南来北京漫游，与其同宗好友、佛学家蒋维乔（江苏武进人）在北平教育部相晤。二人都是乐山爱水之人，畅谈期间，自然免不了各自介绍彼此游历雅事。谈话中，蒋维乔对蒋叔南讲起游览房山一事。一年前，蒋维乔与其好友冯农、冯雨在游历了天津盘山风景后，又相约“再游房山”，于是，自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四日，蒋、冯等人先后游览了房山境内的上方山和云居寺，并写下《大房山游记》一文，刊于当时的《小说月报》第十卷第八号上。文中盛赞上方山：“房山雄奇，其胜在坨、在洞，令人起壮美之感……”作为雅好山水的旅游大家，蒋叔南听完蒋维乔对房山的介绍，不禁怦然心动，“心焉慕之”。

于是，在清明节过后的四月十八日上午，为了早日一睹房山之美，蒋叔南只带着几件极其简单的行李，“子身独行”，迫不及待地赶到北平正阳门京汉火车站，登上了开往房山琉璃河的火车。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车途，在琉璃河站下车后的蒋叔南，用一元二角雇了两头骡子，开始了他的“房山之旅”：

自站西行，经琉璃河镇、李家庄、东营村、西营村，约三十里至天开村，已入房山谷口。时而沿山，时而溯溪，小径犖确，碍足难行，道旁多杏林，枝头杏花亦若沾染现代新思潮者，正在讲解放时候，含苞如笑，醉色撩人，一色杏花红十里，不图今日于骡背上得之。六里至天开，更六里至下中院。此间居民屋顶均以薄岩片代瓦，近山皆岩层，采取极便，省费耐用，诚能因地制宜也。过上中院，居民数十聚集道旁，聆其所语，知有三西人来游房山，适与余先后

经此。村中妇女，多手携鸡蛋及生鸡，欲得善价以售于过客也。

文中“房山”即指现在的“上方山”。民国二十六年(1937)四月，《房山游记汇编》一书编者王毓霖在其序中有言：“上方本名大房山，或称大房岭，房亦作防，又名六聘山。”

在颠簸途中，蒋叔南遇到了不少前去上方山的游客：其中还有三位外国人，可见上方山在当时的名声。从文中还可以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当地村民已经有着非常超前的经商意识，沿途兜售本地的土特产品，更可看出上方山之名由来已久，村民的经济头脑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也随之益强了。

在上方山接待庵，蒋叔南受到方丈贯如接待，还介绍给他三位同好张遵午、王仲清、王吴山。

自接待庵起，蒋叔南开始“解读”上方山独特的山林之幽美。他以清楚简洁的文笔，清晰地为人们勾勒出一幅“上方山游览路线图”。如他记述“云梯”一段，极为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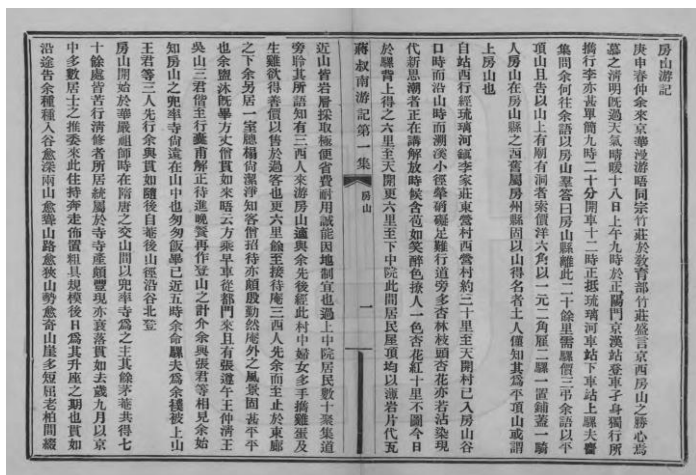
入谷愈深，两山愈耸，山路愈狭，山势愈奇，山崖多短屈老柏，间缀桃花，极其美观。约三里许谷尽途穷，前方疑无去路矣。山之左崖凿级上升，名曰云梯，七十步至头山门。入门石级愈陡，高几及膝，宽仅容足，外方绕以短栏，系以铁链，以便攀登，计二百余步。至云梯庵小憩。庵倚于厂下，下临百丈危崖，若在雨水之时，即在瀑布之顶也。

从十八日傍晚至二十日上午，蒋叔南流连往返在上方山中，在寺僧蓬莱的引导之下，与张遵午、王仲清、王吴山一起先后“经款龙桥，过瓣香庵，抵兜率寺……渡听梵桥……赏云水洞……游一斗泉，至圣泉庵、旱龙潭、华严洞……上玉皇殿，步入龙虎峪……”，一路之上，“松下多小竹，晓风拂拂，摇曳有致”，旖旎风光，尽收眼底。

其中尤以四人探奇云水洞一段引人入胜，从中可略见蒋氏行文特色：

……更进侧转，洞顶极高，约四五十丈，上半分黑白，称为半阴晴天，其下为象驮宝瓶，为灵芝岩。由此更进，导者谓已到鹞子翻身处矣。适间三四人至此折回，余等多燃火把，细察前方，则洞中已无去路，眼前有穴，大可三尺余，适如水井上口，仅供水桶提挈进出之度耳。导者腾身先下，遵午继之，余将所穿夹衣尽行脱去，并将所携洋烛燃放一根于洞口。下降约八尺许，洞向内斜，如直角之弦线口之大，视洞口之初次蛇行处为小。余又用力双脚直伸，借臀与肘之力渐渐溜下，幸此处岩石光滑湿润，尚不十分费事。此时脑筋忽发异想，以为到了十九重地狱，昏昏然莫名其妙。





蒋叔南《房山游记》书影

二十日上午，蒋叔南离开上方山，“策蹇诣云居”。行约五十里后，近中午时到云居寺山门。未进山门，蒋叔南就被其周边“世外桃源”般的景色吸引：

村畔溪畔遍植槐柳白杨，间以正在开花之杏，含苞待放之梨。

在云居寺，蒋叔南逐一观览了天王殿、毗卢殿、弥陀殿、药师殿、大悲殿，随后在一位姓张的老人引导下，登上了“小西天”石经山，就石经洞中所藏经板一一探究，并记以文字：“兹摘录其大意，以知石经之所由来也”。

站在石经山，远眺云居寺，蒋叔南用简练的语言记叙道：

自此望云居如指掌纹，柏林中杂以杏花，苍老富丽，诚不易遘之景物也。北山一径蜿蜒可辨，导者指谓从此可达上方山，计程十八里，惟路极难行也。余察云居形势乃上方山脉蜿蜒南来，分为中外两干，中干至余立足处而尽，外干而北而南，更由而东，抱回环于拒马河之北岸，其支干蟠屈作势，拖为宝瓶峰，局势开张，云居寺在其下，青鸟家言回龙顾祖处也。

当天，蒋叔南住在云居寺。次日早起观瞻了寺中南北二塔。蒋叔南虽然在云居寺停留时间不长，但这里的佛教氛围深深地触动了他：

云居寺局势之开敞，树木之森茂，流泉之清澈，建筑之壮丽，北方丛林中可首屈一指。

看完二塔，蒋叔南便离开云居寺，下午赶至琉璃河火车站，晚归北平，结束了房山之行。

为使读者对蒋叔南这次游览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同时保持资料的完整性，特录其游记全文如下：

庚申春仲，余来京华漫游，晤同宗竹庄于教育部。竹庄盛言京西房山之胜，心焉慕之。清明既过，天气晴暖。十八日上午九时于正阳门京汉站登车，子身独行，所携行李亦甚单简。九时二十分开车，十二时正抵琉璃河车站下车。站上骡夫麇集，问余何往。余语以房山。群答曰：房山县离此二十余里，需骡，

价三吊。余语以平顶山，且告以山上有庙有洞者。索价洋六角，以一元二角雇二骡，一置铺盖，一骑人。房山在房山县之西，旧属房州，县固以山得名者。土人仅知其为平顶山，或谓上房山也。

自站西行，经琉璃河镇、李家庄、东营村、西营村，约三十里至天开村，已入房山谷口。时而沿山，时而溯溪，小径鞞确，碍足难行，道旁多杏林，枝头杏花亦若沾染现代新思潮者，正在讲解放时候，含苞如笑，醉色撩人，一色杏花红十里，不图今日于骡背上得之。六里至天开，更六里至下中院。此间居民屋顶均以薄岩片代瓦，近山皆岩层，采取极便，省费耐用，诚能因地制宜也。过上中院，居民数十聚集道旁，聆其所语，知有三四人来游房山，适与余先后经此。村中妇女，多手携鸡蛋及生鸡，欲得善价以售于过客也。更六里余至接待庵，三四人先余而至，止于东廊之下，余另居一室，窗榻尚洁净，知客僧招待亦颇殷勤。然庵外之风景固甚平平也。余盥沐既毕，方丈僧贯如来晤，云方乘早车从都门来，且有张遵午、王仲清、王吴山三君偕至，行囊甫解，正待进晚餐，再作登山之计；介余与张君等相见。余始知房山之兜率寺尚远在山中也。匆匆饭毕，已近五时。余命骡夫为余幞被上山，王君等三人先行，余与贯如随后，自庵后山径沿谷北登。

房山开始于华严祖师，时在隋唐之交，山间以兜率寺为之主，其余茅庵共得七十余处，皆苦行清修者所居，统属于寺，寺产颇丰，现亦衰落。贯如去岁九月以京中多数居士之推委来此住持，奔走布置，粗具规模，后日为其升座之期也。贯如沿途告余种种。入谷愈深，两山愈耸，山路愈狭，山势愈奇，山崖多短屈老柏，间缀桃花，极其美观。约三里许谷尽途穷，前方疑无去路矣。山之左崖凿级上升，名曰云梯，七十步至头山门。入门石级愈陡，高几及膝，宽仅容足，外方繚以短栏，系以铁链，以便攀登，计二百余步。至云梯庵小憩。庵倚于厂下，下临百丈危崖，若在雨水之时，即在瀑布之顶也。久无僧居，贯如来山，而一改旧观焉。自庵外云路左盘梯虽告尽，而山境之深奥幽秘，殊出吾人意想之外。屈曲再约二三里，古柏之下时露屋角，皆所谓茅庵也。经款龙桥，过瓣香庵，更上半里许，抵兜率寺，已昏黑。九时晚餐，入睡。

十九日。五时即早起。兜率寺佛殿前院内一老柏，大逾两抱，老干繁枝，极其苍郁。殿之后壁刊佛说四十二章全文。自殿侧绝壁扶梯而上，则为玉皇殿。殿后高峰为毗卢顶及茶萝顶。顶东为龙虎峪，顶西为紫金岭，而摘星砣峙于右，望海峰环于左，冈峦层迭，树木荫翳，形势颇佳。两山之间倚崖辟地，临壑建庵，曲径四通，别有境界，地段虽不宏敞，自有幽奥之致，自不显迫窄之局也。

佛殿西首为方丈所居，藏有旧藏经多架，系明本，惜残缺矣。八时早餐，与张君遵午、王君吴山、王君仲青（清）结伴往游云水洞，寺僧蓬莱为导。

八时三十分出寺门西行，经文殊殿、观首殿，渡听梵桥，沿冈上升，约五里而至弥勒殿。俯瞰众山，皆在眼底，惟摘星砣尚在我辈头上也。自殿西下降，山径满铺落叶，颇滑足。约再五里至云水洞，我辈正在休息，昨日所遇之三西人自接待庵踵至，即进洞探览，约一小时而出，手足衣履皆泥泞污秽，相视大笑。时已十一时四十分，我辈皆整装携炬，相率进洞。

云水洞门正南面向，高可一丈，宽一丈二三尺，洞口之顶甚平。自洞口北行二十步，右壁镌一佛像。自此更进，不见天光，更四十步，洞渐低，须鞠躬而进。更二三十步，洞更窄，须俯伏蛇行而进。导者在前，遵午、吴山及余随后，仲清更在余后。余体较大，爬行较缓，遇最小之处即将肚腹着地，用两手屈伸而前，用力蹙进，身几与洞合矣。如此前行约二十丈，稍可屈膝蹲行，时仲清已退回洞口，膝行十余步，洞渐高厂（敞），顶上水珠滴点间结水冰者，曰滴水成冰。

洞内黑暗无比，而地上湿滑，全恃火把之力。余并持洋烛四面观察，洞内钟乳下垂，皆如海松，几疑身入海底，珊瑚岛奇形怪状，不可胜数。山阴道上所谓应接不暇者，余曾居鉴湖，那得有此种万一之境界耶？自此观西方佛手、卧虎岩、人头岩、老龙潭、麻疯窝，而至二龙把洞门，已前行二三十丈矣。洞忽又迫窄，复膝行进十余步，则此洞之二进也。二进之所见者，为上香台、石葫芦、接引佛、什锦岩、石枣、石梨、石核桃、石柿饼、狮子望天岩、石肝、石心、石肺、石孩子、石铛、二龙戏珠池、金水瓶、锡烛台、莲花岩、帽盒岩、仙人过桥，此犹不过以其形似者而导者以之告耳。更进为石琴弦，以竹竿拉之，丁令清越，非凡响也。更进至一处，曰钟鼓楼，导者持火把上升丈余，吾辈止于其下，彼以预置之木槌挨击其近旁诸石，初作鼓声，曰此石鼓也；再作梆声，曰此石梆也；再作钟声，曰此石钟也；再作锣声，曰此石锣也；再作木鱼声、铛铛声，曰此石木鱼、石铛铛也。侧耳静听，拍手叫绝，至此已再进约半里矣。更上坡下行，为洞内之三进，曰面山、米山、葡萄山、棉花山、牡丹山、白龙潭、猴儿捧桃岩、五供养、拦路虎、大砣岩，皆三进内物也。更进侧转，洞顶极高，约四五十丈，上半分黑白，称为半阴晴天，其下为象驮宝瓶，为灵芝岩。由此更进，导者谓已到鹞子翻身处矣。适间三西人至此折回，余等多燃火把，细察前方，则洞中已无去路，眼前有穴，大可三尺余，适如水井上口，仅供水桶提挈进出之度耳。导者腾身先下，遵午继之，余将所穿夹衣尽行脱去，并将

所携洋烛燃放一根于洞口。下降约八尺许，洞向内斜，如直角之弦线口之大，视洞口之初次蛇行处为小。余又用力双脚直伸，借臀与肘之力渐渐溜下，幸此处岩石光滑湿润，尚不十分费事。此时脑筋忽发异想，以为到了十九重地狱，昏昏然莫名其妙。约三丈许出此洞，而进洞之第四进矣。内为鸡冠花岩、西瓜地、南瓜地、菊花岩、棉花岩、象耳岩，再上一坡为罗汉聚会，立者、坐者、伛偻者、侧倚者，盖无不备焉。其上为石幡石幢，四壁满挂，若飘飘乎其欲坠焉。自此石坡下降，湿滑难行，倾度甚陡，导者谓由此再进，洞塞而无可观矣。吴山、遵午止于坡下欲返，余亦意兴阑珊，乃燃一火把掷于坡下，察其下有积水，而余立身于罗汉聚会之会场上，时有水滴于余背，阴澈心脾，几不能忍。乃相将折回，鹞子翻身处之难上，则前此所未遇也。出三进，导者不循旧路引观观音说法台及珍珠塔。余前所述，洞内各物皆记其名，未尝述其状态，然余实无此笔法足以描写形容，且自入洞以后，脑筋昏昏然，莫名其妙，故不得已仅举其名耳。此珍珠塔大可两抱，高可一丈五六尺，斑驳晶莹，不知千万亿珍珠之穿缀也。更前为塔倒二节，则一塔倒为二节之形；塔倒三节，则一塔倒为三节之状。其基础既倾，其尖顶碎裂于数步之外，盖钟乳凝结亦有崩倒之时也。自此而出二进，过一进，再见天日而履人间世矣。

有是哉，洞之结构乃至于此哉！余无以名之，名之曰希奇古怪而已。余意此洞不知若干万年前必在海底，海底之珊瑚岛像即此类。余不明地质学，不能研究其真相。洞内如此宽大，且有滴水，故通空气。余辈在洞内观察近二时，疲劳之度莫可言状。出洞相视，比煤矿中工人略为清洁几分耳。盖洞中窄狭之处为探洞者火把之烟所熏染，与煤矿中固无甚差别也。以后欲探洞者，须饱餐，须多备柴把，须换预备污糟之衣服：此必要者也。导者火把之烟于经过窄狭处熏眼极难受，洞中泥滑难行，洞中深远，探索到底极费力。此探洞之难也，而胆怯气弱者不与焉。

出洞已下午一点三十五分，洗手、食粥，即作归计。至弥陀殿，余拟登摘星砣之顶，而蓬莱不肯为导。余子身上升，约已十丈，无径可攀。余招蓬莱上，彼竭力招余下，余恐迷途，乃下，极扫兴。蓬莱言，朝阳洞、西方洞、金刚洞，皆在砣之四周。余不欲观之矣。遵午等已先行，余与蓬莱缓缓下降，过地藏庵。庵之北园中有白皮松一株，大仅径尺，不足观也。院内有牡丹一本，粗逾拱，高逾人，荫可二丈，含苞一百二十余个。庵僧云是绿牡丹，视京师崇效之牡丹，古老多多矣。庵门前一古松，老干纷枝，披垂可以手折，姿态甚佳。回寺已四时半。

进餐既毕，仍觅蓬莱导余往游一斗泉。出寺东下，越涧过退居寮，沿冈东行约里许，至圣泉庵。自庵侧谷底上升，又约里许而至一斗泉。泉在地窖内之井中，余以手杖试之，不能及底。泉上一庵，不知何名。丹崖环拱而缺其南面，崖壁多钟乳，云水洞内之碎屑也。离一斗泉，至胜泉，南行过两冈，约二里而至旱龙潭。所谓潭者，系一极深之坑潭，径可十余丈，深约二十丈。相传古为毒龙所居，华严祖师开山，挥而去之，仅余此潭，然其情状亦可异也。自此折回，将及寺，贯如偕遵午等将游华严洞，邀余同行，乃折而南行。过十方庵，经华严塔院南行，沿冈里许抵华严洞。洞之左方有一门，额曰“华严祖师洞”。洞内供华严像。洞之深广六七丈许。洞口之右侧一石，斑驳光滑，形如古钵，其口甚整，高下重迭，分为八格，曰八宝功德池。洞底一石甚类鹦鹉，其他形状亦多似海松，则云水洞之具体而微者也。其右一门石级上升，筑为小台，曰华严楼，颇轩敞可玩。时已昏暮，掌灯归寺。贯如备素筵颇丰洁。入睡已十一时矣。

二十日。五时三十分起床，检点行装毕。上玉皇殿，步入龙虎峪，一庵亦就圯矣。庵前一松，视地藏殿之大松较逊，山间称之为松王，何所取耶？松下多小竹，晓风拂拂，摇曳有致，庵之左壁为九王洞，一石厂耳。回寺早餐。七时辞贯如下山，八时抵接待寺，遵午等回北京，余策蹇诣云居。行约五十里，日已向午，抵下庄村。村畔溪畔遍植槐柳白杨，间以正在开花之杏，含苞待放之梨。里许行人柏林，林尽度一石桥，即云居寺山门矣。

云居寺局势之开敞，树木之森茂，流泉之清澈，建筑之壮丽，北方丛林中可首屈一指。视山左长清之灵岩寺，实倍胜焉。门首额曰“西域云居禅林”，门内为天王殿，殿内院中双白松对峙，大围两抱，松下石涧流泉涓涓，则灌引自水头者也。白松之西为毗卢殿，更上为弥陀殿，更上为药师殿。殿前右碑为金刚启，左碑为药师琉璃光如来功德颂也。更上为弥勒殿，前为清嘉庆御题云居寺诗石刻。更上为大悲坛，则寺之尽处，中为大悲殿，右为藏经阁，左为说法台。禅房之设备，亦颇完备。前年居留德侨管理，于此房舍遂多改易之处，于本来面目尚无所损也。僧徒因是四散，无复前日之盛矣。

余匆匆观览，急进午餐，觅一张姓老者为导往，观小西天，即石经山也。二时，自寺东度溪登山，行月五里，岭旁一古柏之下一井甚深，水亦清澈。此七名井之第一井也。更上百余步一佛殿，侧转殿左崖下，一石洞大可八尺，封以石门，门上半为栏干式，可以窥望。洞内满贮石版，即石经洞也。余以便于记忆之故，名曰第一洞。洞内经板能窥见者，一石版之首行为“千手千眼观世

音菩萨”，《大圆满大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一卷，又一版为佛说宝雨经卷。第一洞左数步为第二洞。经板之能见者，一板为《大乘大集地藏大轮经》第七；又一版已残，识其为心经也。东上抵小西天庵，庵东一石井圆形，大可丈许，深约二丈，旁均凿痕，则当年采取石料之所也。井东十余步又一井，亦如之。更东十余步为第三洞，经版之能见者，一版为《菩萨络纓经》卷第十一。更东十余步为第四洞，洞内一版为《摩诃萨波罗经》卷十三。洞前崖端一亭矗立，乃于亭中小憩。亭东为龙王洞，现为放牛之所矣。更东数十步沿崖北转，一井口大可二丈，畜（蓄）水深黑，导者言是龙井，山间樵者常见有大龙在此来往，姑妄听之耳。折回由庵西出，层崖上覆，高不过四五丈，又得一洞，为第五洞，则完全闭塞，无可窥也。洞右一碑上方已剥落，玩其语意为元至正元年高丽比丘慧月重修石经山藏经洞石户碑记。又一碑为金清宁四年进士赵遵仁撰，题为《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四大部经碑记》。兹摘录其大意，以知石经之所由来也。金太平七年枢密直学士韩绍芳牧知是州，尝登峰游览，见石室经碑，召掌寺者询问，均忘底细。乃取出检验，得《正法念经》一部，全七卷，计石二百一十版；《大涅槃经》一部，全四卷，计石二百二十条；《大花严经》一部，全八十卷，计二百四十八版；《大般般若经》一部，全五百二十卷，计石一千五百六十条。又于左右得古记云，幽州沙门释净琬精于学识，于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一藏，以备法灭，乃于白带山石室刻经藏之。石室既满，即塞以石户，以铁锢之。至贞观十三年奄化，其弟子导公继之，仪公、暹公、法公又继之，仍未毕事，韩公以此上闻金圣宗皇帝，敕瑜珈大师讳可玄提点修刻，自太平七年至清宁三年成《大般若经》八十卷，计石二百四十，又《大宝积经》全一百二十卷，计三百六十版，以成四大部，合计二千七百三十条，云云。碑旁竖二碑，皆刻金刚经。

自此石级西登数步，为第六洞。洞较小，洞门额为“宝藏”二字，董其昌所书也。洞西佛殿已为房山县公署所封锁，其两旁石栅可以内窥，殿不甚广，两壁皆嵌石经板，洞中树八棱石柱四，刻佛像极多，并镌佛名于像，旁为千佛柱，实刻一千二十四尊佛。更东为第七洞。洞内所见之版，为《佛说恒水流树经》一卷，则以在第一、二洞之上层矣。更东为唐僧洞，中塑元奘法师取经像，而《西游记》之孙悟空、猪八戒牵白马伺于左右。导者谓唐僧取经即在此处，夫乃穿凿附会之甚欤？更西为第八洞。经版能见者，为《不空罽索神变真言经》卷二十五，又一版为《陀罗集经》卷第二。至此石栏已尽，折回。至庵右拾级登顶，顶上一石浮图，九层，正方形，高可丈五六尺，南面为门，中供佛像；

门旁刻二神将像，形态生动；西侧镌云居石经山石浮图记，其文不能辨识矣；北面刻曰“大唐开元十八年，金化长公主为奏明圣主赐新旧译经四千卷，充幽府范阳县为石经本，并赐山地多处”云云，下款为“开元念八年岁庚辰朱明八日，前莫州吏部常选王守泰记”。山顶石浮图记，下为元和四月八日范阳县丞吉逾《题云居上寺》五言律诗六首，则此塔之建筑当在静琬着手刻经之日也。南山冈上一小石庵内供佛像，更南冈上一庵亦如之。自此望云居如指掌纹，柏林中杂以杏花，苍老富丽，诚不易遘之景物也。北山一径蜿蜒可辨，导者指谓从此可达上房山，计程十八里，惟路极难行也。余察云居形势乃上房山脉蜿蜒南来，分为中外两干，中干至余立足处而尽，外干而北而南，更由而东，抱回环于拒马河之北岸，其支干蟠屈作势，拖为宝瓶峰，局势开张，云居寺在其下，青鸟家言回龙顾祖处也。山下溪流尽处有人家数十，为水头村，云居寺前溪水之源头来自该处。乃从山之西冈下降，巉岩齿齿，小石累累，颇难着足，约五里至水头村。过村西南行不半里，即至水头溪水之发源之所。自溪岸石罅中喷涌而出，源头活水，清澈可鉴。德侨居此，于石罅之前构一水槽，以为藏水之区，上盖铅板，以免污秽。溪东一小庙，为龙王庙，庙前古柏之下有石灰制之椽橈，则德侨每日来此饮水休息之所。我国之待敌侨可谓优矣。余踞溪边石上盥面濯足，快愉之至。溪之两岸垂杨不少，正在舒眼放青之时，不让西子湖边也。蒋竹庄谓云居有西湖九溪十八涧景象，至其地而益信焉，口占一绝以纪吾行：

峰头行到水源头，曲曲清溪滚滚流。

两岸垂杨青欲滴，幽州记否似杭州？

导者家在水头，乃命往村中借一壶来。挈水回寺饮用。时已六时，夕照衔山，催人归去，乃循溪南行，过琬公塔院。塔院碑记为万历时沙门德清所撰，述石经事颇详，并言当时塔院已卖与巨室，清初达观可大师赎回之，则此寺亦已历经兴废矣。塔南为古刹香树庵。更半里返寺。

二十一日。早起至北塔院观法舍利。塔高可八丈，余下二级为六角形，上部为圆形，刻佛像甚多；塔之下层边沿嵌以特制之砖，中绘塔形，上书“法舍利”，塔下刻偈语四句：“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塔院之四周起四小塔，高可七尺，四方形。右前方小塔，其面刻唐石浮图铭，开元十五年太原王大悦所撰，计十二行，行二十六字不等，书法美茂，文完整如新。左后方之小塔，其东方刻石浮图铭并序，谓此浮屠者唐中兴七年岁次辛亥夏月八日，宣义部守幽州都督府法曹参军上轻车都尉贝□王激，上为圣唐天子，下为法界苍生，次逮七□□□俯□□□眷□之所建也。景云二年岁辛亥夏四月

八日建，上骑都尉宁思道书，上柱国丁处约镌文。文多剥缺。按南北朝齐和帝以“中兴”纪元，唐初无之，或者“中兴”非纪元，系高祖之七年欤？左前方小塔刻大唐易州新安府北街李公石浮图铭并序，开元十年四月八日建。易州前遂城县书助教乐高望书、塔砖间有剥落。余携其一以归。以为纪念。

南塔院之塔十二层，高十余丈。塔前有石幢三，中幢六角，刻佛；右幢刻何经，余偶忘之矣。左一塔较高大，刻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读秘藏石经塔记。记中大略谓，我道宗皇帝所办石经大碑一百八十方，通理大师所办石经小碑四千方，皆藏地窖之内，上筑台砌建石塔一座，刻文标记，知经所在，云云。其下备载经石卷数，系天庆八年戊午十七日戊戌甲寅建，燕台沙门惟和书。此塔用意等于小西天之石经室，不可以不记也。北冈上一小塔，不知其名，无暇再观之矣。

八时三十分，整装，遄行二十里，出谷。过六家庄，东风扑人，挟尘土旋舞，无孔不入。下午一时十分，抵琉璃河站。三时开车，六时抵京，住弟季哲寓处。

分析蒋叔南情衷山水的原因，从他的《蒋叔南游记第一集》“自序”中，可见一二，当为后人所借鉴：

余幸喜动而又爱逸。惟逸宜静，惟动多劳，二者相背似不得兼。寓逸于动，其惟游乎？游亦多术：上焉者以神游，庄子所谓乘长风御六龙，游乎四海之外者，放然自得，不以游为游者也。余之游拘泥区域，流连风景，以游为游，游亦下矣。游中作记，按日计程，遇物即书，繁委琐碎，如家常杂账，油盐柴米，随手拈来，非能藉眼底山川，抒胸中丘壑也。

其实，蒋叔南的游记虽然自谦为“以游为游”，看似随手拈来，实际上是巧妙地抒发了胸中“丘壑”，是真正的“神游”之作。总观蒋叔南这一篇《房山游记》，既真实客观地记载下上方、云居两处胜境，又抒发了一位旅游大家对房山的独有情怀。无论语言，还是文思，均可称得上民国游记佳品。

1934年，蒋叔南去世，被葬于灵岩展旗峰南麓。傅增湘有《吊蒋叔南》诗：

蒋侯一旦骑鲸去，冷落山中百二峰。

曾记屏霞庐上住，与君彻夜谈兵农。

好友冯玉祥挽的挽联更是准确地总结了蒋叔南不寻常的一生：

半世功名随流水；

一生事业在名山。





# 房山县解放初期的农村小学

张广文

1948年12月14日，房山县解放。1949年2月，我开始上学，那时已经8岁了。结合有关史料，回忆1949年2月到1953年6月那段艰苦而又充满激情的小学时代，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农村小学教育情况也可见一斑。

## 校舍 老师 学生

房山解放初期，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教育工作。1949年2月，县文教科在顾册村举办教师训练班，县长、县委书记亲临讲课，仅仅解放3个月就实现了村村开学。不过，农村的小学都是初级小学，上一至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是高级小学，要通过考试录取。高小设在县城和大的村镇，解放时，全县仅有十余所高级小学。

说是开学，其实就是背一个手工缝制的布包让父母带着去学校。除了有些大村子办过学校或高小有校舍外，绝大部分解放后建校开学的都是在村里的大庙或祠堂里，都是公产，院子大，房子多。我上学的饶乐府村小学设在村子中间的老爷庙。庙是两进的院子，前后各有东西配殿，后院的东配殿就是学校的第一间教室了。现在的小学生很难想象当时的“教室”：残破的门窗四处漏风，一块块脱落的墙皮下露着砖石，屋内空空。村民临时推举的校长叫邱凯，高高的个子，说话还有些结巴，告诉家长让学生下次来时带窗户纸糊窗户，还要自带桌椅板凳上课用。第二次上学时很热闹，有拿纸的，有拿浆糊的，在老师的指挥下糊窗户。桌凳更是五花八门，有人拿的是小板凳，有的是能坐三四人的长板凳，有的把太师椅拿来了。不知是谁的家长搬来两张大方桌，还有一个破炕桌。冬天还没有过去，屋里也没有火炉，上课就那么干冻着，手冷了用嘴哈一哈，脚冷了就跺跺脚。直到第二年冬天，才有了像样的桌凳，才用土坯砌了一个火炉。

教室旁边的大殿里，佛像还不时享用香火，叩头烧香的和读书上课的同在

一个院，加上一些人的迷信传说，让我们这些孩子终日有一种阴森森、惶恐不安的感觉。下课了谁也不敢在学校呆，赶紧跑回家才踏实。直到1950年政府提倡破除迷信，才把这些佛像推倒请出来，前殿后殿和偏殿都改成了教室。只不过大殿都是一面有门窗，窗户又是糊纸御寒，冬天阴天时，屋内只能看见同桌同学的脸，看不见黑板，老师没法板书，只能对学生口传心授。后来，结合语文开了一门“说话”课，让学生通过猜谜语、讲故事练口才。因为是轮流说话，一个也不能少，学生只好在校外学一些东西拿到课堂上说，对有的低俗的“谜语”并不十分理解，也拿到课堂上说，弄得老师哭笑不得。讲故事也是五花八门，实在讲不出来还可以学猫狗叫，学鸟叫。

房山刚解放，一下子开办那么多学校，师资成了大问题。虽然立即开始举办师资短训班，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各学校就自己想办法请老师先开课。我的启蒙老师姓陈，四十多岁，丁家洼村人，上过私塾。刚见到他时，头戴一顶圆毡帽，身穿黑色棉裤扎裤腿，脚穿双鞍棉鞋白袜，干净利落，透着一股老学究的味道。陈老师毛笔字写得很好，教我念书时是有腔有调的“唱书”，当时只有一个老师一门课。陈老师只教我们不到一个学期，一位1948年毕业于房山中学的贾童文老师（琉璃河李庄村人）就从县里正式分配来了。1951年又来了初师毕业的梁月华老师。随着班级地增加，陆续分配来了其他老师，学校教学也逐步走上正轨。

农村小学老师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住的是黑漆漆的破庙，拿的是小米工资，每天自己筹粮买菜生火做饭，还要在煤油灯下备课，直到1952年9月才开始发工资。好多学生和家长对老师都是很尊敬的，一到农历的节日，都让学生把家里做的节日食品给老师送一些去，有的还请老师到家里吃顿饭。不少家长和学生也和老师结下深厚的友谊。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老师教学生是沿习了旧教学方法，对学生是有体罚的。学习成绩不好，违反纪律都要罚。轻的罚站，有的上课在课堂上说话，打盹，就在课堂里罚站；打架，就到教室外面罚站。时间一节课甚至半天。

1952年，教育部门在教师中开展了纠正体罚与变相体罚的运动，消除残存的私塾式念、背、打教法，让学生也有了自己的尊严。

饶乐府小学刚开学时，说是一个班学生，其实只有20多人。年龄从六岁到十一二岁都有。后来，有的成绩跟不上退学了，有的要回家跟大人干活退学了，也不断随时有人插班入学，一个班到底有多少学生没一个准数。

1949年下半年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后，人民从经济上得到翻身解放。政

府适应广大群众从文化上翻身的迫切要求，放宽年龄限制，凡有上学条件的都可以上学。教室的后面又增加了十多名十五六到十八九岁的大哥哥大姐姐上课，有的比老师年龄还大。当时特别提倡妇女解放，因此主要是大龄女青年。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超龄学生多数都没有初小毕业，但他们再也不是文盲了。

### 课本 课程 文具

学校刚开学时，既无课程安排，也无课本可读，陈老师只好教我们念百家姓、三字经，其余就是写毛笔字，老师教了笔画以后就照字帖写字，主要是柳公权、颜真卿的字帖。

过了几个月，算是有了课本，叫新三字经，是解放区编的。现在还记得开篇几句是“中国人、四万万、有好人、有坏蛋。”直到二年级时才有了正式的课本。课本内容很实际，记得第一课是“一个人”，第二课是“一个人有两只手，左手和右手”。还有教育学生拥军优属的内容：“一二三、一二三，一走走到宋家滩，宋家滩有个宋大娘，儿子打仗在前方。”只是课本质量太差太差了。是用类似于窗户纸的毛头纸印刷的，像现在的无纺布，但薄厚不匀。有的两面的字都看得见，有的是一个大洞没印上字。算术课还包括珠算，从乘法口诀小九九练起，只学了一年就能帮家里算账了。

1949年6月，华北行政委员会就召开了华北小学教育会议，制订了《小学教育暂行实施办法》、《小学教师暂行服务规程》，对教师、教材、课程等都做出安排。到三年级时，课本就正规了，而且有语文、算术两种课本。但是那时压倒一切的是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教育部门心有余而力不足。课程虽然安排了语文、算术、体育、音乐、美工五门课，实际上只能是有什么老师开什么课，老师会什么教什么。直到我毕业那年，体育、音乐、美工课都是语文算术老师代教的。三年级时学校在大庙北边的菜地里开出一片两三亩地的操场，有了跑步、体操、跳高、跳远等正式的体育活动。音乐课开始学简谱。美工是图画课和手工劳作两个内容。语文课还包括写毛笔大楷和用小楷写作文，都是自带砚台自己研墨。记得在《我的理想》一篇作文中，我写的是长大要当工程师。谁知当初为了这个朦胧的理想我奋斗了整整30年才得以实现。

由于解放初期物资匮乏，家里又没钱，上学所用的文具是现在的小学生无法想象的。课本费必须得交，但有的家长实在拿不出钱，就把家里的粮食背到

学校，让老师帮助想办法。作业本都是自己买纸裁好自己装订，那时又没有订书机，都是用针线缝的本子。薄的、厚的、黑的、白的还有捡来的彩色纸，五花八门。一二年级时作业只用铅笔，铅笔质量很差，经常把纸划破，遇到那种颜色浅写不出字的铅笔，只好蘸一次唾沫写几个字，写完作业，嘴唇都是黑的。即使这样的纸笔，也不是都买得起，大部分学生都是从家里拿几个鸡蛋去村里的小店换来的。

为了省铅笔，都要准备笔帽，一方面是保护削好的铅不断掉，一方面是把笔杆接长，直到笔杆实在套不住了才换笔。那时，铅笔只剩下不到半寸长了，还得把铅剥出来捏在手里用。平时练字和演算题用的是石板和石笔。房山区出一种青石板，切割成十六开纸大小，磨平，装上一个木框，用一种较软的石头做成比铅笔细一些的石条做成石笔，在石板上写字，写完可以擦掉再写。一堂课下来，老师要来回走好多趟。学生的桌面上、衣袖上甚至脸上都是石头末。至于用钢笔，那是三年级以后才有的事。小学生尤其是初小学生是用不起自来水笔的，又要写钢笔字，怎么办？都用蘸水钢笔，这种笔一直用到上世纪90年代初。蘸水钢笔，必须配有墨水瓶，蘸一下写几个字，买瓶装墨水好用，但是花钱多，于是就想各种办法代替。有的直接用墨汁，因为不流畅，写的字深一块、浅一块的，还经常断笔画。有的买颜料自制墨水，这有两种。一种是文具店卖的专用的固体颜料，用热水冲开灌到瓶中使用；一种是杂货店卖的染衣服用的染料，也可以冲成墨水用，比较便宜，但颜色浅，沉淀多。这两种自制的墨水不但写字深浅不一，而且有紫色到蓝色各种颜色，也没办法要求统一。

## 课外活动

解放后的小学生活实际上是从课外活动开始的。没有书本先有活动。房山解放时正是平津战役北平围城，各路大军调动频繁，几乎每天都过部队，村里组织欢迎，学生都要参加，手拿彩色三角旗上写着欢迎词，站在路边喊欢迎口号。

刚上学时没有音乐课，却学会不少歌曲，多是跟解放军学的。最早学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哪个部队都唱，我们就跟着学，没谱没词，也不太懂歌词的含义，只是听声音。因此闹出了“革命军人个个要老鸡”的笑话。其次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等歌曲，每次开会必唱。

学生们要参加各种各样大会，一方面受教育，一方面壮声势。庆祝“五一”劳动节、国庆节都要到县城的城隍庙广场。其中，最受教育的是枪毙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的公判大会。第一次是枪毙曾杀死过几十名八路军的恶霸反革命杨天沛，后来还有国民党县长保安团长张德祥。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时期一次就枪毙了27个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每次枪毙前都要把犯人押到城隍庙戏台上，让受害人或家属当场控诉他们的罪行，最后是政府宣判，宣判后就由解放军和民兵把犯人推到西门外或东门外的沙滩上枪毙。那些上台控诉的人，个个苦大仇深，家里都有被反革命残害的人，控诉时台上台下哭成一片，仇恨至极，有人哭得昏倒在台上。到这时，全场人都站起来义愤填膺地高呼口号。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对没有共产党但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逐渐有了深刻地理解。

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志愿军战歌响彻祖国大地。刚经过土改分得土地的农村很快就懂得了保家卫国的深刻含义，全力投入抗美援朝的运动。学生也不例外，主要是由学校组织宣传活动，写黑板报，刷标语，写标语，游行示威，街头演讲，入户宣传，屋顶广播，欢送青年入伍，写慰问信，做慰问袋。还要利用星期天慰劳军属，帮军属家挑水扫院劈柴。在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中，家里拿不出钱来，就利用课余时间到处捡废铜烂铁，甚至到齐家坡原来国民党修的碉堡战壕捡子弹壳，炮弹皮，交给学校卖了钱，再捐献出去。当听说捐献的飞机有一架是“少年儿童号”以后，我们都为此而骄傲，也为志愿军叔叔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那种爱祖国爱人民的信念，也逐渐深深地扎根到幼小的心灵里。

学生参加诸多政治活动，经常停课，虽然受到很多实践的教育，但也打乱了教学安排。另外，学校和村公所放在一起，开会办事人来人往，晚上有扫盲的识字班上课，也有村剧团排演节目，老师也无法安心备课。这种现象全国都一样，教育部门只好向上级反映，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政务院就发布了《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从1952年开始，县里分期分批开展克服学校中内外混乱现象，明确提出“教学工作是学校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才逐步建立了正常教学秩序。

解放初期的农村小学每个学年结束并没有成绩通知单，而是由老师把年终语文，算术的考试成绩汇总后，以分数多少排出名次张榜公布在学校的墙上。90分以上的为“甲等”，75至89分的为“乙等”，60至74分的为“丙等”，不及格的为“丁等”。记得一二年级时，“甲等”第一都是原来家境较好，家长

又识字的学生。我暗下决心，努力学习，终于在三年级时上了“甲等”第一名。由于这种张榜公布的方法有损学生的自尊心，不利学生成长，1952年以后就取消了。

### 学制改革

解放初期，农村小学沿用春季开学（实际是春节后开学），冬季结业（实际是年末）的学制。寒假和县城小学一样，而数伏天还得上学，没有暑假，只有麦秋假和大秋假，目的是回家帮家长种地收秋。我们非常羡慕城里的学生，夏天最热时可以在家里玩。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四二制小学暂行教育计划》，规定每年9月1日至次年7月31日为一学年，每年安排暑假寒假各一个月，农村小学生才享受了城里学生同等待遇。

学制一改，问题来了。我们四年级1952年年底毕业，高小夏季才招生，半年时间怎么打发？于是采取了一个过渡办法。春节开学后，原来的课程继续上，课本继续用，老师讲得深一点，作业布置多一点，叫四年级不合适，取名“四补”，有条件升高小的就补，没条件的就初小毕业回家了。一直补到1953年6月，报名去考县城完小。当时县城的小学 and 中学混杂在房山城内东南角的孔庙和文昌宫里。我的考场就在文昌宫一个改建的教室里。我轻松地答完考卷，美美地享受了第一个暑假生活后，就接到录取通知书，从此结束了初小生活，成为房山县城关完全小学的一名高小学生了。

# 与浩然在一起的日子

苏宝敦

1974年，当时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站”（今区文化委员会前身），根据当时房山县革委会文教组的指示，组成一个写作组，深入全国农业先进典型单位岗上村，撰写全国劳动模范吴春山的先进事迹。

写作组由赵日升、曹岫森、苏宝敦三人组成，深入实际，访贫问苦，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进行详细采访。吴春山当时五十多岁年纪，黑红脸，方圆脸庞，体格健壮，嗓音洪亮，讲起岗上村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创业史滔滔不绝，谈起个人的“苦斗经”更是豪情满怀。他对我们说了这样一个细节：那时他是牲畜把式，从河套沟往涿州运煤，三九寒冬，半夜上路，山风扑面，冻得两脸疼痛。夜里从煤场起程，天亮进涿州城，路边有卖“大碗面”的，一碗一斤，因是常客，人熟路熟，提早做好准备，走到与“面摊儿”一定距离时，将鞭杆儿插入腰间，从口袋里掏出硬币，边向“面摊儿”扔去，边高声喊叫：“大碗面一个！”而后紧走几步，端起大碗面，狼吞虎咽，吃入口中，转回身，继续跟着骡队前行。

采访将近一个月时间，原《十月》副主编张守仁来到写作组参加编写。又过了一段时间，浩然先生来了。他坐的是一辆绿色军用吉普。住下之后，与我们编写组交谈起来。他说他用报告文学形式写了大兴县的王国福、长工屋，很



浩然（前右三）在房山

受感动。我们就和他一起去看吴春山的住房，也是一间长工屋，屋里的墙壁油黑发暗，墙壁上挂着一幅毛泽东主席画像。谈起如何写好报告文学，他说：一要真实，不要像写小说那样编故事；二要写好人物，你们写岗上村的发展变化，重点是写好吴春山；三是文章中要体现出人的精神风貌，把人内心世界的高尚情操写出来。他



还说，有些工农兵英雄人物只会做，不会说，你们要善于引导，比如你们想好一句能表达某个人物思想的一句话，先讲出来，问他是不是这样想的？他说是，就可以用。谈起他个人的小说创作，浩然更是滔滔不绝。他说他进入创作状态后，如小河流淌，自然成文，一天能写七八千字。张守仁先生插话说：我这个编辑审稿子，还跟不上你这个大作家写稿子快。于是，我立即想起第一次见到浩然时的情形。

1975年，我有幸作为一名业余文学作者参加北京市的一次文化工作会，浩然先生坐在主席台上，40多岁年纪，风华正茂，英俊潇洒。我当时已读过他的《喜鹊登枝》、《艳阳天》等作品，令我十分羡慕。

在岗上村与浩然二次相见，面对面听他讲创作，讲人生，实在受益匪浅。第三次与浩然在一起是1991年。《农民日报》文艺副刊在“北京欧美同学会”召开文学创作座谈会，我与浩然邻座，相互交谈很方便。近20年没见面，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很热情地和我握手，很亲近地与我交谈。我祝贺他的新作《苍生》面世，他诚恳地对我说：“在新的时期，我如果写不出《苍生》，作为一名作家，我就彻底‘破产’了”。接着，他问我的情况，我说已写出长篇小说《柳溪轶事》，出版社正在编印。他问我是怎样突破“三突出”框框的？我说我以一个乡为背景，真实地记录从1978到1988这十年间所发生的典型事件，在典型事件中各样人物的真实表现以及他们的音容笑貌，性格特征，没有特意“拔高”某些人。他点点头说：“书出版后赠我一本。”接着，将通讯地址写给了我。

1992年，《柳溪轶事》出版后，我邮寄给自己尊重的三位著名作家，并希望得到他们的点评。刘绍棠先生写了《喜读〈柳溪轶事〉》，许谋清先生写了《苏宝敦的柳溪轶事》，浩然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函。信个说：“赠书收到，谢谢你！我在病中，看来非短时间可以痊愈的。因此研读长篇小说有困难……希望得到你的谅解。……浩然，1992年，4月1日。”这封信，至今我还保存着。

2008年，浩然先生不幸离世。从1992年起，在这16年的时间内，他与病痛争斗，为文学“绿化”工程默默出力，在北京郊区业余文学作者中，他是一代楷模，他将永远活在我们这些农村业余文学作者的心目中。

# 一位山区教育工作者的回忆

张玉泉

王宏道，1958 年底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出席了第二届全国先进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今年 3 月，他向笔者讲述了当年在深山从事教育工作的难忘生活。

1954 年 7 月，刚刚毕业于房山初级师范学校的王宏道，被分配到房山西北山区张坊乡的东关上村任教。

东关上村位于当时张坊乡的大西北，被层层叠叠的大山包围着，距张坊乡 30 多里，没有公路，要进村来除了钻乱石滚滚的山沟就是爬山崖陡峭的坡道。王宏道冒着骄阳背着铺盖卷在父亲的陪伴下，从家乡后石门村向西北爬过两道山、越过三道沟才来到东关上村。这个村方圆 50 多里，200 多户，900 多口人，分住在黑牛水、牛庄、蒿地、庄户山等几个地方，这些地方距中心村黑牛水最远的有 28 里。

在村教委的带领下，王宏道来到原来的学校里“安营”。说是学校，不过是三间四面透风石头垒的教室。学校西侧两间是教室，教室里码着泥土石头桩子，上面搭上的木板或石板落满尘土，这就是学生的课桌。东侧一间是教师的办公室、宿舍兼厨房，满地的烂纸尘土。教室正前面是一个土堆，旁边是没有院墙的空地，枯草萋萋。教室的东侧和校院南侧紧挨着住户。

经了解，王宏道得知黑牛水学校已经停办半年了。当他看到这个小学的现状心里就凉了一半，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当天他就去找乡党委书记和村教育委员请示开学的事情。乡党委向他介绍了该村的情况，并决定第二天动员孩子们来上学。乡党委书记鼓励他说：“这儿一切条件都很差，困难也很多，你是真金，要经得起火炼”。

第二天天亮，王宏道就起来做好上课的准备，但整整等了一天，却没有一个学生来。他感到很失望，面对空旷破烂不堪的教室没有一个学生到校，怎么上课呢？而且还要自己砌炉，砸煤，挑水，做饭……自己既是教师、校长，又是厨师、管理人员，里里外外一把手，面前的一切都是陌生的。王宏道难过的

流出了眼泪，后悔不该到这儿来，可是怎么办呢？他想：是要求调工作？还是家走种地去？这不是逃避困难吗？一个共青团员能在困难面前低头吗？“是真金要经得起火炼”，他想起了乡党委书记的话，他立誓一定要经得起考验。

第三天，王宏道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深入农户用谈家常的方式去动员，解除家长们怕孩子上学受委屈的思想顾虑，除了耐心说服外，还向家长们保证：一定教好孩子，决不打骂。就这样经过七、八天的说服动员后，家长们终于陆续把孩子送入学校。开始只有一二十人，当家长们看到这位青年教师教学认真负责，作风正派，热爱学生时，都自愿把孩子送到学校，所有适龄儿童全都入了学。

1955年春季开学后，王宏道遇到了困难：春耕大忙了，大人们都下地，孩子们有的要在家看弟弟妹妹，有的去放牲口，有的跟大人去干活。能坚持上学的只有几个人。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习，王宏道想尽一切办法坚持教学。每天天刚亮，他就赶快起床做饭吃，接着给来校的学生讲完课、布置好作业后，就带着课本去地里找孩子们，把他们集中在一块听课，或个别辅导做作业。晚上又将在家哄孩子的学生就近集中到一起学习。一次晚上，上完课回校时，由于刮风下雨路不好走，王宏道的手脸和衣服都摔破了。不仅如此，王宏道还要翻山越岭跑到三十多里地的张坊去开学区会，或去买粮食。不管怎样劳累，第二天他仍然坚持工作。

1956年暑假后，东关上村有了第一个高小毕业生。王宏道突然产生了在庄户山办分校的想法，庄户山在村东北的高山上，是东关上村一个生产队，总共14户，有10多个孩子，这些孩子每天往返一趟要爬60多里山路，到村里上学很不方便，早出晚归，家长很不放心。如果就地办学可免去10多个孩子下山上学的途劳。于是，王宏道先向乡党委书记和村教委做了汇报，得到了他们的支持。然后又找生产队长协商，借民房做教室，学生自带桌凳上课。这个意见得到了庄户山社员们的一致拥护。他们说：“这回不用为孩子的安全担心啦！”当王宏道找到全村第一个高小毕业生杨福民出来出任庄户山小学教师时，他由于受“家有二斗糠，不当小孩王”的思想影响，说什么都不同意干，后来经再三的思想工作，他终于答应了。经过一番筹备，很快办起了“一揽子小学”：

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  
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 出 席 証

第 02535 号

姓名：王宏道 性别：男  
席次：\_\_\_\_\_台\_\_\_\_\_排\_\_\_\_\_号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北京

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  
极分子出席证

即白天教小学生，晚上教民校（扫盲班）。同时还兼任了生产队的会计。经过王宏道的努力，学校办得很出色，被评为北京市的先进单位。

由于王宏道工作成绩突出，1956年6月，他被批准加入了党组织。从此，他的信心更足了，干劲更大了。当年，他被乡党委和张坊学区定为骨干教师。他考虑到这里每年一百多名初小毕业生，要跑到30多里地的张坊上高小，极为不便。为了满足当地群众的要求，实现在当地上高小的愿望。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决定在牛家庄办起一座完全小学。他和村干部们一道积极发动群众，盖起了五间房子，学校由原来的两个初小班40多人，一下子增加到6个班70多人，教师也增加到4人。成为一个较完全的高级小学。

为了把学校办得更好，王宏道发动孩子平整操场，并且不花一分钱建起一套体育活动用具。如在两棵树之间，横绑上一根木棍作单杠；直立一根木杆，上端用铁丝绑在树上作爬杆；体操棒、接力棒、跳高架等也都是自己做的；从河滩找拾一些拳头大又圆的石头当铅球；篮球架也由群众出料自己做；篮球是通过打草、打柴、刨药材等劳动攒钱买的。1957年全学区开运动会时，他们学校有四个学生获得前三名优异成绩。他还开设了音乐课，用自己工资买音乐器材。教育教学红红火火、扎扎实实地开展了起来。自从开展勤工俭学后，全校师生解决了书本、纸和笔的问题。学生的学习成绩也大大提高了。

王宏道在日常工作中十分注意言传身教，严格教育和要求每个孩子，而且他有一颗慈母般的心热爱孩子，爱护孩子胜过爱他自己。1955年7月里，有一天晚上雨下得很大，山洪爆发，黑牛水的河水上涨，他准备让家远的孩子留校和自己一起住，可是其中有两个小点的孩子不愿住，怎么办呢？他想如果让他们自己回去，过河时，很可能会冲倒，甚至出现生命危险。为了避免出危险，于是他决定送他们回家。当他背第一个孩子淌河时，由于水急路滑，一下子摔倒在水里，但他仍然坚持着慢慢向前爬着走，送过一个再接另一个，就这样一个个把他们送过河去，然后再领他们爬一个小山头，送进家里。正在担心着急的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被老师安全地送回来时，十分感动。

1958年，王宏道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鼓舞下，他更加任劳任怨，一丝不苟地工作着。他后来被张坊乡党委、学区正式任命全乡北片（辖7个村）学校的负责人。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每周从周一到周六他要坚持在学校给孩子上课，晚上点起煤油灯给孩子批改作业或深入农家做家访。而片上的工作如去了解情况，去乡里或学区里开会，只能利用星期天，早出晚归要往返70里山路。

王宏道默默无闻的工作，不断开拓进取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受到了上级党委和主管部门的肯定。他先后被评为房山县青年红旗手、北京市先进教育工作者。1958年，王宏道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出席了第二届全国先进青年积极分子大会。

# 《青峰》与新时期房山文学的繁荣

刘泽林

早在《青峰》停刊的时候，便有了写这篇文章的念头，但迟迟未能动笔。先是源于文人的理性，料知《青峰》停刊未久，彼时记述，难免会写出些心中的不平来；待到后来，心绪平复如常了，却又看轻了文字，淡了梳理的心思。当然也有懒惰的成份：十多年的出版历程，各阶段编者的不同风格，房山文人与它千丝万缕的关联，等等，要理清这些东西，需要耗费多大的精力！对于一向疏于史料的我来说，写起来无疑难度更大。这期间，心里当然也存了一分侥幸，希望房山的哪个文人会写出一篇记述《青峰》的文章来。但仔细一想，我是《青峰》的一任主编，且时间最久；前两任主编一位已经离世，另一位也年岁已老，那还能指望谁呢？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写吧。头绪繁多，且慢慢道来。

## 《青峰》的三个编辑阶段

《青峰》的前身《房山文艺》系文化馆主办，由赵日升于1974年创刊并主编，16开本；出版三期后，1978年6月第四期始，改为报纸型，8开4版；1981年6月，自总第28期始，更名为《青峰》，由王凤梧主编；房山县文联成立后，王凤梧创办、主编《大房山》报，《青峰》由我主编；1992年7月20日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青峰》（含《房山文艺》）从创刊到停刊，经三任主编，历时18年，共出版67期。

## 赵日升与《房山文艺》

说《青峰》便不能不提《房山文艺》，因为《房山文艺》是《青峰》的前身，或者也可以说《青峰》是《房山文艺》的延续；说《房山文艺》便必须要说赵日升先生，因为他是《房山文艺》的主要创始人，因此也便可以说是《青

峰》的第一任主编。

赵日升，诗人、编辑家，笔名月恒、曾翼人、了之，1938年11月4日出生于北京市房山县大次洛村。1952至1955年，在房山中学读初中时，即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1955年考入通州第一中学（即今潞河中学）读高中。这所学校学风甚好，中国著名作家刘绍棠曾经在此就读，并少年成名，步上文坛。袭此遗风，学校在文学方面，气氛尤为浓厚。赵先生投师该校，显然是对它的文学氛围极为看中。就读期间，他陆续给报刊投稿，小说、散文、小品、诗歌等均有涉足。1956年第2期《河北文艺》发表了赵日升的处女作《谁能猜得着》，从此便专意写起诗歌来。1958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校四年间，诗歌创作愈发精进。1962年，大学毕业后到房山县琉璃河中学任教。1973年调入房山县文化馆创作组工作。

在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有七、八年的时间，但从房山整体的文学发展上看，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对赵日升个人来说，除了诗歌创作，从此又踏上了一条文学辅导之路；对于房山的文学创作而言，从此便掀开了一页崭新的篇章。在此前至1949年这段时间，房山虽然也有可以圈点的文学创作，甚至王凤梧更因几篇杂文而被错划“右派”，但那终究都是零散的个体行为。文化馆虽历来推崇文学创作，但一直苦于没有一个合适的旗手。所以，调赵日升到文化馆，主要看中的是他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赵日升在文学创作组工作期间，开始致力于房山文学队伍的打造，组织起了几十人的业余文学创作队伍，到他调走时，已经有上百人之多了。为了使业余作者有展示作品的平台，赵日升几经努力，于1974年，创办了16开本的《房山文艺》；出版三期后，为快捷、经济考虑，从1978年6月第四期开始，改为报纸型，8开4版，每月一期。《房山文艺》的创办，为房山的业余作者开辟了房山县第一个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促进了房山文学作者的成长和文学事业的发展。那一时期，受时代所限，房山的文学创作虽然整体水平不高，但业余作者队伍的快速扩充，为十年后房山文学的崛起培育了一片沃土。

所以，客观地说，现在房山文学呈现的一片繁荣景象，赵日升无疑具有开创和奠基之功；而《房山文艺》，自然便是当代或新时期房山文学的摇篮了。

1980至1982年期间，赵日升借调至《诗刊》杂志社工作，1982年，正式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编辑部工作。其中一段时间，董华独自编辑《房山文艺》，虽无主编之名，却是实实在在的执行主编。1981年，王凤梧调入房山文化馆，接任《房山文艺》主编。

## 王凤梧与《青峰》



《青峰》报

王凤梧，1927年生，房山饶乐府村人，做教师时，因两篇杂文被划成“右派”，也算是“文革”前房山文学少有的成就。“平反”后赋闲在家，等待落实政策、恢复工作。恰其时，赵日升与文化馆领导访邀，遂于1981年到文化馆创作组工作，主编《房山文艺》，董华仍是执行编辑。赵日升遂安心到《青年文学》就职。自此，房山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81年6月，自总第28期始，《房山文艺》更名为《青峰》，不定期出版，刊名由董华约请著名诗人张志民书写。在这里，任何有关《房山文艺》与《青峰》名称优劣、是否有何玄机的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在第三任编者看来，《房山文艺》更具地域性，一看便知刊物等级；《青峰》则含混了区域的概念，但其内容依旧是房山本色。据凤梧先生说，取意《青峰》，旨在扶植更多文学新人，绝无否定《房山文艺》之意。当时，凤梧先生还声若洪钟般诵了两句注释“青峰”的诗，可恨日后被我忘得干净！此后，我多次见到日升先生，也从未见他对更名一事有什么介怀。可见，《房山文艺》更名为《青峰》实在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

诚如凤梧先生所言，更名后的《青峰》更加注重房山文学创作队伍的培养。

此时的房山文学，正孕育着第一次腾飞。改革开放后，长期禁锢人民的“极左”观念逐渐淡出人的思想，文艺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和提高，全国文艺界迎来了新的春天，进入了全面的文艺复兴时期。和时代同步，房山的文学事业也进入到了春满大地、百花争妍、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与《房山文艺》的办刊宗旨同脉，《青峰》自觉地承担了房山文学创作主流基地、房山业余作者成长摇篮的历史责任。在《青峰》不断吹响的文学号角声中，一支业余文学创作大军迅速向当时房山唯一的文学载体集结，几年间便激增到300多人。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文化馆请刘绍棠等著名作家来房山讲座，我发出去200多个通知，结果前来听讲的作者把一个能容纳300人的礼堂坐得满满当当，那境况绝对是空前绝后了。

《青峰》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摇篮”，如何能够容纳得下那么多文学新人？



凤梧先生便对那些有潜力，且已经在“摇篮”里培育了一段时间的作者下了“逐客令”：到公开报刊上去闯荡吧，好腾出版面给更多的新人。但凤梧先生绝对是要“送一程”的：先是精心帮这些作者润色出一篇好作品，然后亲笔写一封信，连人带作品，推荐到《北京日报·郊区版》去了。鉴于当时房山文学的创作水平，上大刊大报显然不够现实，而《北京日报·郊区版》是距离北京郊区作者最近的报纸。我这么说绝无贬低《郊区版》之意，恰恰相反，我认为在扶持、发展北京郊区文学创作方面，《郊区版》功德无量。于是，房山作者开始陆续在《郊区版》上崭露头角，且占据的版面越来越大。随着凸凹、陈玉泉、张文玺、王刚、李艳梅等新秀名字的不断出现，尤其是王刚、孙艳玲、王文玮三名年轻的作者同获“北京市建国三十五周年征文”奖，在北京文坛引起轰动，被评论家称为“北京西南文学现象”，由此掀起了房山文学崛起的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房山掀起了一股办报热潮：时任房山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张玉泉创办《房山人口报》，凸凹主持《房山政协》报，卓成栋主编《房山矿机报》，一时竟有五、六家闪亮登场，甚为壮观；虽都是行业报纸，但均辟有文艺版，专发房山作者的文学作品，极大地缓解了《青峰》的版面和出版周期的压力。所以，梳理房山文学发展的脉络，这几家载体不能忽略不计。

在推进房山文学创作的同时，凤梧先生宝刀不老，笔耕不辍，短短几年间先后在多家报刊发表小说数十篇，引起全国文坛的关注，成为北京郊区的代表性作家。

所以，如果说赵日升先生对新时期房山文学有开创、奠基之功，那么王凤梧先生无疑便是提高、壮大之德了。

1983年底，房山县文联成立，胡振常任主席，王凤梧被选为副主席。1985年胡振常因身体原因，辞去文联主席一职，房山县委决定由王凤梧继任主席。同年，已经退休的王凤梧创办、主编《大房山》报，《青峰》的接力棒便传到了我的手里。

## 《青峰》的终结

我与《青峰》结缘是在1982年下半年，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我极偶然地得到了一张8开4版文学报纸，上面散发着浓郁的家乡气息，细看出版处，果然是房山文化馆主办。那便是《青峰》了。这一次偶然的机缘，无疑改变了我工作的取向。年底的时候，我携了一篇习作敲开了文化馆院内的一扇木门，



《房山文艺》报

迎面端坐在一张木椅上的是一位粗胖的老者，那便是凤梧先生。

几番访谈之后，凤梧先生对我说：“到《青峰》来吧。”于是毕业后我便选择了到文化馆工作。我想，当初赵日升先生邀凤梧先生的时候，说的一定也是类似的话：到《房山文艺》来吧。由此看来，《青峰》的编者对它文脉的传递是十分看重的，毕竟聚集在这杆旗帜之下的是一支庞大的文学创作队伍。

当时的编辑部有三个人：主编王凤梧，董华和我。这样的人员配置，在郊区文化馆创作组来说，绝对称得上豪华了。因编辑精干，便值得细化分工，在主编终审之前加一道初审。董华自告奋勇揽了奔波印刷厂和校对的任务，那一道初审

的工作自然便由我来做了。对此环节，我并不陌生，因为在大学毕业前，我在《丑小鸭》杂志社实习了几个月。一张四版小报，塞满了也容不过两万字，一年出版最多时也不过八期，所以工作很是轻松。但有一项传统“业务”却是极难考核的，那便是接待来访的作者。那时候不像现在这般方便，来稿发个电子版什么的。而距离并不太远的作者，嫌邮寄太慢，多是亲自前来送稿，为得是亲耳聆听凤梧先生的一番指教；而访我的作者，自然是年龄相当者更多一些，且其中的一部分人日后都与我结下了一定的友谊。

大概在我参加工作一年左右，创作组又先后有苏宝敦、邢一中加盟进来。虽然他们未参与《青峰》编务，且停留的时间极为短暂，但这里却不能不提：毕竟他们曾经来过。

1985年，董华到文化馆下属十渡文化站工作，游走山区三乡，另外开辟了一块文学天地，在京郊弄出了不小的响动。同年，凤梧先生退休，接任县文联主席之职，遂将《青峰》帅印交付与我，自己开创以报告文学见长的《大房山》去了。所以此时的我，说是主编，但几乎就是光杆司令了。

这样也好，我可以实施我的编辑理念了。此前，房山文学创作经两位前辈不遗余力地打造，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局限也十分明显，即：虽然房山作者创作的作品已经能够冲出房山，但大多只是冲到了《郊区版》的门下，而且绝大部分是“微型文学作品”。我当时认为，这固然与房山的整体实力有关，

但房山作品的创作手法过于传统、乡土、单一，也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于是，《青峰》在倡导房山作者向更高的文学层次（走出《郊区版》，到文学大报大刊上闯荡）的同时，鼓励文学形式、语言、手法、内容等全面的创新，并以一次“‘夕阳’ 同题小说” 征文，拉开了这场对房山文学影响深远的“文学创新运动” 的序幕。成效极其显著：统计显示，此前房山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北京日报·郊区版》、《中国人口报》等几家文学档次并不甚高的报纸占据了很大的比重，粗略统计约在百分之六十以上。但到了“文学创新运动” 之后的1987年，刊登房山作品的文学园地已达上百家之多，其中不乏在全国都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不仅如此，这一阶段的房山文学作品，获奖数量和级别都有显著提高。这表明房山的文学水平有了质的提高和飞跃，形成了房山文学发展的第二次高潮。

但高峰之后，《青峰》却从1987年开始进入到了风雨飘摇的时期。这一年，文化局领导调我到图书馆，任副馆长，答应我待图书馆班子建设完成后再回《青峰》报。这一段时间，《青峰》因无人编辑，自然停刊。我想，也许在去图书馆之前，我也应该效仿我的前辈，寻一个可接续香火的人，对他说：到《青峰》去吧。待我再次回到创作组的时候，事业单位面临经费压缩，文化馆已经无力出版《青峰》了。这一停便是三年多。虽然在这段时间，我个人的文学创作进入到了一个丰收的时期，在《青年文学》、《海燕》、《广州文艺》、《厦门文学》等文学期刊屡有斩获；但作为一个编者，终究为《青峰》长期处于停刊状态而心存愧疚。

几番谋划，几经奔波，在成立由十多位房山企业家组成的《青峰》理事会的基础上，《青峰》再一次复生了。为适应时代发展和报纸生存的需要，我对复刊后的《青峰》进行了大幅度变革：在坚守文学报纸的基础上，适度增加了社会焦点、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并且为今后扩大发行量考虑，将《青峰》投放房山各报刊零售网点发行。当时的我意气风发，绝对是一副大干一场的架势。

但好景不长，《青峰》复刊一年后，领导找我，说上级指示，房山要创办一张区级报纸，为整合资源，要连人带报地收编《青峰》，言下之意，《青峰》自然需要停刊。

记得我还颇为激动地和领导理论了一番，后来才觉得当时对领导有些不礼貌：上级的指示，领导有什么办法？

当时《青峰》还有两位编辑：刘强和王雪荣。虽然刘强后来学了摄影，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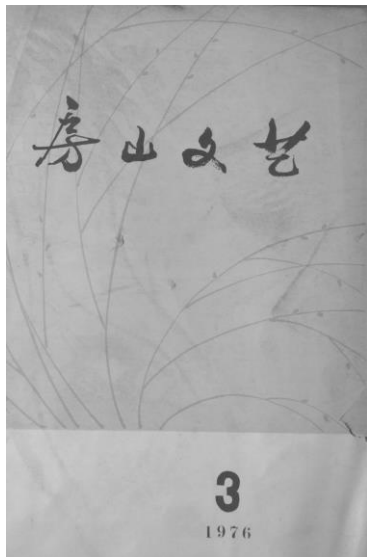
雪荣索性不好写作的行当，但这里却不能不提：毕竟，他们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毕竟，他们曾经在过。而且，即使在《青峰》停刊后，他们依然跟随我，一道创办了“青峰文化服务公司”。看这公司的“番号”，当时的许多读者便猜到，我是要走一条实业复刊的路了。可惜，日后的路却走得身不由己，“复辟”《青峰》的念头也愈发淡薄了。现在想来，当时我的所为，极似《三国演义》中的一个人物：一心图谋复蜀而终不能成的姜维。与垂暮蜀汉不同的是，当时的《青峰》正青春勃发，一派繁荣景象。有人说，恰是《青峰》的繁荣，才催生了那张区级报纸。

### 《青峰》的历史作用

房山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起步，到 80 年代中期的重点突破，再到 90 年代的广泛丰收，直至现在的全面繁荣，发展可谓迅猛。其间，《青峰》为房山文学创作者队伍的形成、成长、壮大，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为房山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青峰》是房山文学创作的策源地。

在《青峰》创办之前，房山的文学创作处于零散的、低档次的状态。除赵日升等少数几人的创作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力。《房山文艺》的创办，不仅使房山的作者有了刊发作品的园地，更为他们向更高的文学殿堂迈进搭建了一架必要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峰》是房山作者走向成功的铺路石。《房山文艺》的创办，唤起了房山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热情，他们自发地向《房山文艺》聚拢，到更名《青峰》时已形成了一支数百人的文学创作队伍，为日后房山文学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青峰》就是当时房山文学的旗帜。无论自觉与否，作为旗手的《青峰》编者们的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房山文学创作的氛围和走向。譬如赵日升先生，以诗歌见长，所以当时的作者队伍习诗者众；王凤梧先生擅长小说，所以当时作者队伍中写小说者渐多。我主持《青峰》时，与凸凹、张文玺一同发起的“创新运动”，更是在房山文坛刮起了一场



《房山文艺》封面

影响深远的创新之风，现在房山一些实力派作家的文风大多是在那一段形成的。从这个现象上看，《青峰》便是房山文学创作的风向标。而《青峰》的编者，在推崇某种创新、倡导某种文风时，总是舍得拿出大块版面，放宽尺度，为此类作品大开绿灯。从这个做法上看，《青峰》又是房山文学的实验田。

《青峰》的历任编者，因年龄和性格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编辑风格：赵日升先生是纯正的诗人，因而《房山文艺》被营造成一个文学的沙龙；王凤梧先生做过语文教师，因而与大部分作者形成了师生之谊；至于我，骨子里有江湖的豪迈，加之作者中与我年龄相当者甚多，因而最后相处出一大片友情。但无论风格如何不同，在对作者的态度上却是一致的，那便是：真诚地扶持。在这个意义上，《青峰》的编者绝对是文学作者的良师益友。

《青峰》是房山作家成长的摇篮。

从现在房山文学创作队伍的构成，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青峰》的历史作用。房山作家协会现有会员 90 人，45 岁以上的会员竟占三分之二，而这三分之二的作者大多起步于《青峰》的时代、《青峰》的平台。

另一组数字也许是更好的说明：在 1980 以前，房山还没有一个省市级作家协会的会员。现在已有 15 人加入北京作家协会，其中除几位是近两年入会的较年轻作者，其他十多人无一例外地与《青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或是《青峰》的“三朝元老”，或其处女作刊于《青峰》，或经《青峰》的实验田栽培而走向成功。

所以，不止一个人说过：《青峰》是新时期房山作家成长的摇篮，是新时期房山文学繁荣的奠基石。

# 周氏兄弟与房山

赵思敬

本文所说的周氏兄弟，指的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原名周树人）和他的二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周作人。兄弟俩著述等身，对房山文史地颇有论及，现将收集到的著述略加整理，以为钩沉备忘。

1899年初，18岁的周树人曾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学习，积累了许多中国矿产知识。七年之后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25岁的鲁迅与同窗顾琅联合编著了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本矿产分布著作《中国矿产志》。这本书由例言、导言、本言组成。附有中国矿产全图一幅，书后有《中国各省矿产一览表》，计109页。由日本本邦信印刷，南京启新书局、上海普及书局，日本东京留学生会馆发行。上海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作《序》，他说：“顾、周两君学矿多年，颇有心得。慨祖国地大物博之无稽，爰著《中国矿产志》一册，罗列全国之所在，注之以图，陈之以说，使我国民深悉国产之所自有，以为后日开采之计，致富之源，强国之本，不致家藏货宝为他人所攘夺。”可见，两人编著《中国矿产志》，为的就是要国人了解家底，把矿产资源当做致富强国的根本。

《中国矿产志》第一章直隶省矿产《第一节 金属矿》“金矿”名下列出6个产地，首列：“顺天府房山县”，旁注小字“宝金山”。这座宝金山，就是今天房山区周口店乡娄子水村西明代“房山八景”之一“红螺三嶮”的别称。此说法见于明人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红螺三嶮”条目，“嶮旧名幽岚山，一曰宝金山。”并且说“红螺三嶮”在明朝成化年间，只有樵夫行走的小道；到了嘉靖年间，才有僧人建造庙宇；直到万历年间，才有游人出入。据此推论，宝金山出产金矿的消息，应该形成于明朝万历年间，距今大约四百多年。

鲁迅先生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十五日发行的《中国矿产志》增订三版封底“征求资料广告”中说：为编写这本书，“爰搜集东西秘本数十种，采取名师讲义若干帙，撮精删芜，以成是书。”翻阅地域史料，大多不见宝金

山金矿的记载，只有民国二十二年（1933）《艺林月刊》编辑的游山专号第四卷“幽燕奥室”，收录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撰写的《游房山红螺三峪记》透露了一些线索：“会日色向暮，岚霭苍茫，横峰如门，殆疑路断，及谷穷润绝，四山忽开，危嵒 崑然，青林掩霭。舆人欢呼，谓至宝金山矣！山以金矿得名，昔年有人开采，闻乃硫铁之属。”至此，才知所谓“金矿”，原来是“硫铁矿”之误。硫铁是铁和硫两者化合物的通称，主要有二硫化亚铁、硫化亚铁和三硫化二铁。1999年编修的《房山区志》记载，房山现已探明的铁矿石储量为2413万吨。为什么将硫铁矿误称为金矿，在科学知识不发达的年代，原因恐怕是矿石上褐色的“黑点”。这可能源于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的记载：“金多出西南，取者穴山至十余丈见伴金石，即可见金。其石褐色，一头如火烧黑状。”寻访得知，上世纪三十年代房山本地人曾在宝金山开矿，后来又曾雇人开采铁矿石。现在宝金山西河滩还有采矿留下的遗迹。对于宝金山的具体位置，《北京百科全书·房山卷》明确记载：红螺山南面，有堵墙山，“北自对子鞍，南至九口鞍，俗称棺材山。山有十二支峰：一为宝金山，堵墙山北脉，上有净业寺。”

《中国矿产志》第一章第二节《非金属矿》中“煤矿”名下列出17产地，亦首列：“顺天府房山县”，旁注小字“无烟煤”。创建于辽天监二年（503）重修于辽天庆元年（1111）的房山周口店西山“木岩寺碑记”，有“取煤于穴”的记载。可见房山产煤历史已近千年。又据清代光绪年间编修的《畿辅通志·榷税篇》记载：乾隆二十九年（1764），宛平县（指门头沟区）只有煤窑一座，房山县却有煤窑九座，可知房山煤业远比门头沟发达。《清实录》光绪十四年（1888）十月十五日记载：顺天府奏：“修筑房山等处煤道工竣，出力官绅，可否保奖？”得旨：“此项工程，系地方应办之事，在事出力官绅，著传旨奖励，毋庸列保。”可见，房山煤炭资源的一举一动都要上报朝廷知晓，等待皇帝圣旨裁定。1999年编修的《房山区志》记载，房山煤炭资源“发热量高，系优质无烟煤，岩性硬整，易开采。煤炭总储量18.51亿吨。”煤炭在历史长河中，一度成为房山的支柱产业。近年来，房山开始了关闭煤矿的工作。2007年7月11日《北京日报》一版头条发表《决战北沟》的通讯报道，文章说：房山北沟是一条绵延90公里的山沟，全区七成多的煤矿，九成多的石板场，六成多的石灰场集中在这里。从2005年开始，房山已经关闭煤矿等资源型企业1204家，其中北沟近千家。房山采煤的历史逐渐退出资源性产业的台账。从事矿产资源产业的1.4万人，到目前已经有9000人实现转移就业。

现代考古发掘证明，战国时期的古燕国都城，就在房山区琉璃河境内的董家林一带，这里是燕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第一部传奇小说，就是描写燕国太子丹谋划刺秦王的《燕丹子》。这部小说不足三千字，《汉书·艺文志》不载，始见于《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只一卷，不题撰者姓名。《旧唐书·艺文志》作三卷，皆题“燕太子丹著”，以后罕见流传。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时，纪晓岚从《永乐大典》中发现，将其录出，列入小说存目。后来由孙星衍校订题叙，刻入《平津馆丛书》。今本《燕丹子》皆源于此本。燕丹子就是《史记》、《战国策》中记载请荆轲谋刺秦王的燕太子丹。小说借燕丹子之口，对傅麴感叹说：燕国如无将抵挡秦军，“易水之北，为之谁有，此盖亦子大夫之耻也。”意思很明白，易水北部的广大土地一旦丢失，对你们这些不肯出世相助的大夫来说，不也是耻辱吗？荆轲被燕丹子奉为上宾之后，夏扶问荆轲：“何以教太子？”轲曰：“将令燕继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霸。于君何如也！”举坐称善，竟酒，无能屈。太子甚喜，自以得轲，永无秦忧。这段对话令人玩味，翻成白话就是燕丹子的属下夏扶问荆轲：“你用什么来指教太子？”荆轲说：“将使燕王继承召公的业绩，赶上甘棠的德政、教化。高目标。想使燕王继夏禹、商汤、周武王的业绩，并而成为四王；往下，想使燕王与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一样，成为第六霸。您以为如何呢？”在座的人都称赞荆轲说的好，直到宴会结束，没有人能折服荆轲。太子丹十分高兴，自认为得到了荆轲，就永远不用担忧秦国的威胁了。从以上两段描写不难看出，太子丹所说的“易水之北”，当指今天琉璃河一带燕国土地。荆轲在这里好像不是刺客，而是谋士，他说的召公，是古燕国的第一代国君。“甘棠德政”指的是召公曾深入民间现场办公，在甘棠即枣树下处理民间诉讼，被后世传为美德。太子丹得到这样一名文武兼备的人才，当然无忧秦国的威胁了。两段饶有兴味的对话，都涉及到燕国都城。

对于《燕丹子》这部传奇小说，明代文学家胡应麟主张此书写成于汉朝末年；清代文学家李慈铭主张此书写成于宋齐之际；鲁迅先生赞同元朝初年史学家马瑞临、明朝文学家宋濂、清朝文学家孙星衍等人成书于战国之际的观点，他在《小说史大略》中说：此书“虽不见于《汉志》，而审其文词，当是汉以前书。”鲁迅先生从“文词”这个角度，将它与《史记》、《战国策》的文风加以比较，考察小说以太子丹复仇雪恨事件为中心，生动描绘他逃归燕国，礼贤下士，招募勇士，派遣荆轲刺杀秦王失败的故事，得出它是“汉以前书”这个结论。今人霍松林则更明确地说：《燕丹子》应该是“秦并天下以后至覆亡以



前十余年间产物。”王灿炽先生在《燕都古籍考》中认为《燕丹子》是现存最早的北京地方文献，在北京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如果说，鲁迅先生对房山矿产资源的了解和对《燕丹子》小说的论述是只言片语，他的二弟周作人对于房山的关注，则是论述颇多了。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猿人与龙骨山》，全文如下：

《人民日报》上读者来信说，在周口店龙骨山上有公家的石灰厂开采石灰岩，应即停止，以免毁坏人类远祖的历史遗迹。周口店是世界第一的“北京人”头骨发现的地方，可能还可掘得，以前的那个存在协和医院，已为美国人拿走，现今有重新挖掘的计划，那保存遗物不使变成石灰的工作实在是必要的。我特别对于这通讯感觉兴趣的，倒并不单是和我意见相合，却在那龙骨山的名字上，那山既然以龙骨名，可见那里向来一直是有这些东西的了。《本草汇言》中说，尝过晋蜀山谷，访产龙骨之处，岩石凌峭，溪径坟衍，则有累累如龙鳞，隐隐若爪牙者，随地掘之，尽皆龙骨，这里的话虽然说得有点夸张，但可见这种地方是有可能有的。龙骨山固然应当保存，就是别处开山伐木，处处可能发现问题，理想的办法是，这些工作都该有专家附属，如地质动植物学等，不但防止破坏学术资料，也可以让他们去研究。这意见未免有点迂远，至少是在现今，但为久远计是并不难办到的。《翻译通报》十五号上王以铸先生说每种言语都要有人懂，这在个人当然困难，对国家集体来说却是件简易的事，“将来在五亿人口中，就每种即使是极为稀见的语言培养十几位乃至数十位专家，恐怕不能说是浪费的事吧。”这个意见很对，我在这里借用了作为说明吧。

本文见于陈子善、鄢琨编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散文《饭后随笔——周作人自选精品集》，全书约71万字。是1949年11月至1950年10月周作人为上海《亦报》和《大公报》撰写连载文章的合集。文章从人民日报刊发的一篇文章说起，对于周口店开采石灰石的做法予以批评，也表明周作人对于北京猿人遗址的关注。这篇文章信手写来，语言质朴，堪称小品文创作的新阶段。周作人认为，通过考古发掘，使“那保存遗物不使变成石灰的工作实在是必要的”。表达了他对北京猿人的关注，对于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他认为是被美国人拿走了。在此，我们不能追究周作人根据什么说这句话，因为，周作人撰写这批小品文的目的是为了“稻粱谋”，以解决生活拮据。令人欣慰的是关闭非煤矿山的举措经过不懈努力，和各级舆论的监督执法，终于熄灭了开山的炮声。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研究，已经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周作人对龙骨山之名很感兴趣，在另一篇《龙骨》中还说：

“龙骨有两种，白的名粉龙骨，有五色龙纹的为五花龙骨。”周口店挖掘的多是粉龙骨，贾兰坡说，过去，周口店当地人把出产的龙骨卖到药店，或留下一两块，用刀刮成粉末，用以止血。上世纪五十年代，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发行的小册子上，第一章说明华北地区出产的药材有 48 种，第四种就是龙骨。仅山西每年所产龙骨就达一万七千斤。房山每年出产多少龙骨，不得而知。药店收购粉龙骨每斤为一千五百元（即一角五分）；五花龙骨每斤为三万五千元（即三元五角）。可见，周作人对于周口店向来出产“龙骨”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

从周氏兄弟对于房山文史资料的著述和论述来看，房山的人文地理内涵的确令人刮目相看，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 北窖村银音会古乐谱探源

张东升

银音会又称“音乐会”，是以音乐为主的民间花会之一，在我国北方很普遍，有的地方也叫“银乐会”。其名称的由来，或因其乐声优雅清纯，或因其乐器中有一种传统打击乐器——银锣而得名，有的地方，则把银锣称“云锣”。

据说，银音会起源很早，大约明代或以前就有存在。我国隋唐时期，民间多有所谓“歌场”、“戏场”，为民间集体音乐活动的重要场所，各种民间音乐伎艺得以展示风姿。后来随着宋词和元曲的兴盛，民间音乐曲目更加丰富多彩，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不少音乐曲谱也随之失传。所以，银音会在我国北方分布虽广，但到现在，多以消亡无存，虽有些村仍有银音会存在，但乐手多已年长，乐谱也多散失，存留不多。相比之下，佛子庄乡该是保存下古乐谱较多的乡镇这一，粗略计算一下，大约有一百二三十首，而北窖村银音会又是留存古乐谱最多的村子，迄今保存有古乐谱 108 首，其中手抄谱 103 首，口口相传曲谱 5 首。此外，长操村和上英水村，都有银音会，长操村银音会保存古乐谱 60 余首，上英水村银音会保存乐谱 40 余首。三个村子合计村古乐谱 200 余首，但其中有不少重复，除去重复曲谱，约计 130 首。一个乡保存有如此众多的曲谱，在北京地区尚属罕见，在华北地区恐怕也稀有。

北窖村银音会成立时间，一说是清康熙二十二年，即 1685 年，后来见到一本纸页已破损不堪的手抄本，上面记载最早的抄本的时间，为明天启年间，因写具体时间的地方已磨损无存，故难以确定具体时间，但以天启年计，距今已有近四百年。

各地银音会所用乐器基本相同，主要有银锣、钹子、笙、管子、横笛、大镲、铙子等。一般 15 人为一班，表演形式有踩街、坐场两种。踩街指在街边边走边吹吹打打，旧历二月二、九月十五、年节、正月十五都是约定俗成的日子。一般踩街时吹奏欢乐曲子。坐场多是应邀做丧事，往往两至三个班子比着吹奏，场面十分。

代表性的乐器是银锣。银锣架子用窗棂般粗细的木条做成，样式也如窗格，

方形，上边突出一个小的方格，中间是九个方格，每个格子间用细绳拴一面小锣。锣有小碗口大小，上下左右各有一个小眼，细绳穿过小眼拴在木框上。9个方格拴9面小锣，加上凸出的方格上拴的一面，一共是10面小锣，分成高低不同的音。演奏时，演奏者一手把架子揽在怀中，另一只手拿一个小小木槌，按照乐谱击奏，声音清纯悦耳，似银器发出的声音。

乐谱是传统的“工尺谱”，五音，即1、2、3、5、6。五音谱历史悠久，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凡声之高下，列为五等，以宫、商、角、征、羽名之。”但在北窖村银音会古乐谱中，分明又可看到由五音向七音过渡的痕迹，如在《感皇恩》、《小华严》、《骂玉郎》、《采茶歌》等曲谱中，已出现了“4”和“7”两个音（根据已故民间音乐家蒲怀新所记由古谱翻成的简谱）。

北窖村银音会所存曲谱百余首，来源十分复杂，其最古者甚至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隋唐时期，如《柳青娘》、《醉太平》、《望江南》、《唐多令》、《好事近》、《千秋岁》等，而这些曲目又和隋唐燕乐有关。《诗经》中写道：“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又有记载曰：“曲和乐则歌，徒歌曰谣。”就是说，“歌”是有管弦乐相配而唱的歌曲，“谣”是没有器乐伴奏的清唱。据有关音乐类史书记载，隋、唐至五代燕乐曲调的总数在500首左右，其中来自民间或和民间有渊源的大约在三分之一。据唐代文献及敦煌传辞考证，《柳青娘》是以歌妓名命名曲名，应与歌妓的歌唱有关或是出自于歌妓的创制。据记载，与歌妓有关的还有一首《杜韦娘》。

隋唐时代，民间多有所谓“歌场”、“戏场”，这些歌场或是戏场，便是民间集体音乐活动的重要场所。另据记载，隋唐燕乐的形成始发于隋代，燕乐曲调的创制和流行也是自隋代开始，至初、盛唐时期达顶峰。《燕乐探微》说：“这燕乐是雅俗兼施的，上自郊庙朝廷之所谓‘雅’，下至陌头里巷之所谓‘俗’。其中有中原乐，有边疆民族乐，也有外族乐；有歌，有舞；有新，有旧。”《唐五代史论稿》记载更为明确：“……《杜韦娘》、柳青娘》二曲，据唐代文献记载及敦煌传辞考证，二曲皆以歌妓名命名曲名，应与歌妓的歌唱有关或出自于歌妓的创制。”

《醉太平》、《望江南》等曲目，史上多有记载，有些研究者史海钩沉，将其收入自己的研究著述中。据龙榆生所著《唐宋词格律》，《忆江南》又名《望江南》、《梦江南》、《江南好》，段安节《乐府杂录》云：“《望江南始自朱崖李太尉（德裕）镇浙日，为亡妓谢秋娘所撰，本名《谢秋娘》，后改此名。”《唐多令》又名《南楼令》，双调，60字。《醉太平》为双调小令，38个字，前后

片各四平韵。第一、二句第三字，第四句第一及第四字，最好用去声，方能将调激起。结句为上一下四。由此可见，古曲对词的声调要求极其严格。《千秋岁》一曲，《宋史·乐志》有载。

北窖村银音会所存古曲谱，见于元曲的曲名更多一些，如《骂玉郎》（一、二）、《感皇恩》、《采茶歌》、《清江引》、《醉太平》、《寄生草》等。考曲谱由来，仅从《感皇恩》一首可见一斑。据《旧五代史·太祖本纪》，与后梁时受禅让，百官舞蹈称贺有关。当其时，“殿前卿相对列诸侯，叫呼万岁愿千秋”、“百僚卿相列排班，呼万岁，尽在玉阶前”，可谓盛况空前。另据考证，《感皇恩》诸作，“叫呼万岁愿千秋”等描写，当为盛唐时代唐玄宗千秋节时祝寿盛颂之作。说法虽然不一，但此曲创于唐或五代时期，已成定论，其出现年代，距今已有千年，足见其历史久远。

此外，北窖村所存古曲谱，有不少和佛教音乐有关，如《五方佛》、《坐堂和尚》、《大梵火赞》、《小五声佛》、《救苦真言》、《大五声佛》、《三归赞》等。还有一些曲目，显然和民间百姓生活相关，或原本就是起于民间，为民间坊市乐者歌者创制，如《鬼八卦》、《花子叫街》、《放水牛》、《赶子儿》、《打枣杆》、《放驴儿》、《滚绣球》、《小娃娃》等。百余首古曲谱，内容之丰富，历史之久远，不仅在北京地区罕见，就是在全国也属罕见，有的地方虽存曲名较多，但完整曲谱却仅以十数计。这些古曲谱是否和敦煌音乐有关，因手头缺少这方面的书籍，实难考证，但说从隋唐燕乐和敦煌音乐能找到其一定渊源，当不为过。据有关史籍记载，敦煌曲子按内容和作者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属僧侣阶层之宗教作品，一类是世俗社会之世俗作品；其中世俗社会的世俗作品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文人作者；一类是民间作者。仅就曲目的具体内容，可分为“疾苦”、“爱情”、“怨思”、“别离”、“闲情”、“隐逸”、“颂扬”、“医”、“道”、“佛”等，其中不少类的题材，都能在北窖村银音会古曲谱中找到，特别是反映民间世俗社会的世俗作品和僧俗作品，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

附：北窖村银音会古乐谱曲名

步 儿	叙 儿	头 身	二 身
三 身	回 法	后二身	后三身
到 见	鬼八卦	儿 弄	挂金锁
鸡铧碎米	一井云	过街先（仙）	和习钦
坐堂和尚	步步紧	七子钵	五声佛
打贺（一）	打贺（二）	大乐拍	中圪未

《房山文史资料全编·乙集》(下)

得胜令	清江引	小华严	锤鼓金字经茶合伞
纸帆儿	回二舞	大杀尾	留名雁
骂玉郎	感皇恩	采茶歌	寄生草
好事近	千秋岁	滚绣球	庆丰年
大焚火赞	时猪连	小天台	凤凰城
唐头(多)令	斗鹤鹑	小走马	普庵咒
花子叫街	观灯赞	大五声佛	吾名马
焚火赞	赶子儿	大赶子儿	偏儿
柳青娘	小寄生草	小梁州	雁过南楼
海青拿天鹅	收海青	春景	夏景
秋景	冬景	小五声佛	三皈赞
醉太平	脱布衫	小金字经儿	神女儿
放水牛儿	五方佛	柳和烟	赶子儿
贺桥令	郎头沙	放驴儿	小开门
小淘气	桃君令	合四排	金平儿
南梅花引	叶里藏花	寄生草(二)	小三宝
撼动山	行道章	天下乐	老八板
南海歌	五大洲	小娃娃	小行路
山东歌	滴溜子	望江南	打枣杆
喜相逢	撼动山(二)		

说明：以上曲名为北窖村历代相传的手抄本，有完整曲谱 103 首。因多次传抄，难免会有错讹。此外，有北窖村已故民间艺人蒲怀新已翻成简谱的古曲谱 50 首，有几首手抄本上没有，曲名如下：

骂玉郎(之二、三、四)	小焚火赞
救苦真言	唐陀会
	回舞

# 房山的元代窖藏

赵思敬

从上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按照毛泽东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精神，全国进入紧张的备战阶段，挖防空洞成了全民的必修课。在挖掘防空洞的过程中，许多珍贵文物重见天日。1969 年 11 月，房山县良乡镇南街药材批发部院内曾出土了一批元代窖藏。

药材批发部的防空洞挖到距地表 3 米的地方时，发现了两个大缸，大缸口径为 53 厘米，底径为 25 厘米，高 70 厘米。很快，这些文物全部上交了。当时，人们只知道南街挖防空洞出土了文物，但到底是什么文物，有多少文物，谁也说不清楚。事隔三年之后，在 1972 年 6 月第 6 期的《考古》杂志上，田敬东写了一篇《北京良乡发现一处元代窖藏》的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这批出土文物的情况。屈指算来，事情已经过去 42 年了，提起这件事，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为说明这批文物的情况。现将有关文字摘编如下，以便了解古人在良乡生活的情景。



元代窖藏：白釉黑花罐

窖藏都是生活实用品，分为瓷器、铁器和铜器，瓷器有 35 件，多数是盘、罐，其次是瓶。先说几件瓷器，影青印花盘：有 5 件，形状、大小相同，都是敞口，小圈足。口径 13.2 厘米，高 4.3 厘米。胎较薄，表里都挂全釉，盘里部有印花缠枝花纹，盘底外部用墨笔书写一“会”字。白釉黑花罐有 3 件。形状基本一样，但大小不等。直口，丰肩，腹内收，凹底，口径 7.5—15.8、高 11.7—18.6 厘米。釉乳白微有光泽。三罐外部通体为花草，其中一件底部有墨书的“刘定安”三字，字边有一墨书押记。黑釉罐 3 件，可分大、中、小三种，大者短颈，圆肩，



元代窖藏：白釉梅瓶



元代窖藏：磁州窑双凤罐

腹内收，凹底。口径 19.5、高 20、底径 18 厘米。近底处露白胎，未施釉。中者直口，圆肩，小凹底。口径 15、高 19.4、底径 9 厘米。小者口小，小凹底，圆肩鼓腹。口径 6.5、高 13.5、底径 7.2 厘米。白釉梅瓶 3 件。两件较大，一件较小。较大的两件釉灰白，平底；其中一件在肩部有“内府”二字。口径 5.5—6.6、高 33.5—35、底径 9.5—11 厘米。

较小的一件，凹底。口径 5、高 28.8、底径 11.2 厘米。釉色纯白，微有光泽，肩部有一破釉露胎有一“刘”字，口施酱釉。白地黑花双凤罐 1 件。直口，圆肩，鼓腹。口径 18、高 38 厘米。釉乳白。肩部有菊花纹一周，近底处有弦纹三道。腹部有展翅飞翔状的二黑凤，凤为鸡头、鹰嘴、鳞身、花尾，两凤之间有祥云六朵。黑凤刻画逼真，形象生动，是瓷器中较精致的一件。

再说铁器，有 12 件。分为食具、饮具、工具。食具：有双耳锅 2 件。一件较大，缺一耳，平底。口径 39.5、高 5.8 厘米。另一件较小，两耳尚存，亦平底。口径 31、高 6.6 厘米。以上两件，烟熏痕迹较重。圆形铁锅 1 件。器身附六平撩（亦称六絮锅），现仅存一。口径 36、高 21.5 厘米。此件铁锅与辽宁绥中县城后村



金元遗址中出土的大铁锅和大铜锅形状近似。饮具有三系耳铁壶 1 件。腐蚀较重，体呈圆形，前有一微曲的壶嘴，有盖无把，肩部有三个对角的半圆形系耳，用以穿绳提之，通高 16 厘米。工具：有弯把铁铲 1 件，铁勾子 1 件，木把铁穿子 1 件。

最后说铜器，有 4 件。方格圆点纹钟 1 件。上有一半圆形钮，高 13.7 厘米。小铜铃 1 件，无纹饰，高 8.5 厘米。菱花铜镜 1 件。中有一钮，四周为缠枝花纹，直径 12.2 厘米。铜釜 1 件。下部已残缺，后用铁修补，尚存三短足，口部稍下有一圈凸起的棱。口径 23、高 16 厘米。



1054 元代窖藏：铁锅

窖藏出土的钧釉瓷盘，是元代的典型器物。其他瓷器，如罐、梅瓶等，胎骨厚重，形体亦较大，釉多不施到底，具有元瓷的特点。有的



瓷盘底部有墨笔书写“兀刺赤王会”字款，也有光写一“会”字的。从瓷器的造型和“兀刺赤”字款来看，这个窖藏的时代为元代。可能这些器物不是一人所有，只是后来到了一人手里埋于地下。翻阅史书兀刺赤为之对音 ulachi, ula (兀刺)《华夷译语》鸟兽门译为驿巴。chi (赤) 为所有者或所掌者之意。《华夷译语》人事门译兀刺赤为马夫。故《(幽闺记)十番鼓儿前腔曲云：“兀刺赤，兀刺赤，门外等多时，缁辔加鞭，心急马迟。”又《元史》卷九九兵志：“典车马者曰兀刺赤、莫伦赤……天子左右服劳侍从执事之人。”可知兀刺乃指管理驿马者，亦即驿站中之小吏。

《永乐大典》卷 19426 “驿站”条引《析津志》“天下站名”条云：自大都往西南七十里第一站即良乡。今之良乡县城为元代之旧城，所以，很可能这个窖藏就是元代良乡驿站的小吏所埋藏的。同时，也可推知元代良乡的驿站就在良乡县城南门内路西。这个窖藏的位置，地处良乡，正是当时元大都的近畿区域。

# 山村草台演话剧

姜玉卉

一般地讲，演话剧得有一定规模的舞台、灯光、布景、道具等条件。在山区农村临时搭个席棚似的草台演不了话剧。可我曾目睹家乡草台演了话剧，还是北京城里正宗的话剧团演出的，那是在1956年的秋天。

我的家乡在京西百花山麓，大石河畔的佛子庄村。1956年暮秋，除了柿子没摘，地里的大秋作物基本收完了。一天放学，我听街上人说，北京城里的京班大戏要来村演出，正搭戏台呢。原来这次全乡十几个村的人都要来看戏，因为人多操场小，要在村西日本时期建的高线站遗址旁的大沙地搭台。在村西，果然有许多村民热火朝天地忙乎着，整个村庄洋溢着快乐的气氛。

村里每年都唱戏，除本村评剧外，房山县评剧团、北京评剧团、北京京剧团都来村演出过。每次最高兴的是孩子们，乐得跟过年似的。有的连饭都顾不得吃，老早地搬凳子到戏台下占地儿。至于唱什么戏，演的好坏不管他，就为凑热闹、乐和。跟鲁迅小说《社戏》中描写孩子们在戏台下听戏的情景非常相似。

山村戏台的环境、条件是非常差的，最影响唱戏效果的是晚场照明设备。当时，山区还没有通电，农民家里点的是煤油灯。戏台用的是煤窑里照明的电石灯，用一会儿就要补充水。演员在台上唱着戏，电石灯嘴的火苗越来越小，台上越来越暗，服务人员就得上台把席棚顶上的电石灯摘下来，把电石粉末倒掉，重新放入电石，冲进水，点燃后再挂上去。

后来，有了气灯，比电石灯亮，但隔一段时间也要摘下来打气，一场戏下来也得要折腾几次。因为台小又矮，有一次电石灯的火苗还把演员的长翎子给燎了。演十八罗汉斗悟空，悟空的金箍棒碰碎了气灯的石棉网，引得台下一片惊呼。

第二天到校后，老师告诉不上课了，和中学师生一起到村东路口迎接剧团。于是我们排好队，手拿三角形色纸旗，一路欢笑一路歌，来到河滩的石子路。列队两侧，盼望着东边山弯处有汽车开进来。

临近中午，除了见到几辆拉煤、拉秋粮的马车外，连汽车的影子也没见到。当时连电话也没有，县里、剧团都联系不上。两位中小学校长一合计，各自把队伍带回去。

傍晚，我刚端起饭碗，就听到汽车的马达声。我赶快放下碗筷往街上跑，见三辆汽车向村西开去，在戏台前停下。一辆大轿车是拉人的，两辆拉道具。村干部组织村民帮助卸车，我发现往年的剧团有很多又高又大的戏箱，这个剧团没有，只是几个演员拎着手提箱，多的是一擦擦的画着房子、树、碾子等大峡的布景，心里想，这回演什么戏呢？

一边卸车，剧团领导一边对村干部说，他们从京城出来，一路向西南周口店开去。当时周口店比房山县城的名气大。但周口店具体在哪也不知道，演出地佛子庄在哪也不清楚。结果，车从南尚乐开向了河北省，觉得不对劲，下车一问，才知走错了路，在文化站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才找到佛子庄村。虽然坐车颠簸了一天，演员们精神饱满，情绪很好。村里象往年一样杀了肥猪，这次还添了一只羊，热情地款待剧团。

饭后，天渐渐黑下来，发电机一起动，台上的灯立刻亮起来，大喇叭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平常寂静的山村立马沸腾起来。因乡政府向所辖各村做了动员，十里八村的百姓三五成群地来到戏台前，几千双企盼的目光投向台上绛紫色的大幕。台口上方的横梁上八只黑色的水桶般大小的专用灯斜挂着，从下口射出强光照在大幕上，突显浓艳、靓丽。

三通锣鼓后，戏幕向两侧拉开，大戏开演。可等来的是一声哨响，没有锣鼓，戏幕拉开，呈现台上的是亮闪的灯光照耀下的房屋、篱笆墙、碾子、井台、牲口棚、柳树等，和村里的景象差不多。人物出场也不唱，说的话和村民一个样，衣着打扮和农民一样，头上扎白毛巾，蓝便帽或光头。身穿青蓝对襟褂子，脚穿圆口布鞋，还有背枪的民兵，演的就是当前合作社的事。原来就要演出的是当时还不被农村了解的话剧。

这次在家乡演的话剧是独幕话剧，剧团是为了配合农村合作化运动进行政治宣传，宣传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我还能记得剧情：坏分子在合作社的田里偷偷地埋一块大石头，耕地时，犁铧被石头打碎；地富分子在牲口喂料槽里放有毒的豆饼，企图毒死集体的牲畜；有的贫雇农因天灾病祸又失去分得土地，教育农民只有走合作化道路，跟共产党走才能彻底翻身，过上好日子。那次话剧团下乡演出，政治意义突出，体现文化艺术为政治服务，文艺工作者走与工

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践行。

由于当时农民对话剧这种艺术形式不熟悉，欣赏不了。多少年来，农民看惯了传统的古装戏，从来没看过话剧，对话剧一点知识也没有，有些欣赏不了，但毕竟是农村少有的热闹场景，都给予热情地捧场。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电影、电视、广播的普及发展，人们对丰富多彩的艺术欣赏能力逐渐有了提升。但五十多年前家乡唯一的那次话剧演出，却深深的印在脑子里，成了永远的记忆。

# 刘平庄“李记盆窑”老字号

唐占忠

刘平庄村今属房山区窦店镇，地处平原，交通便利，早年间“李记盆窑”老字号就落生此地。

“李记盆窑”老字号创建人叫李长贵，祖籍河北省衡水，生于清咸丰年间。他从小家境贫寒，16岁随父母逃荒走到保定北徐水，父母因冻饿死于荒野，他掩埋了双亲后继续北上。17岁来到刘平庄村给地主扛活。村里好心人看李长贵为人忠厚、心灵手巧，就给他介绍了一户人家的独生女为妻。婚后二人相依为命，发现村周围是胶泥地，于是便把老家带来的祖传烧窑手艺施展开来。在村南买了四亩地作为场地，夫妻俩起早贪黑打土坯。后盖起五间简易房子，建起一个盆窑，购置了一些生产工具和材料，“李记盆窑”便随之开业了。

## 盆窑及设备

泥盆的原材料主要包括胶泥土、红土、铜和铅、煤和木柴。

场地和盆窑是用一亩地整平后，建好库房、胶泥池子和盆窑，余下三亩为料地。

在平地上用土坯垒起地面直径5米、高7米、皮厚70公分、从底往上逐渐缩小，到顶直径4米的圆窖，正南方向建窑门高1.7米、宽1.5米（为装和烧窑用）。窑门正中间往里伸进长2米、宽50公分的地沟，上边安置铁笼子（用以除废渣和炭火）。从窑门左侧起，同外窑皮相连修建一条宽1米、35度斜坡道，盘旋到窑顶（为装、出窑用）；胶泥池子是两个容积相等并相连的池子，一高一低，相连处高者留有出口（此处有竹蓖子挡着）。

生产工具主要包括：

**铁钩子**：烧窑时通火、去渣用，长2.5米。

**稻草圈**：用于垫盆，防止碰坏。

**铁挠**：用于挖泥、锄泥、和泥。

**铁耙**：用于搅拌胶泥。

手推独轮平板车：运送泥土和泥盆。

**刷子**：用于往泥盆上刷颜料。

**铲子**：用于铲去轮盘上残存的泥土。

**碾子**：即药房研药脚踏式的碾子，用以碾碎铜、铅颜料。

**水桶**：担水用。

**喷壶**：和泥时，少量匀洒在泥土上边盛水用的壶。

**木板**：一块长宽各 3 米、厚 4 公分的木板，用以在上边脚踏和泥。

**轮盘**：两个同样的木圆盘，直径 90 公分，厚 4 公分。边缘有槽沟，用皮带将两轮盘间隔 2 公分衔接，盘底下固定在安有轴承的架子上，其中一个盘边沿处安有一根直径 3 公分、长 1.5 米的垂直木棍，上端用绳子扎牢，系在房梁上。

### 泥盆制作和装窑烧制过程

泥盆的制作主要有下述过程：

先将胶泥土用推车运到池子旁后，锄进高池子，用出口蓖子挡好，担水放进池中，用铁耙搅合使其成粥浆，净化后提进蓖子挡板，使胶泥水流入低池子里，让其进一步净化、干化。

将纯净干化的胶泥从池子里取出，用推车运进屋，倒在地面上堆积“发省”（发酵），使泥性柔和，时间为二至三天。

将柔合的胶泥放在木板上，用脚反复踏和，如果泥还发硬，可用喷壶洒水，使其成为轮盘适用的泥土。最后将和好的胶泥放在轮盘上。

然后。一人摇动一个轮盘上木棍（呈偏心式运动）带动另一轮盘转动，另一人将盘上胶泥弄成盆底状，然后随着轮盘转动，双手逐渐将泥土上提。当有盆形时，一手在里一手在外继续随轮盘转，使盆壁厚和盆沿适宜成形后停止转动，双手轻轻将盆取下放在屋地上晾干。转盆过程中，如果泥粘手，可在旁边放盆水蘸手，借此使手润滑。此过程每天一个轮盘可出直径二尺八寸的头号盆 80 至 100 个。

泥盆晾干两天后，用刷子将红土调成液刷在盆上，着红后待装窑和烧窑。

装、出窑和烧窑的过程如下：

将刷好红粉的泥盆运到窑门取下，在窑里一层层放好。第一层盆底着地、口朝上，第二层口向下，与第一层盆口吻合，以后类推。当装到跟窑门等高时，

再从窑外斜坡道上搬运，由窑顶往里放，直至装到窑顶盆底朝上，在其上边用土封窑顶，中间留一个人头大小的出气口（即烟筒）。

窑装好将门用坯封上，留有烧火口。以煤和柴为燃料点火烧，使温度保持1千度左右，烧15个小时，一窑盆则烧成。每窑一般烧500套，一套为4个盆。

出窑时，先打开窑门，扒开窑顶，从上边一层层将盆取出来。再将每层用稻草圈垫好以防碰坏，堆放好在场地上以备出售。

瓷盆烧制需两遍过程。头遍是装窑后烧7小时温度是1千度，盆子烧至半成品退温后取出，用刷子将铜、铅碾碎的混合粉制成液体涂在盆上。第二遍是将着色的盆子再装窑烧上10个小时，这时绿色瓷盆便烧成了。

烧盆的种类大小不等，大的口径二尺八寸，小的十公分，以上是轮盘法烧制出装窑的全过程，完全是手工制作。

李长贵夫妇生有二男三女，长子李振海、次子李振江，二人从小跟父亲用轮盆法烧窑。李振海生有五子，时下称其“盆窑五虎”。祖孙三代人强马壮，四十余口自食其力，窑业活计蒸蒸日上。到解放前，又从庄头村买下19亩胶泥地，库房增占18间，购置车2套，增建两个窑及其它生产工具。当时，“李记盆窑”的产品在房山、良乡、窦店、坟里、南尚乐以及固安县的官村、大兴县的庞各庄等地销售，供不应求。

解放后，“李记盆窑”转归集体，为良乡供销社下属南召盆业社所属，盆业社生产的泥盆属统购统销产品。“文革”期间，泥盆生产被视为“四旧”，“李记盆窑”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 昊天塔下的“元九”庙会

张广明

做为良乡历史上标志性建筑的昊天塔（又称“多宝佛塔”）通高 36 米，为 5 级楼阁式空心砖石结构，始建于隋，修于唐，现存的昊天塔为辽代建筑。据说当初建塔，除为了密藏佛舍利外，还被用作军事意图，可以登高瞭望，观察敌情。

昊天塔前，原有一座寺庙，座北朝南，名叫法象寺，传说该寺与塔之间底部有暗道相连，当年香火不断，善男信女烧香敬佛者络绎不绝。但由于年代久远，战乱频繁，该寺于上世纪 50 年代初已荡然无存了。

随着时代的变迁，昊天塔早也失去了军事作用，并逐渐的变成周围百姓登高赏景、祈福纳祥的地方。从清末民初到解放前，每逢农历正月初九到十九，人们便三五成群的聚集在这里或礼香拜佛，或绕塔求安，或登塔远眺。小商贩们也随之多了起来，卖香蜡纸马的，卖各样玩具的，卖应季吃食的，耍把式卖艺的，一时热闹非凡，自然形成了庙会。良乡人称之为“逛元九”。

旧时过春节，从初一到十五都有庙会，为什么这里的庙会，从正月初九延长到十九呢？除了因正当农闲季节，人们有工夫闲逛，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普遍认为九字吉祥，从初九到十九象征着步步登高。还有一个说法，正月十九是旧京的“燕九节”，“七九河开，八九燕来”，是迎春的意思。

昊天塔下的“元九”庙会之所以吸引人，还因为它极具特色。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应有尽有。庙会上有卖一种特产的玻璃制品，名叫“朴朴噔”，紫色，形状如葫芦，底部是平的，很薄，有细长把儿，嘴对葫芦把，嘘吸轻吹，葫芦底就凹凸颤动，发出“朴朴噔，朴朴噔”的声响，很有趣味。另外还有一种，也是玻璃做的，细长的玻璃管，嘴小口大，似喇叭，俗称“牛鼻子管”，吹这种管要憋足了力气，发出“嘟嘟，眸眸”的声音。像古代的号角。这两种玩艺，在我小的时候，都从庙会上买过。

风车也是“元九”庙会的一景。这是地道的农民手工制作的民俗工艺品。五颜六色，大小不一，从一轮、两轮、三轮到几十个轮子。风车的骨架是用高



梁杆扎成的。风轮用廉子棍、彩纸条串连中间的小鼓，小鼓是用胶泥做鼓帮，牛皮纸蒙鼓面，别上两根小竹棍，风吹力带动轮子旋转，拨响小鼓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给人们带来无限欢乐。遇到风大的时候，庙会上的风车一齐响动，连良乡城里的人，都听得真真的，招惹得孩子大人不由自主地要去庙会上逛逛。

在“元九”庙会上，摆摊设点的商贩，五行八作，各显神通。尤其以卖大挂山里红的招人：山里红早先是南尚乐、镇江营一带的特产，个大，红润，酸中带甜，物美价廉。卖山里红的多数是当地农民或小贩，他们卖山里红不用秤，而是拣几十个大而圆的红果用小线穿成一圈，套在脖子上或在手臂上挂着做幌子。买的人不论大人孩子，也多挂在脖子上，好像一串串大项链。买的卖的都透着那么兴高采烈，如同过节一般。

庙会上，卖糖葫芦的与卖山里红的有异曲同工之妙。短的有一尺，长的二三尺，有粘冰糖的，有挂糖稀的。除了红果的，还有海棠、山药的。举着大糖葫芦走在良乡大街上都知道是逛“元九”买回来的。

庙会上还有卖年糕、切糕的，这是应景应季的吃食，隐喻着老百姓丰衣足食、生活步步登高的美好心愿。在良乡城内，有一户回民家做的年糕特别好。小枣豆沙的，粘甜可口。另外，还有“艾窝窝”堪称一绝。除了这些特色外，庙会上还有卖绒花、小金鱼、核桃、栗子、松子、梨干、杏干、花生糖的等等。

当时有民谣赞良乡的“元九”庙会：“良乡塔上站一站，风车吹的团团转。山里红串成大项链，步步登高一大片。”

# 顾册村的庙会与花会

张玉泉

## 庙会

顾册村庙会的节日有三个：农历三月初三春会、农历二月十九菩萨生日庙会、农历六月初六道士晒袍会。

三月庙 在玄应观举办。自农历三月三日到三月五日，为期三天，是房山境内规模最大、最热闹、参与人数最多的一个庙会。其内容一是进香朝拜，二是走会演戏，三是贸易交流。这三天进香者上供朝拜的人全部拥进玄应观内及周边的寺庙里，佛道及各路神仙集中的地方，人们摩肩接踵拥挤不动，香火烟雾弥漫了整个寺观的上空。这三天是观里老道们最繁忙的日子，所有的庙门昼夜敞开接待香客，香火不断。

每次庙会还要走花会。花会最多是民国二十六年，约有十三四道，都是四方十里八村的。据老人们记忆，有房山南观的杠箱会、铜锣会，长沟峪的高脚会，娄子水的高跷会，周口村的少林会，支楼的大鼓会、牛头会，吉羊的叉会，大次洛的叉会，天开的太平鼓子会，苏村的小车会，下坡店的旱船会等等。花会大部分是自愿来的，小部分是邀请的。都没有酬劳，甚至连饭都不管。

此外庙会上还有两台大戏对唱，一台是本村剧团在火神庙的月台上唱，全是评戏；再一台就是琉璃河兴礼的剧团在本村戏楼上唱。戏楼前搭上席棚，留下出口卖票入场。节目很丰富，文武戏都有。如《继母娘打孩子》、《五鬼捉刘氏》，都是哈哈腔调。还有京剧、河北梆子，主要戏目有《打金枝》、《大登殿》、《蝴蝶杯》等等。看戏的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看什么就去看什么。白天没工夫，可以看夜场。看到精彩处常常爆出喝彩声。

庙会上进行物资交流的摊位不下千余个。他们头三天就来占地、搭棚。卖的货物一应俱全，以戏楼为中心，东侧是卖杂品的，如卖柿饼的，卖糖葫芦的；戏楼西侧是卖小吃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说书的。说到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停下向周围群众敛钱。戏楼北侧搭长棚摆上长桌子是茶舍、饭店。跑堂

的报着各种茶名，唱算饭帐声常常吸引逛庙的来吃。再往北是妇女用品，如梳子、篦子、针头线脑之类，还有小孩子玩具。玄应观四面围墙上挂上黑绒布，上面别着各种绢花、绒花卖；戏台西北是摔跤的、耍猴子、训熊的、修脚的、卖艺的、套圈儿的、跑马戏的、卖炸货的；戏楼往南是卖编织的，有背筐、绳套、马车上的用品，还有各种农具如犁、耩、耙、锨、镐、锄、杈子、筛子、簸箕、扫帚等。再往西还有卖苇席、竹篾、炊具、炉具的。三条大街真是车水马龙，喧嚣鼎沸，不绝于耳，热闹非常。

民国二十六年的那次庙会最热闹。这年顾册村所有庙宇都粉刷一新，庙会的组织由村里成立管理委员会，成员由庙观住持、村政、大商号掌柜的组成。管理委员会还负责接待、治安、巡逻等事项。

**二月庙** 农历二月十九日菩萨生日会，在白衣庵庙举办。届时在白衣庵庙前开阔的地上，搭上席棚，支上几个大灶台，安上大锅，锅上放压饸饹床。

这个活动简单明确，即全村老幼为庆祝南海大世菩萨生日，自己带上碗筷，到庵前排上长队领压饸饹吃，一碗不够可再盛。从早上开饭一直延续到下午。压饸饹是纯白面的，豆腐条或油条打卤，菜码子是绿豆芽或大白菜。

当时本村有个著名的拉面手叫郑德海，还有个叫赵凤山，都在外面饭馆里耍手艺，这天也特意赶回家，为乡亲们献艺。

这笔费用的来源一靠庙里的布施，二是村民的捐助；有钱的出钱，有面的出面，有菜的出菜，不够时由当地商号和本村财主自愿分摊。

**六月庙** 农历六月初六道士晒袍会，亦在北极玄应观举办。这个节气天气干爽，届时北极玄应观里的老道们出来晾晒道袍，玄应观门外拉上几道绳子，道士们把收藏的库里的所有的道袍、道服等全都拿出来放在绳子上晾晒。

然后所有师徒们拿着笙、箫、管、弦、云锣等乐器在太阳底下弹奏乐曲，尤其是玄应观里的云锣最动听，乐声能传出三四里之外。这个音乐会常常把附近百姓招来欣赏，围得水泄不通。

在晾衣之前，他们先到火神庙后面的冰雹殿里给冰雹神烧香、跪拜、祈求冰雹神显灵，给个晴朗的好天气，同时也为百姓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个庙会实际上是北极玄应观老道们举办的音乐演奏会。

## 花 会

顾册村的花会比较活跃的有三道。有香锣会、礼佛会和纱灯会。

**香锣会** 俗称炒子会，大约成立于上世纪 20 年代。由三十多人组成，主要负责人是肖八。他在外边打工时学过一些打击乐器，回村后就组织起一班人马自掏腰包买乐器一起练。

香锣会主要的打击乐器有大镲、小镲、大铜锣、小铜锣、大钹、小钹、唢呐、堂鼓，还有铙等。其乐谱除向外人学来之外，自己还创作部分，音域高亢。

香锣会的主要活动一年出会三次，第一次是农历五月初五，是娘娘出去避暑的日子，香锣会要去北大庙后殿的娘娘庙里请出娘娘去避暑，即先上供、烧香、叩头之后，把娘娘从特制的佛龕里请出来，换上夏装，再放进轿子里，轿子由四人抬着，轿杆两侧有两位老太太护卫，老太太手持各种鲜花，给轿子上也插满了鲜花。香锣会在前边伴奏开道，每经过村里一座庙前都要停一会儿，烧柱香再走，直送到后街村东的驾宫里为止，再把娘娘请出坐在佛龕中。驾宫是玄应观的老道为娘娘特意盖的一座庙，一个院子有三间大北房，正中放着佛龕。西侧放着轿子，东侧放着刀、枪、箭、戟、斧、钺、钩、叉各种武器。

香锣会每次出会走在最前边的是香头，他手拿一面三角形黄旗，起引路、指挥作用。一般由村中德高望众的人或有地位的人担任。按锣、镲、钹、铙、鼓次序双行排列。

香锣会的第二次活动是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娘娘避暑结束，接娘娘回宫，程序和做法与接时相同。娘娘入宫后，要把轿子送回驾宫存放，等待来年再用。无论接和送都十分隆重。都要先烧香、上素供。无论抬轿子的还是护卫的，人们都争着去干。他们认为这是很光彩很积德的事。接送娘娘的全过程都由香锣会的香头主持。

第三次是在每年的正月十五晚上的香锣会，主要活动是引领老百姓到各个寺观去进香，到街道各户门前和庙里散灯花，先去玄应观、贞武庙、娘娘殿，西边的火神殿、冰雹殿、鲁班房，再到东侧玉皇殿、白衣庵，还有南侧的老母殿、观音殿、兴云殿，在所有的神殿、庙观前走一遍后，再围村里转一圈，紧跟香锣会后的老百姓自带香火、供果，跟在香锣会后面，自己选择庙观，愿意到哪位佛道面前祈祷、进香、朝拜，就在哪儿停下。

顾册村的殿宇足有十几处，最集中最宏伟的是位于村北的北极玄应观，北极玄应观里自南向北供奉贞武大帝、四大天王和碧霞娘娘。东西两侧还有若干小殿。每年春节时有玄应观道士到各庙内去贴对联。

**礼佛会** 该会成立于清末。当时西坝的一位叫唐玉山的人在玄应观看门，一天菩萨给他托梦，让他牵头成立一个礼佛会，以便接待香客。于是他跟村里

有关人士一商量，大伙儿一致同意，便成立起来。会员有 30 多人，都是信佛的居士。

出会时每人必须穿蓝布大褂，挎黄色挎包，包正面有黄色“佛”字；礼佛会的会长，手持三角蓝布旗镶上白边，中间是个红色或黄色的“佛”字。平时主要任务是到各佛殿举行拜佛活动，如举办大法会等；另一个任务主要是顾册庙会时，或有重大节日时接待外面来的各家花会及香客。顾册村的三月庙会时，各地来进香的花会有十多道。礼佛会便引导他们从西坝进村，进村前先给他们下请贴，然后按先来后到的次序进村。各道会到庙里进香时也由他们领路到各殿，出村时由礼佛会相送。

**纱灯会** 每年正月十四至十六日举行。灯是照明用具，也是文化，它是人生美好的象征，除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灯以外，还专门有相约成俗的灯节灯会。通过灯让人们享受艺术。正月十五观灯，成为一种风俗。从顾册村东头直到西坝，又从西坝到后街，两条主要街道每隔七八米挂一对灯，共挂四百个纱布做的灯笼，每个纱灯高约 60 公分，宽约 45 公分，用白纱布围好四面，里面插蜡，四个纱面都画上连环画儿。连环画儿的内容主要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的情节。每盏灯四幅画儿，共有 1600 个画面。每天夜晚吸引着全村老百姓簇拥到纱灯下挤着看故事。纱灯会集观赏性、趣味性于一炉。

纱灯会的主办者是顾册村财主“斗子李”家出钱顾木匠、糊匠和画匠做灯。每年到时候拉绳、挂灯、插蜡等一套组织管理工作都由李家派专人负责。他们把此项活动当做一项慈善事业来办。

纱灯会从清末延续到民国中期。“七七”事变后，活动停止了。

# 一部民国十三年《良乡县志》

张广明

最早记述北京历史的地方志书，要数元代熊梦祥编纂的《析津志》。但现在仅存的不是原本，乃是现代人从《永乐大典》、《大元一统志》等书中，费尽心血辑录的，原本早已散失。

良乡最早的志书，当推《良乡县图经志书》为明隆庆二年良乡知县安守鲁和杨守正纂修的《良乡县志》，可惜在明末毁于大火。明万历年间由余镗纂修的《良乡县志》清初尚存，康熙之后失传。仅存郭秉聪序。清康熙十二年（1673），由李庆诂（良乡知县）修，张璟（良乡举人）纂，八卷本，残存七卷的《良乡县志》，全国也仅存一部。光绪年代由陈崑（光绪六年任良乡知县）重修《良乡县志》，亦因“良乡涝灾，洪水漂没衙署册卷，以至所有案牒，断然无存”。由此可见，对志书的收藏与保管，实属不易。

据今离我们最近的一部《良乡县志》，修于民国十三年（1924），是现今能查到的较完整的一部，在首都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均有馆藏，但在民间已属凤毛麟角。

1982年，这部修于民国十三年春月的《良乡县志》，在良乡曾经出现过。这是城内西街薛氏所藏原本民国十三年《良乡县志》。这部县志的督修为良乡县知事周志中，总纂修为本县人吕植、见之深，分纂修为吴士杰、游从仕、魏士儒、吴士英、吕蕴华。以上这些都是良乡的知名人士，现知其身份的有三位。

见之深，本县夏庄村人，拔贡出身，后搬住城内，曾任良乡第一任小学校长。魏士儒，为良乡管学校的教谕，类似教育科长。

吴士杰，清举人，其子吴景周，曾为良乡中学教员，其孙吴祥祉，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良乡中学教员，房山师范学校副校长。

当时筹办这部《良乡县志》的共有十二个人，其中参加校对的有六人，编纂前期采访各界人士四十五人。全书共八卷，线装，保存完整。

在这部民国十三年《良乡县志》的序言里，有这样的介绍：良乡县志最早写序者为明朝翰林郭秉聪，时在嘉靖三十七年，其次为康熙十二年癸丑知县

李庆祖，康熙四十年辛已知县杨嗣奇，光绪七年知县陈崑，光绪十五年知县范履福等。这就把良乡县志从创修到重修，续修以年代顺序连接起来。

据史料记载，最早为良乡县志写序的郭秉聪，字子愚，为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历任工部员外郎、光禄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等，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学者。他认为良乡乃“畿辅首县，地处要冲”，在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时候，系统地修志是很必要的。于是他锐意创修，聘请乡人，旁询故老，博取群书，收集资料，只用三个多月，即告修成。这是最早的良乡县志序，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这部民国十三年（1924年）的《良乡县志》第一卷卷首，对良乡的历史沿革及县名的由来都有详细的记载：“昔日贤者或迴车于胜母，或急軫于朝歌，谓名实之不相远也。吾乡以民物俱良得名，而汉凡几革沿而迄今，仍厥始称于以首善伟矣。”这里细读有两处区别于前，一为过去常用“人物俱良”此处为“民物俱良”；另一处是提出了从汉至今良乡都被作“首善”之区。

关于良乡县城，在这部县志里，有较详细的记载：城墙周长一千三百丈，计七里三分，高三丈，底宽四丈，顶宽二丈。原系土城，明隆庆年（1567）知县安上达详请官帑治壁易灰加高至三丈三尺。城门有四，西门缺甕。并记录了“光绪庚子八月，拳匪义和团占据城中，联军来攻。从燎石岗轰以巨礮，城逐陷，拳匪半遭屠杀，良民被害者亦多”这一事实。

关于名胜古迹，多有记载，却不详尽。但对城内孔庙（现拱辰南大街路东，原良乡中学内）有大成殿遗址，记述较细。该孔庙建于明万历五、六年间，知县洪一漠修。从清顺治到光绪都有补修。进孔庙大门，中间有牌楼，称“棂星门”。东西两旁有侧门，东侧门上横书“德配天地”，西侧门上横书“道冠古今”。院内松柏长青，肃穆幽静。大成殿，正位崇祀至圣先师孔子。

良乡的另一处古迹多佛宝塔（良乡塔），据县志所载为隋代所建，唐尉迟敬德重修，故有“寥寥一塔自隋唐”之说。记述虽然简略，但历代咏燎岗古塔的诗词被县志所载却有六首。现摘录两首如下：

#### 燎岗古塔

陈璠

偶因访古上高岗，远映斜阳塔影长。  
 隐约重楼出云外，玲珑七宝雾中藏。  
 昔年题咏邀词客，今日登临礼梵王。  
 果是真身埋舍利，浮图千载历风霜。

燎岗古塔

郭秉聪

燎岗突兀邑城东，古塔玲珑纵碧空。  
绝顶轻笼朝霭白，深林遥射夕阳红。  
北瞻皇极风云会，南望寰区雨露同。  
隋代至今留胜绩，登临惆怅忆前功。

总之，这部民国十三年纂修的《良乡县志》到今天已八十五年，我们真心希望收藏者能妥善保存，并发挥其史料的作用。



# 一支活跃在解放区的小学乐队

苏维斌

1945 年秋天，房山地区的形势很复杂，敌我双方斗争非常激烈。房山城关地区是国民党统治区，长沟地区是游击区，而张坊、十渡是解放区，隶属于晋察冀边区房山县二区管辖。

北白岱村是个普通的村庄，共有二百多户，人口约有一千五、六百人，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当时北白岱小学共有教师两名：苏凤鸣和我，学生约八、九十人。由于抗日战争中日军对我解放区实行“三光”政策，人民群众受尽了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了全面内战，群众生活更加困难。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并坚信这场斗争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这种革命精神的激励下，大家积极参军、参战，抬担架，送公粮，儿童团站岗放哨监视敌人，妇女做军鞋支援前线。在文艺宣传工作方面也是搞得轰轰烈烈，演戏、唱歌、跳舞、扭秧歌、打霸王鞭等。这时苏凤鸣觉得学校要是有一支乐队那就更好了。但要组建一支乐队谈何容易？一无资金，二是即便有资金也没处去买乐器。因解放区没有乐器店，就是国民党统治区小的城镇也没有，必须到大城市北平市去买。即便就是有卖的，买回来也无人会用，到底怎么办才好呢？

经过反复考虑，觉得要想把这件事办成就必须下定决心，克服困难，发动群众，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首先，苏凤鸣找到村中时任党支部书记周玉清、村长蔡春山、游击组长韩俊恒等人，并与其说明了我们的想法，当时他们均表示要给予大力支持。经讨论决定，召开群众大会，向大家说明组建乐队的重要性，并号召大家捐粮、捐款，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粮。大家听后非常高兴，都表示坚决支持。会后共捐粮约六千斤，还有少量的边区票。这就更增强了我们把这事办成的信心和决心。

资金有了让谁去买呀？想到最合适的人选就是赵海、贾让二人，因他俩经常外出做买卖，见多识广，跟他二人一说，他们愉快的答应了，并表示：这是

为村中办的一件大好事，有多大的困难也要克服，一定要把这事办好。可当时解放区流通的货币是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到国民党统治区不能用，还必须把收到的粮款变成核桃、花椒、杏仁等山货，到国民党统治区卖了，变成国民党统治区通用的货币，才能买回乐器。于是就把收到的粮款交给他二人办理。没多久就把乐器买回来了。共买回大铜鼓一个、小铜鼓四个、铜号六个、笙两个、横笛六个、铜镲两个。然后根据学生的年龄大小，身材高矮，个人特长确定乐队人选。记得打大鼓和打镲的是：苏立文、苏维臣、韩林、苏广明；打小鼓的是：周志坡、王德存、苏维义、赵河；吹号的是：贾生、贾才、王德林、苏广江、韩跃恒、苏广来；吹横笛的是：苏广秀、周喜荣、苏维连、郭有生、韩兴、苏广红；吹笙的是：王德山、韩学仁、韩希。

乐器有了，乐队的人员也定了，找谁来教呢？后经研究请邻村南白岱的王力生教吹号，因他在伪军中当过司号长；请房山县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贾鸿明教横笛，当时他正在我村下乡，不但会吹而且水平很高；打鼓和打镲请的是蔡庄村的黄桂英，吹笙的由苏凤鸣先向老师学，然后再教学生。老师认真教，学生努力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锻炼，这支乐队就能奏一些曲子了。记得鼓号的曲调主要是：《接官号》、《八步紧》、《一老调》等。笙和笛子的曲调主要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大生产》及当时流行的一些歌曲。

由于当时处于战争年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需要及时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为使广大干部群众提高认识，正确贯彻执行，房山县人民政府经常在张坊地区召开由各村干部、群众、学生参加的集会，每逢重大节日的庆祝，各校进行体育竞赛，重要领导人逝世都需举行集会，其中大会议程中有一项就是奏乐，也都是由我校乐队担任，有了这样一支乐队使得大会开得更加隆重，增加会场气氛，革命精神更加振奋。

1946年4月8日，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谈判结束后，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和刚释放的叶挺以及在重庆的邓发等17人乘飞机返回延安时，在飞行途中撞在晋西北的黑茶山上，造成飞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房山县人民政府为缅怀这些领导同志的丰功伟绩，学习他们为党、为人民贡献一生的革命精神，决定在南白岱南河滩上举行追悼会，为此次追悼会奏乐的就是我校乐队，使得追悼会更加庄严肃穆。

学生外出参加集会时，通过村中主要街道，鼓乐齐鸣，群众自动出来围观，队伍行进时也必须踩着鼓点走，显得格外整齐和精神，学生家长也为队伍中有自己的子女感到非常自豪。有的说：“咱们的学生外出参加活动边走边奏乐，

真是又整齐又威风！”外村的群众看后也非常羡慕。

这个乐队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因国民党反动军队十六军、“暂三军”及房山的伪保安团经常到张坊地区进攻扫荡，党的各项工作经常不能正常进行，房山县人民政府及广大干部群众也必须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随时转移，因此学校也不能正常上课。在转移时也不便把这些乐器带走，就在慧化寺内（当时的校址）地炉子旁边挖了一个洞，暂时藏起来，以防敌人破坏。直至北平和平解放才又取出来，继续坚持了五、六年的时间。解放后，特别是 1952 年至 1953 年期间，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心情特别舒畅，对文化生活的需要更加迫切，把多年失传的旱船会又重新组织了起来，加上现有的秧歌队，经常在村中演出，以满足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要。一到春节，还到邻村和涞水县的龙洼村演出，队伍出发时，也是由这支学生乐队开道，依次是旱船会、秧歌队，街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群众，场面真是热闹非凡。

这段往事虽已过去 65 年了，但使我至今不能忘怀。此乐队建成，苏凤鸣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虽然也是一名教师，由于当时年龄较小（14 岁），能力差，只是在他的指导下做些具体的工作。回想当时解放区的群众，因为有一股革命的热情支撑着，虽身在苦中但不觉得苦，兴校办学的劲头非常高涨，宁可自己节省，也要挤出部分粮款支持组建乐队，更是难能可贵。

# 解放初吴庄村及附近教育情况回忆

刘树霖

1948年，家乡吴庄村解放后，我开始上学。那时我八岁，对当时及以后一些年吴庄村及附近的教育情况至今仍历历在目。

刚入学时，村里的学校是占了一家地主的三间南屋，共有三个年级：一年级、二年级和四年级。没有三年级。共有学生三四十人，学生年龄差别很大，我八岁，比我大好几岁的有好几个，也和我一样上一年级。二年级学生的年龄记不太清了，四年级的一共三四个人，最大的一个是十七岁。三个年级的学生在一个教室里上课，老师只有一个，上的是“大复式”：给一个年级讲课时，其它二个年级的学生自习或做作业，给一个年级讲完课再给另一个年级讲。这种“大复式”在当时也是普遍现象。当时我村小学归南梨园中心小学管。中心小学与所属各学校有什么事都是靠学生送信解决。可能当时我的学习不错，老师经常派我去其它学校送信。村南的小董村学校，村北的南坊学校和公主坟学校，我都常去送信，所以知道这几个学校也都是一个老师教的“大复式”。

当时上课的课本比较简单，我记得语文课还没讲到一半，整本书我和我的几个同学已经都背下来了。算术在教阿拉伯字码的同时也教中国小写数码和大写数码，还教罗马字码。因为当时农村识字的人少，教几种数码是为记账方便，教罗马字码是为了认钟表。除了语文和算术，其它副课如体育、图画、唱歌等上的并不多。体育是没地方上，图画和唱歌是因大附式不好上。但大字是每个同学每天必须写的，每天上学来了先写一张大仿纸十六个大字，老师每天还给判，写的好的字老师用红笔划圈，写的不好的地方老师划杠。同学每天上学来都要数谁的大字得圈多。

当时老师的工作和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几个年级一个人教，工作是很繁重的，白天教课，晚上不能回家，要在学校备课和判作业，吃饭也是老师自己做。

当时学生的文具也很简单，一年级学生不用纸和铅笔，用的是石板和石笔。石板是用青石板做成，长方形，四边镶上木框，可以放在书包里。石笔是一种比粉笔硬的天然白色石头锯开做成。与木筷粗细差不多。在石板上写字很方便，

写完后，没用了就擦掉。用了一段石板和石笔后才改用纸和铅笔。但买现成本的并不多，多是买纸自己订本，这样比较便宜，我记得当时有一种纸是七分一张，裁成 32 开，又便宜又好用，同学都爱买。钢笔在当时是稀罕物，一般学生是用不起的，我记得我和一些同学为解决买不起钢笔的问题，就自己用子弹壳装上墨水，按个高粱杆或其它东西做的笔尖当钢笔用，经常因为漏水弄得满手和身上到处是墨水。

在地主的南屋上了一年多课以后，学校搬到了村东的大庙里。两间东屋、两间西屋做教室，和西屋连着的一间是老师办公室兼宿舍。山门外是一个比较平坦的平台，同学们可以在那里活动和上早操。条件比原来稍好了一些。

1951 年上三年级时，我转到了大董村小学。那里的学生较多，一个年级一个教室。体育、音乐、图画等副科也能正常上了。1953 年四年级毕业，叫初小毕业，要考高小。当时上高小是有一定难度的。在我村附近高小很少：一个是东边距离六里的石山完小，一个是南边距离也是六里的南梨园高小，再有一个是西南方向距离 12 里的下坡店高小。当时，我村归河北省良乡县管。下坡店归河北省房山县管。我村在这几个学校上高小的都有。为了上高小，我先到下坡店高小报了名，参加了考试，据说当时是 8 个中取一个，我还考上了。但家里认为离家太远，不让我去。我又报考了南梨园高小，也考上了。我记得和我一起初小毕业的，有不少就没考上高小，有的第二年才考上，有的从此就不上学了。

和我一起在南梨园高小上学的有不少村子的学生，如十三里、大小董村、焦庄、南坊、北坊。还有当时房山县管的开古庄。

当时的学校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不受地域限制，考上哪里就可以在哪里上。如我村归良乡县管，下坡店归房山县管，我村学生到下坡店只要考上就可以上。南梨园归良乡县管，开古庄归房山县管，开古庄学生到南梨园上学也不受限制。还有，公主坟村小学归南梨园中心小学管，但公主坟学生上高小，多数是到石山高小。我村和南坊、北坊归南梨园中心小学管。但我村和南坊、北坊的学生有不少又到石山高小上学；二是学生自己解决吃饭问题，那时学生离家远的都是自己带干粮；三是隔村迈村上学比较普遍。如我村学生到南梨园上学要经过小董村，南坊村的学生到南梨园要经过我村和小董村，北坊学生到南梨园上学要经过南坊、我村和小董村三个村。焦庄到南梨园上学要经过大董村，我村到下坡店上学要经过大董村和开古庄两个村。到石山上学要经过小紫草坞和张庄两个村。南坊、北坊、公主坟的学生到石山上学也要经过小紫草坞和张

庄村；四是距离远多是步行上学，有自行车的非常少。如我村、南北坊、焦庄、大小董村和我一起到南梨园上学的只小董村有一个学生骑自行车；五是上学都是自去自回，没有家长接送。那时不管到哪个村上学，都要经过多年雨水冲刷的大深沟。冬天天短，早晨上学、晚上下学都要走黑路。

记得我上高小时，除语文算术外，还有自然、历史和地理，都有专门老师教，有严格考试制度，小学毕业升初中都要考。我印象最深的是：历史课讲的解放前上海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牌子对我幼小的心灵曾产生很大震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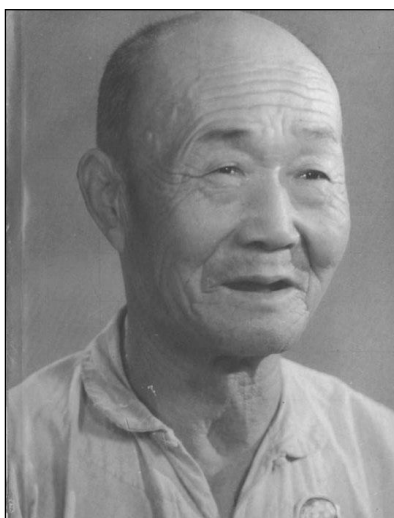
1955年暑假，我高小毕业。当时中学很少，我知道的只有良乡中学和琉璃河中学，房山县只有房山中学。中学招生数量有限，考上初中很不容易。高小毕业在那时可以算文化人了。那年考初中时我们一班三四十人只考上不到十个。

在我的印象中，我的家乡附近教育情况发生较大变化的阶段有这么两个。一个是1954年大董村有了五六年级高小，1956年北坊村有了高小，解决了附近不少村子学生上高小的困难，使高小基本得到了普及。另一个是1958年，良乡县和房山县合并划归北京市，在这年暑假成立了南梨园中学等一批中学，解决了不少高小毕业的学生上初中的问题，使初中基本得到了普及，家乡及全房山文化教育上了一个新水平。

# 吴春山纪念碑建造始末

白全永

在 2008 年第 5 期《中国老区建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陈淑静的文章《岗上青松吴春山》。文中写到：著名作家浩然曾经写过一部小说《金光大道》，书中塑造了一位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高大泉。书中很多故事情节取自北京郊区一个小村庄。高大泉是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吴春山的化身。如今吴春山已故去 20 多年，但岗上村的老百姓一直没有忘记他，在村头最显眼的地方为他立了一座雕像，并刻上了他的业绩。老百姓心中是有一杆秤的，干部真心为百姓办事，老百姓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吴春山像

文中提到的雕像就是位于房山区青龙湖镇岗上村西坡上的吴春山纪念碑。为了起到保存史料的作用，现将吴春山晚年生活、逝世前后及建造纪念碑的过程等一些资料，整理成此文以表纪念。

## 晚年生活

人们称吴春山为“老劳模”原因有两个：一是他被评为劳模的时间较早；二是他在众多劳模中年龄最大。吴春山因当年在家乡率先成立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一时家喻户晓。

多年来，吴春山带领岗上人自力更生，勤俭办社，搞多种经营。1979 年，由于他年龄过高，将近 80 高龄的吴春山退居二线，当了岗上大队的顾问。但他仍继续为岗上村的发展建设日夜操劳。每天早晨起来他总是先收听广播《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后，就拄着拐棍到村中的畜牧场、果园、大田去查看生产情况。为了壮大集体经济，在他的倡议下岗上村兴建了铸造厂和车床厂。吴春

山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将村内的青年送到兄弟单位去学习铸造和车床的技术。当时许多单位请他去做报告，他总是欣然前往。吴春山走遍了房山的山山水水，远郊、近郊的农村，城区的八大学院，许多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厂矿等单位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用报告的形式，教育人们应该怎样对待革命工作，怎样正确对待“文革”，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鼓励人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去奋斗。

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很关心吴春山的晚年生活。为了使这位老劳模安度晚年，1981年，县委、县政府在良乡西北关给他盖了一所新房。1982年春，吴春山与老伴董秀荣正式搬进新居，当年7月11日的《北京日报》头版还发表了宋成明的文章《老劳模的新居——访全国农业劳模、81岁的吴春山》，介绍了此事。当时吴春山还担任着北京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职务。吴春山因年老不能劳动了，但仍发挥着余热，用他的话说：“我为党干工作还干出瘾来了呢！没有够！我身体不成，就用嘴做宣传工作。跟老头一起聊天时，我就给他们讲形势，讲党的政策；跟青年人在一块时，我就常说，你们要好好干工作，听党的话。”吴春山身在良乡，却时刻牵挂着岗上村。在良乡大街，他一遇到崇各庄公社的人，总会上去打听一下岗上村的情况。他还曾多次跑回岗上，看看他日思夜想的家乡。

### 逝世前后

吴春山一直为党的事业和集体的发展操劳。临终前一天，他还在认真学习党中央的整党决定。1983年11月2日上午9点25分，吴春山因病医治无效，在房山县第二医院去世。据当时医院的死亡报告单上显示，吴春山的死因是：心脏病导致的呼吸循环衰竭。得知老书记去世的消息后，岗上村第一时间作了传达，大家无不深感悲痛。吴春山生前对自己的后事早有安排，为了不给政府添麻烦，他在岗上村坡头选择了坟地并提前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材。但当时按照上级统一安排，召开追悼会后，吴春山的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1983年11月8日，吴春山同志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市领导王宪、范瑾、韩伯平、林彤等出席追悼会，吴春山的生前友好、亲属和社会各界群众参加了追悼会。时任市长助理的张进霖主持追悼会，时任房山县委书记的李永芳致悼词。彭真、万里、郑天翔同志送了花圈。送花圈的还有：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市政协和市农口部、办、局；中共



房山县委、县政府和他家乡岗上村的社员；市领导赵鹏飞、张大中、王宪、范瑾、韩伯平、陈希同等。据参加过追悼会的吴春山生前老搭档，原岗上村大队长武凤讲：“因为吴春山最早是河北省的劳模，所以河北省也献了花圈。”当时《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多家媒体对吴春山逝世和召开追悼会的消息进行了报道。其中1983年11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全文如下：

**全国劳动模范吴春山逝世。**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全国劳动模范，原北京市房山县崇各庄公社岗上大队党支部书记吴春山因病医治无效，于11月2日逝世，终年八十三岁。吴春山的追悼会今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彭真、万里、郑天翔等送了花圈。

吴春山1952年在自己家乡带头办起了第一个互助组，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他是农业方面的“土专家”，有关部门曾专门总结过他的“骡马经”、“养羊法”、“造林经验”和勤俭办社的经验。

吴春山是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吴春山去世不久，中共房山县委于1984年1月8日做出了《关于向吴春山同志学习的决定》：“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县劳动英雄吴春山同志是我县干部的杰出典型，是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榜样。”决定号召全县开展向吴春山同志学习，特别是共产党员、各级干部要做学习的表率。

### 塑像立碑

1985年中共房山县委、共青团房山县委及崇各庄乡党委、当地驻军联合在岗上村为吴春山塑半身像立碑，以示纪念。

在塑像立碑选址过程中有一段小插曲。起初有两个方案：一是将塑像纪念碑立在岗上村大队部院内，因为这里是工作过的地方，人们办事来往也能看到。二是将塑像纪念碑立在村中最显著的位置西坡上，这里地势高，场地大，易于开展活动。经过充分讨论，最终选择了第二套方案，并决定将吴春山塑像纪念碑坐西朝东，叫老书记面向岗上村，注视着岗上村的发展。

1985年8月29日，吴春山塑像纪念碑落成仪式在岗上村西坡举行。北京市委“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房山县四大部门领导，吴春山的女儿吴瑞兰及崇各庄乡干部、群众、驻地部队指战员600余人参加了吴春山纪念碑的落成揭幕仪式。整座纪念碑分为两部分组成，上部分是吴春山半身塑像，白水泥材质，显得洁白伟岸。下部分是方形基座和台阶，均为砖石结构，外包水泥混

凝土压光。基座正面镶嵌汉白玉石一块，上面镌刻着“吴春山纪念碑”六个大字。

塑像纪念碑落成后，为附近各中小学开展课外德育教育活动提供了场地，崇各庄乡党委、政府每年定时在这里开展纪念活动。但经过近十年间的风雨侵蚀，到1993年白水泥像已经多处损坏，基座也开裂。1993年12月9日，岗上村经会议研究作出了修缮吴春山纪念碑的决定，并计划增建碑亭和事迹展室。1994年春，修复工程顺利开工。此次修缮改白水泥塑像为汉白玉雕像，重新制作的雕像由南尚乐乡石窝工艺美术厂精雕细刻而成。基座上附上了刻有吴春山生平事迹的碑文，碑文由房山籍书法家卢景辉书写。整个基座外镶黑色大理石，显得庄严肃静，雕像和碑座高2.6米。雕像纪念碑四周栽植了松柏树木，将路面进行了水泥硬化，建了围墙，形成了总占地约2亩的纪念碑雕像园。但是由于资金有限，原计划增建的碑亭和展室并未建成。入园处摆放着《吴春山塑像重雕碑记》，记录了此次修缮的过程。碑文全文如下：

吴春山同志塑像及碑原于1985年肇修，惜数年风剥雨蚀，白水泥像已见损残，且四周蒿菜凌蔽大失雅敬。岗上村党员干部遂复倡议，由共青团房山区委及崇各庄乡党委筹资重建，改塑像为汉白玉雕像，并辟一方隙地为园，栽插花木，以扬先人辉业，而励后人鸿志特为证。

主办单位：共青团房山区委员会、中共崇各庄乡委员会、中共南尚乐乡委员会、房山区石窝工艺雕刻厂、房山区第一水泥厂、房山区第二水泥厂、周口店地区继文水泥厂、周口店地区新街水泥厂、周口店地区瓦井水泥厂、河北镇水泥厂、河北磁家务水泥厂、五二九二二部队。

1994年7月1日

1994年7月1日，吴春山塑像修复落成揭幕仪式举行。原市委顾委主任王宪，团市委书记姚望和当时的区领导以及吴春山的女儿吴瑞兰等，以及当地党、团员，部队官兵和群众2000多人参加了揭幕仪式。7月2日，《北京晚报》报道的题目是《房山重为老劳模吴春山雕像立碑》。本次修缮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2001年6月25日，青龙湖镇党委召集全镇600名各界党员在吴春山雕像纪念碑园隆重集会，庆祝建党80周年并作出了将吴春山纪念碑确定为全镇“党员教育基地”的决定。每年清明节、“七一”期间，这里常开展纪念活动。

自建立至今共接待来人瞻仰开展活动约 70 余次，共接待人员 3 万余人。

# 黄辛庄村的“通臂拳”

刘文中

笔者于上世纪 70 年代初迷上了武术，当时曾拜黄辛庄村武术老师龙国明学习武术。

龙国明老师大我五六岁，家住在黄辛庄村的后街村东头，他家的老宅子很气派，青砖老房子，有门楼，有三进院落。龙国明住在后院，后院和前院之间是一个挺大的拳场，三合土夯实的平坦的地面，屋檐上挂着很明亮的汽灯。经常有十几个年轻人在练拳。他们有的练习“劈砸”，有的练习“引手”，有的在“活膀子”……龙国明告诉我，他们练的就是“通臂拳”，这也是他将要向我传授的拳种。

以后，我就随龙国明学习“通臂拳”。练拳休息时，经常听到龙国明与同村一起练拳的人讲述“通臂拳”的历史掌故。

盛世往往带来收藏的繁荣，中国传统武术其实也是文物，因为中国传统武术具有着文物所应该具有的所有要件。如今，我对中国传统武术知识了解得多了一些，才知道黄辛庄“通臂拳”在中国传统武术史上的独有地位。

近日，我又来到我原来学拳的龙家小院内，与老师聊起了黄辛庄的“通臂拳”。龙国明老师虽年已六旬，但那精神那身体不逊壮年。谈话中，他将黄辛庄“通臂拳”的源流传承情况对我做了介绍：

通臂拳是一种模拟猿猴臂之伸曲而得名的拳种，该拳以取意为准则，而非追求形似。通臂拳历史久远，至少明代就出现了，而且负有盛名。古谱拳术歌诀中就有“佐神通臂最为高”的记载。通臂拳渊源最为古老，历代相传，英豪辈出，可惜史料缺乏，难以详述源流。清道光、咸丰年间，良乡黄辛庄人陈庆功夫已达化境，成为通臂拳门中的一代宗师。后来，他将通臂拳传授给同村的王占春，王又将通臂拳艺传授给了同村的张殿明和一位人称“狄庄头”的人。

黄辛庄的通臂拳主要是由张殿明传承发展起来的。张殿明家住村西，在村里德高望重且武艺高强，人们都尊称他‘张五爷’。张殿明在家中设立拳场，传授通臂拳等武术。我的父亲龙振泉、家住村西北的闫长贵、杨贵林、李恒、

郭占山、高原、刘万全、以及张殿明之子张林等三十多人都习练通臂拳。据我父亲说，他的师兄弟中有的功夫已经练得很好，闫长贵走过江湖，曾在京西下煤窑时独自与三十多个挖煤人动手不落下风。就是下雪天，他也练功不辍，将碾盘上的雪用手轻拂干净后，放一枚铜钱，用双掌拍击碾盘，只见铜钱一下一下的被震起落下又被震起。

当时在张殿明家所练的拳除了“通臂二十四式”外，还学习八趟“地躺拳”，因为此拳较长，在表演时都是一人先练前四趟，一人接着再练后四趟。此外，还有“杵蜡”（练点穴的基本功）和“跑板”（练飞檐走壁的基本功）。为了在正月十五走会表演武术时所用，张殿明又请来京城的武术家唱戏的武生闫保堂传授比较适用于表演的成套的武术套路，流传下来的有“仙人掌”、“太平拳”、单刀、花枪。

黄辛庄村先后设过两个拳场，一个是抗战前张殿明设在自家中的拳场，一个是我在七十年代初设在自家后院的拳场，那时我父亲和一些老一辈练把式的还健在，也有几十个年轻人痴迷武术习练通臂拳等拳术。因为当时突出“抓革命，促生产”，村里不太支持练武术，使黄辛庄的武术没有很好地传承发展走向繁荣。

传统武术是活的文物，很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珍视和想方设法的予以尽量原汁原味的来进行保护。由于传统武术的传奇性才有了艺术性，由此才使得传统武术升华为艺术。我为黄辛庄村曾盛开过“通臂拳”这样璀璨的中国武术奇葩而自豪。

# 记河南中学“山花诗画社”的成立

姜玉卉

2004年4月16日，在房山河南中学诞生了京郊第一个校园诗社——“山花诗画社”。会上，北京诗词学会会长段天顺即席赋诗：“南岑寒出褪，山花出岫云。一枝斜照水，先占燕郊春”。“山花诗画社”被北京诗词学会吸纳为集体会员。有七名老师被吸收为个人会员。学校被人们誉为“圣水清韵育桃李，校园山花绽芬芳”的特色学校。

中华古典诗词是民族文化的瑰宝，浩如烟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体现了民族精神，其本身就是素质教育丰厚的教育资源。河南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王健，受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试点的启示，决定在学校开辟中华古诗文诵读、写作这片处女地。在北京诗词学会的支持和老校友“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冯绍邦、崔育文的鼎力帮助下，京郊第一个校园诗社成立。

为了扎实有效地开展诗词文化教育，由校长、副书记、副校长分别担任诗画社的正副社长。由政教处、教务处、团委、学生会牵头成立教师分会、学生分会、美术分会。聘请北京诗词学会会长段天顺、副会长王儒为顾问，冯绍邦、崔育文为名誉社长，由处室主任、语文教师分别担任秘书长、编委。发展会员近百名。

为了充分调动广大师生对诗词诵读和创作的积极性，必须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平台、园地，以激发师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于是，创办了《山花诗画》校刊，深受师生的喜爱。在社会上也有很大的影响，不断有人直接到校或托人索取。至今，已出版6期，刊登师生创作的诗词数百首，部分推荐到北京诗词学会主办的《北京诗苑》、《诗词园地》上发表。学生的剪纸作品发表后，《北京诗苑》主编石理俊、编辑部主任赵清甫对剪纸非常感兴趣，还提笔配了诗，给学生极大的鼓舞。

为方便师生相互学习、交流，诗画社又主办了诗词专栏，将师生作品定期刊出。学校还以年级、教学班为单位，组织学生在诗词专栏前上诗词学习课。主讲创作感受的老师就是专栏上所登诗词的作者，有教师，有学生。尤其学生

作者，成就感、自豪感难以言表。

诗词专栏的内容丰富。除了师生的杰作，还介绍诗词小知识。栏目多，形式新：如“诗海探奇”、“对联故事”、“楹联对句”、“巧对集锦”、“诗词迷”、“千古名句填空”等栏目，极大地吸引了学生欣赏。尤其诗画社编委在板报上出了联句，要求师生对句，师生兴趣盎然，互相切磋，成了校园学习生活的风景线。

开展诗词讲座，参加各类诗词活动，是提高师生诗词鉴赏和写作的好举措。

一是请进来。邀请段天顺会长来校为师生做竹枝词专题讲座。从竹枝词的产生、特色、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详细地讲解，师生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收益匪浅。当师生得知段老已是七十多岁的市委离休老干部，为了传承中化民族文化，推进校园诗教，不辞艰辛，驱车来到深山区讲课时，被深深感动了。高中语文教师杨宝林即度赋诗：“赤子之心沃土情，七十诗翁到河中。真情妙语玄机释，秀地竹枝节节生。”接着，又请了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组联部部长晨松来学校进行校园诗词教学指导，为诗词教学提供了大量信息。还请了冯绍邦、崔育文为会员们做诗词指导。

二是走出去。诗画社与北京诗词学会有约，凡是该会举办诗词讲座，学校都要派专车让师生赶赴听课。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北京诗词学会”成立20周年之际，师生在京民大厦礼堂与北京干休艺术团同台演出。与此同时，师生还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诗词活动。如海淀诗社在圆明园组织的赏荷吟荷活动以及莲花池、陶然亭公园组织的诗赛，有的作品还获了奖。高二学生刘川珍在北京市第八届艺术节诗歌朗诵会上，朗诵了她自己写的诗《赞母校》，并荣获一等奖。

语文课始终是诗词教学的主渠道，朗读是语文教学的手段之一。结合新教材诗歌单元内容，通过多种途径加强诗文诵读，根据学生的特点，诵读形式多样化。打破课本局限，将网上下载的古诗新唱，抑扬顿挫的诵读放在语文课堂上。从情感上拉近诗词和学生的距离。以教学班、年级组为单位定期举行诗歌朗诵会，给师生诸多机会展示朗读方面的才华。学校每届艺术节，都设有专场诗歌朗诵比赛，有诗赞比赛盛况：“大赛平台韵律飘，俏男靓女各争娇。校园承润发喧雨，诗苑春潮拱嫩苗。”师生同台展示，放声咏唱，“诗词香韵醉，清歌丽阳春。”多位师生在市、区级诗歌朗诵会上获奖。

在校园、社会多种活动中，凡用文字表达的内容，有意识地用诗文形式来表达，提升了档次，效果显著，突出了学校特色。如北京新闻出版社向学校赠书仪式上以及区政协向学校21名特困生捐资助学仪式上，校方的感谢词都是

用诗文表达。深受与会者的好评，在社会广为传颂。在升旗仪式上，一首诗文献词，把师生爱祖国、爱党、爱国旗的情感推向高山之巅。这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是一次思想的洗礼、净化。

学校开展诗教以来，各方面的工作都发生了潜移默化、深层次的变化。首先是提升了师生的精神境界。中华诗词由于其形式与内容、思想与境界的高度统一、其感撼人心的力量，呼唤内在情感的作用之大，影响之深是无以伦比的。特别是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生的高度责任感，已在师生思想中悄然形成。出现了融洽、和谐、互帮互学等新风尚。诗教对深化素质教育、培养科学与人文精神并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诗教促进了课堂教学，提高了学习效率。学生在读诗的过程中，必然要了解诗的社会背景、作者、诗文表达的情意。丰富了知识，而且更多地了解中华民族的人文历史。学校高考成绩连续几年创建校以来历史新高，一年一个台阶，师生一致公认，成绩的取得与校园诗教是密不可分的。是诗教促进了教学，深化了素质教育，才有今天的优异成果。



# 我为《房山文史资料》刻印章

张寿江

《房山文史资料》原名《房山文史选辑》，第一辑是1988年2月出版的。封面由何君华设计，石岩题字。大约这一年的前后，我与当时任编辑的史长义相识，1988年11月下旬的一天，他与任副主编的刘玉荣来到燕山石化公司开展走访调查工作，并向我了解有关燕山的文史情况。我向他们推荐了对金陵历史和地貌有一些研究的肖智，从《房山文史选辑》第二辑起，连载肖智撰写的《北京的金陵》三篇文章。从此，我逐步地跟史长义熟悉起来，他对我业余喜好篆刻印章也有所了解，于是，他邀我为《房山文史选辑》封底篆刻一方印章进行装饰。

在1991年2月出版的第四辑《房山文史选辑》封底右下方，刊用了我篆刻的一朱文长方形“房山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编”印章，但颜色不是套红、印成了黑色的。在这一辑没有署上篆刻作者的名字。这方印章，现在看来比较稚嫩，有的篆字笔划安排，写法不够完美。

1992年4月出版第五辑，我又篆刻了一枚白文“房山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编”圆形印，这枚印章，线条工细流畅，字与字之间，不紧不松，布局错落有致，我比较满意。印章用红颜色印出。从这一辑起封底篆刻开始署上我的姓名。

1993年1月和1994年1月出版第六、七辑，仍采用此圆形印章。

1995年1月出版第八辑，更名叫《房山文史》，封面开始使用魏士宽题字，封面由李荣光设计，封底仍然沿用我篆刻的“房山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编”圆形印章。

1996年1月，出版第九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封面由王书樵设计，封底是我篆刻的一方随形白文“房山文史”印章。自认为此印线条简练流畅，字体古朴遒劲。

1997年1月，出版第十辑，封面由李瑞祥设计，封底仍采用前一方随形白文“房山文史”印章。

1998年1月,出版第十一辑,封面由井泉设计,封底换成我篆刻的一朱文长方形“房山文史”印章。这方印章的字体,刻得简练明快。

1999年1月出版十二辑,封面由王书樵设计,封底采用一张由西周燕都博物馆提供的“董鼎”照片。

2000年1月出版第十三辑,封面由何君华设计,开始使用苏适题字,又恢复使用我篆刻的前一随形白文“房山文史”印章。

从2001年1月出版第十四辑起,编辑栗景鸿提议:每一辑封底都要更换一方印章。我考虑:首先要从形式上,采用一阴或者一阳的刻法,这样就能明显的区别出来。文字内容虽然不变,字体最好不能重样,同时刻法还要有变化,这的确有一些难度,需要花费一番心思,精心设计,这样才能避免雷同。我开始篆刻一朱文“房山文史资料”椭圆印章,从此以后这六个字就固定下来。由于此辑刊用时制版显得有些过大,2002年1月出版的第十五辑,缩小重新使用了这枚印章。

2003年1月出版第十六辑,我仿照汉印刻法,篆刻了一方白文印章,力求线条粗细一致,字体工稳流畅,尽量避免呆板和匠气。可以说,这一方印章,显示出了我当时的篆刻水平。

2003年12月,出版第十七辑,封底采用了我篆刻的一长方形朱文印章,字体采用两行竖式安排,此印是想师法邓石如笔意,走刀圆转浑厚,但感觉未能如愿。

2005年1月,出版第十八辑,封底换成一标准椭圆形白文印章。每字刻得比较规矩,略显平直清秀。

2006年1月,出版第十九辑,封底用了一正方形朱文印章,这方印章用红线把每个文字隔开,字字力求工整。

2006年12月,出版第二十辑,封底采用的是长条一竖行白文印章。似仿照砖刻铭文,“山”字破残,追求古朴之美。

2007年9月,出版第二十一辑,封面由杨建英设计,封面题字仍旧是苏适,封底是我仿照齐白石的刻法,篆刻一长方形朱文印章。

2008年12月,出版第二十二辑,封底仍然是我仿照齐白石的刻法,篆刻一长方形白文印章。以上两方朱白二印,现在看来,虽然有一些齐派刻法的路子,但尚未达到齐派的力度和意趣,只是一个初步模仿和尝试齐派刻法而已。

2009年12月,出版第二十三辑,封底采用我篆刻的一椭圆形朱文印章,文字“房山”“文史”“资料”用红线隔开。以前印文都是从上往下刻成,此次,

这一方文字是从右往左刻成，尝试改变一下文字的顺序。每字安排基本得体，给人一种圆润爽快的感觉。

2010年12月，出版第二十四辑，封底这一印章，是2003年10月，我为北京市编辑各区县文史资料中的“房山文史资料全编”篆刻的一方大印，后因北京市统一设计封面，这一方印章未被采用。我觉得这一方印章，篆刻得比较古朴大方，有可取之处，不忍舍弃。于是，2010年就没再刻新印，就把以前刻的这方印章，将“全编”二字遮挡，只钤“房山文史资料”六字，作为这一辑的印章。

截止到第二十五辑《房山文史资料》封底上，共采用我篆刻的21方印章。其中，共刻了15方不重复的“房山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编”和“房山文史资料”印章。早期刻的“房山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朱白二印，当时未注意保存，采用以后即被磨掉。后来所刻“房山文史资料”原印，现在均保存完好。

顺便再多说一句，以前全国各省市的一些政协文史部门，大部分都编辑出版文史资料，各省市之间也开展互相赠阅和交流。1993年4月，我还篆刻了一长方形朱文“房山政协赠阅”印章。想必这一方印章，为对外宣传房山的历史资料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张寿江篆刻部分作品

# 我参加了歌舞剧《东方红》演出

宋 浩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演，它是一首高昂激越的中国革命颂歌，它概括和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开创了歌唱、舞蹈和戏剧相结合的综合大型歌舞表演的新形式、新道路。我有幸作为合唱演员参加了《东方红》的演出，这一经历使我终身难忘。

## 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

1964年，我正在北京矿业学院读大学三年级，由于家在房山区周口店，放暑假便没有急于回家，而是留在学校学习和休息。忽然有一天，学院团委通知我到主楼的合班教室去。我去了一看，已经有50多个同学，大家议论纷纷，都不知是什么事。团委领导告诉我们，为庆祝建国15周年，上级决定搞一个大型的合唱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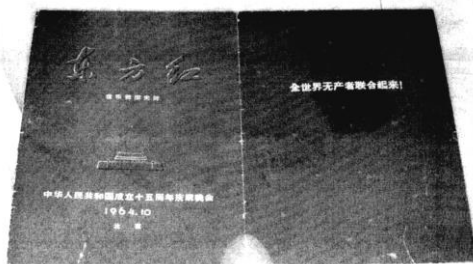


图 1、1964年10月《东方红》演出  
节目单封面

日，特派南京部队前线歌舞团的陈指挥来辅导大家。从那天以后，我们就每天下午在陈指挥的指导下练习合唱，有《东方红》、《保卫黄河》、《歌唱祖国》等十几首歌曲。

9月上旬的一天，通知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去参加彩排，到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是要搞一个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国庆期间作为献礼节目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东方红》是在周恩来的倡议和指导下，集中了全国音乐、舞蹈、诗歌、美术等各方面著名艺术家的智慧集体创作的。来自北京、上海等地和军队系统70多家文艺单位的音乐舞蹈工作者、舞台美术人员，以及北京许多业余合唱团的工人、学生、少先队员等3000多人参加演出。人民大会堂的主席

台是表演舞蹈和独唱领唱的舞台，主席台两侧搭设的阶梯型台架是合唱团站立的地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石油学院、矿业学院、钢铁学院、航空学院 6 个大学的 300 余名业余合唱团员、5 个工厂的业余合唱团员、专业合唱团员都站在阶梯型台架上。庞大的乐团和几百名少先队员布置在大会堂的前几排座位上。让我们喜出望外的是，敬爱的周总理第一次彩排就来观看了。我们既感到紧张又觉得无比幸福，大家满怀激情，唱出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以后的多次彩排，总理经常来观看，节目也不断地在修改完善，说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是当之无愧的。演出的阵容堪称强大，抽调了全国著名的文艺团体和艺术家，王昆、郭兰英、才旦卓玛、李光曦、寇家伦、胡松华、马玉涛、贾士骏等歌唱家和刀美兰、崔美善、阿依都拉等舞蹈家，黎国荃、严良堃、司徒汉、秋里、胡德风等指挥家都参加了演出。

几次彩排之后，周总理亲自在人民大会堂给全体演职人员做了党史报告。通过总理的报告，使我们深切的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与各种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是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赴汤蹈火、不怕牺牲、攻坚克难，才取得的一个个胜利。周总理对毛主席无比忠诚，无比热爱。一国总理在百忙之中给演职人员做报告，我们为有这样的好总理而自豪。

10 月 1 日，建国 15 周年，天安门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敬爱的周总理特意安排我们参加国庆观礼，当然不会到观礼台去观礼，而是站在广场上，就这也是最大的荣誉了。

### 毛主席接见了我们

10 月 2 日晚上，《东方红》正式在人民大会堂进行首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应邀来我国参加国庆庆祝活动的各国贵宾一起观看了演出。《东方红》是一部高昂激越的中国革命的颂歌。全剧共分《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图 2: 北京矿业学院参加演出《东方红》的全体人员合影

《祖国在前进》、《世界在前进》等八场。它以史诗般的宏伟风格和波澜壮阔的音乐舞蹈场面，生动形象地概括和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表现了英勇顽强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艰苦奋斗、前赴后继、决心战胜一切困难，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强意志。

演出服装是借给我们的海军军官礼服，一身白，显得很精神。要求正式演出时都要穿黑色的皮鞋，会务组不给提供，需要自己解决。这在现在看来轻而易举的事情却把我难住了，我活了二十年都是妈妈给做的布鞋，顶多穿一双球鞋，哪里穿过皮鞋呀。好在向同学借了一双，才算过了这一关。10月6日晚，毛泽东主席观看了演出。我们这些业余演员，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毛主席来了，大家无比激动，热情高涨，拼命地唱啊，唱啊，结果不少人演唱第一首歌曲《东方红》时就把嗓子唱哑了，以后只能干张嘴唱不出声音来，好在演唱的主体是专业演员，无关大局。

10月16日下午，我们接到通知，不用带演出服，集合到人民大会堂。一路上大家都在猜测，今天是什么事情呢，难道是国家领导人接见？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人民大会堂，进了宴会厅，只见宴会厅内用阶梯型的台架摆成一个圆圈，真的是毛主席接见吗？是真的吗？我们3000多人整整齐齐的站好，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来，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来了，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都来了，我们是多么幸福啊，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能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毛主席在中间位置坐好，主席身后站着的是郭兰英和才旦卓玛。随着相机的快门声，一个终身难忘的时刻被定格在相机里，定格在我们心中。

主席接见后，周总理给我们做了即席讲话。总理首先强调，我讲话后大家不要过于激动，要注意不要把宴会厅的地板踩塌了。然后总理接着说，今天是个不平凡的日子，有三件大喜事：一件是毛主席接见《东方红》的全体演职人员。第二件是赫鲁晓夫下台。第三件是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顿时接见会场沸腾了，大家欢呼跳跃，鼓掌声持续不断，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是啊，伟大领袖接见我们当然是头等大喜事；当时中苏论战正在进行，赫鲁晓夫作为修正主义的头子早已为全体中国人民所不齿，他的下台当然值得庆贺；原子弹爆炸更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大喜事，当时美国和苏联联合对我国施压，在战略上包围中国，用核武器讹诈中国，而我国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才开始恢复，急需增强国民的凝聚力，提高战胜自然灾害和核讹诈的信心。原子弹的爆炸太适时了，怎能让我们不激动！我们发自内心的喊出“毛主席万岁！”

祖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接见的照片长达 3.3 米，上面写着“毛泽东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接见参加演出《东方红》的全体人员合影”。此后，我们又连续演出了十几场，请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和代表人物观看，场场爆满，盛况空前。从排练到演出我们进出人民大会堂一共 30 多次。

### 《东方红》精神永远激励我前进

系列演出结束后，我们又恢复了正常的学业。1965 年春节刚过，学校就安排我们到河南省平顶山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当初排练《东方红》时，调集了全国多个部队的文工团来参加演出。据后来了解，周总理为了把《东方红》这个节目长期保留下来，除主要演员外，全部由北京市的文艺团体接过来。我们由于在外地搞“四清”，就没有再参加。1965 年 10 月，《东方红》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成彩色宽银幕影片。在拍成电影时，对《东方红》又作了一些改动，把第七场《祖国在前进》和第八场《世界在前进》删掉了。这样到第六场《中国人民站起来》把演出推向高潮，影片也就适时地结束了。影片刚刚拍出来，又是敬爱的周总理，安排参加过演出的人员到北京展览馆剧场观看影片，我们为能先睹为快而激动万分。紧接着影片在全国各地放映，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首演已经过去 48 年了，我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已经步入老年，是《东方红》演出使我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的祖国。几十年来，是《东方红》的精神激励着我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为祖国的煤炭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 房山初级师范建校历程

苏维斌

房山有着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1948年时任房山中学校长的绳纶如深感师资匮乏遂萌生了培养教师的决心，征得县政府主管部门的同意和支持后，于当年夏季在房山中学招收了50名学生组成的师范一班。1948年底房山县城获得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了房山中学，从此迎来了房山教育事业的春天。

1950年1月，房山中学又招收了50名学生，组成了初级师范二班。当时师范二班的教室设在孔庙的正殿里，1951年教室迁到了孔庙以东的东药王庙正殿，当年师范一班毕业后又招收了50人为师范三班。

1952年，经过几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一个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总路线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即将到来。为适应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县领导和教育主管部门开始酝酿师范班与房山中学分开的问题。后经研究决定，单独建立房山县初级师范学校，校址定在顾册村，利用北应观大庙，拆除大殿中的泥塑改建为教室，并在院东侧新建两座青砖平房教室。同时，决定将顾册小学命名为房山师范附属小学。同学们报到时，校内杂草丛生，到处砖头瓦块，一片荒凉。拆除的渣土像小山一样堆在院内。女同学的宿舍安排在大殿东西两廊低矮窄小的“十二司”内，男同学宿舍尚未建成，暂住附近群众家里。

同年9月1日，又招收了50名学生成为师范四班，单独建立的房山初级师范学校迎来了首个开学日。在庆祝师范学校成立的典礼仪式上，县政府教育科长杜生丛到会致贺辞，对师范学校成立表示祝贺，希望老师加强团结，艰苦奋斗，努力把学校办得更好。希望全体同学努力学习，锻炼好身体，为房山的教育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校长王喆讲了建立房山初级师范学校的重大意义和学校面临的困难，要求全校师生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自己动手，劳动建校。党员团员代表也纷纷发言，表示一定响应领导的号召，带头参加劳动。于是，全校师生每天利用中午晚上课余时间，清渣土、平整院落，除杂草。还有一部分男同学到一里多地外的顾册村西砖窑往回背砖，（建男生宿舍用）。经



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入冬前，男生宿舍建设完工，校园也变得平整而洁净，初步显现了学校的模样。学校建立之初，第一位校长是王喆，两个月后王喆调回房山中学任校长，刘天德接任初级师范校长。1953年潭九皋担任第三任校长。

建国初期，房山初级师范学校的建立，为房山培养了大批急需的教育人才，还有许多同学毕业后进入了县委、政府等部门，为全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 解放初期房山县的收音员

魏志华

解放初期，房山还没有通电，通讯非常落后，全县仅有 5 台干电池收音机。县委、县政府、县供销社、房山中学各 1 台。另外，房山三区，因为是县里的重点区，也配有 1 台。当时一是因为我们国家收音机的产量很少，另外，无线电器也受限制，不能随便买卖。全专区只有通县专区有一家国营的无线电门市部，别说房山县没有，就是北京城内大的商场也买不到收音机。

1951 年县里有了收音机，配备收音员时，因为谁也没见过，都不会用，更别说修理。因此，这些收音员就统一到通县专区进行学习、培训。经过 10 几天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无线电的基础知识。

当时县党政机关，有收音机的都配有专职的收音员。县委宣传部的收音员是索培珍，政府的收音员是冯越，三区的收音员是赵文瑞。县里收音员的任务有三项：一是组织干部、群众收听；二是收听电台记录新闻。广播电台每天有几次记录新闻节目，播送的速度很慢，收音员收听后，经过整理，交给县委宣传部，编印宣传材料，印发给各区、各单位开会、出黑板报和广播用。三是县里有大型活动，大的会议时，收音员负责音响。像贯彻《婚姻法》、县党代表大会，以及 1952 年“三反”运动，河北省召开的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县直机关全体干部都到小礼堂去听大会的实况录音。

以上三项任务中，最重要的，也是最艰苦的是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下乡组织群众收听。因为当时交通很不方便，山区没有公路，不能骑车，平原都是土路，也不太好走，又怕把收音机摔着、碰着，所以收音员下乡组织群众收听，基本上是背着收音机步行。1953 年 2 月，刚过了春节，县里开展《婚姻法》宣传月，组织一个宣传队到山区。这个宣传队从县直机关各部门抽了 10 来个人，县政府的徐庆云和我任队长，县政府的收音员冯越也参加了，还带了一台收音机。我们到六区（区政府在霞云岭）后，区里把我们分配到西片最远的几个村，也就是现在蒲洼乡的范围。因为当时天气还很冷，我们都穿着棉衣，带着棉被、棉褥，还背着 10 多斤重的收音机。从霞云岭、堂上、宝水、蒲洼，一直到芦子

水、鱼斗泉。有些地方实在难走，是名符其实的“羊肠小道”，冯越太累了，大家就轮流替他背着收音机。我们每到一个村就要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在开会前就放收音机，放有关《婚姻法》方面的戏曲，歌曲。评剧“刘巧儿”、“小女婿”，歌曲“翻身道情”、“小二黑结婚”等，很受群众欢迎。因为那时农村，包括平原，都没见过收音机，条件好的也只是弄个矿石耳机，收听时用针扎矿石，扎到声音大的地方再听。而收音机又能说又能唱，声音又能大又能小，都感到很新鲜。开会时群众去的又早，人又多、又齐。有的地方信号不好，群众就主动帮我们拉天线，宣传的效果特别好。我们去了一个多月，回来的时候，我们爬山走的近路，天刚亮就从霞云岭出发，经过三流水，中午爬过 1000 多公尺青风岭，从涞沥水、黄山店回来，天黑到县城，整整走了一天，脚都起了泡。

三区的收音员的工作也很艰苦。三区的范围很大，有 30 多个村，南边从长沟到南正，北面从岳各庄、龙门口、周各庄到孤山口中院，圣水峪，一直到上方山。大部分是山路，很不好走，收音员赵文瑞经常背着篓子、背着收音机，到各村去组织收听。每天要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组织群众收听时事政策，农业生产技术及文艺节目，很受群众欢迎，比一般开会宣传效果要好。因为当时县里没有无线电商店，更没有修理部，收音机毛病大时，请专区师傅来修，一般的问题要自己处理，因此收音员还要学习收音机的修理知识。冯越虽然文化不高，但学习很认真、很刻苦，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不但修理收音机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通过收音机还学了俄语，因为当时正是“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他不仅学会了不少单词，而且生活上常用的话也能用俄语说。

1954 年政府的收音员冯越调走，三区的收音员赵文瑞调县政府当收音员，赵文瑞不仅工作积极肯干，而且也很好学、好钻，收音机的使用和一般的修理技术都能掌握。当时房山没有收音机商店，买零件只能到通县专区仅有的一个商店，买时还要有严格的手续。1954 年，赵文瑞有一次到通县去买收音机零件，从通县回来时赶不上汽车，当时房山到北京每天只有一趟汽车，只好住在北京前门附近的旅店里。因为他买的零件多，引起了旅店工作人员的怀疑，以为他是特务，买电台零件，立即报告了当地派出所。夜里赵文瑞刚睡下，派出所就去查户口，把他住的屋子进行了包围，对他进行了详细的盘问，并查看买的所有零件。幸亏他带的手续、证件齐全，才把问题搞清，不然就要到派出所里呆一夜。

1954 年县委宣传部的收音员索培珍调走，赵文瑞也带着收音机划归县政府文化科。（原来收音员归政府办公室领导）。从此，房山县的专职收音员的工作到此结束。

# 河南中学的建立与撤销

潘惠楼

河南中学是由北京市京西矿区政府于 1954 年 9 月创办的，始名北京市河南中学班。1955 年 9 月，被北京市教育局命名为北京市第六十九中学。1958 年，北京市京西矿区政府撤销，学校所在地划入新成立的北京市周口店区，学校名称依其所在地河北镇河南村而改名为河南中学。1960 年，周口店区改名为房山县，河南中学隶属于房山县管辖。1981 年，北京市成立北京矿务局工农区，河南中学及其所在地划入北京矿务局工农区，河南中学的教学业务由北京矿务局教育教训处负责管理。1993 年，北京矿务局工农区撤销，河南中学重新划归北京市房山区。2011 年河南中学撤销，校址改为房山区职业实习培训基地。河南中学从建立至撤销共有 57 年的历史。

上世纪五十年代，河南中学是北京市京西矿区的三所完全中学之一。六十年代初，学校隶属房山县管理，当时也是房山县的三所完全中学之一。河南中学从建立至撤销，一直是房山区北部规模最大、学生和教师人数最多的学校，也是房山区在山区的最大规模学校。在北京市郊区的普通教育系统中，河南中学也颇有名气。

1954 年春，京西矿区政府为解决南部山区人民和南部矿区职工子女的求学问题，决定在房山煤矿所在地的河北地区，建一所中学。接收建设任务的王福林老师，带着一纸公文，一份建设图纸，一张支票，来到河北地区，将校址选定在大石河畔河南村东的一块台地上，征地 20 余亩。这里，正是大石河河套沟的中心，水秀山青，风景优美，空气新鲜，环境清幽。向东 20 余华里即是大石河的出山口，山前是浩浩华北平原，沃野千里；向西可沿河套沟进入太行腹地，山峦起伏，连绵不断。河南中学。从诞生开始，即成为生活在大石河畔人民心中的知识圣殿。

当时正是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市教育局向河南中学下达指示，边建设，边教学，并要求做到当年 9 月份必须开学。京西矿区政府虽然资金紧张，但对教育却十分重视。河南中学从建校开始，就努力向标准化看齐，学校

的设计非常规整。负责建校的戚廷昆主任和王福林老师，精打细算，精心筹划。采购物资，风雨奔波，基建施工亲临现场，保证了工程质量，保证了完工时间。学校房屋全是青砖到顶的建筑，教室宽敞明亮，还单独设置了物理实验和音乐等专用教室。学校专门打一口深井，解决了师生饮水问题。建起教师和学生用餐的食堂，学校的周围种上了花草树木。

河南中学第一任校长姬锡瑞，当时正在北京城里第七十七中学担任学校校长，听到山区缺少师资的情况后，主动向领导提出到艰苦的山区工作。还将自己的家，从条件优越的城里搬到山区，把在城里工作的爱人也调到山区，坐着大马车带着行李来到山区。学校初创，条件和设施都不完善。缺少教师，学校领导向京西矿区政府和北京市教育局求援，在上级的支持下，学校领导亲自到北京的大学招毕业生。一批热心教育、热爱山区的知识分子，主动报名，积极申请，要求来河南中学任教。为了山区的教育事业，为了培养山区人民的子女，许多城镇来的教师在山区安家落户；许多大学毕业生，把自己的青春、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山区教育事业。学校刚刚落成，即招收两个初中班，有 106 名学生上课。当时学校有校舍 34 间，建筑面积 612 平方米。门前没有公路，学校的用品需要人背畜驮。出行去矿区政府，要越过大石河翻过几座大山。到城里开会、办事，要步行 25 华里的河滩石子路，天不亮起身到坨里村乘公共汽车，途中不时传来狼嚎。师生们住宿，睡的是大通铺。取暖，是自己动手烧煤炉子。师生们吃的，很多时候是窝头、咸菜。有的学生上学，每天要步行十多里山路。但师生们斗志昂扬，学校充满欢声笑语。

1955 年，随着京西经济建设的发展，有大批矿工子女入学。大石河沿岸周围的上百个村庄，也纷纷送子女上学。河南中学从北京的大学里，陆续招收很多毕业生来校担任教师，学校的师资水平大为提高。学校建起了化学、生物实验教室，建起了生物园地、操场、图书馆，购置了大量体育器械、图书资料、标本仪器，学校的教学设施逐步增多。学校在教授书本知识的同时，注重思想道德教育，努力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56 年至 1957 年，学校继续扩建。整修操场，建设跑道，师生们背黄土垫地；修建跳远的沙坑，师生们到大石河的河滩挖沙背沙；为了节约建房经费，师生们翻山越岭，去十余里外的黄土坡村大北岭背石板。学校在师生们的辛勤劳作中不断变化，不断完善，不断更新，越来越美。学校虽在山区，条件不如城里，但学校的教学努力与城里保持同步。1957 年夏季北京市统考，正值雨季，山洪暴发，交通中断。取试卷的教师从位于门头沟的京西矿区政府翻

山越岭步行几十里赶回后,却被大石河阻隔在学校对岸。为了使考试按时进行,在河北地区政府的支持帮助下,找来当地游泳最好的青年,泅渡大石河,把试卷及时送到学校,保证了河南中学按时参加了北京市的统考。

1958年,河南中学增加了高中班级,成为房山县当时的三所完全中学之一,也是当时房山县的惟一的山区完全中学。学校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办学方针,在紧张的教课、学习过程中,积极到学校附近的工厂、矿山、农村,参加火热的社会实践,接受艰苦的劳动锻炼。当时国家正开展“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河南中学师生也投入了“大炼钢铁”、“筑路、修渠”等活动。1959年6月15日,河南中学组织师生到辛庄村所在地参加兴修水利劳动,从北京师范学院来校任教的四川籍青年教师刘君德,为抢救学生,被坍塌的土石方掩埋,不幸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后来,在她牺牲的工地上,建起一座扬水站,被命名为“君德扬水站”。

五十年代后期,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十分繁忙,但学校对教学工作毫不放松,学校充分利用晚上和节假日的时间教学。学生们学习刻苦,教师们教课认真,初中、高中的应授课时均达到规定要求,学校教育质量不断提高。1958年、1959年和1960年,三届初中毕业生参加全市升学考试,升学率都在75%至80%之间,处于全市前列。1961年,高中毕业生升学率达到80%以上,名列全县第一,在全市榜上有名,和市重点中学媲美。

1961年至1962年,国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出现暂时经济困难,河南中学根据上级指示,高中停招两届,由初中考入高中的学生转到良乡或房山上学。河南中学利用这一时机进行整顿,学校要求党团员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带头克服困难。师生们在校的操场上种粮食,在校的空地上种菜,在学校中开设了菜园、果园,还到农村开荒种地,改善了学校生活,稳定了教学秩序。学校努力压缩资金,帮助教师和学生解决生活困难,为许多家庭经济比较紧张的同学减免了学费,许多老师从自己不多的工资收入中,挤出资金为生活困难学生购买学习用品。师生们把自己与学校、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共渡难关。

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爆发,河南中学陷入混乱之中。学校成立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总揽学校大权,党政工团组织机构瘫痪,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教师被迫终止教课,教学设备、设施受到严重破坏,红卫兵组

织造反，学校派性组织林立。有的校领导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教师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待遇，有的教师被揪斗甚至打伤致残，给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的身心造成极大伤害。196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河南中学，开始复课闹革命，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同年8月，开始对66届、67届、68届三年的初、高中毕业学生进行工作分配。其中，小部分学生分配到工厂，大部分学生分配京郊插队，还有的学生主动要求支援边疆，到内蒙古自治区集体插队。1969年，河南中学的当年毕业生又集体到东北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军垦。1975年，学校克服困难，开办了修理电动机等电器的校办工厂，为缺少设备的农村服务。当时购买电动机线圈材料需要用铜置换，师生们自觉自愿从家中找铜交到学校，校办工厂的教师背着装有铜的麻袋，去城里的销售部门买漆包线，保证了校办厂的开工。为了帮助农村正确使用电动机，“三夏”期间，校办工厂的师生主动到农村培训电工到田间地头指导，受到农民欢迎。学生在校办工厂劳动，与书本知识相结合，增加了实际操作技能。

1981年，河南中学划入北京矿务局工农区管辖，为工农区所属7个乡镇、两个办事处中的惟一完全中学。学校制定教学计划，加强教师培训，稳定教师队伍，师资水平迅速提高。学校狠抓校风建设，严格学校纪律，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开展文明礼貌活动，受到社会称赞。

1993年，河南中学从北京矿务局工农区划归房山区管辖，结束企业管理学校的状况。1996年，学校利用香港邵逸夫先生捐款，建起教学实验楼，设有两个物理试验室，两个化学试验室，一个计算机房，一个语音教室，增加建筑面积1542平方米。

2010年，在房山区实施规模办学中，河南中学撤销，房山区北部山区学生改为到平原地区住宿上学。河南中学校址，改为房山区职业实习培训基地。57年来，河南中学先后有500多名教职员在校工作，教职员工来自20多个省、市、自治区，有的还是归国华侨。河南中学先后培养出1万多名初、高中毕业学生，他们分布在祖国的各条战线，工作在祖国的四面八方。有的经过严格的考验，被推荐任命为领导干部；有的以自身的努力奋斗，成为具有专长的专家学者；有的受国家委派，远赴重洋，工作在异国他乡。

# 忆周口店中学二三事

宋 浩

1955年—1961年，我在周口店中学（原北京七十中）度过了6年的学习生活。

上世纪50年代初，周口店地区由河北省房山县划归北京市京西矿区。当时的周口店比房山县城要更发达一些，北京猿人遗址就在周口店的龙骨山上，使周口店这个小镇名扬世界；它有日本占领时期修建的铁路，把周

口店出产的石灰石运往琉璃河水泥厂，并通达北京。解放后这里又开辟了更大规模的石灰石厂和花岗岩厂，并相应建起了水泥厂、修造厂、酿酒厂等工业企业。解放初期的周口店经济较为发达、人口众多，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1954年，北京市政府根据周口店地区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决定在周口店建立第七十中学。在文如仲等老师的辛勤努力下，1955年，建成了一座较高标准的中学。

## 全新的学校 纯朴的老师

1955年，我11岁，在周口店小学读高小，是全年级年龄最小的一个。7月份，举行初中升学考试，考场就在校内，升学考试只考算数和语文两门，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是第一个交的卷。过了一段时间，同学们互相传出话来，说学校发榜了，我赶快跑到周口店后街的南头，果然北京七十中的录取名单就贴在墙上，一群人在边看边议论着。我凑前一看，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榜上的第一名居然是我，从此一个农家孩子就要成为中学生了。

新成立的北京七十中坐落在周口店南头，一共招了4个班，200余人。开



图1：北京七十中初三（一）班毕业生合影



学前我们就多次去学校参观，一溜的青砖瓦房，窗明几净，在农村生活了十几年，哪儿见过这么漂亮的学校啊！好容易盼到开学了，同学们热情高涨，群情振奋，很多家庭都是祖祖辈辈才出一个中学生，我们怎能不珍惜这良好的学习机会！同学们大部分都每天跑家，最远的是家住长沟峪的同学，每天要走 18 里的山路来上学，其艰辛可想而知。学校的老师多数都是师范院校刚刚毕业的，他（她）们满怀着革命理想，一方面教书育人，一方面与同学们一起参加建校劳动，师生一起决心把学校建设好。

### 第一次进北京

周口店离北京不到 50 公里，可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去过北京。1956 年春天，学校组织勤工俭学劳动，师生一起到西山上砸石子，为火车铺轨准备碎石，经过几次劳动，学校挣了一笔钱，用这笔钱组织全校师生去北京旅游。200 余名师生从周口店坐火车到北京前门火车站。为了省钱，大家坐的是闷罐车，没有座位，车厢只有几扇小窗子，还用铁栅栏栅起来。下了车，大家一起步行到北京 22 中，这是学校教导主任鲍秉铎老师原所在学校，晚上大家就睡在教室的课桌上。我们用自己的劳动果实游览了故宫、动物园和北海公园等地，了却了农村学生没进过北京的缺憾。

### 除“四害”运动中的掏麻雀，赶麻雀

1956 年，国家号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臭虫和麻雀作为“四害”来消灭，这里光说说麻雀吧！学校号召各班开展竞赛，看哪个班消灭的麻雀多。我们班每天晚饭后组织几个捉麻雀小分队，几个人一组带着手电筒到附近各村



图 2：周口店中学高三（二）班毕业生合影

去捉麻雀。进村之后敲开一户人家的院门，说明来意，就上到屋檐下去掏麻雀。这个办法还真灵验，麻雀一到晚上就在窝里不飞也不动，往往能捉到几个。一晚上，我们走街串户，要走几十里路，能收获十几只到几十只麻雀，这项活动持续了好一段时间。后来，捉麻雀运动进一步掀起高潮，地方政府学习其他地

方的经验，要开展人海战术，把麻雀累死。有一天，全校师生和其他单位的人员一起出动，大家每个人拉开一定距离在山坡上站好，在统一指挥下大家高声喊叫，或者敲起锣鼓、脸盆，用噪音把麻雀赶得到处乱飞，不能落地，直到把它们累死。那时人们思想特别单纯，居然相信靠人海战术能把麻雀累死的童话。结果折腾了一气，麻雀没被累死，而我们却累得够呛。过了一段时间，国家修正了“四害”的对象，把麻雀从“四害”中解放出来，这场闹剧也就收场了。

### 支援农业 劳动建校

学校建在农村，六年来学校师生去农村劳动便成为家常便饭，平整土地、水利工程、割麦收麦、秋收打粮……各种劳动轮番而至。好在大部分同学来自于农村，对农活并不陌生，又是处在年轻力壮的年纪，自然受到农民的欢迎。没有锻炼过的同学则很快手掌就磨起了血泡，过几天也就习惯了。我们吃过公社的食堂，也吃过自己做的饭。劳动既为农业创造了价值，也锤炼了我们的意志品质，学习起来更加刻苦。在劳动锻炼氛围的熏陶下，不少女同学背起了粪筐，沿街捡拾牲口的粪便，虽然也有些难为情，但毕竟这一关闯过来了。新建的学校到处都百业待兴，学校组织基建劳动也很多，平整场地、修路、栽树、建围墙、管理菜园，什么活都干。特别是京周公路西侧的新校区更是同学们亲手开辟出来的，大家挖土方，捡石头，硬是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400米跑道和足球场。为了从远处拉黄土垫操场，我们晚上借上大队的马车，没有骡马，就人来驾辕，大家你拉我推，用一车车黄土把乱石摊垫起来。

1958年，房山、良乡两个县和周口店地区一起合并成为周口店区，北京七十中也相应改为周口店中学。记得1959年，周口店区的几个中学在周口店中学举行了中学生田径运动会，运动会的地点就在我们亲手建起来的运动场。周口店中学当时也能跟两个著名的县办中学——房山中学和良乡中学抗衡一下。

### 新生的学校 骄人的成绩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家境贫寒的同学更懂得珍惜宝贵的学习机会。1958年初中毕业时，雷永清和陈景长两位同学分别被授予北京市中学生金质和银质奖章。1961年是周口店中学首届高中毕业生升学的一年，当时正值国家遭遇

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家大大压缩了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我们两个班 60 余名同学，高考竟然录取了 42 名，升学率达 70%，创一个农村新建学校的奇迹。其中清华、北大、中国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航空学院都有周中毕业生的身影。

岁月荏苒，50 多年过去了，周口店中学也从一名翩翩少年步入壮年，上万名周中的毕业生活跃在祖国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继续做着应有的贡献。

# 娄师白与燕山石化职工的一段情谊

张寿江

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和艺术遗产，需要不断传承，这样它才能够发扬光大。那么，具体到绘画大师齐白石的继承人，在众多的弟子中，娄师白无论是画风、题材，还是书法、治印、作诗，都能够继承齐派的艺术风格和特点，并在长期的艺术学习和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些研究齐派艺术的专著《怎样治印》、《齐白石画虾》和《齐白石绘画艺术》等出版发行，可以说娄师白是一位继承齐派艺术全方面的杰出代表。



图1：娄师白

娄师白，原名娄绍怀，祖籍湖南浏阳，1918年6月生于北京。他青年时期喜爱绘画，1942年毕业于辅仁大学美术系，师从齐白石先生25年。他为人谦和，刻苦奋进，积极创作，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生前是北京画院画师，一生辛勤耕耘，桃李满天下。2010年12月逝世，终年92岁。

关于娄师白先生与燕山石化公司职工交往的一些事情，据我所知，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至九十年代末，他曾先后三次来过燕山石化公司参加有关活动和书画笔会，还与一部分书画爱好者有过一段亲切的接触和交往。

毋庸讳言，现在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书画爱好者，把能够得到名家的书画作品，都视为是一种荣幸和骄傲。因为这些字画除具有一定的欣赏价值以外，还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更值得纪念的是这里面还凝聚着一片情感。

具体说来，在燕山石化公司最早获得娄师白先生绘画作品的是原《燕山石化报》总编辑王雨华。时间可以追溯到1981年初，当时王雨华正在东方红炼油厂工会负责宣传工作，班上有一位同事名叫王德明，业余喜好绘画，别看就是这位燕山石化的职工，还是娄师白先生的入室弟子，师生二人关系密切。那时王德明想调到市内工作，王雨华考虑到王德明如果要调到新的工作单位，会有更大的发展前途，最后就同意调出。王德明把王雨华帮助他调动工作的事情告诉了老师，娄师白先生听后非常高兴，觉得王雨华这位领导爱惜人才，知人

胜任，并应王德明的请求，随即为王雨华绘制了一件水墨三虾图，以表示感谢。上面落款：“雨华同志雅属，师白作。”关于绘虾这个题材，一般人总会觉得看似平常，其实，它很讲究用笔、用墨、用水和构图，也最能够考验一个画家的基本功是否扎实。娄师白先生画虾是得到齐白石大师的真传，已成为他拿手的绘画技法。王雨华得到这幅作品以后，十分喜爱，一直珍藏至今。

1988年1月，燕山石化公司电讯站举办职工艺术节。在这之前，电讯站职工张宏生曾于1987年12月初，参加燕山收藏欣赏联谊会成立大会时，与著名红学家、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编剧之一周雷先生相识。这次电讯站搞艺术节，他邀请到周雷先生，并通过周雷又邀请到娄师白和书法家李华锦前来参加艺术节活动。他们的到来，受到《燕山油化报》总编辑何绍改和电讯站职工以及一些书画爱好者的热烈欢迎。这一天，电讯站的职工们把娄师白先生团团围住，当场观看他挥毫绘画，传授画艺，真是大开眼界。在闲暇时，赵思敬拿出他书写的各体书法作品，请娄师白先生观看指导，娄先生观后大加赞赏，当场又为赵思敬书写了一件篆书“丰富多彩”条幅。接着，又应赵思敬邀请，为燕山石化公司篆书了一件“团结、求实、严细、创新”的企业精神。

事后，电讯站及张宏生为了表示感谢，还回赠娄师白先生一件根雕笔架。

在这之前，我曾邀请周雷先生为我书写一幅扇面书法，这次周雷先生参加电信站活动，就把这件书写好的扇面给我带来了。当时，我就想如果扇面的另一面，再请娄师白先生绘制一幅画作，岂不是更加完美吗？于是，我就拿到娄师白先生面前请他绘画，当他见到周雷书写的扇面时，连连说道：“这字写得真工整，好、真好。现在让我绘画扇面，恐怕画不好，还是我拿回家去再画，然后你去取吧。”

8月的一天，我来到宣武区圆宏胡同6号的“老安草馆”，又见到了娄师白先生，他一见到我，立刻想起我求画扇面之事。不大一会儿就找出那件扇面，见画案调色盘里正好还剩有一些蓝、绿颜色，熟练地为我绘制了一件鸢尾花卉。虽然一共只画有6片叶子和两枝花卉，构图略显简单，但其中一片长长的叶子和一枝花朵同向左侧交叉伸延，占据了画面的多一半，看去整体并不显得空，更加使这棵鸢尾花卉富有活力。画完，在右侧上方题写：“寿江仁弟属画，师白戊辰夏。”这次，我亲眼观看到娄师白先生绘制此花卉的整个过程，首先用绿色画出叶子，然后再用淡墨勾线。由于扇面上有折痕，有一片叶子的颜色被水润了不均匀，他也不再修改，看去这样反而更加自然。接着，娄先生又从画案上拿起一方齐白石大师给他刻的印章，让我欣赏并作讲解。我一边欣赏娄师

白先生为我画的扇面，一边又欣赏齐白石大师为这位得意弟子刻的印章，立刻感悟到这优秀的文化艺术真是一代代传承啊。

1989年2月11日，北京师白艺术研究会成立。同年10月18日，首届师白艺术研究会书画展在中国画研究院隆重举行。那一天上午，叶永定、赵思敬和我前去观看展览并参加开幕式，我们见到了姜师白先生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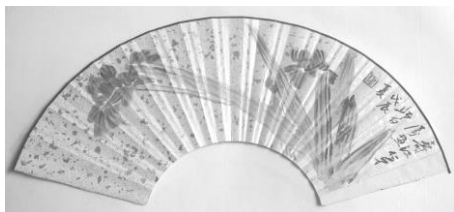


图2：姜师白作画，周雷题字的扇

他进行了亲切交谈，我们三人提出也想要参加师白艺术研究会，他老人家立刻表示同意，然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1990年4月的一天，我们三人收到了师白艺术研究会寄来的会员表。不久，赵思敬、我和孟凡立就到姜师白先生家去拜访，一起交会员表和照片。其中表上有一栏要填写会员推荐人，我和赵思敬不知如何填写，于是我就向姜先生请教，他笑着对我们说道：“这还用问？推荐人就是我啊。”仅此一句话，足以看出姜师白先生对弟子真是爱护有加，积极鼓励，为传授画技，义不容辞，表现出一代大家风范。

有一年春节前，在燕化公司二楼会议大厅，举办一个大规模的书画联谊会，姜师白、李铎等书画名家也前来参加祝兴，只见姜师白先生当场设色绘制了一幅万年青花卉，红花绿叶，鲜艳妖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落款题写篆书“欣欣向荣”。接着，有一位燕化宾馆的女服务员拿出一个素白扇面，走上前去邀请姜先生为她题写几个字。此时，姜先生尽管有些劳累，本可以婉言拒绝，但是他仍然面带笑容，有求必应，很快为她书写了四个大字“前程似锦”，以此作为留念。

1989年8月，《燕山油化报》要准备出版一个“篆刻专版”。有一天，该版编辑赵思敬和我谈起此事，想请一位德高望重的书画篆刻老前辈题个词。于是，我俩就想起了应该去拜访一下姜师白先生，因为姜先生即刻印，还擅长篆书，是一位最合适的人选。在进城的路，赵思敬与我商议请姜先生题写什么词句？我想起了黄苗子写给王世襄《刻竹小言》的诗句：“人言书画本来同，铁笔银毫一脉通……”赵思敬一听，立刻决定就请姜先生写“铁笔银毫”这四个字。当我俩来到姜先生家里，说明来意以后，姜先生立刻走到画案前，征求我俩的意见：“你们让我书写什么词句啊？”赵思敬说出以后，只见姜先生停顿了一会儿，随即拿起一本字典查看，估计是这个繁写的“铁”字笔画较多，再核实一下具体的写法。我站在一旁，看到他这一举动，心里暗暗表示敬佩：

姜先生真是治学严谨啊。只见他查完字典，蘸了蘸墨，大笔一挥，立刻题写出篆书“铁笔银毫”四个大字，落款写行书小字：“为燕山篆刻专版题，姜师白。”下盖印章。

“铁笔银毫”题字，刊登在1989年8月29日出版的《燕山油化报》“文化生活”版的左上角。这一篆刻专版，共发表21位作者的篆刻作品。报纸出版以后，我们立刻给姜师白先生寄去一份。别看这是一张企业报纸，却给姜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1年7月中旬的一天，房山琉璃河水泥厂的职工小杨找到我家。其实，我与他并不相识，他自我介绍说是姜师白先生的学生，老师让他给我送来一封信，我打开一看，是姜师白先生用“老安草堂书笺”专用信纸和毛笔书写的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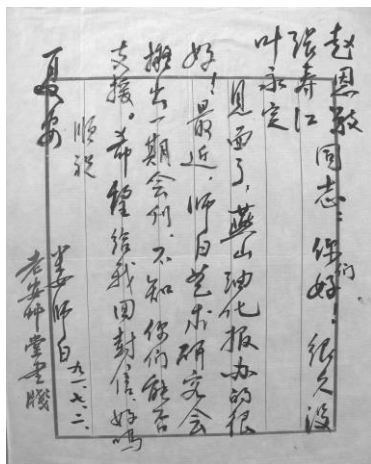


图3：姜师白信笺

赵思敬 张寿江 叶永定同志：

你们好！很久没见面了。燕山油化报办的很好。最近，师白艺术研究会拟出一期会刊，不知你们能否支援。希望给我回封信，好吗？

顺祝 夏安

姜师白 九一，七，二，

一个协会应该有一份会刊，以便会员之间和与对外开展交流，可是，协会成立初期又因资金有限，办会刊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姜师白先生一直很费心思和牵挂此事。我接到这封信以后，立刻找到燕化公司印刷厂的孟凡立，向他商议此事如何处理。第二天，我又进城把有关信息反馈给姜先生。后由于某一些原因，这个会刊未能在燕化公司印刷厂印成。

叶永定、赵思敬和我是第一批加入师白艺术研究会的会员，20多年以来，记不清师白艺术研究会给我们三个燕山石化公司的会员，寄来过多少张贺年卡、讲座通知书和举办展览信息等信件。现在虽然姜师白先生已经逝世了，但姜师白之子、著名画家姜述德会长，仍然与我和赵思敬保持着联系，我俩也经常参加师白艺术研究会举办的各种活动。

大千世界，人海茫茫。回忆我们与姜师白先生的交往并得到他的书画作品等这些往事，感觉到我们燕山石化公司这几个人真是幸运的。无可否认，现在

社会上和书画市场上，姜师白先生的赝品也时有出现，说明他的书画作品早已被人们认可。不过，说到底只有是他的真迹，才能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和经济价值。细心留意，姜师白先生馈赠给个人的书画作品，大都习惯题写“上款”。在燕山石化公司职工里的这些“上款”人，不管是什么渠道，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得到姜师白先生的作品，都不会忘记与姜师白先生的这一段“缘分”。

试想，历来任何一件书画作品，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时间的推移，总有一天将会更改其主，在历史的长河中，持有人只是一个“暂时”的保存者，但姜师白先生赠送给燕山石化职工的每一件作品，永远不会改变的是“上款”所记载的每一段情谊。



##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房山故事

白全永



纪昀（1724—1805）清代著名学者、文学家。字晓岚，一字春帆，直隶河间府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乾隆进士，历任学政、侍读、礼部尚书、左都御史等，嘉庆间官至大学士，谥文达。纪昀少时聪慧卓异，又勤奋好学，精研经史，学问淹通，是乾嘉时期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曾总纂《四库全书》，主持纂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洋洋二百卷，典赡详明，至今仍为学人所重视。还著有《纪文达公遗集》和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

清代笔记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整套书由《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五部分组成，共二十四卷，一千余则故事，嘉庆五年由纪昀的门人盛时彦合刊成书。关于本书的创作目的，作者说“不乖于风教”、“有益于劝惩”，即致力于宣扬封建道德和因果报应思想，这与蒲松龄将自己的作品视为“孤愤之书”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如此，书中亦有不少可取之作。书中有对清代官场腐败黑暗的揭露，有对假道学先生的嘲讽，有对唯利是图、为富不仁的谴责，也有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赞美。书中还有一些神鬼狐妖故事，颇具寓言意味。纪昀身为清朝高官竟敢于用自己纪实的笔端，揭开乾隆盛世的种种弊端，这是很不容易的。在艺术上，本书文笔通俗流畅，自然朴素，刻画的人物也做到了形神兼备，这就使得它具有文学的价值。《阅微草堂笔记》是继《聊斋志异》之后一部最重要的文言小说，以致后世出现许多模拟之作，影响极广。

房山区是北京首都的西南大门，历史悠久，文化璀璨，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在《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纪晓岚就收集了多个关于旧时房、良地区发生的民间故事。现就选择几则，做简单介绍。

—

房山区是文化大区，境内文物古迹众多，《阅微草堂笔记》卷八《如是我闻》(二)就记载了一则发生在佛教圣地云居寺中的故事：

益都朱天门言，有书生僦住京师云居寺，见小童年十四五，时来往寺中，书生故荡子，诱与狎，因留共宿，天晓有客排闥入，书生窘愧，而客若无睹，俄僧送茶入，亦若无睹，书生疑有异。客去，拥而固问之，童曰：公勿怖，我实杏花之精也。书生骇曰：子其魅我乎？童曰：精与魅不同，山魃厉鬼依草附木而为祟，是之谓魅；老树千年，英华内聚，积久而成形，如道家之结圣胎，是之谓精。魅为人害，精则不为人害也。问花妖多女子，子何独男？曰：杏有雌雄，吾故雄杏也。又问何为而雌伏？曰：前缘也。又问人与草木安有缘，眩沮良久曰：非借人精气，不能炼形故也。书生曰：然则子魅我耳。推枕遽起，童亦翩然去。书生悬崖勒马，可谓大智慧矣，其人盖天门弟子，天门不肯举其名云。

这则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书生在云居寺中住宿，遇到杏花精的经历。故事给这座千年古刹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同时故事对人们又有较好的教育意义，它告诫人们悬崖勒马，才是大智慧，特别是年轻人要懂得珍爱自己的生命。这则故事纪昀是在听益都朱天门讲的，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六·滦阳消夏录(六)中，还记录了一则纪昀亲自在良乡名胜古迹弘恩寺中听寺中和尚讲的一则故事：

宏恩寺僧明心言，上天竺有老僧，尝入冥，见狰狞鬼卒，驱数千人在一大公廨外，皆褫衣反缚，有官南面坐，吏执簿唱名，一一选择精粗，揣量肥脊，若屠肆之鬻羊豕，意大怪之，见一吏去官稍远，是旧檀越，因合掌问讯，是悉何人？吏曰：诸天魔众，皆以人为粮，如来运大神力摄伏魔王，皈依五戒，而部族聚伙，叛服不常。皆曰自无始以来，魔众食人，如人食谷，佛能断人食谷，我即不食人，如是晓晓，即彼魔王亦不能制。佛以孽海洪波，沉沦不返，无间地狱，已不能容，乃牒下阎罗，欲移此狱囚，充彼噉噬，彼腹得果，可免荼毒生灵。十王共议，以民命所关，无如守令，造福最易，造祸亦深，唯是种种冤愆，多非自作，冥司业镜，罪有攸归。其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是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官或自顾考成，彼

则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髓洒膏，吞声泣血，四大洲内，唯此四种恶业至多，是以清我泥犁，供其汤鼎，以白皙者，柔脆者，膏腴者，充魔王食。以粗材充众魔食。故先为差别，然后发遣，其间业稍轻者，一经脔割烹炮，即化为乌有。业重者，抛余残骨，吹以业风，还其本形，再供刀俎，自二三度至千百度不一，业最重者，乃至一日化形数度，割剔燔炙无已时也，僧额手曰：诚不如削发出尘，可无此虑。吏曰：不然。其权可以害人，其力即可以济人。灵山会上原有宰官，即此四种人，亦未尝无逍遥莲界者也。语讫，忽僧有侄在一县令署，急驰书促归，劝使改业。此事即僧告其侄，而明心在寺得闻之。虽语颇荒诞，似出寓言，然神道设教，使人知畏，亦警世之苦心，未可绳以妄语戒也。

清朝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良乡县志》中就有对宏恩寺的记载，在杨亦武先生著的《房山历史文物研究》一书中也有记载：“弘恩寺，又作‘宏恩寺’。位于房山区窦店镇望楚村西，是房山东境一座巨刹，也是房山平原地区唯一的一座大规模寺院。弘恩寺地处古良乡县境，为古良乡县名刹。”清朝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都曾驾临弘恩寺，并御赐匾额，留有御制诗传世。纪昀学问渊博，很受乾隆帝赏识。当年纪昀是否是跟随乾隆皇帝来的弘恩寺本文不做研究，但这则故事清楚地告诉后人，在清乾隆年间弘恩寺内曾经有一位法号叫明心的僧人，他向纪昀讲的这则寓言故事，有警世作用。它警示那些为官者和其身旁的四种人，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尽量救济人，不要害人作恶。“魔众食人，如人食谷”，同时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吃人本质。

## 二

世人相传，纪昀一生有“四大嗜好”为：嗜烟、嗜肉、嗜色和收集奇闻异事。他收集的故事不光是他自己的见闻和朋友的讲述，就连他家中的佣人所讲的乡野趣事，他觉得有意思的也收录起来。在《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先母张太夫人，尝雇一张媪司爨，房山人也，居西山深处。言其乡有极贫弃家觅食者，素未出外，行半日则迷路。石径崎岖，云阴晦暗，莫知所适，姑坐枯树下，俟天明辨南北。忽一人自林中出，三四人随之，并狰狞伟岸，有异常人，心知非山灵，即妖魅，度不能隐避，乃投身叩拜，泣诉所苦。其人恻然曰：尔勿怖，不害汝也。我是神虎，今为诸虎配食料，待虎食人，尔收其衣物，

即自活矣。因引至一处，激然长啸，众虎忿集，其人举手指挥，语啁晰不可辨。俄俱散去，惟一虎留伏丛莽间，俄有荷担度林者，虎跃起欲搏，忽避易而退。少顷，一妇人至，乃搏食之，捡其衣带，得数金，取以付之，且告曰：虎不食人，惟食禽兽。其食人者，人而禽兽者耳。大抵人天良未泯者，其顶上必有灵光，虎见之即避；其天良渐灭者，灵光全息，与禽兽无异，虎乃得而食之。顷前一男子凶暴无人理，然攘夺所得，犹恤其寡嫂孤侄，使不饥寒，以是一念，灵光煜煜如弹丸，故虎不敢食；后一妇人，弃其夫而私嫁，尤虐其前妻之子，身无完肤。更盗后夫之金，以贻前夫之女，即怀中所携是也。以是诸恶，灵光消尽，虎视之非复人身，故为所啖尔。今得遇我，亦以善事继母，辍妻子之食以养，顶上灵光高尺许，故我得而诱之，非以尔叩拜求哀也。勉修善业，当尚有后福。因指示归路，越一日夜，得至家。张媪之父与是人为亲串，故得其详。时家奴之妇，有虐使其七岁孤侄者，闻张媪言，为之少戢。圣人以神道设教，信有以夫。

这则故事讲人天良未泯者，其顶上必有灵光，遇事可化险为夷。人天良渐灭者，灵光全息，如同禽兽，终必遭横祸。这虽然是因果报应，但也是劝人为善。讲这则故事的是纪昀母亲张太夫人身边的一个女佣，她姓张，是房山人。无独有偶，据《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滦阳续录》(二)记载，纪昀母亲身边还有一个女佣姓王，也是房山人。她给张太夫人讲述了一则在房山深处，一位神奇道士驱虎救人的故事：

……有王媪者，房山人，家在深山，尝告先母张太夫人曰：山有道人，年约六七十，居一小庵，拾山果为粮，掬泉而饮，日夜击木鱼诵经，从未一至人家，有就其庵与语者，不甚酬答，馈遗亦不受。王媪之侄碯于外，一夕归省母，过其庵前，道人大骇曰：夜深虎出，尔安得行，须我送尔往，乃琅琅击木鱼前导，未半里果一虎突出，道人以身障之，虎自去，道人不别亦自去，后忽失所在。此或似仙欤？……

### 三

据《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四·滦阳续录(六)记载：“余官兵部尚书时，往良乡送征湖北兵，小憩长辛店，旅舍见壁上有归雁诗二首，其一曰：料峭西风雁字斜，深秋又送汝还家，可怜飞到无多日，二月仍来看杏花。其二曰：水阔云深伴侣稀，萧条只与燕同归，惟嫌来岁乌衣巷，却向雕梁各自飞。未题晴



湖二字，是先兄字也。然语意笔迹，皆不似先兄，当别一人。或曰：有郑君名鸿撰，亦字晴湖。这则故事是说纪昀在担任兵部尚书时，到良乡送征战湖北的士兵，在长辛（新）店旅舍墙壁上见到的两首题壁诗。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初，乾隆帝在良乡大南关村东筑建郊劳台，迎接出征凯旋的军人，现遗址尚存。清时送兵接兵都在同一地点，这说明了良乡历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另外，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还提到了房山地区的特产和历史人物。如卷八《如是我闻》（二）中提到了地方特产燕山柿：“闽有方竹，燕山之柿形微方，此各一种也。……”卷十八《姑妄听之》（四）提到了房山籍文化名人贾岛《贾长江集》有‘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一联，句下夹注一诗，曰：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古典文学名著《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的以上故事，是对房山地区民间文学的一个有力补充。二百余年前，才子纪晓岚收集的这些个形形色色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房山地区的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同时这些故事，为研究房山的地方民间文学也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文史资料。

参考资料：《古代小说百科大辞典》（学苑出版社 1991 年版）

# 林斤澜与房山

张广明

著名老作家林斤澜，浙江温州人，1923年生，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61年以写作为专业，从事文学创作。一生致力于小说艺术的探索，在理论方面的独到发现与见解，对中国当代白话文写作极具启发意义。曾主编，《北京文学》杂志，出版小说集、散文集十多部。题材多反映农村生活或知识分子心态。主张鼓励新锐，培养新人，回归文学本体。在北京第三届文学节获终身成就奖。

林斤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京西房山，门头沟一带农村下过乡，蹲过点，体验生活。并曾在山区居住过一段时间。对那里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很熟悉，对那里的人和事，发生的变化也关注。交过不少基层干部和农民朋友。80年代他还到过燕山，给那里的文学青年和业余作者授课，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1965年，林斤澜听到房山县黄山店供销社背篓商店的先进事迹，又看到《北京日报》发表的社论：《让“背篓精神”在全市生根开花》。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深入生活，搜集材料，几乎走遍了全市和郊区的服务行业。写出一篇大散文：《背篓精神开新花》。发表在当年10月份《北京文学》杂志上。文章的开头旗帜鲜明地说道：“北京郊区的村庄，正迈开大步，赶大寨，追南韩继；工业战线上，也掀起了又宏伟又热烈的生产高潮。正在这时候，房山的黄山店，举起了《背篓商店》这面商业战线上的红旗。”他列举了发生在延庆，昌平，怀柔等地商店，供销社、以及各地粮库、银行、信用社、卫生所、火车站等行业，开展学习“背篓精神”的动人场面，歌颂和弘扬了广大职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说：“从这个深山小店里，看到了北京到处在学习背篓精神。是学着又创造着，是赶着又超着，从此一步跨出了商业范围，成为一种精神，在社会上行走，在街头巷尾传说，在各行各业中间，爆发了一簇比一簇动人的火花。”他从这个深山小店里，看到了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精神的无处不在，并开花结果。他的文章为全市掀起“学背篓，赶背篓”的活动和传播宏扬“背篓精神”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他写的散文《新居》里，他没有写搬进新家的喜悦和兴奋，林斤澜却回忆起二三十年前的山区生活。那是在他从乡下搬到城里，住进现代化公寓以后。当时由于有些设施不配套，没有直通公交车，电话也不通畅，办事很不方便。一次他站在高楼的阳台上，看见成群的鸽子在脚下盘旋，想起了在山区居住的时候，顶风冒雨送信的邮递员。它是这样描述那个邮递员的：“那是一个20冒头的小伙子，背着大邮包，一进队部办公室，顺手摘下挂在门边的水瓢，在门后的水缸里，舀一瓢冰凉的山泉水，一饮而尽。下雪天，拿坐在地炉上现成的热腾腾的水壶给他，他也正眼不瞧，喝完凉水，连坐也不坐，立刻拿出信件、报纸；若有汇款条，连现金也带来了，若有包裹单，连包裹也背来了。发完来信，就收寄走的信件包裹，还带卖邮票。三下两下抬腿就起，常常背着邮包临出门，一脚前一脚后，再舀一瓢，一饮而尽。不喝热的喝凉的，这是习惯，这习惯是抢时间抢出来的，没工夫坐下来一口一口地啜呀！”

林斤澜那个时候还很年轻，觉得山区生活最苦的是与世隔绝，有了这样的邮局和那么好的邮递员，每当收发信的时候，都有一种感激和崇敬油然而生，“仿佛山村的阴影都明亮起来了”。特别是那邮递员举瓢一饮的姿态，“都走进了诗情，画意，梦境。”林斤澜在他的作品里，尽管没提到他的名字，但我们从那细腻，深刻，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中，不难想象，他所描画的邮递员，就是房山火红年代的先进典型，铁脚板任成水的生活原貌。这些事迹和人物，已经过去40余年，现在回忆起来，仍然使人鼓舞和感动。

改革开放以后，林斤澜渴望看到他曾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发生的巨大变化。他和老伴及作家赵大年一行五人，到韩村河和十渡参观访问；在已是“北京十六景”之一的十渡旅游区，坐着专供游客坐的小驴车，悠悠的，得得的。“看高高的横横的站着青墙绿壁，绕来绕去走着青青的浅浅的流水。”听赶车把式讲“老帽山六壮士”阻击日寇，弹尽枪毁，跳下悬崖，以身殉国的壮烈事迹，心中无限感慨，很快写出一篇名为《轻重小驴车》的散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诗句：“横着站的太行山麓 / 绕着走的拒马河谷 / 第十个渡口就叫做十渡 / 多么的浪漫因为多朴素 / 小驴车得得着岁月的道路 / 战争年代根据地的山麓 / 和平时光旅游的河谷川、驴车得得又轻又重的抱负。”林斤澜还借着车把式老爷子的口道出“这条山沟通延安”，表达了他对房山人民的无限深情。

# 清末房山诗人王邦屏

范金生

王邦屏，字辅三，房山石楼村人。光绪丁酉年（1871年）拔贡，光绪三十四年任房山县自治学社主讲。民国元年（1912年）任直隶省议会议员。民国二年，任直隶省民政公署交通科科长。之后历任直隶省望都、满城、藁城等县知事。他学识渊博，尤其擅长古体诗，公务之余，或吟咏自遣，或与朋友唱和，留下不少诗作。本人有幸在王邦屏先生曾孙王锦老师家看到他的诗稿，其诗集为《友松书屋诗钞》。展读之际，不禁击节叹赏。由于各种原因，王邦屏先生的诗作未能面世，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为使同邑文化人能欣赏到他的诗，从而进一步了解先生的人品学养，笔者从先生诗集中撷取数首，以飨读者。

王邦屏先生的诗，大部分属于晚清诗歌，还有一部分属民国诗歌。也即我们通常说的“近代诗歌”。同历代诗歌相比，爱国与反侵略的主题十分明显。例如《游韩登仁川绝顶远眺五律》：

东望太平洋，天光接水光。  
秋风吹落叶，旭日照扶桑。  
始政悲亡国，残局感旧邦。  
何人念家国，前途慨茫茫。

历史上日本曾两次侵略朝鲜，第一次是在明朝。第二次侵略朝鲜曾引发甲午中日战争。随着中国的战败，日本完全占领朝鲜，直到二战结束，朝鲜才完全独立。诗中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罪行，写出了朝鲜人民国破家亡的悲哀，并由此及彼，想到列强对华虎视眈眈，弱肉强食，对祖国前途感到无限忧虑。

在《闻合约有成》中诗人写道：

大乱于今始太平，华夷合约喜粗成。  
睦邻谁建防边策，除暴难休善后兵。  
村落已墟多暴骨，京津既陷少坚城。  
惜无中晚才人笔，写尽山河破碎声。



诗中所指的“合约”，系指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京津，烧杀掠抢的“庚子之乱”后，1901年2月由帝国主义侵略者提出的《各国会议十二条大纲》，就是后来正式签订的《辛丑条约》的基础。诗人由“华夷合约”写起，痛斥清政府一味“睦邻”，而疏于武备，无防御边疆之佳策，在外敌入侵时一触即溃，为换取一时的苟安，与侵略者订立城下之盟，签下一纸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诗人目睹了被侵略者残杀的无辜百姓暴骨荒郊，控诉了八国联军奸淫烧杀的罪行，用“写尽山河破碎声”，抒发了亡国之痛，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精神与忧患意识。另一首《光绪庚子闻京津被陷》中，诗人用“破虏何曾摧铁骑，招贤谁为筑金台。数奇李广无侯相，兵败文山岂将才。”之句，指出清政府的腐败和治军无术，有能力的将领得不到重用提升，而无能之辈却身居要职，遂使国防失去保障。可谓切中时弊。

诗人继承了古代诗人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亲身经历了“庚子之乱”，用史家之笔，写下了《夜警·良邑屠城》、《罗家峪避乱》等诗，记录了“千家仓促计逃生”、“故国几人存骨肉，边关何日罢兵革。”的悲惨情景，反映了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颇有杜甫“诗史”的风骨。

诗人生逢民初政治黑暗时代，写了不少政治讽刺诗。1913年，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1915年，杨度等组建“筹安会”，这是一个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的政治团体，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诗人在《闻帝制筹备处成立有感》中，痛斥“筹安狐媚尽，戡乱狗功多。”讽刺袁世凯倒行逆施，违背民意。他的有些诗作，面对民国期间的吏治腐败，敢于用犀利的笔锋刺贪刺虐。如《保阳题壁八首》中写道：

“奸盗优容计已差，而今筹款到烟花。  
偷儿若比捐娼例，也可输金报国家。”

讽刺袁世凯统治下的民国政府鱼肉百姓，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甚至抽捐抽到娼寮妓馆。

在《夜雨秋灯录三章》中写道：

“内忧外患起纵横，捐税何堪巧立名。  
闷坐空堂听天籁，秋风秋雨半愁声。”

写出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忧外患之上，又增苛捐杂税，雪上加霜，百姓不堪其苦，诗人为民请命，道出了百姓的心声。

又；

民贼良臣两判然，而今责任一身兼。

派筹军饷夸循吏，难煞中华父母官。

写出了在军阀反动统治下，下级官吏不得不秉承上司旨意，向老百姓派捐筹饷，想成为一个好的父母官难上加难，突出了正直的下层官吏苦闷和无奈。

诗人的登临怀古诗，风格沉郁悲凉，富于个性和震撼力，如《过汤阴谒岳忠武穆庙》：

“英雄百战整乾坤，南宋勋名迥绝群。

舆隶何知忠愤事，向人频道岳家军。”

诗中以满腔敬佩之情，歌颂了民族英雄岳飞的辉煌功绩，同时指出，一般人只知道岳家军抗金的功劳，并不能理解岳飞对以皇帝赵构为首的投降派的愤懑和怨恨。另一首《楼桑怀古》有“民心自古宗昭烈，故老犹知祀汉皇。”歌颂了三国鼎立时爱民如子，知人善任的蜀汉昭烈帝刘备，反衬当今统治者腐败无能，体现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强精神。

诗人的山水诗清新隽永，情景交融，诗中有画，颇有唐人风度。如《瀑水崖观瀑五首》写瀑布：

“忽闻大声发，惊惶等泥塑。浑疑山岳颓，旋似雷霆怒。须臾近层崖，乃知悬瀑布。匹练横空飞，奔流下杂树。激石涛声狂，腾空雪花逐。流急风自生，一气长贯注。岸曲势回旋，波长莽奔赴。”

先写闻瀑布之声，继写观瀑布之形、之势、之色，仿佛高手画师绘制的一幅观瀑图，有声有色，气势磅礴。表现了诗人对祖国山川之热爱。

记游诗表现超脱与闲适的心境，清雅可爱。如《游上方山兜率寺》：

“世外幽栖昼掩关，松林萧寺乱峰环。

片云孤鹤意俱适，流水疏钟声自闲。

风叶绿堆芳草径，霜花红映夕阳山。

金刚读罢蒲团坐，相对无言俗虑删。”

诗人的述怀诗，往往借题发挥，以表现作者的人格和思想感情，如《题诗灰瓮》：

心血堪怜一炬枯，残灰贮瓮喜传图。

诗魂葬入深山后，应化梅花树万株。

过去读书人敬惜字纸，旧诗稿焚烧后，贮存在陶瓮中，埋入地下，等于将自己的一腔心血（诗魂）埋葬了，诗人想象自己的诗魂化作万株梅花，富于浪漫主义精神。

诗人的咏物诗，做到了“不即不离”，即不停留在物上，又要切合咏物。

如七律《美人风筝》:

疑是蟾宫谪绛仙，风筝飘荡画楼前。  
掌中飞舞千铃响，天外浮沉一线牵。  
行情风姨扶更捷，奔依月姊见犹怜。  
羨他似抱男儿志，直欲凌云上九天。

诗的前六句全写的是风筝，可谓曲尽风筝之妙。后两句在此基础上来写情思，抒壮志。不离于物，又不能粘着于物，这正是诗人写作手法高妙之处。

诗人还写了不少怀乡诗和思亲诗，这些诗表现了对家园的怀念，渴望回到家乡的思乡之情，对政治腐败与外敌侵扰的厌恶，以及对隐居生活的向往，朴实自然。尤其是思亲之作，纯从血性中写出，感情尤为真挚，耐人回味。如《九日思亲》:

旅馆羁栖九月初，思亲儿寄数行书。  
天寒亲体须珍重，儿未归时莫倚闾。

又如《都门逆旅题壁》:

中天皎皎月光寒，今夕离人只独看。  
料的深闺小儿女，灯前也解忆长安。

全诗系由杜甫五律《月夜》点化而来，只不过独自看月的人换成了作者本人，但从全诗来看，化用得如此天衣无缝，信手拈来，说明诗人古诗文功底之厚及点化手法之纯熟，若非对前辈诗人的诗赋烂熟于心是不能做到的。

在艺术手法方面，诗人善于锤词炼句，如五律《夏村衍庆寺赏牡丹兼参观学堂》中间两联：“寻幽来胜地，集社谒花王。已入文明界，如游富贵乡。”又如《过涿州之湖梁》之颌联与颈联：“残星三四点，归雁两三声。茅店霜华重，荒郊曙色清。”《七律一首》中：“且喜云烟双足踏，定携风月满囊回。文经丘壑有奇气，人历山川成健才。”不仅富于哲理，对仗亦十分妥贴工整，足可与历代名句相媲美。又如《和夏夜枕上看月七律》中两联“秋思未添闺阁恨，宵分常伴旅人眠。家余儿女思尤切，书隔关河恐误传。”系前人所云“一句中有三实字（动词），此炼字之法也。”此等句法，当为上乘。

读王邦屏先生的诗，如看清末民初历史画卷，使人油然而生敬意。先生是清末房山本地的一位正直，进步、爱国、博学的诗人，了解、宣传、研究他的诗歌的思想和艺术，足以为京郊文化增辉，为房山文坛增色。房山是诗的故乡，在这块诗歌土壤上，贾浪仙的继承者，代不乏人。我辈后学不容推卸之责任，就是要彰显房山先贤，为前辈诗人拂去岁月的风尘，让他们重现明珠之光彩。

# 渔儿沟往事

张玉泉

## 一、渔儿沟村的沿革

位于良乡古县城西北隅的渔儿沟村隶属良乡拱辰街道办事处管辖。东距区府 1 公里，西北距詹庄 1.3 公里，东北距黄辛庄 1 公里，西南距西北关 0.5 公里。

该村以渔儿沟命名，辖鱼儿沟、孟家洼、任场三个自然村。1950 年“土改”前一直隶属西北关村，“土改”后才独立成行政村。

现有村民 300 多户，千余口人，除少数满族外多数为汉族。据《房山地名志》载：该村于“明代成村”，因“村西有水沟，沟内有鱼，故名”。据民国十七年《良乡县志》载“民国四年（1915 年）划分的自治区域中鱼儿沟划在第一中区”。与本城……吴店、纸房村等十六村划在一起。在城池外，距城五里的记载。

至于该村村民的由来。从历史的大背景下分析，和一些故老们说，祖先大多是来自山西洪洞县的老槐下，渔儿沟人的祖先们于明代就移居在这片水美鱼肥、土地肥沃，平川秀美的地方，又在良乡古城脚下，那么他们是否在明永乐年间随大批移民迁入这里的？他们是否都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据本村八旬老人提供：到清代又有随“龙”来的刘姓等在孟家洼开庄子，为皇上种地纳粮。直到民国时期，还不断有人流入渔儿沟村。这些问题无史料可查，



很难确定渔儿沟的建村历史年代以及先人们移来的具体情景。在良乡西北约 1 公里处，良坨公路东北侧，渔儿沟村南侧，有个名叫孟家洼的地方。

早在清代初期，这里是刺猬河下游一片荒凉的河滩。在距良乡西南 3 公里的元武屯村有个姓孟的财主，买下这约有千余亩的滩涂，雇

人在这片洼地种起庄稼，故被人们称为“孟家洼”。这片洼地很大，东至良乡西北关外，西至太平庄附近，南至小南关北侧，北至詹庄村边。刺猬河上游是小清河和大清河水系，他们分别发源于门头沟潭柘寺赵家台；另一条是大石河支流，漫水河过辛开口、石梯、小苑上，到青龙头合并流出，叫刺猬河，经良乡、北石羊入小清河。每逢雨季河水猛涨，流至鱼儿沟村西南（今北潞园东门一带）形成大片洼地积水，有时棒子地里都有小鱼儿漫游。常年积水的地方在今北潞园派出所一带。有了住户之后，这里曾是官土坑。每发一次水，便堆积一层黑沙土，能种两三年的好庄稼。良坨路大修前，鱼儿沟村南路边上曾插着一个“孟家洼”的长方形蓝地白字的路牌，路扩宽后就不见了。

孟家洼几经变迁，据《房山区地名志》载：“孟家洼属良乡镇鱼儿沟村民委员会辖一自然村，在镇辖境西北部。”解放前为鱼儿沟的一个自然村，解放初归属良乡西北关管辖，人民公社化以后至 80 年代一直为鱼儿沟村第三生产队。据说清朝中后期，有刘姓的满人跑马占地，占去孟家洼的大部分土地。后到了道光年间又有翟姓到这里开庄子，每年向朝廷交公粮。

这里最早仅有刘姓和翟姓居住。后来又有六户迁来，他们分别姓钟、李、翟、吴、陈、刘。刘是河北南宫县人也在此买了 500 亩地，雇用季节工经营。当初这里仅有六七户人家，尚未形成村落。又据《房山地名志》（55 页）载：孟家洼“清末成村，因最初为崔姓人家于此安家，故名崔家庄子，后更名孟家洼。清末至民国初期又有朱姓（与钟家是亲戚）搬来，总共有十多户。到了 1990 年，村民已发展了 58 户，近 200 人，而耕地仅有 200 余亩，其余 800 多亩均被公路、住宅所占。昔日凄冷荒凉的滩涂，如今已发生了巨变。

任场位于鱼儿沟村委会办公楼西侧，占地约 4 亩左右。任场，顾名思义，即任四爷家打场用的场院。场院基本上是正方形，东侧有一拉溜房子四五间，用来存放工具存储粮食。北侧也有一拉溜儿的房子约七八间，为车库、牲口棚、饲养员、把式住房。任四爷的宅院紧靠场院南侧，坐南朝北，为“五正三厢”的格局。

任四爷名叫任文德，大排行老四，土改时化为富农成分，它共有二三百亩沙土地（大部分在今日的飞机场和北岗子一带）。解放前，绝大部分租给贫苦农民耕种，自家留下少量好地，每年雇佣短工耕耘。任四爷原本也是一个穷人家出身，幼年曾给其舅舅放过牛。成年后给其老叔过继。其老叔在外蒙做过生意，很有钱。任四爷继承他老叔的家业，后在村的四周购买大量的土地出租，坐收粮租。逐步富起来后成为鱼儿沟村数得着的户主。清末民初鱼儿沟村仅有

一户任姓，是从原窑上乡任营村搬来的，至今落户已百余年。

## 二、上夜校又排戏

50年代初期，刚刚当了家做了主的村民，得到了温饱之后，青壮年农民急需学文化。农闲时节，村里办起了识字班（夜校），每晚点上罩子灯，到原地主家的大北屋里去上课。没有桌凳，每人就从家里带上小凳子。村里请了曾念过私塾的胡善举当夜校老师，按照识字课本教课。起初从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经过两三个冬季学下来，基本上摘掉了文盲的帽子，他们都能读报，还能写“字条”、“借据”、“合同书”和“简单的便信”了。一开始上夜校的只有一二十人，到最后发展到四五十人。村民上夜校学文化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其原因除了渴望多识字、学文化之外，更重要的是每晚学完文化之后还排演文艺节目。初步得到温饱的农民不甘心枯燥寂寞的生活，便产生了文化娱乐的需求和丰富的生活内容，特别是那些青年人。当时的大队会计贺秀特别热衷排演文艺节目，他就成了当然的组织者和导演。两年中，他们排演了七、八个小话剧、小歌舞等，如“夫妻进京”、“双登记”、“都满意”、“窗户花”等，深受学员和村民的欢迎。这些小戏的形式新颖、活泼，有说、有演、有唱、有跳，内容健康向上，紧跟当时的形势。如“夫妻进京”，热情讴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农民从水深火热的旧社会解放了出来，一心进京去看望毛主席，表达了广大穷苦农民非常热爱毛主席的真挚情感。“双登记”和“都满意”等是配合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个《婚姻法》的宣传，青年男女婚姻自主，选择自己满意的配偶，这些小戏极受青年们的欢迎。在学习排演的过程中，曾有十多对青年男女恋爱，喜结良缘。“窗户花”则歌颂了青年农民过新年时，妻子给在朝鲜当志愿军的丈夫写信，报告解放后过新年的欢乐和幸福，支持和鼓励丈夫英勇杀敌，争取立功的喜悦心情。

演戏的成员达二、三十人，几乎占上识字班的二分之一还多。每次演出的乐器、服装、道具完全由演员自己解决，他们自己制道具，找锣鼓，借衣服，一排演起来可谓废寝忘食，热情十分高涨，有时练到午夜。到了“国庆”、“元旦”、“春节”他们便集中到王家大院里给全村村民演出，每场都挤满了人。1951年春节还应邀到西北关村等演出。后来，由于扫盲班结束，活跃了两三年的文艺活动便停止了。

附：王瑞提供的《夫妻进京》唱词节录

王小妮快板：王小妮，笑嘻嘻，出门遇见了好天气，晴朗的天空没有云彩丝儿，红红的太阳高升起。刷过了牙，洗过了脸，梳洗穿戴多整齐，——红领巾，肩上披，新皮带腰中系。清早起来没吃饭，爷爷叫我备毛驴。我问他备毛驴有啥事，他说俺爹、俺娘进京去见毛主席。这件事情我拿不准，叫出爷爷来问仔细，那个问仔细。

王老汉（内唱）：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月到中秋好时光啊，今年为党过生日，我王老汉心中喜洋洋哪哈。

王老汉：那一年毛主席来到咱家乡啊！我和他在山上叙过家常啊，他问咱们的生活好不好啊！他问咱们种着几亩庄稼啊？

王老汉唱：去年开会进北京啊，天安门上我看见了领袖毛泽东啊。毛主席望着人群微微笑啊，我这心里噗通噗通，一劲噗通啊啊！霎时间礼炮齐鸣震天地呀！广场里响起一片欢呼声啊！高举红旗连声喊：万岁！万岁！毛泽东啊，毛泽东！

### 三、王大门轶事

王大门是对渔儿沟村唯一一户地主兼资本家的称呼。位于渔儿沟村东侧，今隆曦园小区以北，座西朝东。院内为“五正三厢”，即西侧为五间较高的正房，南北侧各有三间厢房。全部为青色卧砖到顶，磨砖对缝。五间正房的门楣、砖柱、脊头都有精美的雕花。三合院的正门在正东，中间有小门楼，此院供主人居住。三合院外的四周为板打土墙，名曰罩墙。墙高丈余，厚约三尺，把小三合院紧紧包围起来，十分严密。罩墙内西侧（三合院西房后）为菜园子，约有四亩，正中有一小门，平日紧闭，运送肥料时才打开。西南角有水井一眼，供饮用和浇菜地用。西北角有一间小房子供看菜看场者住，当年曾有一个叫赵瞎子的人常年打工住在那里。罩墙北侧从东到西靠北墙有十余间房子，分别为库房、骡马棚、工具棚和把式住房等。靠南罩墙也是一拉溜土坯房约六七间，为伙房、长工房、门卫房、保安等住房。东南有角门通墙外厕所。东罩墙正中为王大门的正门。安有两扇大木门，门宽约 3.5 米，高约 2.5 米。拉运庄稼的马车可随便出入，大门顶上有未加装饰的门楼。平日大门紧闭，外人可从旁门出入。只有农忙季节才敞开大门。因为家大在渔儿沟找不出第二家，这是被人称做王大门的原因之一。其二，最主要的应该是王家家业大，家底殷实，门庭

显赫。

王大门的主人为王裕和王俊兄弟俩。早在二、三十年代王家就成为这一带最有经济实力的门户。老大王裕在外经商，弟弟王俊在家经营土地。二十年代末，便到良乡县城经商开铺子，其店名叫“裕丰厚”。以经营杂粮为主，兼营油盐酱醋。门市的后头有一狭长后院，内有七八间房子，分别为磨棚、库房、厨房、职员宿舍，还有牲口棚。养有三头骡子一挂大车，安有一盘磨。专供运粮拉碾磨用。“裕丰厚”店里长年雇用伙计七、八个人，其中有姓李、艾、张的三人在门面售货。其余四、五个人在后院干加工成粮，制作酱油、醋，赶马车拉运粮食等杂活儿。

王家在本村有沙地三四百亩，交其弟弟王俊经营。绝大部分出租给当地贫苦农民，每亩收的地租也比较高。有时受了灾害种不上玉米、小麦也得交小麦、玉米，其杂粮一概不收，对佃户从不迁就。渔儿沟村有三分之一的穷人都租过他的地种，或给他家扛长活打短工。平时雇长工五、六个人，如张朴、张兰禹等。农忙时雇用季节工达十几个或几十个人。王裕没有儿女，其弟弟王俊，只有一个儿子，名叫王恒文，给王裕过继，两门守一个。据王家老人们介绍，王恒文不务正业，到解放时，他把家底挥霍掉了多一半。“土改”时，家中仅剩百余亩土地和早已空下来的房子，全部分给贫下中农。为躲避战乱兵匪抢夺，王家已于抗日战争初期举家搬进良乡城内居住，集中精力经商，村内土地还由王俊照料。王裕兄弟俩在“土改”时受到冲击。后来的生活一直比较稳定。他们均于“文革”前病逝，年逾都在70多岁。



# 创办《房山人口报》的回顾

张玉泉

近读《房山文史资料》第二十五期登载的刘泽林的文章《青峰与新时期房山文学的繁荣》之后，勾起了我对《房山人口报》创办情况的回忆。

## 办报宗旨

《房山人口报》是房山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在改革开放的中期创办的。它的主要宗旨在于大力宣传贯彻执行党的计划生育方针政策，全面有效地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高人口质量，着力转变广大育龄人群陈旧的生育观念，树立婚育新风。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区的计划生育工作虽取得很大成绩，但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仍需有效控制，此时必须采取各种有效的手段全覆盖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用办报的宣传教育形式，于 1986 年初决定办一份《房山人口报》。该报由计生委办公室主任主抓，计生工作宣传指导站承办，由站长张永顺全权负责编辑，开始为月刊，后因时间太紧改为双月刊。每期为八开 4 版（容 3 万多字），每版内容明确，设置的栏目较全，一版主要刊登国家、市、区颁布的有关计生政策、法规。各级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各乡镇计生工作情况、进度、经验、教训，主管领导的举措，目标管理的实施情况，三无乡镇单位的创建（三无：无计划外生育、无大月份引产、无未婚先孕），计划生育管理经验等。二、三版的栏目和内容主要有《计生简讯》、《工作动态》、《农村新貌》、《科技园地》、《知识点滴》、《家庭与卫生》等计生工作情况和有关知识的推广与宣传。第四版刊登人口文学：反映人口、家庭与计生工作的文学作品，主要面向全区业余文学爱好者写的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连环画等。

《房山人口报》从 1986 年 3 月至 1990 年年底办了近 5 年之久，共出刊 40 多期，对房山区的计划生育工作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 打出知名度

为了办得正规庄重，我们从 1989 年初申请了正式内刊号（准印证为北京市内部报刊准印证 890023 号），使这张专业小报合法化。为了扩大影响，打开知名度，充分发挥名人效应，我们从办报之日起，就想办法请名人题字或撰写文章。在 1986 年底请了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著名文艺评论家、北京人文函授大学校长周红兴题写了报头。



图 1: 周红兴题“房山人口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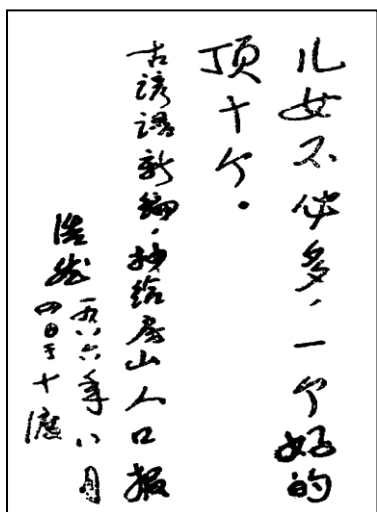


图 2: 浩然题“儿女不必多，一个好的顶十个”

1986 年夏末，当我得知著名作家浩然正住在十渡写他的长篇小说《苍生》时，便利用一个星期天去看望他。我是他在新街下放劳动时交下的老朋友。8 月 4 日下午，当我告辞他时便提出请他给《房山人口报》题个词。他欣然答应，我随即掏出笔记本和笔，他接过来略加思索了一下，便题写了以下字样：“儿女不必多，一个好的顶十个”古谚语新编，抄给《房山人口报》浩然 1986 年 8 月 4 日于十渡。

我们在 1986 年第 11 期（总字第 4 期）的《房山人口报》头版头条刊出了这个题词之后，读者反

响较大。1988 年早春到了，张永顺得知著名作家刘绍棠先生，刚刚病愈出院。在家，他冒着寒风去京登门探望。临告辞时他拿出一份《房山人口报》让刘绍棠一看，他说：“这是我们单位办的一份小报，想请您给题个词！”刘绍棠犹豫了一下，便让夫人拿出纸和笔欣然写下：“人口少而精，中国才富强”题赠《房山人口报》刘绍棠一九八八年二月。永顺接过题字，怀着十分感激之情，深情谢过刘绍棠便告辞了。他坐上公交车，在返回的路上还一遍又一遍地欣赏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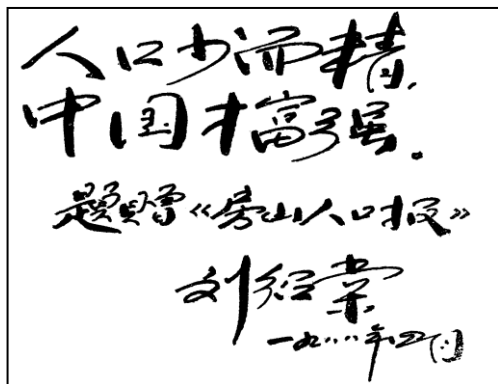


图 3: 刘绍棠题“人口少而精，中国才富强”

位大家的笔墨。事后我想，像我们这个小鼻子小眼小门小户办的小报让这些大家给题字，真有点儿难为情。他们之所以很给面子也完全出于私人关系，否则是办不到的。办报跟写书一样，除内容能吸引人、语言有特色之外，还需让名家（或权威人士）给推荐，这是十分必要的。就是这样每期不足3万字的小报，期期都办得很认真。文字的东西来不得半点儿马虎，况且它代表计生委的窗口，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特别珍爱它。所以一份尘封多年难得见到的小报，偶有发现，才如久别重逢的战友那样兴奋和激动。

那是前年（2010年）一个深冬的上午，我去苏庄农贸市场闲逛，在一个卖旧书报杂志的地摊上偶然发现一张泛黄的《房山人口报》，对折着，里面还夹着一叠旧信封。紧靠报头下登有《中共房山县文件》（房发〔1986〕046号）那是县委转发县计生委党组关于纪念《中共中央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六周年开展学习宣传活动的请示通知，一旁是浩然的那个题词。报头是周红兴先生题的，我一细看是1986年11月出的《房山人口报》（总字4期），距今已有25年了。我如获至宝。我问小贩哪收的，他说从农村买废报纸买来的，他看出了我极欢喜，不忍放下。他说：“这种报纸难得见到，您想收藏？”我点点头，“那就给10元钱吧！”他还显得“很大方”。我犹豫了一下说：“太贵了吧！”我做了扔下报纸要走的姿势，他又怕我不买，于是跳了价，狠狠心，说：“您给一半行了吧！”我花5元钱买下了。其实，我早有收藏，只是怕短缺了这弥足珍贵的一期罢了。

### 文学作者的摇篮

在《房山人口报》副刊上开设了“人口文学”专版，以小说、散文、漫画等文艺形式宣传房山计划生育工作，反映全县20万育龄人群生育观念的新变化，用鲜活的形象，生动的事迹教育人，感染人。起初我担心稿源不足，质量较低而办不起来，经过一段实践之后，情况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来稿之多，质量之好，作者之广，人气之旺，是我想像不到的。有时为了刊登更多的上乘稿件，不得不挤占其它版面。

《房山人口报》副刊的设置，正如刘泽林同志在《青峰与新时期房山文学的繁荣》一文里说“这些虽是行业报纸但都辟有文艺专刊，专发房山业余作者的文学作品，极大地缓解了《青峰》的版面和出版周期的压力”。这是事实，《房山人口报》的创办确实给《青峰》分流了部分作品，减轻了它的压力，为培养

房山文学新人，繁荣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从另一侧面也说明《房山人口报》副刊确实办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否则不会这样“火”。我从《房山人口报》里发现，活跃在今天房山文坛的中老作家，几乎都曾在《房山人口报》发表过文学作品，有的不只一次，比如现任房山文联主席、全国知名作家凸凹，文联副主席张东升，作协主席刘泽林，副主席张永顺，作协副秘书长陈玉泉等。还有张振乾、董华、卓成栋、邢一中等作家、诗人都发了不少作品。他们中多数已成了我的文友，日后跟我有更多的文学交往。当然还有许多作品出自计划生育专兼职干部和广大育龄人群之手。就拿我从地摊上买回的这期报上看，竟出两版文学作品，第三版有纪实小说：《儿子》，有故事：《家教》。有连环画《老模范下山》。有书法；实行计划生育是《致富之路》。还刊载了全国知名诗人晓晴的诗作《桃花开了》。第四版刊登了小柳（刘泽林）的小说《歪脖子树下》，乾恒（张振乾）的抒情小说：《月芽儿》，赵润东的小说《觉醒》，世镛的小小说《计乡长改数》。还有陈玉泉的诗歌：《致年轻的父母》。在二三版的报缝中都登了小小说，还有人物介绍《著名评论家周红兴》《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轶事》等文章。有些作品虽有点幼嫩，但乡土气息很浓，情感真实，感染力较强。有的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较高，情节生动，很受读者青睐。其中有不少作品被国家、省市级的报刊采用，如《北京日报》《中国人口报》《北京日报·郊区版》多次登载凸凹、乾恒、刘泽林、张永顺及笔者的文章。其中有的还获了奖，如笔者的小说《郝秀珍‘告状’》，张永顺的散文《亲闺女》均获《北京日报·郊区版》（见1990年6月27日）新田杯征文三等奖。笔者的《不能光喊难不解难》，张永顺的《话说马淑英》均获《中国人口报微型报告文学征文》三等奖（见1991年11月8日“中国人口报”）。笔者的《只当妈妈正年轻》获现代家庭征文二等奖（见中国人口报1989年末版）

张永顺的散文《山溪流过绿色的山村》获得《中国人口报》举办的“世界50亿人口日奖”（见中国人口报1991年1月4日《乾坤》·第八期）有专家评论，该文“从某一个侧面歌颂了改革，值得称道，它把党的计生政策同农村改革有机地融为一体，立意更高一筹。”笔者的计划生育故事集《太阳在心底燃烧》（中国科普出版社1989年出版，有四分之一故事在《房山人口报》刊登过。另有部分文章在辽宁省锦州市的《家庭报》刊登过。此书被编辑点评：“以田园诗般的乡土情调，浓郁地勾勒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京郊地区人们的风貌，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侧面揭示了什么是家庭、生活和幸福的真谛，沁发着淳朴的泥野芬芳。这些精粹的文章小中见大，平中含高，怪

不得著名作家浩然说一翻此书竟被吸引住。”该书被国家计生委宣教中心推荐给全国计生工作者读物。（见北京计划生育宣教中心主办的《计划生育宣传品制作并发行》（1989 第一期 4 版）。

同时我们还以《房山人口报》的名义开展了以下活动：一、邀请《北京日报·郊区版》副刊编辑给业余作者做如何写好“人口文学”的报告，辅导房山业余作家创作。二、借台唱戏，把较好的作品推荐给《青峰》（含《大房山》）《矿机报》《房山政协报》，以及给《中国人口报》《北京日报·郊区版》等。三、开展《征文》活动，发《征文启示》，征文时间长，题材广泛，文学形式多样。这些十分有效的举措不仅深入宣传了计生工作，而且促进了房山文学创作，培养了房山文学新人。总之《房山人口报》在当时起的作用是值得认真总结和回顾的。

# 八十年代的地方小报

张广明

20 世纪 80 年代，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倾错误，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工作重点和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改革开放的时代号角已经吹响，亿万人民奋发图强开始新的长征。这个时候，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指引下，在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的鼓舞和感召下，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推动“两个文明”建设，传播新思想，新经验，表彰先进人物，歌颂先进事迹，展现改革开放后人们新的精神面貌。各地宣传和文化部门，纷纷组织力量，筹划机构，制定章程，征集稿件，发展通讯员，编辑、印刷、出版本区域的地方报纸或刊物。一时这些属于内部发行，交流的地方小报，如雨后春笋竞相破土而出，春来雪化冰融，一片郁郁葱葱，人们争相传看。



图 1: 80 年代区内出版的报纸

在我收藏的各类报纸中，就有 80 年代期间，北京市一些区县出版，交流的地方小报。如；房山区文联主办的《大房山》，房山计生委主办的《房山人口报》，房山区科委主办的《房山科普》。房山文化馆和文联主办的《青峰》以及改版前的《房山报》。原燕山区北京石油化工公司主办的《燕山石化报》，燕山文化馆主编的《燕山》，北京燕山收藏欣赏联谊会、文管所、文化馆联合主



图 2: 80 年代北京其他区县出版的报纸

编的《收藏春秋》等。此外还有：密云县文化馆主编的《密云文艺》。朝阳区文化馆主编的《芳草地》，门头沟区文化馆主编的《百花山》，海淀区文联主编的《枫叶》，大兴县文化馆主编的《红五月》，石景山区主办的《地名报》，北京群众艺术馆主编的《北京说唱》和唯一的一份《雷锋研究报》。时过 30 年，再翻看这些报纸，依然感到那

个时代人们开拓进取，奋力拚搏，昂扬向上，期盼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心声。

80年代的这些地方小报，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有其共同特点。(1)邓小平同志说过“改革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因此，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宣传报道，“三农政策”，农村改革的新经验，新办法，就成为这些报纸的重点。此外，还以征文，焦点热议，知识竞赛，出专刊等版块，集中报道本地区各



图3：80年代报纸刊登的运动会照片

行各业，围绕中心开展工作服务群众取得的新成绩。(2)随着新时期各方面社会生活蓬蓬勃勃地展开，以文艺形式描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新的矛盾，新的社会面貌的作品多了起来。小说、诗歌、散文、特写、报告文学、书法、美术等、多角度、多层次、多色调，林林总总形成一股气势不小的“文学热”。特别是房山一大批作者，借着地方报纸这一载体，发表了大量具有地域特色，乡土气息的优秀作品。(3)为报纸撰写稿件的作者和通讯员，大多是本地区的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农民、学生、业余作者、文学爱好者。他们深入生活，贴近百姓，不为名利，是一支受到编者欢迎，读者喜爱的创作队伍。这些小报也就办成了学习园地、思想阵地，写作者笔耕的处女地。这些报纸上的报头题字和书法，美术等作品，不少是名人或书法家题写的，如：“房山人口报”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周红兴题写的。还有著名作家浩然题的：“女儿不必多，一个好的顶十个”。画家何君华的《诗配画》。更有这些年在报纸上很少见到的连环画作品。收藏80年代的这些地方小报，也收藏了那个时代的气息，收藏了那个时期的一段历史。

# 我家的土地房产证

李志前

1947年6月，土改工作组来我村，组长张德信，组员杨春茂、杨天凯。他们住徐宪臣的房子（徐解放不久带着家眷去了北平）。当时的村干部是栗友、马向山、李春林。工作组进村，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民主选举成立了农会，主席是王全，副主席是李文月、韩殿禹。（中、下英水村为一个行政村）当时，工作组提出的口号是：“有仇的报仇，有冤的申冤，杀人的偿命，欠债的还钱”。群众发动起来后，曾多次召开诉苦会，启发广大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增强对地主阶级进行清算斗争的意志，对少数地主家里的一些浮财，统一造册，集中到村九神庙里。然后，在工作组、村党支部、农会的主持下，由民主评议，每户贫下中农的经济状况，人口的多少，划分不同的等级，（除金银外）全部公平合理的分给了贫下中农。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实行。这一纲领性文件，为土地改革指明了方向，从而推动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不久，又进行了平分土地运动，彻底实行了土地改革。当时，我家共6口人，原有土地2亩，平均每人占有土地3分多，经过民主评议，我家被定为贫农，又分了5.5亩地，加上原有土地，共计7.6亩，平均每人占有土地1.2亩多，比土改前增加了三倍多。同时，分了房屋4间，从此，我家结束了租地、租房的历史。在平分土地时，村里对每块土地都进行了细致的丈量，地头插上木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姓名、地名、亩数，最后张榜公布。至此，中国农村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被消灭了，贫下中农，扬眉吐气，挺直了腰杆，成了土地的主人，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我家也和广大贫下中农一样，无不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当爷爷看到我家分到的胜利果实后，心中的喜悦难以形容，他对子孙们意味深长地说：“爹娘不能给你们的东西，共产党都给了！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呀！中国从陈胜、吴广起义到今天，历经两千多年，大小农民起义无数次，都没有成功，都失败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才能



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实行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今后，我们的光景会越来越越好。”

1950年，房山县人民政府发给了我《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内容和图如下：

河北省土地房产所有证 字第三十号

房山县第九区下英水村居民李文月，依据中国土地法大纲之规定，确定本户全家（本人）所有土地共计耕地三段七亩六分0厘，非耕地，0段0亩0厘0毫，共计房屋四间，基地二段，0亩0分七厘0毫，均作为本户全家（本人）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予等完全自由，任何个人不得侵犯。特给此证。

县长杜思霖（因年久字已退色）

（土地、房产具体表格略）

一九五零年 月 日



# 我家保存的园田字据

李文长

这张字据，是民国 4 年（公元 1915 年），下英水村李姓家族，爷爷李海元租种祖产园田立的字据。代笔人是我爷爷李春元。一直保存至今，已有 97 个年头了。

说起这片园田，还要从我的 5 世祖李洪智说起，小时候，听爷爷讲过，5 世祖在同辈人中排行老六，有文化，善交际，会经营煤炭行业，因而成了本村较富裕的一族。他膝下有四子，先后为子女买下四个院落的房产和几十亩地。爷爷说：5 世祖真不容易呀！他舍得花钱办大事，硬是在乱石滩上削石岗、填大沟、垒石坝、宽加固、挖石子、厚垫土、造园田，并与原有的土地连成片，因地就势，引水浇灌。使荒滩变成了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自流灌溉，旱涝保收的良田。且站在家门口的阅台上，就一揽无余，被人们誉为一块“金地”。为传承祖业，5 世祖还立下了一条规矩，园田由长子代代相传，不得出卖，不得分割，否则就是败家子，对祖宗的不孝。可到了民国初年，本族李海元爷爷，因家庭生活困难，经族人商议，将祖业园田租给他家耕种，以解决他家的困难，但约定每年交租银九分八厘整，以备族人公共之用。可好景不长，李海元爷爷没种几年，赶上了军阀混战，先后发生了直皖和直奉战争，军阀们为了争夺地盘，控制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出卖主权，充当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体。对内压迫人民，横征暴敛，搜刮民财，恶政猛于虎，百姓苦不堪言。一直到了我爷爷“元”字辈这一代后期，无奈，经本族人商议，按照当时的人口多少，便把园田分掉了。到 1947 年土地改革时，李姓家族已经发展到 19 户 64 人，仅有较富裕，且园田较多的 3 户人家，按照当时的政策，拿出一小部分，有的分给了外姓人耕种。我 5 世祖，不仅重视为子孙们置备不动产，而且还较重视李姓文化的传承。他在通往园田和英水河的小路路口处，下坡的墙崖上还修建了一座直径约 2 米、高约一米的圆堡，中间填土，这一建筑，在农村是极为少见的。建此堡的目的是，警示子孙后代们，智要圆，行要方，做人要厚道。也就是说要胸怀天下，讲团结。做事要守规矩，遵纪守法。君子

以自强不息，以厚德载物，函谷传承道德家。亦有避邪之意。每每观此，我由衷地钦佩我们李姓祖先对传承李姓文化的聪明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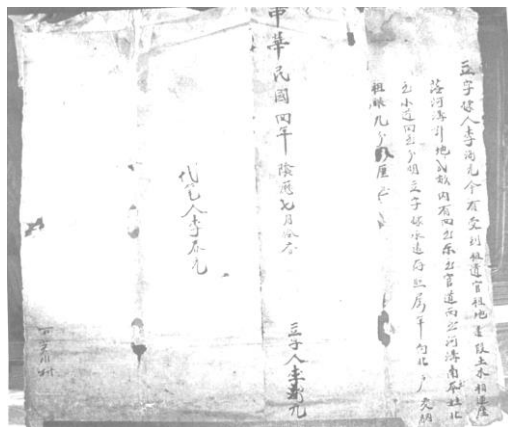
如今，陪伴我度过几十年的那些园田，因河水干涸，变了模样，那座圆堡也不存在了。可有关它们过去的一些往事，仍不时在我脑海中闪现。

### 字 据

立字据人，李海元，今有受到祖遗官租地一段，土木相连，坐落河沟，计地贰亩。内有四至，东至官道，西至河沟，南至本姓，北至小道，四至分明。立字据永远存照，历年向北户交纳租银九分八厘整。

下英水村      立字人：李海元  
                    代笔人：李春元

中华民国四年阴历七月十六日



# 房山地区的恐龙化石

白全永

那是 1993 年夏天，笔者正在当时的崇各庄乡豆各庄中心校读书，突然有一天，在学校的师生中都在议论着一件事——在距离学校不远的崇青水库岸边发现了罕见的恐龙化石！出于好奇，笔者曾相约几名同学亲自到崇青水库去印证此事的真实



图 1：恐龙化石发现地点全景。

性，但可惜的是那次寻找并未发现丝毫有关远古恐龙的痕迹。因此多年来，在崇青水库岸边是否真的发现过恐龙化石，成为笔者脑海中的一个疑问？时过境迁，直到多年后笔者已参加工作，突然在文档《北京历史文化大事记年表》中的一条记载，又重新勾起笔者对此事的关注。这条记载是：“1993 年 6 月，在房山区崇青水库首次发现北京地区恐龙化石。”针对这条记载，笔者又先后查阅了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公布的相关消息和学术类杂志《科学通报》等文献资料。由此对十多年前在房山区崇青水库畔发现恐龙化石的情况，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

## 一、发现过程

据相关书籍介绍，大约在远古时期北京大地曾经是广阔的大海，在石炭纪期间北京地区已经开始了从海洋向陆地的转变，到二叠纪时，西山一带已经全部成为了陆地环境。进入中生代这就是人们家喻户晓的恐龙时代，之后进入侏罗纪和白垩纪。白垩纪末期，地球发生突变，恐龙灭绝。北京地区的侏罗纪在门头沟区和延庆县等地留有印迹，北京地区的白垩纪遗迹主要分布在房山区及其周边。北京的白垩纪系发育，经历了燕山运动最强烈的地壳差异性上升时期。其出露不全，仅存白垩统，主要分布在房山区青龙湖镇内及丰台区大灰厂一带，在房山区良乡东部和蒲洼鱼斗泉有零星分布。

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的地层古生物学界普遍认为：北京房山区坨里（现为青龙湖镇域内）至丰台区大灰厂一带，中生代地层发育完全，化石丰富，为河流、湖泊相沉积。地层古生物工作者在该区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1979年专业人员王自强、王璞在《地质学杂志》上，1982年专业人员洪友崇在《地质学报》上，以及在1984年由地质矿产部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主编的《华北地区古生物图册（二）--中生代分册》（地质出版社出版）都曾经介绍过本地区。因此可以说，能够在房山区崇青水库岸边发现罕见的恐龙化石并不是偶然，但其发现过程却源于一次偶然的野外地质调查。

1993年6月9日，北京的地质工作者赴西山进行野外地质考察。本次考察是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和北京自然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察组，成员有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田树刚和自然博物馆的王文利等人。考察组在京郊房山区崇青水库岸边进行白垩纪地层调查和化石标本采集时，发现了一块早白垩世的恐龙骨化石。化石是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年轻博士、副研究员田树刚发现的。化石发现确切地点在房山区崇青水库南岸的下白垩统卢尚坟组。该组是北京地区白垩纪遗迹出露地层组之一，本组地层发育于湖沼环境，在此发现了大量的远古动植物化石，被地质界称为“房山生物群”，特别是在本组地层发现的拟刺蕨、延吉叶肢介、裂尾甲属于典型的白垩系生物。虽然卢尚坟组化石丰富，但之前却一直未发现过恐龙化石，这次发现也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恐龙化石，具有重要的意义。

## 二、化石考证

化石的发现者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田树刚在1994年第08期《科学通报》上撰写了《北京地区首次发现恐龙化石》一文，对本次发现的恐龙化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根据化石所保存中近端的粗壮程度和形态特征，推断化石是恐龙中部左侧背椎第6—8节肋骨之一的上段。化石全长51cm，上端宽14.5cm，中部宽8.5cm，下端宽7cm。前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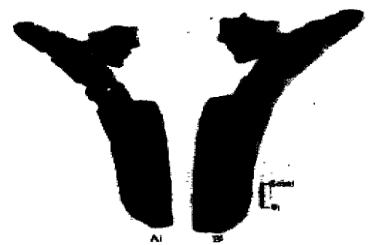


图2:恐龙化石图示 A-前表面, B-后表面。

发育一纵向中槽，中槽于化石上端宽而深，几乎占据化石整个宽度，向下端渐窄渐浅最终消失。化石后表面具一浅内侧槽，限于化石内侧1/2宽度内，内侧槽向下端迅速变窄，在化石中部消失。恐龙化石保存于卢尚坟组中部一套近百米厚的紫红、灰褐色岩层的底部，一层黄灰色厚层含砾砂岩中。这层岩石由大小不等的

含砾砂岩透镜体组成,透镜体短可不足 1m,长可数十米不等。为多次重力流堆积而成。每个透镜体的沉积物粒度下粗上细,经粗略分选,呈砾——砂——页岩的粒序层。属湖滨三角洲前缘相。恐龙骨骼,也许动物整体是经过搬运后沉积的。这些透镜体顶部的薄层黑色页岩中采到大量植物化石;这套岩层的上覆、下伏层位中均产有丰富的昆虫、介形虫和双壳类等化石,都已经前人多次研究,属早白垩世生物群。完全可以和辽西、山东等地的相当生物群对比。

中国地质博物馆专家胡承志、中国地质大学专家李凤麟对发现者进行了悉心指导;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赵喜进鉴定了化石标本,认为此次发现的恐龙化石是腕龙类中的盘龙亚科的骨化石。根据保存部分中近端粗壮程度等形态特征,推测是一中等大小蜥脚类之中部背椎左侧肋骨。这种蜥脚类恐龙生活在约 7 亿年前的早白垩世,个体长约 5 米左右,是一种食草类恐龙。这块恐龙化石标本,当时保存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三、 科研价值

据相关专家介绍,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富藏恐龙化石的国家之一。在 1993 年 6 月之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发现过恐龙化石,尤其是北京周围的山西、河北、河南、辽宁、内蒙古和山东也陆续发现过恐龙的化石。那么北京地区中生代是否有恐龙生存?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这次恐龙化石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北京这一恐龙化石空白区;而且有其重要的科研价值。这正如从事了多年恐龙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赵喜进教授说的那样:“这是北京地区恐龙化石的首次发现,对研究中生代爬行动物,特别是庞大的恐龙类的进化史,恢复北京地区的古地理、古生态和研究蜥脚类恐龙的迁徙规律以及确定和对比中生代陆相地层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科学依据。”无疑,1993 年房山区这次恐龙化石的发掘,在北京地区恐龙化石的发现与研究方面是一个重大突破。

房山区被誉为“龙乡”,因在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闻名中外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而得名。1993 年恐龙化石的发现地点距离“北京人”的故乡——周口店猿人遗址约近 15 公里,这充分说明房山区的化石资源蕴藏品种丰富繁多,房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化石之乡”。在房山区首次发现北京地区的恐龙化石,这对于研究房山区的古动物群、古地理环境和建设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鉴证了房山沧海桑田的自然历史,同时为龙乡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

# 麻将解禁 定局房山

张广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麻将一直成为赌博和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代名词，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打麻将都不能光明正大，买卖麻将牌都得偷偷摸摸，怕被抓到遭受处罚。而这种情况到 80 年代末才有了改变。老百姓打麻将公开了，社区里建立了棋牌室，群众娱乐活动，又多了一项比赛。到 1998 年更是进入国家竞技体育项目。这个过程出现的转变及最后定局，是于 1996 年 8 月 19—24 日国家体委在北京房山召开的一次“麻将座谈会”。

起因是这样的：张普生是安徽省老年体育协会秘书长，老干部俱乐部副主任。1983 年前后，张普生和他的同事发现很多老干部偷偷在家打麻将，而棋牌室越来越冷清，一些老干部也不避讳自己这个爱好，跟他说，能不能在俱乐部里搞次麻将比赛？张普生觉得这事非同小可，但也没有简单拒绝，决定将这个情况反映上去。张普生两上北京，却遭到有关部门的冷漠和拒绝。但他并未泄气，又找到安徽省公安厅。公安厅的一位处长建议老张去调查赌博的历史，这样可以为麻将不能和赌博画等号提供历史依据。随即张普生在北京各大图书馆泡了 20 多天眼界大开，受益非浅。这更加坚定了要将麻将办成体育竞赛的决心。张普生顶住压力、怀疑，以及生活上的打击与困难坚持不懈，经过多方努力终于看到了希望。那是 1985 年 10 月 11 日，公安部下发了一份标有“机密”字样的通知。这份文件的题目是《关于公安机关不再干预麻将，纸牌的制造，销售问题的通知》。通知只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级别的单位，通知上还特别强调此事必须内部掌握，不登报，不广播。文件中特别指出麻将是我国传统的娱乐活动工具。说明麻将和赌博不是一回事。张普生认为，这是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带来的宽松政策，意味着可以组织麻将比赛。于是 1987 年，张普生组织了安徽省第一届老干部麻将比赛，之后，到 1995 成功地组织了多次全国性比赛。张普生觉得，把麻将纳入国家竞技体育项目的时机成熟了，他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国家体委元老董念黎，并由他亲手交给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

1996年8月19—24日，国家体委在房山水利局培训中心召开了“麻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代表有来自9个省、市13个单位20人。大家一致支持，并建议将麻将列入国家竞技体育项目。会后，整理了一份《麻将座谈会纪要》，国家体委党组为了慎重，每位成员都签了名。1998年4月12日，国家体委总局社体中心正式编审了《中国麻将竞赛规则》。从此，麻将解禁。定局在房山召开的座谈会，也就成了上世纪末，房山人见证麻将解禁背后的故事的一段史料。



